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六卷

1857年1月—1857年12月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01-005199-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557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六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3.375 插页:9

字数:58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5199-4 定价:48.00 元

ISBN 978-7-01-005199-4



9 787010 051994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 1857 年 1 月至 12 月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继续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评和政论,以及应约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一系列条目。

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 1848—1849 年革命遭到失败以后,整个欧洲陷入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英国,获得长足发展。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成倍增加,信用和银行业空前发展,证券交易所中弥漫着投机的狂热。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个政治反动和经济繁荣的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根据大量事实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分析,认为普遍的危机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动荡。在收入本卷的文章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当时波及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抨击了欧洲列强反动的内外政策,揭露了它们野蛮的殖民掠夺,高度评价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抗列强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对 1848—1849 年革命后欧洲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早在 1856 年秋天就已得出一场新的经济危机行将发生的结论。1857 年爆发的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正因为如此,“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

新出现”(见本卷第 501 页)。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最初消息传至英国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英国的经济学家们断言:“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咳!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太不健康。”马克思就此指出,当时“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状态的震荡”(见本卷第 479 页)。果然,不久之后,英国经济形势恶化,曾高奏以英国贸易“健康”为主题的华丽变奏曲的《泰晤士报》一改原先的调子,惊呼“英国的经商阶级已经病入膏肓”,并宣称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乃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万恶之源。针对这种说法,马克思指出,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或狂热的投机活动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的周期性的痉挛,是因果倒置,“就像那些如今已经绝种的自然哲学家学派那样,把发烧看做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见本卷第 501 页)。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一系列文章,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括,它们不仅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在 18 世纪 50 年代这个时期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结束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它相继渗入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接着,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旋涡。早在经济危机爆发前,马克思已预见到,这种普遍的投机活动必然导致普遍的危机。在《1844 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法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马克思具体考察了危机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发展,深刻分析各国的工业、贸易和

金融业状况,详细研究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利率的变动,经常跟踪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巴黎证券交易所证券行情的涨落。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科学地预见到1857—1858年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认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范围来说,这场危机必将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最终酿成世界性的危机。

马克思论述1857年经济危机的文章利用了大量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各种报刊和统计报告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和马克思从中做出的概括和结论,后来成为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组成部分。

1857年爆发的危机,表现为各国生产规模急剧缩减,大批工厂倒闭,许多企业破产,市场商品过剩,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质的经济危机。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各国政府想方设法减少资本家阶级的损失,竭力把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使劳动群众本已十分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马克思在《欧洲金融危机》一文中写道:“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劳动阶级的贫困,正在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见本卷第505页)在《工厂工人状况》和《英国工厂制度》中,马克思引用实际材料和具体数字揭露了工厂主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工厂主们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降低工人工资,而且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用童工代替成年工。马克思满腔激愤地把这些资本家称之为“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见本卷第115页),认为“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见本卷第116页)。同样,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论述法国经济政治状况及“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些文章中,揭露了路易·波拿巴与交易所投机商之间或明或暗的勾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恶劣的境地,使国内的

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马克思写道：“越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看到，社会的表层已随着地下火的活动而起伏震荡。”（见本卷第 173 页）

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通讯中，马克思关注的重点之一，仍然是英国的内政和对外政策。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卜生的失败》等文中，马克思指出 50 年代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各传统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腐败变质。马克思说，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权的执政者妥协。马克思强调指出，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寡头政权的合流，严重阻碍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帕麦斯顿政权反对任何民主改革，他的经济政策和法令，都是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帕麦斯顿代表着力图扩大市场、巩固英国在全球的工业垄断地位以及进一步进行殖民扩张的资本家的利益。

除了英国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50 年代还深入研究了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沙皇俄国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反动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们认为，各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其本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

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外交关系的走向，指出这些关系仍旧沿袭着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反动传统。马克思在该文中还谈到分析某些事件时如何把握具体事实与理论概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类比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很大分量。他们揭露了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殖民政策，十分关注 50 年代中期已广泛掀起的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解

放斗争。

在一系列论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事件的文章中,马克思继续发挥他早在 50 年代初就提出的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前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思想。在《英中冲突》、《对波斯的战争》、《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等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强调指出英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的侵略性质,指出这些外交活动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

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攫取利益,英国资本家不仅利用本来存在于两地不同民族之间部落的和宗教的纠纷,而且人为地煽起它们之间的仇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等文章中,严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华的野蛮暴行,支持和赞扬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英勇斗争。

英国政府借口保护居住在中国的英国公民的生命财产,不顾国际法的起码准则,悍然对中国发动战争。马克思考察了这次冲突的经过,谴责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见本卷第 23 页)。马克思说,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使广州城中的无辜平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侵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践踏。对于英国侵略者提出的种种荒唐借口,马克思说:“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见本卷第 93 页)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在中国进行掠夺,两次挑起所谓的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阐明这些战争的海盗式掠夺性质,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对和平居民犯下的可耻暴行。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

中指出，“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见本卷第 106 页）马克思在谈到鸦片战争时写道：“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记录下这些暴行的不是中国官吏，而是那些英国军官自己。”（见本卷第 335 页）

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反动统治者和与其沆瀣一气的外国侵略者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当英国侵略者及英国报刊伪善地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时，恩格斯针锋相对地驳斥道：“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并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见本卷第 14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预言过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认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 148 页）。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 1857 年爆发的民族大起义撰写的多篇文章。这些文章跟踪报道了起义从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在《印度军队中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德里的攻占》和以《印度起义》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揭示了起义的性质，分析了起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起义最终遭到失败的原因。

印度各阶层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到 50 年代，这种矛盾急剧尖锐化，终于在 1857 年爆发以饱受歧视和压迫的土著士兵为主力的反英起义，起义迅即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英国统治阶

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把它说成仅仅是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西帕依”的军事叛乱。英国殖民主义当局竭力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证明起义只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谎言。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印度起义看做是全民族的运动,看做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马克思写道:“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就有过多次哗变,但是这次的起义不同,其性质特别严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见本卷第 165 页)

除了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57 年 7 月起开始应约为美国资产阶级进步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军事和军事史方面的条目。为了使马克思能有更多时间继续研究经济问题,完成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任务,上述的百科全书条目大部分由恩格斯执笔,马克思主要负责撰写一批人物传记条目,还有一部分条目则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他们尽量选择那些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有价值的问题作为条目。就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一样,他们竭力利用这类合法出版物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尽管该书的编辑部要求作者不表现党派倾向,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辞书性质对革命政论作品形成一定的限制,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条目中可以看出,他们仍然善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体裁的作品中阐发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恩格斯对军事科学作过长时间深入的研究,在军事学术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在军队史、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在当时革命家的圈子里素有“将军”之称。在本卷中,恩格斯所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条目,共有近 40

篇之多,内容相当广泛。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军队产生的历史条件,深入分析了军队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以及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等等。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第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考察各个时代的军队。他指出,军队的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恩格斯揭示了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成以后国家军队的阶级性,论证了军队的盛衰总是和与其相关联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相伴随。例如古希腊军队及其方阵战术和古罗马军队及其军团制度的衰落,都是奴隶制社会内部促使该社会崩溃的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长篇力作《军队》,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马克思读了这篇文章之后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对军事技术问题,恩格斯也相当重视。除了在一些关于军事的长条目中论述军事技术的历史方面之外,还写了有关各种武器(《火绳枪》、《刺刀》、《爆炸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手段(《炮兵连》、《炮艇》、《棱堡》、《掩障》等)和辅助技术手段(《军用桥》等)的一系列短条目。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论证了重要的技术发明,如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等对武装力量和军事科学发展的影响。

恩格斯在《山地战的今昔》以及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

斗争的文章中,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各种历史实例,阐发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种战争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人民斗争特有的战争形式。

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主要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传记。这些文章通过对个别人物的生平的描述,反映出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的本质特征及其所处时代的风貌。《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里安》、《贝西埃尔》、《布吕纳》等条目,描绘出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群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从1789—1794年革命到后来成为反革命波拿巴政权支柱的演变。这些人大多是在1789年革命的动荡中发迹和飞黄腾达的。在确立了反动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或者成了利欲熏心和贪得无厌之徒(布里安、布吕纳),或者成了追逐官位、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贝尔纳多特),或者成了可以为任何制度效力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贝尔蒂埃)。拿破仑麾下的这些元帅的传记,展示了拿破仑第一帝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真实面貌。在《毕若》这个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画了一个愚蠢而残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的忠实奴仆的嘴脸。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篇幅较大的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的生平传记,提供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传记以德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共同反拿破仑统治的战争为背景,展现了这位卓越的统帅的活动,并强调他怀有平民情感,在民众中颇得人心。

马克思的《勃鲁姆》一文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都是革命活动家的传略。前者记述了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勃鲁姆的事迹,高度评价了他忠于革命、勇敢战斗的一

生。《贝姆》一文则描述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指挥艺术，说他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在游击战和山地战中表现出是第一流的统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条目，记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自16世纪中叶起，新崛起的海上强国英国，不断地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经常抢劫西班牙运送金银财宝的船队，袭击西班牙的殖民据点，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因此，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决定派遣一支当时举世无双、自称“无敌”的庞大舰队远征英国。“无敌舰队”在海战中遭到惨败。从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为英国所取代。这个由马克思提供资料、由恩格斯执笔、最后又由马克思加以修饰润色的条目，根据丰富详尽的资料，生动地描绘了欧洲历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英西海战的过程。

恩格斯在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条目中，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们变成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的对象。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阿富汗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阿战争而进行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活动。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有力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行径。他写道：“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在每一座大小城镇被征服时，处处都有大量的生命牺牲。……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庄稼被践踏，幸存的受难者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惨遭奸淫和暴

力。法国人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完全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准则。”（见本卷第 281 页）

这个时期，除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和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条目之外，在经济危机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搜集的材料，于 1857 年 7 月开始集中更大的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学巨著，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奋笔疾书，完成了通常所说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手稿现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和第 31 卷。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卷次收入的增加 1 篇《布朗》。原收入第 1 版的《阿克》、《阿克齐》、《阿兰群岛》、《阿尔梅达》、《阿穆塞特炮》、《阿尔贝雷》、《阿斯佩恩》，经考证不是恩格斯撰写的，本卷不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和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原文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孙家衡 李朝晖 胡尧之 杨彦君

参加本卷军事著作部分译校工作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刘善继 潘嘉玢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

周秀凤 耿睿勤 李朝晖 章丽莉 卢晓萍
胡永钦 刘洪涛 朱 羿 李 楠 朱 毅

全卷译文由张启荣审定

目 录

前言		1—11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		3—11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		12—16
卡·马克思 * 英中冲突		17—23
卡·马克思 对波斯战争		24—29
卡·马克思 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30—44
弗·恩格斯 *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45—51
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预算		52—60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61—67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68—74
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		75—79
卡·马克思 * 俄国的对华贸易		80—83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		84—89
卡·马克思 *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90—93
卡·马克思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94—95
卡·马克思 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		96—101
弗·恩格斯 *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102—107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108 —112
卡·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113 —116
卡·马克思	英国工厂制度	117 —124
弗·恩格斯	* 俄国军队的变革	125 —128
卡·马克思	英国的金融舞弊	129 —133
卡·马克思	动产信用公司	134 —141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142 —148
卡·马克思	有趣的揭露	149 —154
卡·马克思	*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155 —158
卡·马克思	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159 —163
卡·马克思	印度军队中的起义	164 —167
弗·恩格斯	艾雷	168 —171
卡·马克思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	172 —176
弗·恩格斯	火绳枪	177 —179
弗·恩格斯	攻击	180 —184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 —188
弗·恩格斯	阿本斯贝格	189
弗·恩格斯	副官	190 —191
弗·恩格斯	阿尔布埃拉	192 —193
弗·恩格斯	阿尔登霍芬	194 —195
弗·恩格斯	亚历山德里亚	196 —197
弗·恩格斯	阿利马	198 —202
弗·恩格斯	安特卫普	203 —204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	205 —210
弗·恩格斯	鹿砦	211

卡·马克思	来自印度的消息	212—215
弗·恩格斯	阿富汗	216—225
弗·恩格斯	军队	226—269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的现状	270—273
弗·恩格斯	阿尔及利亚	274—285
弗·恩格斯	弹药	286—287
卡·马克思	东方问题	288—293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294—297
卡·马克思	* 欧洲的政治形势	298—301
卡·马克思	* 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	302—30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莱-德-托利	308—310
卡·马克思	贝尔蒂埃	311—31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卞尼格先	315—318
卡·马克思	勃鲁姆	319—321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322—328
卡·马克思	*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329—333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334—338
卡·马克思	* 法国动产信用公司	339—342
弗·恩格斯	炮座	343
弗·恩格斯	棱堡	344—345
弗·恩格斯	刺刀	346—347
卡·马克思	贝尔纳多特	348—358
弗·恩格斯	军用桥	359—3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吕歇尔	365—382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383—387

弗·恩格斯	会战	388—391
卡·马克思	布朗	392—39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阿亚库乔	394—3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班牙无敌舰队	396—399
卡·马克思	布里安	400—401
弗·恩格斯	垛墙	402—403
弗·恩格斯	炮兵连	404—406
弗·恩格斯	露营	407
弗·恩格斯	掩障	408—40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博斯凯	410—411
卡·马克思	贝西埃尔	412—41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姆	414—418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419—422
弗·恩格斯	爆炸弹	423—424
弗·恩格斯	双桅炮艇	425
弗·恩格斯	防弹工事	426—427
弗·恩格斯	炮艇	428
弗·恩格斯	炮手	429
弗·恩格斯	轰击	430—431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432—437
弗·恩格斯	炮兵	438—464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465—470
卡·马克思	布吕讷	471—474
卡·马克思	* 1844 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	475—480
卡·马克思	英国的震荡	481—487

弗·恩格斯 * 德里的攻占	488—495
卡·马克思 毕若	496—499
卡·马克思 * 英国的贸易危机	500—504
卡·马克思 * 欧洲的金融危机	505—510
卡·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511—513
卡·马克思 法国的危机	514—519
注释	521—610
人名索引	611—66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669—670
文献索引	671—697
报刊索引	698—703
地名索引	704—721

插 图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的手稿第 1 页	5
卡·马克思《对波斯战争》的手稿第 1 页	27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图(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年)	103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 1 卷的扉页	169
阿利马会战图(1854 年 9 月 20 日)	199
阿富汗(1838—1842 年第一次英阿战争时期)	222—223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19 世纪上半叶)	277
中欧的军事行动(1813 年 8 月 13 日—1814 年 4 月 1 日)	380—381
1857 年的德里	489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7年1月—1857年12月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¹

最近瑞士可能遭到入侵²，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引起了公众不仅对这个山地共和国的防御能力的关注，而且对整个山地战的关注。人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瑞士固若金汤，而认为入侵的军队无非是些高呼“万岁，凯撒，决心赴死的人向您致敬”^①那有名的口号的罗马角斗士。^②人们常向我们提起森帕赫、莫尔加滕、穆尔滕和格朗松的会战³；人们还说，外国军队进入瑞士也许相当容易，但是，正如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的弄臣所说，他们进去容易出来难。甚至军人也会列举出许多险要的山口和隘路的名字，在那种地方，很少的几个人就能轻易地对付敌人上千名精锐之师。^③

① 古罗马历史学家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十二凯撒传》中的《克劳狄乌斯传》。——编者注

② 手稿中本文的开头部分是：“每当瑞士卷入一场战争时，人们对这个国家普遍怀有一定程度的敬畏之情，并倾向于认为入侵的军队无非是些高呼‘万岁，凯撒，决心赴死的人向您致敬’那有名的口号而定遭惨祸的罗马角斗士。”——编者注

③ 手稿中接着还有下面一段话：“为了使你完全相信，他们会在你面前摊开一张以暗色绘出山脉和坡地的瑞士地图，并问你：在这山岩、峡谷、冰河、湍流和悬崖峭壁纵横交错的迷宫里，一支军队怎么寻找道路和协同行动呢？”——编者注

被称为山地要塞的瑞士固若金汤这个传统观念，始于 14 和 15 世纪对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几次战争⁴。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者的主要兵种是披甲戴盔的骑士队，它的威力在于对那些没有火器配备的军队进行不可抗拒的猛攻。但是在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却不能进行这种猛攻，在那里，骑兵，除了最轻装的和少量的，现在甚至毫无用武之地。至于那些身披成百斤铁甲的 14 世纪的骑士，就更无能为力了。他们只得下马徒步作战；这样，他们就连最后一点机动性也丧失无遗，入侵者便变成了防御者，而一旦遇到隘路，甚至连棍棒也抵挡不了。在勃艮第战争时期，手持长矛的步兵在军队里已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并且采用了火器，但是步兵仍然受到沉重盔甲的束缚，火炮很重，轻火器还比较笨拙，不大好用^①。部队的各种装备仍然非常笨重，使他们根本不适于进行山地战，尤其是在那种可以说几乎还没有道路的时代。因此，这些行动迟缓的军队一旦陷入难以通行的地区，就寸步难移，而轻装的瑞士农民却能采取进攻行动，机动制胜，包围并最后战胜敌人。

在勃艮第战争以后的三百年间，瑞士从未遭到严重的入侵。关于瑞士人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逐渐神圣化，一直保持到法国革命，这个粉碎了许多神圣传统的事变也把这一传统观念打破了，至少在熟悉军事史的人们心目中是如此。时代变了。铁甲骑兵和行动不便的长矛手绝迹了；战术经过了多次的革命化变化；机动性成为军队的主要素质；马尔伯勒、欧根^②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横队战术不断被革命

① 手稿中是“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是“还比较笨拙，不大好用”。——编者注

② 萨瓦亲王。——编者注

When this is a chance of Switzerland being involved in a war, the general public look upon that country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awe, and are inclined to ^{grant} ~~obey~~ the invading army, with the Roman gladiators whose: Res, Caesari, morituri tu salutaris has become so celebrated. We are reminded of Surlach and St. Gallen, Alaric and Franson, and we are led to think it may be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any foreign army to get into Switzerland, but that it will be found ^{very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hard} ~~hard~~ ^{to} ~~to~~ ^{get} ~~get~~ ^{out} ~~out~~ again even military men will recite the names of a dozen mountain passes, defiles, which are, by aspects of tradition, perfectly impregnable, and where a handful of men may with ease & successfully oppose a complete ~~host~~ ^{host} ~~of~~ ^{of} the houses & ~~of~~ ^{of} ~~the~~ ^{the} ~~houses~~ ^{houses} soldiers. Had to complete your illustration, try will put a map of Switzerland before you, shall visit mountain-ridges & slopes, and you know how an army is to find its road & to act in concert in the labyrinth of rocks, ravines, glaciers, torrents & impassable mountain crests.

This traditional impregnability of the so-called mountain-forts of Switzerland dates from the time ~~of~~ ^{of} the wars with Austria and Burgundy in the 14th & 15th centuries. At ~~the~~ ^{the} ~~time~~ ^{time} ~~of~~ ^{of} the ~~former~~ ^{former} ~~Swiss~~ ^{Swiss}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Swiss~~ ^{Swiss} ~~the~~ ^{the} ~~armoured~~ ^{armoured} ~~cavalry~~ ^{cavalry} ~~of~~ ^{of} ~~the~~ ^{the} ~~knights~~ ^{knights} had not the chief arm of the invaders, all ~~of~~ ^{of} ~~the~~ ^{the} ~~force~~ ^{force} ~~was~~ ^{was} ~~struck~~ ^{struck} ~~down~~ ^{down} in the ~~possibility~~ ^{possibility} ~~of~~ ^{of} ~~the~~ ^{the} ~~charge~~ ^{charge} ~~against~~ ^{against} ~~armies~~ ^{armies} ~~undefeated~~ ^{undefeated} by ~~the~~ ^{the} ~~fire~~ ^{fire} ~~arms~~ ^{arms} ~~that~~ ^{that} ~~in~~ ⁱⁿ ~~a~~ ^a ~~country~~ ^{country} ~~like~~ ^{like}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where~~ ^{where} ~~except~~ ^{except} ~~of~~ ^{of} ~~the~~ ^{the} ~~lightest~~ ^{lightest} ~~kind~~ ^{kind} ~~(is~~ ^{(is} ~~even~~ ^{even} ~~now~~ ^{now} ~~needed~~ ^{needed} ~~);~~ ^{);} ~~how~~ ^{how} ~~much~~ ^{much} ~~more~~ ^{more} ~~so~~ ^{so} ~~was~~ ^{was} ~~the~~ ^{the} ~~brilliant~~ ^{brilliant} ~~of~~ ^{of} ~~the~~ ^{the} ~~14th~~ ^{14th} ~~century~~ ^{century}, ~~armed~~ ^{armed} ~~with~~ ^{with} ~~nearly~~ ^{nearly} ~~a~~ ^a ~~hundred~~ ^{hundred} ~~weights~~ ^{weights} ~~of~~ ^{of} ~~iron~~ ^{of} ~~iron~~ ^{iron}? They had to dismount & fight on foot, thereby their last remnant of mobility was lost; they, the invaders, were reduced to an almost absolute defensive, & caught in a defile, ~~could not~~ ^{was defeated} ~~be~~ ^{by} ~~defeated~~ ^{by} ~~by~~ ^{by} ~~the~~ ^{the} ~~burgundian~~ ^{burgundian} ~~war~~ ^{war}, ~~infantry~~ ^{infantry} ~~armed~~ ^{armed} ~~with~~ ^{with} ~~pikes~~ ^{pikes}, had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portion of an army of foot; fire-arms had been introduced, but the infantry was still cramped by the weight of defensive armour, the cannons were heavy, & small arms ~~in~~ ⁱⁿ ~~their~~ ^{their} ~~infantry~~ ^{infantry}. The whole equipment of the troops was still so heavy & cumbersome.

军的纵队和散兵线所推翻；波拿巴将军在 1796 年越过卡迪博纳山口，楔入奥军和撒丁军分散配置的纵队中间，从正面击溃了他们，同时又在滨海山脉的峡谷里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并俘虏了大部分敌军——自从这个时候起，就诞生了新的山地战技巧，瑞士固若金汤的看法也就随之告终了。

在采用现代战法以前的横队战术时期，作战双方往往都竭力避开难以通行的地形。地形越平坦，就越被认为是好战场，只要有一些能保障一翼或两翼安全的障碍物就行了。可是法国革命军开始采用了另一种战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进行防御，他们都力求找到正面前有障碍物的阵地，因为这种障碍既可掩护散兵，又可掩护预备队。总的说来，他们更喜欢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作战；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得多；他们的战斗队形——散开队形和纵队——不仅可以^①向任何方向迅速运动，而且甚至能有效地利用起伏地上的各种掩蔽地，而他们的敌人在这种地形上却一筹莫展。实际上，“不能通行的地形”差不多已从军事术语中删去了。

瑞士人在 1798 年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法军的四个师尽管遇到部分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和旧森林州的三次反复起义，仍然控制了个国家，使它在以后三年内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反法同盟之间最重要的战场之一⁵。法国人毫不在乎瑞士的那些难以攀登的高山和峡谷，他们早在 1798 年 3 月间，在马塞纳径直向当时被奥军占领的险峻多山的格劳宾登州进军时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奥军当时据守上莱茵河谷。马塞纳的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越过一些几乎不能通过马匹的山口，突入河谷，占领了所有的出口，迫使奥军在短时间的

^①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编者注

抵抗以后放下了武器。奥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教训；在对山地战素有研究的霍策将军的指挥下转入进攻，以同样的战法赶走了法军。以后，马塞纳退到苏黎世附近的防御阵地，并在那里击败了科尔萨科夫率领的俄军；接着苏沃洛夫越过圣哥达山口侵入瑞士，不久溃退；最后，法军又经格劳宾登进军蒂罗尔，麦克唐纳在严冬从这里越过了三座在当时即使以一路纵队行进也难以通过的山岭⁶。在这以后，拿破仑的几次大规模战役都是在辽阔的多瑙河与波河流域进行的；这几次战役具有远大的战略企图，即切断敌军与他们补给中心的联系，击溃敌军，然后夺取补给中心。这就需要起伏较小的地形和集中大量的兵力来进行决战，但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这是做不到的。然而，从拿破仑在 1796 年进行第一次阿尔卑斯战役和他在 1797 年越过尤利安山向维也纳进军直到 1801 年为止，整个战争历史证明：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和峡谷已再不能使现代军队望而生畏了；从那时起直到 1815 年，阿尔卑斯山无论对法国或反法同盟的军队都没有提供过任何值得一提的防御阵地。

当你通过任何一个有山道从阿尔卑斯山北坡蜿蜒曲折地伸向南坡的深谷时，你在山道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会看到极其险要的防御阵地。以大家熟悉的维亚马拉山口为例。任何一个军官都会说，他用一个营就能守住这个隘路，击退敌军，只要他确信不会被人从后方迂回。可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甚至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脊上，也没有一个山口是不能迂回的。拿破仑进行山地战的准则是：“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苏沃洛夫就曾这样做过，当时他被紧紧地堵在罗伊斯河谷中，不得不率领军队沿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羊肠小道行军，而勒库尔布这位法国最善于进行山地战的将军正

紧跟在他背后追击。

这种从后方迂回敌人的手段能够绰绰有余地抵消防御阵地的威力,而从正面进攻则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防御者要扼守所有可能被敌人用来对阵地进行迂回的道路,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对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监视,而击退迂回运动要靠预备队的合理使用和各个分遣部队指挥官的正确判断和迅速行动;然而,即使三四路迂回纵队中只有一路获胜,防御者也会陷入极端的困境,几乎等于所有迂回纵队都获得成功。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从纯粹战术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防御阵地通常都是峡谷,在谷地配置强大的纵队,而在高地上配置一些散兵作掩护。这种阵地可以从正面迂回,这时散兵群可沿谷地的两边攀登,从侧翼包围防御者的优秀射手;只要情况允许也可以派出小部队沿山脊顶或与峡谷平行的谷地进行迂回,而迂回的大部队则可以利用某一山道袭击防御阵地的翼侧或后方。在所有这些场合,迂回部队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占领着较高的地势,能够俯视敌方所占的谷地。他们可以使用滚木礮石打击敌人,因为现在没有一个纵队会那样愚蠢,不肃清两侧山坡上的守军就进入深谷。所以,这种不久前还是人们惯用的防御方法,现在反而被用来对付防御者了。山地防御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防御所主要依靠的火器的作用因山地地形而大为减弱。火炮几乎毫无用处,即使真正使用火炮,退却时往往也被扔掉。那些由轻榴弹炮组成的、用骡子驮炮的所谓山地炮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已为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⁷。至于谈到火枪和步枪的使用,由于在山地到处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就是说,在防御阵地前面并

没有一块敌人必须在火力下通过的开阔地。由此可见,无论从战略观点或战术观点来看,我们都会得出奥地利卡尔大公——山地战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和论述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著作家之一——所做的结论:在这种战争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巨大的优势。

那么,这是不是说防御一个山国是徒劳无益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性中寻求力量,只要有机会,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在阿尔卑斯山区,几乎很难进行战斗;整个战争就是一连串的小的行动,进攻者不断试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楔入敌方阵地,然后向前推进。双方军队都只能分散行动;双方都可能随时遭到对方有效的攻击;双方都不得不寄希望于一连串不能预见的突发事件。因此,防御者可以利用的惟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找出敌人的这些弱点,急速地插入敌方被分隔的纵队之间。这样,单纯消极防御所惟一依靠的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就变成了可能诱使敌人冒险进攻的许多陷阱,而防御的主力却指向了敌人的迂回纵队,使每一支迂回纵队都可能反而被迂回,而陷入它原来想使防御者陷入的那种绝境。然而很明显,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这时一切全靠各分遣部队的迅速和明智的行动。

还有一种现在大家已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战,那就是民族起义和游击战;这类战争在山区,至少在欧洲,是绝对需要的。这类战争我们可以举出四个例子:蒂罗尔起义⁸,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⁹,巴斯克的卡洛斯派叛乱¹⁰和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¹¹。这些战争给征服者带来不少麻烦,但就其本身而言,都不能算是成功。蒂罗尔起义只是到1809年还受到奥地利正规军支持时才有威势。西班牙

牙的游击队虽然拥有国土辽阔的优越条件,但所以能够长期抵抗,主要还是由于法军不得不始终以主力对付英葡联军。卡洛斯派战争所以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正规军已经衰落,同时,卡洛斯派与克里斯蒂娜^①的将军们又在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因此,这次战争也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最后,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高加索的斗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是由于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疆土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无论俄军——他们和英军一样是最不适于山地战的——在哪里进攻高加索人,高加索人通常总是被击败,他们的村子被摧毁,他们的山口通道被俄军筑垒哨所所控制。但高加索人的力量却在于:他们经常从山区向平原出击,经常突然袭击俄军的基地和前哨,奔袭俄军第一线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俄军纵队的行军道路上进行伏击。换句话说,他们比俄军更轻便灵活,并且发挥了这一长处。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它们根本不同于1798年和1799年瑞士的起义⁵,那时瑞士起义者往往占有看起来颇为坚固的防御阵地,在那里静候法军到来,结果总是被法军击溃。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月
1日—10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1月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①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编者注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¹

(第二篇文章)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对现代山地战的历史所做的简短的评述，十分清楚地证明，现代军队的机动性使军队已完全能够在像瑞士那样的山国克服或绕过阻碍他们进行机动的一切天然障碍。所以，假定在普鲁士国王^①和瑞士之间真的爆发了战争，瑞士人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除了依靠他们自鸣得意的“山地要塞”之外，自然还需指望其他的防御手段。

在上述情况下，进攻瑞士的行动可能在从康斯坦茨沿莱茵河至巴塞尔一线展开，因为我们只能把奥地利和法国看做是中立国，而如果这两国中任何一国积极进行干预，都会使这一进攻具有这样一种破坏力，以致对付这种进攻的任何战略计划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假定只有北部边疆是便于入侵的。莱茵河是它的第一道防线，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障碍物。这条河有约 70 英里流经可受到攻击的边界，而这一带尽管水深流急，便于渡河的地点却是相当多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的。在法国革命战争¹²期间,从来没有为争夺这条河而认真地打过仗。的确,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在任何一条河的长达 70 英里的河段上都是可以实施强渡的。在任何情况下,先制造一些虚假的紧张气氛,进行一些佯攻,然后突然把部队集中到真正的渡口,必然能获得成功。此外,架设在河上的几座石桥,瑞士人未必会把它们破坏到战时不能使用的程度。最后,位于莱茵河南岸的康斯坦茨这座德国城市,对于普鲁士人来说是一个从翼侧包围全线的合适的桥头堡。

但是,在莱茵河后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障碍,它加强了莱茵河的间接防御能力,正像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加强了多瑙河的防御能力一样。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即来自西南方的阿勒河和来自东南方的罗伊斯河与利马特河,在布鲁格附近汇合(后两者同阿勒河成直角),然后径直向北流往莱茵河,在距上述汇合处大约 10 英里靠近科布伦茨的地方流入莱茵河(当然不应该把这一位于阿勒河和莱茵河交汇处的科布伦茨同位于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交汇处的科布伦茨要塞混为一谈)。这样,阿勒河在布鲁格和莱茵河之间把莱茵河谷地一分为二,入侵的军队如在科布伦茨的上游或下游渡过莱茵河,就会面对利马特河或阿勒河,也就是说,会再次被一条便于防守的河流所阻挡。这样一来,由阿勒河和利马特河(罗伊斯河对于利马特河一线来说,只是第二道强大的防线)汇合而形成的凸角是第二道重要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的翼侧左面(西面)^①有苏黎世湖、瓦伦施塔特湖^②、楚格湖和四州湖^③掩护;而这些湖,在上述情况下,没有一个是普鲁

① 这些湖实际上位于该阵地的右面(东面)。——编者注

② 瓦伦湖。——编者注

③ 费尔瓦德施泰特湖。——编者注

士军队敢于渡过的。因此，由于莱茵河位于任何前来进攻的部队的背后，阿勒河和利马特河的阵地就成了瑞士抵御来自北部的入侵的主要战略防线。假定瑞士人击退了对这个阵地的进攻，并在获胜后进行反攻，积极追击敌人，那时，败军在未能借助莱茵河上可能有的几座桥梁退却之前，就会遭到伤亡，会被击溃、分割和消灭。

另一方面，如果敌人从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下游一线实行强渡，瑞士人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应该再看看地形。大部队在高山地带不能生存，也不能在那里安置主要的作战基地和军火库。这就是高山地区战争如果有大部队参加，则持续时间往往很短的部分原因。所以瑞士人绝不应考虑将大量兵力撤往高山地区，他们应该尽可能长久地扼守较平坦的地区，因为那里他们拥有资源丰盛的城镇和便于运输的道路。如果从罗纳河在维勒讷沃附近流入日内瓦湖的入口处到莱茵河在赖讷克附近流入康斯坦茨湖^①的入口处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就把瑞士分成两部分，西北部（不算汝拉山脉）为下瑞士，东南部为上瑞士或者说高山地区。可见，瑞士人的战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主力将会沿苏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一线退却，而坚守开阔地区的每一寸国土，并把东南部的山区留给可能被切断的部队去保卫，让山地民军¹³和分散行动的部队去进行非正规的交火。主力部队的退却将会利用阿勒河南侧的各条支流，它们都是与莱斯河及利马特河平行的，在伯尔尼附近的部队也将会利用阿勒河，它的上游也是从东流向西北的。一旦阿勒河上游被强渡，伯尔尼被占领，那么，瑞士人几乎不可能使战争取得胜利的结局，除非东南部的山地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能重新占领部分平原，并造成对普鲁

① 博登湖。——编者注

士人后方的严重威胁从而引起全线退却。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可以根本不必考虑。

由此可见,瑞士人有几道可以扼守的防线:第一是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一线,其次是阿勒河和莱斯河一线,第三是阿勒河和埃默河一线(且不说中间交叉的那些阿勒河的小支流),第四是阿勒河上游一线,左翼的前面是一片从纳沙泰尔湖延伸到该河的沼泽地。

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一样要受到地形的制约。如果普鲁士人让主力部队在科布伦茨北面渡过莱茵河,并进攻利马特河畔的阵地,那么他们就得冒很大的危险;他们不仅要去进攻 1799 年马塞纳为抗击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而十分成功地守卫过的阵地,而且,即使夺下这块阵地,他们也会发现,再前进五英里,沿莱斯河还有一道同样坚固的防线;然后,再前进两三英里或五英里,另一道山地湍流挡住他们的去路,直到最后,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受阻、格斗和伤亡之后,还会遇到瑞士人凭借埃默河构筑的阵地,这条河几乎同利马特河一样,也是一道严重的障碍。因此,如果不考虑本文全然未涉及的某些政治原因会迫使普鲁士人在离法国边界还相当远时就止步不前,这条进攻路线将是绝对错误的。通往瑞士的正确路线应该是在巴塞尔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莱茵河;或者,如果部分部队要从科布伦茨以北渡河,就必须立即安排在布鲁格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阿勒河,以便把主力集中于这条河的左岸。直接沿阿勒河一线进攻,可以从翼侧包围利马特河和莱斯河,并且有可能从翼侧迂回阿勒河所有不大的南侧支流,直至埃默河。利马特河沿线的阵地并不太大,从苏黎世到布鲁格,可以进攻的正面不超过 20 英里,而沿阿勒河一线从布鲁格到索洛图恩,可以进攻的面却长达 36 英里,而且在索洛图恩以北,对正面攻击也毫无防卫。这块阵地的左翼,即索洛图恩和阿尔贝格之间,是其薄

弱环节；如果阵地在这里被突破，那么瑞士人不仅会丧失这条防线，而且同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联系将被切断，他们下一步只能退向东南高山地区。

不过，这里的防御可以利用各种战术障碍物作为屏障。溯阿勒河向索洛图恩越往上行，汝拉山接近河流的山脊就越高，那些独特的、与阿勒河平行的纵向山谷使军事行动难以展开。这些山脊障碍当然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这种地形上集中大部队往往需要被迫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十分复杂的机动，任何一个将军都不会轻易这样做，除非他对自己和他的部队有充分的信心。这种品质在老的普鲁士将军中已不多见。很难说这些人在1815年之后，还参加过真正的军事行动。他们大概不会冒险进行类似的机动，而宁愿在两翼采取不彻底的折中办法，并把其主要力量集中放在下游。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月
1日—10日之间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77
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44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英 中 冲 突¹⁴

昨天早晨由亚美利加号轮船带到的邮件,有许多是关于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当局的争端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的军事行动¹⁵的文件。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说,造成争端的原因是某些中国军官没有诉诸英国领事而强行从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艘划艇^①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悬挂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

“这里的确有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如划艇是否悬挂着英国国旗,领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完全正确等”^②。

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记得,领事坚持援用于这艘划艇的条约¹⁶上的规定只适用于英国船只;而很多迹象表明,这艘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

① 所谓“划艇”,实际上是一种近海帆船,欧式船身,中式帆具,最早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造。——编者注

② 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第22567号社论。——编者注

能够看到事件的全貌，我们且把双方公函中最重要的部分披露出来。首先是 10 月 21 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先生给叶总督^①的照会：

“本月 8 日早晨，一大队身穿军服的中国官兵，事前根本没有照会英国领事，就擅自登上同其他船只一起停泊城外的英国划艇亚罗号；他们不顾英籍船长的抗议，竟从划艇的 14 名水手中逮捕了 12 名中国人捆绑而去，并将船上的旗帜扯下。当天，本领事即将这一公开侮辱英国国旗和严重破坏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的全部详情通知贵大臣，要求贵大臣对这一侮辱事件进行赔偿，并在本案上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然而贵大臣令人莫解地不顾正义和条约规定，既不对这一侮辱事件进行赔偿，也不表示道歉，而且贵大臣把捕去的水手仍然关押在狱中，说明贵大臣赞同这次破坏条约的行动，使女王陛下政府无法相信不再发生类似的侵犯行为。”^②

事情好像是这样：划艇上的中国水手被中国军官逮捕，因为后者获悉这批水手中有些人曾参与抢劫一艘中国商船。英国领事指控中国总督逮捕水手、扯下英国国旗、拒绝道歉、关押被捕者。中国总督在给西马糜各厘将军的信中肯定说，他在查明被捕者当中有 9 人无罪后，已于 10 月 10 日指派一名军官把他们送回船去，但巴夏礼领事拒绝接受他们。关于划艇本身，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艘中国船，这一点正确无误，因为这艘划艇是由中国人建造的，属于中国人所有，船主为这艘船在英国殖民地船籍登记簿上注了册，骗取到了一面英国国旗——这大概是中国走私者惯用的办法。关于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总督指出：

“贵国划艇湾泊下碇，向将旗号收下，俟开行时再行扯上，此贵国一定之章

① 叶名琛。——编者注

② 巴夏礼《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 年 10 月 21 日》，载于 1857 年 1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2571 号。——编者注

程也。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巴领事官屡次来申,总以扯旗欲雪此辱为名。”^①

根据这些前提,中国总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违背条约的行为。然而英国全权公使^②却在10月12日不但要求交出全体被捕水手,而且要求道歉。总督对此答复如下:

“二十四日卯刻,发去巴领事官札文,并审明犯案之梁明太、梁建富,并见证之吴亚认,共三名,连前九名,共计十二名,一并交还,而巴领事官将解还之人犯十二名并札文不收。”^③

可见,巴夏礼当时完全能够领回他的所有12名水手,而那封他没有拆阅的信很可能是含有道歉意思的。就在同一天晚上,叶总督曾再一次询问,为什么不接受他送去的人犯,为什么他的信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一点没有被理睬,而到了24日,攻击炮台的炮火却响起来了,有几处炮台被占领。直到11月1日,西马糜各厘将军才在他给总督的信中解释了巴夏礼领事这种看来不可理解的行为。他写道,水手是送回给领事了,可是“并非公开地送回到他们的船上,并且没有按照要求为破坏领事裁判权道歉”^④。这样,全部事情归结起来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岔子:没有把包括3名审明的罪犯在内的一群水

①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编者注

② 包令。——编者注

③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引文中“二十四日”是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856年10月22日。——编者注

④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年11月2日》,载于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第22567号。——编者注

手以隆重的仪式遣送回船。对这一点，两广总督首先答复说，12名水手已经实际移交给领事，并无“任何拒绝遣送他们回船”的情况。直到城市被轰击了6天之后，中国总督才知道这位英国领事还有何不满。至于道歉，叶总督坚持无歉可道，因为没有任何错误。我们且引用他的话：

“本大臣之办事人员进行缉捕时，并未见有外国旗帜，尤有进者，受命办理此案之官员审讯人犯时证实该划艇决非外国船只，是以本大臣仍认为并未犯何错误。”^①

这个中国人的雄辩把全部问题解决得实在彻底——显然无懈可击——以致西马糜各厘将军终于没有办法，只好宣称：

“对于亚罗号划艇事件的是非曲直，本统帅断然拒绝再作任何辩论。本统帅对于巴夏礼领事向贵大臣所陈述之事实确信无疑。”^②

但是这位海军将军在占领了炮台、打开了城墙、连续轰击广州6天以后，突然发现一个全新的行动目标。我们发现他在10月30日写信给中国总督说：

“贵大臣目前应立即同本统帅举行会商以结束目前的状况，这种状况已为害非轻，如不予补救，势必招致极严重之灾难。”^③

中国总督答复说，按照1849年的协定¹⁷，他没有权利要求举行

-
- ① 叶总督《致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1856年11月3日》，载于185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第22571号。——编者注
- ②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年11月2日》，载于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第22567号。——编者注
- ③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年10月30日》，载于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第22567号。——编者注

这种会商。总督接着说：

“惟所称进城一节，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间，贵国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内称本总督出示，不准番人入城等语，载在新闻纸，谅贵提督早已知悉。况不能进城，出自广东百姓，众口一词。此番攻破炮台，焚毁民房，其心不甘，已可概见。本大臣有恐贵国官民因此受害，莫若仍照文公使所议办理为是。至所称熟商一事，本大臣前已有委员雷州府蒋守矣。”^①

于是西马糜各厘将军干脆宣称，他根本不理会文翰先生的协定：

“贵大臣复文述及 1849 年英国公使公布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广州的告示。今本统帅必须提醒贵大臣，虽然我们对于中国政府违背 1847 年允许外国人于两年后进入广州的诺言确实极为不满，但本统帅目前的要求与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毫无关系。本统帅并不要求准许其他人员入城，而只要求准许外国官员入城，这样做只是出于前面所说的简单而充足的理由。对于本统帅提出的亲自同贵大臣谈判的建议，承贵大臣相告，数日前已经派一知府前来。因此本统帅不得不认为贵大臣的全部来信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只能谨此附告，如本统帅的建议不能立即得到贵大臣明确同意，则本统帅将立即重新采取攻击行动。”^②

叶总督提出反驳，再次提到了 1849 年协定的细节：

“1848 年，前大臣徐^③与英国公使文翰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往复通函辩论很久，文翰先生确信在城内会晤已无可能，乃于 1849 年 4 月致函徐大臣称：‘今不再与贵大臣争议此问题。’随后文公使在各商馆出告示，不准一个外国人入城；

①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首照会。引文中“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间，贵国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内称本总督出示，不准番人入城等语”一句，按英文译回中文是：“1849 年 4 月，全权公使文翰阁下发布告示于此间各商馆，内称他禁止外国人入城。”——编者注

②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 年 11 月 2 日》，载于 1857 年 1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2567 号。——编者注

③ 徐广缙。——编者注

这一告示曾在报上登载,公使并将此事呈报英国政府。所有中国人或任何国籍之外国人无不知此问题不再进行争论。”^①

于是,不耐烦辩驳的英国海军将军就使用武力冲向广州城,直捣总督府,同时摧毁停在江面的帝国舰队。这样,这出外交兼军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第一幕,借口中国总督破坏 1842 年的条约¹⁸而炮轰广州;第二幕,借口总督顽强坚持 1849 年协定而更猛烈地继续炮轰。广州先是因破坏条约而遭轰击,后是因遵守条约而遭轰击。而且,在前一场合,甚至不是以没有给予赔偿为借口,而只是以没有用隆重的方式给予赔偿为借口。

伦敦《泰晤士报》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观点,就是和尼加拉瓜的威廉·沃克将军¹⁹相比也毫无逊色。

这家报纸写道:“由于这次爆发了军事行动,现有的各种条约就此作废,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了。广州最近发生的事变警告我们,应当坚持要求取得 1842 年条约规定的自由地进入这个国家和进入向我们开放的那几个口岸的权利。我们决不能允许别人再对我们说,因为我们已经放弃要求执行那条许可外国人进入自己商馆以外地区的条款,我们的代表就不能去见中国总督。”^②

换句话说,“我们”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撕毁一个现存的条约和强行要求实现一项“我们”业已根据明确的协定放弃了的要求!不过,我们也高兴地告诉读者,英国舆论界另一家著名的报刊却用比较合乎人情和恰当的语气表示了意见。

① 叶总督《致海军将军西马廉各厘。1856 年 11 月 3 日》,载于 1857 年 1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2571 号。——编者注

② 1857 年 1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2567 号社论。——编者注

《每日新闻》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闯入他们海岸的不速之客。且不说这次袭击广州的后果如何，无所顾忌地任意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

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恐怕是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①尽管借口并不体面，但由于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其他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那么，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很可能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后果，必定是把广州同产茶区——绝大部分依然在帝国掌握之中^②——隔断开来，而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1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指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编者注

② 意指这些地区绝大部分尚未被太平军占领。——编者注

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²⁰

英国不久前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²¹，根据最近的报道，这场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其结果是波斯的沙赫被迫投降。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目的，必须简略地回溯一下波斯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由自称是古代波斯皇帝后裔的伊思迈尔于1502年创建的、保持大国的强盛和威望达二百多年之久的波斯王朝，于1720年左右，在波斯东部各省的阿富汗居民起义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阿富汗人侵入波斯西部，两个阿富汗王公^①还曾数年高踞波斯王位。可是不久，他们便被著名的纳迪尔赶走了。后者起初是一位波斯王位觊觎者^②手下的将军。后来，他自己据有王位，不仅制服了起义的阿富汗人，而且以他令人瞩目的对印度的入侵大大促进了日益衰落的莫卧儿帝国²²的瓦解，从而为英国在印度势力的上升开辟了道路。

在1747年纳迪尔沙赫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一个艾哈迈德·杜兰尼统治下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它包括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后来为锡克教徒²³所占有的整个地区。

① 马茂德和阿什拉夫。——编者注

② 塔赫马斯普二世。——编者注

这个勉强黏合起来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它又重新分裂为原先的各个部分，即各有其独立的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各自为政，内讧不止，只有在共同对付波斯的威胁时才破例地联合起来。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这种由于民族差异加上历史夙怨造成并且经常为边境纠纷和相互覬覦所加剧的政治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又由于宗教上的对立而变本加厉，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即正统派伊斯兰教的教徒，而波斯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堡垒。²⁴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之间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以俄国为敌。俄国最初入侵波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但是那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取得更多成功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²⁵夺得了波斯的12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尼古拉通过那场以图尔克曼恰伊条约²⁶告终的1826—1827年的战争，又从波斯夺得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对昔日的领土被占记忆犹新，对今天的备受压制忍气吞声，对将来可能再遭侵略提心吊胆，这一切使波斯同俄国誓不两立。至于阿富汗人，虽然他们同俄国从未发生过实际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他们宗教的夙敌，是一头要把亚洲一口吞下去的巨兽。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都把俄国视为天然的敌人，因而也都把英国视为天然的盟友。因此，英国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只需扮成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的调停人，同时表明坚决反对俄国人的入侵。虚伪的友好，加上真正的对抗——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然而，不能说这种优势已成功地得到利用。1834年挑选波斯沙赫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由自主地与俄国合作，支持俄国推举的一

位王子^①，次年，当这位王子为维护其继位的要求同他的竞争者^②进行武装斗争时，又进而给以资助并派英国军官去积极援助²⁷。被派往波斯的英国使节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到头来只能是浪费资财；可是当这些使节坚决要求上级授权来阻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国政府却提醒他们注意 1814 年的旧条约的一项条款²⁸，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波斯与阿富汗一旦发生战事，英国人除非得到进行调解的邀请，否则不得加以干预。英国使节和英印当局认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势力的向东扩张，为俄军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于是，1837 年 9 月一支波斯军队侵入了阿富汗。波斯军队在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之后直抵赫拉特，在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蒙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在这些军事行动进行期间，英国大使麦克尼尔被相互矛盾的指令弄得无所适从。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因为英国在波斯和赫拉特的关系方面无可奉告。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要他劝沙赫不要继续行动。这次征讨一开始，埃利斯先生就召回了波斯军队中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了回去。当印度总督再次指令麦克尼尔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项决定。1838 年 3 月 8 日，麦克尼尔前往波斯军营，自荐居间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

到 1838 年 5 月底，在围攻已进行了约九个月之后，帕麦斯顿才

① 穆罕默德·米尔扎。——编者注

② 指他的祖父费特赫-阿里沙赫的三个儿子。——编者注

向波斯宫廷发出一份威胁性的照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第一次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同时，印度政府下令进行讨伐，派兵从海路开赴波斯湾，夺取不久前英国人占据的恰拉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撤往埃尔祖鲁姆，而被派往英国的波斯大使^①则被拒绝入境。在此期间，赫拉特虽遭长期封锁，但顽强地坚守住了，波斯人的屡次进攻都被打退，1838年8月15日沙赫^②被迫撤围，匆忙地把军队撤出阿富汗。人们本来以为英国人的军事行动可以就此结束，但情况远非如此，事态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英国人在制止了波斯据认为是在俄国的怂恿下和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侵占一部分阿富汗领土的企图之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攫为己有。著名的阿富汗战争²⁹就这样开始了，其最终结果是英国人遭到惨败，而谁真正该对这次战争负责，这一点，迄今仍讳莫如深。

目前同波斯开战的理由，和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况很相似，即波斯人袭击赫拉特，而这次袭击的结果是占领了该城。但是说来令人奇怪，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们极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这次战争是否会导致与前次战争同样异乎寻常和出人意料的后果，这一点尚待分晓。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1月
27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2月1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3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① 侯赛因汗。——编者注

② 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布·鲍威尔关于
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³⁰

(a)俄国和英国。1854

这些小册子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作出预言,即通过批判地研究一些欧洲国家的状况、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看来相当工于心计。既然批判³¹所显示的学识和先见之明应当由现代历史来检验,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历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加以对照,这样就可以确信,批判的主张究竟是有充足的理由,还是想当然的推断。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制宪实践大有作为,而且 1848 年革命产生的国民议会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这时,整个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坚定反对派的角色;俄国扮演的角色则是一个凭借实力行使权力的政府。”^①

(“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坚定反对派的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第 19 页。——编者注

角色；俄国分摊的角色则是一个拥有实力积极行动的政府。”)

我们不想谈论这种错误说法——用一个“而且”把“制宪实践”和1848年的那些“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混为一谈。在所有那些议会中，这一点只有对“立法议会”来说才是正确的^①。但是我们要照原话实录。西欧，立法议会，仅限于消极抵抗；俄国，“拥有实力的政府”，却通过政变来“行使权力”，就像波拿巴、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样³²。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是对不久前的过去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随后几周的情况推翻了这种理解和预言，它们表明，批判肤浅而轻率地把一时的丑恶说成是^②永恒的事物。于是西方列强不再“消极抵抗”，转而采取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尚未开始行动以前，俄国已经以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并不“拥有”实力，它的武器也没有威力，它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在匆忙退却。³³在那些专横独裁的、制造政变的政府和1848年的那些议会之间，丝毫看不出他所说的相似之处。那么，是批判的预言不正确吗？是他对情况理解错了吗？完全不是。在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使批判的小册子(a)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化为乌有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满不在乎地用以下的外交辞令式的声明开始写作小册子(b)(《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版)：

“我们新近(!)在4月提出的这种(前面引用的)论点³⁴，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发生的事件的转变中完全实现了：欧洲真正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剧；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它也卖弄制宪——或者是完全不诉诸暴力，或者只是采取暴力而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

-
- ① 手稿中接下去删去了：“至于为什么这对后者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必多说”。——编者注
- ② 手稿中接下去删去了：“普遍的范畴”。——编者注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新近在4月提出”。在俄国人3月撤离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4月提出的论点呢？根本没有。总之，“新近”一词本应当用“早已”才对。我们在4月即事件发生之前“早已”提出的论点，在3月得到了证实。但是，这倒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所以，不是“早已”，而是“新近”等等，可是这句话在语法上是不通的。“我新近在4月坚持的意见，在3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新近在4月提出的论点”早已在3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批判”的论点赋予了新的“转变”，这一论点“新近”在4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但是，看来它“完全实现了”。好极了。这又说明了事件和批判的关系。如果事件在实践中没有证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至少有助于这种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隐蔽的优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事件也在实践上与批判有关。那么4月提出的论点由于3月的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是怎么回事呢？

“欧洲真正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剧！”

真正而且完全！“完全”是不是会使“真正”更有新意呢？反而使它削弱和更庸俗了。仅此而已。但是，这种过分雕琢的文体，这种“真正而且完全”，就像前面那个不幸的“新近”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在4月提出的论点中，第一，1848年和以后几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被错误地与“制宪实践”混为一谈了；第二，东方的冲突变成了一场“制宪”剧，在这出剧中，一些西方列强由于“消极抵抗”被比作1848年和以后几年的国民议会，俄国则被比作那些进

行政变的政府。其实,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进行过制宪活动,政府却在推翻宪法。而现在,俄国挨了打,它的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它也采用“议会制”方针了,现在,以前那场只是“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宪剧,成为“真正”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自从政府成为“制宪的”,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就不再像1848年和以后几年的国民议会,或那些与它们对立的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玩弄“议会制政体”,因而——按布鲁诺·鲍威尔的看法——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列强却不再“消极抵抗”,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了。如果说,在此以前,“制宪”这个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现在它也不再适用于西方列强了。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4月提出的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包含在4月提出的论点中的“制宪”一词的“实现”问题仍然存在。显然,批判的预言就像古代的神谕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似乎被实际情况所推翻,那么这仅仅是似乎而已^①。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就表明,批判原来的话的实际含义就是与它所说的“相反”,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显示其辩证性质而已。幸亏有这种辩证法,这种以相反情况的出现来证明预言应验的辩证法,批判的预言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尔特采用另一种方法。如果他的预言是灵验的,那么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是由它们的应验所证实。如果预言不灵,那是因为预言本身妨碍了它们的实现。前一种情况体现了理论的真实性和实践性,后一种情况体现了预言的实践目的。

^① 手稿中接下去删去了:“这些论点正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已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和解释”。——编者注

批判谴责每天的报刊,说它们只醉心于当前一瞬间的事。而批判却认为它是整体中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说,他是从总体来考虑的。实际表明,如果每天的报刊上全是每天发生的事件,那么批判在理论方面会遭到同样的失败。孤立的事件被他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总的论点的体现,这种论点甚至会由于后来的每一次事件的转变而失去其表面的真实性。(蒲鲁东就是这样做的。当1850年(?)银行的黄金储备增长2000多万英镑,银行利率降低二厘五(?)时,这一事件立即意味着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上实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人民银行³⁵的时代。对巴黎的蒲鲁东来说,这件事是新的,是崭新的,因为他的视野仅限于拉芒什海峡的南岸。)所以,虽然俄国的“时代”新近在4月(在小册子a中)成为表示世界历史新时期的直接用语,可是俄国早已在3月采取的行动却促使批判提出(在小册子b中)这样一个忐忑不安的问题:

“是否在俄国也开始了西方时代?它是否已属于西方……?”(《俄国当前的立场》第18页)

既然批判“新近”在4月提出的关于制宪剧——俄国在其中扮演凭借实力行动的政府的角色,西方列强扮演消极抵抗的坚定反对派的角色——的论点构成小册子(a)的基点,既然事件早已在3月使他的这个基点不攻自破,这实际上已经切实而“完全”地使我们对他的批判宣告结束。不过,我们还可以谈谈一些细节问题。

首先是所谓的历史实例。他特别把为1789年法国革命作准备的事件拿来同现在据认为是为英国革命作准备的事件作对比。杜尔哥认为“谷物贸易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第72页)。³⁶英国在反谷物法同盟³⁷时期就是这样。能把两件不可比拟的事勉强加以类比吗?

法国首先是一个农业国，而英国是一个工业国。谷物贸易自由在这两个国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法国“存在的明白无误和确凿无疑的事实”^①是：“财政赤字和破产”（第 72 页）。而在英国呢？在英国，发生了战争³⁸，政府为应付财政盈余和进出口的加倍增长而忙得不可开交！这就是要作的类比吗？不是：

“在英国，同样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

多妙的类比啊！一方面是“明白无误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批判对情况的单纯的主观判断。类比就在于赤字这一个词。X 死了，因为他折断了自己的腿。预言式的类比：Y 将死去，因为他违背自己的诺言。^②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这个明白无误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在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之前，已经发生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在法国，政府向知名人士和议会建议的改革，同对革命的预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在英国也没有人对罗素的改革法案³⁹感兴趣（第 73 页）。多妙的类比啊！在法国政府的建议中，关键问题是同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决裂，在 1831 年罗素的建议中，涉及的是内阁阴谋；那里谈的是同百年之久的过去决裂，这里谈的是采用还不到三十年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那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对辉格党⁴⁰的种种小手腕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

① 手稿中这句话原为：“在法国革命以前存在的确凿无疑的事实”。——编者注

② 在德文原文中，“折断自己的腿”的“折断”和“违背自己的诺言”的“违背”，用的是同一个动词 brechen。——编者注

民群众对辉格党的改革大失所望不是从昨天起,而是从改革法案宣布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接着,又在内克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迎合批判的心意,帕麦斯顿丧失了“勇气和毅力”,他“深感自己肩负着使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最后拯救者”。^①甚至在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进行类比也不可能比这更荒谬了。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女王^②,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要否定的只是所提出的“历史实例”中表现出的对这些冲突的毫不理解。最低劣的政治权术也远远胜过这种言之无物的故弄玄虚。

有些英国人认为内阁中有“外国影响”⁴¹,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布鲁诺·鲍威尔提到了福克斯,说此人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为此还引用福克斯 1803 年 5 月 24 日的一段讲话^③。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出 1790 年福克斯就即将开始的第二次瓜分波兰⁴²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密”使命。而福克斯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私下的联系⁴³证明什么呢?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和私下的联系^④。其实,俄国的作用也不需要福克斯去发现。卡马森侯爵在威廉三世时已经发现了⁴⁴,执政的辉格党人在乔治一世时也已经发现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响已成为传统。难道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使人们认为帕麦斯顿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第 73 页。——编者注

② 玛丽-安东尼达。——编者注

③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第 II—III 页。——编者注

④ 手稿中接下去删去了:“这里,确实存在一种历史的类比……”——编者注

要同辉格党的传统决裂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会把它“发扬光大”，不会把自己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俄国呢？和这样为帕麦斯顿“辩护”一样，说福克斯发现了英法同盟⁴⁵也是站不住脚的。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⁴⁶之后已经立即这样做了。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批判宣称，俄国所采取的立场促成了“英法对立的缓解”^①，或者说，促成了“英法同盟”的建立。英法同盟于1717年就已存在，几年后，乔治一世曾企图把它变成欧洲抗俄同盟。1834年的四国同盟⁴⁷是英法的第二次同盟，它也是针对俄国的，尽管无济于事。所以，俄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促成任何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一个同盟就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付路易-菲力浦的法国的那个1840年的同盟⁴⁸又算是什么呢？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构想，这个同盟证明，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比尼古拉的俄国更危险。

根据批判的进一步发现，英国用它对付革命的法国的战争把大陆交给俄国——这个发现至少没有创新可言——之后，就感到需要

“自己承担法国的革命事业。正是坎宁填补了真空。他在英国举起革命的旗帜，使英国成为俄国的真正对手”。^②

作为证据，批判引用了坎宁从维吉尔那里借用来的一句豪言壮语（“看我来教训你：埃俄洛斯神。”）^③，似乎出自这位“伊顿英才”⁴⁹

① 这是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5页上的一个标题。——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7页。——编者注

③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135行。——编者注

之口的一句名言就是充分的证明。他对所谓“原则的政策”⁵⁰的话信以为真,深信不疑。其实这些话比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话更虚假。此外,皮特的战争⁵¹也被到处宣扬为“原则的战争”,大部分英国人都“相信”它真是这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在法国革命前不久和在它开始的时候,寡头政权正面临国内动乱的威胁。不过,坎宁的话原本并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而这种“原则的政策”执行起来——承认过去西属美洲的独立⁵²——是同英国的贸易利益非常一致的。帕麦斯顿用坎宁的话来掩饰自己由完全不同的动机所决定的政策,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坎宁关于“革命干涉”^①的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并给英国带来了许多不幸。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改革法案大大改变了英国宪法的性质,甚至

“英国人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何区别了。”^②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1)“腐败的城镇选区”⁵³的分配被改动得有利于作为贵族的一个派系的辉格党;(2)1831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对议会的影响,就像金融资产阶级利用1689年的“光荣革命”⁵⁴所做到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还发现

“谷物法⁵⁵的废除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宣布,就是默认它(英国工业)的优势丧失了。”^②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1)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贵族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9页。——编者注

的利益；(2)英国工业除了自身的资本垄断，不再需要其他的垄断；它表明英国工业相信，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指望自己真正的优势。他说，当战争爆发时，英国还没有

“那样降低身价去迁就同自己对手结盟的可耻思想”。^①

当然，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如果不降低身价，是无法缔结与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的。英国总要保持“始终如一的”高尚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方面已经身价大降了：

“看来，人民只有放弃未来，才能忘掉过去。”^②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于是，皮特的英国的未来就等于英国的未来。一旦“人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从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决裂^③，就消灭了自己的未来。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英国的民族性就是仇视法国，反之亦然。这种英国的“民族性”——法国和英国早期的历次封建战争当然另当别论——源于“光荣革命”，因此，是“不会被消除的”。说得多么深刻！

俄国的民族性就是：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英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英国和法国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未来”，就不能结成一个对付俄国的同盟。其实，布鲁诺·鲍威尔想要说的是，除了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1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1页。——编者注

③ 手稿接下去删去了：“当然应该不再作为人民而存在”。——编者注

俄国,欧洲各国的民族性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代表着“西方”对付俄国。所以它们的民族性也就丧失了。但是,难道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代表欧洲对付过法国?它们的民族性是不是因此又恢复了呢?当然,批判并不关心市民社会。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都在经历政治蛹化期。当一片蛹壳脱落时,批判就认为,这是这些社会衰亡的明确信号。例如,充满政治废话的“盟友的自私动机和别有用心”^①这一章证明了什么呢?无非是证明这两个社会仍然在同完全属于其过去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搏斗,证明它们尚未拥有适合新阶段需要的政治形式。他能以此证明,这个同盟,这个如此糟糕的同盟,肯定不能成为达到更高形式的手段吗?说拥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条件,这是同义反复。

是什么使他认为,俄国

“已确定了加强它对土耳其的影响的计划,不需要任何盟国的协助”?^②

俄国为了最近这次战争不是轮番地试图与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不是始终保持着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且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如何,他怎么能说,俄国对于实现同英国政府的秘密结盟并不总是很有把握,并认为这就是它所以傲慢无礼的理由?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所提出的借口,即维护

① 这是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13页上的一个标题。——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12页。——编者注

“土耳其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民族的事业”^①,

是它的真实动机。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遇见过!^②

这本小册子很大一部分描述的是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以及它们向俄国的让步。说实在的,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证明什么呢?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受到了群众的压力吗?不。是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而且政府和社会,尽管它们实际上各行其是,在理论上却应不谋而合。

俄国的要求!^③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以俄国领事的管理来代替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民族⁵⁶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当然,批判轻信地将俄国的空话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为的是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中气愤地指出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它的**欺诈手段**。^④布鲁诺·鲍威尔责备一些报纸对最近的土耳其事态的无知。其实,他本人才是无知的,竟然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和希腊)一再企图破坏公社的自治。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就是处于土耳其宗主权之下的希腊神父的神权政治,它完全束缚和扼杀了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公社独立的市民的发展。批判的学识渊博特别出色地表现在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11页。——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编者注

③ 这是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28页上的一个标题。——编者注

④ 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25—26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①以及它的“组织规程”。

俄国通过基谢廖夫已把这份组织规程⁵⁷赐给了多瑙河两公国！这太过分了。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南方斯拉夫人应该成为俄国人：首先，由于“事物的本性”^②，——援引这个抽象概念，就是一种深刻的论证；其次，不仅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且由于“历史”，^③可是，塞尔维亚的历史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最后，由于“地理位置”^④，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由于这种地理位置把他们同俄国隔开。这是典型的突降法^⑤！他从“事物的本性”降到“历史”，又从这个抽象概念降到“地理位置”这样的细枝末节。

奥地利只能——或者说他坚持这样认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一论断，“新近”在4月还是正确的，在6月就是“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绝对的证明是从事物的本性得出的。他坚持认为，奥地利不“可能站在盟国一边”^④。对这个论断需要加以验证。在他那精心撰写的关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著作中，他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歪曲历史。在谈到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小心翼翼地向我们隐瞒真实情况。要不是英国用欺诈手段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这项条约，俄军就会被消灭，连它能保有的小股部队也不能从阿德里安堡返回。鲍威尔关于利文的急电一事的叙述也同样是错误的。他说，阿伯丁和威灵顿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不是这项“和约”^⑤，而是对埃内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3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4页。——编者注

③ 突降法为修辞学用语，指写作或演说中由庄严崇高突降至平庸可笑的修辞手法。——编者注

④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36页。——编者注

⑤ 同上，第39页。——编者注

兹的封锁⁵⁸,其实俄国人是担心引起威灵顿的反对才放弃封锁的。而利文是这么说的:

“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动用了一切力量,想从我们这里探听有关我们将来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条件的机密。”

利文完全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引用的自夸的话来回答这一点⁵⁹,接下去,他说道:

“在我们看来,最好是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甚至对这些保证做一些补充。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对这种十分微妙的问题作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和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我们就只好使他们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会认为他们已迫使我们接受无法挽回的牺牲。”

再接下去才出现那段自夸的话,而联系上述这些低级的含糊其辞的话来看,它已经不成其为豪言壮语,这是完全不合批判的心思的。然后鲍威尔提到了帕姆^①的所有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的“英国的弱点”,证明这个弱点确实存在。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了俄国在对英国方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⁶⁰中歪曲事实。他认为,俄国需要的只是

“提醒他[帕麦斯顿],这件重大罪行发生在黑海,靠近切尔克西亚海岸”。^②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德在这个问题上耍弄了一些什么样的复杂的手腕。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章里,我们还读到:1848—1849年

①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第42页。——编者注

“整个德国因对民族原则错误理解而处于消极的状态,认为干预这种民族斗争的任何企图都是政治罪行”。^①

“似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⁶¹关于这本小册子,再谈什么看来都完全是多余的了,除了还有一点可以谈谈,那就是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全是报纸的虚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28 年
《马克思主义年鉴》第 6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第 43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⁶²

英军借口不久前被波斯人占领的一个阿富汗公国赫拉特的归属问题,以东印度公司⁶³的名义占领了波斯在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布什尔²¹。赫拉特现在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西北面的波斯湾、里海和药杀水同东面的印度河之间这一整个地区的战略中心;因此,一旦英国和俄国为了争夺亚洲的霸权而发生严重冲突(英国侵入波斯可能加速这一冲突),赫拉特就将成为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而且可能成为双方最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场所。

赫拉特被赋予这样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点,凡是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的人都会一目了然。波斯的内陆是四面环山的高原,水流不能外溢。这些水流不足以形成一个或几个中央湖泊;它们不是被广阔的沼泽地化为乌有,就是逐渐消失在干燥的大沙漠中。这个大沙漠占了波斯高原的绝大部分,形成了波斯西部和东北部之间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沙漠北面的边界是呼罗珊山脉,它由里海的东南角几乎向正东延伸,形成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连接线;呼罗珊山脉由此向南延伸出一条支脉,将波斯沙漠同灌溉较好的阿富汗分开,赫拉特正位于此,其周围有一片相当广阔而且特别肥沃的谷地为它提供保障。在呼罗珊山脉以北有一片沙

漠,与其南麓的沙漠相似。几条像穆尔加布河那样的大河,在这里也被沙漠吞噬了。但是奥克苏斯河与药杀水,由于水势强大,得以冲过沙漠,在下游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阔谷地。在药杀水的那边,沙漠便逐渐带有南俄罗斯草原的性质,并且最后完全消失。因此,在里海和英属印度之间有三个文化比较发达的不同地区。第一,波斯西部的几个城市:设拉子、舒斯特尔、德黑兰、伊斯法罕;第二,阿富汗的几个城市: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第三,图兰的几个城市:希瓦、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在所有这些城市之间保持着相当频繁的交往,交往的中心自然是赫拉特。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波斯湾到奥克苏斯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设拉子到巴尔赫的中途客栈。经亚兹德和库希斯坦穿过波斯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绿洲的大驿路,直通向赫拉特;另一方面,从西亚通往东亚和中亚的惟一的一条绕过沙漠的道路,必须经过呼罗珊山脉和赫拉特。

因此,赫拉特在强国的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图兰,即波斯和奥克苏斯河北面地区的一个据点。谁占有赫拉特,谁就完全掌握了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因为从这一阵地向任何方向发起进攻,比从伊朗或图兰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加便利,更有把握获得胜利。同时,阿斯泰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巴尔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彼此之间交通非常困难,即使从所有这些城市向赫拉特发起联合进攻,也很少有可能获得胜利。向赫拉特进攻的各纵队,几乎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而赫拉特如果有一位果敢的将军,却可以袭击它们并将它们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从坎大哈、喀布尔和巴尔赫推进的各纵队,一定要比从阿斯泰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分进合击的各纵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从阿富汗方面进攻时,是从山地到

平原,而且可以完全不经过沙漠,而从里海和阿拉斯河方面进攻时,只有一个纵队(从阿斯泰拉巴德出发的)可以不经过沙漠,其他各纵队则必须经过沙漠,以致完全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

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的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西边是波斯,图尔克曼恰伊条约²⁶已将它变成俄国的属国。在东边是阿富汗和俾路支诸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喀布尔和坎大哈现在可以列为英印帝国的属国。在北边是图兰的两个可汗国希瓦和布哈拉;它们名义上中立,但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几乎一定会倒向将获胜的一方。波斯实际上从属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人,这可以由俄国人已派兵进入波斯,英国人已派兵进入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

俄国占有里海西岸和北岸的全部地区。巴库(距阿斯泰拉巴德 350 英里)和阿斯特拉罕(距阿斯泰拉巴德 750 英里),是两个可供设置军火库和集结预备队的主要据点。在俄国的里海舰队控制这个内海的情况下,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向阿斯泰拉巴德输送必要的军需品和援军。在里海东岸有道路通往咸海的各个据点,都有俄国的堡垒。由此向北方和东方伸展的这道俄国的堡垒线上,有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的村庄,这道堡垒线在 1847 年就已经由乌拉尔河推进到恩巴河和图尔盖河,即向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各游牧部落境内和咸海方向推进了约 150—200 英里。此后,实际上已在咸海沿岸修筑了堡垒,现在在咸海和药杀水上都有俄国的轮船航行。甚至有消息说,俄军已占领希瓦,不过这种说法至少还为时过早。⁶⁴

俄国人向中亚或南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时所必须遵循的作战路线,是自然条件规定的。如果从陆路由高加索沿里海西南岸前进,就会遇到巨大的天然障碍——波斯北部的山脉,并且会使入侵的

军队在到达主要目的地赫拉特之前必须通过 1 100 英里以上的路程。如果从陆路由奥伦堡向赫拉特进军,则不仅要经过那个使佩罗夫斯基的军队在远征希瓦时遭到重创⁶⁵的沙漠,而且还要经过两个同样荒凉的沙漠。从奥伦堡到赫拉特的距离,按直线计算有 1 500 英里,如果俄国人从这一方向进攻,则奥伦堡就是俄军能够选为作战基地的最近地点。此外,俄属亚美尼亚同奥伦堡都几乎完全与俄国的中心隔绝,前者被高加索山脉所隔绝,后者被大草原所隔绝。要在这两个地方中的任何一处把夺取中亚所必需的装备和兵员集中起来,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只剩下一条路线,那就是穿过里海,以阿斯特拉罕和巴库作为基地,以里海东南岸的阿斯泰拉巴德作为监视站,而且这条路到赫拉特总共只有 500 英里。这条路线具有俄国所能期望的一切优越性。阿斯特拉罕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正如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位置一样。它位于俄国最大的一条河流的河口,而这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大俄罗斯,所以它具有一切方便条件可被用来转运兵员和军需品,以组织大规模的远征。由阿斯特拉罕乘轮船走四天,乘帆船走八天,便能到达里海另一端的阿斯泰拉巴德。里海本身无疑是俄国的内海,阿斯泰拉巴德(现已被波斯沙赫献给俄国)则位于由西面到赫拉特这条惟一的道路上的起点,这条道路越过呼罗珊山脉,可以完全不经过沙漠。

俄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准备在事态进一步复杂化时进攻赫拉特的主力纵队,正在向阿斯泰拉巴德集结。此外,还有两个侧路纵队,不过它们与主力的协同至少是很成问题的,因而每个纵队各有其自己的明确目标。集结于大不里士的右路纵队,任务是掩护波斯西部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向那里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在必要时开往

哈马丹和舒斯特尔，以掩护首都德黑兰，防备土军和在波斯湾布什尔港登陆的英军的进攻。左路纵队由奥伦堡出发，很可能是指望得到由阿斯特拉罕开往里海东岸的援军。它应当保证占有咸海周围地区，并向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发，争取这些国家或者不抵抗或者协助俄军作战；此外，如有可能还要沿奥克苏斯河而上，向巴尔赫推进，以威胁英军在喀布尔或靠近赫拉特的翼侧和后方。据悉，俄军各支队伍已在途中，中路纵队和右路纵队已分别抵达阿斯泰拉巴德和大不里士。至于左路纵队的推进情况，一时大概还听不到什么消息。

在英军方面，作战基地是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他们的军火库一定是设在白沙瓦。他们已从那里向喀布尔派出一个纵队，喀布尔距赫拉特按直线计算为 400 英里。但当发生严重的战争时，英军除应占领喀布尔外，还应占领加兹尼、坎大哈以及用来防守阿富汗各山口的山地堡垒。他们在这方面将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军占领阿斯泰拉巴德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帮助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侵犯。

从喀布尔至赫拉特的进军，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不需要派出侧路纵队，因为俄军的两支侧路纵队都不可能接近这个地区；如果奥伦堡纵队经若干战斗之后由布哈拉进抵巴尔赫，那么喀布尔的强大预备队会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英军占有的优势，就是他们的作战线比较短；因为，虽然赫拉特恰恰位于加尔各答和莫斯科的正中间，但是，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合处的英军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只有 600 英里，而在阿斯特拉罕的俄军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则为 1 250 英里。喀布尔的英军比阿斯泰拉巴德的俄军距离赫拉特近 100 英里，根据已知的地形条件，英军所经过的地区，开发较好，居民较多，道路也比

俄军在呼罗珊可能遇到的更好些。至于双方的军队，英军无疑在适应气候方面胜过俄军。英军的欧洲团无疑将像他们在因克尔曼⁶⁶的伙伴们那样坚毅顽强，而且对西帕依⁶⁷步兵也绝不能小看。查理·纳皮尔爵士这位地地道道的士兵和统帅，在多次战斗中曾目睹西帕依作战的情况，对他们极为推崇。正规的印度骑兵价值不大，可是非正规的印度骑兵却很出色，他们在欧洲军官的指挥下，无疑地将胜过哥萨克骑兵。

当然，再进一步推断这样一次战争的前景，是完全无益的。不可能猜测双方会派出多少军队。无法预见现在看来正在临近的这种重要事变一旦来临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到赫拉特都需要通过很远的路程，所以双方在赫拉特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点上用来决定胜负的军队的人数都不会太多。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围绕赫拉特而分别聚集起来的各国宫廷的外交阴谋和贿赂手段。在这些事情上，俄国人多半会占上风。他们的外交手腕比较高明，而且带有更多的东方特色，他们知道如何在必要时不吝惜金钱，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敌人内部有自己的朋友^①。英国向波斯湾的远征，只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虽能吸引很大一部分波斯军队，但不能取得多少直接战果。即使把现在驻在布什尔的5 000人增加两倍，他们顶多也只能进到设拉子为止。而这次远征本来也并不指望要做更多的事。如果能让波斯政府看到，这个国家的沿海地区易遭攻击，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对这次远征抱更大的期望，是荒谬的。真正决定整个伊朗和图兰命运的，是从阿斯泰拉巴德到白沙瓦这条线，而在这条线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点就是赫拉特。

^① 暗指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 月
底—2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2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4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预算⁶⁸

1857年2月20日于伦敦

现任财政大臣乔治·刘易斯爵士使财政上的戏剧表演遭到沉重打击。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时期，向议会作财务报告成了一种宗教活动，它必须以极庄严的国家礼仪来进行，必须竭力用一切华丽辞藻来讴歌，还必须使这个仪式至少延续五个小时。对于罗伯特爵士对待国家钱袋的这套礼仪，迪斯累里先生如法炮制，格莱斯顿先生则更有过之。乔治·刘易斯爵士也不敢违背这个传统。因此他做了一篇长达四小时的演说；他慢条斯理，拖拖拉拉，翻来覆去地说个没完，直到一大批可尊敬的议员纷纷抓起帽子逃出议会大厅，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才被突然打断。

这位可怜的演员大声说道：“非常抱歉，我得向人数有所减少的听众继续我的演说；可是我必须对留下来的人说明，打算实行的改变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①

① 乔·康·刘易斯《1857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14日《泰晤士报》第22604号。——编者注

当乔治·刘易斯爵士还是《爱丁堡评论》的一位圣贤的时候，使他出名的就是论证累赘乏味，而不是说理充分或措辞生动。他个人的缺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议会受到挫败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完全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况，甚至最老练的议会演说家也会因而弄得狼狈不堪的。威廉·克莱爵士在赫尔向他的选民无意中泄露，帕麦斯顿勋爵原来已打定主意要在和平时期继续征收战时税，只因为下院开会时迪斯累里先生提出了一项预示着可能引起麻烦的所得税提案，并得到了格莱斯顿先生的附议，这才迫使他一下子缩了回去，突然改变了他的财政策略。因此，可怜的乔治·刘易斯爵士得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他的全部计算、一切数字和整个方案，而他那篇为军事预算准备的演说，现在必须为一项准和平预算端出——这个代用品，如果不是讲得令人昏昏欲睡，倒可能是很有趣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历次预算，在他 1841 年至 1846 年执政时期，由于当时自由贸易派⁶⁹与保护关税派、^①利润与地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激烈斗争，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曾被看做荒诞的东西，因为其内容令人摸不清究竟是要恢复保护关税主义还是要彻底屏弃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则曾被人们过分渲染，说它是胜利的自由贸易在至少连续七年中的财务结算。这些预算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使这些预算得到人们积极的对待，但是乔治·刘易斯爵士的预算，从一开始就只能作为内阁反对者的共同攻击对象而引起人们的反感。

乔·刘易斯爵士的预算，就其收入部分的最初方案而言，用很少的几句话就能说明。他砍掉了为战时规定的 9 便士附加所得税，把

① 手稿中在这里还有：“产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编者注

所得税从每 1 英镑收入征收 1 先令 4 便士减少到征收 7 便士；这个税率一直要实行到 1860 年。另一方面，对酒类仍然要征收全部战时税，对食糖和茶叶仍然要征收部分战时税。仅此而已。

本财政年度的所得税，包括附加的 9 便士战时税在内，提供 1 600 万英镑以上的岁入，这笔岁入来自社会各阶级，其分摊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类——不动产.....	8 000 000 英镑
第二类——农场主.....	1 000 000 英镑
第三类——公债.....	2 000 000 英镑
第四类——商界和自由职业界.....	4 000 000 英镑
第五类——薪饷.....	1 000 000 英镑
<hr/>	
共 计.....	16 000 000 英镑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得税的负担完全落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身上；的确，它三分之二以上来自贵族和中等阶级上层的收入。但是，英国中等阶级的下层，一方面由于有其他的战时税，一方面又由于有昂贵的物价和高涨的贴现率，受所得税的折磨也是很厉害的，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摆脱掉。然而，要不是贵族和中等阶级的上层极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狭隘的自私心戴上一副宽宏大量的博爱的假面具并摆脱他们无法转嫁给人民大众的捐税负担，因而带头鼓动，那么中等阶级的呼声未必能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当然更谈不上在下院中反映出来了。法国在“诚实而温和的共和国”时期曾把规定所得税斥为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而加以拒绝，而如今英国则是以同情人民疾苦的借口来废除这同一种税。这套把戏玩得真是非常巧妙。在刚恢复和平⁷⁰之后，中等阶级下层的代言人不是攻击所得税本身，而

是只攻击它的战时附加部分,以及它的不平等的分摊办法。上等阶级装作理解民众的不满,但其目的只是歪曲这种不满的原意,把要求降低对小额所得的课税变成要求免去对大额所得的课税。中等阶级下层在斗争激烈时,由于急于求得早日减轻负担,没有发觉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也没有顾到获得强大同盟者支持的条件。至于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在新闻界没有机关报,在选举机构没有投票权,他们的要求根本就无从表达。

大家知道,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措施是以所得税作为基础的。不难理解,直接课税是自由贸易在财政上的表现。如果说自由贸易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就在于取消关税、国内产品消费税以及一切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捐税。

可是,如果税款不能通过关税和国内产品消费税来征收,那就必须直接从财产和收入中来征收了。在税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捐税减少必然会使另一种捐税相应地增加。这种减少和增加必定成反比例。因此,如果英国公众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税,那就得准备让商品和工业原料纳更多的税——一句话,就得放弃自由贸易制度。在欧洲大陆上正是这样来解释目前的运动的。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写道:

“在根特举行的一次讨论应采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政策的会议上,有一位发言人举出英国又在反对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作为英国舆论在转向保护关税政策的证明。”

同样,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在他们最近一次呼吁书中,就表示担心大不列颠会重新回到限制的原则上去。

他们说:“很难相信会出现这种全国性的盲目现象,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有点

头脑的人,不会不看到,目前力图达到的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①

在大不列颠,自由贸易,从而直接课税,是产业资本家所使用的对付土地贵族的进攻武器,所以他们对所得税的共同征讨,就在经济方面证明了成立联合内阁⁷¹在政治方面所证明了的的东西,也就是说,证明了英国中等阶级软弱无力,他们为了避免向无产者让步而力图与寡头们妥协。

乔·刘易斯爵士在向反所得税同盟投降的同时,也立刻暴露出另一面来。没有取消纸张税,没有放弃火灾保险费,没有降低酒税,相反,还提高了茶叶和食糖的进口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②方案,茶叶税应该^③先从每磅1先令6便士降低到1先令3便士,然后再降低到1先令;食糖税先从每英担^④1英镑降低到15先令,然后^⑤再降低到13先令4便士。这只是指精制糖而言。白砂糖税则从17先令6便士逐渐降低到13先令2便士和11先令8便士;黄砂糖从15先令降低到11先令8便士和10先令6便士;褐砂糖从13先令9便士降低到10先令7便士和9先令6便士;糖浆从5先令4便士降低到3先令9便士。战争阻碍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但是按照1855年通过的法律,这个方案应该在1857年和1858年逐渐实现。在1855年4月19日把茶叶税从每磅1先令6便士提高到1先令9便士的乔·

① 《利物浦财政改革委员会主席及全体成员向联合王国各阶级发出的呼吁书》,载于1856年12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561号。——编者注

② 手稿中在这里还有“1855年的”。——编者注

③ 手稿中在这里还有“在1857年”。——编者注

④ 1英担等于112磅或50.8公斤。——编者注

⑤ 手稿中在这里还有“在1858年”。——编者注

刘易斯爵士，建议把这种税在四年内降低到1先令，即在1857—1858年降低到1先令7便士，在1858—1859年降低到1先令5便士，在1859—1860年降低到1先令3便士，最后降低到1先令。对于食糖税，他也建议采取这种办法。我们知道，对食糖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世界市场上食糖的存货减少了，例如目前在伦敦只有43 700桶^①，而两年以前还有73 400桶。所以，食糖价格自然也就提高了。至于茶叶，帕麦斯顿对中国的远征使供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因而使价格提高。因此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在商品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时期，要想使关税的任何降低不仅有利于进口商，而且有利于广大的消费者，就必须使这种降低进行得迅速而有力。但是乔·刘易斯爵士却反而断定说，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关税降低得越少，就越有利于消费者。这种说法只能与他的所谓邮政收费是一种直接税以及所谓混乱正可弥补课税缺陷这种奇谈相媲美。

以提高英国人民的日常消费品茶叶税和食糖税来弥补所得税的减少，这就是公然以增加对穷人的课税，来减轻对富人的课税。但是这种考虑未必能阻止下院通过这种措施。然而有些茶商，他们之所以缔结了大宗的合同和协定，据他们说，是由于确信乔治·刘易斯爵士于1856年4月19日在下院所做的声明（海关总署于1856年11月11日再度向茶商重申了这项声明），该声明说“1857年4月6日茶叶税将降低到1先令3便士”^②。因此，茶商坚持要让他们履行契约所规定的

① 桶为英制容量单位，1桶等于252加仑。——编者注

② 《茶叶税和食糖税》，载于1856年11月15日《经济学家》第690期。——编者注

义务,要使预算的道义上的义务得到遵守。同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很乐意报复一下帕麦斯顿,因为帕麦斯顿在利用皮尔派⁷²先推翻德比政府,然后推翻罗素,最后推翻他们自己的长老老阿伯丁之后,忘恩负义地把皮尔派抛弃了。此外,格莱斯顿,作为1853年财政方案的起草人,自然要保卫他自己那份模范的预算,使它不受乔·刘易斯爵士的无礼侵犯。因此,他宣称,他打算^①提出以下的决议案:

“根据1855年的关税法令,本院不同意对茶叶税和食糖税作任何增加。”^②

一直到现在,我只谈到预算的一个方面,即其收入方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另一个方面,即计划中的开支。如果说计划中的收入方面是英国官方社会目前状况的写照,那么,计划中的开支就更是英国现政府状况的写照了。帕麦斯顿需要钱,需要一大笔钱,不仅是为了牢固地确立他的独裁,而且也为了满足他的炮轰广州⁷³、对波斯作战²¹、对那不勒斯远征⁷⁴等等的贪欲。所以他才提出这种比1815年媾和以来的最高支出还超过大约800万英镑的和平时期预算。他要求65 474 000英镑,而过去迪斯累里先生只要有55 613 379英镑,格莱斯顿先生只要有56 683 000英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约翰牛应该预见到,在东方获得赫赫战功的幻想,将来有一天必然会化为税吏手中沉甸甸的账单。

但是,由于战争而额外加征的年度税额不能超过360万英镑,也就是说,200万英镑来自1857年5月到期的国库债券;120万英镑来

① 手稿中在“他宣称,他打算”这个地方是:“他在星期四,2月19日,宣称在星期五下院作为筹款委员会开会时,他打算”。——编者注

② 威·格莱斯顿(1857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610号。——编者注

自 2 600 万英镑新长期国债和 800 万英镑非长期国债的利息；最后，大约 40 万英镑来自对于新债务的新偿债基金。这样，加征的战时税实际上还够不上帕麦斯顿勋爵所要求的额外支出的一半。但是他的军事预算完全可以说明这些额外支出的增长。陆海军的全部预算从 1830 年到 1840 年平均不到 1 300 万英镑，但是在刘易斯的预算中竟达到 20 699 000 英镑。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与战前最后五年的军事预算对比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1849 年的预算是 15 823 537 英镑，1850 年是 15 320 944 英镑，1851 年是 15 555 171 英镑，1852 年是 15 771 893 英镑，1853—1854 年是 17 802 000 英镑，而 1853—1854 年的预算在批准时已经考虑到即将爆发战争。

乔·刘易斯爵士坚持着辉格党人⁴⁰的正统教条，认为树液生来就是充当害虫的食料的，所以他举出 1856 年进出口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但即使结论正确，前提仍然可以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只须看看以下这些情况就足够了：现在成千上万一贫如洗的工人流浪在伦敦街头，等待习艺所⁷⁵收容；1856 年英国的茶叶、食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减少了许多，酒类的消费量却略有增加，这已是官方收入的报告中提到的尽人皆知的事实；现任财政大臣威尔逊先生本人承认，去年的贸易报告清楚地证明了 1856 年英国贸易的利润与贸易的增长成反比例。本来，反对派领袖的策略自然应该是集中主要火力攻击这种过度的支出。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如果直接反对这种贵族式的挥霍，他就很可能受到自己那些家臣侍从们的背后暗算。^①因此他只好采取极其微妙

① 手稿中这句话是：“但是，如果迪斯累里先生认真地反对那些贵族食税人，他就很可能受到自己人的背后攻击。”——编者注

的手腕^①——在论证他的反对帕麦斯顿预算的提案时，不说这个预算为 1857 年和 1858 年规定了过度的支出，而是说这个预算难以保证国家在 1858—1859 年和 1859—1860 年得到必要数量的收入。

不论怎样，下院关于预算的辩论将是极其有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辩论要决定本届政府的命运，因为这场辩论是迪斯累里—格莱斯顿—罗素联盟反对帕麦斯顿的一出好戏，而且还因为财政反对派的那些论证本身——坚持取消所得税，禁止增加食糖税和茶叶税，但又不敢公然反对过度的支出——无疑将是一套新鲜的货色。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2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3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56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手稿中不是“极其微妙的手腕”，而是“极其无奈的应急之策”。——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⁷⁶

1857年2月27日于伦敦

德比伯爵和科布顿先生谴责对华军事行动的两个议案,都按照预先所作的声明提出了。一个是2月24日在上院提出的,^①另一个是2月27日在下院提出的^②。上院的辩论是在下院开始辩论的那一天结束的。上院的辩论给帕麦斯顿内阁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只得到36票比较微弱的多数。下院的辩论则可能会导致内阁的失败。但是不管下院的讨论将引起多么大的兴趣,上院的争论已经把论战双方的理由讲尽了,而德比和林德赫斯特两位勋爵的精辟演说已经抢在能言善辩的科布顿先生、爱·布尔沃爵士、约翰·罗素勋爵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前。

政府方面惟一的法律权威——大法官^③说:

-
- ① 爱·德比《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编者注
- ② 理·科布顿《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编者注
- ③ 罗·克兰沃思。——编者注

“除非英国在亚罗号事件¹⁵上有充分的理由，否则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

德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证明了英国在那艘划艇的事件上没有任何理由。他们采取的论据同英国发表最初报道后《论坛报》专栏文章^①采取的论据十分符合，所以我在这里只须把他们的论据很简略地概括一下就行了。

英方为推卸广州大屠杀⁷³的罪责而硬加于中国政府的罪名是什么呢？那就是：违背了 1843 年的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¹⁶。该款规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潜藏于英国军舰或商船上的中国罪犯，中国当局不得自行逮捕，而应要求英国领事引渡，由英国领事将罪犯交给地方当局。现在中国官员没有通过英国领事，逮捕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划艇亚罗号上的中国海盗。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德比勋爵指出：

“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

那么，这只中国船是怎样变成英国商船的呢？是靠在香港买到了英国船籍登记证或航行执照。这个登记证的法律根据是 1855 年 3 月香港地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现有条约¹⁸，并且还取消了英国自己的法律。因此，它是无效的。这项法令只有依据商务航运条例才能取得一点符合英国法律的外貌。但商务航运条例是在这项法令颁布了两个月之后才通过的。况且这项法令从未同商务航运条例的法律规定取得一致。因

① 指《英中冲突》一文，见本卷第 17—23 页。——编者注

此,划艇亚罗号据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项法令,完全是一张废纸。然而即使依照这张不值一文的废纸,亚罗号也得不到它的保护,因为这只船已违背它所规定的条件,而且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这一点,连约·包令爵士^①自己也承认。可是,有人说,不管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反正船上挂的是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侮辱。首先,如果挂了旗子,那么这面旗子是挂得不合法的。^②然而究竟是不是挂了旗子呢?关于这一点,在英国和中国的声明中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国的声明已经为领事们所转交的葡萄牙第83号划艇的船长和船员的证词证实了。11月13日的一期《中华之友》援用这些证词说:

“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③

可见,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保护荣誉的问题也不能成立。

德比勋爵在这次演说中很得体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话的习惯,从而使自己的论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费什么力气就使自己的演说充满了极深刻的讽刺。身为英国世袭贵族首领的德比伯爵是在反驳边沁的得意门生、以前的博士、现在的爵士约翰·包令;他是在维护人道,驳斥那位职业人道主义者;他是在捍卫各国的

① 手稿中这句话是:“曾写信给巴夏礼领事说亚罗号无权得到英国庇护的约翰·包令爵士”。——编者注

② 手稿中这句话是:“但是,首先,亚罗号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约翰·包令爵士本人在10月11日自香港寄给巴夏礼领事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编者注

③ 爱·德比(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编者注

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仪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赞同“民意即天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⁷⁷。征服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⁷⁸的会员却鼓吹开炮；德比痛斥英国海军的行动，说那是“卑劣的行径”和“不光彩的军事行动”，而包令却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暴行，为它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而额手称庆。德比伯爵越是显得不大意识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讽刺性就越是突出。他在这个并非出自个别人物的聪敏才思而是由时势的滑稽可笑所造成的历史大讽刺中占了上风。在全部英国议会史上，大概还从未出现过一次贵族在理智上战胜暴发户这样的事例。

德比勋爵一开始就声明：

他“只能依据他要指责其行为的那些人所提供的声明和文件”；他感到“这些文件”足以“论证他的论点”。

可是有一点已经被公正地指出过，即政府公之于众的这些文件使政府有可能将全部责任推卸给自己的部属。议会中反政府派的攻击完全指向包令及其同伙，而国内的政府却可以同意这种攻击而丝毫不损害本身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此。我现在引用勋爵本人的话^①：

“我不愿意说任何不尊敬包令博士的话。他也许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据我看来，在他要求准许进入广州的问题上，他简直是害了偏执狂。（会场喊声：“听啊！听啊！”还有笑声。）我相信，他做梦也要进入广州。我相信，他清早一醒来想的就是这件事，夜晚临睡时想的也是这件事，而半夜里他要是醒着，想的还是这件事。（笑声）我相信他一定认为，从他约·包令爵士能在广州衙门受

① 爱·德比(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编者注

到正式接待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来衡量,任何牺牲都不为大,任何通商中断都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笑声)”

接着是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言^①：

“约·包令爵士不仅是全权公使,而且是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笑声)。他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艘划艇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现在请注意他是怎么说的:‘该船是不受保护的,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千万不要透露给他们。’而且他的这个想法还很顽强,因为他实际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条约的罪过,但是我们不对他们这样说;我们坚持要求赔偿并且要求以特定的形式送回被捕者。要是没有按照这种形式送回水手,那么采取什么补救的办法呢?很简单,抓起一只中国帆船——中国的兵船。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抓,直到我们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有理而我们没有理。(“听啊!”)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吗?有过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提出更——我不愿说‘更欺诈的’,只使用在我国与‘欺诈’相等的字眼——更虚伪的口实吗?(“听啊!”)不寻常的是,这位约·包令爵士竟认为他有宣战的权力。一个处在这种岗位的人一定要有权采取防卫行动,对于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以那样一种理由,那样一种口实来采取进攻行动,这却是世界史上难以找到的最不寻常的做法。从提交议院的文件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自从约·包令爵士一开始就任现职以来,他的野心就是要达到他的许多前任根本没有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进入广州城。他由于一心一意地要实现进入广州城这一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结果又怎样呢?属于英国臣民的价值150万英镑的巨额财产,现在在广州被没收了;此外,我们的商馆被烧光了;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出于一个最有害的人的有害政策造成的。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① 约·林德赫斯特(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编者注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①”

最后，格雷勋爵发言^②：

“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发现，当约·包令爵士请求会见叶总督时，总督是准备会见他的，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的坐落在城外的房子作为会见地点。约·包令爵士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在通过议案时，如果期待不到什么别的结果，我希望至少得出这样一个有益的结果，即立刻召回约·包令爵士。”

下院对待约·包令爵士的态度也是一样，而且科布顿先生甚至在一开始演说时就郑重宣布同他这位“有着二十年交情的朋友”^③绝交。

从德比、林德赫斯特和格雷三位勋爵的演说中摘引的原话证明，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只要撇开约·包令爵士，不让自己与这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相混同，就可以挡开攻击。政府所以有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窘境，并不是由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反对者的纵容或他们的策略，而完全是由于提交议会的那些文件；这一点，我们在了解了根据这些文件所进行的辩论之后，再稍微看一看这些文件本身，就很清楚了。

-
- ①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亦译《量罪记》、《请君入瓮》）第2幕第2场。——编者注
- ② 乔·格雷（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编者注
- ③ 理·科布顿（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编者注

约·包令爵士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伦敦《泰晤士报》说，这个人“完全自行其是，既不和国内上司商量，也不考虑国内上司的政策”^①，这难道还没有证实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帕麦斯顿勋爵要在他的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在他困难重重，遇到了财政困难、波斯战争²¹、秘密条约、选举改革⁷⁹、联合内阁⁷¹等等问题的时候，在他感觉到下院注视他的目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而较少钦敬”的时候，——为什么他恰好要选定这个时候，冒着使他自己的地位更加恶化甚至彻底垮台的危险，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向另外一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表现出始终不渝的忠忱呢？为什么他要使自己喜新好奇的热情高涨到这一步田地，乃至去给一位包令博士当替罪羊呢？当然，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认为这位高贵的子爵会陷入这种罗曼蒂克的精神失常。他在这次同中国发生的纠葛中所奉行的政策，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他提交议会的文件是不完整的。除了已经公布的文件，必定还有秘密文件和秘密训令，这些文件和训令会证明：如果包令博士真的害有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是由于在他背后有这位头脑冷静的白厅⁸⁰首脑鼓动着他的偏执狂，并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它从潜热状态煽成吞噬一切的火焰。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2 月
27 日

载于 1857 年 3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6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1857 年 2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2615 号的社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1857年3月6日于伦敦

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①，经过四个夜晚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以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而平静下来。帕麦斯顿用“惩罚性的解散”来回敬不信任。⁸¹他把下院议员们打发回家以示惩戒。

辩论的最后一个晚上，下院会场内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众中间笼罩着极强烈的激动情绪，这不仅是由于所系利益之巨大，而且更是由于受审判一方的性质。帕麦斯顿的执政，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执政，而是一种独裁。从对俄战争³⁸开始起，议会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在媾和以后，它也没有敢于重申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了立法团⁸²的地位，它所不同于原来波拿巴的那个御用机构之处，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装腔作势的高调。单是组成联合内阁⁷¹这一点就已表明，各旧政党——议会机器就是靠它们彼此的摩擦运转的——已经化为乌有。由联合内阁最先反映出来的各政党的这种无能，后来由于战争的作

① 见本卷第61—67页。——编者注

用而体现在一人的万能之中,此人在他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来不曾属于任何政党,但却一直利用所有的政党。要不是发生了对俄战争,这些旧的官方政党的衰败本身就会引起变革。议会就会由于它机体中注入新鲜血液,即给仍处于被剥夺了表决权和代表权境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至少某一部分以政治权利,而获得新的生命。然而战争中断了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战争不是使旧的议会矛盾的中和有利于群众,而是使这种中和的好处完全为一人独得。结果我们得到的不是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帕麦斯顿的独裁。战争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强大原动力,战争也是确保这种结果的惟一手段。所以战争已经成为帕麦斯顿独裁的首要条件。在英国人民中间,对俄战争比巴黎和约⁷⁰要受人欢迎。那么为什么这位英国的阿基里斯^①——凸角堡的耻辱和卡尔斯的投降⁸³就是在他主持下发生的——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呢?很明显,这是因为这种抉择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所以他就以同美国发生的误解⁸⁴为理由而签订了巴黎条约,所以他就要远征那不勒斯⁷⁴,他就和波拿巴来一场表面的争吵⁸⁵,他就入侵波斯,他就在中国进行大屠杀。⁷³

下院就这最后一个事件通过不信任案,便是取消了帕麦斯顿维持他所篡夺来的权力的手段。所以这次投票不是单纯的议会表决,而是一次反抗——一次强行恢复议会宪法职权的企图。下院普遍的情绪是如此,而且不管形成这种杂牌多数的几个派系——包括德比派、皮尔派⁷²、曼彻斯特派⁶⁹、罗素派以及所谓独立派——抱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他们全都说决不是一般的反内阁阴谋使他们在投票中联合一致。这倒是实话。然而,指责他们搞阴谋正是帕麦斯顿答辩

① 讽喻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的中心论点。他以争取听众同情的辩论，把自己装扮成无原则阴谋的受害者，来掩盖自己的理亏。对于这种像老贝利^①的罪犯们所惯用的辩词，迪斯累里先生的驳斥是最妙不过的了。迪斯累里说：

“首相是世界上惟一不能容忍联合的人。可是，他却正是毫无明确原则的政治联合的头号样板。请看他的政府是怎样组成的吧。就在去年，他的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在本院支持一个法案，我记得，那个法案是一位前阁员提出的。但是在上院，这个法案却遭到一位政府成员的反对，并且他为了给自己那显然前后矛盾的行为辩解，公然宣称，他就任时首相并不曾要求他在任何问题上做出保证。（笑声）然而，高贵的勋爵^②却对今天这个无原则的联合感到大为震惊！高贵的勋爵不能容忍联合！高贵的勋爵只与自己在政治上诞生于其间、成长于其间的人们一起行动。（喝彩声和笑声）那个海格立斯娃娃（指着帕麦斯顿勋爵）是从辉格党的摇篮里出来的，他的政治生涯是多么首尾一贯啊！（笑声再起）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贵的勋爵几乎什么原则都信奉过，几乎同哪一个政党都结成过联盟，而在今天晚上，他却大声警告别人不要联合，因为他害怕下院的多数——其中包括若干曾做过高贵勋爵的同僚的最杰出的议员——可能不会批准业已以暴行开始、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以毁灭告终的对华政策。先生们，这就是高贵的勋爵现在的立场。我们曾听到高贵的勋爵为这个政策作过什么答辩吗？他有没有规定哪怕一条我们的对华关系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呢？他有没有提出哪怕一条我们在这一危急困窘的关头能够遵循的政治准则呢？相反，他为了掩盖他理屈词穷的狼狈相而说——说什么呢？——说他是阴谋的受害者。他不是像一个大丈夫或者政治家那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答辩。他把辩论中出现过的一些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了结和过了时的琐细意见重复一番，然后回过头来说这一切都是阴谋！高贵的勋爵一向习惯于不提出一条原则而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实际上是偶然情况的结果，事实上它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高贵的勋爵坐在议席上，不必就任何一个能触动国人心灵或影响全国舆论的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可是高贵的勋爵终于将发现，现在已经是这样的的时候了：如果他要做一个政治家，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政治路线；他将发现，他的内阁的荒唐

① 老贝利是附设有监狱的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别称。——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行为一被察觉、所有那些通常影响下院意见的人一联合起来加以斥责,就赶快向国人申诉他是阴谋的受害者,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①

然而,如果以为这次辩论触及那样牵动人心问题所以就一定很吸引人,那就完全错了。辩论一晚又一晚地进行,而总不举行表决。在大部分搏斗中,斗士们的声音都淹没在私人交谈的嘈杂声浪中。一晚复一晚,官场人物们都抢时间发言,以便赢得另一个24小时去进行阴谋和幕后活动。第一天晚上,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布尔沃和约翰·罗素勋爵也一样^②;可是首席检察官^③对他们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拿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深思熟虑的提法或论证去和在另一个地方发表的论证作比较”^④。无疑他是正确的。第二个夜晚被双方的法律代表——检察长^⑤、怀特赛德先生和首席检察官——冗长的专门关于法律方面的争论占去了。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倒的确想使辩论增色,但是没有成功。当这个实际上谋杀了邦迪埃拉兄弟的人^⑥假装清白地高喊,他“要洗清他与这无辜流血案件的关系”的时候,会场上对他这种可怜巴巴的呼喊报以抑制不住的讥笑声。第三天晚上更是无聊。未来的首席检察官弗·塞西杰爵士向现任的首席检察官答辩,希大律师奋力向弗·塞西杰爵士

-
- ① 本·迪斯累里(1857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4日《泰晤士报》第22619号。——编者注
- ② 理·科布顿、爱·布尔沃和约·罗素(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编者注
- ③ 理·贝瑟尔。——编者注
- ④ 理·贝瑟尔(1857年2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16号。——编者注
- ⑤ 詹·蒙克里夫。——编者注

答辩。约翰·帕金顿爵士大力施展他那粗俗的辩才。卡尔斯的威廉斯将军的发言,下院只静听了几分钟就不约而同地置之不理了,清楚地看出他并不是他们原来想像中的那个人。最后,悉尼·赫伯特爵士发了言。这位皮尔政治学派的文雅后生所发表的演说,的确是简洁有力、尖锐、对比鲜明,不过只是对官场人物的论点加以嘲笑,而没有提出他自己的新论点。但是最后一个晚上,辩论倒是达到了下院应有的水平。罗巴克、格莱斯顿、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都大显才能,每人各有千秋。

困难的是撇开在辩论中被用做挡箭牌的约·包令爵士而直接揭露帕麦斯顿勋爵本人,要他个人对“屠杀无辜者”负责。这点终于做到了。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主要将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尽量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次讨论的结果料无不妥吧。在内阁被击败的第二天和内阁宣布解散下院的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竟敢这样说:

“国民将很不能理解要回答的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因为这里六个星期之后才听说的、发生在世界彼端的、而且是前内阁委派的官员们干的那一系列的事,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大臣们在圣诞节才听说有这些事,当时他们也和任何别人一样毫无所知。实际上,所报道之事简直就像月球上发生的事或《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同现内阁扯不上任何关系……难道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应该为了它过去从未做过并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它只是与大家同时听到的事情、为了那些不是由它委派的并且它至今未能与之保持任何联系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而被谴责和撤换吗?”^①

对于这家一直把广州大屠杀⁷³说成是帕麦斯顿外交杰作的报纸的这种无耻的胡言乱语,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在冗长辩论中好不容易弄清、并且是帕麦斯顿或其下属一次也没有加以争辩的事实来反驳。

^① 1857年3月5日《泰晤士报》第22620号社论。——编者注

1847年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时关于要求准许香港英国当局进入广州问题所发的第一道训令,就是用威胁的词句写成的。不过,他的火气被他的同僚,当时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浇了一盆冷水,格雷伯爵不仅给驻香港的、而且还给驻锡兰的海军的指挥官们发出了一道最严格的禁令:在未得到来自英国的特别许可时,任何情况下不准对中国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在1849年8月18日,即在他被罗素内阁免职之前不久,给驻香港的英国全权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那些大员们或北京政府想错了。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虚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摧毁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给该城居民以最严厉的惩罚。”^①

可见,1856年帕麦斯顿勋爵任首相时所发生的炮轰广州的事情,早在1849年帕麦斯顿勋爵在罗素内阁外交大臣任内最后一次发到香港去的训令里就有了先兆。那时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曾稍微放松那项不准香港英国代表逼迫中国当局准许他们进入广州的禁令。罗素政府的格兰维尔伯爵,德比政府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和阿伯丁政府的纽卡斯尔公爵都是如此。最后,到1852年^②,一直做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被任命为全权公使。据格莱斯顿先生说,包令的任命是帕麦斯顿的工具克拉伦登勋爵一手包办的,事先并未告知阿伯丁内阁或征得其同意。当包令第一次提出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克拉

① 詹·格雷厄姆(1857年2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16号。——编者注

② 应为1854年。——编者注

伦登在1854年7月5日的训令里对他说,他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等到为实现他的目的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已经具备时才动手。当时英国正和俄国作战。当亚罗号事件¹⁵发生的时候,包令正好得悉已经媾和并且的确正在给他派出海军,于是就挑起了同叶总督的争端。1月10日,克拉伦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通知包令:“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西马糜各厘爵士和你本人所采取的做法。”以此短短一句话表达的认可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正相反,哈蒙德先生奉克拉伦登勋爵之命,在给海军大臣^①的信中对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表示政府赞赏“他行动适度和尊重中国人的生命财产”。

可见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至于如今他希望打出什么旗号去号召联合王国的选民,这个问题我想留到下一篇通讯里来回答,因为本文篇幅已经超过限度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
6日

载于1857年3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7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① 拉·贝尔纳-奥斯本。——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⁸⁷

1857年3月13日于伦敦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我的好大人；
这样我好唱出一套赞美曲来。”^①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是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低教会派的主教们——他们都是由这个老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别利伯爵提名而当上主教的——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②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③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为伦敦的“尸首贩子”⁸⁸感到骄傲。同样，帕麦斯顿为利物浦的“毒品贩子”感到骄傲。这些满脸和气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直接靠奴隶贸易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尊贵代表。别无什么诗篇闻名的利物浦，至少有资格要求给它记上一笔曾以赞美奴隶贸易的颂歌丰富了诗坛的独特功劳。如果说平达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Ariston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3幕第7场。——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约翰王》第1幕第1场。——编者注

③ 同上，第2幕第1场。——编者注

men hudor”)^①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们的颂歌,那么,现代利物浦的平达在赞美唐宁街⁸⁹拳击手们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高明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也大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而热衷于取消现行的对华条约。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动机。去年他们冒险进行了大宗茶叶投机生意;战争拖延下去,会使他们的大量存货涨价,同时又会使他们能够延期偿付广州债主的巨额债款。所以,战争会使他们既能欺骗英国的买主同时又能欺骗中国的卖主,从而实现他们所设想的“民族光荣”和“商业利益”。一般地说,英国制造商并不赞同这种利物浦教义问答的教条,所根据的就是那个导致希望棉价低廉的曼彻斯特人与希望棉价高昂的利物浦人对立的崇高原则。在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②期间,英国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着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他们心窍的那把大锁。从1854年到1857年,向中国出口的英国工业品平均不超过125万英镑,而这是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字。

英国制造商发言人科布顿先生在下院说:“实际上,从1842年以来,我们(即联合王国)丝毫也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就我们的工业品而论是如此。我们增加了茶叶的消费量,仅此而已。”^③

① 平达《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编者注

② 即1840—1842年鸦片战争。——编者注

③ 科布顿《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编者注

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制造商能够比英国主教、鸦片走私商和茶商看得广阔些。如果不算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不放的食税者和钻营家,不算那些相信在帕姆^①的庇佑下“民族将振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们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的真正党羽都列举过了。可是我们还不要忘掉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⁹⁰和小丑;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因而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颂扬这位广州大屠杀⁷³的英雄。这样,就应该认为下院的表决不仅意味着对帕麦斯顿的反叛,而且意味着对《泰晤士报》的反叛。所以,即将举行的选举不仅要决定是否让帕麦斯顿独揽国家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决定是否让《泰晤士报》完全垄断舆论的制造。

那么,帕麦斯顿会用什么口号来争取大选的选票呢?扩大对华贸易吗?可是他已经摧毁了这种贸易赖以进行的口岸。他已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这种贸易从海上转向了大陆,从五个通商口岸转向了西伯利亚,从英国转向了俄国。他提高了联合王国的茶叶税,这是扩大对华贸易的最大障碍。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吗?可是政府本身提交下院的蓝皮书⁹¹《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证明,最近七年来那里只发生了六起侮辱事件,其中两起的肇事者是英国人,而在其余四起中,中国当局尽力惩办了罪犯,使英国当局感到完全满意。所以,如果目前香港、新加坡等地英国商人的生命财产有危险,他们的危险也是帕麦斯顿自己招来的。但是要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呀!帕麦斯顿已经把它按每面50英镑的价格出卖给香港的走私商,并且以“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英国货买主”玷污了它。然而,

① 即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扩大贸易、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和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这些口号，就是那些现在已向选民发表演说的政府先知们提出的仅有口号。他们聪明地避而不谈任何国内政策问题，因为“不要改革”和“增加捐税”的口号是得不到支持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一位阁员，王室司库马尔格雷夫勋爵对选民说，他“不想提出任何政治理论”^①。另一位阁员，鲍勃·娄，在基德明斯特尔发表演说时嘲笑不记名投票、扩大选举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欺人之谈”^②。还有一位阁员，拉布谢尔先生，就是那个以这样一种借口来为炮轰广州辩护的聪明人，他说，如果下院判定这一行动不正当，那么英国人民就得准备给那些财产在广州遭到毁灭的外国商人赔偿大约 500 万英镑，——就是那个拉布谢尔，在向汤顿的选民发表演说^③时根本抛开政治，干脆就拿包令、巴夏礼、西马糜各厘的丰功伟绩来作为他竞选的论据。

可见，一家英国地方报纸所说帕麦斯顿不仅没有“高明的竞选口号，而且没有任何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事情决不是绝望了。自下院表决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对广州采取的地方性暴力行动已导致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现在的问题只是，由谁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断言这场战争正当的人，不是比他的靠谴责这场战争而当选的对手更能有力地进行战争吗？

难道帕麦斯顿不会在两届内阁之间的空位期间把事情搞得一团

① 乔·马尔格雷夫《1857年3月在斯卡伯勒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27号。——编者注

② 罗·娄《1857年3月10日在基德明斯特尔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27号。——编者注

③ 亨·拉布谢尔《1857年3月11日在汤顿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27号。——编者注

混乱,好使自己成为仍然不可缺少的人吗?

其次,单是发生选举斗争这件事,难道不会使问题得到有利于他的解决吗?按英国选民目前的成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选举斗争就意味着辉格党⁴⁰和托利党⁹²之间的斗争。既然帕麦斯顿是辉格党的实际领袖,既然他的失败必然造成托利党的上台,那么,大多数的所谓自由派难道不会为了排斥德比而投帕麦斯顿的票吗?这些就是政府派实际所指望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那么人们迄今默然忍受的帕麦斯顿的专制独裁就会公开宣告实行。新的议会多数只有毫不含糊地表现出对首相俯首听命才能存在。到了一定的时候,帕麦斯顿一撇开议会而诉诸人民,就可能会发生一次政变,正如在波拿巴撇开国民议会而诉诸全国之后发生了政变^①一样。那时,正是这些人民可能会由于吃了苦头而认识到,帕麦斯顿是卡斯尔雷—西德茅斯内阁的旧阁僚。那个内阁曾经压制出版,禁止公众集会⁹³,中止人身保护法⁹⁴,使内阁的任意监禁和放逐合法化,最后还在曼彻斯特屠杀⁹⁵了反对谷物法⁵⁵的人民。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3 日

载于 1857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7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指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法国发动的政变。——编者注

卡·马克思

* 俄国的对华贸易

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⁹⁶自己——至于法国人，他们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客串，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

因为俄国人被排除在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牵连；他们也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然而俄国人却自己独享内陆和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

外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 1768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⁹⁷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惟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①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 100 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 12 名代理商管理,其中 6 名俄国人,6 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 4 万箱;但在 1852 年却达 175 000 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食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有限。俄国人则付出价值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金属制品、毛皮,甚至还有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 1 500 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 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②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 5 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 600 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 1855 年集市的茶叶不下 112 000 箱。

① 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此处显然指蒙古。——编者注

②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 900 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在海上贸易畅通的情况下,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利包两港同俄国内地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间的交通。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自然比使用我们拟议中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也是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因而完全可以由陆路运输的货物;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工业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内陆贸易。它占领黑龙江沿岸的地方——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⁹⁸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³⁸期间曾受阻中断,但是,无疑它将来会恢复并大力推进这种努力。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支舰队,无疑它将来会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来谋求参与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对它说来,这与扩大已经为它所垄断的陆路贸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8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

1857年3月20日于伦敦

编写1848年到1858年的欧洲历史的未来历史学家，对于波拿巴1851年对法国采用的手段⁹⁹同帕麦斯顿1857年对联合王国采用的手段竟如此相似，一定会惊愕不已。这两个人都假装不求助于议会而求助于国民，不求助于狡猾的党派联合，而求助于老实的舆论。这两个人都提出类似的借口。如果说波拿巴曾经要拯救法国免遭社会危机，那么如今帕麦斯顿就是要拯救英国免遭国际危机。和波拿巴一样，帕麦斯顿要证实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对付立法权的空谈和干扰。波拿巴既诉诸保守派，同时又诉诸革命派，把前者当作贵族的敌人，把后者当作中等阶级夺权的敌人。而帕麦斯顿——他不是也侮辱过一切专制政府吗？他会引起任何自由派的不满吗？另一方面，难道他没有出卖一切革命吗？他不是应该成为保守派选中的人物吗？他反对任何改革，保守派怎么会不支持他！他不让托利党⁹²人担任官职，自由派的钻营之徒怎么会抛弃他！波拿巴这个名字使外国人害怕，但代表法国的光荣。帕麦斯顿对于联合王国说来不也正是如此吗？不管怎样，从1830年以来，从英国实行改革³⁹以来，因而也就是从英国近代史开始以来，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

以外，他一直执掌着外交部。因此，英国的国际存在，不管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或多么“光荣”，都离不开帕麦斯顿勋爵这个中心人物。波拿巴一拳就打倒了法国所有公认的大人物，而帕麦斯顿难道不会把罗素派、格雷厄姆派、格莱斯顿派、罗巴克派、科布顿派、迪斯累里派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统统“碎为齑粉”？波拿巴不讲原则，毫无顾忌，但他答应给法国所希望的东西——一位人物。帕麦斯顿也是如此。他也是一位人物。连和他势不两立的敌人都不敢说他代表着什么原则。

法国立法议会的统治，这不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¹⁰⁰再掺上少许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联盟的统治吗？他们的这个联盟本身就证明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政党的解体，而旧的党派传统只允许它们结成一个消极的统一体。这种消极的统一体不适于积极行动；它的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它只能是一种障碍；波拿巴的权力即由此而来。帕麦斯顿的情况不也正是如此吗？1852年起召开的议会不也是一个联合议会，因而不是一开始便体现为一个联合内阁吗？法国国民议会被波拿巴强迫驱散时，已经失去了足以成事的多数。下院在被帕麦斯顿宣布最终解散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波拿巴在诉诸国民以前就举行了政变。受宪法约束的帕麦斯顿在试图举行政变之前，必须先诉诸国民。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一切优势都在波拿巴方面。巴黎的大屠杀，外省的武力迫害，全面戒严，大规模的剥夺政治权利和流放，投票箱后有刺刀前有大炮，——所有这一切使波拿巴派报纸（惟一免于被十二月洪水冲走的报纸）的论据具有险恶的雄辩力，无论这家报纸的肤浅的诡辩、令人极端厌恶的逻辑或辞藻堆砌得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都不会使它失去说服力。相反，帕麦斯顿的喽啰们喊得越响，他的地位却越不稳

固。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可是他忘记吩咐自己的奴才们记住人们给那想为瞎子领路的跛子提出的忠告,——他忘记叮嘱他们记住达来朗所说的“切莫过于殷勤”。的确,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太过火了。例如,首都一家报纸就曾这样大唱赞歌:

“帕麦斯顿万岁!——这就是我们期望回响在每一个选民大会上的口号……对帕麦斯顿勋爵无限忠诚——这就是每一个候选人的信条中应该恪守的第一教义……必须要自由派的候选人承认: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首相——这是当今的政治必然性。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是当代的英雄,不仅是未来的英雄,而且是当前的英雄;不仅是紧要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是我们同时代人中惟一的、生来应付我国显然即将面临的情况的人物……他是现代的偶像,是万民爱戴的人,是一轮冉冉东升的旭日。”

难怪约翰牛对此感到无法忍受,难怪帕麦斯顿拥戴者们的热狂使人们大倒胃口。

既然帕麦斯顿本人被宣布为政治原则,所以难怪他的对手们把对他本人的仔细研究当作了自己的政治原则。的确,我们看到,帕麦斯顿仿佛有魔法似的,使议会制英国的所有昔日巨擘都死而复生了。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是约翰·罗素勋爵(辉格党⁴⁰人)出现在伦敦饭店首都选民大会上的场面^①,以及皮尔派⁷²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卡莱尔选民面前的表演^②,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学派⁶⁹的代表理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群众大会上的戏剧性表演^③。帕麦

① 约·罗素(1857年3月19日在伦敦饭店举行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633号。——编者注

② 詹·格雷厄姆(1857年3月16日在卡莱尔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19日《泰晤士报》第22632号。——编者注

③ 理·科布顿(1857年3月18日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633号。——编者注

斯顿并不像海格立斯那样行事。他不是把巨人举到空中去杀死，而是把侏儒们扔回到地面上，以赋予他们新的力量。如果有什么人在世人心目中的评价下降的话，那么这无疑是约翰·罗素勋爵，一位所有法律早产儿的生父，玩弄权术的英雄，维也纳的外交调停人¹⁰¹，能使一切都无可挽救地化为乌有的人物。但是现在请看一看他昂首阔步地出现在伦敦选民面前的场面吧。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纯粹是帕麦斯顿给他安排的环境造成的。罗素说，我是废除宣誓法¹⁰²和市镇机关法¹⁰³的法案的倡议者，是议会改革法案³⁹、市政机关改革法案¹⁰⁴、调整教会什一税¹⁰⁵问题法案、某些有关非国教徒¹⁰⁶的自由派法案以及若干有关爱尔兰的法案的倡议者。总而言之，我体现了辉格党人政策中一切进步事物的实质。难道你们为了一个代表着并无人民成分的辉格主义（不是作为政党而只是作为一群钻营之徒的辉格主义）的人而把我牺牲掉吗？然后，罗素把自己的缺点用来吹嘘自己。我一向是反对无记名投票的。难道你们以为帕麦斯顿奚落我，我现在就会自甘堕落而放弃信念，就会保证支持激进的改革吗？他的听众喊道：不，不能让约翰勋爵现在承担支持无记名投票的义务。这位小人物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循序渐进的议会改革运动的拥护者。为不赞成无记名投票的约翰·罗素三呼万岁之后，还得再呼一声万岁！然后，罗素勋爵使天平完全倾向于他那一方面，他问到会的人，他们能否允许一个小小的鸦片商集团按照帕麦斯顿的命令组成竞选团体来把政府所示意的决定强加在首都的自由选民身上，并且按照帕麦斯顿的命令，使他，即十六年以来一直是他们的朋友的约翰·罗素勋爵本人遭到奚落！不！不！听众高声喊道，打倒这个集团！约翰·罗素勋爵万岁！很可能，现在他不仅将在伦敦重新当选为议员，而且可能得票最多。

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的故事则更加奇特。如果说约翰·罗素勋爵变得很可笑,那么格雷厄姆就变得很可鄙了。他对他的卡莱尔选民说:我生平有一次凭良心办事,宁可冒着丧失政治地位的危险而不愿屈从于一个人的命令,难道因此我就应该被人当作一支点完了的蜡烛一样吹灭,像一只被赶出赛狗场的狗一样溜走吗?你们不管我干了多少丑事,还是选举我作为你们的代表。难道你们会因为我做了惟一的一件好事而要把我打发走吗?卡莱尔的选民回答道,当然不会。

与罗素和格雷厄姆不同,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先生所要应付的不是自己的选民,而是布莱特和吉布森的选民。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曼彻斯特学派的名义说话。这就加强了他的地位。在曼彻斯特,拥护帕麦斯顿的口号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还要显得做作。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在本质上不同于伦敦和利物浦的鸦片走私商的利益。在曼彻斯特产生的抵制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反派不是依据当地社区的物质利益,而号召选举帕麦斯顿则和这个社区的全部传统直接抵触。这个号召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高价报刊,它们想为废除报纸印花税和降低广告税¹⁰⁷报仇;另一方面是有钱有势的工厂主,他们对布莱特的优越的政治地位很眼红,企图扮演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以为纠集在帕麦斯顿的贵族旗帜下比支持布莱特的稳健纲领更为时髦,更为高雅。曼彻斯特的帕麦斯顿集团的这个特点,使科布顿能够从反谷物法同盟³⁷运动以来第一次重新占据平民领袖的地位,重新号召劳动阶级聚集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形势。他选来攻击帕麦斯顿的调子是多么高,可从下面这段引文中看出来: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与我认为我国人民应该密切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有联系。你们是否希望下院议员维护你们的利益,监督支出(是的,是的!)并且不

让你们卷入无益的、花钱的战争呢？（是的！）好，但是，如果我从你们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在选举过程中得到证实的话，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那些为了密切关怀你们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并且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次战争问题进行了表决的议员全都抛开，让他们赋闲在家，而准备另选别人（不，不！）——另选别人出来干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吗？不，是让他们到议会里按现任大臣的指示干些卑鄙龌龊的勾当。（高声喝彩）的确，我听说，你们准备让帕麦斯顿勋爵来做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不！）好，可是如果议会不制止他，如果他在受到议会抑制的时候解散议会，如果你们不把那些不偏不倚、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你们的权利的人送进议会，而把纯粹执行帕麦斯顿意志的人送进议会，那岂不是授他以专制权力吗？让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世界上最粗暴的、代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专制；因为你们在这位大臣周围造成了代议制形式的骗人假象；当他躲在议会的盾牌后面的时候，你们就动不了他；要是你们在选举中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不把那些将要警惕地监视现任大臣的人选入下院，我敢说你们的景况就会很糟糕，因为你们将要比普鲁士国王和法国皇帝的臣民受到更不负责的统治。（高声喝彩）^①

帕麦斯顿为什么急于进行选举，这就一清二楚了。他只有靠突然袭击才能获胜，而时间对突然袭击是不利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0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理·科布顿《1857 年 3 月 18 日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演说》，载于 1857 年 3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22633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¹⁴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讯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硬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有事实作根据,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⁶³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对于东印度公司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或者承认是“有意不闻”,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①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②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

“如果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它走的就是一条应受议会和全国谴责的道路。但是相反,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受到了严重的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暴虐,对此我们不能默不作声。(喝彩声)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

① 托马斯·奎斯特德·芬尼斯。——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1857年3月20日在议会大厦举行的内阁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634号。——编者注

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设身处地也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的行动,那我们就是辜负了我国同胞对我们寄予的信任。(喝彩声)”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它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¹⁵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①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

① 斯·巴夏礼。——编者注

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斗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

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的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¹⁰⁸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¹⁰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2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以下这封信摘自《佩斯劳埃德氏报》。

2月26日于切尔克西亚图阿普谢司令部

“您将由英国轮船袋鼠号接到这封信，也许它将使欧洲首次得悉一个可能对切尔克西亚各民族未来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您知道，我的上司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已经同意切尔克西亚各部落领袖和代表的要求，接受总司令的职务。星期一，即2月23日，我们在司令部所在地图阿普谢上岸。在动身前，穆罕默德贝伊给各兵种聘请了约两百名优秀的军事教官，他们随同我们来到此地。穆罕默德贝伊已被郑重宣布为切尔克西亚部队的总司令。王公、贵族以及民众代表都手按古兰经宣誓服从他，切尔克西亚的议会代表团今天还呈献了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先知的旗帜。当这位新司令宣誓效忠这面神圣旗帜时，场面极为热烈。（旗帜是绿色的，上面有一把白剑、一弯新月和一颗星。）场内情绪慷慨激昂；切尔克西亚人决心获取完全独立，否则宁可战死沙场。预期到5月可能将有15万(?)人参加战斗。穆罕默德贝伊刚才对我说：‘俄国即将看到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占上风。’我熟悉我所掌握的材料（穆罕默德贝伊在上次战争中是站在切尔克西亚人一边的），所以我认为，一个民族，在没有军事组织的情况下能够抵御敌人三十年之久，一旦很好地组织起来，一定能得到完全的独立。您可以期望在即将来临的春天从这个山国得到一些重要消息。只要我们的通讯工具允许，您将最快地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事变进程的信息。”

班迪亚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最初在科苏特手下,后来在瑟美列手下;1851年和1852年流亡英国,被普鲁士政府和法国政府雇佣为密探,自然对它们的共同主人有所理解;现在他在英国的庇护下前往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占上风的切尔克西亚。旧的精神是反俄的,新的精神必定是亲俄的——切尔克西亚应该得到它从未丧失过的独立,而且,为了功德圆满,还得造出一个尚待建立的议会来。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
25日前后

载于1857年4月1日《自由新闻》第3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¹¹⁰

1857年3月31日于伦敦

“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作为争取重新选入新议会当舆论代表者的最好理由。……帕麦斯顿进入议院，将不是作为保守党、或辉格党、或皮尔派、或激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全民政党的伟大设计师和掌管人。”^①

以上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机关报《晨邮报》上的一段话。帕麦斯顿是独裁官，新议会是他的立法团⁸²——这就是这段话的含意，一些选举公报似乎也是这样说明的。至于《晨邮报》所说的“舆论”，正像人们公正地指出的，其中一半是帕麦斯顿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则一笑置之。

这场选举斗争中的最大事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⁶⁹的彻底失败：布莱特和米尔纳·吉布森失去了曼彻斯特的议席，科布顿失去了哈德斯菲尔德的议席，埃·阿米蒂奇爵士失去了索尔福德的议席，福克斯失去了奥尔德姆的议席，迈奥尔失去了罗奇代尔的议席。曼彻斯特的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帕麦斯顿政府也惊讶不已。

^① 1857年3月27日《晨邮报》第25971号社论。——编者注

从政府的行动犹疑不决，可以推断它对这个地区的胜利原不抱有希望。起初，帕麦斯顿收到曼彻斯特的一些告选民书，就立即气势汹汹地说要亲自去一趟棉都^①，在“对手自己的粪堆上”向对手挑战。但是，再一掂量，他退缩了。于是，内阁属员鲍勃·娄出场了。一伙大工厂主请他做曼彻斯特的候选人，保证即使失败也付给他2000英镑，这笔钱够他买到该郡的一座腐败的城镇选区⁵³，他公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允许竞选委员会开始以他的名义拉选票。后来科布顿先生在曼彻斯特发表了那篇重要的演说¹¹¹。这时，帕麦斯顿吩咐娄打退堂鼓，他依命照办了。经过再三考虑，在曼彻斯特获胜的希望仍然渺茫，《泰晤士报》便奉命扮演了寓言中的狐狸^②。鲍勃·娄不得不写一篇社论，坚持重新选举布莱特这一帮人，并且警告曼彻斯特不要因抛弃旧的代表而使自己丢脸。而当实际情况与所有这些忧虑相反，传给唐宁街⁸⁹的电讯说科布顿受挫，布莱特和吉布森落选，而且是被绝大多数票击败的时候，可以想像内阁阵营里如何欢欣若狂和高呼胜利了。至于帕麦斯顿本人，也许他认为这个胜利从他本身的意图来说已超出了限度，因为这个老骗子清楚地知道，要制服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巨人，只要让他进入下院就行了，而要很快摧毁下院本身，摧毁它的基础，即有特权的选民团，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也只要赶走它的一些最知名的议员，把他们撵上街头，从而给站在“英国宪法”门外、被剥夺了应享的权利的群众提供一批有声望的首领。

曼彻斯特学派在自己的一些据点被自己的军队的大多数所击

① 曼彻斯特的别称。——编者注

② 伊索寓言《狐狸和乌鸦》。——编者注

败,表面上完全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这不仅是因为科布顿和吉布森曾提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要把他逐出内阁,为解散议会提供借口。在帕麦斯顿身上和布莱特、科布顿等人身上,似乎体现了一种不同原则和不同地位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帕麦斯顿是鼓吹民族荣誉的号手,他们则是维护工业利益的喉舌;在他身上,在这位惯于玩弄外交手腕的子爵身上,集中体现了英国寡头政治的擅权,他们则是代表英国中等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暴发户;他从政党的瓦解吸取力量,他们的力量则来自阶级斗争。他是旧托利⁹²主义最后的肆无忌惮的体现,反对现已不存在的反谷物法同盟³⁷的领袖们。因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失败看来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加之他们的那些获胜的竞选对手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例如,布莱特的对手约翰·波特尔爵士,人们只知道他是曼彻斯特的大胖子。本来人们很可能把他称做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幸亏他那渺小的智慧和巨大的钱包使他不至于与那位不朽的骑士相提并论。米尔纳·吉布森的对手阿·特纳一向声称他本人是一个平凡的人,决不会以炫耀才华或摆阔气这种讨厌的作风来刺痛自己同胞的感情。最后,科布顿的对手阿克罗伊德先生指责前者是帝国的大人物,而他(阿克罗伊德),从来是将来当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哈德斯菲尔德人。他们全都以没有才能却有品德而自豪,这份天赋将使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犯下“反对一切政府”的错误,不会像米尔纳·吉布森那样为了某些理论上的奇思怪想而牺牲有利可图的职位。

但是,撇开表面现象不说,帕麦斯顿那篇反对科布顿等人的演说^①,

① 亨·帕麦斯顿(1857年3月27日在蒂弗顿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8日《晨邮报》第25972号。——编者注

并不是导致曼彻斯特学派周围长期堆积的易燃物爆炸的原因，而是使它们爆炸的借口。曼彻斯特是这群人的核心，布莱特又被公认为它的真正的英雄，所以审视一下他的失败，也就可以理解他的战友们在其他工业地区同时遭到的失利。在这里起了作用的首先是曼彻斯特的老的辉格党⁴⁰人和托利党人，他们渴望为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出现以来在政治上受到冷遇报仇雪恨。在1852年的选举中，布莱特仅以100票的多数战胜他们，这已表明对他们在数量方面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他们确实无法打着自己的旗号取得胜利，可是对于任何一支脱离布莱特大军的兵团来说，他们却是一支强大的援军。其次就是高价报刊的那些首领，这些人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¹¹²都怀有深仇宿怨。加尼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千方百计地反对布莱特，竭力为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破烂的论据乔装打扮，他的这种企图容易得到实现，是因为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对俄战争时期不得人心¹¹³。当时，他们的确不敢在曼彻斯特的公开集会上露面，不得不躲在纽奥尔大厦，即反谷物法同盟的旧址，和志同道合者饮茶密谈。自由派资产阶级、工厂主以及大商行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投票反对布莱特；在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中，一致拥护他的，只有贵格会¹¹⁴教徒和爱尔兰人，这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在联合王国随时随地都在追随自己的“自然主宰”。如何解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有的“曼彻斯特的大亨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像他们的利物浦对手那样成为“绅士”。如果说，他们在布莱特还是他们阶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时，曾经容忍像他这种有才能者的优越感，那么，现在他们认为，像一般庸人那样在飞黄腾达时将自己所妒忌的人一脚踢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过，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布莱特的个人优越感，更多的是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的陈腐要

求；这些余党是曼彻斯特的累赘，有点像残余国会¹¹⁵是英伦三岛共和国的累赘那样。这些余党在威尔逊先生的主持下定期集会，这位“体面人物”、已歇业的淀粉商人在会上受到同盟的名誉书记鲁宾逊先生和其他一些没有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小人物的支持。这些人被大风暴时期的浪涛卷到水面上，坚决不肯再沉下去，他们实在提不出任何理由赖在政治舞台上，只会死抱着昔日的陈腐传统，习惯性地编织着今天的谎言，每当布莱特需要时，就代表曼彻斯特出面表演一番。这次反叛的首领之一恩特威斯尔先生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坦白地说道：

“问题不在于对华战争，或对俄战争，或任何战争。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是否今后还要听命于在纽奥尔大厦集会的余党。”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终于埋葬了那曾经像梦魇一样压迫着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之后，不禁得意扬扬，自以为已堵上了他们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大门，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样做是为新的革命运动扫除了主要障碍。

然而，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义，由一个喝醉了酒的反布莱特的选民透露出来了，他在投票时大喊大叫道：“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换句话说：让改革问题和阶级斗争见鬼去吧！中等阶级终于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反贵族的口号我们听厌了，它们没有什么好处，只会让工人闹起来。我们已经争到了自由贸易，心情非常舒畅，尤其是在降低了战时所得税之后。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让我们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在全民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吧。让我们大家都做真正的英国大臣¹¹⁶帕麦斯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国人，真

正的约翰牛吧。

因此,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工厂主们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夺取的革命领导。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31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9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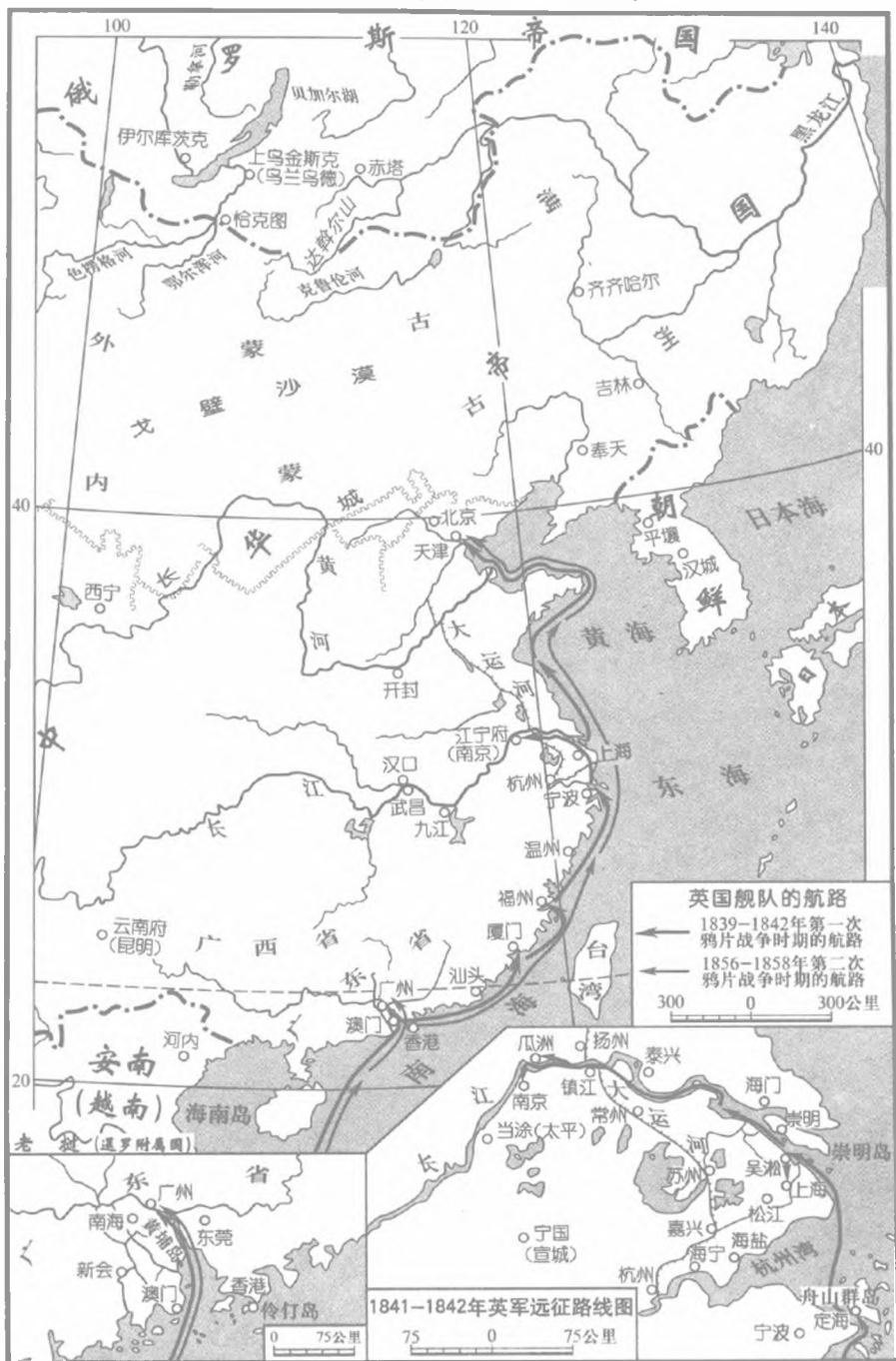
*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¹⁴

如果英国人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端达到顶点，那就可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 1841—1842 年因鸦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一样。那一次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向中国人勒索到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他们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虽然非常厌恶我们⁹⁶的掠夺本性，但是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并不比我们少一些——为我们 16 世纪和 17 世纪共同祖先所特有的那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然而自从英国人为贩卖鸦片而进行了那头一次顺利的掠夺性入侵以来，中国的局势已有重大的变化，因此令人十分怀疑的是：在当前进行同样的远征能否得到大略相同的结果。新的远征无疑将从香港岛出发，同 1841—1842 年那次一样。那次远征的舰队包括有：2 艘装有 74 门炮的炮舰，8 艘三桅快速战舰，多艘海岸炮舰和双桅横帆艇，12 艘蒸汽舰和 40 艘运输船；舰船上全部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达 15 000 人。新的远征使用的兵力大概不会比这少；实际上，我们下面叙述的许多理由将说明，他们会使用比这多得多的兵力。

1841—1842 年的远征军在 1841 年 8 月 21 日由香港出发，首先占领厦门，随后在 10 月 1 日占领了舟山岛，把这个岛作为他们以后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图

(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



军事行动的基地。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侵入中部大河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达离江口约 200 英里的南京城。长江把中国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自南京顺流而下约 40 英里处，皇家运河流入并穿过大江，这条运河是南北各省之间的通商要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通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迫使皇帝^①立即媾和。1842 年 6 月 13 日，英军在亨利·璞鼎查爵士率领下逼近了吴淞，到达与此地同名小河的河口。这条河^②由南流来，在紧靠长江注入黄海的地方流入长江口。吴淞口是位于它南面不远的上海的港口。吴淞口岸边建有炮台，可是它们全被毫不费力地攻下了。接着一支入侵的军队向上海进发，上海未经任何抵抗就投降了。长江岸边安分怕事的居民，度过了将近二百年的长期和平生活，现在才第一次经历战争。虽然英军当时还没有遇到居民的什么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从海上接近江口的地方却极难通过。长江江口广阔，它的两岸在入海处半为泥滩，几乎很难辨认，因为海面在离岸许多里格^③内是一片黄浊，黄海即由此得名。打算驶入长江的船只不得不谨慎地沿南岸前进，不断地用水砣测量深度，以免碰上由流沙形成的堵塞江道的浅滩。沿江口直到巨大的崇明岛北端，到处都有这种浅滩；崇明岛位于江口中心，把江口分成两条水道。过了这个长约 30 英里的崇明岛以后，长江两岸即开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海潮可涨到镇江府¹¹⁷，镇江府约在长江口与南京距离之半的地方。实际上，对溯江上驶的船只来说，从这里开始所看到的才算是一条江河，

① 道光帝。——编者注

② 事实上这条河应是黄浦江。——编者注

③ 旧时长度单位，1 里格约等于 5 公里或 3 海里。——编者注

在此之前的那一段只是海上的一个河口或臂形海湾。英国舰队在到达这个地点以前，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从舟山停泊处出发，用了15天才走了80英里。在崇明岛附近，曾有几艘较大的船只搁浅，但涨潮后就驶开了。英国人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这些中国的鞑靼^①士兵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鞑靼士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主将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投火自尽。在这次攻击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报复，在劫城的时候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对岸的瓜洲城投降了，并交出了300万元的赎金，英国海盗自然是分外高兴地将这笔钱放进了腰包里。

过了镇江，航道深达30英寻^②，因此，就深度来说航行已很便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非常湍急，每小时不下于六七英里。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这些军舰开往南京。8月9日，英军终于在南京城下抛锚了。结果不出英军所料。皇帝恐惧万分，只得于8月29日签订条约¹⁸；而现在英国人就是借口中国人破坏了这个条约而提出了以新战争相威胁的新要求。

① 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此处“鞑靼”士兵意即满清士兵。——编者注

② 1英寻等于1.829米。——编者注

如果这次新战争真的打起来,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但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了。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掉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其次,如果英军这次又企图溯长江而上,他们很可能遇到看来他们在上次战争中没有遇到的人工设置的障碍。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再度占领南京,未必会在北京朝廷中引起像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很长时间以来,南京及其周围很大部分地区都是在起义者^①的手里,有一个——也许是几个——起义领袖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¹¹⁸。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如占领南京,对于皇帝^②来说那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将起义者赶出南京,这倒是替皇帝效劳,但英军占领这个城市后,要守住它,将会是一件相当困难、麻烦和危险的事情,而且近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南京被一支敌军占领,对于北京或皇帝的统治可能也不会马上造成什么致命的后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9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指太平军。——编者注

② 咸丰帝。——编者注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1857年4月7日于伦敦

选举程序即将结束。显著的结果是：帕麦斯顿胜利了；议院的成员有了很大改变，涉及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议院的智力水平空前降低了。但是，英国各家报纸对内阁多数派的力量纷纷加以算计，因这些算计而争论不休，甚至对新当选的议员按照老框框加以分类，真是荒谬愚蠢。例如，《晨邮报》为内阁有80票的多数而欢欣鼓舞，迪斯累里的《新闻报》则估计自己在城镇失去了四个议席，在一些郡失去了约二十个议席。伦敦《泰晤士报》认为，由于皮尔派⁷²、曼彻斯特派⁶⁹和公开的保护关税派被逐，议会恢复了旧日面貌，回到了它的合法主人即古老的辉格党⁴⁰和托利党⁹²的手中。该报很想让世人相信：

“英国人民又回到了三十来年前的状况。”^①

迪斯累里的《新闻报》也附和《泰晤士报》的这种看法。但是寡头

① 1857年4月7日《泰晤士报》第22648号社论。——编者注

政治借以自我安慰的这种乐观结论，就像《观察家》这类伪激进派报纸的乐观结论一样，都是荒谬的。这家报纸写道：

“改革后的议会正符合帕麦斯顿勋爵的号召。”

可是要知道，帕麦斯顿需要一批奴才，而开明的国民，即少数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对他的恭维的回应却是给他送去一帮护民官^①！他们高呼“帕麦斯顿万岁！”只是为了欺骗这位狡猾的子爵！如果说，新议会发起一场大的运动，这当然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大不列颠像航海家辛伯达那样，将会发现要把老头儿甩掉比背着他更困难^②。

要把新议院同以前各届加以比较，也许最好先从那些在选举斗争中完全消失的老的议会党派开始，即从皮尔派和曼彻斯特学派开始。

与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曼彻斯特学派不同，皮尔派并不代表某个阶级，也不代表某个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议会中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在两院的墙外可能有不少朋友，但是却不能组成一支军队。他们是前届内阁留下的残骸；他们因自己的已故领袖^③背叛了谷物法⁵⁵而同托利党疏远；他们因念念不忘对辉格党人的旧恨而不愿融入辉格党的行列；他们坚信——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认为，——自己就是经世治国之才；他们因为有贵族联系而没有与曼彻斯特学派合而为一，他们相信能影响议会的辩论，因为他们之中有些人就是口若悬河的辩才。这个自封的政治家的自命不凡的核心动摇不定，

① 护民官为古罗马平民选出的维护其利益的官员。——编者注

② 《一千零一夜》中《航海家辛伯达的第五次航行》。——编者注

③ 罗·皮尔。——编者注

难以归类,表面上是一个特殊的议会党派,实际上是因皮尔的自由贸易立法而引起的所有议会党派瓦解后的产物。他们就是靠这种瓦解起家的,他们促使德比内阁垮台,推出自己的名义领袖^①来主持各党派的联合,即所谓的联合内阁或群贤内阁⁷¹,从而又加深了这种瓦解。当议会的瓦解过程显然加快时,他们这伙人便体面地举起旗帜来掩饰旧党派的同时自杀。他们于是暂时赢得了统治地位,而同时也就取消了他们作为一个特殊集团存在的惟一理由。联合起来的各党派把力量结合在一起,结果必然是大家都变得软弱无力,都俯伏在一个人面前。皮尔派扶着梯子,帕麦斯顿踩着梯子爬了上去。

早在1852年,皮尔派就在竞选的战场上折损了一半兵力,1857年的选举更使他们全军覆没。菲利莫尔两兄弟、哈维勋爵、乔·克拉克爵士、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威·波利特勋爵、阿·戈登、萨顿、哈科特、拉欣顿、斯迈思、以在东印度公司的活动闻名的詹·韦·霍格爵士、朗德尔·帕尔默以及卡德威尔先生,都下台了。以上列举的绅士中的最后一位,曾接到已当上首相的帕麦斯顿请他出任财政大臣的建议,但是,根据格莱斯顿、格雷厄姆等人的劝告,他谢绝了。不过,在现已被埋葬的下院临终前的一次会议上,为了要超越格莱斯顿,他背离了自己的朋友,在预算的分组表决中投票支持了帕麦斯顿。最后,在辩论广州问题时,他惟恐事态发生变化,又转向相反的立场,回到皮尔派一边,并同意科布顿先生关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动议。这位绅士真是皮尔派集团的一个奇特的典型,他既道貌岸然,又无耻地追求名位。皮尔派全军覆没以后,只剩下三位将军——格莱斯顿先生、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和赫伯特先生,这三个人不能形

① 乔·阿伯丁。——编者注

成三位一体,因为他们在出身和志趣方面都大不相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是作为激进派开始从政的,格莱斯顿先生是作为极端的托利党人起家的,赫伯特先生则什么也算不上。

赫伯特先生在南威尔特郡选民大会上所做的揭露,清楚地描绘了帕麦斯顿用以对付皮尔派的方法。最使皮尔派威信扫地的就是他们在对俄战争时的行为,特别是他们对敖德萨的宽恕¹¹⁹;有人说,这是因为赫伯特先生是沃龙佐夫公爵的外甥。帕麦斯顿的忠实走卒《晨邮报》、《太阳报》和《晨报》这类报纸,散布这些恶毒诽谤尤为卖力。可是赫伯特先生对他的选民说,其实他曾签署攻击敖德萨的命令,但是在他离职以后,帕麦斯顿勋爵立即发布命令宽恕该城市。^①这一揭露丝毫不亚于约翰·罗素勋爵在伦敦城选民大会上所做的揭露。^②大家知道,罗素是由于那次出使维也纳而声名扫地的¹⁰¹。当选举吵吵闹闹的时候,啤酒气味很浓的《晨报》这份领有营业执照的酒馆老板们自己的报纸,即帕麦斯顿为下层民众办的报纸——他办的报纸种类繁多,迎合各种趣味,上起高级沙龙,下至小酒铺——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大叫罗素在维也纳严重变节。罗素被该报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世人,克拉伦登勋爵不准他公布帕麦斯顿亲笔签署的训令,而使他(罗素)为之丧失威信的维也纳政策正是由这个训令规定的。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他的同胞们,诗人们,给希腊诸神编造了一些比人们用来描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的更不光彩

① 悉·赫伯特(1857年4月1日在南威尔特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4月2日《泰晤士报》第22644号。——编者注

② 约·罗素(1857年3月27日在伦敦城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40号。——编者注

的故事。现代的法国和英国却把无须由诗人来抹黑的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之流捧为自己的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皮尔派在全军覆没后幸存的这少数几位将军,将不再是以团体的身份,而只是以个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议会中。作为个人,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已不受派系的妨碍,他满怀激情,无疑是新的下院中最重要的演说家,因此可以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出色的角色。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议会决斗时,也像有时在激烈的搏斗中那样,间或抛弃自己的武器而抓住对手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格莱斯顿已经掌握了迪斯累里的唇枪舌剑,迪斯累里也学会了格莱斯顿的虚情假意,——而这样交换,迪斯累里未必是赢家。

在和皮尔派分手时,我们还要指出历史的这场恶作剧:它把这个派别的诞生安排在旧的议会党派在反谷物法同盟³⁷影响下瓦解的时刻,现在又让这个派别随着曼彻斯特学派从议会中的消逝而同时死亡。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9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1857年4月7日于伦敦

最近发表的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期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①，是剖析联合王国社会的珍贵材料。这些报告颇能说明工厂主在这次大选中所采取的反动立场。

在1856年会议期间，议会以类似走私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工厂法令^②，“激进的”工厂主利用它首先修改了有关在传动齿轮和机床上装置防护设备的法律规定，其次在雇主和工人的纠纷中采取了仲裁原则。一条法律旨在使工厂工人的肢体和生命能有较好的保护；另一条法律是要把这种保护交由廉价的衡平法庭¹²⁰去裁决。但事实上这两条法律都是骗局，后者是要让工厂工人不受法律保护，前者是要使工人的肢体没有安全保障。兹摘引视察员联合报告中的一段话如下：

①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关于进一步修正工厂劳动条例的法令》。——编者注

“按照新的立法,由于日常工作接近传动齿轮因而熟知工作中容易发生的危险并知道必须谨慎从事的人,能受到法律保护;但是,那些为了执行特殊委托而被迫中断日常工作并使自己遭受无法觉察的危险或者由于无知而无法预防危险的人,也就是说,正是那些看来需要法律予以特殊保护的人,却不能受到法律保护。”

仲裁条款则规定:必须挑选那些对于造成身体残废的“机器的结构非常熟悉”的人担任仲裁人。一句话,仲裁大权完全由工程师和机器设计师独揽。

视察员写道:“显然,应该认为工程师和机器设计师没有资格担任工厂仲裁人,因为他们与工厂主有业务上的联系,工厂主是他们的主顾。”

在这样的条件下,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如死亡、手臂腿足被切断、四肢骨折、头部和脸部挫伤以及划伤、碰伤等等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的半年中,事故竟达到 1919 起这样惊人的数字。在半年的实业通报中,登载了 20 件机器造成的死亡事故,这个数字约为英国海军在其“光荣的”广州大屠杀中所损失的人数的 10 倍¹²¹。工厂主根本不想费力气去保护工人的生命与肢体,只是想方设法逃避赔偿工人因工伤失去的胳膊和腿足,不愿担负他们的活机器的损耗费,所以,我们对官方报告中所说的下面的话不必感到惊奇。报告说,

“违反工厂法令的延长工作时间现象日有增长。”

按照该工厂法令的定义,延长工作时间就是迫使未成年人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允许的限度。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在早晨 6 点钟以前开工,在傍晚 6 点钟还不收工,缩短工人法定的用餐时间。在一天之中,蒸汽机开动 3 次,即在早晨开工,以及在早饭和午

饭后复工；它也停止3次，即在每顿饭开始时和傍晚收工时。这样，就有可以偷5分钟的6次机会，一天总共可以偷半个小时。每天延长5分钟的工作，一周一周积累起来，一年就是两天半；但是以欺诈方式延长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下面摘录兰开夏郡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先生的一段话：

“用这种非法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所获得的利润，对工厂主们来说是不能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现，可是他们看到被发现的人所缴纳的罚款和讼费的数目并不大，于是就认为，即使被查出来，还是能得到很多好处。”

除工厂法令规定的罚金数额微不足道之外，工厂主还千方百计地使工厂法令的措辞尽量有利于避开其中的各项规定。视察员们一致声称，“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非法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他们一致谴责一些大业主故意进行欺骗，采取卑鄙手腕来避免被揭露，施展下流的阴谋来刁难负责保护工厂奴隶的视察员和助理视察员。在指控工厂主延长工作时间时，视察员、助理视察员或者他们的警察都必须准备好宣誓证明工人的确是在非法定的时间内被使用了。现在，假设视察员在傍晚6点钟以后来到工厂。机器立刻停止转动，虽然工人只能是为了照管机器才留在厂房，但是由于工厂法的措辞，指控还是不能得到确认。然后工人被匆忙送出厂外，往往是通过好几个门，以便把他们很快疏散。有时，助理视察员一跨进门，煤气灯就熄灭了，让他们突然在黑暗中置身于复杂的机器之间。在一些因非法延长工作时间而臭名昭著的地方，还周密地布置一些人向厂方报告视察员的行踪，为此雇用了火车站和旅店的仆役。

这群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难道不

正是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最好的搭档和“真正的英国大臣们”¹¹⁶的天然支柱吗？

工厂视察员的这些报告毋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的丑恶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使它们的执行人无能为力；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被这种制度吸收的13岁以下的童工数目在一些部门正在增加，而女工数目则在一切部门均有增长；虽然现在工人数目对马力数量的比例还和过去几个时期一样，但是工人数目对机器数量的比例却减少了；由于更经济地使用动力，一台蒸汽机能够比十年以前带动更多的机器；现在，由于增快机器的转速以及采取其他的方法，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工厂主在迅速地填满自己的腰包。

报告中所列举的这些重要的统计材料，很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所以，兰开夏郡的工业奴隶主急需有一个能够转移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对外政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4月
7日

载于1857年4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9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工厂制度

1857年4月10日于伦敦

在联合王国工厂视察员 1856 年的报告^①中,包含许多详细的工厂统计报表资料,例如工厂的数目、使用马力的总数、机器的数量和从事生产的人数。这样的报表在 1835 年、1838 年和 1850 年也曾按照下院的指示编制过,资料都是取自工厂主所填的表格。这样,我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工厂制度进行比较;而在法律意义上,工厂制度在这里只包括使用蒸汽或水力的纺织企业。

联合王国最近六年以来社会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制度的迅速扩大。

以下是最近三个报告的编制年份内的工厂的数字: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 819	1 932	2 210
毛纺织厂.....	1 322	1 497	1 505
精梳毛纺织厂.....	416	501	525

^①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编者注

亚麻纺织厂.....	392	393	417
丝织厂.....	268	277	460
共 计.....	4 217	4 600	5 117

可见,工厂数目的平均增长额,在1838年至1850年间是每年32个,在1850年至1856年间则扩大了将近两倍,达到每年86个。以下是对两个时期工厂数目总增长额的分析:

1838—1850年的总增长额

	百分比
棉纺织厂.....	6
毛纺织厂.....	13
精梳毛纺织厂.....	20

1850—1856年的总增长额

	百分比
棉纺织厂.....	14.2
毛纺织厂.....	0.5
精梳毛纺织厂.....	4.7
亚麻纺织厂.....	6.1
丝织厂.....	66.0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增长只限于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业,而在后一个时期,也包括了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在这两个时期,各部门在总增长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在1838—1850年间,主要是精梳毛纺织业和毛纺织业有所增长,在1850—1856年间,毛纺织业几乎没有变化,精梳毛纺织业的增长速度则减少了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在后一个时期,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发展最快,丝织业在增长总额的百分比方面占第一位,棉纺织业在绝对增长数方面占第一位。

这种工业增长的地区变化很大,好像是在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在工业普遍增长的同时,个别地区也有衰落现象,在许多郡和城镇,一些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规律,就是那条遍及现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

即集中的规律。例如,兰开夏郡以及毗邻它的约克郡的部分地区这个棉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就把全国其他地区的棉纺织业吸引过来。在1838年至1856年期间,棉纺织厂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增加了411个,在拉纳克(格拉斯哥)、伦弗鲁(佩斯利)和安特里姆这几个郡却减少了52个。同样,毛纺织业正在向约克郡集中;这里增加了200个毛纺织厂,而在康沃尔、德文、格洛斯特、蒙茅斯、萨默塞特、威尔特、威尔士和克拉克曼南,却相应地减少了82个厂。精梳毛纺织业几乎完全集中在约克郡,那里增添了107个新工厂。亚麻纺织业目前在爱尔兰的发展大大超过联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但是在安特里姆、阿马、唐郡、蒂龙增加59个亚麻纺织厂的同时,在约克郡却减少了31个厂,在德文郡、多塞特郡、格洛斯特郡减少了9个厂,在法夫郡减少了18个厂。在柴郡、德比郡、诺丁汉郡和格洛斯特郡增加了76个丝织厂,在萨默塞特郡相应地减少了13个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工业部门的衰落以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补偿,所以工业的迁移可能看起来只是大规模分工原则的更明确的表现。但是,总的说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工厂制度的发展更倾向于在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建立分工。例如,英国南方的威尔特、多塞特、萨默塞特、格洛斯特等郡在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工业,而北方的兰开夏郡、约克郡、沃里克郡、诺丁汉郡却在加强自己的工业垄断。联合王国在1838年至1856年这段时期工厂增长的总数为900个,其中兰开夏郡就占360个,约克郡占344个,沃里克郡占71个,诺丁汉郡占46个,后两个郡的增长是由于在两种专门的生产中采用了改良的机器,在诺丁汉的织袜机和考文垂的织带机上应用了机械动力。

必须把工厂数目的增长同所使用的发动机马力数量的增长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新工厂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在旧工厂中

装备更强大的机械,以蒸汽机代替水力,给水轮加上蒸汽动力,以及其他类似的改进办法。以下是 1838 年、1850 年和 1856 年各工厂额定功率的对照表:

联合王国工厂中使用的发动机马力

	1838 年		
	蒸汽机	水力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46 826	12 977	59 803
毛纺织厂.....	11 525	9 092	20 617
精梳毛纺织厂.....	5 863	1 313	7 176
亚麻纺织厂.....	7 412	3 677	11 089
丝织厂.....	2 457	927	3 384
共 计.....	75 083	21 986	102 069

	1850 年		
	蒸汽机	水力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71 005	11 550	82 555
毛纺织厂.....	13 455	8 689	22 144
精梳毛纺织厂.....	9 890	1 625	11 515
亚麻纺织厂.....	10 905	3 387	14 292
丝织厂.....	2 858	853	3 711
共 计.....	108 113	26 104	134 217

	1856 年		
	蒸汽机	水力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88 001	9 131	97 132
毛纺织厂.....	17 490	8 411	25 901
精梳毛纺织厂.....	13 473	1 431	14 904

亚麻纺织厂………	14 387	3 935	18 322
丝织厂………	4 360	816	5 176
共 计………	137 711	23 724	161 435

虽然这些数字中所反映的动力的增长——1838年至1856年增加59 366马力——无疑是很大的,但是仍然远低于工业上可以采用和实际上正在采用的补充动力的实际数量。报告中的一切数字都只是指蒸汽机和水轮机的额定功率,而不是指实际上已经使用或者可能使用的功率。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改进装配、改善汽锅的能量和结构等等,能够以比过去大得多的动力来驱动;所以,它的额定功率只能看做是可以据以计算它的真正潜能的指数而已。土木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说明了最近对蒸汽机的改进,由于这种改进,同样一部蒸汽机能够以更少的燃料消耗来做更多的功,然后他总结说:

“现在我们从同一重量的蒸汽机平均至少可以多得50%的功,在许多场合,过去每分钟限制转速为220英尺、产生50马力的同一部蒸汽机,现在能产生100马力以上。”^①

把发动机马力的增长和工厂数目的增长比较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毛纺织业已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虽然1856年毛纺织厂的数目比1850年只增加了8个,但是其中所使用的发动机的功率在同一时期却增长了3 757马力。显然,在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方面也有同样的集中趋势。联合王国的纱锭总数,在1850年

^① 《1852年11月内史密斯工程师给伦·霍纳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编者注

和 1856 年分别为 25 638 716 支和 33 503 580 支。每个工厂的纱锭平均数如下：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4 000	17 000
精梳毛纺织厂	2 200	3 400
亚麻纺织厂	2 700	3 700

诚然，织布厂方面的倾向，似乎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是广泛分布于许多工厂主之间。织机的总数在 1856 年为 369 205 台，而 1850 年是 301 445 台，但是每个工厂主使用的平均台数，在 1856 年却少于 1850 年。然而这种似乎偏离英国工厂制度总的发展趋势的情况是很容易用下述事实来解释的，即在织布部门不久以前才有了工厂制度，还没有完全淘汰手工织布的方式。在 1836 年，几乎只有在棉布织机或者在生产混纺棉织品方面才采用蒸汽动力；但是几年以后，生产各种织品——毛织品、精梳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的动力织机的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至今仍在继续。下表说明 1836 年以来动力织机的增长情况：

	1836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08 751	249 627	298 847
毛纺织厂	2 150	9 439	14 453
精梳毛纺织厂 ...	2 969	32 617	38 956
丝织厂	1 714	6 092	9 260
亚麻纺织厂	209	3 670	7 689
共 计	115 793	301 445	369 205

棉布织机数量的增长是由于扩大了生产，而不是由于采用了机械动力来生产以前只用手工织的布匹；但是在其他那些此前很少采

用机械动力的工厂里,现在采用机械动力来织造地毯、条带和亚麻布。利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这种方法随着梳毛机、特别是李斯特氏机的推行已被广泛采用,这也造成了大批的工人失业。

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程度,可以从出口数字的对比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在 1850 年有 1 932 个棉纺织厂,在至 1850 年 1 月 5 日为止的三年内,出口的棉布和棉纱的平均价值约为 2 460 万英镑。如果 1856 年的 2 210 个棉纺织厂都只按照 1850 年各厂的生产数量来生产棉布和棉纱,那么出口的价值就应当是 2 800 万英镑。可是,在至 185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三年内,这项出口的平均价值达到约 3 100 万英镑。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每一马力所运转的织机数量大有增加,每一马力所占用的工人数目却固定未变,即平均 4 个人。这可由下表看出:

从业工人总数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259 104	330 924	379 213
毛纺织厂	54 808	74 443	79 091
精梳毛纺织厂 ...	31 628	79 737	87 794
亚麻纺织厂	43 557	68 434	80 262
丝织厂	34 303	42 544	56 137
共 计	423 400	596 082	682 497

工人总数 682 497 人,看来的确不多,因为单是使用手工织布机的织工及其家属在 1838 年已达到约 80 万人了。下表说明各类工人的百分比:

	13岁以下的童工	13—18岁的男性未成年者	13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者	18岁以上的男工
1838年	5.9	16.1	55.2	22.8
1850年	6.1	11.5	55.9	26.5
1856年	6.6	10.6	57.0	25.8

在1838年至1850年期间,童工数目有所增长,但是并不是与工人的总增长数按比例地增长。1850年至1856年期间,童工数目增长很大,共有10761名,其中9655名在棉纺织业部门。必须再提一下,1844年通过的仁慈的法律允许工厂雇用8岁的儿童,而以前法律是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的¹²²。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4月

10日

载于1857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9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俄国军队的变革¹²³

当上次欧洲战争³⁸爆发的时候，很多军人谈起俄国军队的完善组织，不无某种敬畏之情。在法国和英国，旅、师、军是由一些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组成的，新任命的指挥官指挥的是他们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部队，参谋部则由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军官组成。而在俄国，整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各个部件，在几年以前就已达完善的地步。每一个团在整个组织中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从连到军，每一个军事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指挥官，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师都有自己固定的参谋部。有人说，这架机器实际上已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它只等一声令下，一开气门，就能极其灵活地运转起来；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轮子、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滑车、每一条引带、每一个活门和每一个杠杆，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据说我们应当看到的情况，但可惜我们所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军几乎从来没有满额，因为常有整个的师，更经常的是整个的旅被调往远方战区，因此各军就要由其他部队来补充。力图使每一个军、每一个师、每一个旅的各组成部分尽可能地一起行动的做法，原来同那些确定作战方法的严格规则一样，使军队在行军中的运动受到束缚；最后，分支繁多的指挥机构，所有这些指挥军、师、旅及其相应的参谋部的将军，这些

为自己的部队所熟悉、彼此十分了解、悠然安于自己的职位并在执行任务时能应付自如的将军，——所有这一切原来完全是一个大骗局，是为了诈取政府的钱财，克扣士兵的口粮、被服和日用品。

如果这些事实还需要官方的证实，那么俄国政府刚好做到了这一点。军队的新编制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消除普遍侵吞公款的温床——下级参谋部和司令部。军和旅的参谋部都被撤销。甚至“旅”这个名词也从俄国军队中消失了。现在，6个基干军都由一个人指挥，这个人就是前克里木战争的司令官，公爵米·德·哥尔查科夫第一。诚然，每一个军都有一个军长，但是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参谋部，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可能具体地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能，他至多也只不过是本军的检查者，是他下属的5个师的师长的监督者。实际上，组成所谓“王牌军”的30个师（18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6个炮兵师）的师长，直接服从总司令；而在每一个师中，4个步兵团或骑兵团的团长和炮兵连长又直接服从师长。被这一新编制完全取消了职位的旅长则被派到师长的参谋部，担任副职和助手。所有这些做法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

俄皇可以信赖哥尔查科夫公爵，而哥尔查科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信赖自己的参谋部的军官。在旧编制所具有的那种烦琐的官僚制度和等级次第的情况下，总司令的直接影响不超出军长以外。这些军长及其参谋部要把命令下达到师，师的参谋部把命令下达到旅，旅的参谋部把命令下达到团长，由团长负责把命令付诸实施。这无非是一种组织得很妙的从事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和盗窃的制度；它本身组织得越好，攫取公款的活动也就越有组织，越能得逞。这一点当第一、第二、第三军在战争时期由波兰开往南方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俄国政府只在名义上保留军长的职位并且完全取消旅长的职

位,正是想根除这种弊端。现在,在总司令和连长之间,只相隔两级,即师长和团长;只有一个参谋部,即师参谋部,有可能被用来侵吞公款。如果政府能够杜绝师参谋部侵吞公款的恶习,那就有望迟早把它从团中根除。

这样,军队的整个编制,由于从链条中取消了两个环节而被打乱了,而这两个环节在战争时期无疑是必要的。的确,俄国政府承认,无论是军长或旅长,都不能完全从军队等级中勾销掉。在军队等级中仍保有军长,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旅长则被完全免除指挥职务并被变成只不过是师长的附庸。这只是表明,这些将军在和平时期没有指挥的职务,但是他们是准备好一旦发生战争就派用场的。事实上,在惟一尚有敌军当前的军队,即高加索军队中,还保持着旅。因此,取消其军队中的旅,只不过是使旅长及其参谋部在和平时期不能为害,这难道还需要其他的证明吗?

另一个重大变革,就是解散庞大的龙骑兵军,这个军由10个团组成,每个团有8个连,它既受骑兵训练,又受步兵训练。本来,这个军应该在一切大的战斗中起出色的作用。在决定性关头,它应该以骑兵特有的速度猛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某个重要据点,然后下马,分成16个步兵营,在自己的重骑炮兵的支援下,坚守这一据点。可是,在上次战争期间,这个军丝毫没有发挥作用,现在看来大家都承认,这种混合部队是完全不适合于积极的战斗行动的。结果,这些步骑两用兵被变成普通的骑兵,分为12个各有8个连的团,分别编入“王牌军”的6个军中。这样,俄皇尼古拉想借以保持自己在当代最伟大的军事组织家中的地位的两大创造,在他死后几年就烟消云散了。

在其他的变革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个军中加建一个来复枪营以及在高加索军队中建立两个新的步兵团。第一个革新在某种程

度上缓和了严重缺乏轻骑兵的情况。第二个革新表明,俄国已决定尽快地结束高加索的战斗。由于同样的原因,高加索各个军的预备旅还没有解散。因此,很可能目前在那里已经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
16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5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0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金融舞弊

1857年5月1日于伦敦

破产法庭对英国皇家银行内幕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自从铁路大王赫德森破产以来，似乎还没有这样充分揭露过体面社会的镀金表层所掩盖的冒险投机、假仁假义、营私舞弊和卑鄙无耻。最近受到舆论谴责的绅士当中，有一位蒂克斯伯里的前议员汉弗莱·布朗先生，按多德的1855年《议员手册》的介绍，他是一个“商人”，一个“铁路公司的积极创办人”，一个“著名的铁路统计学家和铁路运输方面的专家”，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支持者”，并且还是一个“自由派”。在英国皇家银行这个泡沫破裂以后，大家立刻得悉，这个权威人士利用他的银行董事的地位，骗取了大约7万英镑。但是揭露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他照常执行公务。汉弗莱·布朗既泰然自若地继续在下院露面，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安坐在“无俸法官”¹²⁴的席位上。他甚至向公众表白，他很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作为郡的治安法官，曾依法严惩一个偶然偷了少量马铃薯的穷车夫，并且谆谆地开导犯人，告诉他最糟糕的就是辜负信任。蒂克斯伯里的一家报纸认为自己有权利利用这个机会指责英国制度的特点：让大窃贼充当小窃

贼的审判官。于是布朗先生扬言,不仅要控告那位不幸的新闻记者,而且还要永远离开蒂克斯伯里这个美好的城镇,除非它的居民以某种郑重的忏悔行动来为侮辱无辜者的恶行赎罪。于是,举行了向“无耻阴谋的受害者”呈献颂词的隆重仪式,按当时报纸的报道来看,这篇颂词缺乏艺术修饰,读起来味同嚼蜡。布朗先生把颂词放入口袋,从他家的阳台上向人群慷慨陈词,他说,要不是由于公职誓词使他不能泄露英国银行的秘密,他的无辜就会像朗朗白日一样清楚明晰。他在结束高谈阔论时,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所犯过错无多而所受伤害过重的人。在最近举行的普选中,他又重新当上他那个安静舒适的小城镇的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一向效忠的内阁,竟忘恩负义地抛弃了他。

4月29日,这位自命不凡的绅士终于摆脱了一直封住他的口、使他默默忍受无耻诽谤之辱的那份誓词的约束;破产法庭的法官充当了接受他忏悔的牧师。按照股份公司的惯例,董事必须拥有该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布朗先生打破常规,先当了董事,然后才当股东;不过,他拿了股票却无须为此付款。他弄到这些股票的方法极为简单:后来潜逃的英国银行经理卡梅伦先生交给他20张共值1000英镑的股票,而他(布朗)交给卡梅伦先生一张价值1000英镑的期票,同时想方设法不为这张期票支付分文。布朗在1853年2月当了董事,3月就在银行开了账户。他往银行存入很少一笔钱——18英镑14先令,当天就用一张期票作抵押向银行借了2000英镑,由此人们立刻可以看出,他在管理股份公司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的确,布朗先生在与英国皇家银行建立业务联系以前和以后曾经荣任过领导人的企业有:澳大利亚食糖进口和提炼特许公司、防水砖瓦和普通砖瓦专利公司、万都自来水公司、地产公司、船

坞公司——总之，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公司。债权人的法律顾问林克莱特先生问他，所有这些公司后来的结局怎么样，布朗确切地回答道：“应该认为，它们已经停业了。”他在英国银行开的账户以 18 英镑 14 先令的贷方开始，以 77 000 英镑的借方告终。所有这些款项都是经过卡梅伦先生之手预付给他的，“从未征得其他董事”的同意。

布朗先生说：“该公司的经理是经手一切业务的人。这家银行的做法就是如此，而且”——他以博学之士的口吻补充道，——“手续是十分健全的。”

真情实况大致是：整个企业的上层领导人——总裁、董事、经理、法律顾问和会计师——都按照事先规定的计划，彼此之间互助互惠，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弄到了多少钱。布朗先生还打算说：他作为银行董事，也不太知悉他作为银行主顾的所作所为。至于那些并非管理人员的主顾，布朗先生在被调查时似乎还对其中有些人竟敢侵犯董事的豁免权感到痛心。例如，他这样说到某一位奥利弗先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奥利弗从银行骗取了 2 万英镑。我这话说得很重，但是我并不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是一个骗子。”

林克莱特先生问：“那么您呢？”他若无其事地回答：“很倒霉，是一个蒙在鼓里的董事。”他对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同样不动声色。例如，他的存款与他的贴现期票之间的那种荒唐的悬殊，引起了他和林克莱特先生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林克莱特先生：“难道贵行业务中没有这样一个通常的规定：任何人要开贴现账户，必须同时也开一个活期存款账户，而且在这个活期存款账户上必须始终保有相当于贴现账户上期票总数四分之一的存款？”

布朗先生：“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告诉我说，这是苏格兰的制度。”

林克莱特先生：“你没有采用这个制度吗？”

布朗先生：“没有，因为这个制度并不健全。”

每当布朗先生发善心给银行提供有价证券时，他提供的都是一些期票或提货单，而这些票据他已在同一个时候审慎地抵押给别人了，他总是用一种被特派员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十足的“骗术”的手腕，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些证券。1856年3月1日，布朗先生事实上已经终止了他在银行的账户，换句话说，董事会已经决定不让他再扩大他的债务了。然而他在6月7日居然又从银行方面得到了1020英镑。林克莱特先生问道：“做这件事是施用了什么魔术呢？”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这并不困难。”

以下是他写给他的挚友卡梅伦先生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次因揭露英国皇家银行内幕而在报刊上引起的怒潮所持的总的态度：

“1855年10月5日于威斯敏斯特小斯密斯街

卡梅伦先生阁下：不知尊驾现在何处，兹托令亲转致此函。令人伤心的消息传播甚快，阁下谅已得悉大小各家报纸如何辱骂我们，你我二人首当其冲。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上的刻薄文章都是我们的某位同事通过会计师煽动起来的。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公开报道的内容，我读了这些东西之后，几乎以为，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的债，以前的一切报道全是错的；《泰晤士报》是为了侮辱我们而积存了全部愤怒……自从银行莫名其妙地停止支付以后，我尚未见到其他董事。

您的忠实的

汉弗莱·布朗”

好像“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的债”！显然，布朗先生认为，人们对他和他的同伙充满义愤，只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伪善。“全都是

盗贼!”泰门这样说^①, 布朗先生也这样说, 也许他在灵魂深处还确信所谓体面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说。重要的只是不要做小的窃贼。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15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 5 幕第 3 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动产信用公司¹²⁵

(一)

现今的法兰西帝国正在用动产信用公司¹²⁶的报告书弥补大军¹²⁷的战报。4月28日,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在最近一次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了一次报告,总结了那个出色的波拿巴机构在1856年的全部活动。文件起草人以其特有的手法,使这份辞藻华丽的文件中既有财务报告,又有理论原理,既有数字,又有情感,既有证券投机,又有思辨哲学;可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明显的腐败现象,美言粉饰,只能是欲盖弥彰。

的确,动产信用公司的利润仍然十分诱人。它的股票价格最初定为500法郎,1856年每股付利息25法郎,股息90法郎,合计115法郎,恰好为该公司本金的23%。但是,要作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应当把动产信用公司与一般商业企业相比,而应当与它本身相比,这样,我们将会看到,仅在一年内,其利润就减少了将近一半。在这家公司每年的纯收入中,应当区别以下两种因素:一种是固定的,另一种是可变的,一种是章程规定的,另一种要取决于该公司的商务运作,一种列入利息项,另一种列入股息项。所以,每股25法郎即5%的利息收入,是该公司账目中一个固定不变的项目,而公布的股息才

是该公司有无进展的真正标准。所以，我们看到，1855年为178法郎70生丁的股息，1856年减少到90法郎，这种变动绝不能说是上升。如果考虑到小股东们是平均按每股1500法郎的价格购进股票，那他们在1856年所得的实际股息恐怕还超不过7%。

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认为，“试图指出1855年和1856年两年的股息不一样的原因，是多此一举”。但他还是大发善心地提示我们，1855年的利润有其“特殊的性质”。完全正确。但是，正是由于自己的利润保有特殊性质，动产信用公司才能够随心所欲地具有任何性质。这个公司利润的特殊性质是由于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规模相差悬殊而产生的。这种悬殊绝不是暂时性的，它实际上是该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规律。动产信用公司既不要求成为一个银行公司，也不要求成为一个工业公司，而是要求成为——最好能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其他一些银行公司和工业公司的代表。该公司的宗旨就是要成为这种代表机构。所以，它的业务并不受它本身的资本和通常由资本引起的信贷的限制，而完全取决于它实际代表的或者企图代表的权益的多寡。如果它的资本和它的业务之间的悬殊状况消失了，因而它的“特殊”利润也消失了，那么它就不但会降格为一家普通的银行，而且会可怜地破产。动产信用公司由于本身的性质而必然从事大量的业务，所以它必须不断执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新计划。既然是这样一个机构，任何停滞，尤其是倒退，都是遭到不可避免的垮台的征兆。就以1856年的报告书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资本只有微不足道的6000万法郎，而另一方面，业务却达60多亿法郎这样巨大的数额。以下是贝列拉先生列举的这些业务情况：

“本公司对最近一次债券的认购数不仅得以保持，而且由于有了便利认购者的分期付款办法，增加到4000万法郎。

本公司的现金交易额达……………3 085 195 176 法郎 39 生丁
 本公司同银行之间的流转额为……………1 216 686 271 法郎 33 生丁
 本公司的其他流转额达……………2 739 111 029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收到 1 455 264 张股票和本票
 的分期付款额共计…………… 160 976 590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用自有款项支付的或用由本公
 司对其起银行家作用的那些公司的
 款项支付的 3 754 921 张息票金额达…… 64 259 723 法郎 68 生丁
 本公司的有价证券总存量为 4 986 304 张股票或债券。”

贝列拉先生并不否认，动产信用公司在 1856 年所起的作用和它从前所起的作用有些不同。该公司在创办以后的头三年中，应当“在法国创立一些重要企业”，“为大企业的创立提供一套制度”，并从而证明它可以不断地以大量新的有价证券供应证券市场。但是，在 1856 年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和平开创了一个社会活动的新时代”，投机活动有大肆泛滥之势。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动产信用公司的勤勤恳恳的绅士们，那些一心一意要促进国家繁荣的贝列拉们、富尔德们、莫尔尼们，感到他们的“一项紧急的任务”是在他们过去扬鞭策马的地方勒紧辔头，在他们奋力冲刺的地方放慢脚步，在过去因没有“深思熟虑”而“鲁莽行事”的地方保持“审慎”态度。当整个法国都动起来的时候，动产信用公司为了良心宽慰，反而决定要静止不动。不过，作出这个高尚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于 1856 年 3 月 9 日《通报》上有一篇评论“指出了政府想限制新有价证券的发行而规定了一些范围”。贝列拉先生说，甚至“即使”动产信用公司另有打算，那么，“这篇评论也会成为一项命令，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这是一次被迫的暂停活动，必将中断新企业的建立”。看来，这次被迫的暂停就是该公司自愿放慢脚步的充分根据。

正当动产信用公司在飞奔急驰之际被政府勒住马缰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不讲道义的竞争忙不迭地力图限制其活动范围，削减其财源。1856年3月9日《通报》的评论矛头直接指向所谓的匿名公司，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这种公司的建立和运营必须由政府批准和监督，动产信用公司开办这种公司要受到自己的章程的限制，而与此同时，法国的投机活动却找到一条更广阔的出路：开办股份公司，这种公司不必由政府批准并且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因此，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途径；匿名公司发展所受到的阻碍完全因股份公司的丰收而得到补偿。拿破仑第三虽有贝列拉先生所谓的“崇高的智慧”，并不阻止投机活动，只不过是使很大一部分投机活动脱离他心爱的机构的控制而已。1856年头九个月中，整个法国都沉醉于投机活动，动产信用公司本可以从中渔利，但这个忠诚敬业的公司仅仅由于“崇高的智慧”考虑不周而只好“在有限范围内”活动，服服帖帖地“等待准予恢复活动的官方信号”。它一直在等待官方的信号，等待“时来运转”，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连拿破仑的“崇高的智慧”也完全无法控制的事。

这件事我们且留待下次再作分析。

(二)

1856年9月，当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动产信用公司，用贝列拉先生的话来说，正在充当“金融和信贷方面的精明的哨兵”，这个哨兵比其他“站在各级阶梯上”的人“视野更广”，“能防止惊慌和过度激动”，专心致志地关注“维护国民的劳动和信贷”这一崇高目的，对“偏私或忌妒的批评”淡然处之，对“粗暴无礼或

精心策划的攻击”一笑置之，对庸俗的“歪曲诽谤”傲然不理。在这个紧急关头，法兰西银行看来很难答应动产信用公司为争取社会繁荣而自认为有责任向它提出的那些要求。所以，我们被告知：“危机发展得如此猛烈迅速，应归咎于法兰西银行严格遵循支配其行动的章程而采取的那些措施”，“这个机构还很不完善，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和谐的结合”。法兰西银行拒不帮助动产信用公司，也不要它的帮助。动产信用公司凭着它特有的大胆构想，认为金融危机正是放手施展金融骗术的最佳时机。在一片混乱中，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用正规行动好几年攻不下来的堡垒。因此动产信用公司主张联合几家外国公司，购买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公债或国债，使法兰西银行能“有效地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继续发放以公债和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当动产信用公司提出这个无私而又仁慈的建议的时候，它的金库里已经堆满了约 5 475 000 法郎的公债和 11 500 万法郎的铁路股票，而法兰西银行此时所握有的公债约为 5 000 万法郎。换句话说，动产信用公司所握有的铁路股票数额比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公债数额多一倍以上。如果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公债投进市场，以加强自己的黄金储备，那就不仅会使公债跌价，而且会使所有其他的有价证券，尤其是铁路股票更加厉害地跌价。因此，这项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法兰西银行不把自己握有的公债投进市场，为动产信用公司握有的铁路股票腾出余地。而且，正像贝列拉先生所说的，法兰西银行就会有借口，不再发放以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了。这样一来，法兰西银行就暗中拯救了动产信用公司，而表面上人们却以为是法兰西银行依靠着这个慷慨大度的机构，好像它是由于动产信用公司的帮助才得救的。但是，法兰西银行感到事有可疑，便对这个“精明的哨兵”敬而远之。

动产信用公司像它的保护人^①曾经拯救法国免遭社会主义之祸那样，也十分坚决地要拯救法国免遭金融危机之灾，它提出一个新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向法兰西银行而是向巴黎的一些私人银行家提出的。它大公无私地建议

“满足法国各铁路公司的需要，认购它们要在 1857 年发行的 3 亿法郎的债券。动产信用公司宣布自己准备认购 2 亿法郎，如果其他银行认购其余 1 亿法郎的话”。

这样的认购必然会迅速提高铁路股票和债券即主要为动产信用公司所持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如此，动产信用公司通过这大胆的一着，就会使自己成为法国所有铁路的大股东，并使巴黎的所有大银行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不由自主地成为它的合伙人。但是这个计划也落空了。动产信用公司不得不“声明放弃采取共同措施的念头”，只好自己出面应付了。动产信用公司相当自豪地坚信，“单是它提出的此类建议的事实本身，无疑已大大有助于安定人心”，因此，它也就大大地得到安慰，尽管危机发展的趋势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它觉得有望获得的利润”。

除了所有这些倒霉事件，动产信用公司还抱怨直到现在还有人不让它打自己的王牌，即发行 6 亿法郎的债券，也就是说，发行它自己发明的纸币，这种纸币的偿付期限很长，而且不是以该公司的资本为担保，而是以可以用它来交换的有价证券为担保。

贝列拉先生说：“本应该通过发行我们的债券得到的资金，也许能使我们购买一些至今尚未用于投资的有价证券，有利于扩大我们对工业的扶持。”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1855年，动产信用公司正准备发行这种债券24 000万法郎，这是它的章程所许可的，但是被土伊勒里宫¹²⁸的“崇高的智慧”制止了。动产信用公司把这种纸币的发行称之为增加自己的资本；普通人却更愿称之为增加它自己的债务。所以，1856年3月动产信用公司由于政府干预而被迫暂停活动，股份公司的竞争，金融危机，以及它自己的纸币未能发行，——所有这些情况已足以说明它的股息为什么会降低了。

这家规模巨大的骗人的企业在以往所有的报告书中，总是把用工业股份公司代替了私人工业大吹大擂，说这是该企业的特点和革新。但是在最近的这份报告书中，即使费尽气力也难找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在该公司的6 000万法郎的资本中，1856年有4 000万法郎投入国债。而它经由信贷而握有的款项，一大部分已被用于在证券交易所结算日为公债和铁路股票进行“展期”。在1856年的这些业务中，法国的公债为42 150万法郎，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为28 100万法郎。目前，这种展期不过是给证券交易商预付货币，使他们能继续维持业务，使交易所的空头证券显得坚实可靠。动产信用公司企图依靠经营这种业务，即依靠把一大部分国民资本从生产活动中抽出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冒险投机，以博得国民的感激。路易-拿破仑的确得到了贝列拉先生们的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确实使皇家证券具有虚拟价值，而且不断地鼓励、灌输、支持和传播这种冒险投机精神，如今它已成了帝国的根本原则。对贝列拉先生得意地描述的那些业务活动，只要草草地浏览一下便会明白，动产信用公司的投机活动必然同它的骗人的买卖相联系。一方面，作为交易所的保护人，这个公司在执行这种社会职能时，常常是先向公众借钱，再贷给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公司和个人，以维持国家股票和公

债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它又经常利用这些证券的行情波动,利用它们的上涨和下跌来牟利。为了从表面上协调这种互相矛盾的目的,就不能不进行欺诈和蒙骗。

像所有的职业赌徒那样,路易-拿破仑大胆地构想自己的谋略,缓慢而谨慎地予以执行。例如,他曾经两次制止动产信用公司肆无忌惮的活动,——先是在1855年禁止它发行自己的债券,后来1856年又在《通报》上发出警告,使它被迫暂停活动。但是,尽管他进行阻挠,该公司仍然积极活动。事实上,如果让它任意飞翔,它会折断翅膀。如果波拿巴继续打搅它,对它加以节制,它就会失去灵魂,不成其为动产信用公司了。但是,从贝列拉先生的报告书中显然可见,“崇高的智慧”和“深思熟虑”终于达成了妥协。如果信誉扫地的动产信用公司得不到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个危险的权利,那么,维持它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资金,就要在法兰西银行这块更响亮的招牌下转到它的名下。这就是现在提交立法团“有学问的狗和猴子们”审查的新银行法的秘密目的之一。贝列拉先生说:“我们敢说,大可不必费力地到别处去寻找资金,法兰西银行就有可以进行有效的帮助的资金,它可以贷款给公共信用机构,给大企业,给工商业”,换句话说,给动产信用公司。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5月
12日和1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5月30
日和6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5027号和502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¹²⁹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²¹，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¹⁵了。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迄今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就不会再有第一次英中战争^①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¹³⁰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先后尝试组织过波斯的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因为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忌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

① 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组织性和战斗力。它的全部战绩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几次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某种核心或预备队。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军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阵势来吓唬敌人而已。最后，同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 60 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火炮，并按照最佳原则排列了方阵，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警卫部队还是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些印度正规骑兵自己作战的本领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写的一本关于骑兵的书^①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他们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找不出一个能说明他们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 600 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 1 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德，他们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哑，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 300 名步兵和 50 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军需品和枪炮都留给了入侵者——你不能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

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应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人学欧洲式战术。1806—1812 年的俄土战争¹³¹和

① 刘·爱·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编者注

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军最有力的都是非正规部队，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兵员既有从设防城市征召来的，也有从山区省份征召来的。正规军只要一上战场，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刚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璘特人^①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纳的一个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的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场战争³⁸中，从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尔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规军每次交战都击败了俄军¹³²。

事实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编组、装备和操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组织引用于野蛮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一套欧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因素的最顽强的抗拒。只要士兵可以在检阅时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苏丹或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大量的背教者^②和欧洲军官，它在最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② 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编者注

近那次战争中就根本打不了仗。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惟一兵种是炮兵。东方人在这方面太无知无能了，他们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样，炮兵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所有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惟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大量英国预备队和强大海军作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德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在那里，抗击他们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的部队，而是大群亚洲人摆成的不规则的战阵。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惟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这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

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消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⁷³,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①,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

①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3章第40页。——编者注

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似乎还只限于南方未参加大起义^①的几个省份。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人民,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城可以被整个毁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据点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国人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并守住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再干些什么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那将是下策;而南京以北惟一可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这样就得在海岸上建立有防御工事和守备部队的作战基地,进军途中要克服一个一个的障碍,要留下分遣队以保证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军压境之势抵达这座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军队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铺平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形势极为复杂,使人根本无法预料它将如何发展。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将使英军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有在某个不重要的地方或许出现例外,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方。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①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人阴谋之害¹³³),正如天朝皇帝^②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防御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5 月
20 日前后

载于 1857 年 6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3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洪秀全。——编者注

② 咸丰帝。——编者注

卡·马克思

有趣的揭露¹³⁴

1857年5月26日于伦敦

5月18日,奥当奈尔在西班牙参议院发表演说,揭露了现代西班牙的一些轶闻秘史。他背叛了埃斯帕特罗,实行政变,为纳尔瓦埃斯的上台铺平了道路,现在波拉科斯派¹³⁵则正试图摆脱后者。为了这个目的,卡龙赫将军这位参加过1843年克里斯蒂娜派暴动¹³⁶、1854年革命爆发时潘普洛纳的军区司令,被怂恿在5月18日当参议院辩论向女王^①呈递奏章一事时,针对有关建议大赦的一节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他猛烈攻击军队起义,特别是1854年的军队起义¹³⁷,坚决主张“安抚政策不应当因保证绝对不受惩罚而导致对无可救药的暴徒的鼓励”。这次由萨尔托里乌斯的朋友们预先策划的打击,既针对巴伦西亚公爵(纳尔瓦埃斯),也针对奥当奈尔。其实,波拉科斯派曾经认为,奥当奈尔一有机会就会揭发纳尔瓦埃斯是他在警卫部队兵营起义时的秘密同谋者。所以,卡龙赫将军给奥当奈尔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纳尔瓦

① 伊萨伯拉二世。——编者注

埃斯采取了一个铤而走险的步骤。他，一个一向主张维护秩序的人，却为 1854 年的革命辩护，他说，这次革命“是受到了最崇高的爱国精神的鼓舞，是由以前几届内阁的过火行为挑起的”。这样，当内务大臣诺塞达尔先生建议议会通过德拉古式的严酷的出版法时，政府首脑纳尔瓦埃斯却在参议院中充当“魔鬼的辩护人”，即革命和军队起义的维护者。但这是徒劳的。在 5 月 18 日参议院的会议上，纳尔瓦埃斯被波拉科斯派逼着收回自己对“以前几届内阁”的指摘，同时还不得不痛苦地倾听奥当奈尔那些使他难堪的揭露，他也承认这些揭露是真实的，只是抱怨“奥当奈尔揭露了私人的机密谈话”，怀疑“今后是否还能信赖友谊”！在宫廷的心目中，纳尔瓦埃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被认定有罪的叛逆者，不久以后就不得不让路给布拉沃·穆里略和萨尔托里乌斯——一场新的革命的两位真正的先驱。

以下是奥当奈尔的演说的逐字逐句的译文：

“奥当奈尔：自从参议院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我不能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讨论中保持缄默。我在这些事件中所起过的作用，使我必须发言。我曾经是警卫部队兵营起义的首领，曼萨纳雷斯纲领¹³⁸的起草人；又担任过维多利亚公爵内阁的陆军大臣；两年后王国曾经庄严地号召我去拯救这个王国和岌岌可危的社会；我幸运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而没有被迫进行流血战斗或者下令放逐任何人——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参加正在进行的讨论。而且，如果在卡龙赫将军对我以及对两年来与我一直有联系、在危急时刻出力拯救了社会和王国的优秀的将军们进行指责之后再保持缄默，那就是犯罪了。卡龙赫将军把警卫部队兵营起义说成是叛乱。这是为什么？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起义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如果任其发展，国家将被卷入一场无法控制的革命？我很感谢议长，因为他以坚决的态度驳回了卡龙赫将军的指责。的确，他这样做，是表现了一个捍卫自己事业的人的毅力。（普遍的强烈反应）我不得不详细地谈一谈情况，这是为辩明这件事所必需的，而且我希望在辩论中首先要排除那种可能强调个人的东西，因此，如果内阁首相愿意回答以下的问题我会对他表示感谢，我的问题是：巴伦西亚公爵自从 1852 年以来与那些在维卡尔瓦罗的

将军保持着密切联系,是真的吗?自从参议院在105人表决后闭会以来,他都有关于他们一切行动的情报,是真的吗?他打算和他们一起实现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吗?由于我所尊重的一些理由,他没能这样做,可是后来派了他的一个副官去祝贺我们的胜利,是真的吗?

纳尔瓦埃斯:听了卢塞纳伯爵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必须声明,不论我们过去的关系如何,我根本没有参与他所策划的以及后来付诸实施的一切,根本没有按他所策划的和付诸实施的方式办事。

奥当奈尔:内阁首相以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我本来不愿意进一步解释,但是,既然非要我这样做不可,我就解释一下吧。任何人都知道,1852年政局非常平静。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开始有人悄悄议论‘制宪改革’。议员先生们一定还记得由于担心改变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他们大概没有忘记,当时政治家们纷纷组成新的联盟,他们决定向女王呈递一份奏章。许多人在这份奏章上签了名,但是并没有呈递给女王。议会召开了,几天以后,《日报》公布了其中几个方案,在议院中产生了效果,以致政府在议长的选举中遭到了严重失败。在这以后,议会被解散了。当时,温和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为了对此表示抗议而联合起来了;巴伦西亚公爵被任命为这个新联盟的主席。由于担心政府会对联盟进行刁难,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巴伦西亚公爵又被推选主持这个委员会,蒙先生、皮达尔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是该委员会的积极成员。除了抗议,这个委员会还提请讨论新选举的合法性问题。在巴伦西亚公爵到巴约讷去以后两三天,布拉沃·穆里洛内阁提出辞职。布拉沃·穆里洛被阿尔科伊伯爵所代替。反对派还是原班人马,当议会召开时,一份由巴伦西亚公爵起草的宣言被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否决了它,可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反对派的声势非常浩大。阿尔科伊伯爵的内阁被勒尔松迪将军的内阁所代替,然后又建立了圣路易斯伯爵的政府。我很抱歉不得不说得详细些,但是现在该谈谈我本人同警卫部队兵营中那些和我站在一起的人的政治关系了。在巴伦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以前,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接见了他的一个代理人,他在这以前曾和这个代理人有过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公爵对国家目前可悲的处境表示痛心,对威胁着王权和宪制的危险表示不安,最后他说,只剩下一条出路——诉诸武力(强烈反应)。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准许巴伦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他先到了马德里,然后迁往阿兰胡埃斯。在那里我们和他商谈一次。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爱国心情,我钦佩这种爱国心情,尽管我不能支持实际上由他领导的内阁。他向我们声明:形势已使诉诸武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某些

原因，他不能第一个出面表态，但是第二支离鞘之剑一定是他的；他又说：当前只要有二个骑兵团起义就足以进行革命了。他这一番话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议会开幕了。巴伦西亚公爵深信一切合法手段都徒劳无益，没有出席参议院担任反对派的领导，而去了洛哈。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议会中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记得那次著名的105人表决。可是政府认为不应辞职。议会解散了，然后采取了前所未闻的迫害措施。曾投票反对内阁的将军们、杰出的政治家们、同情反对派的记者们都遭到驱逐；宣布各方面都要大改组；宣布发行强制性的债券；总之，政府已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敢不敢说，在这个所有在野党派一向只能搞阴谋的国度里，什么时候曾有过比1854年革命更合法的革命？至于我，我离开了那座我曾经躲了六个月的简陋的住所。我离开时骑着马，几位将军和几团人跟随着我，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因为它无耻地蹂躏了我作为一个将军和参议员曾宣誓要保卫的宪法。我们来到了维卡尔瓦罗，令我痛心的是，在那里开始了战斗。战斗不分胜负。双方的部队都很勇敢。守备部队不得不返回马德里，我们就留在维卡尔瓦罗。第二天，按照和巴伦西亚公爵的约定，我们经过阿兰胡埃斯前往安达卢西亚。当时塞拉诺将军驻在哈恩省，他答应援助我们。我们来到曼萨纳雷斯时，他在那里迎接了我们，并且说，那些答应跟随他的人都遭遣散了，他单身一人来和我们祸福与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表了宣言。我不喜欢做了事不认账，我想说说那时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我通过密使了解了马德里的一切动态。温和党里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被卷入了运动。只是该发生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策划某件事时，看来有大批人响应，可是要真的行动时，其中最热心的人都不见了。有人告诉我，我们大概不会得到民众支持，政府竭力说服他们相信，运动只是因个人的纠纷引起的，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发表曼萨纳雷斯宣言的起因，其中有两点很重要：

制宪改革，我后来担任内阁首相时曾向女王陛下提到这一点；

国民军，不是以前实际上组织过的那种国民军，而是我打算建立的作为真正的秩序因素的一支国民军。

我们离开了曼萨纳雷斯，并给巴伦西亚公爵写了一封信，信末由我和其他四位将军署名，我们在信中声明，如果他来这里，我们将任命他为我们的总司令。公爵派一个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病了，正受到严格的监护。有人说我们决定逃往葡萄牙。这是误传。相反，我们决定撤往莫雷纳山，在巴里奥斯建立自己的骑兵，阻截所有载运粮秣的车辆，一有机会就向马德里进发，这时我们突

然听到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垮台和女王号召维多利亚公爵组阁的消息。从这时起,我的使命就结束了。这时,大臣圣米格尔将军派人捎话给我,要我返回马德里。我顺从了,但是坚决不加入内阁。国王把维多利亚公爵免职,我与这位公爵从1840年起就已断绝了一切联系。那些后来责备我加入他的内阁的人,在我抵达马德里的当天晚上,就来劝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务,说这是拯救秩序和社会的惟一办法。所有这些都属于温和党。我见到了维多利亚公爵,由于与他的这种关系,要不是他的宣言替我洗清了恶意的诽谤,我会感到很难堪的。埃斯帕特罗热情地拥抱了我,并且说,该结束西班牙人之间的一切纠纷了,以一党之力来进行统治已不可能,因此他坚决要敦请一切贤达人士共襄大事。我察看了马德里的情况。街垒还没拆除,守备部队的人数极少,但是一向明白事理的民众使我大受鼓舞,信心倍增。我和埃斯帕特罗的第二次见面显得很冷淡;他建议我当外交和殖民大臣。我对他说,我如果入阁,只能同意当陆军大臣。他告诉我,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最适合担任古巴总督这个职务。我回答说,由于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不愿意再回哈瓦那,宁愿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但是我恳求他立即组成内阁,不要使国家继续受到处于临时状态的危险。不久,原来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萨朗萨将军,以埃斯帕特罗的名义,请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位,就在当天夜晚,我就和我的同僚们一起宣誓就职。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两条路:或者听任革命发展下去,直到它的过分做法引起反应,或者加以刹车,让它停下。第一条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迫使我走第二条路。我对这一点并不后悔。我们第一次讨论的问题是制宪议会。在座的科利亚多先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争论。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签署了关于召开议会的法令。举行了普选——不是像皮达尔先生说的那样是在政府的压力下举行的,而是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条件下举行的。大部分代表都是衷心希望国家幸福的人。如果政府坚定的话,宪法是在四个月内制定的。但是埃斯帕特罗——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出了名的软弱性格,使政府方面的任何行动都陷于瘫痪。我继续留在内阁里,并不像维多利亚公爵所错认的那样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同僚。使我继续守在这个职位上的原因,也就是那曾经使我争取这个职位的原因。我继续留下来,是为了阻止革命的进一步泛滥。”

奥当奈尔为自己的政变作了一次笨拙的辩护,然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说:他不能支持纳尔瓦埃斯元帅的内阁,

“因为它已经宣称它打算遵循一种与代议制不协调的政治路线”。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26 日

载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503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①的通过和银行总裁阿尔古伯爵的辞职,可以说是当今帝国金融史上的两件大事。1834年,阿尔古先生被路易-菲力浦提升为法国金融界的首领,大家知道,他已牢牢地保住这一职位二十三年,凭着自己的精明谨慎,顶住了1848年¹³⁹和1851年¹⁴⁰的风暴。1848年革命的矛头不仅针对路易-菲力浦,而且更是针对以法兰西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贵族的。所以可以想见,这个机构及其不得人心的领导人当然要成为革命的首要打击对象。阿尔古伯爵没有认清当时的形势,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通过人为地加剧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恐吓中等阶级,使它走上反革命道路。于是,他突然停止提供巴黎商界一向依赖的信用贷款;可是,他故意制造的巨大险情并没有动摇临时政府的地位,反而冲击了这家银行本身。满以为会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并没有发生,却发生了储户反常地向银行挤兑的现象。尽管阿尔古错误地估计了民众的力量,他却敏锐地估计了政府的能力。他不仅说服政府强行规定银行券的行市,并乖乖地向这家刚被它拯救免于彻底破产的企业按十分不利的条件借一笔贷款,

^① 指法国立法团1857年5月28日通过的法令。——编者注

还乘机增加银行的财源,让它有发行小面额银行券的特权,不让外省银行发行,从而扩大其垄断地位。1847年以前,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最小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它获准发行200和100法郎的银行券。外省银行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权发行银行券,其地位已被法兰西银行新设的分支行取代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它的总流通额,在1847年年终时只有4800万美元,到1855年年底达到了122455000美元;它的总营业额在1847年还不到37500万美元,在1855年已增至94060万美元,其中54900万美元是各分支行经办的。它的股票在革命前的通常报价为2000法郎左右,现在的市价为4500法郎。1848年以前,法兰西银行主要是一个巴黎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全国性机构。革命政府赋予它的新的特权,把它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私人企业。这样,经过阿尔古的精明的操办,二月革命¹³⁹所要消灭的金融贵族的垄断,恰恰借助于这次革命本身而得到扩大、加强和改组。

阿尔古不得不面临的第二个大灾难就是改变¹⁴⁰,它能否成功,要看能否强行打开由他负责看守的银行金库。这位顺从听话的总裁不仅默许波拿巴的盗窃,而且还大力消除商界的忧虑,他一直不离开自己的职位,而这时所有正派的人或自称正派的人的大批离职,已严重威胁这个篡权者的声誉了。为了嘉奖这种难能可贵的效劳,波拿巴同意不在1855年修改银行章程,而进行修改是在1840年最后一次准许银行特许状延期时的附加条款中有过规定的。阿尔古和他的朋友、已故的苏尔特元帅一样,从来只忠于自己的职位和薪俸。他在这时辞去法兰西银行总裁的职位,也只能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即像民间谚语所说的:屋将塌时鼠先溜。

新的银行法的这段历史,标志着颇能说明当今帝国时代的劣迹

之一。在 1856 年底欧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最初提出讨论现行银行法的修改问题,曾有这样一个动听的借口:支撑银行的庞大业务的资金太少了。在六个多月的时间中,法兰西银行的代表们,当着拿破仑第三的面,同巴黎的大金融家、大臣们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可是,目前的这个法案直到立法团⁸²最后解散的前夕才被提交给这个机构。在专题委员会¹⁴¹里初步讨论时,法案遭到猛烈的抨击;负责汇报该法案的委员会,简直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有人威胁要把这个方案整个儿推翻。但是,波拿巴很了解自己的傀儡。他们向他们暗示:政府的决心已定,因此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批准法案,或者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丢掉工作清闲而报酬优厚的职位。为了帮助他们抛弃最后一点羞耻之心,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专门用来讨论法案。于是,法案自然获得通过,只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这项甚至在立法团这样一个机构里也要费这么大力气才得以通过的法案,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说实在的,即使在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在法兰西银行和路特希尔德家族被公然授权可以禁止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法案时,也没有哪个大臣敢于要国家这样完全向他们投降。现在政府放弃了在新的银行法有效期满以前修改它的权利,这个权利是 1846 年的特许状就做了保证的。还有十年有效期的银行特权,现在又被恩准延长三十年。银行券的面额被批准降低到 50 法郎。这项条款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1848 年发行面额 200 法郎和 100 法郎的银行券曾使这家银行以自己的纸币代替了 3 000 万美国的黄金和白银。这个新的变动无疑会给法兰西银行带来巨额利润,但是国家却毫无所获。相反,国家还要付钱给银行,用来维持以法国的名义赋予该银行的信誉。法兰西银行被授予在尚未设立分支行的地方设立分支行的特

权,而这并不是作为国家对银行的让步,反而是作为银行对国家的让步。准许银行向主顾收取超过6%的法定利息,条件是只要承担一个义务,即把由此得来的利润并入银行的资本,而不归入其全年股息。银行同国库的往来账的利率由4厘降到3厘,但这由于1840年法令的下述条款的废除而得到更大的补偿,这一条规定在国库的债款降到8000万法郎以下时银行根本不收利息,这种债款额通常平均是8200万法郎。法兰西银行得到的最后一个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优待,就是该行新发行的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的91250张股票,只有已有的91250张股票的持有人才能购买,而目前该银行股票在交易所的价格为4500法郎,但这些新股票却应当以1100法郎的价格出售给旧股东。这项完全是牺牲国家利益而使金融巨头受惠的法令,有力地证明了波拿巴政府在财政上已陷入怎样的困境。作为对所有这些让步的回报,政府得到了2000万美元,也就是说,这家银行必须购买2000万美元专门为此发行的三厘公债,这种公债的最低价格为75法郎。整个这笔交易看来有力地证实了在欧洲大陆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波拿巴已经从这家银行的金库中弄到了一笔巨款,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他的这笔诈骗交易披上一件比较体面的外衣。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6月
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6月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4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1857年6月12日于伦敦

不久以前,当帕麦斯顿勋爵在他自己的下院就波斯战争²¹问题接受质询时,他以讥讽的口吻回答道:“和约一经批准,下院就可以发表关于战争的意见。”这份于1857年3月4日在巴黎签订、1857年5月2日在巴格达批准的和约^①,现在已提交下院了。和约共有十五条,其中八条都是和约中常用的具文。第五条规定,自互换和约批准书之日起三个月内,波斯军队必须撤离赫拉特领土、赫拉特城和阿富汗的一切地区。按照第十四条,英国政府方面答应,一俟上述条款生效,“英国军队就立即撤离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

但是应该回忆一下,波斯特使费鲁赫可汗在君士坦丁堡同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进行长时间谈判时,曾主动提出波斯军队撤离赫拉特,当时布什尔尚未被占领。因此,英国从这个条款中所能得到的惟一新的利益,只不过是有一年中最有碍健康的季

①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波斯沙赫陛下之间的和约》,载于1857年6月11日《泰晤士报》第22704号。——编者注

节把自己的军队困在波斯帝国的最容易感染疾病的地方。夏季的烈日、沼泽和海洋甚至对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当地的居民也是可怕的灾难,这些,古代和近代作家都曾有所记述;可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些,既然几个星期以前,这方面的权威、帕麦斯顿的拥戴者亨利·罗林森爵士已经公开说过,英印军队必然会死于恶劣的气候?伦敦《泰晤士报》得悉在穆罕默腊获胜的消息,立刻就声称,虽然有和约,为了拯救军队,必须向设拉子推进^①。受命统帅这次远征的英国海陆军将领^②之所以自杀,也正是因为他们非常担忧军队可能遭到的命运,按照政府的指令,他们是不应该率领军队由穆罕默腊再向前推进的。因此,完全可能看到克里木惨剧小规模地重演;而这次惨剧的发生,既不是由于战争的需要,也不是由于政府犯了重大错误,而是由于一份用胜利者的剑写成的条约。在上述和约的条款中有一句话,只要帕麦斯顿需要,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争端”。

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军队撤离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但是这句话是有争议的:穆罕默腊城是否隶属于波斯?土耳其人从未放弃对这个位于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城市的要求,它是他们在该河惟一可以经常通航的海港,因为巴士拉港在某些季节水位太低,不能停靠载重量大的船只。因此,如果帕麦斯顿乐意,他就可以借口穆罕默腊不“隶属于”波斯,借口等待土耳其和波斯边境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把穆罕默腊据为己有。

第六条规定,波斯同意

“放弃对赫拉特领土和赫拉特城的主权以及对阿富汗各地区的主权的一切要

① 1857年5月15日《泰晤士报》第22681号社论。——编者注

② 埃瑟里奇和斯托克。——编者注

求”；“决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承认赫拉特和整个阿富汗的独立，决不试图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在同赫拉特和阿富汗发生争端时，须请“英国政府从中进行友好的调处；除非这种友好的调处失败，决不诉诸武力”。

英国政府方面答应

“随时影响阿富汗各邦，以便防止可能由它们方面引起的任何不愉快”，并“竭尽全力用公正的和无损波斯尊严的方式调解争端”。

如果把这一条中的官样文章去掉，它的意思无非是波斯承认赫拉特的独立，也就是费鲁赫可汗自己在君士坦丁堡会议时就准备要做的让步。诚然，按照这一条，英国政府被指定为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正式调停人，但是从本世纪一开始，它就一直就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它能否继续扮演下去，这就不是权限问题，而是实力问题了。此外，如果沙赫^①在德黑兰宫廷里藏有一位许霍·格劳秀斯，此人就会指出，按照国际法，凡独立国家据以授权外国政府干预本国国际关系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同英国签订的条款更是如此，因为它把阿富汗这个仅仅用来作为各种各样的部落和邦的标志的带有诗意的名词，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了。从外交的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国就同泛斯拉夫国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第七条规定，阿富汗各邦对波斯国境有任何侵犯行为时，

“波斯政府有权……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和惩罚进犯者”，但是“一旦完成任务，必须退回本国境内”，

这一条实质上是 1852 年条约^②中的一项条款的翻版，该项条款

① 纳赛尔丁。——编者注

② 大不列颠与波斯之间关于赫拉特独立的条约。——编者注

曾是远征布什尔的直接起因。

根据第九条,波斯同意英国派驻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这些人享有最惠国的特权;但是根据第十二条,英国政府放弃

“对今后实际上并不受雇于英国使团或英国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的任何波斯臣民的保护权”。

费鲁赫可汗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同意英国在波斯设立领事馆,目前这项条约只增加了英国放弃对波斯臣民的保护权,这种权利曾成为战争²¹的表面原因之一。奥地利、法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进行任何海盗式的远征,也在波斯设立了领事馆。

最后,条约要德黑兰宫廷请回默里先生,并向这位绅士道歉,因为在沙赫写给其首相的一封信中,默里先生被描述成一个“愚蠢无知的狂人”,一个“蠢材”,一份“粗野、荒谬、令人厌恶的文件”的起草人。费鲁赫可汗也曾提出要向默里先生道歉,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坚持要免去波斯首相的职务,要让默里先生“在号角声中,在长笛、竖琴、萨克布号、古琴、扬琴和其他乐器的乐声中”^①,隆重地进入德黑兰。默里先生在任驻埃及总领事时,曾接受巴罗先生私人赠送的礼物;他第一次到达布什尔时就把当时以沙赫名义送给他的烟草运往市场公开出售;他曾像游侠骑士那样随身带着一个声誉可疑的波斯女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不能使东方公众对英国人的廉洁和品格有过分的好感。所以,波斯宫廷被迫重新接纳他,这样的成功实在是大成问题的。总之,除了费鲁赫可汗在战争爆发前已提出的让步之外,这个条约没有一条值得为它浪费笔墨纸张,更不值得为它消耗金钱和抛洒

^①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3章第10节。——编者注

鲜血。这次远征波斯所获得的纯利,可以总结如下:大不列颠在整个中亚细亚受到普遍的憎恨;由于动用印度军队,印度国库承受新的负担,印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另一场克里木惨剧的重演几乎不可避免;波拿巴在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正式调解人地位得到确认;最后,俄国获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一个在里海,另一个在波斯的北部沿海边境。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

载于 1857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4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军队中的起义¹⁴²

罗马的“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金科玉律。不同的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邦国，合起来构成了这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互相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原则。然而，最近这一统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征服信德¹⁴³和旁遮普¹⁴⁴以后，英印帝国不仅达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抹去了印度各独立邦的最后痕迹。所有好战的土著部落都被制服了，所有严重的内部冲突都结束了，最近奥德的被兼并¹⁴⁵已清楚地表明，残余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印度公国也只是由于获得默许才得以存在。这样，东印度公司⁶³的地位大有改变。它已不再借助印度一部分地区去进攻另一部分地区，而是高高在上，整个印度都在它的脚下。它已成为惟一的征服者，而不再从事征讨。它手下的军队不必再去扩展它的领地，只要保持这些领地就行了。士兵变成了警察，2亿土著居民被英国人指挥的20万土著军队所控制，而土著军队又控制在仅有4万人的英国军队的手里。一眼即可看出，印度人民的顺从依赖于土著军队的忠诚，但英国当局建立土著军队的同时，也就组织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拥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土著军队可靠到什么程度，从他们最近的哗变就可以清

楚地看出,当英国对波斯的战争²¹几乎把孟加拉管区¹⁴⁶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的时候,就立刻爆发了哗变。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就有过多次哗变,但是这次的起义¹⁴⁷不同,其性质特别严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西帕依⁶⁷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

“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实际上是以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告终”^①;

哗变已经不局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孟加拉军队中的起义无疑与对波斯战争和对华战争¹⁵有密切的联系。

四个月前不满情绪在孟加拉军队中开始蔓延的原因,据说是土著士兵担心政府要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当时曾分发一种子弹,据说弹壳纸被涂抹了牛油和猪油,它必须用嘴去咬,土著士兵认为这是违背他们教规的,因此这就成为地方性骚动的信号。1月22日,在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兵营里发生一次纵火事件。2月25日,在贝汉布尔第十九土著团哗变,抗议向他们分发这种子弹。3月31日,该团被解散。3月底,驻伯勒格布尔的第三十四西帕依团的一名士兵,在阅兵场上手持实弹的枪走出队列,号召伙伴们哗变,然后开枪射伤了该团的副官和军士长。在随后发生的一场格斗中,几百名西帕依袖手旁观,其余的则参加了格斗,用枪托打他们的军官。随后这个团也被解散了。4月发生的突出事件是安拉阿巴德、阿格拉和安巴拉等地的孟加拉军的几个兵营被纵火焚烧,驻密拉特的轻骑兵第三团发

① 1857年6月29日《泰晤士报》第22719号社论。——编者注

生了哗变,在马德拉斯军和孟买军内也有类似的不满情绪。5月初,在奥德首府勒克瑙有人策划暴动,但是被亨·劳伦斯爵士果断制止。5月9日,密拉特轻骑兵第三团的哗变士兵被押赴监狱去服刑,他们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次日傍晚,骑兵第三团的士兵和两个土著团(第十一团和第二十团)一起聚集在操场上,杀死了竭力要他们驯服的军官,放火烧毁了兵营,杀死了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英国人。这个旅的英军部分拥有一团步兵、一团骑兵和大量的骑炮兵和步炮兵,但是他们直到天黑才能行动。他们使哗变者只受到轻微的损失,就让他们逃到郊外,奔往距密拉特约40英里的德里。在德里,土著守备部队汇入他们的队伍,该部队有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五十四团和第七十四团以及土著炮兵一个连。英国军官不断遭到袭击,起义者所抓到的一切英国人都被杀死,已故的德里莫卧儿²²的继承人被宣布为印度国王。在派去援救密拉特——那里的秩序已经恢复——的部队中,5月15日到达的六个土著工兵-地道爆破兵连,杀死了指挥官弗雷泽少校,立刻逃出城,他们受到骑炮兵部队和近卫龙骑兵第六团几支队伍的追击。五六十名哗变者被打死,但其余的人逃到德里。在旁遮普的非罗兹布尔,第五十七和第四十五土著步兵团哗变,但是被镇压了。来自拉合尔的一些私人信件说,整个土著部队都处于准备公开哗变的状态。5月19日,驻加尔各答的西帕依企图夺取圣威廉堡¹⁴⁸,但未成功。从布什尔调到孟买的三个团立刻被派往加尔各答。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你会对密拉特英军司令^①的行为感到惊奇:他迟迟才在战场上出现,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哗变者的追击那样

① 休伊特。——编者注

松懈无力。因为德里位于朱木拿河右岸,而密拉特位于左岸,两岸之间仅在德里有一座桥相连,要切断逃亡者的退路是轻而易举的。

与此同时,所有笼罩着不满情绪的地区都已经宣布军事管制;主要由土著兵组成的部队正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集中去对付德里;邻近地区的王公,据说都宣布效忠英国;已有信件送往锡兰,命令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额尔金勋爵和阿什伯纳姆将军的部队停止前进;最后,一支 14 000 人的英国部队大约在两星期后将从英国派往印度。无论印度目前季节的天气以及运输工具的极度缺乏对英军的调动可能造成多大的阻碍,德里的起义者大概不会进行持久的抵抗就要投降的。然而,即使这样,这也仅仅是一场必然发生的最可怕的悲剧的序幕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7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6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艾 雷¹⁴⁹

艾雷，理查爵士——二级巴斯勋爵士，少将，现任英军军需总长，1821年入伍时为少尉，1825年任上尉，1851年任中校^①；1854年以此身份指挥派往东方军队的一个旅。1854年9月，在克里木远征军从瓦尔纳出发的前夕，他被任命为远征军军需长；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是被指责为在拉格伦勋爵率领下使英军被摧毁的六名或八名军官之一，因为他们墨守成规，虚应故事，缺乏常识，消极懈怠。当时艾雷负责规定各团各种行军装具（帐篷、大衣、被褥、靴鞋）的配额。据他本人说（在切尔西调查委员会作调查时）：

“从185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起，在巴拉克拉瓦没有一天不储存着大量寒衣，[……]”^②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前线的堑壕里[……]有些团却正由于缺乏这些东西而大吃苦头，其实这些东西[……]就给他们存放在不过七八英里以外的地方。”

他说，这不是他的过错，要他批准分发这些东西，丝毫不困难。相反，他认为自己有功，因为无论批准、部分满足或者拒绝师、团军官

① 理查·艾雷爵士1838年任中校，1851年被提升为上校。——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破损。——编者注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
Popular Dictionary

or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VOLUME I
A-ARAGUAY.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345 & 346 BROADWAY.
LONDON: 16 LITTLE BRITAIN.
M.DCCCLVII.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1卷的扉页

向他提出的申请,他都尽可能简化了例行的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6 日—23 日之前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¹⁵⁰

欧洲在东方战争³⁸结束后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局面，正很快地被一片活跃甚至狂热的景象所代替。例如，在大不列颠，一场改革运动正在悄然逼近，同时，它在印度也遇到不少麻烦。诚然，伦敦《泰晤士报》告诉世人，除了那些在印度有朋友的人，

“英国公众作为整体来说，对于印度的最新消息的期待，并未超过比如说对延误的澳大利亚轮船或马德里起义的结果的关注。”^①

但是，同一天，同一家《泰晤士报》，在一篇金融评论中却摘下了那副傲慢的满不在乎的假面具，暴露了约翰牛的真实感情：

“尽管银行的黄金储备不断增长，尽管丰收在望，像目前我们在证券市场可以普遍看到的这种长期萧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印度的情况引起的惶恐不安，压倒了对其他一切问题的关心，假如明天听到什么严重的消息，人们很可能会惊慌失措。”^②

大可不必推测印度事件的进程，因为现在每一封信都能带来可

① 1857年7月9日《泰晤士报》第22728号社论。——编者注

② 《金融市场与伦敦城信息》，载于1857年7月9日《泰晤士报》第22728号。——编者注

靠的消息。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假如在欧洲大陆爆发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因派士兵和舰队对中国作战¹⁴⁵和镇压印度起义¹⁴⁷而弄得精疲力竭的英国，就再也不能像它在1848年和1849年那样骄横恣肆、耀武扬威了。再说，形势也不允许英国袖手旁观，因为东方战争和与拿破仑结盟，最近已使它备受大陆政策的束缚，与此同时，它的一些传统的政党彻底崩溃，创造财富的各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增长，使它的社会结构比任何时候更厉害地遭受痉挛性的震荡。1848—1849年，英国的威力曾像梦魇一样沉重地压着欧洲革命，最初它对革命还有些惧怕，后来为排遣自己固有的寂寞而把革命当作一出戏来欣赏，后来有些背叛革命，后来有些向革命卖弄风情，最后则靠革命大发其财。甚至可以说，它在1846—1847年商业衰退中受到相当猛烈的打击的工业繁荣，由于1848年的革命，却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如今大陆上的革命，对英国来说，将不再是一出可供欣赏的戏剧，也不再是一场可资利用的衰退，而是一场必须经受的严重考验。

越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看到，社会的表层已随着地下火的活动而起伏震荡。巴黎的选举¹⁵¹，甚至已经不是一场新的革命的预兆，而是新革命的真正开端。卡芬雅克的名字被反对波拿巴的力量当作旗帜，这完全符合法国以往的历史，正像奥迪隆·巴罗当年领导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力量一样。对于人民来说，卡芬雅克像奥迪隆·巴罗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然而对于中等阶级来说，他们两人都体现一个严肃的思想。革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是胜利之日写在旗帜上的名字。在现代社会，革命运动为了把握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在一开始借用这样一些人的旗帜，这些人虽然反对现存政府，但是与现存社会还是完全协调一致的。总之，革命必须从统治阶级的

手中获得登上官方舞台的入场券。

要真正了解巴黎的选举、巴黎的逮捕和巴黎的迫害，必须考虑巴黎交易所的状况，它在竞选鼓动之前就发生波动，而且比竞选鼓动延续得更久。甚至在 1856 年的最后三个月，整个欧洲陷于金融危机时，巴黎交易所也没有像当前整个 6 月份和 7 月初这样全部证券都不断地狂跌。此外，这次没有一个间歇性的涨跌过程，而是直线下跌，只是在最后出现突然猛跌时才算是符合了通常的跌落规律。动产信用公司¹²⁶的股票，在 6 月初约值 1 300 法郎，到 6 月 26 日下跌为 1 162 法郎，7 月 3 日为 1 095 法郎，7 月 4 日为 975 法郎，7 月 7 日跌到 890 法郎。法兰西银行股票 6 月初市价为 4 000 法郎以上，可是，尽管该银行被授予新的垄断权和特许权，到 6 月 29 日股票仍然下跌到 3 065 法郎，到 7 月 3 日又下跌为 2 890 法郎，一直到 7 月 9 日未曾超过 2 900 法郎。三厘公债、主要铁路（北部铁路、里昂铁路、地中海铁路、大联线公司等）的股票以及其他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也都同等程度地持续下跌。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①，暴露了波拿巴的国库绝望的处境，同时也动摇了公众对法兰西银行管理层本身的信任。动产信用公司的最近一份报告书^②不仅暴露了这个机构极端空虚的本质，以及其中所牵涉的形形色色的利害关系，还告诉公众它的董事们和皇帝^③在勾心斗角，某种财政上的政变在酝酿之中。其实，动产信用公司为了完成紧急义务，已被迫向市场抛出手中的大约 2 000 万法郎的有价

① 见本卷第 155—158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34—141 页。——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证券。与此同时，一些铁路公司和其他股份公司为了支付股息，为了获得维持业务或者启动业务的资金，也不得不出售有价证券，号召给自己旧的股票添注新的股金，或发行新股票来获得资本。由此可见，法国证券市场的持久的呆滞既然完全不是由于纯粹偶然的情况造成的，它必将随着以后每次结账期限的来到，以更尖锐的形式反复出现。

目前这种病症已使人们恐慌不安，这一点，从以下这个事实就可以推断出来：第二帝国伟大的财政庸医埃米尔·贝列拉已经登场，他向路易-拿破仑呈递一份报告，其中引用了路易-拿破仑于1850年向农商总会演说中的一段话：

“信赖——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是物质利益的精神因素，是给肉体以生命力的灵魂。通过唤起信心，它能成十倍地增加一切产品的价值。”

然后，贝列拉先生用我们读者早已熟悉的手法来继续说明最近五个月内国家证券减少了98 000万法郎。他以这样不祥的话结束他这篇伤感的报告：“法国的预算几乎等于是恐惧的预算。”如果像贝列拉先生所说的，法国除了为维持帝国而不得不支付2亿美元税金，由于恐惧失去帝国还必须付出更多，那么，当时完全是为了省钱而建立的这个如此昂贵的机构，其日子确已是屈指可数了。如果说，帝国财政上的混乱已经造成它政治上的困难，那么后者又必定会反过来影响前者。正是因为法兰西帝国的状况是如此，不久前的西班牙风潮¹⁵²和意大利风潮¹⁵³，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所面临的麻烦^①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见本卷第300—30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1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7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7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火 绳 枪

火绳枪——源出于法文 *arquebuse*, 但有时误写为 *harquebuse*, 而在英国人中, 特别是在苏格兰境内, 曾讹误为 *hagbut* 或 *hackbut*, 是最早的一种真正适于在战场上为军事目的使用的火枪。早在公元 1485 年博斯沃思会战¹⁵⁴中就已使用这种枪, 当时叫做手枪。这只是一个铁制的短圆筒, 一端堵着一截类似枪尾的东西, 有一个导火管, 固定在一根像矛或戟的柄的坚硬木杆的顶端。这种手枪, 或者说小型火炮, 装的是粗粒火药充填的弹丸或小型子弹, 通过以火绳点燃火门来发射。这种武器放在前排士兵(长矛手或持戟手)的肩上, 靠把手调整方向, 由后排士兵发射, 发射时当然并不进行瞄准。根据霍尔的编年史^①记载, 甚至在比这更早的时期, 在阿赞库尔会战¹⁵⁵时期, 不列颠人就装备了“手提火枪”。然而这种古老的火器十分笨重, 移动非常不便, 尽管响声可怕, 外形别致, 但效果不大, 或者毫无效果。在亨利八世时代, 尽管早期曾依靠西班牙火绳枪手的火力取得了帕维亚会战¹⁵⁶的胜利, 但是大弓由于射击精度高, 射程远, 侵彻力强,

① 指爱·霍尔《高贵而光荣的兰开斯特王室和约克王室的联合》1542 年伦敦版。——编者注

仍然不失为优良的武器。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大弓仍被称为“武器之后”,尽管她的军队中已有火枪手,而且她曾派詹姆斯上校(著名小说家^①的一位祖先)率领一队骑马的火绳枪手去援助法王亨利四世。在伊丽莎白时代,这种武器已经大有改进,不过依然又长又笨,只有放在射手面前的一个插入土里的叉架上才能射击;这种必不可少的装备有时安上一个矛头或戟头,斜插在土里,作为护栏的尖桩。

这种古老的火绳枪的枪管特别长,是用很厚实的金属制成的,一般枪膛较小,有些已有膛线,例如,在苏格兰汉密尔顿宫中至今保存着一支这样的枪。1570年博特威尔霍的汉密尔顿曾用它击毙了墨里摄政王。这种枪用大麻制成的火绳即导火索发射,火绳穿过与现代燧发枪机所用的相类似的击锤,扣动扳机时,击锤将燃着的火绳投入药池,击发火绳枪。后来,火绳枪机让位于轮发枪机。轮发枪机是把燧石牢牢固定在药池上,一个齿轮借助于弹簧迅速转动,向放在它下面的火药喷出火花。继轮发枪机之后,出现了所谓弹簧枪机。这是钢制燧发枪机的第一个粗糙的前身。这种枪机由约瑟夫·曼顿作过很大改进,它完全被火帽(人们很难想像有比这更快和更可靠的发火具)取而代之也只有几年工夫。在英国内战¹⁵⁷时期,一些精制的皮斯托枪、猎枪和纤巧的小火枪上曾采用弹簧枪机,但是这些枪稀少而昂贵,没有广泛使用,只是一些缙绅和高级军官的佩戴之物,火绳枪依然是士兵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完善的火绳枪问世直到不久以前,在枪身的制造和子弹飞行方向的精度方面,远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的进步。精确瞄准的困难看来完全是射击方法不完

^① 乔·詹姆斯。——编者注

善、武器笨重和发火极为缓慢所造成的,因为许多年代久远的、特别是西班牙制造的火绳枪,其枪管根据击发原理加以改造,安上新的枪托,并适当地改短后,在远射程上射击也能十分精确,甚至具有不寻常的侵彻力。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23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攻 击

攻击——按其总的战略意义,是指在任何一次遭遇、战斗、交战或激战中争取主动权的行动;而且,在任何场合,开始时总是一方采取进攻作战而另一方采取防御作战。一般认为,攻击能获得更多胜机,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严格的防御性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甚至在防御战中也采取进攻行动。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改变作战的地点和地区,打乱敌人的计划,使敌人离开其作战基地,迫使敌人在不是他所预期的、他做好准备的时间和地点,或者说肯定对他不利的时间和地点作战。

在严格的防御性战斗中运用进攻战和正面攻击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次出色的战役:一次是以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告终的1814年战役¹⁵⁸,另一次是以滑铁卢的溃败和巴黎的投降结束的1815年战役¹⁵⁹。在这两次著名的战役中,这位完全是为了保卫被入侵的国家而战的统帅,曾在一切地方利用一切机会对敌人发动攻击;尽管整个说来与入侵者相比一直处于很大的劣势,但是在攻击点上总能形成优势,并且通常都能取胜。这两次战役的不幸结局丝毫不损于它们的总体构思或局部行动的意义。这两次战役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方面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

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盟国在物资方面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世纪内连年征战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攻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谁先取得主动权，或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被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大国取得的光辉成就所迷惑，以为他们的胜利都应归功于大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很需要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最后还必须提到拿破仑第一，都是特别喜爱攻击的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他们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的。法国人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他们几乎是锐不可当的勇猛攻势，归功于他们善于果断机敏地迅速乘胜追击，把敌人的灾难变成其彻底的毁灭。他们在防御时却远非如此强大了。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直到进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之后，自己能转入进攻，进行攻击，这时防御行动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在野战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过进攻战，但是从来没有在防御战中显过身手。在他们的历史上，没有一次会战是先在不利的条件下整日进行防御，最后才转为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至于法国军队及其统帅，总的来说也是如此。相反，希腊人进行的许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马拉松会战¹⁶⁰、温泉关会战¹⁶¹、布拉底会战¹⁶²等，特别是布拉底会战，都是按照下述方式进行的：先抗击敌人的强攻，直到其力量减弱下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对这些已趋于疲惫的进攻者发动攻击。很久以来，英国人就采用这种

战法，瑞士人和德国人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过，它通常都给这些部队带来胜利，后来美国人也成功地采用了它。克雷西会战、普瓦捷会战、阿赞库尔会战¹⁵⁵、滑铁卢会战、阿斯珀恩会战和埃斯灵会战¹⁶³，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会战，都准确地遵照了这种战法。还可以补充一点：在1812—1814年的战争¹⁶⁴中，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英国人的战法来对付英国人，当时英国人几乎连续不断地攻击美国人，而且还违背惯例列成纵队进行攻击，这种战法曾被英国人卓有成效地用来对付过法国人，不久以前又用来对付俄国人^①。

当两军在战场上对峙并准备交战时，通常使用的攻击方法如下：第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正面平行攻击。进攻的兵力在从一翼到另一翼的全线同时进入战斗，并且单纯用强攻来解决战斗。第二，翼侧攻击。或两翼同时进行，或先以一翼，后以另一翼攻击，而将中路后撤。这是拿破仑爱用的战法。他在用这种方法使敌人加强两翼而削弱中路的同时，将自己的中路后撤，以庞大的骑兵预备队来加强它，最后再迅速冲入在敌人中路形成的缺口，以歼灭性的打击结束战斗。第三，中路攻击。将两翼后撤作为预备队。这是三种攻击方法中缺陷最大的一种，很少被采用，而且被认为从来没有成功过。假如一支军队被迫采取这种阵势，通常会被包围以至消灭，就像罗马的攻击部队在坎尼的遭遇那样¹⁶⁵。相反，这种阵势用于防御却是很好的。第四，斜向攻击。这是埃帕米农达斯的创造，他在留克特拉会战¹⁶⁶和曼丁尼亚会战¹⁶⁷中曾采用这种战法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种战法就是秘密地逐渐加强自己的一翼兵力以攻击敌人的一翼，而将中路和另一翼后撤，但在这样机动时要始终做出进行攻击的威胁，使

① 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防守方无法及时加强其薄弱点。这就是奥地利元帅克累尔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爱用的战法。克累尔费运用这种战法经常击溃土耳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谈到自己辉煌的胜利时常说，他“只不过是重演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法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一般来说，也包括法国人，同样还有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他们所有出色的会战中，通常都采用纵队攻击而赢得胜利。这种纵队只要不遇到真正的障碍，不为敌人所阻，就可以突破敌人的中路而长驱直入。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过去不论在攻击或防御时都几乎始终不变地以横队作战，现在也仍然如此；他们总是能够以这种队形用中路兵力抵抗和阻击强攻纵队，直到自己的两翼前出，包围敌人的两翼，粉碎敌人为止。值得注意的是，每当英国人放弃这种可以说是民族固有的二列横队攻击方法，而像在丰特努瓦会战¹⁶⁸和奇珀瓦会战¹⁶⁹那样用纵队进行强攻时，他们就遭到了失败。几乎可以肯定，面对坚定沉着的敌军，用纵队攻击中路的战法是根本错误的，虽然对付体质和纪律都差的敌军，特别是士气低落的敌军，用这种方法有把握获胜。

对于只有步兵防守的多面堡或野战工事，进攻者可以直接进行攻击；如果多面堡还有火炮防守，就必须首先用火炮压制敌方的火炮。炮击的任务是破坏防栅，击毁敌炮，摧毁胸墙，从而迫使防御者把火炮撤到工事内部去。在攻方炮兵完成任务后，轻步兵，主要是来复枪手，绕过部分工事，向胸墙顶部射击，使防御者完全不敢露头或不得不仓促射击。来复枪手逐渐接近目标，对目标进行合围，这时攻击纵队已经组成，由携带斧子和梯子的士兵作为前导。纵队的前列士兵可能还携带柴束，既可当作盾牌，又可用来填充壕沟。这时，工事的火炮已后撤来对付强攻纵队；而进行攻击的来复枪手应加强火

力,以射击守方的炮手为主,使他们不能给火炮重新装填炮弹。进攻者如果能进到壕沟,就须在强攻时一致行动,从四面八方同时冲向工事。因此,进攻者应在壕沟边停留一下,等待统一的信号。当他们攀登胸墙时,防御者会用榴弹炮弹和滚木礮石迎击他们,而在胸墙顶上,将用刺刀或枪托来对付他们。虽然阵地的有利条件仍在防御者方面,但是攻击的锐气使进攻者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工事两侧没有其他工事掩护,那么,在这个时候击退敌人猛烈的强攻是困难的,虽然并非完全不可能,以前也曾有过先例。对于非永久性工事,可以进行突然攻击或硬攻,在这两种场合,指挥官首要的职责,都是通过间谍或侦察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工事的性质及其守军、防御兵器和各种物资的情报。在攻击时,步兵经常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器材,这时士兵需要发挥自己丰富的创造性:用干柴烧毁鹿砦,用草捆填平不大的壕沟,在枪手的掩护下用梯子攀越防栅,以及用火药包爆破设置了障碍的门窗等。只要坚决大胆地采用这些办法,他们通常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普通障碍物。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23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7月17日于伦敦

自从德里落入起义的西帕依⁶⁷之手，他们拥立莫卧儿²²皇帝，到6月8日正好一个月了。但是，认为哗变者能够击退英军而守住这个印度古都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谬的。德里的工事只有一座城墙和一条简陋的护城壕，而周围瞰制城市的高地已被英国人占领，他们甚至不必轰毁城墙，只采用切断城内水源的简单办法，就可以在很短时期内迫使德里的守军投降。而且，哗变的士兵是乌合之众，他们杀死自己的军官，军纪荡然无存，已找不出一个可以赋予最高指挥权的人，所以他们很少有可能组织认真而持久的抵抗。使混乱局势更加混乱的是，德里的这支庞杂的队伍日益膨胀，每天都有孟加拉管区¹⁴⁶各地新的哗变部队络绎不绝地前来，都好像是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汇入这个难逃厄运的危城。5月30日和31日，哗变者冒险在城郊两次出击，但均被击退，受到重大损失。这两次出击看来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绝望，而不是出于对自身力量的任何自信。惟一令人奇怪的倒是英军行动的迟缓，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因为天气酷热和缺乏运输工具。据法国人的报道，除总司令安森将军外，还有

约 4 000 名欧洲兵已死于致命的酷暑。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在德里城下的战斗中，烈日对士兵的危害甚于敌人的枪弹。由于缺乏交通工具，驻在安巴拉的英军主力向德里行进差不多用了 27 天，每天平均只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造成进一步迟延的原因，是安巴拉没有重炮，因此必需从最近的军火库调去攻城炮兵纵列，而最近的军火库却远在萨特利杰河彼岸的皮劳尔城。

尽管如此，德里陷落的消息仍然指日可待；但以后又将怎样呢？如果说，起义者无可争辩地占有印度帝国的传统中心达一个月之久这一事实，可能起到最强烈的煽动作用，使孟加拉军全部瓦解，使哗变和逃亡现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展到旁遮普，向西扩展到拉杰布塔纳，使英国在印度全境的统治发生动摇，那么认为德里的陷落（尽管它可能在西帕依队伍中引起惊慌）足以扑灭起义的火焰，会阻止其进展，或恢复英国的统治，这就大错特错了。拥有约 8 万人的整个土著孟加拉军队（其中大约有拉杰布特人¹⁷⁰28 000 名，婆罗门¹⁷¹23 000 名，伊斯兰教徒 13 000 名，较低种姓的印度教徒 5 000 名，其余是欧洲人），已有 3 万人因哗变、逃亡或被开除而消失。至于这支军队的其余士兵，有几个团已公开宣称他们将仍然效忠和支持英国当局，但不做土著部队目前正在做的事：他们将不协助当局反对土著团的哗变者，相反，将援助自己的“巴依”（兄弟）。从加尔各答起，他们几乎在每一个基地都是这样做的。土著团曾一度消极，但是他们一旦相信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哗变。伦敦《泰晤士报》一位驻印度的记者对一些尚未表示态度的团、一些尚未与起义者合作的土著居民的“忠诚”，说得非常透彻。

他说：“如果你读到一切平安无事，你应该理解为：土著部队还没有公开起来哗变；不满的居民还没有公开造反；他们不是力量还太弱，就是自己感到力量

不强,要不然就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当你读到某个孟加拉土著骑兵团或步兵团‘表示忠诚’时,你应该理解为:在这些受到赞许的团中只有一半是真正忠诚的,另外一半只是在装样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使欧洲人措手不及,或者借此避免嫌疑,从而更便于帮助他们那些参加哗变的伙伴。”^①

在旁遮普,只是用解散土著部队的方法才防止了公开的起义。在奥德,可以说英国人只保有勒克瑙的专员官邸¹⁷²,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土著团都起义了,他们携带枪支弹药逃跑,把英国人的房子全部烧光,并且跟起义的居民联合起来。现在,英军的真正处境由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得最清楚:英国人不得不在旁遮普和拉杰布塔纳建立快速突击部队。这说明,英国人既不能依靠他们的西帕依部队,也不能依靠土著居民来维持他们各个分散的部队之间的联系。正像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¹⁷³时期一样,他们只是控制着自己军队占领的据点以及这些据点所能瞰制的周围地区;被分隔开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则依靠快速突击部队来维持;但快速突击部队的活动本身极不可靠,活动的地区越广,效果自然便越差。英军兵力确实不足,还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进一步证明:为了把财物从受起义威胁的基地运出来,英军只能靠西帕依来运送,而西帕依总是毫无例外地在半途起义,带着托付他们运送的财物逃之夭夭。从英国派出的部队即使最顺利也不可能在11月以前到达,同时从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抽调欧洲部队将更加危险,因为马德拉斯的西帕依第十团已经显露不满的征兆,所以,在整个孟加拉管区征收普通税的一切念头都必须打消,而瓦解的过程也只好听之任之。即使我们假定,缅甸人不会趁机行动,瓜廖尔的摩诃拉扎将继续支持英国人,指挥着印度最

^① 1857年7月15日《泰晤士报》第22733号。——编者注

精锐部队的尼泊尔统治者将保持平静，怀有不满情绪的白沙瓦不至于同不安分的山区部落联合起来，波斯的沙赫不会傻到从赫拉特撤退，²¹——即使这样，整个孟加拉管区仍然需要重新征服，整个英印军队仍然需要重新建立。这件大事所需的费用将全部落在英国人民的肩上。至于格兰维尔勋爵在上院提出的意见，说东印度公司⁶³能够依靠发行印度公债来筹措必要的款项，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可以从西北各省的骚乱局势对孟买金融市场的影响来做出判断。印度土著资本家立即陷于恐慌之中，大量款项被从银行提出，政府的有价证券几乎找不到买主，大规模贮藏财物的现象不仅在孟买，而且在它的郊区都开始出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17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8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阿本斯贝格

阿本斯贝格——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 1 200 人，相传曾为古罗马人的阿巴西努姆城。城郊有温泉，还有一座精美城堡的废墟。1809 年 4 月 20 日，波拿巴在阿本斯贝格城下与奥军会战，将奥军击败；奥军损失火炮十二门，士兵 13 000 人。这次胜利是兰茨胡特和埃格米尔会战¹⁷⁴胜利的前奏，并打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副 官

副官——军队中大小单位的指挥官的助理军官或助手。每个步兵营或骑兵团的指挥官通常都有一名副官；旅、师和军的指挥官以及总司令根据其指挥权的需要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官。副官的职责是传达长官的命令，监督执行这些命令，接受或汇集呈送长官的报告。因此，他所管理的多半是本军事单位的内部事务。他规定本单位各部分的值勤次序，下达每日命令；同时他又像是长官的秘书，草拟给分遣部队和上级机关的公文函件，把每天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加以综合，填写本部队的日志和统计表。目前，在较大的部队中通常都设有总参谋部派出的常设参谋部，由“参谋长”领导，参谋长行使副官的较高级的职能，而让副官只传达命令和调整本单位的内部勤务。但是，在这方面，职能的安排在不同国家的军队中大不相同，简直不可能作一个概括的说明。例如，就军长的副官的职责来说，没有两个国家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些名副其实的副官，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根据君主制度的需要，设有许多伴随君主的徒具虚名的副官长，他们除了侍奉君主一人以外，没有什么实际的职责，而且就连这些职责也纯粹是一种形式。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阿尔布埃拉

阿尔布埃拉——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的一个村庄和一条小河的名称，在巴达霍斯东南 12 英里。1811 年春天，英军包围了当时在法军手中的巴达霍斯，并对这座要塞进行极其猛烈的围攻¹⁷⁵。贝雷斯福德率领约 1 万名英军和德军以及 2 万名葡萄牙军和西班牙军，在阿尔布埃拉附近掩护围攻。5 月 16 日，苏尔特率领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安达卢西亚部队向他进攻。英军的右翼配置在一个圆形高地上，中路和左翼就在它的鞍形延伸部分。这块阵地前面有阿尔布埃拉河掩护。苏尔特立即看出这个圆形高地是瞰制整个阵地的制高点；所以他只在中路和左翼的对面据守，准备全力攻击英军的右翼。贝雷斯福德不顾军官们的反对，几乎把全部英军和德军配置在中路和左翼，于是，高地的防守就完全依靠西班牙的新兵了。所以，当苏尔特的步兵以密集的纵队向这个高地冲锋时，西班牙军很快就退却，英军的整个阵地立即处于被包抄的境地。在这紧急关头，贝雷斯福德多次拒不把英国或德国部队派往右翼，他手下的一名参谋^①自己出来承担责任，命令约 7 000 名英军从右翼进攻。他们在鞍形高地

① 亨利·哈丁。——编者注

的后面展开,用火力的击溃了法军最前面的几个营;当他们登上高地时,发现守在那里的是一些混乱的、没有空间可以展开的纵队。他们就向这些纵队推进,以展开的横队的火力杀伤密集的人群;最后,英军转入刺刀冲锋,法军向山下狼狈溃逃。这一最后的冲击使英军付出了兵员伤亡近五分之四的代价。但会战结局已定,苏尔特撤退了,不过,几天以后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也撤除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阿尔登霍芬¹⁷⁶

阿尔登霍芬——莱茵普鲁士的一座小城，位于从于利希到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公路旁。1793年3月1日奥地利军在科堡的指挥下战胜杜木里埃的部分法军，这次会战即以该地命名。杜木里埃在1792年占领比利时以后，打算入侵荷兰，在麦士河和鲁尔河之间留下7万人围攻马斯特里赫特和芬洛，并掩护这次围攻，同时他用余下的兵力从安特卫普攻入荷兰。麦士河上的军队不得不非常分散，掩护围攻的一些师驻扎在艾克斯拉沙佩勒、阿尔登霍芬和埃施韦勒的附近。科堡集中4万人，成二路纵队向后面两个据点推进；他绕过埃施韦勒附近的阵地，以正面攻击夺取了阿尔登霍芬的阵地，打得法军向艾克斯拉沙佩勒狼狈逃窜，并于次日占领了艾克斯拉沙佩勒。马斯特里赫特解围了，奥军前卫追击法军甚至追过了麦士河，并在通格尔附近痛击法军。逃散的法军各师只是在到达蒂勒蒙之后才集结起来，在那里等待杜木里埃。这样，联军进入比利时的道路就打通了。稍后，奥军在内尔温登附近又取得胜利，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征服。法军在阿尔登霍芬会战中和被追击时遭到重创，至少有1万人伤亡和被俘，另有1万人随后立即开了小差；大量的装备也落入奥军之手。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亚历山德里亚¹⁷⁷

皮埃蒙特的一个筑垒城市，位于博尔米达河和塔纳罗河的汇合处，距离波河数英里。1178年由米兰人建立，曾是抵御德国历代皇帝入侵的堡垒。在当代，自1848年和1849年战争¹⁷⁸以来，又重新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意大利抵御奥地利的一个国家要塞。尽管到本世纪初，该城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不值得重视，但在1657年，法国人却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把它攻克，1706年萨瓦亲王欧根也只是在粉碎对方的长时间抵抗之后才占领了它。¹⁷⁹就其现存的情况而言，这些防御工事的主要威力在于拿破仑在皮埃蒙特并入法国¹⁸⁰之后所增筑的部分。这是拿破仑建造的惟一的要塞。这些工事，第一次采用了（虽然不是全部采用）蒙塔朗贝尔的新的暗炮台体系来保护壕沟。拿破仑特别加强了主堡，这是一个筑有许多外围工事的六角棱堡工事，并在博尔米达河的对岸构筑有一座桥头堡。不久前，皮埃蒙特政府决定为要塞再增建一些工事，如果瓦伦扎附近的波河渡口能适当地加强，那么这个要塞就可能成为一个居高临下的广大设防阵地的指挥中枢。该城有1所高等学校，1所神学院，13座教堂，包括1座主教座堂，以及一些生产亚麻布、丝绸、呢绒和蜡烛的工厂。居民包括郊区在内有36 000人。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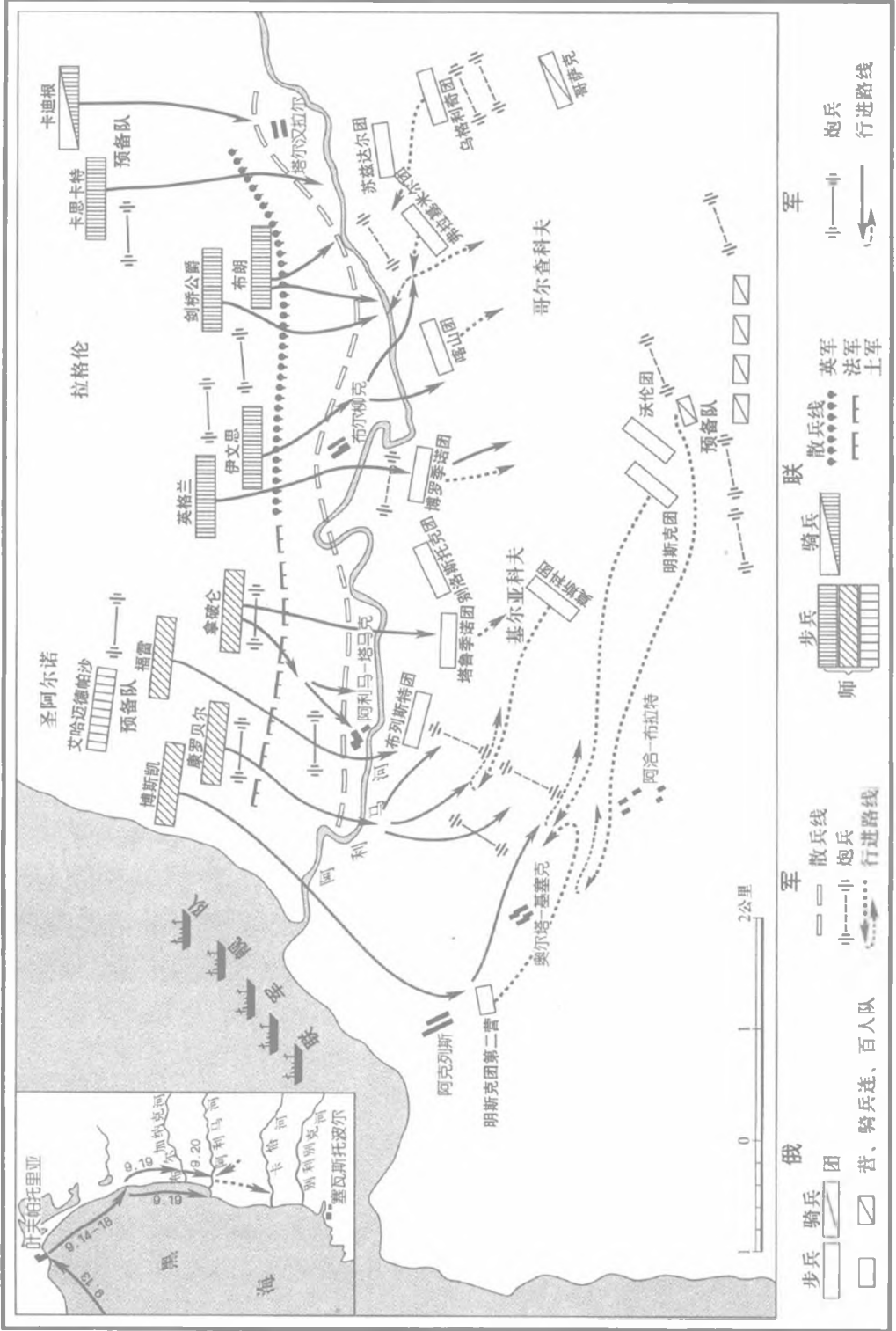
阿 利 马¹⁸¹

阿利马——克里木的一条小河，从巴赫奇萨赖城郊的高地向西流入叶夫帕托里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卡拉米特湾。河的南岸靠近河口一带地势陡峭，整个瞰制着对岸，在上次俄土战争³⁸中，被缅施科夫公爵选为防御阵地，以抗击联军在克里木登陆后的进攻。

缅施科夫指挥的军队有 42 个步兵营，16 个骑兵连，1 100 名哥萨克，96 门火炮，共 35 000 人。1854 年 9 月 14 日，联军共 28 000 名法军（4 个师）、28 000 名英军（5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和 6 000 名土军在阿利马河以北不远处登陆。联军炮兵的火炮和俄军的一样多——法军 72 门，英军 24 门。俄军阵地看来相当坚固，但是实际上有许多弱点。阵地的正面几乎宽达 5 英里，这对缅施科夫的为数不多的军队来说是太宽了。右翼没有任何依靠，而左翼（由于联军舰队的火力控制了海岸）不能把阵地伸展到海边，因而有同样的缺陷。联军的计划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制定的。他们打算以正面佯攻来吸引俄军，这时法军就在 5 个船队的掩护下迂回俄军的左翼，英军则在骑兵的掩护下迂回其右翼。

攻击是在 20 日发起的。这次攻击原定于拂晓开始，但是由于英军行动迟缓，法军不敢先行渡河。在法军的极右翼，博斯凯师渡过这

阿利马会战图 (1854年9月20日)



条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而过的河,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南岸陡坡,他们费力地把12门火炮也运上了台地。在博斯凯左边,康罗贝尔也率领他的师渡河,在高地上展开,这时拿破仑亲王的师清除了阿利马村的果园、葡萄园和房屋里的俄国散兵。所有这些攻击用了29个营的兵力,缅施科夫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上迎战的只有9个营,不久又增派了7个营。这16个营凭借40门火炮和4个骠骑兵连,要顶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法军的冲击,不久法军又得到福雷师留下的9个营的增援。这样,圣阿尔诺的全部军队,除了留作预备队的土军,都投入了战斗。结果很快就揭晓了。俄军渐渐支持不住,尽可能有秩序地退却了。就在这同时,英军开始攻击。大约在4时,在俄军阵地的左翼,博斯凯的火炮从台地顶端的齐射表明战斗真的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英军的散兵线向俄军的散兵线攻击。英军放弃了迂回俄军右翼的计划,因为俄军骑兵,不算哥萨克,也比英国骑兵多一倍,正在掩护右翼,甚至威胁英军的左翼。因此,拉格伦勋爵决定直接正面攻击俄军。他以布朗的轻步兵师和伊文思师为第一线猛攻俄军中路。剑桥公爵和英格兰将军的两个师组成第二线,而预备队(卡思卡特师)在骑兵的配合下紧跟着左翼。第一线展开了,攻击迎面的两个村庄,赶走俄军后,渡过了阿利马河。这里双方的说法不同。英国人明确地坚持说,他们的轻步兵师已到达俄军掩护重炮的胸墙,但随后被击退。而俄国人却断言,轻步兵师并没有渡过河,更不用说到达筑有胸墙的陡坡了。不管怎样,第二线是紧跟在第一线后面运动的;展开后必须再成纵队,以便渡过阿利马河并登上高地;后来它再次展开,在几次齐射以后发起冲锋。正是剑桥公爵的师(警卫部队和苏格兰高地兵团)援救了轻步兵师。伊文思运动缓慢,但没有被击退,所以在他后面的英格兰师也就不需要支援他。胸墙

被警卫部队和苏格兰高地兵团占领,俄军在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之后放弃了阵地。俄军的 18 个营在这里与同样数量的英军作战;英军比俄军每个营大约多 50 人,俄军则以炮兵的优势和阵地的坚固绰绰有余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然而素以杀伤力强大著称的英国步兵的火力,在这次战斗中特别猛烈。参战的大部分军队都装备了米涅式来复枪,其枪弹的火力很强,可以一下子杀伤整行人,对于俄军的长纵队是特别致命的。俄军步兵,除了 6 个营,全部投入了战斗,而没有希望挡住敌军如潮的攻势,于是退出战斗,在骑兵、轻炮兵和一小部分步兵预备队的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退却。英军在这次会战中的确打得比所有其他军队出色,但是他们以其惯用的那种笨拙的方式实行机动,展开,列成纵队,然后又完全不必要地在敌人的火力下重新展开,因而既丧失了时机,又损失了人员。这次会战的结果是:联军在俄军未得到增援以前完全控制了克里木的不设防地区,并且打开了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他们没有得益于前一种优势,却毫不迟疑地利用了后一种优势。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比时的一个近海城市，安特卫普省的省会，位于斯海尔德河北岸布鲁塞尔北面 26 英里和根特东北偏东 32 英里处。居民(1855 年)79 000 人。城市呈弓状，城墙似弓背，河流像弓弦。防御工事极其完备，包括主堡在内，绵延约 2.75 英里。五角形的坚固的主堡是阿尔瓦公爵于 1567 年建造的。安特卫普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它在 15 和 16 世纪时达到繁荣的顶峰，那时是欧洲的贸易中心，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各国船只川流不息(有一段时期在港口停泊的船只达 2 500 只之多)，据说居民曾达 20 万人。1576 年，该城曾遭到西班牙人的洗劫和焚烧。1585 年，它被帕尔马亲王亚历山大^①长时间围攻后占领。¹⁸²从那以后，它的贸易就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联合省份的其他城镇。1794 年，该城落入法国人手中。在比利时各省举行叛乱之后，1832 年法国热拉尔元帅经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围攻重新占领了它。¹⁸³安特卫普现在虽然已不像中世纪时那样重要，但时至今日其贸易和工业也完全不是无足轻重的。河流能航行最大的船只。拿破仑建造的大小船坞已改造成能够容纳 1 000 只船的宽阔

^① 亚·法尔奈泽。——编者注

的商业码头。发达的运河水道网使安特卫普能够进行广泛的内陆贸易：1846年，到这里来的船只达1 970只，吨位达286 474吨。该城同英国保持着经常的非常频繁的航运联系，最近又成为大批移民去美国的出发地。该城是欧洲最大的皮革市场之一。它的主要产品是黑丝绸和丝绒，还有棉织厂，麻布厂，生产花边、地毯、帽子、刀类制品的企业，以及制糖厂和造船厂。到目前为止，城市保存有许多壮观的古迹。大多数房屋很古老，但建筑坚固。有许多漂亮的公共建筑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大教堂，是早在15世纪奠基、至少经过84年的时间才完工的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建筑。另外还有三座著名的教堂，一座1583年建成的交易所，市政厅——一座国王驻跸安特卫普时的宫殿，以及汉撒城镇会堂。此外，城内还有一个绘画、雕塑和科学研究院，一个藏书15 000卷的公共图书馆，一个绘画陈列馆，藏有200幅珍贵的绘画，其中有许多是古代佛来米名家的杰作，还有一个植物园，以及各种学校、医院和救济院。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57年

7月23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

1857年7月28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昨晚在“死寂的下院”¹⁸⁴发表的三个小时的演说，如果不是去听，而是去读，也许会得多于失。一个时期以来，迪斯累里先生喜欢作庄严肃穆的演说，故意慢条斯理地字斟句酌，不动声色地平铺直叙。这虽然符合一个有望做大臣的人应不失体面这种特殊念头，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成犀利的隽语警句，而今他竟竭力要把隽语警句掩藏在枯燥无聊的官样文章中。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个耍弄匕首比挥舞长剑更熟练的演说家，最不应该忘记伏尔泰的警告：“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好。”^①

除了表明迪斯累里先生目前雄辩口才的这些技巧特点以外，他，自从帕麦斯顿执政以来，在议会的演说中总是尽量避免涉及现实问题。他发表演说不是为了他的提案被通过，他提出这些提案是为了给他的演说做准备。这些提案可以叫做自我否定的提案，因为就其

① 伏尔泰《浪子》序言。——编者注

内容来说,如果被通过了,对对方并无损失,如果被否决了,对提案人也无害处。其实,这些提案既不要求被通过,也不要求被否决,只不过要人们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既不是酸性的,也不是碱性的,而是天生中性的。发表演说并不表明就要行动,行动的假象却为发表演说提供了良机。当然,这也许是议会辩才的典范而完美的形式;但是,这种议会辩才的完美形式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议会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运,被列入令人生厌之物的范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则^①。政治演说也是如此。迪斯累里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可以在有益知识普及协会的小册子里发表,或者送给技工学校¹⁸⁵,或者作为有奖征文送交柏林科学院。他的演说对发表演说的地点、时间和由头持一种奇怪的无所谓的态度,这充分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也不符合其由头。在孟德斯鸠或吉本的书^②中,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章是可以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让它出自一个恰恰是以防止帝国衰落为己任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之口,那就非常荒谬了。的确,可以想像,一个有主见的演说家在感到自己已不可能影响事件的实际进程时,就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我们现代的议会里可以扮演一个既不失尊严,也不乏风趣的角色。已故的加尔涅-帕热斯先生——不是临时政府的加尔涅-帕热斯,而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有名的众议院议员——就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是迪斯累里先生,这个已失去作用的党¹⁸⁶的公认领袖,甚至会把这方面的成功也认为是极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编者注

②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和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编者注

大的失败。印度军队的起义无疑提供了一个表演演说技巧的良机。然而,且不说迪斯累里先生论述这个题目的方式是多么枯燥无味,作为他要发表演说的借口的提案,其实质究竟何在呢?根本就没有提案。他佯装渴望看到两个官方文件,对其中一个文件是否存在,他并不完全肯定,至于另一个文件,他则肯定与他所谈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的演说和他的提案没有任何关联可言,一定要说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他的提案引出了一篇无对象的演说,而对象本身又不值得为它发表一篇演说。可是,作为英国最杰出的在野政治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迪斯累里先生的这篇演说应该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我很乐意用他本人的话来对他的“关于英印帝国的衰落的见解”作一番简短的分析:

“印度的骚乱是兵变还是民族起义?军队的行为是某种突然冲动的后果呢还是有组织的阴谋的结果?”

迪斯累里先生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肯定说,直到最近十年间,不列颠帝国在印度都是采用“分而治之”的老原则,但是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尊重印度各个民族,不干涉其宗教,保护其土地所有权。西帕依⁶⁷军队曾作为一个安全阀,吸收了国内的一些动乱分子。但是近几年来,治理印度采用了一个新原则——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通过强行消灭土著王公的权力,破坏继承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现的。1848年,东印度公司⁶³的财政十分困难,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这时公布了参事会¹⁸⁷的一份议事录,其中几乎毫不掩饰地宣布一项原则:要增加收入,惟一方法就是通过排挤土著王公来扩大英国的地盘。因此,萨达拉公国的拉甲¹⁸⁸死后,东印度公司不承认他收养的继承人,却把该公国并入自己的

图。从此，凡土著王公死后无嫡嗣时，都采用这种兼并制度。过继收养原则这一印度社会的基石，政府概不承认。因此，从1848年至1854年，有十几个独立王公的公国被强行并入不列颠帝国。1854年贝拉尔公国被强行吞并，其领土有8万平方英里，人口400万至500万，并拥有大量宝藏。迪斯累里先生最后提到对奥德的强行兼并，这次兼并使东印度政府不仅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且与伊斯兰教徒发生冲突。然后，迪斯累里先生继续说明，最近十年间，这个新的管理制度怎样破坏了印度的继承关系。

他说：“过继收养法的原则不是印度的王公和公国的特权，在印度斯坦，这适用于每个拥有地产并信仰印度教的人。”

下面，我再引用一段话：

“为王公贵族服公务而拥有土地的大领主（或称札吉达尔¹⁸⁹）和拥有土地但不缴纳土地税的伊纳达尔¹⁹⁰（相当于我们的自由农¹⁹¹——这么说也许不大确切，但至少比较通俗易懂），是印度人数最多的两类人，这两类人如果没有嫡嗣，一向都根据这个原则来获得遗交其家产的继承人。由于萨达拉被兼并，这两类人都受到了触动，我已经提到的十个较小的但独立的王公的领地被兼并，也使他们受到触动，而当贝拉尔公国被兼并时，他们不仅受到触动，而且十分惊恐不安了。谁能平安无事呢？在全印度，那些没有亲生骨肉的领主，那些自由农，谁能高枕无忧呢？（鼓掌欢呼）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担心完全是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引起的。在印度已开始第一次收回札吉和伊纳。当然，以前也有过调查所有权问题的不当做法，但是谁也没料到会废除过继收养法；所以，任何当局，任何政府，都未能收回那些没有嫡嗣的所有者手中的札吉和伊纳。这是一个新的财源；但是，就在这一切影响到上述这两类印度教徒的心态的时候，政府又采取了一个步骤来破坏继承关系，对此，我现在必须请下院加以关注。读过提交1853年委员会的那份证词之后，下院无疑已经知道，印度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不纳土地税。在印度免缴土地税比在我国免缴土地税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整个说来，在印度土地税就是国家的全部税收。

很难查清这些土地赏赐的由来，但是毫无疑义，土地赏赐是远古以来就有

的。土地赏赐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极为流行的私人不动产,还有属于寺院和教堂的大量免纳土地税的土地赏赐。”

英国总督^①借口有人用欺诈手段要求免税,决定调查印度地产所有权问题。根据1848年规定的新办法,

“这一所有权问题调查计划立即被欣然接受,因为它可以证明政府强大有力,执行机构精明强干,可以成为国税的丰富来源。因此,在孟加拉管区和邻近地区成立了一些地产所有权问题调查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在孟买管区也成立了,还命令在新设省区进行调查,以便在调查结束后,这些委员会能取得应有的成效。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最近九年来,在印度,这些免税地产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一直在大规模进行,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迪斯累里先生估计,每年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收回的地产在孟加拉管区不少于50万英镑,在孟买管区不少于37万英镑,在旁遮普不少于20万英镑,等等。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财产的方法,它还停止向土著大贵族支付原先约定的津贴。

迪斯累里先生说:“这是一种新的没收方式,而其规模却最大,最惊人,最令人气愤。”

接着,迪斯累里先生谈到了对土著人宗教的干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详述。根据前面所说的一切,他得出的结论是:印度目前的骚乱不是兵变,而是民族起义,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在这篇洋洋洒洒演说的最后,他劝告政府放弃目前的侵略政策,注意改善印度的国内状况。

^① 詹·达尔豪西。——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509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鹿 砦¹⁹²

鹿砦——军事用语，指用砍倒的树木构筑的障碍物，经常用于简单的山地战中。在紧急情况下，把树纵向放倒，树枝朝外，以阻碍敌人前进，树干则用做防御者的胸墙。如果事先构筑鹿砦，例如当作防守山隘的手段，就要把粗大树枝去叶削尖，把树干埋进土里，再把树枝编成一种类似拒马^①的东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29 日—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① 旧时用以阻止骑兵进攻的钉有尖头钉和带刺铁丝的防御架，也称铁蒺藜。——编者注

卡·马克思

来自印度的消息¹⁹³

1857年7月31日于伦敦

最近一班印度邮件带来了6月17日为止来自德里的消息以及7月1日为止来自孟买的消息，证实了最悲观的预测。当督察委员会¹⁹⁴主席弗农·斯密斯先生最初把印度起义的消息通知下院的时候，他满有把握地宣称，下一班邮件必将带来德里已被夷为平地的消息。邮件来了，可是德里还没有“从历史上被抹掉”。曾经有人说，炮兵纵列最早要在6月9日才能到达，因此对这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的攻击必须推迟到这个日子。6月9日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6月12日和15日倒是发生了一些事件，不过情况恰恰相反，不是德里遭到英国人的轰击，而是英国人遭到了起义者的攻击，尽管起义者的屡次出击都被打退了。这样，德里的陷落又再度延期，不过现在已不再说是由于缺乏攻城炮，而是说巴纳德将军决定等待援军，因为他的兵力——约3 000人——根本不足以攻占这座由3万名西帕依⁶⁷扼守并拥有充足军需品的古都。起义者甚至在阿季米尔门外建立了一个营地。在此以前，所有的军事著作家一致认为，一支3 000人的英国部队，完全足以击溃拥有3万或4万人的西

帕依军队；否则，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英国还怎么能“再度征服”印度呢？^①

目前，在印度的英军实际上已达3万人。在今后半年内从英国最多能派出20 000或25 000人，其中6 000人要补充在印度的欧洲军队，其余的18 000或19 000人，由于在途中遭到的损失，由于气候条件而遭到的损失以及其他原因，剩下来能够上战场的将减少到约14 000人。英军必须下决心在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迎战哗变者，要不然就根本不同他们作战。然而，为什么英军在德里周围集结得这么慢，这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在目前这个季节，炎热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查理·纳皮尔爵士那个时候并不是如此，那么过几个月等到欧洲部队抵达后，雨季将更有理由成为按兵不动的借口了。不应当忘记，目前的这场哗变实际上在1月就已经开始，因此英国政府早就得到必须随时准备作战的警告了。

尽管英军包围了德里，但西帕依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把德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就产生了很自然的后果。哗变蔓延到加尔各答的大门前，50个孟加拉团已不复存在，孟加拉军已成为昔日的神话，而分散在广大地区的、被围困在孤立据点上的欧洲军队，不是被起义者所杀，就是处于拼命困守的境地。在加尔各答，在一个据说是周密策划的奇袭政府所在地的计划被揭露，驻扎在当地的土著部队被解散之后，基督教居民组织了一支志愿队。在贝拿勒斯，企图把一个土著团缴械的做法，遭到了锡克教徒²³部队和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的抵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它表明，锡克教徒也和伊斯兰教徒一样，已在和婆罗门¹⁷¹一致行动，这样，所有不同的群体正在迅速地结

^① 1857年7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740号社论。——编者注

成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英国人曾坚信，西帕依军队是他们在印度的主力。现在，他们突然之间清楚地看到，正是这支军队对他们构成了危险。不久以前，在辩论印度问题时，督察委员会主席弗农·斯密斯先生还说，

“完全可以断言，土著王公和起义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①

事隔两天，同一个弗农·斯密斯却不得不公布一份紧急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不祥的话：

“据截获的文件证明，前奥德国王^②与阴谋活动有牵连，已于6月14日被押入威廉堡¹⁴⁸，其随从被解除武装。”

不久以后还会出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所认为的兵变，实际上是民族起义。

英国报刊装出十分满意的样子，相信起义还没有蔓延到孟加拉管区以外，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的忠诚丝毫不容置疑。但是，这种对局势的乐观看法似乎同最近一班邮件带来的关于奥兰加巴德爆发了尼赞^③的骑兵哗变的消息正相矛盾。奥兰加巴德是孟买管区辖属的奥兰加巴德区的首府，实际上，最近一班邮件是宣告孟买军已开始起义。诚然，奥兰加巴德的哗变据说已被伍德伯恩将军立即镇压下去了。但是，不是听说密拉特的哗变也被立即镇压下去了吗？勒克瑙的哗变不正是在被亨·劳伦斯爵士镇压下去后，过了两个星期，又以

① 弗·斯密斯(1857年7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7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744号。——编者注

② 瓦吉德-阿里沙赫。——编者注

③ 海得拉巴公国的统治者。——编者注

更大的声势重新爆发了吗？难道不记得，印度军队中发生哗变的最初消息是与治安已经恢复的消息同时传来的吗？尽管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主要是由属于下等种姓的人组成的，但各个团都有近百个拉杰布特人¹⁷⁰——这个数目完全足以构成与属于上等种姓的孟加拉军起义者相联系的环节。有人宣布，旁遮普平静无事，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获悉，“6月13日在菲罗兹布尔执行了军法处决”，沃恩的部队——旁遮普第五步兵团——“因追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出色行动”而受到褒奖。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平静”。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7月
31日

载于1857年8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9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阿富汗¹⁹⁵

阿富汗——亚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位于印度的西北，介于波斯和印度之间，而在另一方向上则介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之间。它曾包括波斯的呼罗珊和科希斯坦两省，以及赫拉特、俾路支、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目前境内居民约 400 万。阿富汗的地势极不平坦：有高原和大山，有盆地和深谷。像所有多山的热带国家一样，气候差异很大。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峰终年积雪，而盆地的温度可高达 130 度^①。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炎热，但是一般说来气候比印度凉爽。尽管冬夏之间和昼夜之间温度相差很大，但是全国气候总的说来是有益于健康的。主要的疾病有热病、黏膜炎和眼炎。有时天花肆虐。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沙漠的绿洲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枣椰树，炎热的盆地出产甘蔗和棉花，在 6 000 或 7 000 英尺高度以下的山坡梯田上盛产各种欧洲水果和蔬菜。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常有熊、狼和狐狸出没，而狮、豹和虎等则栖息在适于它们生活习性的地方。同时也不乏对人类有用的动物。这里有良种波斯羊即肥尾羊。有高大的良种马。骆驼和驴当做驮畜使用；

^① 这里是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 54.4 度。——编者注

山羊、狗和猫都很多。除喜马拉雅山脉的延伸部分兴都库什山脉之外，在西南部还有苏莱曼山脉，在阿富汗和巴尔赫之间横贯着一条欧洲人不太知晓的帕鲁帕米苏斯山脉。河流不多，最大的是赫尔曼德河和喀布尔河。它们都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喀布尔河向东流，在阿塔克附近注入印度河；赫尔曼德河向西流，经过锡斯坦地区注入济里盐沼。赫尔曼德河的特点是，它像尼罗河一样，每年泛滥，使两岸的土壤肥沃，而在泛滥地区以外则是沙漠。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是首都喀布尔、加兹尼、白沙瓦和坎大哈。喀布尔是喀布尔河上的一座美丽城市，位于北纬 34 度 10 分，东经 60 度 43 分。城内的房屋是用木材建造的，整洁而舒适，城市四周有绮丽的园圃，景色引人入胜。喀布尔被村庄所包围，处于丘陵环抱的一片广阔平原的中央。城中的主要古迹是巴卑尔皇帝的陵墓。白沙瓦是一个有 10 万居民的大城市。加兹尼是自古闻名的城市，一度为马茂德大苏丹的都城，如今已失去昔日的光辉，显得破旧不堪。在离加兹尼城不远的地方有马茂德的陵墓。坎大哈建立较晚（1754 年），坐落在一个古城的旧址上，有几年曾是首都，1774 年政府所在地迁往喀布尔。据估计，坎大哈有 10 万居民。离城不远有该城的奠基人艾哈迈德沙赫的陵墓，这是一处神圣的庇护所，甚至国王也不能捉拿躲藏在陵墙里面的犯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政体是君主制，但是国王对其民性剽悍狂妄的臣民的权威具有个人性质，因而很不稳定。王国划分为若干省，每个省都由国王的代表管辖，征收捐税并把税款汇寄京都。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富有独立精神的民族。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而忌讳手工业和商业，不屑一顾地把这些行业交给印度人和其他城镇居民去干。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种刺激，是对他们单调而辛苦的

营生的调剂。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¹⁹⁶，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一种封建的统治。他们对统治深恶痛绝，爱好个人的独立自主，仅此一端，就使他们未能变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这种违反常规，反复无常，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往往心血来潮，闻风而动，容易受一些能巧妙地煽动其情绪的政治阴谋家的蛊惑。两个主要的部落是一贯相互敌视的都兰尼人和吉尔采人。都兰尼部落比较强大；由于占有优势，他们的艾米尔即可汗就成了阿富汗的国王。国王的收入大致相当于1 000万美元。他只在自己的部落中享有无上权威。兵员主要由都兰尼部落提供；军队的其余部分由其他的克兰补充，或者由那些为了薪饷或抢劫而来服役的军事冒险者补充。在城市里司法权由卡迪^①行使，但是阿富汗人很少求助于法律。可汗握有惩罚甚至生杀予夺之权。报杀亲之仇是氏族的义务。然而，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除非受到挑衅；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哪怕是一个使用计谋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其他危险。阿富汗人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但是他们并不执拗狭隘。什叶派和逊尼派²⁴之间联姻通婚是常见的现象。

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²²和波斯人的统治。在英国人来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帖木儿和纳迪尔沙赫，都走过这条道路。1747年，纳迪尔死后，从这个军事冒险家学会兵法的艾哈迈德沙赫，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辉煌繁荣的顶峰。他属于萨多扎伊氏族，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占有已故首领

① 卡迪是根据伊斯兰教教规进行宗教审判的法官。——编者注

在印度掠夺的东西。1748年他终于把莫卧儿总督逐出喀布尔和白沙瓦,然后渡过印度河,快速地侵占旁遮普。他的王国从呼罗珊扩展到德里,他甚至同诸马拉塔公国¹⁹⁷进行较量。但是这些伟大的军事业绩并没有妨碍他关心各种和平艺术的发展,他享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声誉。他于1772年去世,把王位传给儿子帖木儿,但是帖木儿不胜重任。他离开了由他父亲建造的、几年内已变成富裕而人口稠密的中心的坎大哈城,把政府所在地迁回喀布尔。在他统治期间,曾被艾哈迈德沙赫的铁腕遏止的部落间的内部纠纷又死灰复燃。1793年帖木儿去世,由泽曼继位。这位国君打算巩固伊斯兰教在印度的统治,这个严重威胁英国属地的计划,引起极大的关注,因此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被派往边境,阿富汗一旦有所行动就予以制止,同时开始同波斯谈判,有了波斯的援助,阿富汗人就会腹背受敌。但是这些预防措施用不着了;泽曼沙赫苦于应付国内的密谋和混乱,他的庞大计划胎死腹中。国王的兄弟马茂德举兵攻入赫拉特,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遭到失败,逃往波斯。泽曼沙赫当初获得王位,曾得力于以萨腊弗腊兹可汗为首的巴拉克查依氏族的支持。泽曼任命一个不孚众望的人当大臣,引起了他过去的拥护者的嫉恨,他们策划了一个密谋;密谋败露,萨腊弗腊兹被处死。接着,马茂德被密谋者请回,泽曼受到监禁并被挖去双目。为了反对都兰尼人支持的马茂德,吉尔采人推举了舒扎沙赫,舒扎沙赫当了一个时期的国王,但是主要由于自己的拥护者的背叛,最后遭到了失败,不得不藏身于锡克教徒²³中。

1809年拿破仑派加当将军去波斯,打算怂恿沙赫^①入侵印度,而

① 费特赫-阿里。——编者注

印度政府也派代表^①去觐见舒扎沙赫,策划对抗波斯。这时,朗吉特·辛格已经确立了政权,而且声名远扬。他是锡克教徒的首领,凭着自己的才干使旁遮普脱离阿富汗人而独立,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称摩诃拉甲(大拉甲)¹⁸⁸,使得英印政府不得不看重他。篡位者马茂德注定不能久享胜利之福。他的大臣法特赫可汗动摇于马茂德和舒扎沙赫之间,在野心和眼前利益的驱使下,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他被国王的儿子卡姆朗捉住,双目被挖,后来被残酷处死。这位被害大臣的强大家族誓为死者复仇。傀儡舒扎沙赫再次被推上台,马茂德被逐。但是舒扎沙赫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不久即被废黜,由他的另一个兄弟继位。马茂德逃到赫拉特,继续统治这个地区,1829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卡姆朗继位统治这个地区。这时巴拉克查依氏族获得了最高权力;它的代表人物彼此划分了地盘,但是由于民族习性,内讧不休,只是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才联合起来。有一个兄弟穆罕默德可汗统治白沙瓦城,并为此向朗吉特·辛格纳贡;另一个兄弟统治加兹尼城,还有一个兄弟统治坎大哈;在喀布尔,执掌大权的是氏族中最有实力的多斯特-穆罕默德。

1835年,亚历山大·伯恩斯上尉被派到这位王公那里当使节,这时俄国和英国正在波斯和中亚细亚彼此钩心斗角。他向多斯特建议缔结同盟,这正是多斯特求之不得的;但是英印政府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却不提供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与此同时,波斯人于1838年在俄国人的帮助和劝说下,包围了通向阿富汗和印度的要地赫拉特,一位波斯代表和一位俄国代表来到喀布尔,多斯特由于英国人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终于被迫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建议。伯恩斯

^① 蒙·埃尔芬斯通。——编者注

离开了喀布尔，于是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他的秘书威·麦克诺顿的影响下，决定惩罚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他本人迫使多斯特采取的。他决定废黜多斯特，另立当时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英国人同舒扎沙赫和锡克教派订立了一项条约；这位沙赫开始招募军队，一支由英国人出钱、英国军官指挥的英印军队在萨特利杰河地区集结。麦克诺顿以伯恩斯为助手，作为驻阿富汗使节随军出征。而这时波斯军队已经从赫拉特撤围，这样，干涉阿富汗事务的惟一有力的借口已不存在。尽管如此，1838年12月英军仍然开进信德，强使该地区屈服，并征收军税以供养锡克教徒和舒扎沙赫¹⁴³。1839年2月20日英军渡过印度河。他们约有12000名士兵和4万多名随营人员，此外还有沙赫的新兵。3月，英军越过博兰山口；当时粮秣已感不足，骆驼成百地死亡，大部分辎重都损失了。4月7日，英军进入霍贾克山口，未遇抵抗就越过了山口，4月25日，进入已被阿富汗的王公们即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们所放弃的坎大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指挥官约翰·基恩爵士将诺特指挥的一个旅留驻坎大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向北进发。阿富汗的坚不可摧的要塞加兹尼于7月22日被攻占，因为一个投敌分子提供了所有城门中只有喀布尔门没有筑防栅的情报，于是城门被炸开，要塞在强攻下被占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招募的军队在这次惨败后立即溃散，8月6日，喀布尔也打开了城门。舒扎沙赫以应有的仪式登上了王位，但是实权仍在麦克诺顿的手中，他也用印度的国库支付舒扎沙赫的一切费用。

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调回。但是阿富汗人决不甘心受欧洲异教徒的统治，1840年至1841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英印军队不得不经常调动。然而麦克诺顿宣

称,阿富汗社会的情况通常就是如此,并且向英国报告,一切情况良好,舒扎沙赫的政权也已趋于巩固。英国军官和其他派驻官吏的警告都没有用。1840年10月,多斯特-穆罕默德向英国人投降,并被解往印度;1841年夏季的多次起义都被顺利地镇压了;10月,被任命为孟买总督的麦克诺顿,打算率领另一批部队开赴印度。可是这时突然起了风暴。对阿富汗的占领每年要印度国库花费125万英镑。必须支付驻阿富汗的16000名英印军队和舒扎沙赫军队的薪饷开支,还要加上在信德和博兰山口的3000名军队的费用;舒扎沙赫的帝王般的豪华生活费用、他的官员们的薪俸以及他的宫廷和政府的全部费用,均由印度国库开支;最后,津贴或者确切些说收买阿富汗的首领们,使他们不要惹麻烦,这一笔费用也从同一来源中支付。有人对麦克诺顿说,花费这么多的钱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他试图紧缩开支,但是惟一可行的削减费用的办法就是停止对首领们的津贴。但在他试行这项措施的那一天,首领们就策划了一个旨在消灭英国人的密谋,这样,麦克诺顿本人就帮助了各支反叛力量联合起来,而在此以前这些力量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是单独进行的,不统一的,互不协调的;不过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这时阿富汗人对英国人统治的仇恨已达到了顶点。

驻喀布尔的英军是由埃尔芬斯通将军这个身患痛风病、毫无能力、优柔寡断的老头子指挥的,他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部队占据的是一块类似营垒的地方,面积很大,守军几乎不足以防守垒墙,更不用说派部队到开阔地作战了。工事极不完善,壕沟和胸墙可以纵马跨越。尤有甚者,兵营几乎处于瞰制营垒的邻近高地的火枪射程之内;在整个部署中更荒唐的是:所有粮秣和药品的储备都放在离兵营有一段距离的两个独立堡垒内,而且在它们同营垒之间隔着一些有

围墙的园圃和另外一个未被英军占领的小堡垒。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卫城本来可以作为整个军队的一个安全的、极好的冬季驻扎地，但是为了迎合舒扎沙赫的心意而未被占领。1841年11月2日，起义爆发了。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城内住宅遭到袭击，他本人被杀。这个英国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义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声势大震。埃尔芬斯通束手无策，盲目地听从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意见，不久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拿破仑曾用三个词概括了这种状况：命令，反命令，混乱。甚至这时还没有去占领巴拉希萨尔。只派了几个连去对付几千名起义者，当然被击溃了。这就更使阿富汗人越战越勇。11月3日，他们占领了靠近兵营的一些堡垒。9日，存放军需品的堡垒被阿富汗人占领（守军只有80人），这样，英军就势必要忍饥挨饿了。5日，埃尔芬斯通已经提出宁愿出一笔钱以换取不受阻碍地撤出该国。实际上到11月中旬，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军心已经非常涣散，不论欧洲兵或是西帕依⁶⁷都已经无法同阿富汗人进行野战。于是，开始进行谈判。在这过程中，麦克诺顿在一次与阿富汗首领们的谈判中被杀。这时已经遍地冰雪，粮秣难以为继。1月1日终于签订了投降书。全部现金19万英镑必须交给阿富汗人，此外，还签署了14万英镑的期票。除6门六磅炮和3门山炮外，全部火炮和弹药都留下了。英军必须全部撤离阿富汗。首领们答应保证安全通行，提供粮秣和驮畜。

1月5日英军开始撤退，计有4500名士兵和12000名随营人员。行军不久之后就毫无秩序可言了；士兵与随营人员混杂在一起，出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使得任何抵抗行动都成为不可能。寒冷、冰雪以及粮秣不足，就像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但是使英国人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们相当远的哥萨克，而是装备有远

射程火绳枪和占据着每一个高地的愤怒的阿富汗狙击手。签订投降书的那些首领是不能而且也不愿约束这些山地部落的。小喀布尔山口成了几乎是英军全军的坟墓，它的一小股残余部队，不到 200 名欧洲兵，被歼灭在贾格达拉克山口的入口处。只有布赖登医生只身逃到贾拉拉巴德，讲述了经过情况。许多军官被阿富汗人擒获，作了俘虏。赛尔指挥的旅一直坚守贾拉拉巴德。人们要求他投降，但他拒绝退出这个城市，诺特在坎大哈也是这样。加兹尼被攻陷；在这个城市里连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火炮的人都没有，而守军中的西帕依早已受不了这里的气候了。

这时，边境上的英国当局得到喀布尔惨败的消息，立即在白沙瓦集结部队准备去援救在阿富汗的几个团。但是运输工具不足，西帕依又大量染病。1842 年 2 月，波洛克将军接任指挥官，3 月底他得到了新的增援。于是他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前往贾拉拉巴德解救赛尔，但是赛尔在几天以前已在该地把包围他的阿富汗军队完全击败。新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命令英军撤退；但诺特和波洛克都借口缺乏运输工具而婉言拒绝服从。到了 7 月初，印度舆论终于迫使埃伦伯勒勋爵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英军的民族荣誉和威信；因此他批准从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同时向喀布尔进军。到了 8 月中旬，波洛克和诺特彼此商定了作战计划，8 月 20 日波洛克向喀布尔进发，到达了甘达马克，并于 23 日击溃阿富汗人的一支部队；9 月 8 日，夺取了贾格达拉克山口，13 日在泰辛附近击溃了敌人集结的部队，15 日在喀布尔城下扎营。与此同时，诺特于 8 月 7 日离开坎大哈，率领他的所有部队向加兹尼进发。经过几次小的交战之后，他于 8 月 30 日击溃阿富汗人的一支大部队，9 月 6 日占领敌人放弃的加兹尼，破坏了工事和城市，在阿利丹附近阿富汗人的一个坚固阵地上，又一次击

败阿富汗人,9月17日兵临喀布尔城郊,在这里波洛克立即同他建立了联系。早在这以前,舒扎沙赫已被一个首领杀害,从那时起阿富汗已经没有真正的政府;名义上的国王是他的儿子法特赫·琼格。波洛克派一支骑兵去营救喀布尔的被俘人员,但是后者已经买通看守人,所以他们在中途与部队相遇。为了报复,英军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场,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许多居民。10月12日英军放弃喀布尔,经过贾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开往印度。法特赫·琼格处于绝境,就跟随英军而去。这时,多斯特-穆罕默德被释放,返回自己的王国。英国人在阿富汗扶植傀儡君主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7 年
7月—8月10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军队¹⁹⁸

军队——国家为进行进攻性或防御性战争而保持的有组织的武装人员的集团。关于古代的军队，我们有比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军队是埃及军队。它的光荣时代正值拉美西斯二世(塞索斯特里斯)统治时期；在其统治时期的许多古迹上留下的记述其功业的绘画和碑文，是我们了解埃及军队状况的主要资料来源。埃及军队分为两级：赫尔莫提布和卡拉西尔；在其鼎盛时期前者有16万人，后者有25万人。这两级大概完全是依年龄或服役时间长短而分，所以在一定的年限后，卡拉西尔就转为赫尔莫提布或转为后备兵。整个军队分驻在各个军屯内，每个军人都有一大块土地作为对他服役的报酬。这些军屯多位于这个国家的低地^①，设置在这里是为了预防亚洲邻国的攻击；只有少数军屯设于尼罗河上游，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不是很可怕的对头。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是它的弓箭手。此外，军队还有使用不同武器、按武器类型分编为营^②的各种步兵队：矛队、

① 主要指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开罗南郊的地区。——编者注

② 恩格斯用营(battalion)这个词称呼古代埃及步兵的战术单位。——编者注

刀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步兵有许多战车支援，每辆战车上有武士二人：一名驾车，一名射箭。在古迹中未见描绘骑兵的画。惟一的一幅描绘骑马人的图画被认为属于罗马时代。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埃及人只是从他们的亚洲邻国学会骑马和使用骑兵的。后来，他们有了许多骑兵，像古代的一切骑兵那样在步兵的两翼行动，这是可以肯定的，对此古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埃及人的护身器具包括不同材料制成的盾牌、头盔、胸甲或锁子甲。他们攻打城堡的方法有许多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的方法和计谋。他们有龟甲盾¹⁹⁹或攻城槌、护棚和云梯；加·威尔金森爵士认为他们还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并善于挖掘地道，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①。从普萨美提克时代起，埃及就拥有一支希腊雇佣兵，他们也屯田于下埃及。

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为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大片地区而征战一千多年的亚洲军队最早的典型。在这里和在埃及一样，各种古迹也是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步兵装备看来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攻防武器通常都制造较好，而且外表比较美观。此外，这里的武器种类更多，因为这个帝国幅员辽阔。主要的武器是矛、弓、刀剑和匕首。在绘画中，薛西斯的军队中的亚述人也是手持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美观）、毡质或皮质的锁子甲和盾牌。战车依然是军队的重要部分；战车载二人，驭手须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画面中许多战车兵都披着长的锁子甲。此外还有骑兵，我们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骑兵。在最早的雕塑品上，骑

① 约·加·威尔金森《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1837年伦敦版第1卷第67—68页。——编者注

手是骑在光秃的马背上,后来才采用一种像衬垫那样的东西。在一件雕塑品上可以看到像现今东方所使用的那种高马鞍。这些骑兵同波斯人的骑兵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骑兵几乎毫无区别,是一种轻装的、非正规的骑兵,冲锋时乱哄哄一拥而上,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击退,但是对于已经混乱或溃败的军队却有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画面中,骑兵列于战车兵之后,后者看来是一个贵族兵种。步兵战术在部队的常规运动和队形展开方面看来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者是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者是位于后列,第一列和第二列的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在围攻要塞时,他们肯定已经会使用活动碉楼和挖掘地道。按《以西结书》中的一段话^①也许可以断定,他们为了瞰制被围的城堡,曾构筑一种类似土堤或土岗的东西,它们可以视为罗马堡垒的简陋的雏形。他们的活动碉楼和固定碉楼也筑得和被围要塞的墙一样高,或者更高,以便瞰制要塞。他们也使用攻城槌和护棚;他们的军队人数众多,所以能够把整条河流改道,以便接近所攻击的地方的薄弱部,或利用干涸的河床,作为进入要塞的通路。巴比伦人的军队似乎和亚述人的军队差不多,但是没有具体的详细材料。

波斯帝国的伟业归功于它的奠基者,即现今法尔塞斯坦这个骑手之乡的尚武的牧民,在这里骑兵一开始就居于支配地位,而且从那时起直到不久前采用现代欧洲式的训练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大流士·希斯塔斯普曾建立一支常备军来控制被征服的各省,防止各省的总督即民政长官的频繁的叛乱。这样,各省都驻有守备

^①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第21章第22节和第26章第8节。——编者注

部队,由一名特派长官指挥;此外,各筑垒城市也驻有分遣部队。各省负责供养这些部队。这支常备军中还包括国王的警卫部队——1万名精选的步兵(敢死队, Athanatoi);他们披着金碧辉煌的盔甲,行军时后面跟随着一长列车辆载着他们的妻妾和仆役,还有一队骆驼载运粮秣;此外,还有1000名持戟手、1000名骑兵卫队和许多战车,有些战车还备有尖叉。大规模远征时,这些兵力尚不敷使用,还要在帝国各省普遍征兵。这些各色各样的队伍组合成一支真正的东方式军队,包括在武器和作战方法上大不相同的各种部队,还有庞大的辎重队和无数的随营人员。我们认为,像希腊人所估计的那样,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员。士兵按不同的民族,分别武装以弓、标枪、矛、刀剑、狼牙棍、匕首、投石器等。各省的部队有各自的指挥官;据希罗多德说,这些部队似乎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每十人组成的战斗单位就有一名军官来指挥。^①大的部队或军队侧翼通常由皇亲国戚指挥。在步兵中,由波斯人和其他雅利安族人(米甸人和巴克特利亚人)组成精锐部队。他们装备有弓、中等长度的矛和短剑;头上缠着类似头巾的东西作为防护,身穿铁页甲;盾大部分是用柳条编成的。但是,这些精锐部队同波斯的其余步兵一样,即使遇到小股的希腊部队,也总是遭到惨败。这群动作迟钝的乌合之众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早期的方阵只能作消极的抵抗,马拉松会战¹⁶⁰、布拉底会战¹⁶²、米卡莱角会战²⁰⁰和温泉关会战¹⁶¹就是明证。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在波斯军队中的战车,在极为平坦的地形上对付像波斯步兵本身那样的乌合之众可能还有用,但对付希腊人密集的长矛手或者对付利用起伏地形作战的轻装部队,就毫无用处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7卷第81章。——编者注

了。一点小的障碍就挡住了战车。交战时马匹惊驰,不服驾驭,反而践踏了自己的步兵。至于骑兵,在这个帝国的早期也很少有证据能说明其卓越不凡。在适于骑兵作战的马拉松平原上,波斯人有1万名骑兵,但是没能冲破雅典人的阵列。在较晚的时期,骑兵在格拉尼库斯会战²⁰¹中大显身手,他们排成单列,突然袭击从浅滩涉水登岸的马其顿纵队的先头部队,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把他们击退了。骑兵就这样在很长时间内成功地顶住了托勒密指挥的亚历山大军队的前卫,直到主力部队到达,轻装部队在其侧翼机动时为止,由于没有第二线部队或预备队才不得不退却。但是在这个时期,波斯军队有所加强,因为注入了希腊成分,也就是说,吸收了一些希腊雇佣军,这是国王在薛西斯死后不久雇来的;麦姆农在格拉尼库斯会战中采用的骑兵战术完全不是亚洲式的,即使没有确凿的史料,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把它归之于受了希腊的影响。

希腊的军队是我们在军队的具体组织方面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第一支军队。可以说,战术史,特别是步兵战术史,是从他们开始的。暂且不说荷马所描写的^①希腊英雄时代的军事制度,当时还没有骑兵,显贵和头领是在战车上或走下战车跟同样显贵的敌人进行决斗,当时的步兵似乎也不比亚洲的步兵强多少;现在我们直接来谈雅典极盛时代的军队。在雅典,每一个自由民出身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只有担任一定公职的人,在较早时期,还有第四等级即最贫穷的自由民,才免服兵役。²⁰²这是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必须服兵役两年,特别是担任边防勤务。在这个时期,他们完成军事训练,以后一直到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旦

① 荷马《伊利亚特》。——编者注

爆发战争，公民大会规定应征人数；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实行全民征集制(panstratia)。每年由人民选举十名将军，负责征召和建立这些部队，每一个部落即宗族的成员在各自族长指挥之下编成支队。这些军官和中队长即连长一样，也是由人民选举的。所有应征的人组成重步兵(hoplitae)，编成矛手的方阵即纵深横队；全部军队最初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后来增加了轻装部队和骑兵，重步兵仍是军队的主力——决定战斗结局的部队。方阵有不同的纵深；文献中提到的方阵纵深有8、12、25列。重步兵的护身装备包括：胸甲或紧身甲冑、头盔、椭圆形盾、矛和短剑。雅典方阵的威力在于攻击；它以猛烈的冲锋闻名，特别是在米太亚得在马拉松会战中规定冲锋时加快步伐、从而能突然压向敌人的战法之后。在防御上，比较坚实而密集的斯巴达方阵则略胜一筹。在马拉松会战中，雅典的整个军队由1万名重步兵构成重装方阵，而在布拉底会战中他们除8000名重步兵外，还有同样数量的轻步兵。由于波斯入侵的巨大压力，雅典不得不增加服役的人数；最贫穷的阶级，即贫民，也列册当兵。后者组成轻装部队(gymnetae, psili)；他们或者完全没有护身器具，或者仅有一面盾；武器是一支矛和一些标枪。随着雅典权势的扩大，他们的轻装部队因得到同盟者的部队²⁰³甚至雇佣军而加强。以弓箭手和投石手著称的阿卡纳尼亚人、埃托利亚人和克里特人也加入了雅典军队。此外，还组成一支介乎轻装部队和重步兵之间的部队——轻盾兵，他们的装备与轻步兵类似，但能攻占和扼守阵地。然而，这种部队一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²⁰⁴时被伊菲克拉特改编以后，才起了重要作用。雅典的轻装部队无论决断或者在执行方面都因机智和迅速而声誉卓著。在某些场合，多半是在地形崎岖的地带，他们甚至成功地对抗了斯巴达方阵。雅典的骑兵是在共和国已经富强的时代建立

的。阿提卡的山地不利于这一兵种,但是由于毗邻色萨利区和维奥蒂亚这些盛产马匹因而最早建立骑兵的地区,所以不久希腊的其他城邦也都建立了骑兵。雅典骑兵最初有 300 人,以后增到 600 甚至 1 000 人,由最富有的公民组成,形成一支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保持不变的常备部队。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非常机警、敏捷和主动。在战斗时,他们和轻装部队一样,通常是配置在方阵的两翼。在较晚的时期,雅典人还保有一支由雇佣兵组成的 200 人的骑兵弓箭手(hippotoxotae)队。雅典士兵直到伯里克利时代为止,是不领薪饷的。以后,他们才领到两个奥波尔(此外还发给两个奥波尔作为伙食费,伙食由士兵自行解决),有时重步兵甚至可以领到两个德拉克马。军官领双饷,骑兵领三份,将官领四份。仅重骑兵部队在和平时期每年就花费 40 塔兰特(4 万美元),在战时则花费更多。战斗队形和作战方式都非常简单:方阵居中,士兵伸出矛,并用成排的盾牌掩护整个正面。他们以与敌人方阵平行的正面向敌人的方阵攻击。如果第一次攻击不能打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则以刀剑进行格斗来解决战斗。这时,轻装部队和骑兵,或者是攻击敌方对应的部队,或者是竭力突入敌人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利用敌人队伍中出现的混乱。如果获胜,他们就进行追击,如果战败,则尽力掩护退却。他们还被用来进行侦察和突袭,在敌人行军时,特别是通过隘路时,扰乱敌人,设法截获敌人的辎重,俘虏其掉队人员。因此,战斗队形非常简单,方阵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把方阵再分为较小单位并不具有战术意义;这些单位的指挥官的任务只是设法使方阵的队形不致被破坏或者在万一被破坏时可以迅速恢复。从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已指出雅典军队在波斯战争时期的数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期,参加野战的有 13 000 名重步兵,担任守备的有 16 000 人(最年轻和最年老的

士兵),另外还有1 200名骑兵和1 600名弓箭手。根据伯克的计算,雅典派往叙拉古的军队有38 560人,后来去增援的达26 000人,共计近65 000人。雅典在这次远征²⁰⁵彻底失败后确实已精疲力竭,其情形和1812年对俄战争之后的法国完全一样。

斯巴达是希腊最尚武的城邦。如果说雅典人的普遍体育训练是既增强体力,又锻炼技巧,那么斯巴达人则着重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把行伍中的坚毅精神和军人荣誉看得比机警灵巧更为宝贵。雅典人接受的训练好像是为了在轻装部队中作战,但在战争中他们也能在重装方阵的严格规定的位置上战斗。相反,斯巴达人受到的全部训练都是为了在方阵中作战。显然,只要方阵决定战斗结局,斯巴达人最后总是占上风。在斯巴达,每一自由民从20岁到60岁都列入军队的花名册。五长团²⁰⁶确定应征的人数,通常是从30岁到40岁的中年人中挑选。和在雅典一样,同一部落或同一地方的人员编在同一部队。军队的编制以莱喀古士所定的小队(enomotiae)为基础;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两个中队合成一个分队,8个中队即4个分队组成一个联队。这就是色诺芬时代的军队编制;这和较早时期似乎有所不同。联队的人数说法不一,从400人到900人不等;据说联队数量一度曾有600个。这些由斯巴达自由民构成的各种不同的队伍编为方阵;编成方阵的重步兵的装备是每一人一支矛、一柄短剑和一块系在脖子上的盾牌。后来,克里昂米尼采用宽大的加里亚盾,用一根带子缚到左臂上,使士兵的双手都能自由活动。斯巴达人认为,士兵战败归来时丢失盾牌是奇耻大辱;保存盾牌,就证明退却是完全有秩序的,方阵是完整的;而单独的逃跑者为了逃命,当然就不得不丢弃笨重的盾牌。斯巴达方阵一般纵深有8列,但有时可把一翼配置在另一翼之后,使方阵

纵深增加一倍。士兵齐步前进,也能作一些简单的队形变换,例如,通过每一士兵向后转把前面变为后面,通过转弯把一翼提前或撤后等,但是这些队形变换似乎是后来才采用的。斯巴达的方阵和雅典的方阵一样,在其极盛时代只实行平行正面攻击。方阵之间的距离如下:行军时为 6 英尺,冲锋时为 3 英尺,而在迎击冲锋时则仅为 1.5 英尺。军队由国王中的一个指挥,他和他的侍从武士(damosia)位于方阵的中央。后来,斯巴达自由民大量减员,方阵的人数就靠挑选处于从属地位的珀里俄基人²⁰⁷来保持。骑兵从来不超过 600 人,每 50 人成一个排(ulami)。骑兵只掩护方阵的两翼。此外,还有一支 300 名骑手的队伍,一支由斯巴达青年组成的精锐部队,但是他们作战时不骑马,组成一支保卫国王的重装卫队。在轻装部队中有斯基里特人——阿卡迪亚附近的山地居民,他们通常掩护左翼;此外,方阵的重步兵还带有赫罗泰²⁰⁸仆役,后者在战斗中应起散兵的作用。例如,在布拉底会战时,5 000 名重步兵就带了 35 000 名赫罗泰轻装部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后者业绩的任何历史资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人的简单的战术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留克特拉会战¹⁶⁶中,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以人数不多的底比斯军队与人数超过自己很多的从来是不可战胜的斯巴达方阵相对抗。在这里如采取简单的平行正面攻击就意味着肯定要被击败,因为这样会使自己的两翼遭到正面较宽的敌人的翼侧包围。因此,埃帕米农达斯不以横队进攻,而把自己的军队排成长纵队,攻击斯巴达方阵中国王^①所在的那一翼。他在这个决定性的地点成功地突破了斯巴达军队的阵线;然后他调转军队,向突破口的两侧运动,从侧翼包围被

① 克里昂姆布鲁图斯一世。——编者注

突破的阵线,使它不打乱其战术序列就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正面。在曼丁尼亚会战¹⁶⁷中,斯巴达军队增大其方阵的纵深,但底比斯纵队再次把它突破。斯巴达的阿革西拉乌斯,雅典的提摩太、伊菲克拉特和哈布里也都改变了步兵战术。伊菲克拉特改进了轻盾兵,这是一种轻步兵,但必要时能够以横队作战。他们手持小圆盾,身穿结实的麻布紧身甲冑,还配有木柄长矛。哈布里使方阵的前几列士兵在防御时以跪姿迎击敌人的攻击。当时采用了实心的方队以及其他形式的纵队等等,于是,战斗队形的展开,就成为基本战术的组成部分。同时,各种轻步兵受到更大的重视;希腊人的野蛮和半野蛮邻邦的一些兵种,如骑兵弓箭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等,也被采用了。这时期大多数士兵都是雇佣兵。富有的公民发现自己当兵不如花钱雇人代替更为有利。方阵是军队中只允许自由民加入的具有显著民族性的部分,现在因混入无公民权的雇佣兵而降低了质量。在马其顿时代的前夜,希腊及其殖民地,就像18和19世纪的瑞士一样,成了为挣钱当兵的人和雇佣兵的市场。埃及国王们较早就组建了一支希腊部队。后来,波斯国王也把一批希腊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使军队具有一些镇定的精神。这些部队的首领都是不折不扣的雇佣兵头目,就像16世纪意大利的情况那样。在这个时期,抛射石块、标枪和燃烧射弹的各种军用器械已被采用,特别是已被雅典人所采用。伯里克利在萨摩斯围攻战²⁰⁹中就已经使用这样的器械。围攻时,在被围城堡周围构筑一道有壕沟或胸墙的包围线,同时设法把各种军用器械配置在城墙附近的瞰制阵地上。为了破坏城墙,通常需要挖掘地道。在强攻时,纵队列成森纳斯皮斯姆式的战斗队形,也就是纵队外面的士兵把盾牌拿在前面,里面的士兵则把盾牌举在头上,这样就形成一种防避敌人射弹的屏障(罗马人称之为“龟甲盾”)。

由此可见,希腊人的战法主要是用大批可塑性强的雇佣兵来形成各种新奇独特的队形,采用或创立各种新的轻装部队,废弃了古老的多利斯重装方阵这种当时惟一能够却敌致胜的方阵。与此同时,又崛起了一个君主国马其顿,它吸取了所有真正的改革成果,创立了一支由重步兵组成的军队,其规模非常之大,任何一支军队与它接触都难以抵御其冲击。马其顿的菲力浦建立了一支拥有3万步兵和3000骑兵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主体是约有16000或18000人的大方阵,按斯巴达方阵的原则编成,但装备上有改进。宽大的长方形的加里亚盾代替了希腊式的小盾牌,24英尺长的马其顿矛(sarissa)代替了中等长度的矛。在菲力浦时代这种方阵的纵深为8到10、12、24列不等。这种矛很长,前6列中每一列如把矛端平,就可使矛尖突出在第一列的前面。要使1000到2000人这样宽的正面整齐前进,就必须有很好的基本训练,因而需要经常演练。亚历山大完善了这种组织。他的方阵通常有16384人,即纵深16列,每列1024人。16人的一行,叫做分队,由位于排首的分队长带领。两行为一个双队,两个双队为一个四联队,两个四联队为一个中队,两个中队为一个大队,即方队,也就是纵横各16人的组合。这是机动单位;军队行军时,就按大队列成纵队,正面16人。十六个大队(等于八个五十人队,或四个千人队,或两个远征团)组成一个小方阵,两个小方阵组成一个双方阵,四个小方阵组成一个四联方阵,即通常所说的方阵。所有这些单位各自都有指挥官。右翼的双方阵称为首,左翼的称为尾或后部。每当方阵需要特别稳固的时候,左翼就置于右翼的后面,排成横512人纵32人的队形。另一方面,后8列展开在前列之左时,正面就加宽了一倍,纵深则减为8列。列与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与斯巴达的方阵相似,但密集队形非常紧密,以致

处于方阵中间的单个士兵根本无法转动。交战时，方阵各单位之间不容许有间隔：方阵形成一个绵密的横面，像一堵墙似地进行冲锋。方阵完全由马其顿志愿兵组成，但在征服希腊²¹⁰以后，希腊人也能加入。所有的士兵都是重装步兵。除了盾牌和长矛，他们还佩带头盔和刀剑，虽然在这长矛如林的攻击之后，并不常常需要用刀剑进行白刃战。当方阵和罗马军团相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方阵体系，自最早的多利斯时代起一直到马其顿帝国灭亡止，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缺乏灵活性。这些正面和纵深都很大的行列，只有在平坦而开阔的地形上才能整齐有序地运动。每遇障碍，方阵就得排成纵队，但采取这样的队形，方阵就不能作战。此外，方阵没有第二线或预备队。因此，一旦方阵遇到的敌军分成为小部队，能够不打乱战斗队形即绕过地面障碍，而且排成几线，可以相互支援，而方阵却被迫在起伏地作战时，这个新的敌人就会把它彻底摧毁。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贝拉²¹¹遇到的那样的敌人来说，他的两个大方阵显然是不可战胜的。除了重装的基干步兵，亚历山大还有由6 000名重盾兵编成的警卫部队，他们拥有更重的装备，盾更大，矛更长。他的轻步兵由手持较小的镀银盾牌的银盾兵和大量轻盾兵组成；这两种兵编成半方阵，其人数通常为8 192人，既可以散开队形作战，又可像重步兵那样以横队作战，他们的方阵常常也能做到这一点。马其顿骑兵从马其顿和色萨利区的贵族青年中招募；后来有希腊本土的骑手加入。他们划分为连(ilae)，其中仅马其顿贵族就有8个连。他们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重骑兵的那一类；他们戴头盔、披胸甲并有铁页护胫，佩长剑，持长矛。马也有铁甲护头。这种骑兵被称为铁甲骑兵，深为菲力浦和亚历山大所重视；亚历山大在阿尔贝拉会战时曾用这种骑兵进行决定性的机动，他先击溃并追击波斯军的

一翼,然后绕过他们的中路,直扑另一翼的后方。这种骑兵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形:横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轻骑兵没有护身器具,持标枪和轻的短矛;还有一种特技兵队,即骑兵弓箭手队。这种兵担任警戒、巡逻、侦察任务,以及其他各种非正规的战斗行动。这些兵是在色雷斯和伊利里亚部落中招募的,此外,这两个部落还有几千人充当非正规步兵。亚历山大创立了一个新兵种,叫做两能兵,这是一种既能骑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的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曾为近代人所仿效。16世纪及以后几个世纪的龙骑兵就完全模仿了这一兵种,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古代的混合部队是否比现代的龙骑兵能更好地完成其双重任务。

亚历山大用来征服从地中海至奥克苏斯河和萨特利杰河之间地区的军队的编成就是这样。其兵力在阿尔贝拉会战时有两个重步兵的大方阵(约3万人)、两个轻盾兵的半方阵(16 000人)、4 000名骑兵和6 000名非正规军,总共约56 000人。在格拉尼库斯会战时,这支包括各兵种的军队共计35 000人,其中有5 000名骑兵。

关于迦太基军队,我们不了解其详细情况;甚至汉尼拔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其兵力究竟多少也有争论。同亚历山大创建的编制相比,他的后继者的军队并无任何改进。象的使用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在受到火的惊吓时,这种动物对自己军队的危害甚于对敌人的危害。后期(亚该亚同盟²¹²时期)的希腊军队一部分是按照马其顿的样式,一部分是按照罗马的样式组织起来的。

罗马军队有人们尚未使用火药时代所发明的一套最完善的步兵战术。重步兵和密集编队仍占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分散的较小部队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几条线前后依次配置,部分地用

于支援和替换,部分地作为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单个士兵训练法,其目的性比斯巴达的方法更明确。因此,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马其顿方阵或者是努米迪亚骑兵。

在罗马,凡年龄在17到45或50岁的公民,除属于最低一级者外,没有参加过20次步兵战斗或10次骑兵战斗者均须服兵役。被挑选上的通常只是比较年轻的人。对士兵的训练非常严格,目的在于用一切可以想像的方法增强士兵的体力。广泛地练习跑步、跳跃、撑竿跳高、攀登、格斗、游泳,先脱去衣服游泳,然后携带全副装备游泳,此外还有使用武器和作各种运动的正规训练。每个士兵须携带40—60磅的行军装备,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作长途行军。军事训练中也包括练习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构筑营垒。不仅新兵,甚至连老兵军团都必须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样的士兵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在共和国鼎盛时期,通常有两支执政官的军队,每一支军队由两个军团和同盟者的部队(其步兵人数与罗马同,骑兵比罗马多一倍)组成。部队的招募是在卡皮托利诺山朱庇特神庙中或马尔斯练兵场上的公民大会上进行的;从每个特里布斯²¹³中挑选同样的人数,平均分配给四个军团,直到满额。有些因年龄或多次参加战斗而免除兵役的公民,常常再次志愿入伍。新兵宣誓以后,即被解散回家,听候召集。召集时,最年轻的和最穷的人编入轻装兵,年龄稍长和财产较多者编入长矛兵和主力兵,最年长者和最富者则编入后备兵。每个军团有1 200轻装兵、1 200长矛兵、1 200主力兵、600后备兵和300骑兵(骑士²¹⁴),共4 500人。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又各分为10个中队,即连,每一个中队附加同一数额的轻装兵。轻装兵(后备兵、辅助部队、散兵)编成军团的轻步兵,与骑兵一起列于军团的两

翼。长矛兵列为第一线,主力兵列为第二线;他们最初都装备矛。后备兵为预备队,装备投枪,这是一种较短的、但是非常沉重锋利的矛,用于在以刀剑同敌人格斗之前向敌人的前列抛掷。每个中队由一名百人长指挥,副百人长作为他的助手。百人长的等级由他在整个军团中的位置决定;最低的是长矛兵最后一个即第十中队的副百人长,最高的是后备兵第一中队的正百人长(*primus pilus*),军团的高级军官不在时,他甚至负责指挥整个军团。通常正百人长指挥军团所有的后备兵,同样,*primus princeps*(主力兵第一中队的正百人长)指挥军团所有的主力兵,长矛兵第一中队的正百人长指挥军团所有的长矛兵。在早期,军团由6个军事护民官轮流指挥,每人指挥两个月。在第一次国内战争²¹⁵以后,每个军团都设有副将,作为军团的常任长官;护民官这时大部分成为担任参谋或行政职务的官员。三线士兵在武器上的差别,在马略时代以前已经消失。军团三线的所有士兵都配发了投枪,从此以后投枪就成为罗马人的民族武器了。以前由于年龄和服役年限长短而产生的三线士兵在质量上的差别,不久也消失了。按照萨卢斯提乌斯的说法,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梅泰卢斯同尤古尔塔会战²¹⁶中。马略这时把军团的30个中队改编为10个大队,分为两线,每一线5个大队。与此同时,大队的额定人数增加到了600人;在正百人长率领下的第一大队持军团的鹰徽²¹⁷。骑兵像从前一样分编为小队,每一小队有士兵30人和十人长3人,其中第一个十人长指挥小队。罗马步兵的护身装备包括:长4英尺宽2.5英尺的椭圆形的木盾,外包皮革,用铁钉铆合,中间有一个凸起的浮雕装饰(*umbo*)以抵挡矛的击刺。铜制的头盔,一般后部较长以掩护颈部,用包有铜页的皮带系在头上。约一英尺见方的胸甲,用鳞状的皮带从肩膀套下,系在皮质紧身甲冑上。百

人长的护身装备是包有铜页的锁子甲。伸出进行刀剑格斗时暴露在外的右腿用铜页包裹着。除用于击刺比用于砍劈更多的短剑外，士兵还另外携有投枪，这是一种木杆长 4.5 英尺、铁尖长 1.5 英尺、全长约 6 英尺的重矛，杆的横断面为 2.5 平方英寸，重约 10 或 11 磅。在 10—15 步远的距离进行投掷，它常常可以穿透盾牌和胸甲，因此几乎总能击倒敌人。轻装兵的装备较轻，携带一些轻的短标枪。在共和国的后期，当蛮族辅助部队开始担任轻装勤务时，上述这种部队就完全消失了。骑兵的护身器具与步兵相近，即一支长矛和一柄长剑。但是罗马的民族骑兵并不十分出色，宁愿徒步作战。后来，它就完全被废除，为努米底亚、西班牙、高卢和日耳曼的骑兵所取代。

罗马军队的战术队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列队时中队之间的间隔同中队正面的宽度相等，中队的纵深则为 5、6 列至 10 列不等。第二线的中队配置在第一线各中队的间隔的后面；后备兵的位置更靠后些，但正面是完整的。根据情况，每条线的各个中队可靠拢而形成无间隔的正面，或者第二线的各个中队前出填补第一线的间隔；如果需要较大的纵深时，每个主力兵中队置于相应的长矛兵中队的后面，使纵深加倍。当同皮洛士的象队交锋²¹⁸时，所有的三条线都留下间隔，每个中队都掩护着前面的一个中队，而给象空出一条穿过整个战斗序列的直路。用这种队形，方阵动转不灵的缺点完全得到克服。军团能在方阵不敢冒很大危险的地形上运动和机动而不打乱战斗序列。绕过障碍物时，通常至多只需要一两个中队缩小正面，而且不久正面即可恢复。军团能用轻装部队掩护整个正面，因为他们能够在各线中队前进时通过间隔向后撤退。但主要的优点是军队排成几条线，可根据情况依次投入战斗。采用方阵时，战斗的结局只能决定于一次突击。没有在失利时能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这种生力

军，——实际上从未准备应付这种情况。军团则可以用自己的轻装部队和骑兵在整个正面接战，——可以用第一线的长矛兵抵御敌人方阵的攻击，而长矛兵不是很容易被击败的，因为这首先必须把10个中队中的至少6个中队各个击破，——还可以用主力兵进攻以消耗敌人的力量，最后用后备兵去取得胜利。这样，部队和会战进程始终掌握在统帅手中，而方阵一旦交战，就得无可改变地投入全部兵力，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如果罗马的统帅想中止战斗，军团这种组织形式使他能以预备队占领阵地，而把已投入战斗的部队经由间隔后撤，另行占领阵地。在任何情况下，总有一部分部队队形完整，因为即使后备兵被击退，他们后面还有已重新组成的两个第一线部队。当弗拉米尼努斯的那些军团在色萨利区平原同菲力浦的方阵接战²¹⁹时，它们的第一次攻击立即被击退，但在接二连三的攻击下，马其顿人开始疲惫了，部分地失去了严整的队形；凡是稍显紊乱的地方，就会有一支罗马中队试图楔入这个笨拙不灵的人群中。最后，当20个中队自翼侧和后方攻击方阵时，其战术连续性就无法继续保持，纵深的队形开始瓦解，士兵纷纷四散奔逃，会战终于失败。为了对付骑兵，军团排列成圆阵——一种以辎重居中的方队。行军时一旦遭到攻击，则排列成四边队形——一种以辎重居中而正面宽大的加长纵队。当然，这只有在开阔的平原上，在可以照直运动的地方才能应用。

在凯撒时代，军团多半是在意大利利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来补充的。在同盟战争²²⁰以后，公民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兵役的义务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因此，这时适于服兵役的人员大大超过了需要。饷银几乎等于一个工人的工资；因此，新兵绰绰有余，甚至不必强迫征兵。只有在特殊的场合，军团才在各省招募新兵；例如，凯撒的第五军团

就是他在罗马高卢²²¹招募的,但后来这个军团的士兵全都取得了罗马的国籍。军团从未达到4 500人的编制人数;凯撒的各个军团就很少超过3 000人。他们宁愿把新兵编成新军团(*legiones tironum*),而不愿把新兵和老军团的老兵混编在一起;这些新军团最初不参加野战,只用于守卫兵营。军团分为10个大队,每一大队有3个中队。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等名称仍然保存,这些名称仅仅是为了按上述制度表明军官的等级;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每个军团第一大队的6个百人长有权参加军事会议。百人长都是从普通士兵中擢升的,很少再晋升;由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组成统帅侍从参谋部,是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这些青年人会很快提升为军事护民官,然后再提升为副将。士兵的武器仍然是投枪和刀剑。除了装备,士兵还要背负35到60磅的行李。携带行李的用具非常笨重,士兵必须先卸下行李,然后才准备战斗。部队野营用具由骡马驮载,一个军团需要500匹左右。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鹰徽,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凯撒从自己的军团中选拔一定数量的人(*antesignani*)担任轻步兵,这些人既要适于担任轻装勤务,又要适于在横队中进行近战。此外,他还有各省的辅助部队:克里特岛的弓箭手,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高卢和努米迪亚部队以及日耳曼雇佣兵。他的骑兵一部分由高卢部队组成,一部分由日耳曼部队组成。罗马的轻装兵和骑兵在这以前不久已经消失了。

军队的参谋部由元老院任命的副将组成;他们是统帅的助手,统帅派他们指挥各分遣部队或战斗单位。凯撒第一次给每个军团委派一名副将作为常任指挥官。如副将不敷分配,则由司库担任军团的指挥。他本身主管军队的财务和军需,并有许多文书和传令兵协助他工作。参谋部还有军事护民官和上述的青年志愿者(*contuber-*

nales, comites praetorii)担任副官和传令官;但在战时他们和普通士兵一样,加入由司令部的执法官、文书、雇员、基准兵(speculatores)和传令兵(apparitores)组成的警卫大队作战。此外,统帅还有一种由老兵组成的私人卫队,这些老兵是应自己的老长官的召唤而重新志愿入伍的。这支部队行军时乘马,但徒步作战,被认为是军中的精锐;他们执掌和护卫全军的军旗。作战时,凯撒通常把军队列为三线:每一军团的4个大队为第一线,第二线和第三线各3个大队;第二线各大队位于第一线各大队的间隔处。第二线必须支援第一线;第三线是对敌人正面或翼侧进行决定性机动以及击退敌人决定性突击的总预备队。在敌人一旦向翼侧迂回因而必须延长正面时,军队只列为两线。只有在必要时才排成单线(acies simplex),在大队之间不留间隔;但是在保卫兵营时,通常单线的纵深仍然有8—10列,可以用胸墙上排不下的士兵组成一支预备队。

奥古斯都完成了把罗马的军队变为一支常备的正规军的工作。他把25个军团分驻在整个帝国境内:8个军团配置在莱茵(他们被视为全军的主力(praecipium robur)),3个军团配置在西班牙,2个军团配置在非洲,2个军团配置在埃及,4个军团配置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6个军团配置在多瑙河两公国。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全部是在意大利本土征召的精锐部队,他们组成皇家警卫部队;这支部队有12个大队,以后扩充为14个大队;此外,罗马城还有7个原先由被释奴隶组成的市警卫(vigiles)大队。除了这支正规军,各省还必须像早先那样配备轻装的辅助部队,这种部队这时大部分已变成负责警卫和警察任务的民兵了。但是在受到袭击威胁的边境上,不仅这些辅助部队,而且外籍雇佣兵都参加作战。在图拉真时代,军团的数量增加到30个,在赛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时代,又增加到33个。军

团除了番号,还按其驻地命名(日耳曼军团、意大利军团),按皇帝称号命名(奥古斯都军团),按神名命名(丘必特军团、阿波罗军团),或按授予的奖章命名(效忠军团、虔信军团、无敌军团)。军团的编制稍有改变。指挥官这时被称为司令官。第一大队在人数上增加了一倍(千人大队),军团的额定人数增加为步兵 6 100 人,骑兵 726 人;这是最低限额,必要时尚可增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千人大队。千人大队由一名军事护民官指挥,其余的大队则由护民官或长官指挥;因此,百人长的官衔这时就成为下级军官的官衔了。允许被释放或未被释放的奴隶、外省人以及各色各样的人参加军团成为常规。只有在意大利,禁卫兵才必须是罗马公民,但是后来这一规定在意大利也取消了。因此,罗马军队的民族性很快地就被淹没在野蛮的和半野蛮的、罗马化的和非罗马化的成分的洪流之中了;只有军官仍然是罗马人。军队成分的这种质量下降很快反映在它的武器和战术上。重胸甲和投枪被取消了;曾经造就世界征服者的劳累的训练制度开始为人们所厌弃;随营人员和豪华奢侈对军队已成为必需,随着 *impedimenta*(辎重)的增加,军队的实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削弱了。就像在希腊一样,军力的衰落表现在轻视重装的基于步兵,迷恋各种轻武器,以及采用野蛮人的装备和战术。因此,出现了装备各式各样的抛射武器的多种轻装部队(如辅助兵、前卫部队、长矛或标枪投掷手、侦察兵、散兵、盾牌手、投石手、弩炮手、长矛手),据维格齐说,骑兵按哥特人、阿兰人和匈奴人的样式实行了改进。最后,罗马人和野蛮人在装备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经非罗马化的军团的遗骸而大步前进了。

因此,与称霸西方的日耳曼人相抗衡的,就只有古罗马战术的微弱残余及其可怜的传统了;但是甚至这点微弱的残余这时也一扫而

光了。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在其他一切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封建制度虽然按其起源来说也是一种军事组织,但本质上却是和一切纪律不相容的。各地大的诸侯及其军队的叛离是常见的现象。向各首领下达命令常常变成喧嚷不休的军事会议,因而无法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行动。所以,战争很少在决定性的地段进行;为了争夺某一地点,需要多次征战。在整个这段时期(包括6世纪至12世纪这个混乱时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²²²和十字军征讨²²³,而且每次都徒劳无功。

中世纪的步兵是由封建的家臣侍从和部分农民组成的,主要是由一些长矛手组成的,他们大都无济于事。对那些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骑士来说,单枪匹马地冲入这群无盔甲保护的乌合之众中间任意大杀大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当欧洲大陆上的一部分步兵以弩弓为武器的时候,在英国大弓已成为农民的民族武器了。这种大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捷和阿赞库尔等会战¹⁵⁵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雨水常常会使弩弓无法使用,而这种大弓却不怕雨,可以把箭射出200码开外,与旧式滑膛火枪的有效射程相差无几。这种箭可以穿透一英寸厚的木板,甚至可以穿透胸甲。因此,它甚至能长期与最初的轻火器相抗衡,尤其是因为,当时的火枪每装填和发射一次,大弓就可以连射六次;甚至一直到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还试图重新把这种民族的大弓列为战斗的武器。这种大弓对付骑兵特别有效,即使重装骑手的盔甲可以防避箭矢,但箭矢却可以射伤或者射死马匹,失掉坐骑的骑士往往因此而束手被擒。弓箭手以散兵队形或以横队作战。

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全身披甲的骑士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有战斗力的、采用正规队形攻击的重骑兵。亚

历山大的铁甲骑兵虽然决定了阿尔贝拉会战的结局,但这毕竟是例外,在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有关它的传说了,在古代史的整个后期,步兵在战斗中始终保持着突出的地位。因此,中世纪赐给我们的惟一进步是骑兵的创立,现代的骑兵就是从那个时代的骑兵直接传下来的。然而这种骑兵的笨重程度,可以由下述的事实得到证明:在整个中世纪,骑兵是装备笨重、行动缓慢的兵种,而一切轻装的勤务和迅速的运动都是由步兵担任的。不过,骑士并不经常以密集队形作战。他们宁愿一个对一个地决斗,或者驱入敌人的步兵群;这样,作战方式又回到了荷马时代。当骑士成密集队形行动时,他们就或者成横队(骑士在第一列,比较轻装的骑士随从兵在第二列),或者成长纵队攻击。通常,这种攻击只有用来对付敌军的骑士(重装骑手);如果对付步兵,这种攻击就是白白浪费兵力。马匹本身的盔甲和骑手的盔甲加重了马匹的负担,它只能缓慢地作短距离的运动。因此,在十字军征讨以及在波兰和西里西亚同蒙古人作战的时期²²⁴,这种行动缓慢的骑兵经常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中,最终被东方的行动迅速的轻骑兵击败。在奥地利和勃艮第对瑞士的战争²²⁵中,重装骑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陷于困境,不得不下马组成比马其顿方阵更难移动的方阵;在山间隘路中,樅木滚石从山上向他们砸下来,结果方阵失去了战术队形,被敌人的坚决攻击击溃。

到14世纪,有了一种比较轻便的骑兵,一部分弓箭手为了便于机动,也乘马行进;但是由于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火药的使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改进,不久就成为无用的东西而被废弃或者另作他用了。

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则是从他们东面的各国学来的,后者又是从最初的

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在 14 世纪上半叶,欧洲军队最先开始采用火炮;这是一种发射石弹的笨重的火炮,只适用于围攻战。但是不久就发明了轻火器。1364 年,意大利的佩鲁贾城有了 500 支手枪,枪身长约 8 英寸;后来由此制造出皮斯托枪(因托斯卡纳省的皮斯托亚城得名)。不久以后,又制造出较长和较重的手枪(火绳枪),和我们现在的火枪相仿,但是,由于枪身短而重,射程有限,而火绳对于瞄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到 14 世纪末,西欧各国的军队全都有了炮兵和火绳枪手。但是,新武器对整个战术的影响甚小。无论重火器或轻火器装填弹药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又非常笨重和昂贵,因此甚至到 1450 年也还没有代替弩弓。

同时,封建制度的普遍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的诸侯或者像在法国那样,臣服于中央政权,或者像在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变成了半独立的君主。下层贵族的力量被联合城市共同行动的中央政权所粉碎。封建的军队不复存在,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组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但是这些雇佣兵,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很难使他们服从纪律,又不能按时给他们支付薪饷,所以时常惹出很大的乱子。因此,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了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常备军。1445 年,他征召了 15 个敕令连^①,每连 600 人;共有骑兵 9 000 人,分别驻守王国的各城镇并按时领取薪饷。每连分为 100 个长矛手组,每个长矛手组由重装骑手 1 人、弓箭手 3 人、骑士随从兵 1 人和见习骑士 1 人组成。可见,他们是重骑兵和骑兵弓箭手的混合体,当然这两种兵在战斗中是

^① 根据国王的敕令而成立的骑兵连。——编者注

单独行动的。1448年，他增补16 000名自由射手归4名司令官指挥，每人指挥8个连，每连500人。所有的弓箭手都备有弩弓。他们由教区征召和武装起来，而且被免除一切捐税。这种军队可以说是近代的第一支常备军。

到现代战术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的末期，战术才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杂乱无章，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大部分由雇佣兵组成的步兵，装备长矛和刀剑、胸甲和头盔，交战时密集成群，但是由于装备和训练都好于封建的步兵，所以在战斗时更加坚强而有序。正规征召的新兵和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当然比偶尔征召的新兵和封建的家臣侍从的乌合之众高出一筹。这时，重骑兵也认为有时必须以密集队形攻击步兵。轻步兵仍然以弓箭手为主，但在散兵中已广泛使用轻火器了。骑兵这时还是主要的兵种；重骑兵这些身裹铁甲的重装骑手，已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贵族充任，也不再固守过去那种骑士式和荷马式的战法，而改变为以密集队形进行比较单调的攻击了。不过这时已经普遍感到这种骑兵过于笨重，于是就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比较灵便的骑兵。如上所述，骑兵弓箭手部分地满足了这种需要；意大利及其邻国开始使用一种叫做斯特拉底阿蒂^①的土耳其式轻骑兵，它是巴希布祖克^②的一种，由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雇佣兵组成。这种骑兵很有威慑力，特别是在追击战中。波兰和匈牙利除了模仿西方建立的重骑兵以外，还保留着本民族的轻骑兵。

① 斯特拉底阿蒂(Stradioti)是15—16世纪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招募的一种轻骑兵，在威尼斯等地服役。——编者注

② 巴希布祖克(Bashi-Bozuk意为“歪头巾”)这里指18—19世纪土耳其非正规骑兵中的雇佣兵。——编者注

炮兵还处于幼年时代。那时的重炮固然已经用于战场上,但是无法从已占领的阵地转移;火药很差,弹药的装填困难而缓慢,而且石弹发射的射程很短。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出现了两个进步:法国人改良了火炮,西班牙人使步兵面目一新。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使火炮变得能够移动,不仅可以把它拉到战场上,而且可以在战斗时变换阵地,在军队移动时随之前进,当然那时军队的移动并不很快。因此,查理八世成为野战炮兵的创始者。他的火炮装在带车轮的炮架上,由许多马匹拉曳,比意大利人的笨重的旧式火炮(用犍牛驮运的)显出巨大优势。这种火炮给意大利步兵的长纵队造成极大的损失,马基雅弗利撰写他的《兵法》^①一书,主要就是为了构想能减少这种火炮对步兵的杀伤的队形。在马里尼亚诺会战²²⁶中,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所以能击溃瑞士的长矛手,就是因为这种火炮射击效果好,移动灵便,从翼侧阵地轰击了瑞士军队的战斗队形。然而,长矛在步兵中已日渐失去了优势。西班牙人改良了当时通用的轻火器(火绳枪),并用以装备正规的重步兵。他们的火枪(hacquebutte)是一种重的长管武器,枪膛可容纳重2盎司的子弹,发射时架在叉架上。这种火枪所发射的子弹可以穿透最坚固的胸甲,因此在对付重骑兵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骑手一旦落马,这些重骑兵就会乱作一团。每个长矛手连,配备10或15名火枪手,在帕维亚会战¹⁵⁶中,他们的射击效力使联军和敌人都感到惊异。弗伦茨贝格曾说,在那次会战时,这种火枪发射一次通常就能放倒几个人和几匹马。从这时起,西班牙步兵就开始占有优势,并且延续了一百多年。

^① 马基雅弗利于1519—1520年写的《兵法七卷》。——编者注

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²²⁷对军队的编制有重大的影响。不论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显然改善了各个兵种。在这以前，每一个愿意加入雇佣军的人都必须自备全套装备和武器，并会使用自己的武器。但是在这场在不大的地区持续四十年之久的战争中，这种现成的新兵很快就供不应求了。荷兰人不得不满足于他们所能搜罗到的体格适合的志愿兵，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训练。拿骚的莫里茨编写了近代第一部操典，从而为整个军队的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步兵再次开始操练步伐，变得更加整齐划一和紧密了。这时他们被编为较小的单位：过去每一个连有400—500人，这时减少到150—200人，10个连编成一个团。改良的火枪取代了长矛；整个步兵有三分之一是火枪手，和长矛手混编在一个连内。长矛手只有在白刃战中需要，他们仍然戴着头盔、胸甲和铁护手，火枪手则抛掉了所有护身器具。通常长矛手排成两列，火枪手则排成5—8列；第一列齐射后即后退，重新装弹。骑兵的变化更大，在这方面，也是拿骚的莫里茨起了带头作用。由于不可能建立由重装骑手组成的重骑兵，他就建立了一支在德国招募的轻骑兵，给他们配备头盔、胸甲、护肘、铁护手和高筒靴；但是，只凭长矛，他们不是西班牙重装骑兵的对手，他就给他们装备刀剑和长柄手枪。这种新式骑兵类似我们现代的胸甲骑兵，很快就表明他们比人数较少、不太灵便的西班牙的重装骑手更优越，因为在这群行动缓慢的重装骑手向他们猛扑之前，他们就可以射杀对方的坐骑。拿骚的莫里茨曾像训练步兵那样精心地训练他的胸甲骑兵；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敢于在会战中变换阵势和以小股或大股骑兵作其他机动。不久，阿尔瓦也认为必须改善自己的轻骑兵；在这以前，这种轻骑兵只适于以散兵队形作战和单个格斗，但是在他的统率下，不久就学会了像重骑兵那样成密集队形

攻击。骑兵队形仍和从前一样，成5—8列横队。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建立了一种新式骑兵——龙骑兵；在最初这是一种为较迅速移动而乘马的步兵；但是在创立后没过几年，他们就被同样地当作骑兵来使用，并按步骑两用的需要装备起来。他们没有护身器具，也没有高筒靴，但是装备了骑兵用的刀剑，有时是长矛；此外，他们还带有步兵用的火枪或者较短的马枪。但是这种军队并没有实现在创建时对他们所寄予的希望；他们不久就成为正规骑兵的一部分，不再作为步兵来作战了（俄国皇帝尼古拉曾企图恢复原先的龙骑兵，组成一支既适于骑马作战又适于徒步作战的16 000人的部队；但是他们从未徒步作战，一直被当作骑兵，因此现已改编，作为骑马的龙骑兵，与俄国的其他骑兵合编了）。法国人在炮兵方面仍保有他们已取得的优势。大约在这个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牵引索，亨利四世还采用了霰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把他们的火炮轻便化和简单化，但它们仍嫌笨重，口径和射程都适于有效射击的轻便火炮那时还没有发明。

三十年战争²²⁸开始了17世纪伟大的军事改革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时代。他的步兵团三分之二由火枪手组成，三分之一由长矛手组成。有一些团则完全由火枪手组成。火枪制作得非常轻便，射击时已没有必要使用枪架。古斯塔夫·阿道夫还采用了一种纸造的弹壳，使装填大为简便。纵深的队形废除了；他的长矛手成6列，火枪手只成3列。这些火枪手受到按排和按列射击的训练。人数达2 000或3 000名的庞大的团减少到1 300或1 400人，编为8个连，两个团编成一个旅。他采用这样的队形，打败了常常编为30列（类似纵队或方队）的密集成群的敌人，他的炮兵使敌人受到惨重的损失。骑兵也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编了。重装骑手已被完全废除。胸

甲骑兵取消了护肘和其他无用的护身器具,这样他们就更轻便灵活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龙骑兵几乎总是当作骑兵来作战的。胸甲骑兵和龙骑兵都只排成3列,并且奉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因射击耽误时间,而应当立即持刀冲锋。他们分编为连,每连125人。炮兵也因为有了轻炮而有所改进。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蒙皮炮曾闻名一时,但是没有维持多久。它们为四磅铁炮所代替,这种铁炮非常轻便,用两匹马即可拉走;在火枪手发射两次的同时,这种铁炮能发射6次;每个步兵团都有两门这样的火炮。这样一来,野战炮就分为轻炮和重炮两类;轻炮随步兵作战,而重炮则留置预备队中或者在整个会战期间占领某一阵地。这段时期的军队,已开始显示步兵对骑兵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了。在1631年莱比锡会战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步兵19 000人、骑兵11 000人,蒂利有步兵31 000人、骑兵13 000人。在1632年吕岑会战时,华伦斯坦有步兵24 000人、骑兵16 000人(170个连)。火炮的数量也因为采用了轻炮而增加了;瑞典军队通常每1 000名士兵有5—12门火炮;在莱希河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在72门重炮火力的掩护下强渡该河的²²⁹。

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长矛和各种护身器具就完全废除了,因为步兵普遍地采用了刺刀。大约1640年在法国发明的这种武器曾不得不和长矛相争八十年之久。奥地利人最先用刺刀装备了他们的全体步兵,随后是普鲁士人;法国人把长矛一直保持到1703年,俄国人则保持到1721年。几乎与刺刀同时在法国发明的燧发枪,也在1700年前逐渐被大多数军队所采用。它极大地缩短了装弹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护火药池中的火药免受雨淋,这就更加有助于长矛的废除。但是,射击仍然很慢,一个士兵在一次战斗中

最多只能发射 24—36 发子弹；在这段时期的后半期，条例的改进，训练的改善，轻火器构造的进一步改良（特别是由于普鲁士最先采用的装弹铁探条），才使得士兵能快速射击。这就必须进一步缩小队形的纵深，于是步兵改为只排成 4 列。当时建立了一种步兵精锐部队——掷弹兵连，其本来的任务是在近战前投掷手榴弹，但不久他们就只用火枪作战了。某些德国军队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已经建立了来复枪队，这种来复枪则是 1498 年在莱比锡发明的。这种武器这时与火枪并用，每个连的优秀射手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但是除了在德国，这种武器并不太受人喜爱。奥地利人也建立了一种叫做潘都尔兵的轻步兵，是来自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区²³⁰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适于奔袭和追击，但从当时的战术观点来看，他们因毫无训练而不适于战斗。法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种叫做自由连的非正规步兵。各国军队的骑兵也都轻装了。重装骑手完全消失了，胸甲骑兵只留有胸甲和头盔；在法国和瑞典，甚至连胸甲也废除了。步兵的射击效力和射速的日益提高，对于骑兵是非常不利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骑兵持刀向步兵冲锋已完全不适用了；步兵射击线无法通过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以致骑兵也懂得了更多地使用马枪而不是刀。因此，在这个时期，双方的骑兵往往也像步兵那样相互射击；骑马冲至距敌人 20 码的地方，放一排枪，然后驱马猛攻，被认为是英勇行为。但是，查理十二却恪守他的伟大先辈^①的规矩。他的骑兵从不停下来进行射击；不管面对的是骑兵、步兵、炮队还是堑壕工事，他们总是持刀冲锋，而且总能获胜。法国人也放弃了新的战法，重新只用刀剑作战。骑兵战斗队形的纵深更加缩小，由

①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编者注

4列减到3列。这时，炮兵已普遍减轻了火炮的重量，普遍使用弹壳和霰弹了。另一个重大的改革是把这一兵种列入军队的编制。在这以前，虽然火炮属于国家，但是操作火炮的人却不是士兵，他们形成一种行会，炮兵不算是一个兵种，而算是一种手艺。炮兵军官没有军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被归入裁缝和木匠之列，而不被看做领有军衔的有身份的人。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前后，炮兵成了军队的组成部分，并分编为连和营；操作火炮的人成了正规的士兵，军官也像步兵和骑兵一样有了军阶。由于这种改革而造成的炮兵的集中使用和人员的固定，为在旧制度下不能发展的炮兵科学开辟了道路。

由纵队队形到横队队形的过渡，由长矛到火枪的过渡，由骑兵的优势到步兵的优势的过渡，是随着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征战并开创横队战术的全盛时期而逐渐完成的。他把步兵排为3列，使射击每分钟达到5发。在莫尔维茨会战²³¹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这种步兵成横队展开，在奥地利骑兵刚刚击溃了普鲁士骑兵后，以速射击退奥地利骑兵的各次攻击；在消灭奥地利骑兵以后，普鲁士步兵攻击奥地利的步兵，击败对方，从而赢得会战的胜利。在大的会战中，对付骑兵，从来不用方队，除非是步兵在行军时突然遭到敌方骑兵的袭击。在会战中，步兵如果受到骑兵的威胁，通常只须将其外翼折转就可以了。为了对抗奥地利的潘都尔兵，弗里德里希建立了类似的非正规的步兵和骑兵，但是在会战时从不依靠他们，所以他们很少参加会战。他的会战的结局，是由射击线的缓慢推进决定的。曾被他的前辈^①忽视的骑兵，这时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它只排成两列，除了在追击时，严格禁止射击。过去一直很少为人注意的骑术，这时备受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重视。所有队形变换必须高速进行,因此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队形。由于泽德利茨的努力,弗里德里希的骑兵优于当时的或者以前曾有过的任何其他骑兵;他们作战剽悍,队形整齐,攻击勇猛,集结迅速,后来的骑兵都无法与之相比。炮兵已经大为简便化,以致一些大口径的火炮不能承受全装药,因而后来不得不废除。但是,重炮兵的运动仍然缓慢笨拙,其原因是炮架质量低劣而又沉重,组织也不完善。战斗时,他们最先进入阵地,有时虽向前变换到第二阵地,但不能作任何机动。轻炮兵(编入步兵的团属火炮)配置在步兵横队的前面,即在营与营的间隔前50步的地方;他们和步兵一同前进,士兵拖着火炮,在300码的距离用霰弹射击;火炮的数量很多,每1000名士兵有3—6门。步兵和骑兵都分编为旅和师;但是,一旦战斗开始,就很少有任何机动,每一营都必须在总的横队中保持自己的既定位置,所以这种划分没有任何战术意义;至于骑兵,一个旅长在攻击时,有时可以随机应变;然而在步兵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横队队形(步兵成两横队居中,骑兵成两或三横队居于两翼)同以前的纵深队形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队形使尽可能多的人员能同时行动,因而使步兵的火力和骑兵的攻击都发挥最大效力;但是,正是这种队形在这方面的完善,像紧身服一样束缚了整个军队。每个骑兵连、步兵营和每门火炮在战斗序列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序列如果加以倒置或者稍微加以打乱,就必定会影响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行军中必须严格加以组织,当军队为了宿营或者作战而再度展开时,每一单位都须正好处于预先规定的位置。因此,进行任何机动,都须全军一起进行;在这样一支只适于成横队作战的军队行动如此缓慢而且战斗序列又如此呆板的条件下,要派遣部分兵力进行侧击或者建立专门的预备队以使用优势兵力攻击某一个弱点,那是不

可能的和错误的。此外,在作战时,这种宽横队为了保持排面整齐,前进得非常缓慢。帐篷总是随军队前进,而且每晚都得撑开;营地周围还得构筑简易的堑壕工事。军队的粮秣要由兵站补给,野战面包房要尽可能地随军行进。总之,所携带的辎重十分累赘,给军队的运动造成了现今不可想像的困难。但是,虽然有这些缺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组织还是当时最好的,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竞相仿效。兵员补充几乎到处是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并辅之以诱骗手段;只是在受到严重损失后,弗里德里希才在各省强迫征兵。

同盟国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¹²开始后,法国军队因军官大量损失而陷于混乱,人数总共不到15万人。敌军的人数多得多;法国必须重新征兵,于是以招收国民志愿兵的形式大规模地进行了征召;到1793年,国民志愿兵至少已有约500个营。这些部队未经训练,而且也没有时间按照复杂的横队战术来训练他们,使他们达到作横队运动时所要求的那样完善的程度。尽管法国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是一次次同排成横队的敌人较量的尝试均告失败。这就需要创立一套新的战术。美国革命²³²表明,采用散开队形和以散兵向敌开火,即使训练不好的军队也可以取得优势。法国人采用这种方法,以长纵队支援散兵,只要大部分军队密集状态良好,纵队里小的混乱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国人采取这种队形,以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攻而常常取得胜利。由于采用这种新队形,又缺乏经验,他们的部队只能在起伏地、在乡村和树林中作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有避开敌人火力的藏身之地,而敌人的横队在这些地方却必然会陷于混乱;法国人没有帐篷、野战面包房等,他们不得不野营露宿,靠周围地区所提供的东西为生。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被帐篷和各种辎重所累敌军所没有的一种机动性。革命的战争

造就了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他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用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横队战术所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一直到他们的敌人学会他们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组建自己的军队时为止。这种新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恢复旧的原则,即每个公民必要时应当应征入伍,保卫国家,因而就是通过全体居民中实施不同规模的强迫征兵来组建军队。这种改变立刻使军队的平均人数比弗里德里希时代增加了两倍,必要时还可以增加更多。其次,废除了野营用具,停止了由兵站供应给养,实行了露营并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因而增长,其程度不亚于因实行普遍兵役制而形成的数量的增长。在战术编制上,步兵、骑兵和炮兵混合编入军队的较小的单位(军、师)中的原则成为常规。这样,每一个师都成为一支完整的小型军队,能单独行动,甚至对占数量优势的敌人也能作相当有力的抗击。这时,纵队成为战斗序列的基础;它是散兵群从那里出击、然后又回到那里去的仓库,是向敌军横队的某一点攻击的楔形密集集团,是在地形和战斗情况有利于以射击线对付敌人时接近敌人然后展开的形式。由于三个兵种结合在较小的单位中,再加上三种战斗队形的结合,各兵种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充分的程度;散兵、横队和纵队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因此,现在任何地形都适于战斗;迅速判定地形的一切利弊,根据地形特点迅速配置军队,成了对指挥官的主要要求之一。这时,不仅总司令而且下级军官都需要具备这种素质以及独立指挥的一般能力。军、师、旅、分遣部队经常需要其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出现在战场上的,已经不再是那种在开阔地上排成连绵不断的横队、两翼配有骑兵的步兵了;这时,单个的军和师排成纵队,隐蔽在村庄、道路或丘陵的后

面,彼此保持相当大的间隔,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部队以散兵和炮兵向敌开火。战线由于人数变化和采用这种队形而拉长了;只要手中握有需要时就可以调来的部队,实际上就不必在敌人面前派一支横队去填补每一间隔了。迂回翼侧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战略行动;比较强大的军队可以整个楔入比较弱小的军队及其交通线之间,因此一次败仗就能使全军覆没并决定战局的胜负。当时惯用的战术机动是:当情况表明敌人已把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时,立即以生力军突破敌人的中路。预备队在横队战术时期是不适用的,只会在决定性时刻减弱军队的战斗力,但现在却变成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战斗序列不仅沿正面延伸,同样也向纵深扩展;从散兵线到预备队配置地点常常有2英里和2英里以上。总而言之,如果说新的一套战术较少地要求操练和阅兵分列式的精确,它却要求上自最高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每个人都要行动更加敏捷,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更多的机智;自拿破仑以来,战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装备在这一时期变化不大;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各国军队很少有时间进行这种需要时间的改革。法国军队在革命前不久曾有两项很重要的革新。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式火枪;缩小了口径和游隙,用弯曲的枪托代替从前使用的直枪托。这种精确度更高的武器使法国散兵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它还成为火枪的典型,在击发机发明以前,其他各国军队中所使用的火枪都是按照这种式样稍加改变而制成的。其次,格里博瓦尔简化并改进了炮兵。法国炮兵在路易十五时代完全被忽视了;火炮的口径各种各样,炮架是老式的,甚至构造火炮所根据的型式也是不统一的。格里博瓦尔在七年战争²³³时期在奥军中服务,曾见过一些精良的炮型,他成功地减少了口径的种类,统一和

改进了炮型,大大简化了整个火炮的构造。拿破仑就是用他所发明的火炮和炮架来作战的。在对法战争爆发时,英国的炮兵状况最糟,但以后也大有改进,虽然这种改进是逐渐而缓慢的;他们首先采用单尾炮架,这种炮架后来为大陆许多国家的军队所采用,同时他们还设计一种装置,使步炮兵能乘坐在前车和弹药车上。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创建的骑炮兵,在拿破仑时代大有发展,拿破仑本人尤其重视;骑炮兵本身的战术也第一次得到发展。当战争结束时,人们发现英国人的这一兵种是最有效的。在欧洲各大国的军队中,只有奥地利军队以炮兵连代替了骑炮兵,炮兵连的炮手乘坐专用的车辆上。

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仍然保存着装备来复枪的特种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新战法使这种武器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枪特别流行,在1838年法国人就加以仿造,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需要远射程的火枪。他们先后建立了土著的文森狙击兵和猎步兵,并使它们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们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来复枪的改进,因此射程和射击精确度都空前提高了。这些改进使德尔维涅、图沃南和米涅闻名于世。在1830年到1840年间,大多数军队的步兵都采用了击发机,而落后的照例是英国人和俄国人。同时,各国都努力于进一步改良轻火器,制造一种射程更远、可以装备所有步兵的枪。普鲁士人采用针发枪——一种由枪尾装填、射速高而且射程远的来复枪;这种枪最初是在比利时发明的,普鲁士人又大大加以改良。普鲁士军队所有的轻装营都装备了这种枪;其余的步兵前不久都装备着老式的枪,它略加改造就成了米涅式来复枪。英国人这次最先用恩菲尔德式来复枪这种精良的枪装备所有步兵,这种枪是米涅式枪稍加改良而成的;它的优点在克里木战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在因克尔曼会战²³⁴中挽救了英军。

在步兵和骑兵的战术方面,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变革,那就是法国猎兵对轻步兵的战术所作的重大改进和普鲁士采用的新的连纵队制,后者具有很大的战术优点,如稍加改变,不久就一定会成为普遍采用的队形。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仍然采用三列横队的队形,英国军队自拿破仑时代起一直采用二列横队;普鲁士军队在行进中采用三列横队,在作战时大多采用二列横队,第三列是散兵及其支援队;法国军队以往采用三列横队,在克里木战争中改用二列横队,现在全军都在采用这个队形。在骑兵方面,俄国曾尝试恢复17世纪龙骑兵遭到失败,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在各国军队的炮兵中,火炮的部件大有改进,口径以及车轮、炮架的式样等也都简化了。炮兵学大有进展。但是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改革。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装备发射六磅和十二磅重炮弹的火炮;皮埃蒙特军队装备八磅和十六磅的,西班牙军队装备八磅和十二磅的;此前一直使用八磅和十二磅火炮的法国军队,现在采用所谓路易-拿破仑式的榴弹炮——一种也能发射小炮弹的普通的轻型十二磅炮,以代替其他各种野战炮。英国军队在殖民地使用的是三磅和六磅炮,但从英国派出的军队现在只使用九磅、十二磅和十八磅炮。在克里木,英军甚至有一支装备三十二磅炮的野战炮连,但这种野战炮经常深陷土中。

现代各国军队的一般组织都很相似。除了英国和美国,军队都是由强迫征召的士兵来补充的,这里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征兵制,即服役者在服满其期限后终生不再服役;另一种是后备兵制,即现役期限短,但以后还要再次应征服役一定期限。法国是第一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普鲁士则是第二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基干部队和民兵通常都由志愿兵来补充的英国,法律也规定,如志愿兵不

足,民兵可由征兵(或抽签)来补充。瑞士根本没有常备军,整个武装部队由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民兵组成。招募外籍雇佣兵至今在某些国家仍然是常例;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甚至目前还保持瑞士籍的团;法国还有外籍军团,英国在大战时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现役的期限很不相同;瑞士是2周,德意志各小邦是1年半到2年,普鲁士是3年,法国是5—6年,英国是12年,俄国是15—25年。军官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补充。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目前对于由普通士兵晋升军官尽管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实际上存在种种障碍。在法国和奥地利,一部分军官必须从士官中补充;在俄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所以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在普鲁士,在和平时期,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军官官衔,这种考试就成为受教育不多的人的障碍;在英国,由普通士兵提升为军官是罕见的例外。为了培养另一部分军官,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军事学校,可是除了法国,各国的军官并不是非经军事学校训练不可的。在军事教育方面法国军官处于领先地位,在一般教育方面普鲁士军官走在前面;英国人和俄国人则在两方面都是落后的。至于军队所需的马匹,据我们所知,普鲁士是强迫征集马匹的惟一的,马匹的所有者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现代军队的装备和武器目前几乎到处都一样。当然,在武器装备的质量和工艺方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俄国人最差,英国人则由于真正享有工业发达之利而居于首位。

在各国的军队中,步兵都分为基干步兵和轻步兵。前者通常是步兵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轻步兵在各国都是少数。目前,法国轻步兵被公认为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轻步兵,它有21个猎兵营,9个朱阿夫兵营和6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狙击兵营。奥地利轻步兵,特别是来

复枪手,同样是非常好的;它有32个营。普鲁士有9个来复枪营和40个轻步兵营;但是后者尚未能充分适应它们特殊的使命。除了6个来复枪营外,英国没有真正的轻步兵;继俄国之后,无疑要算英国的轻步兵最不适于执行这种勤务了。可以说,俄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轻步兵的,因为它现有的6个来复枪营在它的庞大的军队中是微不足道的。

各国的骑兵同样分为重骑兵和轻骑兵。胸甲骑兵始终是重骑兵,骠骑兵、猎骑兵、轻骑手则始终是轻骑兵。龙骑兵和矛骑兵在某些军队中是轻骑兵,在另外一些军队中则是重骑兵;俄国如果没有哥萨克,那也就根本没有轻骑兵。最好的轻骑兵当然是奥地利的,即匈牙利和波兰族的骠骑兵。炮兵也是这样区分的,只有法国是例外,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他们的枪炮只有一种口径。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根据火炮口径的大小,仍区分为轻炮连和重炮连。轻炮兵又分为骑炮兵和步炮兵两种,前者是专门与骑兵共同行动的。如上所述,奥地利军队没有骑炮兵;英国和法国军队没有真正的步炮兵,他们的炮手都乘坐在前车和弹药车上。

步兵编成连、营、团。营是战术单位;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它是军队进行战斗的组织形式。因此,一个营的人数不应过多,这样营长才能通过口令和目力进行指挥,同时也不应过少,以便它能够在战斗中作为独立单位行动,甚至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也能够独立行动。因此,营的人数在600到1400人之间不等,平均是800到1000人。营分为连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其下属各机动单位,提高士兵的训练细节的效果,以及更便于实施经济管理。实际上,连只有在以散兵向敌开火时才起独立单位的作用,在普鲁士军队中则只有当排列成连纵队时,也就是当4个连中每个连都按3个排编成纵队时,连才具有独

立单位的作用；这种队形要求每个连有很多的人数，在普鲁士，每连有 250 人。在一个营内，连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就像连的人数不固定一样。在英国，每营有 10 个连，每连有 90—120 人；在俄国和普鲁士，每营有 4 个连，每连 250 人；在法国和奥地利，每营有 6 个连，每连人数不等。营合编为团，这与其说为了战术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以及为了进行统一的训练；因此，在战时，同一个团的各营常常彼此分离。在俄国和奥地利，每团有 4 个营；在普鲁士有 3 个营；在法国有 2 个营，后备部队除外；在英国平时大多数团仅有 1 个营。骑兵分为连和团。每连有 100—200 人，是战术单位和行政单位，只有在英国，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才把骑兵连进一步分成 2 个排。每个骑兵团有 3—10 个骑兵连。在英国，平时每团只有 3 个连，每连大约 120 名骑手；在普鲁士，每团有 4 个连，每连有 150 名骑手；在法国，每团有 5 个连，每连有 180—200 名骑手；在奥地利，每团有 6 个或 8 个连，每连有 200 名骑手；在俄国，每团有 6—10 个连，每连有 150—170 名骑手。在骑兵中，团是一个战术单位，因为它拥有进行独立攻击所需的兵器，各连相互支援；因此骑兵团的人数较多，要有 500—1 600 名骑手。只有在英国，骑兵团的人数很少，他们不得不把四五个团合编为一个旅；奥地利和俄国的骑兵团的情况则不同，其人数往往相当于一个中等的旅。法国的骑兵团名义上人数很多，但是在战场上此前一直以较小的编制出现，这是因为他们缺少马匹。炮兵编为连，只有在平时才编成团和旅，因为在战时炮兵连几乎总须单独行动，而且历来总是这样使用的。每连至少有 4 门火炮。在奥地利每连有 8 门火炮；在法国和英国每连有 6 门火炮。来复枪队和其他真正的轻步兵通常只编成营和连，而不编成团；这种兵的性质使他们不适于编成大的单位。工兵和地道爆破兵也是如

此,而且他们在军队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在这方面只有法国军队例外,但是他们的3个工兵和地道爆破兵团一共只有6个营。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的平时建制中,通常都认为团的编制就够了。较大的单位,旅、师、军,多半在战争爆发时才组成。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在平时也使其军队保持组织完整,配齐各级高级指挥官,就像战时一样。但是在普鲁士,这完全是一种空架子,除非是在至少动员整个一个军的情况下,而这就需要征召整个省的战时后备军²³⁵;而在俄国,如果说部队真正编为团,那么最近这次战争³⁸已经表明,原来的师和军很容易混淆起来,所以这种编制的优点与其说在战时,不如说在平时更有意义。

在战时,若干个步兵营或骑兵连合成一个旅:步兵由4—8个营合成,骑兵由6—20个连合成。军队如编有大的骑兵团,则这些团就完全可以代替旅;但是由于团必须派出一些部队执行师的任务,所以团的人数经常减少。轻步兵和基干步兵合成1个旅是有一定好处的,但轻骑兵和重骑兵则不然。奥地利人总是一般给每1个旅配属1个炮兵连。几个旅编成1个师。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师由3个兵种组成,例如:由2个步兵旅、4—6个骑兵连和1—3个炮兵连组成。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完全不把骑兵编入师,英国的师完全由步兵组成。因此,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意在对他们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他们应当一有机会就把骑兵(相应地还有炮兵)配给师,而这事很容易被忽视,或者做起来往往很难,甚至行不通。但是师属骑兵所占的比例在各国都是不大的,因此这一兵种的其余部分,为了建立预备队骑兵,都编为骑兵师,每师2个旅。在较大的军队中,2个或3个师、有时4个师编成1个军。甚至在师里没有骑兵和炮兵的时候,在这样的军里也经常有自己的骑兵和炮兵;当师混合编成时,也仍然有骑

兵和炮兵的预备队,归军长掌握。拿破仑最先建立了这样的预备队,而且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其余全部骑兵编成预备队骑兵军,包括2个或5个配有骑炮兵的骑兵师。俄国的预备队骑兵保持着同样的编制;看来其他国家的军队在大战时也将重新采用这一编制,尽管已经取得的效果同因这种编制而集中于一地的大量骑兵很不相称。战斗部队的现代编制就是这样。但是,尽管废除了帐篷、兵站、野战面包房和粮秣车,军队为了在作战中保证战斗力,仍然有由非战斗人员和车辆组成的大批辎重。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下面列出根据现行条例普鲁士军队1个军所需要的辎重:

炮兵辎重: 6'个车队,共30辆;1个药房,共6辆车;
浮桥辎重: 材料车34辆,工具车5辆,锻工车1辆;
步兵辎重: 车116辆,马108套;
卫生辎重: 车50辆(供1600至2000名病员使用);
预备军需辎重:车159辆;
预备辎重: 车1辆,备用马75匹;

共 计: 车402辆,马1791匹,人员3000名。

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辖军队,除英国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称为参谋部。这些军官的任务是侦察和目测军队运动所经过的或者可能经过的地形;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并且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部队不致丧失战机,不致产生混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因此,这些军官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们必须受过完备的军事教育,熟悉每一兵种在行军和战斗中的能力。所以这些军官在各国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并在高级军事学校中受过严格

训练的。只有英国人以为，从军队中随便挑一名尉官或校官都能担任这种职务；正因为如此，英军参谋部的水平最低，军队只能作最缓慢和最简单的机动，而指挥官，如果说办事认真，便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全部参谋工作。一个师一般只有一名参谋，一个军有自己的参谋部，由一名高级军官或参谋来掌管，一个军团则有完整的参谋部，由几名将军在一名参谋长的领导下工作，参谋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军团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在英国军队中，参谋长下面设一名副官长和一名军需长；在其他的军队中副官长同时就是参谋长。在法国，参谋长一身而二任，在其领导下，两种职能各有其特设的机关。副官长是军队人事部门的长官，他听取各下属机关和部队的报告并掌管纪律、训练、编制、装备、武器等方面的事务。所有的部属都通过他与总司令发生联系。如果他同时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他就和司令共同制定本军团的作战和行动计划。至于进一步详细制定这些计划，那是军需长的职责，他要负责详细计划行军、宿营、野营等具体事项。司令部里设有必要数量的参谋负责侦察地形，草拟防御或进攻计划，等等。此外，还设有炮兵司令和工兵总监，分别管理下属部门；同时还有几个参谋长助理，在战场各地代表参谋长，还有一些传令官和传令兵，负责传送命令和公文。司令部还设有军需官及其文书和财务官，并设医务处长以及军法官或军法处长。军和师的参谋部都是按同样模式组成，但是比较简单，人员也较少；旅部和团部的人数更少，营部则可以只由营长、副官、一名财务官、一名上士文书、一名鼓手或司号兵组成。

大国为了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指挥，除了上述机构，还需要许多其他机构。有负责征兵的官员和补充军队马匹的官员，后者经常与国家管理养马场的机关保持联系；有军官学校、士官学校、步兵

教导营、骑兵教导连、炮兵教导连、骑术学校和兽医学校等。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铸造所以及制造轻火器和火药的工厂；有各种营房、军火库、仓库、要塞及其装备和负责管理它们的军官；最后，还有全军的军需部和总参谋部，其人员数量比单个作战部队的参谋部和军需部更多，所担负的职责更为重要。总参谋部的职责尤其重要。它通常下设战史处（搜集战史、过去和现在的军队编制等方面的材料）、测绘处（负责绘制地图和进行全国地形测量）、统计处等。统管所有这些机关以及整个军队的是国防部。各国国防部的编制各不相同，但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职务范围极广。现在试举法国国防部的编制作为例子。它有七个部：(1)人事部，(2)军械部，(3)工程要塞部，(4)行政管理部，(5)阿尔及利亚事务部，(6)军务部(包括战史处、测绘处等以及各参谋机构)，(7)财务部。部的直属机构有由将官、校官和专家组成的下列咨询委员会：步骑炮兵人事委员会、筑城委员会、军医委员会、兽医委员会和公共工程委员会。这样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机构，负责一支现代第一流军队的人员征集、马匹补充、给养、管理及其经常的扩充。这样的机构是和军队征集的人员的巨大数量相适应的。虽然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曾超过拿破仑在 1812 年所拥有的那支大军，当时他有 20 万人在西班牙，20 万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有 45 万人和 1 300 门火炮侵入俄国；虽然我们很可能再看不到这样一支在仅仅一次军事行动中集中 45 万人的大军，但是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普鲁士，都能够召集、装备和训练一支 50 万人甚至人数更多的军队；虽然这些国家的军队不超过其人口的 1.5%—3%，但是它们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

美国的军事制度是主要依靠各州的民兵和在情况需要时召集的

志愿军来保卫国家；主要用来维持西部印第安部落秩序的常备军，根据 1857 年陆军部长^①的报告，仅有大约 18 00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9 月 24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① 约·弗洛伊德。——编者注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的现状

1857年8月4日于伦敦

当最近一班印度邮件把大量报道(它们的简要内容早先已在电讯中报道过了)带到伦敦以后,德里被攻占的谣言就迅速传开,而且人们全都信以为真,以致影响到证券交易所的行情。这是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²³⁶的翻版,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只要对据说是提供这种好消息的马德拉斯报纸的日期和内容略加考察,真相即可大白。马德拉斯的报道自称是根据6月17日来自阿格拉的私人通讯写成的,但是6月17日拉合尔的官方战报却宣称,截至16日午后4时,德里城下一切还是平静的;同时7月1日的《孟买时报》写道:

“巴纳德将军在击退敌人数次出击后,于17日晨尚在等待援军。”

关于马德拉斯报道的日期,可以说的就是这些。至于它的内容,则显然是根据6月8日巴纳德将军关于攻占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以及有关被围攻者在6月12日、14日出击的一些私人报道写成的。

德里市区及其兵营的军用平面图,终于由劳伦斯上尉根据东印度公司未公布过的一些平面图绘制出来了。由该图可以看出,德里

的防御工事既不完全像人们最初断言的那样不堪一击，也不完全像人们现在宣称的那样固若金汤。德里有一座通过云梯攀登或正规围攻可以拿下的卫城。城墙长 7 英里多，是坚固的砖石结构，但不很高。护城壕狭窄，也不很深，侧射防御工事不能以纵射火力有效地掩护幕墙。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圆堡。它们呈半圆形，并开有枪眼。堡内有螺旋梯由墙顶向下通往与护城壕处于同一水平的弹药室，弹药室的墙上开有供步兵射击的枪眼，这对横过护城壕的攻城云梯队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保护幕墙的棱堡内设有供步兵用的踏垛，但它们可能被曲射火力压制。当起义爆发时，城内的军火库尚有 90 万发弹药，两套配备齐全的攻城炮兵纵列，大量的野战炮和 1 万支步枪。火药库在很久前已根据居民的要求迁至德里城外的兵营内，还存有不下 1 万桶火药。巴纳德将军于 6 月 8 日攻占的制高点位于德里的西北，城外的兵营就设在那里。

从这份根据可靠的平面图所做的说明可以看出，假如目前在德里城下的英军在 5 月 26 日就已经到达，——他们如果配备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本来是可以在那时到达的，——那么，这个起义的堡垒只要经过一次奇袭就一定会被摧毁。考察一下那张在《孟买时报》上发表、然后由伦敦各报转载的列有 6 月底以前起义的各团兵力和起义日期的一览表，就能无可置疑地证明，5 月 26 日占领着德里的起义者还只有四五千人，也就是说，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设想可以防守 7 英里长的城墙的兵力。同时，密拉特距德里仅仅 40 英里，自 1853 年初起，该地一直是孟加拉炮兵司令部的所在地，有供军事科研用的重要的实验室以及野战炮和攻城炮的教练场；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英军指挥官竟连进行一次奇袭所必需的兵器都没有，英军在印度向来是惯于以这种攻击压倒土著人的。起初听说他们在等待攻城炮兵纵

列^①，后来又听说他们需要援军，现在，消息最灵通的伦敦报纸之一《新闻报》告诉我们说：

“我国政府确实知道，巴纳德将军缺乏军需品和弹药，子弹的供应已限于每人24发。”

根据巴纳德将军6月8日关于占领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我们看出，他本来打算在次日强攻德里。然而他不仅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反而由于某种意外情况，只得对被围攻者采取守势了。

目前很难计算双方的兵力。印度报纸的报道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们认为，波拿巴派的《国家报》刊载的一篇印度通讯，可能有某些可信之处，这篇通讯似乎是由加尔各答的法国领事发出的。根据他的报道，6月14日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约为5700人，如果加上该月20日应当开到的援军，其数量预计可增加一倍(?)。他的炮兵纵列由30门重型攻城炮组成；同时起义者的兵力估计为4万人，他们组织很差，但有充足的攻防器材。

顺便说一下，在阿季米尔门外，大概在加济可汗陵墓附近，设营防守的3000名起义者，并不像伦敦某些报纸所想像的那样与英军直接对峙，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与英军之间还隔着整个德里城，因为阿季米尔门在古德里废墟以北的德里新城的西南角。在城市的这一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起义者再设立几个这样的兵营。在城市的东北面，即靠河的一面，起义者控制着舟桥，并且仍与他们的同胞保持着经常联系，能够不断地获得兵员和军需品的补充。德里形成了一个与本国后方畅通无阻的要塞，就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只是小一些罢了。

① 见本卷第212页。——编者注

英军行动的迟缓,不仅使被围攻者能集中大量兵力进行防御,而且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已守住德里若干星期之久,并多次以出击袭扰欧洲兵,再加上每天不断传来整个军队到处爆发新的起义的消息,这一切无疑都增强了西帕依的士气。英军兵力不多,想围困该城自然是不行的,而必须进行强攻。然而,如果下一班邮件还不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那么,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在最近数月内英军的任何重大的作战行动都得停止。雨季将真正到来,“朱木拿河的深而急的流水”将灌满护城壕而使城市的东北面得到保护,同时 75—102 度^①的气温加上平均 9 英寸的降雨量,将使欧洲兵饱受名不虚传的亚洲霍乱的折磨。那时,埃伦伯勒勋爵所说的这段话就会得到证实了:

“我认为,亨·巴纳德爵士是无法停留在他现在的地点的,因为气候不允许。当雨季来临时,他将失去与密拉特、安巴拉和旁遮普的联系;他将被困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地带内,那时他的处境——我不想说这是险境,——只能使他遭到瓦解和覆灭的后果。我相信他会及时撤离该地的。”

因此,德里的问题完全要取决于巴纳德将军是否得到足够的兵员和弹药,以便在 6 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内对德里发动强攻。从另一方面看,巴纳德将军的撤退会大大增强起义者的士气,并可能促使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公开参加起义。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4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9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这里是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 24—39 度。——编者注

弗·恩格斯

阿尔及利亚²³⁷

阿尔及利亚——北非的一部分，过去是土耳其的阿尔及尔帕沙辖区，从1830年起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之一。它北临地中海，东与突尼斯接壤，西与摩洛哥毗邻，南与撒哈拉大沙漠相连。从东到西，最长距离为500英里，从北到南，为200英里。阿特拉斯山脉构成这个国家自然地理的重要特点，它把沿海的可耕地同沙漠隔开。它也是这个地区的南北河流的分水岭。主要的山脉从东向西延伸，中央山脉的支脉在全境纵横交叉。西部最高的山是瓦纳什里斯山脉，托勒密称之为扎拉库斯山，东部最高的山是朱尔朱拉山和欧雷斯山。这些山的高度将近7 000英尺。主要的河流是希利夫河。还有一些相当大的河流，从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流下，注入沙漠。这些河流没有一条可以通航。夏季这些河流几乎是干涸的，但是春季却淹没很大一部分地区，使土壤肥沃。

某些旅行家不认为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害。眼炎和皮肤病为常见病。有人说，并不存在地方性热病，但是法军大批病死或许会使人得出不同的结论。空气清新，夏季炎热；冬季有时很冷，山区尤甚。在与沙漠相连的地方是多沙的不毛之地，但是在两山之间，特别是在河流附近的地方，土壤肥沃。阿尔及利亚生长各种谷物，以及欧洲和

热带的水果；各种花卉，特别是玫瑰花，异常美丽；阿尔及利亚生长的甘蔗，据说是所有已知品种中最大、产量最高的。各种家畜很多。马自然是良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骑。阿尔及利亚的骆驼和单峰驼是优等的。这里是美利奴羊的故乡，西班牙最初就是从阿尔及利亚引进的。努米迪亚狮、黑豹和美洲豹、鸵鸟以及蛇、蝎子和其他有毒的爬虫都很多。

土著居民据认为是柏柏尔人²³⁸，也叫卡比尔人或马威德人，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关于这个种族的史，资料很少，只知道他们曾经占据非洲的整个西北部，现在在东部沿海地区也能看到他们。卡比尔人居住在山区。其余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即伊斯兰教徒入侵者的后裔。这里有摩尔人、土耳其人、库鲁格人²³⁹、犹太人、黑人以及法国人。1852年，全国人口有2 078 035人，其中134 115人是欧洲各族人，此外还有一支10万名士兵的军队。卡比尔人是一个热爱劳动的种族，居住在一般的村庄里，都是出色的庄稼人，也在矿场、金属加工企业以及粗毛和棉花加工工场做工。他们制造火药和肥皂，采集蜂蜜和蜂蜡，供应城市家禽、水果和其他产品。阿拉伯人沿袭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生活，根据对牧场的需要或其他情况，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居民中最不受尊敬的大概是摩尔人。他们住在城市里，生活过得比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都舒适；由于一直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非常胆怯，可是仍然保留着残酷本性和报复心理，道德水平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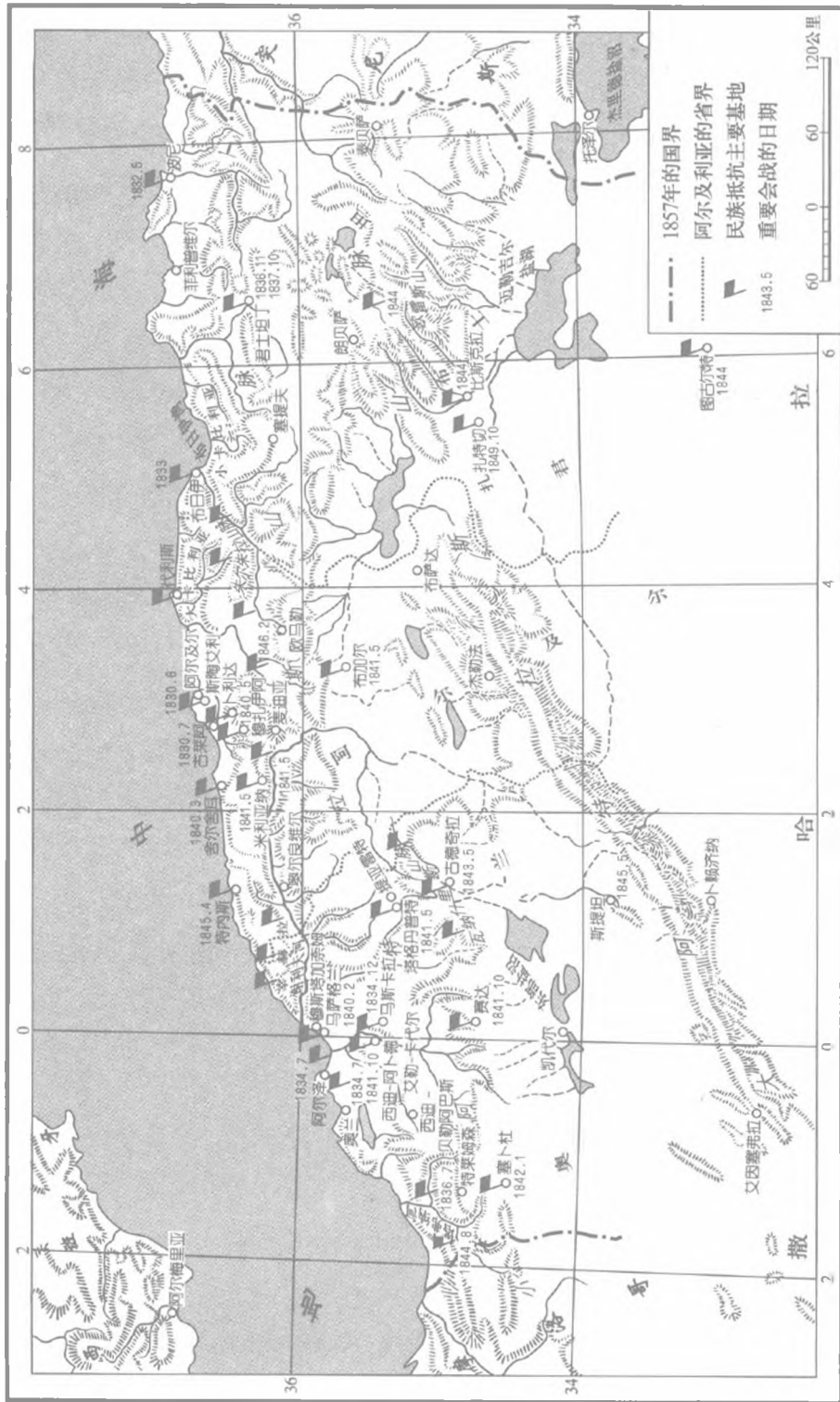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城市是：首都阿尔及尔、约有2万居民的君士坦丁和沿海的筑垒城市波尼（1847年约有1万居民）。波尼附近有珊瑚场，常有做珊瑚生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光顾。布日伊位于布日伊湾。卡比尔人曾在布日伊附近把法国的一艘双桅横帆艇的锚索

砍断，使之搁浅，然后杀死船员，把船洗劫一空。正是这种暴力行为，促使法军加快占领了这个地点。

在内地，尤其在君士坦丁省，有一些古迹，例如朗贝萨古城的遗址，那里有城门的一些残迹、一座圆剧场的遗迹和一座用科林斯柱支撑的陵墓。位于海滨的古莱阿[和]舍尔舍耳，后者是古代的尤利亚·凯撒里亚城，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这里曾是尤巴的驻在地，附近有许多古代遗迹。奥兰是一个筑垒城市，1792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人统治。特莱姆森曾是阿卜杜尔·卡迪尔的驻在地，位于肥沃地带，旧城于1670年被焚毁，新城则几乎完全被法军破坏。这里生产地毯和毛毯。扎布，即古代的格士利亚，位于阿特拉斯的南面。比斯克拉也是一个重要地点，比斯克拉人温良和善，他们在北方各港口当差役和搬运工很受欢迎。

阿尔及利亚先后被罗马人、汪达尔人和阿拉伯人征服。1492年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后，斐迪南派一支远征军征讨阿尔及利亚，占领了奥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势将征服整片国土。塞里姆·库泰米这位管辖与阿尔及尔城相邻的肥沃的迈提贾平原的艾米尔，无力抗击强大的入侵者，求助于土耳其人，于是著名的海盗巴巴罗萨·奥鲁治被派去支援。奥鲁治于1516年到达，他首先自立为国君，亲手杀死塞里姆·库泰米，然后向西班牙人进攻。在一场时胜时败的战争之后，他不得不躲往特莱姆森，一支西班牙军队包围并俘获了他，于1518年将他处死。他的哥哥海尔埃丁成了他的继承人。海尔埃丁向苏丹塞里姆一世求援，并承认这位君主为自己的最高宗主。塞里姆遂任命海尔埃丁为阿尔及尔的帕沙，并给他派了一支军队，使他能够用这支军队击退西班牙人，最后再自立为国君。由于他在地中海抗击基督教徒有功，苏里曼一世封他为卡普坦-帕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19世纪上半叶)



沙^①。查理五世试图恢复西班牙人的统治,于1541年派遣一支由370艘战船和3万人员组成的强大远征军横渡地中海。但是一场凶猛的风暴和地震打散了舰队,使舰队和陆军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部队没有掩蔽所,又受到勇猛的敌人不间断的骚扰性攻击,只得回到船上逃走,损失了8000人、15艘战船和140条运输船。从此,柏柏尔国家²³⁸与马耳他骑士²⁴⁰之间就战事不断,由此产生了海盗行为,阿尔及利亚海盗在地中海造成普遍的恐怖,基督教国家不得不长期对之低头屈服。布莱克统率的英军、杜坎统率的法军、荷兰军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不同时期都攻打过阿尔及尔;杜坎曾两度炮击阿尔及尔,事后德依^②派人请来路易十四的法国领事,从他那里得知炮击花了多少钱,便嘲笑说,只要给他这笔钱的一半,他就能自己把这个城市烧毁。

尽管欧洲列强不断加以防止,海上掠夺行为还是在继续;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海岸有时也遭受专门从事这种恐怖的战争和掠夺行业的暴徒的袭击。成千上万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在阿尔及尔一直遭受折磨。虔诚的教徒建立了一些团体,专门为了每年往返阿尔及尔,用囚犯们的亲属为救他们而拿出的钱把他们赎回来。这时,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已经是有名无实了。由土耳其近卫军²⁴¹推举的德依纷纷宣布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1705年,易卜拉欣德依赶走了最后一个土耳其帕沙;土耳其近卫军在激烈的选举中选出新的首领,这些首领往往又在士兵哗变中被杀害。近卫军是从土耳其的移民中招募

① 卡普坦-帕沙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的称号。——编者注

② 德依是1671—1830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称号。——编者注

来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甚至土耳其近卫军士兵与土著妇女所生的儿子都不准加入他们的队伍。德依有时向君士坦丁堡送礼,以表示其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但经常性的贡赋已完全停止,同时,土耳其人被自己同俄国的无休止的斗争所牵制,也没有力量去镇压远方省份的叛乱者。指明如何消灭这种怪物般的暴政,这一使命正等待着年轻的共和国美国来承担。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有地中海的强大舰队保护贸易,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他们非法的勒索。恢复和平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又重新开始其劫掠行为;美国人在1795年为了维持和平,曾经不得不仿效欧洲各国向德依缴纳买路钱,而现在已拒不纳贡了。1815年分舰队指挥官迪凯特在与一支阿尔及利亚分舰队的遭遇战中,俘获了一艘三桅快速战舰和一艘双桅横帆艇,进入阿尔及尔湾,迫使德依交出所有的美国俘虏并放弃以后对贡款的任何要求。英国人效法这个勇敢的先例,于1816年在埃克斯茅斯勋爵的统率下炮击阿尔及尔城,把它夷为废墟,迫使德依交出英国俘虏。但是这毕竟只是惩罚措施,因为海盗行为并没有绝迹;1826年,阿尔及利亚人又公开在地中海掠夺意大利船只,甚至侵入北海。1818年,侯赛因德依执政;1823年,法国领事的住宅被抢劫,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多次受到袭击,法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最后,这位阿尔及尔的德依当面侮辱了法国领事,并对法国国王使用了不尊敬的语言,因为国王没有答复德依就法国政府欠犹太商人的债的问题所写的信,这些商人又都欠侯赛因的债²⁴²。为了迫使德依道歉,法国派出一支分舰队封锁了阿尔及尔。法国、穆罕默德-阿里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开始谈判,在谈判中,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承诺征服阿尔及尔,并向苏丹定期交纳贡款,后者则答应任命他为阿尔及尔的总督。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

英国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和穆罕默德-阿里在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上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查理十世政府决定单独远征阿尔及尔。1830年6月13日,布尔蒙将军统率的38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侯赛因德依征招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与之作战,但是在法军已然登陆的情况下,他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7月4日,阿尔及尔投降,条件是:对居民的私人财产和他们的宗教予以尊重,德依和他的土耳其士兵则必须离开。法军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的战利品包括12艘战船、1500门铜炮和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钱币。他们在阿尔及尔立即配置守备部队,实行军事管制。查理十世政府打算把阿尔及尔让给苏丹,而正当这个指令送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1830年的七月事变废黜了查理十世。²⁴³他的继位者^①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决定保留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任命克洛塞尔为总司令去接替布尔蒙。

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在每一座大小城镇被征服时,处处都有大量的生命牺牲。阿拉伯和卡比尔部落珍视独立,仇恨外族统治而不惜性命,他们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庄稼被践踏,幸存的受难者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惨遭奸淫和暴力。法国人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完全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准则。他们替自己辩护,说卡比尔人残暴、嗜杀成性、拷打俘虏,还说,对野蛮人宽容是一种错误。但是一个文明政府竟采取以牙还牙的复仇政策是大成问题的。观其果而知其树,可以说,法国花费了大约一亿美元,牺牲了几十万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阿尔及利亚成了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一所法国将军和士兵的军事学校,所有后来在克里木战争中获得荣誉的法国军官都在这个学校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教育。至于殖民的尝试,只要把欧洲人的人数和土著居民的人数作一比较,就可以证明这种尝试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失败了,而且这发生在世界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发生在离法国只有 20 小时路程的意大利古代粮仓,那里惟一缺少的就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论军事上的朋友或野蛮的敌人都威胁着这种安全。这种失败是由于法国人性格上的一种先天的缺陷而使他们不适于移民,或者是由于地方行政当局的不明智,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所有重要的城市——君士坦丁、波尼、布日伊、阿尔泽、穆斯塔加奈姆、特莱姆森——都是被强攻占领的,都遭到随之而来的一切灾祸。土著人曾怀着很深的敌意屈从于土耳其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他们是教友;但是,他们从新政权的所谓文明中却看不到任何好处,并且因宗教狂热而对新政权深恶痛绝。每个总督上任都无非是重复前任的苛政;文告中宣布了最善良的意愿,但是占领军的军事行动,双方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都使关于和平和善意的表白化为泡影。

1831 年比雄男爵被任命为民政长官;他力图建立一套与军事管理机构并行的民政管理制度,但是,他的措施会导致对总督的约束,所以激怒了拿破仑的老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于是按照他的意见,比雄被召回。阿尔及利亚在萨瓦里的统治下变成了所有因政治或社会方面行为不当而受法律制裁者的流放地;一个外籍军团开入了阿尔及利亚,它的士兵不准进入城市。1833 年有人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写道:

“三年来我们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向当局提出申诉,所得到的答复就是新的暴行,而暴行首先是针对那些提出申诉的人。结果,没有人敢提什

么了；正因为如此，这份请愿书没有署名。先生们，我们恳求你们为了人道而把我们这种毁灭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吧，把我们从奴隶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吧！如果这个国家仍然置于军事管制法之下，如果这个国家不要民政管理，那么我们就完了；我们这里就永无宁日了。”

这份请愿书促使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结果，建立了民政管理。萨瓦里死后，在瓦罗尔将军临时执政时期，为了平息民愤，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排干沼泽地，修筑道路，建立本地民兵。但是，当曾经率军向君士坦丁进行过第一次也是十分不成功的一次远征²⁴⁴的克洛塞尔元帅回到阿尔及利亚时，所有这些措施都停止了。他的治理激起普遍不满，1836年，一份由54名当地的头面人物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要求调查他的滥用职权行为。克洛塞尔终于被迫辞职。路易-菲力浦在其执政的整个时期，一直试图进行殖民，但其惟一结果是土地投机；实行军事殖民也毫无成效，因为种地的移民一旦离开他们碉堡的火炮射程范围就不安全；还试图向阿尔及利亚东部移民，把阿卜杜尔·卡迪尔从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西部赶走²⁴⁵。由于这位坚韧不拔、大胆无畏的首领的失败，这个国家完全被平定，加米安-加腊勃大部落随即表示归顺。

1848年革命时期，卡芬雅克将军接替奥马尔公爵任阿尔及利亚省总督。不久，他和也在阿尔及利亚的茹安维尔亲王一起离职。但是对该省的统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顺利。在共和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总督一再更换。移民被送去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不是接连不断地死亡，就是满心厌恶地离开。1849年，佩利西埃将军袭击一些部落和贝尼·锡勒姆的一些村庄；他们的庄稼和一切有用的什物照例都被焚毁，因为他们拒绝纳贡。在扎布这个与沙漠接壤的富庶地区，在一名马拉布特²⁴⁶的鼓动下发生了大规模的骚动；1 200名远征

军开赴该地，但是被起义者击败。起义的规模很大，鼓动起义的是一些叫做西迪·阿勃迭腊赫曼的秘密组织，其主要宗旨就是歼灭法国人。起义者直到康罗贝尔和埃尔比荣将军率领的一支远征军到达后才被击败；对扎特切这个阿拉伯城镇的围攻也表明，土著人没有丧失勇气，对入侵者绝无好感。这个城镇在 51 天中击退了围攻者的多次进攻，最后才被强攻占领。小卡比利亚直到 1851 年才投降，圣阿尔诺将军在这一年征服了它，从而建立了一条菲利普维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交通线。

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繁荣的言论。但这都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内地始终没有被殖民化。除了沿海地区和城市附近，法国人的统治纯属幻想。各部落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表示对法国的统治极端憎恶，所以法国人的野蛮的清剿活动从未停止。例如，1857 年，朗东元帅就对尚未屈服的卡比尔人的村镇进行了一次胜利的清剿，企图把他们的土地并入法国领地。土著人一直受着铁腕专制的统治，但是不断的起义说明法国的占领并不稳固，以这种手段维持的和平是虚假的。1857 年 8 月在奥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阿拉伯局²⁴⁷长官杜瓦诺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名富豪的罪犯；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员，甚至下级官员，依仗权势，专横暴戾，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目前总督管辖区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央的阿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这个国家由一个兼总司令的总督管辖；他的助手是秘书和民政长官；在总督下面还有一个由内务长官、海军司令、陆军司令以及首席检查官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确认总督的法令。阿尔及利亚讼事审理委员会审理民事和刑事方面的违法行为。

在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的省,有市长、法官和警官。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部落仍然有他们自己的卡迪^①;但他们那里建立了他们似乎比较喜欢的仲裁法庭制度,并且有专门负责在法国法庭上为阿拉伯人利益辩护的官员(阿拉伯人的律师)。

据调查,阿尔及利亚的贸易从法国占领以后大有发展。进口价值约为2200万美元,出口价值约为300万美元。进口的是棉织品、毛织品、丝织品、谷物、面粉、石灰和精制食糖;出口的是未加工的珊瑚、皮革、小麦、植物油、羊毛以及其他某些小商品。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8月
10日—21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卡迪是根据伊斯兰教教规进行审判的法官。——编者注

弗·恩格斯

弹 药

弹药——使用火器所需要的射弹、装药和点火具，这个词通常是指这三者已制出备用的成品。例如，轻火器的弹药包括子弹和火帽（当然，燧发枪或针发枪不用火帽）；野战炮的弹药包括实心弹、爆炸弹、霰弹、榴霰弹、装药、信管、火绳和点火具等以及火箭连所使用的火箭。在要塞里和在围攻时，火药一般存放于桶中，需要时将它制成装药；围攻时所需的各种混合火药也同样处理；空心弹也是就地装填的。野战军队的弹药数量根据情况而定。每名步兵一般随身携带60发子弹，很少多带；随军车辆为每名士兵载运同样数量的子弹；其余的弹药则由后续的车队（相距一两天的路程）载运。在野战炮兵里，炮兵连的每门火炮常备150—200发炮弹，一部分装在火炮前车的弹药箱里，另一部分装在弹药车里；此外，在军队的弹药储备中，每门火炮通常还有200发炮弹，其余的炮弹则由后续的车队载运。在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军队中一般都是这样，当然，这只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经过数月作战，弹药储备一般就会消耗殆尽，也可能因一次战斗的失利而完全丧失，弹药的补充则往往困难而缓慢。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8 月
10 日—21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东 方 问 题

1857年8月11日于伦敦

据说,大约在14个月以前已经由巴黎和约⁷⁰解决了的东方问题,现在由于外交活动在君士坦丁堡的停顿,竟然又成了悬案。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大使馆在该地降下了它们的国旗,同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关系。支持土耳其国务会议反对四强的要求的英国和奥地利大使,则同时宣布他们不怕对这一冲突可能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这些事件发生在本月6日。戏剧的情节还是旧的,但是剧中人物变换了角色,通过新的演出,剧情具有了某些新意。这次打先锋的已不是俄国,而是法国。它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图沃奈尔先生,用有点装腔作势的、缅施科夫式的语气,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销在摩尔多瓦的选举,因为摩尔多瓦的卡马康^①沃戈里德斯违反巴黎条约,通过不正当的干涉,竟让反对合并的人获得了多数的代表名额。²⁴⁸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但表示同意把卡马康召到君士坦丁

① 卡马康(Kaimakam)指代理国君。——编者注

堡,让他来回答对他这次行为的指责。图沃奈尔先生傲慢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委托设在布加勒斯特的欧洲改组委员会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在这个委员会中,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代表占多数,这些人正是赞成多瑙河两公国合并、指控沃戈里德斯非法干涉的人,因此,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奥地利大使的挑唆下,当然拒绝让自己的死对头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裁决一切。灾难也就由此产生了。

显然,现在争执的真正问题,仍然是那个曾经引起对俄战争的问题,这就是:让多瑙河两公国完全脱离土耳其,不过这次不打算采用“物质保障”的形式,而打算采用两公国合并,由一个欧洲傀儡君主统治的形式。俄国以其特有的沉着、谨慎和耐心,从不偏离其既定目标。在只对它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它已经能够把一部分敌人团结起来反对其余的敌人,从而可望用一部分人制服另一部分人。至于波拿巴,他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他希望利用国际纠纷作为排解国内不满情绪的安全阀。他因俄国肯赏光戴上法国面具出场并让他领舞而扬扬得意。他那虚构的帝国也只能满足于这种戏剧性的胜利,在他内心深处,他可以自欺欺人地指望把一个属于波拿巴王朝的人借俄国的帮助扶上通过外交谈判而临时拼凑的罗马尼亚的傀儡王座。自从有名的1850年华沙会议²⁴⁹以及奥地利军队进入德意志北部边境以来,普鲁士总想在自己不吃亏的情况下对奥地利报复一下。撒丁则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同奥地利的一场冲突,但已不再通过同意大利革命结成危险的同盟,而是跟随在大陆专制列强的后面。

俄国极力要实现多瑙河两公国合并,奥地利则极力反对这种合并。奥地利很了解这个方案的主要动机,它更直接地针对的是自己,而不是土耳其政府。最后,主要靠佯装反俄来博得声誉的帕麦斯顿,

自然必须假装分担弗兰茨-约瑟夫的真正恐惧。他无论如何必须装作他同奥地利、土耳其政府是一致的，除非受到法国的逼迫，他不会对俄国的压力让步。这就是各有关方面的立场。在这里，罗马尼亚人民云云不过是个借口，人们关心的根本不是他们。甚至极端狂热的人也未必会这样轻信，以为路易-拿破仑真心维护真正的人民选举，以为俄国真的热切希望罗马尼亚民族强盛，从彼得大帝以来，毁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和战争的目的之一。

几个自封的罗马尼亚爱国者在布鲁塞尔创办的一家名为《多瑙河之星》的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摩尔多瓦选举的文件，我想把其中的主要内容给《论坛报》翻译出来。这是一些写给摩尔多瓦的卡马康尼古拉·沃戈里德斯的信件，写信人有：他的父亲斯蒂凡·沃戈里德斯，他的内兄、土耳其驻伦敦大使穆苏鲁斯，他的弟弟、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他的另一个内兄、摩尔多瓦政府驻君士坦丁堡的代办福蒂阿代斯先生，以及奥地利派驻土耳其政府的使节普罗凯施男爵。这些信是不久前从卡马康在雅西的宫中盗窃出来的，现在《多瑙河之星》以掌握这些信的原稿而大肆吹嘘。《多瑙河之星》显然认为撬锁盗窃是搜集外交情报的十分体面的方式，欧洲的一切官方报刊看来也都赞同这种观点。

《多瑙河之星》发表的关于摩尔多瓦 选举的秘密信件^①

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康·穆苏鲁斯先生

致卡马康沃戈里德斯(摘录)

1857年4月23日于伦敦

“我秘密地告诉您,克拉伦登勋爵赞同您就出版问题给法俄两国领事^②的答复。他认为,这一答复是恰如其分、公平合理的。我在勋爵阁下面前称赞了您在当前形势下的明智之举。我写信给土耳其政府,设法保证您能得到您理所应得的高升。您一定会拯救这个美好的国家,使它不致遭受那些不配称为摩尔多瓦人的卖国贼力图使它遭受的危险。他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奖赏,竟堕落到想把自己的祖国摩尔多瓦变成瓦拉几亚的附庸,想把摩尔多瓦从自治的民族中一笔勾销。他们不顾当代人和后代的诟骂,竟想借口建立一个幻想的罗马尼亚,把摩尔多瓦和摩尔多瓦人降为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您蔑视这伙厚颜无耻地自称民族派的败类,是履行一个忠诚、英勇的爱国者的责任。在极力扩张国土的瓦拉几亚,合并派才可以自称为民族派;但是在摩尔多瓦,这种人只能称为反民族派。在这里,惟有反对合并的才是民族派…… 英国政府坚决反对合并。请不必怀疑。我秘密地告诉您,有关这方面的指示,不久前已发给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特派员^③(此人是我的朋友),阁下很快就可看到这个指示的结果。您在出版问题上给法俄两国领事的答复是很恰当的…… 作为一个自治公国的首领,您的职责就是回击那些外国人对内政的不光彩的、非法的干涉。既然这两国的领事犯了错误,他们的政府为了解救他们只好把他们召回,这并不是您的过错…… 我还担心,在外国干涉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在对您的态度上会很为难,在同您的通信中会违心地不充分表达它对您温和审慎的举止所感到的满

① 1857年8月8日《多瑙河之星》第50号。——编者注

② 维克多·普拉斯和波波夫。——编者注

③ 威廉·亨利·利顿·厄尔·布尔沃。——编者注

意和嘉许。当然,作为摩尔多瓦的卡马康,您必须服从最高政府;但与此同时,作为这个独立公国的首领,作为摩尔多瓦的波雅尔^①,您又必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在必要时应向土耳其政府指出,摩尔多瓦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公国存在,是两公国自古就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

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

致卡马康沃戈里德斯

“我紧急通知您,您的内兄刚才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他带来了关于勋爵阁下对两公国合并的态度的重要消息。帕麦斯顿勋爵坚决反对合并;他认为合并是侵犯我国的主权,因此将对英国驻两公国特派员亨利·布尔沃爵士发出相应的指示。所以,正像我以前写信告诉您的那样,您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摩尔多瓦人表示拥护合并的任何愿望,尽力表现得能博得土耳其政府的好感或英奥两国的支持。既然三强决定反对合并,您就不必对法国的意图或威胁感到不安,法国报刊对您的态度,就像对一个希腊人一样。”

同一人致同一人

1857年4月15日于伦敦

“我劝您完全按照奥地利领事^②的意见行事,不管他有多少缺点,甚至不管他的态度越来越傲慢。您必须看到,这个人只是按照他本国政府的指示办事。奥地利完全同意土耳其政府与英国的观点,因此,如果奥地利表示满意,土耳其和英国也必然表示满意。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您必须听从奥地利领事的意见和愿望,毫不反对地使用他向您推荐的人,而不必追究这些人是否道德败坏或声名狼藉。只要这些人真心反对合并就行。这就够了。因为,如果摩尔多瓦的国务会议宣布要合并,奥地利就会要您对不听从它的那位积极反对合并的领事的意见担负责任。至于英国,即使两公国的国务会议都主张合并,它也绝不会让这种合并实现的。然而您最好还是能阻止摩尔多瓦的国务会议宣布合并,因为这样三强就比较容易对付法国和俄国,从而您就会得到它们的感谢……您禁

① 波雅尔(boyar)是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编者注

② 奥斯卡·德·格德尔·拉努瓦。——编者注

止新闻出版自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摩尔多瓦的狂妄之徒,那些戴着法国面具的俄国之友,会滥用这种新闻出版自由来煽起一场要求合并的民众运动……绝不容许这种阴谋得逞。我相信,如果在法国发行了《多瑙河之星》以及其他同样下流的刊物,政府立刻会把它们的创办人放逐到卡宴^①去的。法国既然热切期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能够成立自由俱乐部和举行政治性聚会,它就应该先在自己家里准许这样做,不要放逐和警告一切敢于稍微自由地讲话的记者。法国有这么一句谚语:“善举应先从自家做起”^②。巴黎条约没有提到两公国的合并;它只是说,两公国的国务会议将对国家的内部改组发表意见;可是把合并当做自己口号的狂妄之徒,完全忘记了条约的这一条款,不考虑内部改革,只追求新的国际组织,幻想着外国君主统治下的独立……英国采取同奥地利完全一致的行动,坚决反对合并,并且同土耳其政府一致,决不让合并实现。如果法国领事对您说一些相反的话,不要相信他,因为他满口谎言。”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11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0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首府,过去是法国政治犯流放和服苦役的地方。——编者注

② 蒙吕克《格言剧》第 3 幕第 7 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8月14日于伦敦

当7月30日的的里雅斯特电讯和8月1日的印度邮件带来的印度消息^①最初传来时,我们曾立即指出,从这些消息的内容和日期来看,攻占德里的说法是一个低劣的骗局,是令人难以忘却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事件²³⁶的极其拙劣的仿制品。但是约翰牛的轻信却令人如此难以理解,他的大臣、他的股票经纪人和他的报纸居然能使他确信,那些只说明巴纳德将军采取纯守势的报道中,包含着全歼敌人的证据。日复一日,这种幻觉越来越强,始终如一,最后甚至使精于此道的将军德·莱西·伊文思爵士也于8月12日晚在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宣称,他相信攻占德里的传闻是可靠的。然而在这场令人发笑的表演之后,肥皂泡接着就要破裂了。第二天,即8月13日,就接二连三地收到比印度邮件先到达的、发自的里雅斯特和马赛的电讯,明确地指出6月27日德里的状况仍无变化,那位仍然只进行防御并苦于应付被围攻者频繁猛烈出击的巴纳德将军,对于自己能

^① 指攻占德里的虚假报道,见本卷第270页。——编者注

阵地守到那个时候,已经感到十分高兴了。

我们估计,下一班邮件大概将带来英军撤退的消息,或者至少将报道一些预示这种撤退行动的事实。肯定地说,德里城墙那样长,无法想像防御者能够处处有效地加以防守;相反,这会招致敌人以集中的兵力突然进行奇袭。但是巴纳德将军似乎深受欧洲人关于筑垒城市、围攻和轰击等观念的影响,不愿意采取查理·纳皮尔爵士所擅长的那种使亚洲人吃惊的出奇制胜的大胆行动。据说,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确已增加到12 000人左右,其中欧洲兵7 000人,“可靠的土著兵”5 000人;但另一方面,无可否认,起义者每天都得到新的援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围攻者和被围攻者兵力悬殊的情况依然如故。此外,巴纳德将军能够依靠突然袭击获得一定胜利的惟一地点,就是位于制高点的莫卧儿宫,但是在可能已经到来的雨季,要从河岸向莫卧儿宫接近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从克什米尔门和河之间攻打莫卧儿宫,又将使进攻者在一旦失利时遭到最大的危险。最后,雨季的到来,必将使这位将军以保障交通线和退路作为他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总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会以他那还不充裕的兵力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去冒险干他在比较有利的季节都不敢做的事。尽管伦敦的报纸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竭力欺骗自己,但上层人物已极为不安,这一点从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晨邮报》就可以看出。该报贪财的绅士们向我们报道说:

“我们怀疑,甚至下一班邮件能否给我们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一旦目前驰援围攻者的队伍开到并带去足够数量的(看来仍感不足的)重炮,我们就会得到叛乱者的堡垒陷落的消息。”

显然,英国的将军们由于软弱、犹豫和失策,竭力把德里抬高为印度起义的政治军事中心。英军在长期围攻以后退却,或者只守不

攻,就会被看做是一种无可怀疑的失败,并且会引起全面的动乱。此外,这还会使英军感到面临灭顶之灾,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陷于此种境地,只是因为不断进行出击、搏斗的围攻战,以及希望很快能对敌人进行血腥报复,使他们处于亢奋状态。至于说印度教徒对起义漠不关心,甚至说他们同情英国的统治,那完全是无稽之谈。王公们,像真正的亚洲人一样,正在等待时机。在不受一小撮欧洲人控制的整个孟加拉管区,人们安于自由自在的无政府状态,不过,在那里也没有他们要反抗的人。如果指望印度起义具有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将是可笑的误解。

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军队还没有表态,人民当然也就没有行动起来。至于旁遮普,它直到目前仍是欧洲部队的主要中心基地,当地的土著部队已被解除武装。要想发动起义,附近的半独立的王公们还必须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像孟加拉军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广泛的密谋,没有土著居民的暗中同情和支持,是肯定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实现的,就如同英国人在筹措军队给养品和运输工具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正是军队集中缓慢的主要原因)说明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一样。

电讯中的其他消息之具有重要性,也只是在于它们说明:在旁遮普最远的边境,即白沙瓦地区已爆发起义;另一方面,起义正由德里往南向孟买管区迅速推进,遍及占西、绍戈尔、印多尔、马乌等基地,最后达到孟买东北仅 180 英里的奥兰加巴德。关于本德尔肯德的占西,我们可以指出,这里筑有防御工事,因而可能成为武装起义的另一个中心。另一方面,据报道,范考特兰特将军在为了与德里城下的巴纳德将军会师而由西北向那里进发的途中,打败了锡尔萨地区的哗变者;他那时距离德里还有 170 英里。他需要经过占西地区,在那

里他会重新与起义者遭遇。至于英国本土的政府所采取的准备措施，帕麦斯顿勋爵似乎认为最曲折的路线就是最捷近的路线，所以他命令军队绕道好望角前往印度，而不经埃及。另外，原定派往中国的数千人到锡兰后便被截住，转派往加尔各答，而7月2日第五燧发枪团确已到达该地，这一事实，使他有机会对他的驯顺的下院议员们中那些竟然至今还不相信他的对华战争完全是“发一笔横财”的人开一个恶作剧式的玩笑。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
14日

载于1857年8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0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欧洲的政治形势

在下院闭会前夕，帕麦斯顿勋爵利用最后一次会议前的一次会议，让它大致看一眼他准备在已结束的本届会议和下届会议之间为英国公众上演的几场好戏。他的节目单上的第一项就是宣布恢复对波斯的战争，这场战争，按照他在几个月之前所说的，已由3月4日签订的和约^①宣告最后结束了。将军德·莱西·伊文思爵士曾希望命令雅科布上校率领目前驻波斯湾的部队返回印度，这时帕麦斯顿勋爵却直截了当地声明，只要波斯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雅科布上校的部队就不能撤离。然而，赫拉特的驻军还没有撤走。相反，盛传波斯又向赫拉特增派了军队。固然波斯驻巴黎大使^②予以否认，但是波斯方面的诚意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严重怀疑，所以雅科布上校所率领的英军还要继续占领布什尔。就在帕麦斯顿勋爵讲话的第二天，电讯传来消息，说默里先生已经强烈要求波斯政府从赫拉特撤兵²¹；这个要求完全可以被认为是重新宣战的先兆。这就是印度起义¹⁴⁷的第一个国际影响。

帕麦斯顿勋爵的节目单上的第二项缺乏具体细节，但是展示了

① 见本卷第159—163页。——编者注

② 费鲁赫汗。——编者注

一幅广阔的远景。当初他宣布从英国抽调大批军队派往印度，他的反对者曾指责他使英国丧失防御能力，从而给外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他的回答是：

“英国人民永远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随时可以迅速动员足够的人力去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可是现在，在议会闭会前夕，他却完全改变了腔调。对于德·莱西·伊文思将军关于用螺旋桨战列舰运送军队去印度的建议，他的回答已不像从前那样，硬说帆比螺旋桨优越，相反，他承认这位将军的计划首先是很有可取之处。但是，下院也应该记住：

“至于是否需要在本国保持足够数量的陆军和海军，应该另作考虑……有些情况说明，向国外派出的海军超出绝对必需的数量，是不适当的。当然，汽轮战列舰处于常备状态，目前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但是，一旦发生前面所指的那种事件，就需要派海军出海作战，如果让战列舰去执行向印度运兵的任务，那怎么能够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把舰队派往印度，就要犯严重错误，因为欧洲目前的局势可能需要这支舰队在最短期间准备战斗以进行自卫。”

不可否认，帕麦斯顿勋爵使约翰牛实在左右为难。如果采取有效的手段坚决镇压印度起义，本国就会遭到攻击；如果让印度起义的力量壮大起来，那就会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

“在舞台上，除了那些印度的王公，还要同其他一些人物较量”。

在谈到被说得那么神秘的“欧洲局势”之前，不妨先综述一下同一次下院会议上所说的关于英军目前在印度的真实情况。首先，一举攻占德里的一切美妙希望，仿佛不约而同地被放弃了，以前那种狂妄估计，已经让位给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如果英军能把他们的据点坚守到11月国内援军开到的时候，那就很值得庆幸了。其次，人们

隐隐地担心最重要的据点坎普尔很可能失守，而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坎普尔的命运；他认为，解救坎普尔甚至比攻占德里还重要。坎普尔位于恒河流域中心，牵制着奥德、罗希尔肯德、瓜廖尔、本德尔肯德，而且还是德里的前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坎普尔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地方。最后，下院中的一位军职议员弗·斯密斯爵士，提请下院注意下面这个事实：在他们的印度军队中，实际上没有工兵，因为他们都开了小差，很可能“德里会成为第二个萨拉戈萨²⁵⁰”。另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也忘了从英国派出工兵部队的官兵。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所谓“隐现于未来”的欧洲事件，这时，伦敦《泰晤士报》的那篇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暗示的评论文章，让我们立刻大吃一惊。它说，法国的宪法可能被推翻，或者拿破仑可能与世长辞，那时，目前安危所系的英法同盟就要告终。换句话说，《泰晤士报》这家代表英国内阁的大报，认为法国随时可能爆发革命，同时宣称，作为目前的同盟的基础的，不是法国人民的赞同，而只是同这个法国篡权者的秘密勾结。除了法国可能发生革命以外，还有多瑙河地区的纠纷问题²⁴⁸。摩尔多瓦的选举结果宣告无效并未使纠纷得到平息，它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成为大动乱的舞台，也许会发出欧洲国际冲突的信号。北欧之所以还能保持和平，是因为那里在急切地等待着两件事情的发生：瑞典国王^①的去世和丹麦当今国王的逊位。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最近举行的一次博物学家大会上，瑞典皇太子^②坚决主张建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联盟。此人正当壮年，坚

① 奥斯卡尔一世。——编者注

② 查理·路德维希·欧根。——编者注

毅果敢,正在把瑞典、挪威、丹麦的热血青年团结在自己队伍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党,将把他的登基看做是拿起武器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孱弱而愚钝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据说已终于得到他那位门户悬殊的配偶丹纳尔女伯爵的准许而引退,在此以前她一直不准他这样做。正是由于她的缘故,国王的叔父斐迪南亲王这个丹麦王位的假定继承人,曾被迫不问国事,后来经过皇族其他成员的协商,才再次入朝秉政。现在,据说丹纳尔女伯爵有意从哥本哈根迁居巴黎,甚至想怂恿国王永远退出充满风浪的政治生活,把王杖交给斐迪南亲王。这位 65 岁左右的斐迪南亲王,对哥本哈根宫廷的关系一向同阿尔图阿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对土伊勒里宫廷的关系一样。他性格倔强、苛刻,守旧观念非常强烈,从来就不屑于挂上拥护立宪制度的招牌。然而他登上王位的首要条件将是宣誓接受他公开表示憎恶的宪法。由此可见,国际纠纷是很可能发生的,瑞典和丹麦的斯堪的纳维亚党都打定主意要利用这些国际纠纷而有所收获。另一方面,丹麦同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后盾的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冲突²⁵¹,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将把德国卷入北欧的动乱之中;而保证斐迪南亲王取得丹麦王位的 1852 年伦敦条约²⁵²则将把俄国、法国和英国都牵涉进去。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2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1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²⁵³

我们昨天刊载了本报驻伦敦通讯员关于印度起义的通讯,这位通讯员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造成这次猛烈爆发的一些前因。今天我们准备花点时间,接着谈一谈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同时说明,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决不像他们想让世人相信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温和宽厚、无可指责的恩人。为此目的,我们要援引在1856年和1857年下院会议期间提交下院的关于东印度实行刑讯问题的官方蓝皮书⁹¹。我们会看到,这些材料是无可辩驳的。

首先,我们有马德拉斯刑讯调查委员会的报告^①。报告声称,该委员会“深信到处都在为征税而使用刑讯”。它怀疑

“每年因刑事罪而受刑的人数是否有因不纳税而受刑的人那样多”。

它指出,

“有一个情况甚至比确信存在刑讯更使委员会感到痛心,这就是受害方很难获得纠正。”

委员们认为,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1. 想亲自向收税官²⁵⁴申诉

① 《马德拉斯刑讯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5年伦敦版。——编者注

的人必须走很远的路,进出官府又要花费金钱和时间;2. 担心申诉状“将被退回,照例签上交特西达尔办理的批语”,

特西达尔就是掌管该地区警察和税收事务的官员,也就是那个本人或通过其下属警官使他遭受冤枉的人;3. 法律对政府官员进行追究和惩罚的规定过分宽大而无济于事,即使他们已正式受到控告或被判定犯有此类罪行。如果这类控告在治安法官面前得到证实,他好像也只能判 50 卢比罚款,或为期一个月的监禁。当然,他也可以把被告解交

“刑事法官,予以惩办,或将案件提交巡回法院审理”。

这份报告还说:

“看来,这些程序很冗长,而且只适用于一类违法行为,即警察滥用职权,所以对案件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

警官或税吏是同一个人,因为税款是由警察征收的,如果他被控勒索钱财,则要由助理收税官审讯;然后他可以向收税官提出上诉,然后还可向税务局提出上诉。税务局可以把他交付政府法院或民事法院。

“既然法律如此规定,贫穷的莱特²⁵⁵就永远也斗不过富裕的税吏;我们也没有听说什么人根据这两个条例(1822 年和 1828 年条例)提出过申诉。”

再说,这种勒索钱财的罪名,只有在警官侵吞公款或强迫莱特缴纳额外税款以饱私囊时才能成立。这就是说,法律对使用暴力征收国税并未规定任何惩罚。

这里援引的这份报告,只涉及马德拉斯管区,但是达尔豪西勋爵

在 1855 年 9 月写给董事们^①的信中说：

“我早已不再怀疑，所有英属各省的下级官吏都采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刑讯。”

这就是说，官方也承认，普遍施用刑讯已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种财政制度，但是，作出这种承认也是为了袒护英国政府。马德拉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说：施用刑讯的全是印度籍的低级官员，而欧籍的政府官员却总是在尽力阻止发生这类事情，不过没有成效。针对这种说法，马德拉斯土著居民协会于 1856 年 1 月向议会呈递了一封请愿书，对刑讯问题的调查提出如下的申诉：1. 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调查，委员会只是坐在马德拉斯城里开会，而且只有三个月，而要进行申诉的土著居民，除了极少数例外，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2. 委员们并未试图追究祸根；如果追究，就会发现祸根就在税收制度本身；3. 没有讯问那些被控告的土著官员，他们的上级对用刑情况事先了解到什么程度。

请愿的人写道：“这种暴行的真正犯罪者，不是实际执行的人，而是下令要他们执行的那些官员，即他们的顶头上司，后者则要负责为他们的欧籍上司征收预定数额的税款，而这些欧籍上司又要向最高政府当局负责。”

的确，只要援引几段被宣称作为马德拉斯报告依据的证词，就足以推翻报告中的“英国人毫无过错”的论断。例如，商人科尔霍夫先生说：

“施刑的方式五花八门，都是特西达尔或他的下属随心所欲的胡作非为。但是我很难说，是否从最高当局方面获得任何纠正，因为一切申诉状通常都被

^①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编者注

批转特西达尔去调查和呈报。”

在土著居民的申诉状中，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份：

“去年，我们的佩赞秭（主要作物或者说稻谷）由于雨水欠缺而收成不好，因此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缴税。在贾马班迪^①确定之后，我们由于遭受损失，就要求根据 1837 年伊登先生任收税官时与我们签订的协议条件予以减免。由于不许减免，我们就拒不接受交给我们的普塔^②。这时，特西达尔就开始气势汹汹地强迫我们缴税，从 6 月一直延续到 8 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监管，经常被赶到太阳下暴晒，我们被强迫俯身弯腰，背着石块，站在灼热的沙地上。8 点钟以后才放我们去我们的稻田。这种残酷的虐待延续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我们有时去向收税官递交请愿书，但他拒不接受。后来我们把这些请愿书呈交给治安法庭，法庭又把它们转交给收税官。这样，我们仍然不能得到公正待遇。9 月我们接到官方的通知，25 天后，我们的财产就被查封，接着就被拍卖了。除了我列举的事实以外，我们的妇女也受到凌辱虐待；竟有人在她们的乳房上施用刑具。”

一个土著基督教徒在回答委员们所提的问题时说：

“每当欧洲部队或土著部队经过时，所有的莱特都被迫无偿地拿出粮食等东西，如果谁想要收费，就要遭到严刑拷打。”

接着是一个婆罗门¹⁷¹所经历的情况。这个婆罗门与本村及邻村的一些人，都接到特西达尔的命令，要他们无偿地供给木板、木炭、木柴等物，以便进行戈莱伦河架桥工程；当他加以拒绝时，就有 12 个人把他抓去，进行各种折磨。他又说：

“我向助理收税官卡德尔先生提出申诉，但是他不进行任何调查，就把我的

① 贾马班迪(Jamabundy)是印度土地税的年税额。——编者注

② 普塔(Puttah)是地主或收税官交给佃农的正式收租单，其中规定土地使用性质和地租金额。——编者注

申诉状撕了。他渴望靠压榨穷人来廉价地完成戈莱伦河架桥工程，从而博得政府的好评，因此，不论特西达尔怎样为非作歹，他都毫不过问。”

1855年管辖旁遮普卢迪亚纳区的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案件，最清楚地表明了最高当局对这种极尽敲诈暴虐之能事的非法行为的看法。根据旁遮普首席专员^①的报告，已经证实

“在代理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同意或直接命令下，富裕公民的住宅无故遭到搜查；搜查时被没收的财产长期扣押；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好几个星期也不提出受押的罪名；笼统地、同等严厉地对一切人采用对付嫌疑犯的预防措施法；代理专员到各个区巡行，都有一些警官和密探相随，他到处使用他们，这些人是一切灾害的祸首”。

达尔豪西勋爵在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中说道：

“我们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布里尔顿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这些证据，证明这个官员确实犯有首席专员所列举的每一项不正当的和非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使英国行政机关的一部分蒙受耻辱，使众多的英国臣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任意拘押，并遭受残酷的刑讯。”

达尔豪西勋爵主张“严厉惩办，以儆效尤”，因此他认为：

“布里尔顿先生暂且不宜担任代理专员的职务，而应降职为一级助理。”

不妨用马拉巴尔海岸格讷拉的塔卢格^②的居民请愿书来结束这些摘自蓝皮书的引文。这些居民说，他们白白向政府呈交了几次请愿书，然后把他们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作了对比：

① 约·劳伦斯。——编者注

② 塔卢格(Talook)指印度的小税区，常由几个村子组成，由一名税吏负责征税。——编者注

“在‘拉尼’^①、巴哈杜尔和提普治理时期，我们耕作水地和旱地、丘陵地、低洼地和森林地，缴纳少量税款，因此我们过着安定和幸福的日子。西尔卡尔^②官员当时要我们缴纳额外的税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缴过。收税时我们没有吃过苦头，没有受过压迫或虐待。而自从这个国家归顺尊贵的公司^③以后，这个公司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榨取我们的钱财。抱着这个恶毒的目的，公司就弄条例，发命令，并派来收税官和民事法官执行这些条例和命令。不过，那时的收税官及其下属本地官员，有一个时期对我们的申诉还给予应有的注意，还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相反，现在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官员，为达到升官目的不择手段，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控诉充耳不闻，使我们遭到各种压迫。”

这里，我们只是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真实历史做了一番简短的、淡化的概述。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正而严肃的人们也许会问：人民想赶走那些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难道不对吗？既然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这种事，那么就算是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那些所谓的残暴罪行，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0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拉尼(Ranee)指印度土邦的女邦主。——编者注

② 西尔卡尔(Circar)即政府。——编者注

③ 尊贵的公司(Honorable Company)即东印度公司。——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莱-德-托利²⁵⁶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俄国公爵和陆军元帅，1759年^①生于立窝尼亚，1818年5月25日卒于东普鲁士因斯特堡。1769年，他未满11岁就加入俄国军队，在入伍的二十九年中，参加了对土耳其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的各次战争，但在1798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崭露头角，军阶较低。他在1806年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他的军事声望始于1807年，当时他率领俄国前卫部队英勇地保卫普鲁士埃劳²⁵⁷，在该城的街道、教堂和教堂墓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1808年他迫使瑞典人退到卡累利阿，1809年他任步兵上将，指挥12 000名俄军携带火炮、弹药、粮秣和辎重渡过冰封的波的尼亚湾，在更大的规模上仿效了查理·古斯塔夫横渡封冻的小贝尔特海峡的著名进军。他占领了于默奥，他的到来促进了酝酿中的反古斯塔夫四世的政变，迫使瑞典人求和。²⁵⁸1810年以后，他受命主管俄国陆军部。

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他直接指挥的该军团的主力，根据夸大的官方报道足有55万人，实际上只有104 000人，驻扎

① 巴克莱-德-托利生于1761年。——编者注

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军队总数也不超过 20 万人。因此,俄军的撤退在当时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绝对的必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写的回忆录^①中错误地认为,最初的撤退计划出自巴克莱-德-托利之手,其实这个计划是普鲁士将军富尔早在俄法决裂以前制定的²⁵⁹,而在宣战以后,贝尔纳多特又迫使亚历山大不得不实行这个计划。巴克莱-德-托利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顶住了吵吵嚷嚷要进行会战的愚昧的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来自一般俄军军人还是大本营;他撤退得十分巧妙,不断地把一部分部队投入战斗,使巴格拉齐昂公爵有可能同他会合,并为契查哥夫海军上将袭击敌人后方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不得不在斯摩棱斯克那样的地方应战²⁶⁰时,占领了一块使战斗不致变成决战的阵地。而当离莫斯科不远,决战已经不能避免时,他在格扎茨克附近选择了一块坚固阵地²⁶¹,这个阵地几乎不可能从正面攻击,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加以迂回。当他把军队部署好的时候,库图佐夫到来了,由于俄军将领互相倾轧以及俄国军人对于由一个外国人指挥这场神圣战争不满,最高指挥权转入库图佐夫手中。库图佐夫故意使巴克莱-德-托利难堪,放弃了格扎茨克的防线。这样,俄军不得不在博罗季诺附近的不利阵地应战²⁶²。在 8 月 26 日^②的会战中,指挥右翼的巴克莱是惟一坚守阵地的将军,他坚守到 27 日,掩护了俄军的撤退,要不是他,俄军就会全军覆没。在从博罗季诺向莫斯科方向撤退以后,正是巴克莱-德-托利再

① 《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 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8 月 26 日是俄国旧历的日期;新历应是 9 月 7 日。——编者注

一次阻止了保卫神圣首都的无益尝试。

1813年战役²⁶³期间,巴克莱于4月4日^①攻占托恩^②要塞,在柯尼希斯瓦尔塔附近击溃洛里斯顿;5月8日^③包岑会战失败后,他掩护联军退却,取得格尔利茨会战的胜利,促使旺达姆投降,并且在莱比锡会战中立下战功。在1814年战争期间¹⁵⁸,他没有再指挥独立的部队,他的活动主要是行政和外交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军队在他直接领导下,纪律严明,这使他在法国居民中博得很好的声誉。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他从波兰回来太晚,未能参加滑铁卢会战,但参加了第二次入侵法国。他在去卡尔斯巴德温泉浴场的旅途中去世。晚年受人诽谤,郁郁不乐。他无疑是亚历山大的将领中的佼佼者,他朴实、顽强、果断而又明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年8月底—9月15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4月4日是俄国旧历的日期,新历应是4月16日。——编者注

② 波兰文作托伦(Torun)。——编者注

③ 5月8日是俄国旧历的日期,新历应是5月20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

贝尔蒂埃²⁶⁴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法国元帅,纳沙泰尔公爵,瓦朗然公爵,瓦格拉姆公爵;1753年11月20日生于凡尔赛,1815年6月1日在班贝格被害。他的父亲^①是路易十六时代的地形测绘工程兵团司令,他是被他的父亲培养成一名军人的。他从皇家地形测绘局转入军队,最初在总参谋部中任中尉,后为龙骑兵上尉。美国独立战争²³²时,他曾在拉斐德麾下服役。1789年,路易十六任命他为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少将,在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以及1791年2月19日²⁶⁵,他为王室出力不少。但是他明白,这场革命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此后,他先后在拉斐德、吕克纳尔和居斯丁手下任总参谋长。由于在旺代战争中表现积极,他在恐怖时期未受到怀疑。他在1793年6月12日的索米尔保卫战²⁶⁶中的英勇表现,在国民公会议员们的报告中备受称道。热月九日²⁶⁷以后,他被委任为凯勒曼的总参谋长,在他坚持下法军占领博尔盖托一线,阻止了敌人的进军。可见,他作为一个总参谋长的声誉,早在波拿巴挑选他担任这个职务以前就已被确认了。在1796—1797年战役中,在蒙多维会战

^① 让·巴·贝尔蒂埃。——编者注

(1796年4月22日)、洛迪会战(1796年5月10日)、科多尼奥会战(1796年5月9日)和里沃利会战(1797年1月14日)中²⁶⁸,他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师长。

贝尔蒂埃才智平庸,行为执著,具有海格立斯般的体魄,可以连续工作八昼夜;对作战的一切细节,例如各个军的运动,部队人数、宿营和指挥人员情况,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执行任务迅速,在这方面对他永远可以信赖;他仔细认真,善于使用地图,能敏锐地判断地形的特点,擅长以简明的语言报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他经验丰富,十分机智,在战斗时知道应该向哪里下达命令,并能亲自监督执行;在战场上,他是司令官的活电报机,在办公桌旁,他是司令官的不知疲倦的打字机;对总揽司令部一切高级职权的将领来说,他是一个模范的参谋。1798年波拿巴不顾他的谏阻,派他率领军队去攻占罗马,就地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俘掳教皇。²⁶⁹他既不能阻止一些法国将军、军需官和伙食供应人员在罗马抢劫,又不能制止法国士兵哗变,他辞去指挥官职务,交由马塞纳接手,只身转赴米兰,在那里他爱上了美丽的维斯康蒂女士;对她痴情地长期热恋,因而在远征埃及²⁷⁰时得到了“多情派”首领的绰号,并花掉了他的王室主子先后赏给他的4000万法郎的大部分。

从埃及返回以后,他支持波拿巴雾月18日—19日阴谋²⁷¹,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他任此职直到1800年4月2日。在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中他再次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使波拿巴误信了关于奥军的行军路线和配置情况的虚假情报,从而在马伦戈陷入显然尴尬的境地²⁷²。在战争获胜、同梅拉斯将军签订休战协定之后,他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使命,然后重回陆军部,直到帝国宣布成立。此后,他一直在皇帝身边,以大军¹²⁷少将衔总参谋长的身份,跟随皇帝参加了历次战役。

拿破仑慷慨地赐予他许多封号、头衔、奖金、津贴和礼品。1804年5月19日，他晋升为帝国元帅，获得荣誉军团大绶带和法国大狩猎官的称号。1805年10月17日，他荣幸地与马克一起制定了乌尔姆投降书的条款。²⁷³1806年普鲁士战役结束回国时，获得纳沙泰尔和瓦朗然主权公爵的封号。1808年，他奉命娶巴伐利亚国王^①的侄女玛丽-伊丽莎白·巴伐利亚-比肯费尔德公主为妻，并获得法国副统帅的称号。1809年拿破仑任命他为总司令，率领大军从巴伐利亚进攻奥地利。他于4月6日宣战，到了15日已使整个战局陷于危险境地。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领一半法军驻雷根斯堡，派马塞纳率领另一半法军驻奥格斯堡，把巴伐利亚军队配置在他们两人之间的阿本斯贝格，这样，卡尔大公只要快速推进，就能把这几支军队各个击破。奥军的行动缓慢和拿破仑的到达拯救了法军。但是，在担任更加适合他的才干的职务以后，在自己主子的眼皮底下，他在这次战争中又有出色的表现，因此在他一长串的封号中，又增加了瓦格拉姆公爵这一封号²⁷⁴。

在对俄战争时期²⁷⁵，他连总参谋长的职务也不能胜任。在莫斯科大火以后，他甚至不能正确理解自己主子的命令；虽然他一再请求准许他随拿破仑一同返回法国，后者却命令他同军队一起留在俄国。这时，当法军要对付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之际，他的才智有限和墨守成规就暴露无遗了。他沿用他的习惯做法，向后卫部队的一个营，有时是一个连发布的命令，就好像这支后卫部队仍然有3万人似的；他把阵地划给早已不存在的团和师，而为了弥补他的无所作为，就增派信使传送指令。1813—1814年期间，他重新担任了他

①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编者注

往常的职位^①。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下台^②后,贝尔蒂埃借故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庇护人,甚至在拿破仑退位以前,就提交呈文宣布拥护元老院和临时政府²⁷⁶,后来又率领帝国的元帅们到贡比涅去奴颜婢膝地赞颂路易十八。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封他为法国的贵族,任命他为新建的王室警卫部队的长官。他把自己的纳沙泰尔公国让给普鲁士国王^③,以换取34 000佛罗伦的津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他随同路易十八到根特。但是,由于隐瞒了拿破仑的一封信,他失宠于国王,离开当地前往班贝格,1815年6月1日在那里遇害,有六个蒙面人把他从他岳父^④的宫殿的一个窗口扔了出去。他的回忆录^⑤于1826年在巴黎出版。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
底—9月15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即总参谋长的职位。——编者注

② 元老院1814年4月3日作出这一决议并于次日公布。——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④ 比肯费尔德亲王。——编者注

⑤ 《贝尔蒂埃元帅回忆录》1827年巴黎版第1—2部。——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卜 尼 格 先²⁵⁶

卜尼格先,莱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俄国将军,伯爵,1745年2月10日生于不伦瑞克(当时他父亲在该地任警卫部队上校),1826年10月3日去世。作为一名侍从,他在乔治二世的汉诺威宫廷度过了五年;后来参加汉诺威军队,在晋升为步兵警卫部队上尉以后,参加了七年战争²³³的最后一次战役。当时,人们议论他追求女性的狂热多于议论他的战功。为了娶汉诺威驻维也纳宫廷公使施泰因贝格男爵的女儿,他辞去军职,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班特尔恩;由于挥霍无度,债台高筑,妻子死后,他决定去俄国军队供职以重振家业。他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升为中校,先在鲁缅采夫部下同土耳其人作战,后在苏沃洛夫部下镇压起义者普加乔夫。在一次获准休假时,他到汉诺威娶了美貌出众的冯·施维赫尔特小姐为妻。回俄国后,在鲁缅采夫和波将金的保举下当了团长。1788年他在奥恰科夫围攻战²⁷⁷中立了功,被任命为准将。1793—1794年波兰战争期间,他指挥一支轻装部队;在奥什米亚内战役和索雷战役以后,被提升为将军;他曾率领骑兵突破了波兰军队的中坚,决定了维尔纳战役²⁷⁸的胜利,而由于他在涅曼河下游两岸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大胆的奇袭,叶卡捷琳娜二世奖给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一把荣誉军刀和

200名农奴。波兰战争时期，他显示了优秀骑兵军官的素质——刚烈、勇敢、敏捷，但是没有显示一名军队指挥官所必需具备的更高的造诣。波兰战争以后，他被派往在波斯作战的军队，他以连续10天的轰击迫使里海的杰尔宾特投降²⁷⁹。圣乔治三级十字勋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赐给他的最后的奖赏，在她死后，他被她的继位者^①召回并遭到贬黜。

那时，圣彼得堡的军事总督帕连伯爵正策划一个刺杀保罗的密谋。帕连知道卞尼格先很果敢，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把密谋者引进皇帝的卧室。正是卞尼格先把躲藏在壁炉里的保罗拖了出来，而当保罗拒绝退位，其他一些密谋者犹豫不决时，卞尼格先大喊道：“别废话了！”解下肩带，向保罗扑去，经过一场搏斗，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勒死了他。为了快速了结，卞尼格先又用沉重的银鼻烟盒砸保罗的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卞尼格先立即获得驻立陶宛的司令官的职位。

1806—1807年战争²⁸⁰初期，他在卡缅斯基统率下指挥第一军团的一个军（第二军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在掩护华沙以抗击法军的尝试失败后，他被迫退到纳列夫河畔普乌图斯克，并于1806年12月26日在这里击退了拉纳和贝尔纳多特的进攻，当时他在兵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拿破仑正率其主力进攻俄国第二军团。卞尼格先向亚历山大皇帝虚报战功，并且暗中打击卡缅斯基和布克斯格夫登，不久便被任命为与拿破仑作战的军团的总指挥。1807年1月底，他对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免于陷入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然后进行了埃劳会

① 保罗一世。——编者注

战²⁵⁷。2月7日埃劳陷落,8日,卞尼格先为了阻止拿破仑的猛烈追击,不得不进行决战。俄国军队的顽强作战,莱斯托克所率普军的及时到达,法国个别部队的延迟抵达战场,使得胜负难分。双方都声称自己是胜利者,但至少拿破仑本人说过,埃劳战役是他历次战役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卞尼格先唱了《感恩赞》^①,并从沙皇那里接受了一枚俄国勋章、12 000卢布的津贴和一封贺信,信中赞扬他是“战胜常胜将军的将军”。

春天,当法军的一部还忙于围攻但泽²⁸¹时,他在海尔斯贝格筑壕固守,放过了攻击拿破仑的机会,但是在但泽失陷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却认为攻击的时机到了。一开始,他的部队就被拿破仑的前卫部队所阻击,后者的兵力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拿破仑的机动很快就迫使他退回其筑壕的营垒。在这里,拿破仑6月10日只用两个军和几个警卫营的兵力进攻这个营垒,没有成功,但在次日就迫使他放弃营垒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已经抵达蒂尔西特的28 000人的一个军的到来,又突然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在那里整顿部署他的部队,背靠阿勒河,以弗里德兰桥为惟一的退路。他没有趁拿破仑集结起队伍以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拉纳和莫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一直到拿破仑在五点钟时把部队部署完毕并下令进攻。俄军被击退到河边,弗里德兰被占领,桥被俄军自己破坏,尽管俄军的整个右翼还在河的对岸。6月14日弗里德兰会战就这样失败了,俄军损失了两万多人。据说,卞尼格先当时是受了他的

① 《感恩赞》原文为拉丁文 Te Deum,基督教的一首感恩赞美诗,其首句为 Te Deum laudamus(“主啊,我们赞美你”)。在本文中,唱《感恩赞》当为授勋时的宗教仪式。——编者注

波兰籍妻子的影响。在整个这次战役期间,卞尼格先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全部行为可以说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奇妙结合。

1812年战争²⁷⁵期间,他主要是在亚历山大皇帝的大本营工作,在那里他阴谋排挤巴克莱-德-托利,企图取而代之。1813年战役²⁶³期间,他指挥俄国的一支预备部队,在莱比锡战役中被亚历山大封为伯爵。在这以后,奉命把达武逐出汉堡,他围困汉堡,直到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军事行动结束为止。当时,他和平地占领了汉堡,为此他要求获得新的荣誉和奖赏并如愿以偿。1814年到1818年,在比萨拉比亚指挥南方军团,之后,他最终去职隐退,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在那里去世,去世时他已挥霍掉大部分家产,使他留在俄国服务的孩子们只得艰难度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年8月底和9月15日—
22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勃鲁姆²⁸²

勃鲁姆，罗伯特——德国革命的殉难者之一；1807年11月10日生于科隆，1848年11月9日在维也纳被处死。他是一个贫穷的熟练箍桶匠的儿子，其父于1815年去世，留下三个孩子和一个贫困无依的寡妇，1816年她又嫁给一个普通的驳船装卸工。这第二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在1816—1817年的饥荒年头，这一家人的困苦达到极点。1819年，年幼的罗伯特，作为天主教徒，得到一个教堂勤杂工的位置；后来，跟一个镀金匠当学徒，稍后，又跟一个腰带匠当学徒，按照德国习俗，当了一个流动帮工，但是他干不了这一行，在短暂的外出奔走以后不得不返回科隆。他在科隆一家制灯厂找到工作，并博得老板的好感，被提拔在账房工作，需要陪伴老板到南德意志各邦旅行，1829—1830年他同老板住在柏林。在此期间，他以顽强的努力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但并没有显出在某一科学领域具有显著的天赋或出众的才能。1830年应征服兵役，这是每个普鲁士臣民的义务，他与他的庇护人的关系由此中断。六个星期后，他被军队遣散，失去安身之地，又回到科隆，当时的环境几乎和他两次离开科隆时一样。由于双亲贫困，本人处境绝望，他只好同意当林格尔哈特先生这位科隆剧院经理手下的跑腿小厮。他虽然职位卑微，但是经常接近

舞台使他关注戏剧创作,同时,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莱茵普鲁士造成的活跃的政治局面,又使他有机会跻身某些政治活动,并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一些诗作。

1831年,当时移居莱比锡的林格尔哈特让勃鲁姆当莱比锡剧院的出纳和秘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47年。从1831年到1837年,他为《彗星》、《晚报》等供家庭阅读的莱比锡报纸撰稿,并且出版了《戏剧百科》、《宪法之友》、《前进》年鉴等等。他的著作带有某种小市民的平庸色彩,后来的作品甚至还充满低级趣味。他的政治活动是在1837年开始的,当时他以莱比锡市民代表团代表的身份把荣誉礼品赠给萨克森议会的两个反对派议员^①。1840年他成为席勒协会和德国作家联合会²⁸³的创始人之一,1841年成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政治性报纸《萨克森祖国报》上撰稿,这使他成了萨克森最有声望的新闻记者和政府专门迫害的对象。德国天主教²⁸⁴(这是当时的名称)认为他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1845年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天主教会并成为该会的精神领袖。1845年8月13日,武装的市民和大学生在莱比锡的步兵营房前举行大会,声言要捣毁营房,为前一天步兵连开枪屠杀民众的事件²⁸⁵复仇,这时勃鲁姆凭借他广受欢迎的口才,说服激动的群众不要放弃法律所许可的反抗方法,并亲自带头进行起诉,要求依法赔偿。萨克森政府对他的努力的报答是再一次迫害他,并最后在1848年封闭了《祖国报》。

1848年二月革命¹³⁹爆发时,他成为萨克森自由派的中心人物;他创立了祖国联合会²⁸⁶(该会很快就拥有4万多名会员),并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他被莱比锡市派到“预备议会”²⁸⁷,担任了

① 卡·哥·托特和尤·迪斯考。——编者注

副议长。他阻止了反对派的大批退出,从而使这个机构保存了下来。预备议会解散以后,他是保留下来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是这个议会里温和反对派的领袖。²⁸⁸他的政治见解是以共和制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而以各种传统的王国和公国等作为其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王国和公国才能完整地保存那些他认为是德国社会特有的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使它的各个阶层能够独立发展。作为一个演说家,他讲话机智灵巧,绘声绘色,很受欢迎。

维也纳起义²⁸⁹的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他受委托同德国议会的其他几位议员一起把议会反对派所写的贺信带到维也纳去。1848年10月17日,他作为代表团的代表,向维也纳市议会递交了这封贺信^①。他参加学生军的队伍,并在战斗中指挥一个街垒。文迪施格雷茨占领维也纳后,他镇静地坐在一家旅馆里谈话,突然旅馆被士兵包围,他被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他不愿背弃自己的言行而损害自己的尊严,因而被判处绞刑,后来绞刑改为枪决,黎明时在布里吉特瑙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和9月15日—22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致维也纳人》,载于1848年10月22日《维也纳日报》第290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没有报道印度有什么新的事件发生，但包含大量很有意思的有关战争的细节，我们现在把这些细节扼要地介绍给读者。首先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迟至7月15日英国人仍然未能进入德里。这时，英军兵营内发生了霍乱，雨季也已经开始，因此围攻者的撤围和退却，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英国的报纸想要我们相信，疫病夺去了将军亨·巴纳德爵士的生命，却饶了他手下那些饮食更坏、操劳更重的士兵。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公诸于世的正式报道，而只能通过按公认的事实进行推断的办法来大致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围攻部队中猖獗肆虐的情形。德里城下兵营中的一名军官在7月14日写道：

“我们没有采取攻夺德里的行动，只是应付敌人的出击。我们有5个欧洲团的部分兵力，但能够集中用来进行有效攻击的，只有2000名欧洲兵，因为每个团都留下了人数较多的分遣部队防守贾郎达尔、卢迪亚纳、苏巴图、德格沙伊、格绍利、安巴拉、密拉特和皮劳尔。事实上各团只派来人数不多的分遣部队。敌人在炮兵方面远比我们占优势。”

这就证明，来自旁遮普的部队发觉从贾郎达尔到密拉特这条重要的北方交通线处于反叛状态，因此不得不减少队伍的人数，把分遣

部队留在一些重要的地点。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由旁遮普来到德里的兵力比预期的少，但是这还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兵减少到只有 2 000 人。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在 7 月 30 日写的通讯中，企图从另一角度来解释围攻者行动消极的原因。他写道：

“援军确实已到达我们的兵营，其中包括：皇家第八团的一部分，第六十一团的一部分，一个步炮连，两门土著部队的火炮，非正规骑兵第十七团（护送载运大量弹药的辎重队），旁遮普骑兵第二团，旁遮普步兵第一团和锡克步兵第四团；但是这些增援围攻部队的土著队伍并不是完全地和同样地可靠，尽管已把他们与欧洲兵混编在一起。在旁遮普部队的各个骑兵团内，有许多来自印度斯坦本部和罗希尔肯德的伊斯兰教徒和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孟加拉的非正规骑兵则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都是极不忠实的一类人，他们在部队中存在，不论数量多少，都会带来许多麻烦，——事实已证明是如此。在旁遮普骑兵第二团内，曾不得不解除约 70 名印度斯坦人的武装，并处 3 人以绞刑，其中有一名高级土著军官。已调来一个时期的非正规骑兵第九团，已有几名骑兵逃亡，而非正规骑兵第四团，据我所知，曾在被派出执勤时杀死了本团的副官。”

这里就暴露了另一个秘密。德里城下的兵营看来与阿格拉曼特的兵营有某些相似之处，那里的英国人不仅要和正面的敌人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同盟者作斗争。但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人只能用 2 000 名欧洲兵来进攻。第三个报道者，《每日新闻》驻孟买的记者，详尽地列举了巴纳德的继任者里德将军所指挥的各个部队，这个材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他把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举出来了。根据这位记者的报道，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3 日，由旁遮普到达德里城下兵营的约有 1 200 名欧洲兵和 1 600 名锡克兵，还有非正规骑兵及其他等等，总共约 3 000 人，由张伯伦准将率领。现在由里德将军指挥的全部兵力，他估计为 7 000 人，其中包括炮兵和攻城炮兵纵列，因此，在旁遮普援军开来以前，德里城下的军队不可能超

过4 000人。8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曾指出，亨·巴纳德爵士已集结了一支有7 000名英国兵和5 000名土著兵的军队。尽管这个数字是过分夸大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欧洲兵约有4 000名，还有略少于此数的土著兵。这样，巴纳德将军当时原有的兵力，与目前里德将军集结的兵力是大致相等的。因此，旁遮普援军仅仅补充了几乎达围攻者半数的损耗，这种巨大的损失，部分地是由于起义者不断出击，部分地是由于霍乱肆虐造成的。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英国人能够用来进行“有效攻击”的欧洲兵只有2 000人。

德里城下的英军兵力就是如此。现在来看看他们的作战行动。他们的行动并不十分出色，这一点根据以下的简单事实就完全可以看出：自从6月8日巴纳德将军报告说攻占德里对面的高地以来，司令部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战报。当时的战斗，除了一次例外，全都是围攻者抗击被围者的出击。围攻者有时在正面，有时在两翼受到攻击，但最多的是在右翼后方受到攻击。6月27日和30日，7月3日、4日、9日和14日被围者均曾出击。6月27日的战斗仅仅是前哨的小规模遭遇战，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中午过后不久就因雨季的第一场倾盆大雨而中止了。6月30日，起义者一支较大的兵力出现在围攻者右侧的封闭区，袭击了围攻者的步哨和小哨。7月3日清晨，被围者先在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进行佯攻，然后沿格尔纳尔大道向这一翼后方推进数英里，直达阿里布尔，目的是拦截送往兵营的补给品和钱款。在前进途中，他们同旁遮普非正规骑兵第二团的一个前哨遭遇，后者立刻退却。当他们于4日回城时，英军兵营派出1 000名步兵和两个连的骑兵向他们展开攻击，实施拦截。但是起义者竟顺利退入德里城，损失很小，或者说没有损失，并且保全了所有的火炮。7

月8日,英军兵营派出一支队伍去破坏距德里约6英里的伯西村附近的运河桥;在前几次出击中,起义者曾通过这座桥,攻击了英军的深远后方,袭扰英军的通往格尔纳尔和密拉特的交通线。桥被破坏了。7月9日,起义者再次出动大量兵力,攻击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据该日用电报拍往拉合尔的官方报道称,出击者约有1000人被击毙;但是这个报道看来是过分夸大了,因为一篇7月13日发自兵营的通讯中是这样写的:

“我方埋葬和焚烧了250具敌兵尸体,还有大量尸体被他们拖回城内。”

就在这篇刊登在《每日新闻》的通讯里,没有声称英军击退西帕依⁶⁷,而是相反:“西帕依打退我方所有的作业部队,然后才退走。”围攻者的损失相当大,计伤亡212人。7月14日,由于起义者又一次出击,发生了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但详细的报道尚未收到。

与此同时,被围者获得了大量援军。7月1日,来自巴雷利、莫拉达巴德和沙贾汉布尔等地的罗希尔肯德的哗变部队(包括四个步兵团、一个非正规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连)顺利地同他们在德里的伙伴们会合。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写道:

“本来估计他们不可能渡过恒河,然而预期的河水泛滥没有发生,他们在格尔穆格代瑟尔渡过恒河,穿过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带,到达德里。在两天内,我军屈辱地眼看着他们的人员、火炮、马匹和牲畜(因为叛乱者有大约5万英镑的财物)源源不断地通过舟桥开进城内,既无法阻止,也无法进行任何干扰。”

起义者这次通过整个罗希尔肯德地区的顺利行军说明,自朱木拿河以东直到罗希尔肯德山脉这一大片地区对英军来说都是无法通行的;而起义者毫无阻碍地由尼默杰到阿格拉的行军,如果同印多尔和马乌的起义联系起来则说明,从朱木拿河西南直到文迪亚山脉的

整个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在德里地区惟一成功的——确实是惟一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他们靠范考特兰特将军的旁遮普锡克兵平定了德里以北和西北的地区。在卢迪亚纳与锡尔萨之间的整个地区内，他主要是对付荒凉沙漠上那些零散村落里的专事抢劫的部落。据说他已于7月11日离开锡尔萨，前往法塔哈巴德，由那里再去希萨尔，以开拓围攻部队的后方。

除德里外，在西北各省，阿格拉、坎普尔和勒克瑙这三个地点已经成为土著人与英国人斗争的中心。阿格拉方面的情况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当地的哗变部队为了攻打英军一个遥远的据点，首次进行了行程约300英里的计划周密的攻击。据阿格拉出版的报纸《乡巴佬》报道，纳西拉巴德和尼默杰的西帕依团，为数近1万人（步兵约7000人，骑兵约1500人，火炮8门），于6月底到达阿格拉附近，7月初即在距阿格拉约20英里的萨西亚村后的旷野设营驻扎，7月4日似乎在进行攻城准备。驻扎在阿格拉城外兵营中的欧洲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躲进了堡垒。阿格拉的指挥官起初派出一支由科塔的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作为前哨抵挡敌人，但他们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全部投入了起义队伍。7月5日，由孟加拉欧洲兵第三团、一个炮兵连和一队欧洲志愿兵组成的阿格拉守军出动去攻击哗变部队；据说，把他们由村里赶到村后的旷野上，但后来显然自己又被打退了，在总数500人中死49人、伤92人以后，不得不在敌人骑兵的袭击和威胁之下匆忙地撤退，据《乡巴佬》报道，甚至来不及“朝他们放一枪”就不见踪影了。换句话说，英国人简直是逃之夭夭，赶紧躲进堡垒，而这时西帕依却来到阿格拉城下，破坏了兵营里几乎所有的房屋。次日，即7月6日，他们进抵通往德里途中的珀勒德布尔。这一事件的重要结果，就是哗变部队切断了英国人在阿格拉与

德里之间的交通线,并且他们还可能出现在莫卧儿古城城下。

在坎普尔,根据最近的邮件得悉,惠勒将军率领下的一支约有200名欧洲兵的部队,连同步兵第三十二团人员的妻子儿女,被数量占压倒优势的起义者围困在一座堡垒里,起义者的首领是比图尔的纳那·萨希布。6月17日和6月24日至28日,堡垒遭到数次强攻,在最后一次攻击中,惠勒将军腿部中弹,因伤致死。6月28日,纳那·萨希布要求英国人投降,条件是答应让他们乘船沿恒河顺流而下到安拉阿巴德。英国人接受了投降条件,但当他们刚刚乘船到达河中央时,恒河右岸的火炮突然向他们开火。船上那些企图往对岸逃命的人,被一支骑兵部队捉住杀死。妇女和儿童都做了俘虏。从坎普尔,多次派人到安拉阿巴德去紧急求援,7月1日,由雷诺少校率领的一队马德拉斯燧发枪手和锡克兵出发,向坎普尔前进。7月13日拂晓,在距法塔赫布尔不到4英里的地方,这一队人和哈夫洛克准将会合。哈夫洛克带领第八十四团和第六十四团的约1300名欧洲兵、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以及奥德非正规骑兵的残部,于7月3日由贝拿勒斯到达安拉阿巴德,然后以强行军赶上雷诺少校。就在与雷诺会合的当天,他被迫在法塔赫布尔城下与纳那·萨希布率领前来的土著兵交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哈夫洛克将军以侧击的方法把敌人赶出法塔赫布尔,退往坎普尔。7月15日和16日,他又两次与纳那·萨希布在坎普尔交锋。7月16日,坎普尔被英军收复,纳那·萨希布退往位于恒河岸边距坎普尔12英里的比图尔,据说那里已筑有坚固的工事。纳那·萨希布在向法塔赫布尔进军以前,曾杀死所有俘获的英国妇女和儿童。收复坎普尔对英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就保住了他们的恒河交通线。

在奥德的首府勒克瑙,英国守军的处境,几乎与他们在坎普尔的

伙伴的处境同样困难——被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围困在堡垒内，缺乏给养，并且失去了指挥官。指挥官亨·劳伦斯爵士，在7月2日出击时腿部负伤，7月4日死于破伤风。7月18日和19日，勒克瑙仍在坚守。它惟一的获得解救的希望就寄托在从坎普尔带兵前来的哈夫洛克将军的身上。问题是哈夫洛克是否敢于这样做，他的后方还有纳那·萨希布。然而任何拖延势必给勒克瑙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雨季很快就会使野战无法进行。

考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孟加拉西北各省，英军已逐渐被困在一些好像是分散在革命大海中的孤立礁石似的小据点上。在下孟加拉，只有在米尔萨布尔、迪纳普尔和巴特那曾发生局部的违抗行为。除此以外，在贝拿勒斯周围游荡的婆罗门曾企图重新攻占这个圣城而未获成功。在旁遮普，起义者的士气受到挫折，锡亚尔科特和杰赫勒姆两地的哗变被镇压，白沙瓦的风潮也被有效地制止。但在古吉拉特，在萨达拉的本特尔布尔，在那格浦尔地区的那格浦尔和绍戈尔，在尼赞地区的海得拉巴，最后，远至南部的迈索尔，都曾试图举行起义，所以，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的平静，决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
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9月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1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当前亚洲的情况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对英国国家和人民来说，他们统治印度的真正价值究竟何在？直接收入，即贡赋形式的收入，亦即在印度收入抵偿在印度支出以后的余额，根本没有落入英国国库。相反，每年的开支非常庞大。自从东印度公司⁶³大张旗鼓地踏上征服之途，——这是距今已将近一百年前的事，——它的财政就陷入窘困状态。它不得不屡次向议会求助，不仅请求军事援助，以帮助它控制所征服的领土，而且请求财政援助，使它免遭破产。情况就这样一直继续到现在。目前是要求英国国家派遣大量军队，接下去无疑还会要求给大量的金钱。为了进行征服和建立自己的机构，东印度公司到目前为止已向国家借债 5 000 万英镑以上；同时许多年来，除了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土著兵和欧洲兵之外，英国政府还负担 3 万正规军的来往运输费和在印度的维持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从其印度帝国得到的好处，显然只不过使个别英国臣民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应该说是很可观的。

首先，东印度公司有股东 3 000 人左右，按照最近的特许状²⁹⁰，要保证他们每 600 万英镑实付资本获得 10.5% 的年息，即每年 63 万英镑。东印度公司的资本是由可转让的股票构成，因此，凡是有钱

购买股票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按照现行的特许状，这些股票可获溢价 125%—150%。拥有金额 500 英镑即约值 6 000 美元的股票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享有发言权，但是要有表决权，则须持有 1 000 英镑的股票。3 000 英镑股票的股东有两票表决权，6 000 英镑的有三票，1 万英镑以上的有四票。然而，除了董事会选举之外，股东的作用很小；他们选出十二名董事，另由国王任命六名；可是国王任命的董事必须曾在印度居住十年以上。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董事退出董事会，但是他们可以重新当选或再次被任命。要成为董事，必须是持有 2 000 英镑股票的股东。董事的薪俸收入每人为 500 英镑，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薪俸加倍；但是使人愿意担任董事职位的，主要是与之相联系的任命印度一切文职和军职官员的广泛权力。不过，督察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分享这一权力，而且最重要职位的任命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这个委员会由六人组成，他们都是枢密官，通常其中有两三个是内阁阁员。委员会主席必定是阁员，实际上就是印度事务大臣。

下面谈谈通过董事和督察委员会取得职位任命的人。这些职位分为五类：文职、宗教职务、医职、陆军职和海军职。要在印度任职，至少在文职系统，必须知道一些当地语言，为了给文职部门培养年轻人，东印度公司还在黑利伯里设有一个专科学校。相应的培养军事部门人员的专门学校则设在伦敦附近的阿迪斯库姆，但是这个学校主要是教授军事科学原理。以前进入这些学校是靠公司董事的情面，但是在最近对特许状作了修改之后，入学则是经过公开考试，进行公开竞争。初到印度的文职官员每月的收入通常约为 150 美元；以后，在他通过一种或数种当地语言的必要考试（这种考试在他到达印度后的十二个月内一定要进行）之后，他即获得领取薪金的职务，

年薪从 2 500 美元至 5 万美元不等。后一数字是孟加拉参事会¹⁸⁷参事的薪俸；孟买和马德拉斯参事会参事的收入每年约为 3 万美元。只有参事会的参事能领取约 25 000 美元以上的年薪，要想得到一个年薪 2 万美元或 2 万美元以上的职位，需要在印度居留十二年。在印度居留九年者，有资格领取 15 000 至 2 万美元的薪俸；居留三年者，有资格领取 7 000 至 15 000 美元的薪俸。表面上，文职的任命所根据的是资历和业绩，但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面。因为文职待遇优厚，所以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这种职位，为此目的，一些军官一有机会就脱离军队。文职部门的平均薪俸约为 8 000 美元，其中还不包括数目不菲的各种津贴和额外补贴。文职官员可担任省督、参事、法官、大使、大臣、收税官等等；其总人数一般约为 800 人。印度总督的薪俸为 125 000 美元，但是各种额外补贴往往还要更多。担任教会职务的有 3 个主教和大约 160 个牧师。加尔各答的主教每年收入 25 000 美元；马德拉斯和孟买的主教收入为其二分之一；牧师除了收取仪式费外，收入 2 500 至 7 000 美元。从事医职的约有 800 名内外科医生，他们收入 1 500 至 10 000 美元。

在印度服役的欧洲军官，包括应由藩属王公供养的部队的军官，约有 8 000 人。步兵的固定薪饷为：少尉 1 080 美元，中尉 1 344 美元，上尉 2 226 美元，少校 3 810 美元，中校 5 520 美元，上校 7 680 美元。这是驻防时的薪饷，在作战时薪饷更多一些。骑兵、炮兵和工兵的薪饷要高一些。许多军官到参谋部任职或担任文职工作，其薪饷即增加一倍。

因此，大约有一万个英国臣民在印度占有各种赚钱的职位，因在印度供职而领取薪俸。这里还应该加上一大批退休后回到英国领取

养老金的人,这是各个部门在人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后应该支付的。这些养老金,加上应在英国偿付的红利和债务利息,要耗费每年从印度收取的约1 500万到2 000万美元,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通过英国臣民向英国政府间接缴纳的贡赋。每年从一些职务离职的人都要往英国带回自己的大笔薪俸存款,这也大大增加了每年印度资金的外流。

除了在政府任职的欧洲人,至少还有6 000个常住印度的欧洲人在从事贸易和私人投机。这些人,除了在农业地区栽种蓼蓝、糖料作物和咖啡的一些种植园主外,基本上都是商人、经纪人和工厂主,居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或这些城市的近郊。这些人几乎完全掌控着进出口贸易额大约各为5 000万美元的印度对外贸易,他们的收入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因此很显然,正是这样一些人在利用英国与印度的关系牟取巨额收益,当然,他们的所得也增加了英国国民财富的总额。但是,与这一切相对应的是需要支付的大笔开销。从英国人民口袋里掏出来用于在印度的陆海军的费用,随着印度领地的扩展在不断增长。此外,还应该加上缅甸战争²⁹¹、阿富汗战争²⁹、中国战争²⁹²和波斯战争²¹的费用。其实,最近对俄战争³⁸的全部费用,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算在印度的账上,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对俄国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完全是因猜忌俄国对印度的图谋而产生的。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人由于占领印度而被卷入的无止境的征服和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那么与这一占领有关的开支,总的说来,就有可能达到其收入无论如何也难以补偿的数目。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9月4日于伦敦

起义的西帕依⁶⁷在印度的暴行,的确是骇人听闻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是只有在武装暴动的战争中,在民族战争、种族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的暴行;总之,这是当年旺代²⁹³派对“蓝制服”,西班牙游击队对不信教的法国人,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对维也纳起义者,卡芬雅克的别动队²⁹⁴或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²⁹⁵会员对法国无产阶级儿女都曾施加过的暴行,而这种暴行正是讲究体面的英国一贯赞赏的。西帕依的行为尽管声名狼藉,也只不过是集中反映了英国本身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不仅包括其建立东方帝国时期,甚至包括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十年。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要指出刑讯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①。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

① 见本卷第302—307页。——编者注

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²⁵⁵，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为了找一些类似西帕依的暴行的例子，我们不必像伦敦某些报纸那样远溯中世纪的历史，也不必超越现代英国历史的范围。我们只需看看第一次对华战争²⁹²，看看可以说是昨天发生的事件。当时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记录下这些暴行的不是中国官吏，而是那些英国军官自己。

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英国人则体现了人类的一切善良天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军官们的来信充满了恶意。有一个军官从白沙瓦来信，描述了非正规骑兵第十团因拒不执行攻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命令而被解除武装的情形。这名军官欢欣若狂，因为那些士兵不仅被解除武装，而且被剥去衣服和靴子，每人分得12个便士后，就被赶往河岸装上小船，漂向印度河下游，这位军官喜不自胜地预料他们全都会淹死在急流中。另一个军官告诉我们，一天夜晚，白沙瓦的几个居民为祝贺婚礼燃放了一些小火药弹（这是当地的民族风俗），结果引起一场虚惊，第二天早上，有关的人就被捆起来，

“遭到一顿使他们永远难忘的毒打”。

从品第来的消息说，有三个土著领袖在进行密谋。约翰·劳伦斯爵士写了一封回信，命令派一个间谍去参加他们的会晤。约翰爵士接到间谍的汇报后，就发出第二道命令：“处以绞刑。”这几个土著

领袖就这样被绞死了。有一个文官从安拉阿巴德来信说：

“我们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我们敢向您保证，我们绝不饶他们。”

另一个文官从同一个地方来信说：

“我们没有一天不吊死 10 个到 15 个人(非战斗人员)。”

一个军官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写道：

“霍姆斯真是‘好汉’，他把他们一批一批地绞死！”

另一个军官在谈到把一大批土著人处以绞刑时说道：

“于是我们的娱乐开始了。”

又有一个军官写道：

“我们骑在马上进行军事审判，凡是被我们遇到的黑鬼，我们不是吊死他，就是枪毙他。”

从贝拿勒斯来的消息说，有 30 个柴明达尔²⁹⁶被绞死，只因为他们有同情自己同胞的嫌疑。由于同样的理由，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烧成灰烬。伦敦《泰晤士报》登载的一个军官从贝拿勒斯的来信中说：

“欧洲士兵在对付土著人时，便成了恶魔。”

不应当忘记，英国人的残暴总被说成是军人的尚武行为，往往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不讲令人作呕的细节，而土著人的暴行，本身已令人震惊，又往往被故意渲染夸大。例如，最初在《泰晤士报》发表、以后又在伦敦许多报章杂志上转载的一篇详细叙述在德里和密拉特所犯暴行的报道，它的作者是谁呢？原来是一个住在离出事地点直线距离远达 1 000 多英里的班加罗尔(在迈索尔)的胆小的牧师。关于

德里情况的真实报道证明,一个英国牧师的想像能够比一个印度哗变者的狂想造成更大的恐怖。割鼻子,割乳房等等,总之,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当然会引起欧洲人的憎恶,其程度超过了对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会长^①下令用炽热的爆炸弹轰击广州居民住宅的憎恶,或对一位法国元帅火烧烟熏被困在山洞中的阿拉伯人²⁹⁷,对战地军事法庭决定用九尾鞭活剥英国士兵的皮,对英国感化营中惯用的任何一种“仁慈的”刑具的憎恶。残暴,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也有自己的时尚,它因时因地而异。学识渊博的凯撒坦率地叙述他怎样命令部下砍去几千个高卢军人的右手²⁹⁸。拿破仑也许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他宁愿把他那些有共和主义思想嫌疑的法国团放逐到圣多明各岛,让他们死于黑人之手和瘟疫。

西帕依的可耻的体刑,令人想起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风俗,想起查理五世皇帝的刑律²⁹⁹,想起布莱克斯顿法官描述的英国对叛国罪犯的惩罚。印度人的宗教已使他们成为自我折磨的能手,所以对印度人来说,让他们的种族和教派的敌人受折磨是十分自然的,让英国人受折磨,更是理所当然,因为就在几年以前,英国人还一直在利用札格纳特节获取收益,庇护并鼓励这种残忍的宗教流血仪式³⁰⁰。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贝特经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哮,扮演着莫扎特歌剧中一个残暴成性的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吊起来,然后放在火上烤,然后砍成四块,然后戳在铁叉上,最后活生生地剥皮^②,把复仇的情绪表演得淋漓尽致,——所有这一切只是显得很愚蠢,幸亏在悲剧的伤感后面明

① 约·包令。——编者注

② 莫扎特《后宫诱逃》第3幕第6场。——编者注

显地露出了喜剧的技巧。伦敦《泰晤士报》把角色演得过火，不仅仅是由于惊慌失措。它给喜剧提供了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题材，那就是复仇的答尔乔夫。其实，它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像耶利哥的城墙那样仅仅由于声浪的震荡而倒塌³⁰¹，所以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灌满约翰牛的耳朵，使他忘掉他的政府应该对这场灾难以及它竟达到如此巨大规模负责。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4 日

载于 1857 年 9 月 16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511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法国动产信用公司

动产信用公司¹²⁶，正如我们在几个月前分析其 1856 年的冠冕堂皇的报告书^①时所预料的，又在走下坡路了。这次下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严重恐慌。几天之内，这家企业的股票从 950 法郎跌到 850 法郎左右，而后面这个数字，看来还远远不是极限。政治家对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涨跌的兴趣，并不亚于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涨落的兴趣。该公司股票行情的波动，可分为几个时期。1852 年它第一次发行时就安排得很巧妙。股票分成三组，第一组的股票持有者有权按照票面价值获得第二组和第三组股票。其结果是，由于市场高度活跃，股票限额发行，由于人们对该公司股票抱有很快就会大大升值的奢望，所以幸运的第一组股票持有者大为受益。股票市价从第一次发行时的 250 法郎立刻上涨到 1 775 法郎。它们在 1852 年、1853 年和 1854 年的波动并没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只表明刚建立的企业所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而不是对成熟的企业的考验。1855 年，动产信用公司达到其鼎盛时期，它的股票的瞬间报价曾达到 1 900 法郎，说明它已远离通常的尘世的业务。从那时起，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① 见本卷第 134—141 页。——编者注

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价格的波动,如果平均以四个月为来看,是在逐渐下跌的,这种下跌服从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律,尽管偶尔有些偏差。这个规律就是,价格从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所达到的最高点下跌到平均最低点,而这个最低点又成了下一个时期的最高起点。例如,1 400 法郎、1 300 法郎、1 100 法郎这些数字,依次成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最低点和另一个时期的平均最高点。在今年整个夏天,股票已经不能较长时间达到 1 000 法郎;而目前的危机,即使不引起更坏的后果,也将使股票的平均最高价格跌到 800 法郎左右,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跌到更低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而且,如果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跌到其票面价额 500 法郎,这同它的根本规律也是不能相容的。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规模相差悬殊,因而使它获得巨额利润,使它的股票市价出奇地高于其原价,——这并不是动产信用公司繁荣的条件,而是它赖以生存的条件。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谈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研究它的利润从 1855 年 40% 减少到 1856 年 23% 的时候,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①。

目前动产信用公司股票的价格,是和一些看来被误认为是原因而其实只是结果的情况有关。在动产信用公司最“受人敬重的”董事中,有一位奥·图尔恩埃桑先生被宣布为破产人,因为法院判定他应当替在本年 5 月偷偷逃出法国的他的侄子沙尔·图尔恩埃桑先生偿还所欠的债款 1 500 万法郎。单是个别董事的破产决不能说明动产信用公司的现状,这一点,凡是记得当年普拉斯先生的破产并没有明显地动摇波拿巴政权的这个支柱的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追踪探索整个机构的

^① 见本卷第 134 页。——编者注

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险很大很明显的时候，才会惊慌起来。例如，罗的股票和银行券在法国一直享有高度的信任，尽管摄政王^①及其顾问们一直听任应由银行券代表的硬币贬值。公众并不了解，当铸币厂用一个马克^②的白银铸造成数目比过去多一倍的利弗尔^③时，代表一定数量的银利弗尔的银行券就贬值一半。但是，根据枢密院的命令，这些银行券的正式票面价值被降低了，100利弗尔的银行券只能兑换50利弗尔的银行券，这时这个过程才一下子被看清，肥皂泡也就破灭了。同样，动产信用公司的利润几乎下跌了50%，这一点，当时甚至丝毫没有引起英国那些撰写金融评论的作者的注意，而现在，关于奥·图尔恩埃桑先生的破产，欧洲的所有报刊都在大肆喧嚷。其实，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当今年5月沙尔·图尔恩埃桑先生不偿还债款时，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表现得比平时更加义愤填膺，他挺身而出，在伦敦报刊上郑重否认奥·图尔恩埃桑先生和动产信用公司那个卑鄙的逃债者有任何联系。现在法国法院的决定，彻底驳倒了这位能言善辩的绅士的声明。

不仅如此，看来动产信用公司本身也是惊慌不安的。它的一个董事厄内斯特·安德烈先生认为有必要使自己公开摆脱对将来的一切责任，并通过法律手续同这个机构断绝一切关系。别的人——包括霍廷格银号——据说也在发出退却的信号。要是水手们自己都忙着上救生艇，乘客当然会认为船快要沉了。最后，这两位图尔恩埃桑

① 菲利浦第二，奥尔良公爵。——编者注

② 马克(mark)是旧时欧洲大陆的金银重量单位，等于8盎司(约240克)。——编者注

③ 利弗尔(livre)是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当时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编者注

先生同圣彼得堡施蒂格利茨银号和庞大的俄国铁路系统关系密切，这也会给欧洲金融界提供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们肯于“建立起法国的信用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并支持全世界的证券投机，但如果以为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除了从他们股票所代表的资本获得每年平均 25% 的股息之外，他们在这个机构创立的头五年中还定期分到总利润 5% 的红利——每人大约 275 000 法郎，等于 55 000 美元。另外，人们发现，那些享受到动产信用公司优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共工程，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些董事的私人事业搀和在一起。例如，大家都知道，贝列拉兄弟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就有很大的利害关系。现在，仔细阅读这些已公布的报告书，我们发现公司认购这些铁路的股票共达 62 300 万法郎。但是，这 15 名董事不仅总是按照自己的私人利益来处理公司的业务，而且还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大规模证券投机的信息，来调控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们还能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所以，这些董事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暴富起来；所以，欧洲的公众发现他们遭遇金融方面的厄运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手中的公共信贷也是密切相连，水乳交融——虽然某些私人财产，由于经营有方，其寿命无疑会超过公司的寿命。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炮 座³⁰²

在炮兵连中,当火炮架高到足以超越胸墙顶部进行射击,而不是像通常那样通过射孔进行射击时,就叫做把火炮安放在炮座上。要使火炮炮位达到这样的高度,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野战工事里,胸墙后面的土平台可以作为安置火炮的地方。在永备工事里,利用一般的高滑动炮架或旋转平台把炮提高到所需的高度。安放在炮座上的火炮,不像通过射孔射击的火炮那样有防御敌人火力的掩蔽物;所以,只有在怕严重损坏胸墙而不能开射孔的情况下,或希望不受射孔限制而向左右两侧扩大火力作用范围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因此,在炮座上安放火炮的做法适用于野战工事、凸角工事和射击舰只的岸防炮台,尤其适用于有石砌胸墙的工事。为了掩护火炮不受到纵射火力,必要时可构筑横墙和垛墙。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9 日—14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棱堡³⁰²

在古代防御工事中,城墙是用圆形或方形的塔楼从侧面防守的,当强攻的敌人遇到护城壕被迫停止前进时,弓箭手可以从塔楼向敌人射箭,或利用军用器械发射投掷物。欧洲引进火炮以后,这种塔楼大为加大。最后,16世纪初,意大利工程师们将圆形或方形塔楼改为多边形塔楼,这就是棱堡。棱堡是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塔楼内部,因此对面的凸角向开阔地突出。形成凸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两条长边同城墙或垒墙相连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侧面则以火力掩护护城壕。最初的意大利棱堡还带有它的前身古代塔楼的痕迹。它离主墙很近,凸角很钝,正面短,胸墙的表面用石块一直砌到顶端。这种小型棱堡的侧面主要是用来掩护连接两个棱堡的幕墙前面的护城壕的,因此侧面和幕墙垂直。这些棱堡位于形成要塞整个围廓的多边形的各个角上,或者,如果多边形的一边过长,这条边的一部分处在两个突出侧面的火枪有效射程以外,那么就中间构筑中间棱堡,这种棱堡叫做台堡。

随着17世纪攻城炮的改进,需要有更大的棱堡,幕墙很快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棱堡。侧面的作用也有改变,这时侧面必须主要对对面棱堡正面前的护城壕进行纵射,并且侧面已

不再和幕墙垂直,而是和对面棱堡正面的延长线(称为防守线)垂直。石砌障壁的高度减低了,这是为了使斜堤或者较低的外围工事的胸墙能够掩护它以防避敌人的直射火力。这样,在老的法国学派和德国学派的手中,以后在沃邦和库霍尔恩的手中,棱堡的形式和大小都发生了很多改变,最后,大约在1740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一部关于棱堡防御工事体系的著作^①,他的棱堡防御工事体系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的最完美之作。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它的侧面和防守线接近垂直,而不完全垂直;外围工事也有很大改进。

棱堡有实心的和空心的两种。实心棱堡的整个内部填实到垒墙的高度;空心棱堡则是沿着棱堡的内边构筑垒墙,其宽度足以放置火炮,工事的中心是空的。在实心棱堡里有时构筑封垛,这是一种各边与棱堡的各边相平行的工事,它们构筑得很高,火炮可以从这里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由于这种封垛的制高位置,通常在封垛里放置射程最远的火炮,以便在较远距离用炮火骚扰敌人。

自16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防御工事体系是惟一得到公认的体系,直到18世纪末,蒙塔朗贝尔才提出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方法,其中最受赞许的是内陆要塞的多边形体系或侧防暗堡体系,以及配置几层火炮的暗堡体系。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
9日—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科尔蒙太涅《军事建筑学,即筑城工艺》1741年海牙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

刺 刀³⁰²

目前所有基干步兵普遍使用的这种武器,通常认为是1640年前后在法国发明的(大概是在法国的巴约讷城,其名称即由此而来^①)。根据另外的资料,这种武器是荷兰人从马来人那里学来的,马来人把他们的 kris 即匕首固定在火枪上。这种武器传入法国是在1679年前后。在此以前,火枪手没有有效的近战武器,所以,为了在短兵相接时保护他们,只好把他们同长矛手混在一起。刺刀使火枪手有可能抵御骑兵或长矛手,因而就逐渐取代了后者。最初,刺刀固定在一根木棍上,与木棍一起插入火枪枪管,但是士兵上刺刀后无法射击,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套在枪管上的套箍。虽然如此,长矛仍然作为步兵武器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奥地利人首先在所有基干步兵中采用带刺刀的火枪以代替长矛;普鲁士人在1689年仿效了他们;法国人在1703年,俄国人在1721年,才完全废除长矛。在1703年施派尔会战中,步兵第一次上刺刀冲锋。³⁰³目前,在轻步兵中,刺刀已普遍被又直又尖的短剑代替,它用活动刺刀座固定在来复枪枪口的一侧。

① “刺刀”英语为 bayonet, 源出于法语 baionnette(刺刀), 法语这个词又来源于 Bayonne(巴约讷城), 该地为法国商港, 刺刀产地。——编者注

这当然不太牢固,但是轻步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成横队冲锋,所以人们认为,这个缺点可以由这一武器的多种用途得到弥补。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9 日—14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贝尔纳多特³⁰⁴

贝尔纳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法兰西帝国元帅, 蓬泰科尔沃公爵, 瑞典和挪威国王, 称查理十四·约翰, 1764年1月26日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 1844年3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的王宫中去世。他是律师的儿子, 受过律师职业教育, 但是他喜爱军事, 于1780年秘密参加皇家海军陆战队, 法国革命爆发时, 他已获得士官军衔。从此时起不断迅速被提升。1792年在居斯丁的军团任上校, 1793年指挥一支缩编旅, 同年, 由于克莱贝尔的保举, 升为准将, 担任松布尔和麦士军团师长, 在克莱贝尔和茹尔丹的指挥下, 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战斗中获胜, 在于利希战斗中立功, 并迫使马斯特里赫特投降³⁰⁵。在1795—1796年对奥地利的克累尔费将军、克赖将军和卡尔大公的战争中战功卓著。1797年初, 奉督政府³⁰⁶的命令, 率领2万人增援意大利军团; 在意大利第一次同波拿巴的会面, 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关系。波拿巴虽然生性大度, 但对莱茵军团及其将领却怀有狭隘的猜忌心理。他很快看出, 贝尔纳多特很想单独获取功名。贝尔纳多特是一个地道的加斯科涅人, 不能正确衡量一个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这样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因此两人之间心存芥蒂。在入侵伊斯特里亚半岛³⁰⁷期间, 贝尔纳多特

在指挥前卫部队渡过塔利亚门托河以及在 1797 年 3 月 19 日攻克格拉迪斯卡要塞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所谓果月十八日革命³⁰⁸以后,波拿巴命令一些将领向所属各师收集支持这次政变的贺信;但是贝尔纳多特对此一开始持反对态度,接着又表示很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最后还是给督政府送去了贺信^①,但其内容同所要求的截然相反,而且传送未经波拿巴之手。波拿巴在去巴黎向督政府递交坎波福米奥条约³⁰⁹的途中,曾到乌迪内司令部去拜访贝尔纳多特,对他大加吹捧,但第二天却从米兰下令,把莱茵军团中他的一师兵力缩减一半,命令他把另一半人调回法国。经过多次抗议、调解和新的争吵,贝尔纳多特终于被说服接受了驻维也纳大使的职务。在这里,他按照达来朗的指示行事,采取和解的立场,但是巴黎报纸在波拿巴及其一伙人的教唆下,宣称这种立场充满保皇主义倾向,为了证明这一指责,还不厌其烦地挑剔,说贝尔纳多特取下了挂在他邸宅门口的三色旗,摘下了他的随从人员帽子上的共和国帽徽。贝尔纳多特在因此遭到督政府的谴责之后,于 1798 年 4 月 13 日,即在维也纳反雅各宾示威游行周年纪念那一天,升起了写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结果他的邸宅遭到维也纳人群的袭击,旗子被烧毁,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奥地利政府对他的要求拒不答应,他便偕同全体使馆人员去了拉施塔特;然而督政府却遵照亲自插手这一丑事的波拿巴的意见,压下这件事,把自己的代表丢下不管了。

1798 年 8 月,贝尔纳多特同马赛商人的女儿、约瑟夫·波拿巴

^① 据 1797 年 8 月 12 日《总汇通报》第 325 号所公布的这封贺信来看,该信送出应在果月十八日政变以前而不是以后。——编者注

的小姨子德西雷·克拉里小姐结婚,从此他同波拿巴家族有了亲戚关系;但这看来只加深了他对拿破仑的敌意。1799年,他担任上莱茵监视军司令,但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这就预先证实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对他的评价^①:他可以当助手,但当不好司令官。在督政府牧月三十日政变³¹⁰以后,他主管陆军部,他的本事主要不表现在作战计划上,而表现在勾结雅各宾派的阴谋活动上,他依靠雅各宾派重新抬头的势力,企图在军队中给自己收罗追随者。在1799年9月15日那天早晨,他发现《通报》^②上有他退职的消息,在这之后他才得悉他已提出辞呈。这是督政府中波拿巴派系的成员西哀士和罗日·杜科对他耍的诡计。

贝尔纳多特在担任西方军团司令时,扑灭了旺代战争²⁹³的最后的余火。在宣布帝国^③以后,帝国授与他元帅称号,并委任他指挥汉诺威军团。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以及后来担任北德意志军团司令时期,竭力在北部的人民中树立个人声望,标榜自己是独立的、温和的、擅长行政管理的人。他率领驻汉诺威的一个军,即大军¹²⁷的第一军,参加了1805年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的战争。他被拿破仑派到伊格劳去监视斐迪南大公在波希米亚的动向;后来被调回布吕恩,在奥斯特利茨会战³¹¹期间,他的军部署在苏尔特和拉纳之间的中央,协助粉碎了联军右翼从翼侧迂回法军的企图。1806年6月5日,他被封为蓬泰科尔沃公爵。在1806—1807年对普鲁士战争期

① 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2卷第60页。——编者注

② 指1799年果月29日《总汇通报》第359号。——编者注

③ 指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称帝,改共和国为法兰西帝国。——编者注

间,他指挥第一军。他奉拿破仑之命,从瑙姆堡开往多恩堡,当时在瑙姆堡附近的达武,则奉命向阿波尔达前进;在达武接到的命令中附有这样的话:如果贝尔纳多特已经同他会合,那么他们可以一同开往阿波尔达。达武侦察到普军移动的方向,确信在去多恩堡的途中不可能遇到敌军,因而建议贝尔纳多特共同向阿波尔达进军,甚至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但是贝尔纳多特固执地坚持从字面上解释拿破仑的命令,仍向多恩堡前进,整天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然而达武却不得不在奥尔施泰特会战³¹²中单独承受敌人的主攻,这次会战由于贝尔纳多特没有参加,最后没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由于奥尔施泰特和耶拿的两股溃军的汇流,以及拿破仑成功的战略组合,才减轻了贝尔纳多特明知故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拿破仑本来已经签署了把贝尔纳多特提交军事法庭的命令,但是进一步考虑以后,又撤销了这项命令。耶拿会战以后,贝尔纳多特会同苏尔特和缪拉特于10月17日在哈雷击败了普军,把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将军追击到吕贝克,迫使他于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投降。1807年1月25日他还在托恩附近的莫伦根平原击败了俄军。

在蒂尔西特和约³¹³以后,按照丹麦同拿破仑签订的同盟条约的条款规定,法国军队应当占据丹麦的岛屿,从那里进攻瑞典。因此,1808年3月23日,也就是俄国入侵芬兰的同一天,贝尔纳多特奉命向西兰岛推进,以便会同丹麦军队攻入瑞典,推翻国王^①,并把这个国家瓜分给丹麦和俄国——这对一个被指定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斯德哥尔摩的人来说,是个奇怪的使命。他率领32 000人的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军队渡过贝尔特海峡,抵达西兰岛;但是1万名西班牙军队

①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编者注

在罗曼纳将军指挥下，依靠英国舰队的帮助，设法撤离了。贝尔纳多特在他留驻西兰岛期间毫无作为，也毫无收获。此后他被召回德国，参加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新的战争，他奉命指挥主要由萨克森人组成的第九军。

1809年7月5日和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²⁷⁴对他同拿破仑之间的不和更是火上加油。会战的第一天，欧仁·博阿尔奈前出到瓦格拉姆附近，插入敌军预备队的中路，但没有得到贝尔纳多特应有的支援，因为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加入战斗太晚而且太不主动。遭到正面和翼侧攻击的欧仁被有力地击退到拿破仑的警卫部队那里；法军进攻的第一次突击就这样因贝尔纳多特行动缓慢而受挫。当时贝尔纳多特占据了阿德勒克拉村，该村在法军的中心地带，但在法军的正面稍前一些。第二天早晨6点钟，奥军出动，发起一次分进合击的进攻，贝尔纳多特没有设防固守这个村庄，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面，却在阿德勒克拉前面展开自己的部队。他认为奥军的迫近使这个阵地非常危险，所以放弃了这个村庄，退到阿德勒克拉后面的台地，于是阿德勒克拉立即被贝勒加德的奥军占领。这样一来，法军中路处于危急状态，它的指挥官马塞纳派出一个师到前面去重新占领阿德勒克拉，但是这个师又被达斯普雷的掷弹兵击退。正在这时，拿破仑亲自来了，他负责总指挥，制定一个新的会战计划，破坏了奥军的机动。可见，贝尔纳多特又像在奥尔施泰特那样，使会战的胜利又一次受到威胁。他则不满意拿破仑违反一切作战规则，命令杜帕将军（杜帕将军的法国师是贝尔纳多特军的一部分）脱离他的指挥独立行动。他提出的辞呈被接受了，因为拿破仑已经发现他那天对萨克森人发布的命令同皇帝的通告不一致。

贝尔纳多特回到巴黎，开始同富歇策划阴谋，不久之后，英军对

瓦尔赫伦岛的远征³¹⁴(1809年7月30日)迫使法国内阁在皇帝不在的时候委派他去防守安特卫普。英军的错误使他的行动成为多余;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份告官兵书的字里行间指责拿破仑忽视采取应有措施来防守比利时沿岸地区。他被免去指挥权;回到巴黎以后接到命令,要他离开首都,回到自己的蓬泰科尔沃领地去。他拒绝服从这个命令,因而被召到维也纳。他同拿破仑在申布伦³¹⁵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辩以后,接受了罗马区总督的职务——这是一种光荣的流放。

他当选为瑞典王储的原因,甚至在他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完全弄清楚。查理十三世在收养奥古斯滕堡公爵查理-奥古斯特为义子并承认他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以后,派弗雷德伯爵去巴黎,为这位公爵向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儿夏绿蒂郡主求婚。1810年5月18日,奥古斯滕堡公爵突然死亡,俄国强迫查理十三世收奥尔登堡公爵为义子;而拿破仑则支持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的要求。年老的国王本人主张宣布已故的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哥哥^①为继承人,并派默尔纳男爵带了指令去见弗雷德将军,要求弗雷德去说服拿破仑同意国王提出的人选。但默尔纳这个年轻人属于瑞典极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当时以为只有紧密联合法国才能复兴自己的国家。默尔纳到了巴黎,同年轻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拉皮耶、瑞典总领事西格纽尔和弗雷德伯爵本人磋商以后,提议贝尔纳多特为瑞典的王位候选人,他们竭力不让在土伊勒里宫的瑞典大使拉格尔比耶尔克伯爵知道自己的步骤;而且他们完全被贝尔纳多特巧妙制造的一系列误会所左右,他们坚信贝尔纳多特事实上是拿破仑心目中的候选人。因此,弗雷德和

① 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编者注

西格纽尔于6月29日在给瑞典外交大臣的急电中报告说,如果王位继承人的位置能给拿破仑的助手和亲戚,拿破仑将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查理十三世表示反对,但是厄勒布鲁的全国议会于1810年8月21日选举了贝尔纳多特为瑞典的王储。国王也就被迫把他收为义子,起名查理·约翰。拿破仑无可奈何,只好勉为其难地命令贝尔纳多特去接受给予他的高位。贝尔纳多特于1810年9月28日离开巴黎,10月21日抵赫尔辛堡,在那里宣布脱离天主教,11月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1月5日出席等级会议,并从此时起掌握了政权。自从签订倒霉的腓特烈港和约²⁵⁸以来,瑞典普遍主张重新占有芬兰,一般都认为,没有芬兰,就像拿破仑在1811年2月28日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说的,“瑞典就不能生存”,至少是不能作为一个摆脱俄国控制的国家。瑞典只有紧密联合拿破仑才能指望收回这个地区。正因为人们坚信这一点,贝尔纳多特才得以当选。在国王患病期间(1811年3月17日至1812年1月7日),查理·约翰被任命为摄政王;但这个任命只是仪式问题,因为他从到达瑞典那天起就已经领导一切事务了。

拿破仑这个十足的暴发户,并不照顾自己老部下的情感,他于1810年11月17日强迫贝尔纳多特不顾以前的协定参加大陆体系³¹⁶,并向英国宣战。他还取消了贝尔纳多特作为法国公爵所应得的收入,并借口贝尔纳多特不是“和他同等的国君”,而不接受贝尔纳多特直接给他的信件,并退回查理·约翰赠送给新生的罗马国王^①的六翅天使勋章。这些小动作不过使贝尔纳多特有理由根据早就作出的决定行事。他刚到斯德哥尔摩就任,就公开接见了因收买斯韦

① 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第一之子。——编者注

阿堡的指挥官而被瑞典人所痛恨的俄国将军苏赫帖连,甚至同意此公被委任为驻瑞典王宫的大使。1810年12月18日,他同车尔尼晓夫会谈,表示“切盼博得沙皇的好感”,并同意永远放弃芬兰,条件是挪威要脱离丹麦而并入瑞典。他通过车尔尼晓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一封极为谄媚的信。当他因此同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那些推翻古斯塔夫四世和促成贝尔纳多特当选的瑞典将领们不再支持他了。他们的反对立场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得到响应,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法国的一个师于1812年1月17日侵入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这是拿破仑根据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秘密建议而采取的措施),终于使查理·约翰有了正式宣布瑞典中立的名正言顺的借口。然而他背着议会,同亚历山大于1812年3月24日^①在圣彼得堡秘密缔结了针对法国的进攻同盟,其中还明文规定挪威并入瑞典。

拿破仑的对俄宣战,使贝尔纳多特一时成为主宰欧洲命运的人物。拿破仑向他提议,只要他派4万名瑞典军队进攻俄国,就答应给他芬兰、梅克伦堡、斯德丁以及在斯德丁和沃尔加斯特之间的全部地区。贝尔纳多特本来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在拿破仑进入莫斯科以前占领圣彼得堡。他却宁愿在同英国、俄国一起组成的三头执政中扮演李必达的角色。他怂恿苏丹^②批准布加勒斯特和约³¹⁷,从而促使俄国契查哥夫海军上将从多瑙河沿岸撤走自己的部队,并在法军的翼侧采取行动。他还是1812年7月18日签订的以英国为一方和以俄国、瑞典为另一方的厄勒布鲁和约³¹⁸的中间人。亚历山大被拿破仑最初的胜利吓破了胆,他邀请查理·约翰会晤,同时建议他担任俄

① 3月24日是俄国旧历的日期,新历应是4月5日。——编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军总司令。查理·约翰机智地拒绝后一项建议而接受了会晤的邀请。他于8月27日到达奥布,在会晤时发现亚历山大灰心丧气,只想求和。此时已无退路可走的查理·约翰,竭力给这位动摇的沙皇打气,并指出,拿破仑表面的胜利必将导致其灭亡。会晤的结果签订了所谓奥布条约³¹⁹,其中附有一项秘密条款,使同盟具有家庭协议的性质。实际上,查理·约翰除了得到诺言,毫无所获,而俄国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却获得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同瑞典的同盟。不久,根据正本的文件证明,芬兰归还给瑞典的问题当时完全取决于贝尔纳多特;但是这个统治者,这个加斯科涅人,却轻信了亚历山大的恭维话:“总有一天,从拿破仑额头掉下的法国皇冠会落在他的头上”,已经把瑞典仅仅看成是一个暂且寄居之地了。

法军撤出莫斯科以后,他同法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当英国在1813年3月3日的条约³²⁰中保证他得到挪威的时候,他加入了反法同盟。他在英国的资助下,于1813年5月率领约25 000名瑞典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登陆,并向易北河推进。在1813年6月5日实现的休战³²¹期间,他在特拉亨贝格的会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那里,亚历山大皇帝把他介绍给普鲁士国王^①,并一起商定了总的作战计划。他作为由瑞典、俄国、普鲁士、英国、汉撒和北德意志等部队组成的北方军团总司令,通过一个以朋友身份经常出入他的司令部的人,同法军保持非常暧昧的联系;他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只要他向法国人证明自己是宽容仁慈的,他们就会心甘情愿舍弃拿破仑而换取贝尔纳多特的统治。因此他阻挠部下将领转入进攻,当毕洛夫不顾他的命令,在大贝伦和登讷维茨两次击败法军的时候,他又制止追击溃军。当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布吕歇尔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而向易北河进军,并同他会合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的军营中的英国全权代表查理·斯图亚特爵士以停止供应相威胁,他才不得不向前推进。然而瑞典军队出现在莱比锡战场³²²上,不过是装装样子,在整个战争期间伤亡还不到200人。当联军进入法国的时候,他让瑞典军队在法国边境按兵不动。拿破仑退位以后,他亲自前往巴黎,向亚历山大提醒在奥布对他许下的诺言。达来朗向盟国国君会议声明,“只能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其他一切都是阴谋”,这就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幼稚的希望。

在莱比锡会战以后,查理·约翰率领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军队,侵入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公国,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面临敌军的优势兵力,被迫于1814年1月14日签订基尔和约,和约规定,挪威割给瑞典。但是挪威人不愿任人如此无礼地摆布,于是宣布挪威在丹麦王储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支持下实行独立,国民代表于1814年5月17日在埃兹沃尔德集会,通过了一部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现代欧洲最民主的宪法。查理·约翰调动瑞典陆海军,占领了控制通向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要冲的腓特烈斯塔要塞,然后进行谈判,同意把挪威视为独立国家,并承认埃兹沃尔德宪法;他在1814年10月7日得到挪威议会的同意以后,于11月10日前往克里斯蒂安尼亚,以他自己的名义和国王的名义向宪法宣誓。

1818年2月5日,查理十三逝世。称为查理十四·约翰的贝尔纳多特被欧洲承认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这时他企图修改挪威宪法,恢复已被废除的贵族阶层,掌握绝对的否决权和撤销一切文武官员的权力。这种企图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了1828年5月18日骑兵袭击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的克里斯蒂安尼亚居民的事件。一场暴力事件看来即将临头,但是1830年的法国革命³²³迫使这位

国王暂时采取和解的步骤。为了得到挪威，他曾经不惜牺牲一切，而挪威在他整个统治期间始终是心腹之患。从1830年法国革命开始以后，欧洲就只有一个人认为瑞典国王是法国王位的合适追求者了，这个人就是贝尔纳多特自己。他不止一次地向斯德哥尔摩的法国外交代表说：“怎么拉菲特没有想到我呢？”欧洲形势的改变，首先是波兰的起义³²⁴，一度促使他产生建立反俄阵线的念头。在他据此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建议遭到坚决的拒绝之后，他不得不对自己闹独立的念头表示赎罪，于1834年6月23日同尼古拉皇帝签订一项同盟公约，这个公约使他成为俄国的一名藩臣。从这时起，他在瑞典的政策的表现就是，侵犯出版自由，惩治犯大不敬罪者，阻挠各种改革措施，甚至包括那些使工业摆脱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陈规束缚的措施。他利用瑞典议会各阶层之间的勾心斗角，长期阻挠各种运动；但是议会1844年的各项自由主义决议（根据宪法，议会应在1845年使这些决议成为法律）³²⁵，使他的政策有彻底破产的危险，正好在这时他去世了。

如果说，在查理十四统治期间，瑞典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不幸中有所恢复，这不能归功于贝尔纳多特，而要完全归功于该民族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

11/12日—10月15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军 用 桥³²⁶

为军队渡过大河和狭窄海峡架设临时桥的技术,古代人早已熟知,他们在这方面的作业之宏伟,有时确实令人惊讶。大流士曾经用舟桥渡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薛西斯也曾用舟桥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希罗多德的著作^①中可以看到有关的描述。薛西斯的军队曾架设两座横跨达达尼尔海峡的桥。第一座桥用了360只船,这些船互相靠拢,船首和船尾用锚固定,其龙骨顺着水流的方向;它们靠牢固的缆绳彼此连接,上面铺木板,两侧用横杆固定,并以土层封盖。第二座桥用了314只船,以同样的方法建造。据阿利安的记载,亚历山大的军队有一个使用轻便船只的常备浮桥纵列。^②罗马人有一种用兽皮包裹的荆条船,用以支撑桥面上的木板;这种船在帝国崩溃以前,一直是军队辎重的一部分。不过,一旦需要渡过湍急的河流,他们也会建造更牢固的军用桥;凯撒横渡莱茵河³²⁷时用的著名的木桩桥就是证明。

关于中世纪军队架桥器材的资料,我们没有找到,但是,在三十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83章、第7卷第36章。——编者注

^② 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5册第3章。——编者注

年战争²²⁸时期,军队曾携带器材在德国的大河上架设桥梁。当时所用的船很重,多半用栎木制成。支撑桥面板的是一些立在船底的支架。荷兰人首先使用比较小型的平底船,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和船尾呈尖形,两端形成一定的斜面高出水面。这种船有一副包着白铁皮的木骨架,称为浮桥船。据福拉尔说^①,法国人也自称是铜壳浮桥船的发明者,还说他们在1672年前后就已经有了一支完备的浮桥纵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军队都有了这种船,其木骨架通常裹以白铁皮、铜皮、皮革或浸油帆布。后一种材料是俄国人采用的。这些船都不大,为了保持浮力,它们必须互相靠近,间隔不超过4—5英尺;水流因此严重受阻,使桥的安全受到威胁,并使敌人有可能放下可浮物加以破坏。

目前大陆各国军队都使用较大的浮桥船,但基本上和一百年前使用的相似。从1829年起,法国人使用平底船,这种船的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很尖,而船尾尖度稍差;船的两端高于船舷的上缘,像舢板船那样翘起。船的大小如下:长31英尺,上宽5英尺7英寸,底宽4英尺4英寸。骨架是栎木的,包有一层云杉板。每只浮桥船重1658磅,浮力(船吃水到船舷上缘顶端时的负荷力)为18675磅。架桥时,船舷与船舷的间隔为14英尺。桥面宽11英尺。军队的前卫常使用较小的浮桥船,在不大的河流上架桥。奥地利浮桥船与较大的法国浮桥船相似,但是为了便于搬运,从中间横截为二,在水上连成一体。两只船互相紧紧靠拢,用短方木连接,用一根纵梁支撑桥板面的主横梁,构成浮托桥墩。这种浮桥船是比拉戈发明的,1825年

^① 《福拉尔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短评》1754年巴黎版第3卷第82页。——编者注

首次被采用。俄国人的浮桥船是木骨架的,其中心横梁或支柱可以拆卸;骨架上绷着涂有柏油或印度橡胶液的帆布。浮桥船每只长 21 英尺 9 英寸,宽 4 英尺 11 英寸,高 2 英尺 4 英寸,重 718 磅。桥面宽 10 英尺。两船的间隔为 8 英尺。俄国人还有用皮革包裹的同样骨架的浮桥船。据说普鲁士人最先把浮桥船横隔成若干个防水舱,使船不致因一处漏水而沉没。他们的浮桥船都是木制的平底船。架桥时,他们根据情况在浮桥船之间留下 8—16 英尺的跨度或间隔。荷兰人(从 1832 年起)和皮埃蒙特人的浮桥纵列与奥地利军队的相似。比利时的浮桥船船头是尖的,但船尾并不尖。大陆各国军队的浮桥纵列都配备有载锚的小船。

英国和美国军队的浮桥纵列完全不用船,而是用轻质材料制成的密封的空心圆筒支撑桥梁。1836 年,英国用布兰查德上校于 1828 年设计的两端为圆锥形、半球形或抛物线形的浮筒代替了其他各种类型的浮桥船。英国的大浮筒长 24.5 英尺,直径为 2 英尺 8 英寸。它是这样制成的:在一连串以空心的白铁管作轮辐的白铁轮子上包白铁皮;一个较大的直径为 $1\frac{3}{4}$ 英寸的白铁管作为它们共同的轴,通过整个浮筒。

美国曾试验使用外涂印度橡胶液的浮筒。1836 年累恩上尉(后为上校)曾用这种浮筒在亚拉巴马的一条深而湍急的河流上架桥,1839 年阿姆斯特朗先生设计了一种与此相似的浮筒,每个浮筒长 18 英尺,充气后直径为 18 英寸,重 39 磅;三个浮筒构成一个桥节。1846 年美国军队在与墨西哥作战³²⁸时使用了充气的外涂印度橡胶液的浮筒。它们很轻,折叠后不占地方,因而很便于搬运,但是除了遇到砂砾等等的摩擦便会损坏和不能使用之外,也有各种浮筒都具

有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浮筒沉到水中一半时，每增加一次等量载重，吃水深度就会越来越大，而人们需要的却相反；其次，浮筒两端容易阻留各种可浮物；最后，为了使它们在水中移动，必须预先用桥板把它们一对对地连结成筏，而浮桥船却能像普通船一样单独在水上移动，而且可以把小部队迅速地划过河去。下面的材料就足以比较出浮筒和浮桥船的浮力：法国浮桥船可支撑大约 20 英尺长的桥，浮力（桥梁上部结构除外）为 150 英担^①以上；英国的两浮筒筏大致也可支撑同样长度的桥，但浮力（上部结构除外）只不过 77 英担，而可载量则只有其浮力的一半。

除了浮桥船外，浮桥纵列还包括桨、篙、锚、缆以及浮桥船在水上移动和在一处固定所必需的其他用具，也包括预定的铺桥面用的木梁和壳板（木板）。在使用浮桥船时，通常是先将每只船在位置上固定，然后将木梁和木板在上面铺开；使用浮筒时，则是将它们一对对地连接成筏，然后在离桥的一端的适当距离下碇，并且用木梁和木板与桥的一端连结起来。如果情况允许，可在预定的筑桥地点的上方的隐蔽地带，将三四个或五个浮筒用桥板连结成桥节，然后将整个桥节依次一个个地浮运到预定的地点。有时，如果架桥兵有丰富的经验，整个桥可以在河的一岸造好，渡河时借水流的力量推送过去。在瓦格拉姆会战²⁷⁴前夕，拿破仑就是这样渡过多瑙河的。整个这次战役从在敌前用军用桥横渡大河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教益的。

但是浮桥纵列并不总是现成的，军事工程师必须在必要时没有浮桥纵列也能够在河上架桥。为此使用了各种筑桥材料和筑桥方法。在通航的河道上航行的大船，一般都可用来做舟桥。如果找不

^① 1 英担等于 112 磅或 50.8 公斤。——编者注

到船,而河的深度或河底的形状要求建造浮托桥墩,则可利用木筏、浮桶以及其他可浮物架桥。如果河浅,河底坚固而又相当平坦,则可建造固定的木桩桥墩或支架桥墩。木桩桥墩可以保证建造最牢固可靠的桥,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劳力;而建筑支架桥墩迅速而又容易。有时,可把装满柴束等物的大车沉入河的较深处作为铺桥的桥墩。跨越水淹地和沼泽地等的桥可用堡篮建造。如果只是步兵要通过狭窄的河流或沟壑,则可以采用各种吊桥;吊桥一般用牢固的缆索悬吊。

目前,在敌人的有效火力控制下是很少建造军用桥的,但必须始终为敌前建桥创造条件。所以,桥通常在河流的凹进地段修筑,这样左右两边的火炮就可以射击到对岸的桥头附近,借以掩护架桥。此外,凹进地段的河岸一般高于对岸的凸出地段,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兼有交叉火力的优点和制高位置的优点。步兵可乘船或浮桥船划到对岸,立即在桥头占领阵地。有时也可以建一座浮桥来渡运少量的骑兵和一些轻炮。把河分成几条支流的一些岛屿,或紧靠小河汇流点的地方,都能提供有利条件。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时在前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在河流的隐蔽地带把各个桥节造好,然后顺流浮运下去。进攻的一方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河流上的许多有利地点之间作出选择,因而容易以佯攻迷惑敌人,然后在另外一个很远的地点真正渡河;而防御者在很长一段河流上分散兵力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目前多半是在离河较远的地方集中兵力,一旦查明真正的渡河地点,立即在敌军全部渡河之前,将全部兵力投向真正的渡河地点。自从法国革命以来,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在欧洲任何一条大河上架桥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其原因就在这里。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5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吕歇尔³²⁹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 瓦尔施塔特公爵——普鲁士陆军元帅, 1742年12月16日生于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罗斯托克, 1819年9月12日卒于西里西亚的克里布洛维茨。1754年, 少年布吕歇尔被送到吕根岛, 在这里秘密加入了瑞典骠骑兵团, 任骑兵少尉, 参加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在1758年作战时被俘, 遭囚禁一年并开除瑞典军籍以后, 被劝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71年3月3日被任命为骑兵上尉。1778年, 当施韦特侯爵的私生子冯·耶格尔费尔德上尉顶替他补上了少校空缺时, 他上书弗里德里希二世:

“陛下: 耶格尔费尔德除了是施韦特侯爵之子外并无功绩, 竟先我而被提升。我请求陛下准我退职。”^①

为此, 弗里德里希二世下令将他关入监狱, 但是当他不顾相当长期的监禁, 拒绝撤回他的呈文时, 国王同意满足他的请求, 批示如下: “冯·布吕歇尔上尉可以滚蛋。”于是, 布吕歇尔远走波兰的西里西

^① 《迈耶尔百科全书》1845年版第4卷第1210页。——编者注

亚,不久结了婚,从事农耕,在波美拉尼亚置有薄产,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后,重返他原来的团,任少校,但是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即任期从1779年算起。数月后其妻去世。在参加对荷兰的不流血的入侵³³⁰时,1788年6月3日晋升为中校,1790年8月20日升为上校和骠骑兵团第一营营长,早在1760年他已加入该团。

1794年布吕歇尔在普法尔茨对共和制法国作战时,作为一名轻骑兵指挥官崭露头角。1794年5月28日,在基尔韦勒战斗获胜后,晋升为少将,在卢森堡、凯撒斯劳滕、莫尔施海姆、魏登塔尔、埃德斯海姆、埃登科本等地的战斗,使他声名大噪。他以奇袭和成功的突击不断地惊扰法军,并总是及时地向司令部汇报关于敌人调动的确切情报。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写的日志³³¹,于1796年由他的副官哥尔茨伯爵出版。这本日志虽然遣词造句多有差错,但仍不失为一部关于前卫战的佳作。巴塞尔和约³³²签订后再次结婚。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后提升他为中将,他在任中将期间占领了爱尔福特、米尔豪森和明斯特,并以总督身份执掌政务。1805年,他率领的一个人数较少的军集结于拜罗伊特,监视奥斯特利茨会战对普鲁士的直接后果,即监视贝尔纳多特的部队进占安斯巴赫公国的情况。

1806年布吕歇尔在奥尔施泰特会战³¹²时指挥普鲁士军队的前卫。但是他的攻击被达武的猛烈的炮火击退,他的用生力军和全部骑兵再次攻击的建议被普鲁士国王否定。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两地战败以后,他沿易北河向下游退却,而拿破仑对普军主力穷追不舍,从耶拿一直追到斯德丁。布吕歇尔在退却途中收容了各军的残部,他的军队增加到将近25 000人。他在苏尔特、贝尔纳多特和缪拉特联军追击下进行的向吕贝克的撤退,是德国在这一屈辱时代中有数的一段光辉的插曲。吕贝克是一个中立地区,他把这个不设防的城

市的街巷变成殊死奋战的场所,致使该城遭到法国大兵三天的洗劫,因此遭到激烈的责难。但是,在当时情况下,重要的是给德国人民做出一个至少应该顽强抵抗的榜样。他被逐出吕贝克,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平原被迫投降,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以书面形式说明他投降的原因是“弹尽粮绝”^①。他在以个人名誉作担保后获释,前往汉堡,在那里同儿子们一起打牌、抽烟、饮酒,消磨时光。在和维克多将军相交换以后,被任命为波美拉尼亚总督。但是,普鲁士和拿破仑在1812年2月24日缔结的同盟条约秘密条款之一规定,应当像对夏恩霍斯特和其他杰出的普鲁士爱国者那样,解除布吕歇尔的职务。为了抚慰这一公开的贬谪,国王秘密地以其在西里西亚的漂亮的庄园孔岑多夫赐赠给布吕歇尔。

从签订蒂尔西特和约³¹³到德国独立战争这一转变时期,道德协会³³³的首领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力图临时推举出一位深得人心的英雄,他们选中了布吕歇尔。他们成功地在群众中抬高他的声誉,因而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1813年3月17日发表宣言号召普鲁士人拿起武器时,他们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足以迫使国王任命布吕歇尔为普军总司令。在联军顽强奋战但仍然遭到失利的吕岑会战和包岑会战²⁶³中,布吕歇尔在维特根施坦指挥下作战。联军从包岑向施韦德尼茨退却时,他曾在海瑙附近设伏,率领骑兵痛击梅松指挥的法军前卫,使梅松在这次战斗中损失1500人和11门火炮。布吕歇尔的这次奇袭振奋了普军士气,使拿破仑在追击时不得不小心谨慎。

1813年8月10日特拉亨贝格休战协定³²¹期满后,布吕歇尔开

① 《迈耶尔百科全书》1845年版第4卷第1211页。——编者注

始指挥一个独立的军团。这时，盟国的君主们将部队分编为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配置在易北河下游；主力军团，经波希米亚进军；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尔任总司令，协助他的是参谋长格奈泽瑙和军需长缪弗林。这两个人一直在他手下担任该职直到1815年缔结和约时为止，曾为他制订所有战略计划。布吕歇尔本人，据缪弗林说：

“在战争的战略实施方面一无所知。他实在是什么也不懂，要他批阅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是很小的作战计划，他都弄不明白，判断不了计划的好坏。”^①

和拿破仑的许多元帅一样，他也不识地图。西里西亚军团包括三个军：朗热隆伯爵指挥的俄军4万人；冯·萨肯男爵指挥的16000人；约克将军指挥的普军4万人。布吕歇尔率领这样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军团是很困难的。已经担任独立的指挥官的朗热隆，不愿听命于一个外国的将军，加之得悉布吕歇尔曾接到密令，要他只采取守势，但是完全不了解布吕歇尔8月11日在赖兴巴赫同巴克莱-德-托利会晤时已争取到后者允许他可以见机行事。因此当他觉得这位总司令违背了早先商定的计划时，他就有理由不执行命令，他的这种抗命行为还得到了约克将军的大力支持。

当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危险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发生了卡茨巴赫会战，它使布吕歇尔稳固地控制住了他的军团，并进军直抵巴黎城下。麦克唐纳元帅遵照拿破仑将西里西亚军团逐回西里西亚腹地的命令，于8月26日攻打布吕歇尔配置在尼斯河注入卡茨巴赫河处普

① 缪弗林《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役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第225页。引文开头的“战略”一词是恩格斯加的，见他1857年9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劳斯尼茨与克罗伊奇之间的前哨,开始了这次会战。这次所谓的卡茨巴赫会战,实际上包括四次不同的战斗。第一次战斗是以刺刀冲锋赶跑了尼斯河右岸山后台地上约8个营的法军,其兵力几乎还不到敌军的十分之一,而所造成的结果却完全超出了它原来的意义,这是因为从台地上溃退的法军没有在下克赖因集合,也没有守住克罗伊奇附近的卡茨巴赫河沿岸地段,当时假如这样做,他们的逃跑就不会对法军的其余部分发生任何影响了;其次,是因为配置在尼斯河左岸的萨肯和朗热隆两军在天黑时曾数度挫败敌人;还因为在左岸亲自指挥的麦克唐纳元帅到下午7时已难于抵挡朗热隆的攻击,在日落后就立即将自己的军队带到戈尔德贝格,当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不能继续作战,因而势必落入敌人手中;最后,是因为暴雨季节使溃退的法军所必经的一些平时不大的河流——尼斯河、卡茨巴赫河、代希瑟尔河及博伯尔河变成湍急的洪流,并使道路几乎无法通行。这样,在西里西亚军团左侧山区的地方民兵协助下,本身意义不大的卡茨巴赫会战就以生俘法军18 000—20 000人、缴获火炮200余门和弹药车、救护车和辎重车300余辆及其他各种装备而结束。

在会战后,布吕歇尔竭力鼓动他的部队全力追击敌人,他正确地向他们指出:“现在多辛苦一些,就可毕其功于一役。”^①9月3日,他率领自己的军团强渡尼斯河,4日,通过比绍夫斯韦达向包岑集结。他以这样的运动解救了主力军团,使8月27日在德累斯顿遭到挫败而被迫退往厄尔士山脉的主力军团得以脱离战斗³³⁴,拿破仑则不得不增加援兵前往包岑去追歼在卡茨巴赫被击溃的敌军,并同西里西

^① 缪弗林《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役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第327页。——编者注

亚军团作战。布吕歇尔在停留于易北河右岸萨克森东南部期间，采取一系列时进时退的机动，始终避免与拿破仑交战，但在遇到法军的单个分遣部队时则进入战斗。9月22、23和24日，他在敌人右侧实行一次侧敌行军，以强行军挺进到易北河下游，靠近北方军团。10月2日，他在易北河上埃爾斯特附近架设浮桥，10月3日晨，他的军团以单列纵队渡过了河。这次运动不仅是大胆的，甚至是冒险的，因为他完全不顾自己的交通线的安危。这样做是出于重要的政治原因，并最终导致了莱比锡会战³²²。如果不是布吕歇尔，行动迟缓、过分谨慎的主力军团是决不敢冒险进行这场会战的。

贝尔纳多特任总司令的北方军团，共约9万人，因此当务之急是使这个军团向萨克森进军。布吕歇尔同北方军团内的普军指挥官毕洛夫和俄军指挥官温钦格罗德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获得了最确凿的证据，证明贝尔纳多特同法国人调情，只要他在一个单独的战场独当一面，就无法促使他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毕洛夫和温钦格罗德表示可以不按贝尔纳多特的意图行事，但他们为此需要支援他们10万人。正因为如此，布吕歇尔才冒险侧敌行军，而不顾君主们要求他向左，即向波希米亚方向前进，同他们靠拢的指示。贝尔纳多特甚至在西里西亚军团渡过易北河之后还不断刁难布吕歇尔，但是这些刁难也没有使他放弃他的意图。在离开包岑之前，他曾派遣一名机要官去通知贝尔纳多特：既然北方军团兵力过弱，不能在易北河左岸单独作战，他将率领西里西亚军团前来，并将于10月3日在埃爾斯特附近渡河；因此，请贝尔纳多特与他同时渡过易北河，一起向莱比锡进军。贝尔纳多特对这一信息置之不理，而敌人又占领了埃爾斯特对面的瓦尔滕堡，因此布吕歇尔首先驱逐了敌人，然后，为了能在拿破仑倾全力向他猛攻时进行防御，便开始在瓦尔滕堡到布莱丁一线

构筑营垒。他从这里前进到了穆尔德河。

10月7日在同贝尔纳多特会面时约定,两个军团同向莱比锡进军。9日,当西里西亚军团准备这次进军时,贝尔纳多特根据关于拿破仑从迈森沿大道前进的情报,坚持要退到易北河的后面,只有布吕歇尔决定与他协同渡过萨勒河,在该河后面占领阵地,他才同意留在易北河左岸。尽管由于这一行动西里西亚军团会重新丧失自己的交通线,布吕歇尔还是同意了,因为否则联军就会实际上失掉北方军团。10月10日,整个西里西亚军团同北方军团在穆尔德河左岸会师,河上的桥梁都被破坏。贝尔纳多特这时又提出必须退到贝恩堡,布吕歇尔仅仅为了不让他撤回易北河右岸,又作了让步,条件是贝尔纳多特在韦廷附近渡过萨勒河并在那里占领一块阵地。10月11日,正当西里西亚军团的纵队越过马格德堡至哈雷的大道时,布吕歇尔获悉贝尔纳多特违背了自己再三保证的诺言,并没有在韦廷架桥,于是决定沿这条大道实施强行军。

拿破仑看出,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避开他在杜本集结兵力向它们发出的挑战,又知道他们除非退到易北河对岸就不可能避开这场会战,同时,也了解他只剩下四天的时间就将同主力军团遭遇,这将使他腹背受敌,于是,决定沿易北河右岸向维滕贝格前进,用这种佯动来诱使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渡过易北河,然后给主力军团以迅猛的打击。果然,贝尔纳多特由于担心他与瑞典之间的交通线,命令自己的军团立即利用在阿肯架设的桥撤到易北河右岸,当天,即10月13日,他还通知布吕歇尔说,亚历山大皇帝出于某些重要考虑,已让他(布吕歇尔)听从他的指挥。为此,他要布吕歇尔尽可能不失时机地率领西里西亚军团随他之后开到易北河右岸。假如布吕歇尔这时迟疑一下,跟着北方军团走,那么战役就会失败,因为总

数约 20 万人的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就不会出现在莱比锡会战中了。布吕歇尔复函贝尔纳多特,说明根据他所掌握的一切情报看来,拿破仑丝毫没有把战场转移到易北河右岸的意图,只不过是企图迷惑他们。同时,他恳求贝尔纳多特放弃渡过易北河的打算。另一方面,他一再请求主力军团向莱比锡进军,并提出在该地与他们会师,10月15日他终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邀请。他立即向莱比锡进军,而贝尔纳多特却撤向彼得斯贝格。10月16日,他在从哈雷至莱比锡的进军途中,在默肯的一场激战中击溃了马尔蒙指挥的法军第六军,缴获 54 门火炮。他立刻把这次战斗的结果通知了在莱比锡会战第一天没有露面的贝尔纳多特。会战第二天,即 10 月 17 日,布吕歇尔驱逐了帕尔特河右岸的敌人;敌人手中只剩下哈雷关卡附近的一些房屋和堑壕工事。18 日拂晓,布吕歇尔同贝尔纳多特在布赖滕费尔德会谈,贝尔纳多特提出,除非布吕歇尔当天从西里西亚军团给他抽调 3 万人,否则他就无法攻击帕尔特河左岸的敌人。布吕歇尔完全为了顾全大局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条件是他要亲自率领这 3 万人,以保证他们在进攻时能有力地协同作战。

10 月 19 日获得最后胜利以后,在拿破仑从莱比锡向莱茵河撤退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布吕歇尔认真地追击他。当 10 月 19 日一些将领在莱比锡集市广场上迎接各国君主,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互相道贺的时候,只有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在向吕岑方向追击敌人。在他从吕岑向魏森费尔斯进军途中,普鲁士的威廉亲王追上他,把普鲁士陆军元帅的委任状授予他。盟国的君主们让拿破仑先赢了一步,这一步再也不能扳回了,但是从爱森纳赫开始,布吕歇尔每天下午都能到达拿破仑早晨刚刚离开的地方。正当他打算向科隆进军,再从那里渡过莱茵河时,他被召回并奉命去封锁该河左岸的美因茨

城。他很快地把敌军追击到莱茵河，使莱茵联邦³³⁵瓦解，使它的军队脱离了所属的法军各师。当西里西亚军团的司令部进驻赫希斯特时，主力军团进抵上莱茵。1813年战争就此结束，这次胜利完全有赖于布吕歇尔的过人胆识和刚毅精神。

盟国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意见分歧；一派主张留在莱茵河并采取防御态势，另一派则主张渡过莱茵河向巴黎进军。君主们久久犹豫不决，最后，布吕歇尔和他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向巴黎分进合击：主力军团从瑞士出发，毕洛夫从荷兰出发，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从中莱茵地区出发。为了这次新的战役，增拨三个军归布吕歇尔指挥，即克莱斯特军、黑森选帝侯军和萨克森-科堡公爵军。布吕歇尔留下朗热隆军的一部围困美因茨城，命令新的增援部队跟随自己作为第二梯队，于1814年1月1日在曼海姆、考布和科布伦茨三点渡过莱茵河；在摩泽尔河谷将马尔蒙逐出孚日山脉和萨尔河地区，把约克军配置在摩泽尔河各要塞之间，并率领一支由萨肯军和朗热隆军一个师组成的28 000人的部队，经沃库勒尔和茹安维尔向布列讷挺进，以便自己的左翼同主力军团会师。1月29日，在布列讷附近他遭到拿破仑约4万人的攻击。这时，约克军仍远离西里西亚军团，而为数11万人的主力军团还刚刚到达肖蒙。布吕歇尔因之不得不对付拿破仑的远多于自己的兵力。然而，除了几次骑兵的小规模遭遇战之外，拿破仑既没有以他素有的魄力对布吕歇尔发动攻击，也没有阻拦他退向特拉讷。假如拿破仑占领布列讷，在它附近配置部分军队，并用三个军分别占领迪安维尔、拉罗蒂耶尔和绍梅尼勒，他在1月30日就能够以优势兵力猛攻待援的布吕歇尔。可是，拿破仑却态度消极，而这时主力军团已在奥布河畔巴尔集中，并以部分兵力增援布吕歇尔的左翼。这位皇帝如此消极，是因为他寄希望

于沙蒂永的和谈³³⁶；他努力启动了这次和谈，指望利用和谈来赢得时间。果然，在西里西亚军团与主力军团会师以后，一些主张外交谈判的人坚持认为，在和平协商进行期间，打仗只要装装样子就行了。施瓦尔岑堡公爵曾派遣一名军官去见布吕歇尔，争取他的同意，但是布吕歇尔让他带回了这样的答复：

“我们必须进军巴黎。拿破仑曾拜访欧洲各国首都，我们岂能失礼？简单地讲，他必须退位……不推翻他，我们将永无宁日。”^①

他强调指出，盟军趁拿破仑未能集结他的剩余部队之前在布列讷附近对他实行攻击可以获得很大优势，他并且愿亲自进行这次攻击，只要他能在约克军来到之前获得援军。军队在贫瘠的奥布河谷无法生存，若不出击，就得撤退，——这个理由使他的建议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发起会战，但是，施瓦尔岑堡公爵没有率领手下的联合部队去进攻敌人，只把符腾堡王储军(4万人)、久洛伊军(12 000人)和弗雷德军(12 000人)给了布吕歇尔。而拿破仑这方对主力军团的到来既一无所知，也没有怀疑。2月1日下午1时左右有人向他报告布吕歇尔已发动进攻，他竟不相信。在查明情况属实后，他起身上马，打算避开战斗，并给贝尔蒂埃作了相应的指示。但是，当他在布列讷和拉罗蒂耶尔之间追上听到炮声越来越近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新近卫军³³⁷时，受到狂热的欢迎，于是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高呼“炮兵，前进！”这样，4时左右，在拉罗蒂耶尔展开了激战。但是，在初次失利后拿破仑就再也没有亲自参加战斗。他的步兵冲入了拉罗蒂耶尔村，战斗激烈，难分胜负，布吕歇尔不得不把他的预备队调上来。

① 缪弗林《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役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第419页。——编者注

直到夜晚 11 时，法军才被逐出该村，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撤退，法军共伤亡 4 000—5 000 人，被俘 2 500 人，损失火炮 53 门。如果这时离巴黎仅六日行程的联军全力挺进，拿破仑必然抵挡不住他们处于绝对优势的兵力。然而君主们惟恐妨碍拿破仑在沙蒂永会议上媾和，竟让主力军团总司令施瓦尔岑堡公爵利用种种借口避免采取坚决的行动。

拿破仑命令马尔蒙返回奥布河右岸朝朗吕方向前进，他自己侧敌行军退向特鲁瓦，这时，联军兵分两路，主力军团缓慢地向特鲁瓦前进，西里西亚军团则向马恩河进发。布吕歇尔预计在马恩河同约克军以及朗热隆和克莱斯特两个军的一部分会合，这样，他的兵力总共可以增到 5 万人左右。他的计划是追击这时已到达马恩河下游的麦克唐纳元帅，直捣巴黎，而施瓦尔岑堡应该在塞纳河钳制法军主力。但是，拿破仑看出联军不懂如何利用既得胜利，同时深信自己能不等主力军团向巴黎方向深入就返回塞纳河，便决定猛攻兵力较薄弱的西里西亚军团。因此，拿破仑留下维克多和乌迪诺率领的一支 2 万人的部队去对付 10 万人的主力军团，自己率莫尔蒂埃和奈元帅两个军共 4 万人向马恩河方向进发，在诺让又带上马尔蒙军，2 月 9 日率领这支联合部队进抵塞扎讷。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沿通往巴黎的小道经圣旺和索姆皮伊前进，2 月 9 日将他的司令部设在韦尔蒂小镇上。他的兵力部署如下：约 1 万人在司令部；约克率领的 18 000 人在多尔芒至梯叶里堡之间，追击正在沿埃佩尔奈至巴黎的大驿道退却的麦克唐纳；萨肯率领的 3 万人在蒙米赖至拉费泰苏茹瓦尔之间，防止塞巴斯蒂亚尼的骑兵同麦克唐纳会合，并切断麦克唐纳通往拉费泰苏茹瓦尔渡口的道路；俄国奥尔苏费耶夫将军率 5 000 人把守尚波贝尔。这种错误的部署，使西里西亚军团的梯

次配置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这是由布吕歇尔的两个彼此矛盾的动机造成的。一方面,他力图切断麦克唐纳的道路,不让他同塞巴斯蒂亚尼的骑兵会合;另一方面,他想把克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吸收进来,因为这两个军已从沙隆出发,预计可在9日或10日同他会合。一个动机促使他放慢步伐,另一个动机却促使他急速前进。

2月9日,拿破仑在尚波贝尔向奥尔苏费耶夫发动攻击,并将他击溃。当时克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已到达,但大部骑兵未到,布吕歇尔即率领这两个军向奉拿破仑的命令开来的马尔蒙进攻,并在后者向费尔尚普努瓦斯退却时跟踪追击,但在获悉奥尔苏费耶夫溃败的消息后,于当夜率领他的两个军返回贝热尔,以便在这里掩护通往沙隆的道路。2月10日,萨肯在战胜以后,在特里尔波附近把麦克唐纳逐过马恩河,但当日夜间听说拿破仑进攻尚波贝尔,即于11日仓促向蒙米赖后退。他还没有到达蒙米赖,就不得不在旧迈松展开战斗队形,来对抗这位从蒙米赖方向迎面而来的皇帝。萨肯在同约克会合前被击败,损失惨重。这两位将军在维福尔会合,2月12日退到梯叶里堡,在该地约克被迫进行一场后卫战,遭到重大损失,然后退到于乌希堡。拿破仑命令莫尔蒂埃沿菲姆大道追击约克和萨肯后,13日停留在梯叶里堡。11日和12日,布吕歇尔因不知约克和萨肯的确实位置和战斗结果,便在贝热尔静观在埃托日占领阵地与他对抗的马尔蒙的动向。13日他获悉两位将军失利的消息后,推测拿破仑已去寻找主力军团;他认为马尔蒙是拿破仑的后卫,因而一心想给马尔蒙以致命一击。布吕歇尔进到尚波贝尔,迫使马尔蒙退往蒙米赖;2月14日拿破仑在该地同马尔蒙会合;这时,拿破仑便转而对付布吕歇尔,中午在沃尚同他遭遇;当时布吕歇尔有2万人,但几乎没有骑兵。拿破仑向他发动攻击,以骑兵包围了他的纵队,迫使他

在遭到重创后退回尚波贝尔。在从尚波贝尔退却时,如果不是布吕歇尔有意缓慢地退却的话,西里西亚军团本来可以在天黑前不受到多大的损失就到达埃托日。因此他在整个退却过程中不断受到攻击,他的一支部队,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师,在经过埃托日时再次被沿该城两侧街区运动的敌人包围。近午夜时分,布吕歇尔到达贝热尔营地,休息数小时后即向沙隆进发,2月15日将近正午时到达沙隆。16日和17日,约克和萨肯的部队先后与他会师。在尚波贝尔、蒙米赖、梯叶里堡、沃尚、埃托日等地的各次战斗中,他损失了15 000人和27门火炮。对于造成这些失利的战略上的失误,完全应由格奈泽瑙和缪弗林负责。

拿破仑留下马尔蒙和莫尔蒂埃对付布吕歇尔,带领奈元帅以强行军返回塞纳河,施瓦尔岑堡在这里已击退维克多和乌迪诺;他们已退过耶尔河,并在该地将麦克唐纳率领的12 000人及从西班牙调来的一些增援部队合并进来。16日,拿破仑的突然到来使他们大感意外。17日拿破仑的部队接踵而至。他同元帅们会师后,立即发起了对施瓦尔岑堡的攻击,当时施瓦尔岑堡的兵力配置在以诺让、蒙特罗和桑斯为顶点的一个大三角形阵地上。在其麾下的将领维特根施坦、弗雷德和符腾堡王储一一被拿破仑击败之后,他也转身逃跑,退往特鲁瓦,并通知布吕歇尔,请他前来会合,以便共同在塞纳河与拿破仑交战。布吕歇尔这时已获得新的增援,当即表示同意,2月21日他进抵梅里,22日整天在那里等待关于约定的战斗的部署。晚上他得知已通过利希滕施坦公爵向拿破仑提出休战建议,但被拿破仑断然拒绝。布吕歇尔立即派遣一名秘密信使到特鲁瓦,恳请施瓦尔岑堡出战,甚至表示愿意由他单独出战,只要主力军团作为预备队即可。但是施瓦尔岑堡因得知奥热罗把布伯纳将军逐回瑞士而更加惊

慌,已下令向朗格勒退却。布吕歇尔立刻认识到,向朗格勒退却必将导致向莱茵河对岸退却;为了把拿破仑引开,不让他去追击士气沮丧的主力军团,便决定再次直接向巴黎方向进军,向马恩河挺进,在那里他这时可以指望集结一支10万人的军队,因为温钦格罗德已率领25 000人进抵兰斯附近,毕洛夫率领16 000人开向拉昂,克莱斯特军的余部可望从爱尔福特开来,由圣普里指挥的朗热隆军的余部,可望从美因茨开来。

正是布吕歇尔再度与主力军团分开这一行动扭转了局势,使拿破仑处于不利的境地。假如拿破仑追击退却的主力军团,而不去攻击前进的西里西亚军团,盟军就会遭到失败。2月24日,布吕歇尔趁拿破仑尚未追来,在昂格吕尔架设一座浮桥渡过奥布河,完成了他进军途中惟一的艰巨任务。拿破仑派遣乌迪诺和麦克唐纳率领约25 000人追击主力军团,于26日同奈元帅和维克多一起离开埃尔比斯去追击西里西亚军团。根据布吕歇尔送来的情报,即主力军团面前这时只有两个元帅,施瓦尔岑堡停止了退却,鼓起勇气,转身攻击乌迪诺和麦克唐纳,在27日和28日把他们击败。布吕歇尔打算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尽可能靠近巴黎的某个地方。马尔蒙及其部队仍在塞扎讷,莫尔蒂埃则在梯叶里堡。布吕歇尔逼近时,马尔蒙退却了,26日在拉费泰苏茹瓦尔与莫尔蒂埃会合,然后又一起从该地退往莫市。布吕歇尔接连两日企图渡过乌尔克河,将战线大大向前推进,迫使两个元帅同他会战,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沿着乌尔克河右岸前进。3月2日,他到达乌希堡,[大约]3日晨,获悉毕洛夫和温钦格罗德已迫使苏瓦松城的法军投降,布吕歇尔即于当日渡过埃纳河,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苏瓦松。拿破仑在拉费泰苏茹瓦尔渡过马恩河后,距离布吕歇尔有两昼夜强行军的路程,即向梯叶

里堡和菲姆方向前进,在他的一支分遣部队再度攻占兰斯后渡过韦勒河,并于3月6日在贝里欧巴克渡过埃纳河。布吕歇尔本来打算在拿破仑渡过埃纳河后,在河的对岸同他会战,并为此调集了军队。可是当他得知拿破仑向菲姆和贝里欧巴克进发,企图从左侧攻击西里西亚军团时,就决定布成斜角阵势,一俟拿破仑走出贝里欧巴克峡谷,立刻从克朗攻打他的翼侧,迫使他在背后仅有一条隘路的情况下作战。布吕歇尔在从苏瓦松到克朗的中途以右翼依托埃纳河、左翼依托莱特河部署好兵力后,获悉温钦格罗德竟让拿破仑于6日顺利通过了贝里欧巴克,后者甚至还派遣一支分遣部队沿大道向拉昂挺进,只好便放弃了这一卓越的计划。这时,布吕歇尔认为除拉昂外,在任何地点都不宜进行决战。

拿破仑要是从兰斯出发沿公路经科尔贝尼,就能和从克拉奥讷出发的西里西亚军团同样迅速地到达拉昂,因此,布吕歇尔为了滞阻拿破仑,便将沃龙佐夫军配置在埃纳河与莱特河之间那块坚固的克拉奥讷台地上,同时,派温钦格罗德率骑兵1万人经费蒂约向科尔贝尼方向前进,拿破仑若向沃龙佐夫进攻,就立刻攻击他的右翼和后方。然而,温钦格罗德没有执行规定的任务,因此拿破仑在3月7日将沃龙佐夫逐出台地,不过他自己损失了8000人,沃龙佐夫损失4700人却未溃败,秩序井然地退却了。3月8日,布吕歇尔把军队集中在拉昂,这里的会战势将决定两军的命运。且不说他在人数上占有优势,拉昂前面那片广阔的平原也特别适于西里西亚军团的2万骑兵的展开;拉昂本身位于一座独立的山岗的台地上,四周坡度为12、16、20、30度不等,山麓有四个村庄,对攻守都很有利。那天,拿破仑亲自指挥的左翼法军的进攻被击退,马尔蒙指挥的右翼法军在入夜露营时也遭到突然袭击和严重的失败,这位元帅简直无法控

制自己的部队，一直溃退到菲姆。拿破仑及其仅有 35 000 人的左翼军陷于完全孤立，被困在一块不利的阵地上，势必要向拥有绝对优势兵力、为胜利所鼓舞的敌人投降了。但是，次日清晨，布吕歇尔突患寒热病，双目发炎，不能指挥作战，而拿破仑还在原来的阵地上摆出挑战的姿态，因此，当时一些指挥作战的将领大为恐惧，他们不但停止已经开始的进攻，而且还让拿破仑在夜间安然撤向苏瓦松。

虽然如此，拉昂会战还是损伤了拿破仑的兵力和士气。3月13日他突然攻占已落入圣普里之手的兰斯，试图以此重整旗鼓，但没有成功。这时他的处境已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在17日和18日攻打在奥布河畔阿尔西的主力军团时，施瓦尔岑堡尽管只拥有8万人来对付拿破仑指挥的25 000人，也敢于毅然应战，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20日和21日。当拿破仑撤出战斗时，主力军团尾追至维特里，就在他的后方与西里西亚军团会师。拿破仑在绝望中使出了最后一招——退往圣迪济耶，企图用他的区区兵力切断联军的主要交通线以及朗格勒与肖蒙之间的退路，以此威胁数量庞大的联军。联军以直取巴黎回答了这一行动。3月30日，战斗在巴黎近郊打响，西里西亚军团猛攻蒙马特尔。布吕歇尔自拉昂会战患病以来尚未复原，但还是短时地亲临战场，他骑在马上，戴着保护眼睛的遮阳帽檐。但是巴黎投降以后，他就辞去了司令职务，辞职的借口是患病，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法国人的从不隐讳的仇视，他与盟国的君主们认为需要采取的外交姿态难以调和。因此，3月31日他以私人身份进入巴黎。在整个1814年战争中，他是联军中惟一力主进攻的人物。他以拉罗蒂耶尔会战打破了沙蒂永主和派的计划，继而在梅里表现了果敢精神，从毁灭性的退却中挽救了联军，最后又以拉昂会战决定了巴黎的第一次投降。

第一次巴黎和约³³⁸缔结后，布吕歇尔伴随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访问英国，被当做一位当代英雄受到盛大欢迎。他被欧洲各国授予各种各样的战功勋章。普鲁士国王为他制作了铁十字勋章；英国摄政王^①将自己的肖像赠送给他，牛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1815年，他再次决定了对拿破仑最后一次战役的结局。这时已经73岁的布吕歇尔，在6月16日利尼会战遭受惨败之后，仍能收拾残军，重整旗鼓，紧紧尾随那位胜利者的后面继续进军，因而能于6月18日傍晚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上，这是战争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³³⁹滑铁卢会战后，他把溃逃的法军从滑铁卢一直追击到巴黎，以往只有过一次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即拿破仑同样出色地把普军从耶拿一直追击到斯德丁。这次，他是率领自己的军队进入巴黎的，他甚至还任命了他的军需长缪弗林为巴黎的军事总督。他曾竭力主张枪决拿破仑，炸毁塞纳河上的耶拿桥，把法军劫自欧洲各国首都的珍宝归还原主。他的第一个愿望遭到威灵顿的阻挠，第二个愿望受到盟国君主们的反对，只有最后一个愿望得到实现。他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常常出现在玩“红与黑”的赌桌旁。在卡茨巴赫会战周年纪念的时候，他访问了故乡罗斯托克，该城居民集体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他逝世时，普鲁士全军哀悼八天。

拿破仑称他为老魔鬼，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国军人则叫他“前进元帅”。他原本是一位骑兵将军。在这门专业方面他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这门专业只要求战术技巧，并不需要战略知识。他与民众一样地仇恨拿破仑和法国人，在民众中颇得人心，因为他怀有平民情感，具

① 乔治四世。——编者注

有健全的理智,作风朴实,谈吐粗鲁,但在必要场合也善于慷慨陈词。他是一名模范军人。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在紧急时刻不知疲倦;对普通士兵有强烈的影响;既有非凡的勇敢,又善于敏锐地判断地势,危急中当机立断,防御时沉着顽强,进攻时勇猛坚决;遇到较简单的情况,他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确定正确的行动方式,遇到较复杂的情况则依靠格奈泽瑙,因此,对于1813—1815年半正规半游击战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他是一位完全称职的将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年9月17日—10月30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昨天从印度收到的消息，描绘了一幅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严峻和危险的情景，虽然从本报的另一个栏里可以看出，我们熟悉情况的驻伦敦记者另有他的看法。³⁴⁰关于德里的情况，我们得到截至7月29日为止的详细消息，并且还得到更新的消息，大意谓，由于霍乱肆虐，围攻部队被迫从德里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驻扎下来。固然，伦敦没有一家报纸肯证实这个报道，但我们认为，这个报道至多也不过是发表得稍微早一点而已。如同我们从印度的所有通讯中知道的那样，围攻部队由于被围者在7月14日、18日和23日的出击而遭到重创。在这几次出击中，起义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奋不顾身，并且由于火炮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位英国军官的信中写道：“我们用十八磅炮和八英寸榴弹炮射击，而叛军以二十四磅炮和三十二磅炮还击。”在另一封信里又说：“我们遭到18次突击，人员伤亡达三分之一。”

可望到来的援军只有范考特兰特将军率领的一支锡克²³兵。哈夫洛克将军在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被迫退回坎普尔而暂时放弃解救勒克瑙的念头。同时，“在德里地区又开始了霖雨季节”，这当然使

霍乱的疫情更加险恶。宣布向阿格拉退却以及至少暂时放弃占领大莫卧儿²²首府的企图的消息,如果不是已经被证实,也一定很快就会被证实。

在恒河线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哈夫洛克将军的行动,他在法塔赫布尔、坎普尔和比图尔的功绩,不出所料地受到了我们伦敦同行们的过分赞扬。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哈夫洛克由坎普尔前进 25 英里后,就不得不又退回该地,不仅是为了把病员留在那里,而且也是为了等待援军。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实,因为它表明,解救勒克瑙的企图失败了。这个城市的英国守军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章格·巴哈杜尔由尼泊尔派去解围的一支 3 000 人的廓尔喀³⁴¹部队。如果他们不能解围,那么坎普尔的屠杀就会在勒克瑙重演。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起义者一占领勒克瑙要塞并随之巩固他们在奥德的政权,就会从翼侧威胁英军攻打德里的全部行动,并将决定在贝拿勒斯和整个比哈尔地区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起义者掌握住勒克瑙要塞,坎普尔的重要性就失去了一半,而它同德里以及贝拿勒斯的交通将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加深了渴望从这个地方得到消息的焦急心情。勒克瑙守军在 6 月 16 日估计,他们靠着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状态的口粮,最多可以支持六个星期。到最近一次报告发出的时候为止,六个星期中已经过去五个星期了。现在那里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据说要去但还不一定去的尼泊尔援军身上。

如果我们从坎普尔沿恒河而下,看一看贝拿勒斯和比哈尔地区,那么在这里英国人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8 月 3 日从贝拿勒斯寄给《孟加拉日报》^①的一封信里说:

① 可能是《加尔各答日报》。——编者注

“迪纳普尔的哗变者越过索安河以后，向阿拉前进。欧籍居民自然担心自己的安全，写信请求从迪纳普尔派遣援军。于是，派出两艘汽船载运皇家第五、第十和第三十七团这几支部队前往。深夜，有一艘汽船搁浅，牢牢地陷入泥中。船上人员匆匆登岸，徒步前进，但没有作应有的戒备。突然他们遭到两岸近距离的猛烈火力的袭击，在这个不大的队伍里有 150 人伤亡，其中还有几名军官。据估计，基地所有的欧洲人，约 47 人，全部被杀。”

阿拉城位于孟加拉管区¹⁴⁶内英国人居住的沙哈巴德地区，是从迪纳普尔到加济布尔路上的一个城市，在迪纳普尔以西 25 英里，加济布尔以东 75 英里。贝拿勒斯本身也已受到威胁。这个城市有一个按欧洲式样构筑的堡垒；如果这个城市落到起义者手中，它就会成为第二个德里。在位于贝拿勒斯以南恒河对岸的米尔萨布尔，发现了一起由伊斯兰教徒组织的密谋；同时在距离加尔各答约 18 英里的恒河上的贝汉布尔，第六十三土著步兵团被解除了武装。一句话，一面是不满情绪，一面是惊慌，二者笼罩着整个孟加拉管区，甚至蔓延到加尔各答的大门口。在那里，人们非常担心穆哈莱姆大斋期³⁴²（在这期间，情绪亢奋达到狂热地步的伊斯兰教徒到处持刀游荡，随时寻衅械斗）很可能导致对英国人的全面袭击，并且总督^①已不得不把自己的卫队解除武装。因此，读者立刻会明白，英国人沿恒河一带的这一主要交通线现在有被破坏、被分割和被切断的危险。而这就会影响预定在 11 月到来的援军的运动，孤立英国人在朱木拿河上的作战线。

在孟买管区，也出现了很严重的局面。孟买第二十七土著步兵团在科拉普尔的哗变是事实，而关于他们被英军击败的消息只不过是传闻。孟买土著部队在那格浦尔、奥兰加巴德、海得拉巴，最后在

① 查·约·坎宁。——编者注

戈尔哈布尔相继举行哗变。孟买土著部队现实有 43 048 人,而在该管区内实际上只有两个欧洲团。土著部队不仅用来维持孟买管区内的秩序,而且作为援军派往旁遮普的信德,编成纵队向马乌和印多尔进发,以便收复这两个地方并加以固守,还被用来建立通往阿格拉的交通线和解救该地的守军。负责这次行动的斯图亚特准将的纵队,由孟买第三欧洲团 300 人、孟买第五土著步兵团 250 人、孟买第二十五土著步兵团 1 000 人、孟买第十九土著步兵团 200 人、海得拉巴部队第三骑兵团 800 人组成。在这支拥有 2 250 名土著士兵的部队中,约有 700 名欧洲兵,他们主要是属于皇家第八十六步兵团和皇家第十四轻龙骑兵团的。此外,英国人还在奥兰加巴德编成一支土著兵纵队,以便威慑坎德什和那格浦尔这两个有不满情绪的地区,同时支援在中印度行动的快速突击部队。

我们听说,印度的这一部分地区“已经恢复平静”,但是我们对这种结论不能完全相信。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决定于马乌的占领,而决定于马拉塔¹⁹⁷的两个王公——霍尔卡和辛迪亚采取什么路线。报道斯图亚特到达默豪的同一条消息补充说,虽然霍尔卡仍旧可靠,但他的部队已不服从指挥。关于辛迪亚的政策,则一字未提。他年纪很轻,颇得人心,富有热情,可以把他当作整个马拉塔民族的自然的首脑和核心。他自己有 1 万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他脱离英国人,不仅会使英国人失去中印度,而且会给予革命的联盟以很大的力量,使它更加巩固。德里城下部队的退却以及不满者的威胁和要求,可能最后迫使他站到自己的同胞方面来。但是,对霍尔卡以及对辛迪亚发生主要影响的是德干高原的马拉塔人;在那里,如我们已经报道的^①,

^① 见本卷第 328 页。——编者注

反叛行为终于已明显地抬头。也正是在那里,穆哈莱姆斋期特别危险。因此,有一定的理由期待孟买军会普遍起义。从海得拉巴、那格浦尔、马尔瓦这些信奉伊斯兰教最狂热的地区招募来的有 60 555 人的土著部队的马德拉斯军,也会立即起来效法。因此,如果考虑到八九两月的雨季将使英军的运动瘫痪并使他们的交通阻断,这样的推断看来是合理的:由欧洲派去的援军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将会到得太迟并且只能分批到达,因此是很难应付他们承担的任务的。我们大致可以料想到,在下次战役中,阿富汗的惨剧³⁴³将会重演。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3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会 战³⁴⁴

敌对双方军队的主力之间,或至少是在单独的战区内的独立行动的两军集团之间的交战,叫做会战。在使用火药以前,会战的结局总是通过真正的白刃战来决定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攻击时是以戈矛林立的密集方阵,以及随后用刀剑进行短促的格斗来决定胜负。罗马人在进攻时把军团列成三线,这样就可以用第二线的兵力再次攻击,用第三线的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机动。罗马人的横队进到距敌人10—15码处,即向敌人抛掷投枪即很重的标枪,接着就用刀剑进行格斗。如果第一线受挫,第二线就通过第一线的间隔向敌人进攻;如果这时还不能打败敌人的抵抗,那么第三线,即预备队,就猛攻敌人的中路或一翼。在中世纪,主要战斗的结局是由铁甲骑士队的攻击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炮兵和轻火器的使用使步兵重占优势时才起变化。此后,一支军队在火器的数量和构造上的优势就成为会战中的主要因素,直到18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都给步兵装备了火枪,并且火器质量大致相等时为止。正是在这时候,在平均射击精度的条件下,火器在一定时间内发射的弹数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步兵开始排成三列纵深的宽横队;这些士兵受过最严格的训练,以保证能不断地快速射击,达到每分钟5发的射速;双方的宽横队缓慢地向对

方挺进,不停地互射,并得到发射霰弹的炮兵的支援;最后,其中的一方因遭受损失而动摇,另一方就趁机猛扑,进行刺刀冲锋,通常都是这样解决战斗。如果一方在会战开始前已经占领了阵地,那么另一方通常会与敌军阵地成锐角攻击,以便从翼侧迂回,然后包围其一翼;这样,被围的一翼以及中央的与其相连的部分就被优势兵力所打乱而挤成一团;这时,进攻的一方便用重炮予以轰击。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最爱用的战法,他在洛伊滕会战³⁴⁵中运用得特别成功。此外,进攻的一方有时还用骑兵向已经动摇的敌人步兵攻击,并且在许多场合都获得辉煌的胜利。但是,总的说来,会战的结局仍是以步兵横队的速射来决定的,这种火力非常有效,使当时的会战成为近代流血最多的会战。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会战³⁴⁶中,全军18 000人损失12 000人,在库讷斯多夫会战³⁴⁷中,全军3万人损失17 000人。然而,在拿破仑各次战役中最大的一次血战——博罗季诺会战中²⁶²,俄军的伤亡却稍少于全部兵力的一半。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完全改变了会战的情况。军队分编成若干师,每师约一万人,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它不再仅以横队作战,而且以纵队和散兵队形作战。在采用这些战斗队形时,已没有必要只选择开阔的平地作为战场,开始侧重选择森林、村镇、庄园以及各种起伏地作战。自从这种新的战斗队形被各国军队采用以后,会战与18世纪的会战相比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军队通常排成三线,一次攻击,至多连续不断的两三次攻击,就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然而,现在战斗却可能持续一整天,甚至两三天,而且在这整个期间,攻击、反击和机动反复交替,双方互有胜负。目前,会战通常是由进攻一方的前卫发动的。它派出散兵和他们的支援队,散兵一遇到严重的抵抗(这通常发生在有利于防御的地形上),轻炮兵便在散兵和小队骑兵

的掩护下向前推进,前卫主力则占领阵地。接下去通常是进行炮击,其中要耗费一定数量的弹药来协助侦察,迫使敌人暴露其兵力。这时,各师相继到达,根据已查明的敌情进入阵地。在便于发动攻击的地点向前派出散兵,必要时还派出基干步兵和炮兵予以支援;侧翼进行攻击准备,集中部队攻击敌人主阵地前的一些要点,而敌人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进行一系列的机动,以威胁敌人的防御阵地,或者使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击有遭到反击的危险。军队逐渐接近敌人,攻击点终于确定,于是密集的兵力便从此前占领的隐蔽阵地出动。这时主要是基干步兵和炮兵向预定的攻击点射击;然后,担任攻击的部队开始出动,同时小队骑兵也间或进行攻击。于是开始争夺要点,这些点可能反复易手,双方会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各个要点之间的空隙地这时就成了已展开的步兵横队的战场,有时也成了刺刀冲锋的场所。不过,这很少会形成真正的白刃战,而在村镇、庄园、堑壕工事等处却经常真正使用刺刀。在这种开阔地上,骑兵一有机会也向前猛冲,炮兵则继续进行射击,并前进到新的阵地。当会战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时,交战双方军队的意图、部署,特别是兵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投入会战的兵力也越来越多,很快就显示出,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未动用的预备队来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或者是进攻的一方这时已获得进展,敢于用自己的预备队猛攻防御一方的中路或翼侧;或者是攻击都被击退,不可能得到新的兵力的增援,在这种场合,防御的一方就可出动自己的预备队,以强有力的冲锋不仅击退而且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多数场合,决定性的攻击是针对敌人正面的某一地段进行的,目的在于突破敌人的防线。面对选定的点,集中尽可能多的炮兵;步兵以密集的兵力前进,在冲锋成功后,骑兵就迅速冲入这样形成的突破口,转向左右两侧,从翼侧和后方冲击敌人

的防线,迫使敌人向两翼收缩。但是,要使这种攻击真正成为决定性的,就必须使用大量兵力,并在敌人把他们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再进行,否则将得不偿失,甚至可能造成会战的失败。在大多数场合,当会战出现显然不利的局面时,一个指挥官宁可中断会战,也不愿动用最后的预备队,坐待敌人决定性的突击。在当前的编制和战术条件下,这往往用较小的代价就能办到,因为在激烈的会战以后,敌人通常也元气大伤。预备队和炮兵在后面占领新的阵地;在他们的掩护下,部队逐步撤出战斗,进行退却。能不能有秩序地退却,在这种场合就要看追击的速度而定。对企图撤出战斗的部队,敌人会派出骑兵拦击,因此,为了支援这些部队,骑兵也应做好准备。但是,如果退却一方的骑兵被击溃,而步兵在尚未摆脱敌人以前就被敌人赶上,那就会全面溃败,这时,后卫在天黑以前在新的防御阵地上通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就是在双方兵力和指挥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现代会战的一般情况。如果其中的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问题就简单多了,就会出现各种情况的组合,其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文明军队之间的会战,整个说来,都具有上述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8 日—21 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布 朗³⁴⁸

布朗, 乔治, 爵士——英国将军, 1790年8月生于苏格兰埃尔金附近的林克伍德。1806年1月23日入伍, 先后在第43步兵团任少尉和中尉, 参加对哥本哈根的轰击³⁴⁹。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¹⁷³, 从1808年开战起直至1814年战争结束; 在塔拉维拉会战³⁵⁰中受重伤。作为敢死队的一员参加对巴达霍斯的强攻¹⁷⁵。1811年6月20日被任命为第85团上尉; 1814年9月在罗斯少将率领的远征美国的军队中任中校, 参加布莱登斯堡会战和攻占华盛顿的战斗。³⁵¹1824年2月6日被任命为来复枪旅一个营的营长; 1831年5月6日任上校; 1841年11月23日任少将; 1842年任代理副官长; 1850年4月任副官长; 1851年任中将。在克里木战争期间, 率领英军轻步兵师参加阿利马会战³⁵²和因克尔曼会战²³⁴, 并在第一次攻击凸角堡失利的战斗中担任强攻部队的总指挥³⁵³。他在联军中以严格执行军纪著称, 但由于他本人英勇善战, 也由于他极其公正地让年轻的贵族军官严守战场纪律, 从而受到普通士兵的爱戴。1855年被封为二级巴斯勋爵士, 1856年4月4日被报纸誉为“在战场上有杰出表现的将军”。^①

^① 1856年4月5日《泰晤士报》第22334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10 月 15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阿 亚 库 乔³⁵⁴

阿亚库乔——秘鲁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 131 921 人。在该省省会(也叫阿亚库乔)附近曾发生过一次会战,这次会战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的独立。1824 年 8 月 6 日的胡宁会战³⁵⁵以后,西班牙总督拉·塞尔纳将军企图通过机动来切断苏克雷将军指挥的起义军队的交通线。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他把敌军诱入阿亚库乔平原,在那里西班牙军队在一个高地上占据了防御阵地。他们有 13 个步兵营,配有炮兵和骑兵,共 9 310 人。1824 年 12 月 8 日,双方的前卫进入战斗,次日,苏克雷率领 5 780 人发动进攻。科尔多瓦将军指挥的哥伦比亚第二师进攻西班牙军队的左翼,一下子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在左翼,拉马尔将军指挥的秘鲁师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无法向前推进,直到拉腊将军的预备队到达。这时敌军全线退却,骑兵立即进行追击,打散了西班牙骑兵并彻底击败了步兵。西班牙军队有 6 名将军被打死;伤亡和被俘人数达 2 600 人;总督也被俘虏。南美洲军队的损失如下:1 名将军和 308 名官兵被打死,伤 520 人,其中有 6 名将军。次日,这时指挥西班牙军队的康泰拉克将军签字投降,不仅他和他所有的部队成了战俘,而且在秘鲁的全部西班牙军队和全部据点、火炮、军火库以及还在西班牙人手中的全部秘鲁领土(库斯科、

阿雷基帕、普诺、基尔卡等)都交给了起义军。成为战俘的军队人数,总共近 12 000 人。西班牙的统治就这样最终被推翻;1825 年 8 月 26 日,丘基萨卡会议宣告了玻利维亚共和国的独立。

阿亚库乔派这个名字,在西班牙成了埃斯帕特罗及其军队中的党羽的绰号。聚集在埃斯帕特罗周围的一部分军事智囊同他一起参加了镇压南美洲起义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军事上的同伙,而且是由于他们对冒险事业的共同爱好,他们还彼此保证回到西班牙以后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的保证。人们给他们起阿亚库乔派的绰号,暗示这次会战的失败实质上是由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同党造成的。然而这种说法不对,尽管它流传很广,甚至现在在西班牙通常也都相信这种说法。埃斯帕特罗不仅没有出现在阿亚库乔会战中,而且在会战时他甚至不在美洲,当时他还在去西班牙的路上,因为拉·塞尔纳总督派他给斐迪南七世送去一些文件。1824 年 6 月 5 日,他在基尔卡搭乘英国双桅横帆艇台伯号,于 9 月 28 日到达加的斯,10 月 12 日抵马德里,1824 年 12 月 9 日,也就是在阿亚库乔会战发生的那一天,从波尔多乘船返回美洲。(见唐·何塞·塞贡多·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四卷集,1844[—1845]年马德里版;以及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1848 年马德里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10 月 23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班牙无敌舰队³⁵⁶

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于 1588 年派出远征英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其目的是

“为天主效劳,使许多饱受异教徒即我们神圣天主教的敌人压迫的人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异教徒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教派,使他们受尽折磨”(《西班牙远征英国的真实记述》公元 1588 年版)。

几乎在与舰队出发的同时,根据菲力浦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对这支舰队作了详细说明书,书名是《1588 年我国元首唐·菲力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集结的最幸运的无敌舰队。佩德罗·帕斯·萨拉斯著》。伯利勋爵设法弄到了这本书的副本,因此英国政府预先得悉了远征的一切详情细节。(这本书包括了一直到 1588 年 3 月的资料,目前保存于英国博物馆。)该书指出,舰队拥有 65 艘大型帆船和舰只、25 艘排水量为 300 至 700 吨的大型运输船、19 艘排水量为 70—100 吨的辅助船、13 艘小型三桅快速战舰、4 艘小帆船和 4 艘桅船——总共 130 艘舰艇,总吨位为 57 868 吨。舰艇共配置 2 431 门火炮,其中有 1 497 门青铜炮——大部分是最大型的加农炮(四十八磅炮)、长炮(三十磅和二十磅的长管炮)等;弹药有 123 790 发球形

实心弹和 5 175 英担^①火药,每门火炮配备约 50 发炮弹,装药平均为 4.5 磅。全部舰只配备了 8 052 名水手,装载 19 295 名士兵、180 名神父和修道士。舰上还有上岸后牵引野战炮用的骡子和炮车等。根据上述引证材料,这次远征备有 6 个月的粮食。这支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舰队应开往佛来米海岸,以掩护帕尔马公爵指挥的 3 万步兵和 4 000 骑兵组成的另外一支军队登上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平底船,船员都是来自波罗的海的水手。这样,整个舰队做好了向英国进发的准备。

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舰队,由最初的 30 艘舰只增加到近 180 艘大小不一的舰艇,但整个来说,规模不及西班牙人。然而英国舰艇配备了 17 500 名水手,因此水手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西班牙舰队。英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支军队:一支为 18 500 人,由莱斯特伯爵指挥,任务是直接抵抗敌人;另一支为 45 000 人,担任女王的私人警卫。此外,根据英国博物馆保存的题为《为对付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召集的英国兵力的详细记述》的手稿(手稿部,书目 18,第 21 章)来看,还可从低地国家^②得到 2 000 名步兵的增援。

无敌舰队原定 5 月初离开里斯本,但因舰队司令圣·克鲁斯和副司令去世,出发延期。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继任舰队司令,此人对海军业务完全外行;但是副司令马丁内斯·德·雷卡尔德是有经验的海军将领。1588 年 5 月 29 日,舰队在从里斯本到科鲁尼亚装运补给品的航途中被大风暴打散,虽然所有的舰只,除 4 艘以外,都

① 1 英担等于 112 磅或 50.8 公斤。——编者注

②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编者注

在科鲁尼亚集合了,但它们都严重受损,需要修理。无敌舰队已经完全失去作战能力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舰只暂不出动;但是舰队司令霍华德勋爵违反这一命令,乘船前往科鲁尼亚,查明真实情况,回来后即继续作战争准备。此后不久,得到了在海面上出现西班牙舰队的消息,他即下令起锚,在拉芒什海峡尾随西班牙舰队前进,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骚扰。当时西班牙人向佛兰德海岸前进,舰船相互之间尽可能靠紧。发生了一些小的战斗,英国人因为自己的舰只比较灵活,水手比较多,航海技能比较熟悉,所以经常战胜不灵活的、水手配备不足的西班牙大帆船,尽管这些船上挤满了士兵。此外,西班牙的火炮操作欠佳,往往瞄准得太高。无敌舰队在加来附近抛锚,等待帕尔马公爵的舰队开出佛来米港湾;但是不久得到消息说,帕尔马的舰只因不适于战斗,在无敌舰队穿过拉芒什海峡并赶走进行封锁的英荷分舰队以前不能开出。无敌舰队于是重新起锚,但是在敦刻尔克附近因无风而被迫下锚停泊在英国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霍华德勋爵准备了纵火船,于8月7日夜间又起风的时候,向敌舰放出了8艘纵火船。纵火船使西班牙舰队陷入一片惊慌之中。有些舰只起了锚,另一些砍断了绳缆,听任风势摆布;整个舰队乱成一团,一些舰只自相碰撞而损毁。到第二天早晨,仍然一片混乱,几个舰艇分队分散在辽阔的海面上。当时霍华德勋爵得到了那些由大小贵族担任船员的舰只和由拜伦勋爵指挥的进行封锁的分舰队的支援,并在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巧妙协助下,于拂晓4时对敌人发起攻击。这次战斗,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猎捕(因为英国人在一切攻击点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一直进行到天黑。西班牙人作战勇敢,但是他们笨拙不灵的舰只不适宜在狭窄的水域里航行和进行机动的战斗。西班牙人被彻底击败,损失惨重。

这样,同帕尔马公爵的运输舰船的会合已成泡影,单靠无敌舰队的兵力在英国登陆也绝无可能了。当时舰上储存的粮食已基本告罄,到西属佛兰德这时已不可能,除了回西班牙去补充食物以外别无出路。(见《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海军在爱尔兰海岸附近遭到的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1588年伦敦版。根据艾曼努埃尔·弗雷莫萨的供词。此人当时在雷卡尔德舰队司令的排水量1100吨的旗舰圣胡安号上服役。)穿过拉芒什海峡的通道也遭到英国舰队封锁,所以只得绕道苏格兰回国。被派去追击的西摩尔勋爵的舰队对无敌舰队骚扰不大,因为他们弹药不足,不敢贸然进攻。然而在西班牙人绕过奥克尼群岛以后,海上起了大风暴,打散了整个舰队。有些舰只被风暴刮回到挪威海岸触了礁,另一些在北海沉没,或者在苏格兰海岸附近和赫布里底群岛一带触礁损毁。在这以后不久,西班牙人在爱尔兰西部海岸再次遭到风暴袭击,在那里又损失了30多艘舰艇。那些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的水手也大部分被打死;约有200人被爱尔兰总督^①下令处死。整个舰队剩下不过60艘破烂不堪的舰艇,它们载着饥饿的船员约在9月中旬到达桑坦德,入侵英国的计划最终放弃。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年9月21日—10月23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① 威·菲茨威廉。——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布 里 安

布里安, 路易·安东·福韦勒·德——拿破仑的私人秘书, 1769年7月9日生于桑斯, 1834年2月7日卒于卡昂附近。1778年进入布列纳的军事学校, 在那里作为拿破仑的同学, 度过了大约六年。1789年到1792年, 先后在法国驻维也纳使馆任随员, 在莱比锡研究国际法和北方民族的语言, 在华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王宫里服务。回到巴黎后, 恢复了与拿破仑的亲密关系, 当时拿破仑是个穷军官, 而且没有朋友; 但是1792年6月20日以后的革命运动³⁵⁷形成的决定性转变, 迫使他返回德国。1795年重返巴黎, 与拿破仑再次会面, 后者对他却很冷淡; 但是1796年底布里安再次拜会他, 随后被召入大本营, 旋即被任命为他的私人秘书。第二次意大利战役³⁵⁸以后, 布里安获得国务参赞的头衔, 住在土伊勒里宫, 成为第一执政的家中常客。布里安是承揽军用物资的库隆商行的秘密股东, 曾为这家商行做成一笔供应全部骑兵装具的赚钱的交易, 1802年这家商行因亏空300万而倒闭; 商行负责人潜逃, 布里安遂被放逐到汉堡。1806年, 他奉命监督汉堡严格执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¹⁶。布里安曾向汉堡参议会征收了200万法郎, 向梅克伦堡公爵这位亚历山大皇帝的亲戚罚了款, 因此他们便控告他盗窃公款; 拿破仑派代表去调查他的

行为,命令他归还帝国金库 100 万法郎。

他由此失宠,穷途潦倒,在巴黎一直住到 1814 年拿破仑垮台;这时,他再次露面,法国临时政府²⁷⁶发还他的 100 万法郎,并任命他为邮政总局局长。他的这个职务曾被路易十八免除,但是一听到拿破仑要从厄尔巴岛返回的风声,这位君主又任命他为巴黎警察局局长;他担任这个职位总共八天。拿破仑于 3 月 13 日在里昂签署的命令中,没有把他列为应该大赦的人,所以他跟随路易十八去了比利时,从那里被派往汉堡,回到巴黎以后被封为国务参赞,后又被封为国务大臣。1828 年,经济上的困难迫使他寄居比利时,住在布朗卡公爵夫人在方丹莱韦克的庄园里,离沙勒罗瓦不远。在这里,他在德·维尔马雷先生等人的协助下,写了一部《回忆录》(八开本,十册),该书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曾轰动一时。他死在一家疯人院里。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57 年
9 月 22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堞 墙

堞墙——筑城用语，指胸墙的横向凸起部分，也就是为了不使敌人有可能从高处看见工事内部，或者为了掩护炮座式炮台的炮手和火炮不受侧射火力的伤害而构筑的横墙和胸墙。在炮座式炮台上，火炮要超越胸墙顶部进行射击，所以必须架设在高的旋转平台上，装置在旋转平台上的炮架可前后移动。因此，炮兵操纵火炮时部分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侧射火力或跳弹火力对他们尤其危险，因为敌人射击的目标比有射孔和低炮架的炮台上的目标几乎高出一倍。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在火炮之间构筑横墙或横向胸墙，并且必须修筑得大大高于胸墙，使它们能完全掩护住登上平台的炮手。这一上部建筑从横墙横过整个胸墙。如果火炮的两侧都有堞墙，火炮的射击角度就会被限制在 90 度到 120 度之间。

Bonnet-à-Prêtre 或 Queue d'Hirondelle(燕尾堡)——野战筑城用语，指具有两个凸角并在凸角之间有一个凹角的堑壕工事。凹角经常为 90 度，两个凸角通常为 60 度，这样，两个外正面长于两个内正面，并且向后延伸。这种工事有时用来做小的桥头堡，或在其他情况下，用来防守隘路的入口。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5—28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炮 兵 连³⁵⁹

炮兵连(battery)^①一词在野战炮兵中是指通常用于协同作战的一定数量的火炮(4—12门)以及必要数量的马匹、炮手和装备。在一个炮兵连中,英国人和法国人有6门炮,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有8门炮,俄国人8门或12门炮。野战炮连分为轻炮连、重炮连和榴弹炮连;有些国家还有山炮连。在描述战斗阵地时,炮兵连这个词也用来表示某一安置火炮的点。在攻城炮兵中,炮兵连可以指配置了火炮的要塞的一个横面,也可以专指配置成一个横面向要塞攻击并有胸墙掩护的若干火炮。构筑炮台就是指为火炮修筑这种胸墙和炮位。炮台就其外形而言,有凸起的、半凹进的和凹进的;就其装备而言,有普通火炮炮台、榴弹炮炮台和白炮炮台;就其掩蔽方式而言,有射孔式炮台、炮座式炮台(无射孔)和暗炮台(有防弹工事)。就其用途而言,有为各种不同的炮兵连——破坏炮连、跳弹炮连、白炮连、破城炮连和反炮兵炮连——构筑的炮台。破坏炮连的作用是击毁与它平行的要塞的横面上的火炮;跳弹炮连配置在横面的延长线上,用来

① 原文 battery 一词有多种含义,可以指炮兵连、炮台、炮组等。——编者注

对这个横面进行纵射,它的实心弹和爆炸弹可以越过胸墙,沿横面飞行,而且跳离地面不高;臼炮连用来轰击棱堡内部和要塞内的建筑物;破城炮连用来破坏垒墙陡坡的障壁;反炮兵炮连配置在对着侧面的斜堤顶上,用来压制从掩护缺口前面壕沟的侧面来的火力。岸防炮台是构筑在海岸的一定地点以对付敌人军舰的堑壕工事;它或者是永久性的,通常用石料构筑,往往为暗炮台,其中配置几层火炮;或者是临时性的土质工事,多为炮座式炮台,以保证更广阔地进行扫射;这两者后面一般都是封闭的,这是为了防备登陆步兵的突然袭击。

构筑土质炮台时,应对主要尺寸进行定线,所用的泥土取自未来的胸墙前面或后面的壕沟。胸墙的外斜面不必有障壁,但内斜面和侧面,即射孔的内侧,须用柴束、堡篮、编条、土桶、沙袋或草皮土块加以覆盖,这样,泥土即使在陡峭的斜面上也不致塌落。在胸墙的外斜面和在前面的壕沟之间,通常要留护堤即水平凸起部以巩固胸墙。在炮台内射孔之间应筑踏垛,其高度要使人站在上面可以观察胸墙外面。为了保护炮台不受侧射火力的危害,常常在其一侧或两侧修筑肩墙,与它的胸墙成钝角。在炮台可能受到纵射火力的地方,必须在火炮之间修筑横墙或肩墙。在炮座式炮台上,这种掩蔽工事的加固办法就是使横墙高出胸墙几英尺;这一凸起部分横过胸墙,一直延伸到胸墙的外棱线上,这就是所谓的垛墙。火炮放置在用木板、枕木或其他木材做成的平台上,以保证火炮平稳。弹药一部分放在胸墙脚的崖孔内,另一部分放在地下的、用土覆盖的木质防弹工事里。为了掩护炮手不受来复枪火力的杀伤,常用坚固的木板制成的掩障遮住射孔,火炮伸出时,则将掩障向两边敞开,或者在掩障上开个孔,使炮口穿过。圆木做成的掩障用来防避敌人的火力,它的一端靠在胸

墙内棱线上,另一端斜支在后面的地上。榴弹炮的炮台的射孔底边从下向上倾斜,而不是从上向下倾斜;臼炮炮台根本没有射孔,因为大射角可以保证炮弹飞越胸墙顶部。为了有效地防避重炮火力,胸墙至少应该有 17 或 18 英尺厚;如果敌炮的口径很大,而胸墙的土质又不好,则可能需要 24 英尺厚。高度有七八英尺就足以起防护作用。各炮之间应有 10—14 英尺的间隔;如果需要横墙,胸墙就应相应地延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5—28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露 营

露营(法语 Bivouac, 可能源于德语 bei 和 Wache)——军队不用帐篷露天宿营, 士兵把武器放在身旁和衣而睡。在古代战争中, 军队在帐篷中宿营, 这些帐篷就好似一座可移动的城市。在中世纪, 封建主和王侯的军队以行军途中遇到的城堡和寺院作为宿营地。受宗教狂热驱使而投身对亚洲进行十字军征讨²²³的那群人, 与其说是军队, 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除了为首的骑士和王侯以及他们的贴身侍从, 他们全都在野外露营, 就像游荡在亚洲平原上的野蛮的游牧部落。随着正规战的恢复, 帐篷扎营重新出现, 而且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欧洲成为普遍的现象。但在大规模的拿破仑战争时期, 快速运动被认定比士兵的健康更为重要, 于是帐篷作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从欧洲战场上消失了, 只有英国军队偶尔使用。全军都在篝火旁露营, 如果位于敌人附近, 即不用篝火; 士兵们睡在禾秸上, 有时也可能就睡在光秃秃的地上, 由一部分士兵守卫。历史上没有一次露营像奥斯特利茨会战³¹¹前夕的露营那样为诗画所颂扬。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5—28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掩 障

掩障——筑城用语，指不让敌人看到某处情况的固定物，例如放在炮台内棱线上、突出于射孔上方的柴束；它们使敌人难于在一定距离内通过射孔进行观察。有时射孔处装上较复杂的掩障，它由两块厚木板做成，从两边沿槽沟闭合，可以完全遮住射孔。如果射向始终不变，则在火炮伸出时不必将它敞开，因为在掩障上可以开孔使炮口穿过。必要时，这个孔可用活动挡板遮住。另一种掩障用于掩护炮台的炮手，以防避曲射火力的杀伤。它用光滑坚固的圆木做成，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支在地上。如果炮弹不十分大，而且不是近于垂直地落下，就不会打穿这种掩障，而只能擦过掩障并以一定角度跳开。在修筑堑壕时，用各种特殊的掩障来掩护工兵不受火力杀伤；它借助于滚轮移动，并随着挖壕的进展而向前挪动。如要抵御步枪的火力，只需一块用硬木板做成的护板，向外的一面包上铁皮，再用粗圆木做支柱。如要抵御火炮的火力，则需要有装满泥土的大方箱或方框、沙袋或柴束。最普通的一种工兵掩障是个很大的堡篮，或填满柴束的圆篓，由工人们在工兵前面滚动它们。当需要从上面掩护对壕时，构筑掩障的方法是：将方木梁放在上面，铺上柴束，再撒上泥土，这样，方木梁就能十分可靠地抵御爆炸弹和实心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5—28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博 斯 凯³⁶⁰

博斯凯, 玛丽·约瑟夫——法国元帅, 1810年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1829年入巴黎综合技术学校, 1831年入梅斯军事学校, 1833年任炮兵少尉, 1834年以少尉衔随同第十炮兵团前往阿尔及利亚。有一次, 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那里处境非常危急, 指挥官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退出战斗, 这时年轻的博斯凯出面献策, 结果使敌人遭到了惨败。1836年, 被任命为中尉, 1839年为上尉, 1842年为少校, 1845年为中校, 1848年为上校, 不久之后, 在共和国政府时期为准将。在1851年卡比利亚战役^①中, 他率领他的旅攻击莫纳加尔隘路时负伤。他迟迟未被提升为师长, 原因是他对路易-拿破仑态度矜持冷淡, 但是, 当军队被派往土耳其作战的时候, 他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

在阿利马会战³⁵²中, 他指挥法军右翼从侧面攻击俄军的左翼, 行动迅速有力, 连俄国人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他甚至成功地带领他的炮兵通过没有道路、显然无法通行的峡谷到达了台地。但是应该指出, 在这次战斗中, 他的部队的人数远远超过敌军。在巴拉克拉

^① 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

瓦,他及时赶去解救英军右翼,使英国轻骑兵的残存部队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使俄军不得不停止追击。³⁶¹在因克尔曼会战²³⁴时,他早在清晨就准备好派3个营和2个炮兵连去支援英军。这个建议被拒绝,他就把法军3个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英军右翼的后面。上午11时,他将其中的两个旅调往火线,从而迫使俄军退却。如果没有他的支援,英军可能会彻底失败,因为英军全部投入了战斗,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而俄军却还有16个营尚未动用。作为负责掩护黑河河岸斜坡的联军的部队指挥官,波斯凯始终表现出过人的敏捷、机警和主动。他参加了对马拉霍夫的强攻³⁶²,在这次战事以后被提升为元帅,1856年任参议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1857年9月29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贝西埃尔³⁶³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法兰西帝国元帅;1768年8月6日生于洛特省普赖萨克,1813年5月1日在吕岑会战²⁶³中阵亡。1791年加入路易十六的立宪自卫军³⁶⁴,在驻比利牛斯山的猎骑兵团当一名军士,不久后成为猎骑兵上尉。1796年9月4日,罗韦雷多会战胜利后,波拿巴在战场上提升他为上校。在1796—1797年意大利战役期间,任总司令的基准兵³⁶⁵队长;后在埃及任基准兵上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种部队相联系。1802年他升为师长,1804年获得帝国元帅的称号。他参加过罗韦雷多会战³⁶⁶、里沃利会战³⁶⁷、圣让达克会战²⁷⁰、阿布吉尔会战²⁷⁰、马伦戈会战²⁷²(在这次会战中他曾指挥骑兵的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击)、奥斯特利茨会战³¹¹、耶拿会战³¹²、埃劳会战²⁵⁷和弗里德兰会战³⁶⁸。1808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萨拉曼卡省的一个有18 000人的师的师长;当他到任时,库埃斯塔将军已经占领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之间的一块阵地,从而威胁着马德里和法国之间的交通线。贝西埃尔攻打他,取得了里奥塞科城之战的胜利。在英军对瓦尔赫伦岛的远征³¹⁴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贝西埃尔为驻比利时的法军指挥官,以接替贝尔纳多特。同年(1809年),贝西埃尔获得伊斯特利亚公爵的封号。在埃斯灵会

战¹⁶³中,指挥一个骑兵师,打败了奥地利的霍亨索伦将军。在远征俄国时期,任骑兵警卫部队司令,当1813年德国战役开始时,担任法军骑兵司令。在吕岑会战前夕,在进攻萨克森的里帕赫隘路时阵亡。出于审慎的考虑,他阵亡的消息在一段时期内未向全军宣布,由此可见他在普通士兵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7年
9月29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 姆³⁶⁹

贝姆, 约瑟夫——波兰将军, 1795 年生于加利西亚的塔尔努夫, 1850 年 12 月 10 日去世。他一生极端仇恨俄国。在拿破仑的胜利和宣言唤起复兴波兰的信心的时代, 贝姆进入华沙的学生军训队, 后在佩尔蒂埃将军领导的炮兵学校受军事教育。在炮兵学校毕业后, 被任命为骑炮兵中尉; 在 1812 年战争中, 在达武和麦克唐纳部下任骑炮兵中尉; 因参加但泽保卫战³⁷⁰而获得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该要塞失陷后回到波兰。沙皇亚历山大以热爱波兰民族为幌子, 改编了波兰军队, 贝姆于 1815 年加入波兰军队当一名炮兵军官; 但是不久因同一名他的上级军官决斗而被免职。不过后来又被任命为华沙炮兵学校军事学教员, 并被提升为上尉。他使康格里夫火箭在波兰军队中得到使用, 并把这方面的经验写成一本书^①, 这本书最初用法文出版, 后来译成德文。他容易激怒, 不愿顺从, 从 1820 年到 1825 年曾几次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并被判入狱, 被释放后, 再次入狱, 最后被押送到波兰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科茨克, 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下虚度岁

① 约·贝姆《1819 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 年魏玛版。——编者注

月。亚历山大死后，彼得堡的起义³⁷¹使康斯坦丁对他无暇顾及，这时他才得以脱离波兰军队。离开俄属波兰后，他到了伦贝格，在一家大酿酒厂当监工，并且写了一本关于酒精蒸馏法的书。

1830年华沙爆发起义³²⁴时，他参加了起义，几个月后被提升为炮兵少校；1831年5月他参加奥斯特罗文卡会战³⁷²，在同占优势的俄国炮队作战时表现了非凡的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波兰军队对俄军的攻击最后被击退，俄军渡过纳列夫河，这时，他把他的全部火炮勇敢地向前推进，掩护波军撤退。在这以后，他升为上校，不久又升为将军，被任命为波兰炮兵司令。当俄军强攻华沙时，他英勇作战，但作为一个指挥官，却犯了错误，没有发挥他的40门火炮的作用，使俄军占领了主要防御地点沃利亚。华沙沦陷后，他带领余部退往普鲁士，要求士兵不向普军缴械，结果引起当时称为菲绍之战的一次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后来，他离开军队，在德国组织波兰流亡者救援会，以后他到了巴黎。

他那异乎寻常的性格——孜孜不倦地喜爱精密科学同强烈的实干精神结合在一起——使他甘冒风险，而一旦受挫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例如1833年他独自负责为唐·佩德罗招募波兰军团³⁷³，但没有成功，因而被指责为背叛，当他去布尔日招募波兰人加入他的军团时，遭到一个对他失望的同胞的枪击。1834年到1848年期间，他旅行跋涉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各地。

1848年，奥属波兰刚一出现革命的迹象，他就赶到伦贝格，10月14日又在那里去维也纳。在维也纳为加强防御工事和组织革命力量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努力的结果。10月25日，他领导的维也纳机动自卫军³⁷⁴的一次出击以溃逃告终，对此他不得不提出严厉的谴责，而结果他被吵吵嚷嚷地指责为叛变。尽管这种指责是荒谬

的,但是影响十分严重,若不是担心引起波兰军团暴动,他就可能被拖上军事法庭。在10月28日他出色地保卫了猎人街的大街垒之后,在维也纳市政当局和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开始谈判以后,他就悄然消失了。对他的怀疑因他的神秘失踪而更加强,这种怀疑从维也纳又跟随着他到了佩斯,在那里,由于他向匈牙利政府提出不准组织特别的波兰军团的审慎的建议,一个名叫科洛迭茨基的波兰人把他当做叛徒,向他开枪,使他负了重伤。

匈牙利政府委派贝姆指挥特兰西瓦尼亚战争³⁷⁵,但要他自己想办法招兵买马。这次战争是他军事生涯的一个最重要时期,使他显示了他的独特的指挥艺术。1848年12月底,贝姆开始进行第一个战役,他统率一支约有8000人组成、装备很差并由各色各样的人(未经训练的马扎尔新兵、护国军³⁷⁶、维也纳的流亡者和一小部分波兰人)匆忙拼凑起来的队伍,这支成分混杂的军队在经过特兰西瓦尼亚的行军时,又不断补充了一些塞克列人³⁷⁷、萨克森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大约经过两个月时间,贝姆结束了这次战役,战胜了普赫纳率领的2万名奥军、恩格尔哈特率领的6000名俄国辅助部队以及乌尔班率领的强盗队伍。他迫使乌尔班逃到布科维纳,迫使普赫纳和恩格尔哈特退到瓦拉几亚,占领了除一座小要塞卡尔斯堡以外的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勇敢的突然袭击,大胆的机动,强行军,以及善于通过以身作则、通过巧妙地选择隐蔽地段、通过在紧要关头一贯提供炮兵支援而赢得他的部队对他由衷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在第一个战役所进行的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统帅。同时他还表现出是一个善于迅速组织和训练军队的能手;可是,他满足于初步的一般的组织,忽视建立由精锐部队构成的核心(这是绝对必需的),所以,他的临时组成的军队一遭到严重的挫败,

就必定像梦幻那样消失。

当他控制特兰西瓦尼亚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的特使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残酷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敌对民族之间和解的政策使他的军队人数在几个月内增加到4万—5万人，而且有了足够的骑兵和炮兵。如果说，尽管贝姆率领这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远征巴纳特³⁷⁸有过几次出色的机动，但并没有取得巩固的战果，那么应该考虑到：他由于必须同无能的匈牙利将军^①协同作战而被束缚了手脚。

俄国大军侵入特兰西瓦尼亚和随之而来的马扎尔人的失败，迫使贝姆回到他进行第一个战役的战场。他想通过攻入摩尔多瓦来骚扰敌人后方的尝试未能成功，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7月31日在谢斯堡附近被吕德尔斯指挥的人数比他多两倍的俄军完全击败，他没有被俘只是因为他陷入一块沼泽地，几个溃散的马扎尔骠骑兵偶然发现了，把他救了出来。他重整残部，于8月5日再次对赫曼施塔特发动强攻，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增援，不久只好放弃；在8月7日的战斗失败以后，他重返匈牙利，恰好赶上亲眼看到泰梅什堡决战³⁷⁹的失败。他率领马扎尔残部在卢戈日进行最后抵抗失败后，他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继续同占压倒优势的敌军作战，直到8月19日才被迫到土耳其避难。

为了给自己开拓新的反俄活动领域，贝姆入了伊斯兰教，被苏丹^②封为阿穆拉德帕沙，担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反对，他被降级派往阿勒颇。1850年11月他在那里有效地平

① 卡·韦切伊。——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编者注

息了伊斯兰教民反对当地基督教居民的流血事件³⁸⁰；大约一个月后，他因拒绝就医而死于严重的热病。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³⁸¹

昨天,大西洋号从印度带来的消息有两点很重要,即哈夫洛克将军去解救勒克瑙未获成功和英军仍然滞留在德里。和后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历史上只有过一次,就是对瓦尔赫伦岛的远征³¹⁴。到1809年8月中旬,远征败局已定,但直到11月,英军还迟迟不肯登船撤退。拿破仑得悉一支英军在这个地点登陆,决定不去攻打,而让他们死于疾病,因为疾病必定会比火炮使他们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无须法国花费分文。目前的大莫卧儿^①甚至比拿破仑更幸运,他发现自己既能够利用出击来加强疾病,又能够利用疾病来加强出击。

一份9月27日发自卡利亚里的英国政府公报告诉我们:

“有关德里的最后消息是到8月12日为止,这时该城仍在叛军手中;但不久可望攻城,因为尼科尔森将军率领的大量增援部队距城仅有一日路程。”^②

如果威尔逊和尼科尔森以其现有的兵力还是攻不下德里,那么它的城墙将会一直屹立到它自行坍塌时为止。尼科尔森的大军总共

①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编者注

② 《驻马耳他海军少将致伦敦海军大臣。9月25日下午6点》,载于1857年9月29日《泰晤士报》第22798号。——编者注

约有 4 000 个锡克人，这支援军用以攻击德里未免少得可怜，但是却足以以为不从城下撤兵提供一个新的无异于自杀的借口。

在休伊特将军犯了错误，从军事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犯了罪，让密拉特的起义者到达德里之后，在白白地浪费了最初的两个星期，让起义者以出人意料的突袭夺取该城之后，再来策划围攻德里，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大错。一位权威，一位我们冒昧地认为比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预言家更高明的权威——拿破仑，曾规定两条看来可以算是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策划围攻德里，就违背了这两条基本原则。英军当局本该知道，印度政府不久以前曾整修过德里的防御工事，因此要夺取该城，只有采用正规围攻，需要一支至少有 15 000 人至 2 万人的围攻部队，如果防御达到通常应有的水平，所需兵力还要多得多。既然这个行动需要 15 000 人到 2 万人，那么凭 6 000 人或 7 000 人就着手干起来，简直是愚蠢的。此外，英国人也知道，由于他们兵力薄弱，围攻必然会旷日持久，他们的军队就会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和这样的季节，受到一支无法战胜的无形的敌人的袭击，这个敌人将向他们的队伍撒播死亡的种子。因此，围攻德里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要达到这个目的，德里根本没有战略意义。固然，由于历史的传统，德里在土著人的心目中是一处与其实际意义并不一致的吉祥之地，哗变的西帕依单凭这一点就选择它作为他们总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按照土著人的偏见来制订自己的军事计划，而是置德里于不顾，把它孤立起来，就能使它不再具有那种想像的重要性；如今，英军却扎营城下，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城墙，把主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

集中到这里,这样,自己就把撤退的路也给断了,更确切地说,会使撤退标志着溃败。这样,他们简直是给哗变者帮了忙,因为哗变者正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英国人本来一眼就能看出: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机动的野战部队来扑灭各地不满情绪的火花,使自己的军事据点之间的联系畅通无阻,把敌人压缩到少数几个据点中,把德里孤立起来。但是,他们并未按照这样一种简单而且不证自明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下,胶着不动,把大片自由活动的地带留给哗变者,而自己各地的守备部队却固守着一些分散的、互相隔离的、彼此相距很远的据点,受到可以从容行动的、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的封锁。

英国人让自己主要的机动部队固定在德里城下,并没有堵住起义者,反而使自己各地的守备部队不能动弹。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个主要错误,这些守备部队部署军事行动的愚蠢,在军事史上也是很难找到先例的。它们各自独立行动,互不照顾,没有总的指挥,不像是属于同一支军队,倒像是一些属于不同国家、甚至是敌对国家的部队。以坎普尔和勒克瑙为例。这两个相邻的地方有两支单独的部队驻守,它们数量都很少,不足以应付局势,而且各有自己独立的指挥;它们相距仅 40 英里,但是行动上极少配合,就好像处于南北两极。按照最普通的战略原则的要求,休·惠勒爵士这位坎普尔驻军指挥官本应该有权把奥德首席专员亨·劳伦斯爵士及其部队调回坎普尔来加强自己的阵地,暂时撤出勒克瑙。这样做,两支守备部队都能得救,哈夫洛克的部队再与他们会合,就能够建立一支人数不多却能控制奥德和解救阿格拉的军队。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由于两地各行其是,坎普尔的守备部队已遭歼灭,勒克瑙的守备部队也必将连同要塞一起落入起义者之手。尽管哈夫洛克做出惊人的努力,率领

他的部队八天行军 126 英里,经受了相当于行军日数那样多次的战斗,而且这都是在印度夏季盛暑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做了这样英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哈夫洛克在徒劳无功地试图援救勒克瑙,使自己精疲力竭的部队更加疲惫之后,在被迫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一再从坎普尔出击,从而不断遭受无谓的折损之后,很可能最后不得不带着所剩无几的士兵退往安拉阿巴德。他的这支部队的行动再好不过地说明,如果把德里城下的这一小股英国部队集中起来用于野战,而不是活活地关在疫病流行的兵营里,它该会有什么作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国在印度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守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现在,甚至人数不多的、由加尔各答溯恒河而上的增援部队,也完全为许多孤立的守备部队所吸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到达安拉阿巴德。

至于勒克瑙,此前一些邮件所引起的那种最黯淡的预测^①,现在已被证实了。哈夫洛克又被迫退回坎普尔;靠盟国尼泊尔的军队解救勒克瑙,已不可能;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该城因饥饿而被攻陷、它的英勇守军及其妻子和子女被杀戮的消息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4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384—385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爆炸弹³⁸²

爆炸弹——由重炮和白炮发射的空心铁质炮弹，内装火药，以大射角发射，具有降落力和爆炸力。爆炸弹是所有使用的射弹中最大的一种，因为白炮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短，能做得具有相当大的直径和炮膛。目前通常使用的爆炸弹是 10、11 和 13 英寸的；1832 年，法军在安特卫普围攻战¹⁸³中使用了比利时铸造的白炮和直径为 24 英寸的炮弹。爆炸弹内的火药由引信引起爆炸，引信是装填了缓燃药的空心圆管，在白炮发射时着火。这种信管预先定好时间，使爆炸弹在到达目标时尽快爆炸，有时使爆炸弹即将着地时就爆炸。除了火药，炮弹中有时放入一些瓦朗谢纳剂³⁸³，以点燃易燃物，但是有人认为，瓦朗谢纳剂没有用处，因为它在炮弹爆炸时成了很多微粒，并认为，没有这种药剂，炮弹的燃烧作用也一样大。发射爆炸弹的射角为 15 度到 45 度，而一般为 30 度到 45 度；用减装药的较大的炮弹在射角为 45 度左右时有最远的相应射程，而用增装药的较小的炮弹在射角为 30 度左右时也有最远的射程。在一切情况下装药量都是比较少的：白炮在发射 200 磅重的 13 英寸的爆炸弹时，如果射角为 45 度，火药装药为 $3\frac{1}{2}$ 磅，其射程可达 1 000 码，而如果装药为 20 磅，

即相当于爆炸弹重量的 $\frac{1}{10}$,其射程为4 200码。这种从很高的高度落下的爆炸弹,如果落在易于破坏的目标上,其破坏力是很大的。它能穿透一座楼房的各层和坚固的拱楼板;13英寸的炮弹虽然只装大约7磅火药,但其爆炸效果可相当于一枚地雷,如不遇障碍,其碎片可飞出800和1 000码。但是,它如果落到松软的土地上,可以入土8到12英尺深,或者熄灭,或者爆炸,但已不能为害。因此,爆炸弹也常常被用做小地雷或定向地雷,在敌人必经之地把它埋入大约一英尺深的土里,用缓燃火绳或导火索引爆。爆炸弹在历史上最先实际使用于中国:中国人,据他们的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一种装填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金属球,用一根缓燃火绳来引爆。它们用于防守隘路,在敌人逼近时埋在那里。1232年在开封府被围攻期间,中国人在遭到猛攻时常常从胸墙上把爆炸弹向进行强攻的蒙古人滚下去。古吉拉特的沙赫马茂德,在1484年的詹巴尼尔围攻战中曾向城内发射爆炸弹。在欧洲,且不说更早的不甚可信的例子,西班牙境内的阿拉伯人和步其后尘的西班牙人,从14世纪初起就用火炮发射炮弹和燃烧弹了,但是空心弹由于价格昂贵和不易制造而长期没有得到广泛采用。只是从17世纪中叶起,它才成为攻城炮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
29日—10月6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双桅炮艇

双桅炮艇——现在通常是指较老式的白炮艇(*galiotes à bombes*)。这种炮艇建造得十分牢固,能够经受白炮后坐所产生的震动,艇身长 60—70 英尺,载重 100—150 吨,吃水 8—9 英尺,一般有两个桅杆。艇上通常装有两门白炮和若干门火炮。当然,这种舰艇的航海性能是很差的。它们由一艘辅助船(通常是双桅横帆艇)随伴;在战斗开始前,炮手和大部分弹药都在辅助船上。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防 弹 工 事

防弹工事——用以抵御落下的炮弹冲击的坚固的顶盖结构。在当前已使用直径很大的炮弹的情况下，要使大多数设置防弹工事的建筑绝对不受曲射火力的危害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也是不需要的。带有拱心石的厚度为 3.5 英尺的圆拱顶，能够抵挡大多数炮弹，甚至一枚 13 英寸的炮弹也不能穿透它，但是第二枚则多半可以穿透。因此，只有火药库、实验室等需要有绝对防弹的工事，在这些地方一枚炮弹即可引起大爆炸。用 3 或 4 英尺厚的泥土覆盖的坚固拱顶最为安全。一般暗堡的拱顶无须这样坚固，因为炮弹两次落在同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临时性防弹工事是用一根根并排放在一起的坚固木梁做顶盖，放上柴束，铺上畜粪，最后再撒上泥土。由于采用暗炮台和暗堡，以及暗堡式防御营房，它们通常都是在离垒墙不远的地方沿着垒墙的内斜面构筑的，这样，要塞中防弹工事的数量大为增加；目前，对要塞的正规攻击往往同昼夜不停地猛烈炮击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守军如果没有可靠的掩体供轮换下来的部队休息以恢复体力，就无法坚守阵地。因此，在构筑现代化要塞时，势必会越来越多地修建这类工事。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炮艇

炮艇,或曰炮艇——一种较现代化的、用臼炮装备的舰艇。对俄战争³⁸以前,英国舰队中的这种舰艇吃水 8—9 英尺,艇上除 2 门 10 英寸臼炮外,还装置 4 门六十八磅炮和 6 门十八磅卡伦炮。在对俄战争时,海战必须在浅水和弯曲的水道中进行,为了对付不怕军舰正面进攻的那些强大的俄军岸防要塞,需要使用臼炮艇,于是就发明了一种新式炮艇。这种新式炮艇长约 60 英尺,船梁宽大,船首呈圆形,像荷兰的浅水单桅船,船底平坦,吃水 6—7 英尺,以蒸汽推动。它装备 2 门 10 英寸或 13 英寸口径的臼炮和几门野战炮或卡伦炮,以便用霰弹击退前来强行登船的敌人;艇上没有重炮。它曾被用来从 4 000 码的距离上轰击斯韦阿堡要塞³⁸⁴,取得了很大效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炮 手

炮手——最初是指在臼炮队中操纵臼炮的士兵,但是目前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是指稍低于中士的炮兵军士。炮手的主要职责通常是进行火炮的瞄准。奥地利曾经建立炮手团,作为训练炮兵军士的学校,这个机构对于火炮的有效而科学的操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奥军的这一兵种因此而闻名。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
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轰 击

轰击——向城镇或要塞发射炮弹以引起燃烧的行动。轰击分为无序的和有序两种。无序轰击是军舰、野战炮连或较少量的攻城炮队向某一地点发射炮弹，以恫吓居民和守军，使之早日投降，也可以是为了其他目的。有序轰击是攻击筑垒据点的方法之一。1815年，在滑铁卢会战¹⁵⁹以后，普军围攻法国北部的一些要塞时首次以有序轰击进行攻击。当时，法军和波拿巴的拥护者士气非常低落，其余的居民渴望和平，普军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应抛弃按部就班的旧的攻击形式，而代之以短时间的猛烈轰击，这样就可以引起燃烧和军火库爆炸，使该地全体居民夜不成眠，从而通过居民对指挥官的道义上的压力，或通过大规模的实际破坏和守军极度疲劳，促使要塞早日投降。虽然用直射对防御工事进行的有序攻击还在继续被采用，但是与用重榴弹炮进行曲射相比已居于次要地位。在某些情况下无序轰击就够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必须采取有序轰击；不过，两者都能达到各自的目标。目前围攻理论中的一个原则是：用曲射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员和物资，并威胁要塞内部，和用直射和跳弹射击毁坏外部防御工事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对有大量非军事居民的中等要塞进行轰击，效果最为明显，因为轰击造成的道义上的影响是迫使指挥

官投降的手段之一。对大要塞进行轰击需要大量的弹药。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³⁸⁵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消耗炮弹之多是前所未闻的。正是这次战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序轰击的最重要的例子:英法臼炮艇攻击斯韦阿堡要塞³⁸⁴时,曾发射了5 000多枚爆炸弹和同样多的实心弹。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
29日—10月6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³⁸¹

昨天,我们收到了本月7日为止的伦敦报刊材料。^①在讨论印度起义的形势时,这些报刊充满了它们从最初就怀有的那种乐观情绪。它们不仅告诉我们,对德里的必将取胜的攻击就要开始,而且告诉我们攻击要在8月20日开始。当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围攻部队的现有兵力。一位炮兵军官在8月13日从德里城下的兵营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截至本月10日为止英军的实有兵力^②:

	英国军 官人数	英国士 兵人数	土著军 官人数	土著士 兵人数	马 匹
参谋部	30	—	—	—	—
炮 兵	39	598	—	—	—
工 兵	26	39	—	—	—
骑 兵	18	570	—	—	520
第 一 旅					
皇家第七十五团	16	502	—	—	—

① 这句话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加的。——编者注

② 《1857年8月13日来自孟加拉的一位炮兵军官的信》,载于1857年10月5日《泰晤士报》第22803号。——编者注

	英国军 官人数	英国士 兵人数	土著军 官人数	土著士 兵人数	马 匹
东印度公司第一燧发枪团	17	487	—	—	—
库马昂营	4	—	13	435	—
第二旅					
皇家第六十来复枪团	15	251	—	—	—
东印度公司第二燧发枪团	20	493	—	—	—
西摩尔营	4	—	9	319	—
第三旅					
皇家第八团	15	153	—	—	—
皇家第六十一团	12	249	—	—	—
锡克兵第四团	4	—	4	365	—
基准兵	4	—	4	196	—
库克兵	5	—	16	709	—
共 计	229	3 342	46	2 024	520

因此,英军在德里城下兵营内实有的全部兵力截至8月10日共为5 641人。我们还得从这个数目中减去120人(112名士兵和8名军官),因为根据英国的报道,他们在8月12日攻打起义者在城外英军左前方新设的炮台时已阵亡。因此,到尼科尔森准将率部与围攻部队会合前,战斗人员只有5 521^①人。尼科尔森是从菲罗兹普尔率领下列部队护送一个二级攻城炮兵纵列前来的:轻步兵第五十二团(约900人)、第六十一团一部(约4个连,360人)、鲍彻野战炮连、旁遮普第六团一部(约540人)以及木尔坦的一些骑兵和步兵,兵力共约2 000人,其中有1 200多名欧洲兵。这样,在尼科尔森部队到来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是5 529人。——编者注

时驻在营地的战斗人员 5 521 人再加上这些兵力,总数为 7 521 人。据称,旁遮普省省督约翰·劳伦斯爵士又派来了援军,包括步兵第八团的余部,第二十四团的 3 个连,并携有来自白沙瓦的佩顿上尉部队的 3 门骑炮兵火炮、旁遮普步兵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及旁遮普第六团的另一部。但是这支部队,估计人数最多有 3 000 人,而且大部分是锡克人,现在还没有到达。如果读者还记得大约一个月以前曾有张伯伦指挥下的旁遮普援军到来^①,你们就会明白,正像那支援军当时只足以把里德将军的部队补足到它在亨·巴纳德爵士指挥时的原数一样,新的援军也只能使威尔逊准将的部队补足到它在里德将军指挥时的原数。对于英军惟一现实的援助就是攻城炮兵纵列终于到来。但是,即使所期待的 3 000 人到达兵营,使英军总数达到 1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的忠诚还很值得怀疑),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据说,他们要包围德里。姑且不论企图用 1 万人包围这个设防坚固、周围长达 7 英里以上的城市是多么可笑,英军首先要使朱木拿河改道,然后才能考虑包围德里。不然英军早上进入德里,起义者可能在晚间就离开了,他们或者渡过朱木拿河向罗希尔肯德和奥德进发,或者顺朱木拿河而下,朝穆德拉和阿格拉方向前进。总之,如果要包围一个四边形地区,有一边围攻部队不能接近,却给被围者准备了一条交通线和退路,那么如何实行这种包围,目前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给我们提供上面那张表格的那位军官说:“大家都认为,用强攻夺取德里是不可能的。”

同时他还说,兵营里的人就指望

^① 见本卷第 323 页。——编者注

“对城市炮击几天，打出一个大缺口”。

这个军官又补充说：

“根据适中的估计，敌人现在已经集结了将近4万人，并拥有大量使用得很好的火炮；他们的步兵也很善战。”

如果考虑到据守城池的伊斯兰教徒通常都会表现出的拼死顽抗的精神，那么，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通过“一个大缺口”闯入城内，是否能再从这个缺口闯出来，就大成问题了。

事实上，英军要以现有兵力攻下德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起义者发生内讧，弹药耗尽，士气沮丧，丧失自信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从7月31日到8月12日他们一直不断地战斗，看来很难证实上述这种假定。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一封来信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些英国将军为什么不顾一切作战规则而决心留在德里城下。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几星期前，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是否应当从德里城下撤走，因为他们每日战斗，疲惫不堪，再也不能忍受过度的疲劳。但是这种想法遭到约翰·劳伦斯爵士的坚决反对，他明白地告诉那些将军，他们的退却将会引起周围居民的暴动，他们也将立即危在旦夕。这个意见占了上风，约翰·劳伦斯爵士答应给他们调来他所能搜罗的全部援军。”

由于部队已被约翰·劳伦斯爵士全调走了，现在旁遮普本身很可能爆发起义，德里城下各兵营的士兵也很可能因雨季末期从地面散发的瘴气而病倒和大批死亡。范考特兰特将军的部队，据四个星期前的报道，已达到希萨尔，并继续向德里推进^①，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显然，他们不是严重受阻，就是在途中被解散了。

① 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英国人在恒河上游的处境确实非常危急。哈夫洛克将军受到奥德起义者的行动的威胁，起义者从勒克瑙取道比图尔前进，企图在坎普尔以南的法塔赫布尔附近切断他的退路；同时瓜廖尔的部队正在从加尔比这座朱木拿河右岸城镇向坎普尔运动。指挥这次分进合击运动的可能是纳那·萨希布，据说此人掌握着勒克瑙的最高指挥权，这次运动第一次显示出起义者具有一些战略观念，而英国人看来则只是惦记着发扬自己愚蠢的离心战法。例如，从加尔各答调来增援哈夫洛克将军的第九十步兵团和第五燧发枪团，据说在迪纳普尔被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截留，他心血来潮地决定把他们经由法扎巴德带到勒克瑙。伦敦《晨报》称颂这个作战计划，认为这一着很高明，因为勒克瑙将因此而腹背受敌，右面受坎普尔的威胁，左面受法扎巴德的威胁。^①根据一般的作战规则，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如果不设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队伍，反而一分为二，中间被敌军整个隔开，那么这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把他们歼灭。实际上，就哈夫洛克将军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援救勒克瑙，而在于援救他自己和尼耳将军的少数部队的残部。他很可能不得不退回安拉阿巴德。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交汇处的安拉阿巴德，确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掌控恒河-朱木拿河间地的锁钥。

看一眼地图就可以知道，企图收复西北各省的英军的主要作战线是沿着恒河下游流域。因此，必须成为真正行动起点的迪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萨布尔的阵地，尤其是安拉阿巴德的阵地，应当得到加强，应当把孟加拉省本部的所有较小而在战略上又无关紧要的据

^① 《我们当前在印度的形势》，载于1857年10月5日《晨报》第20686号。

——编者注

点的守军都撤到这些地方。目前,这一主要作战线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一点,从以下摘自由孟买寄给伦敦《每日新闻》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

“不久以前,迪纳普尔的三个团哗变,截断了安拉阿巴德与加尔各答之间的交通(河上的轮船来往除外)。这次迪纳普尔哗变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因为距加尔各答不到 200 英里的整个比哈尔地区现已暴乱蜂起。今日消息称,桑塔尔人³⁸⁶又起暴乱,有 15 万嗜血和劫掠成性的野蛮人在孟加拉横行,情况的确会骇人听闻。”

只要阿格拉还能坚守,对于孟买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对于马德拉斯军来说,就是通过绍戈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旁遮普军以及扼守安拉阿巴德的部队则须恢复他们与阿格拉的交通。但是,如果动摇不定的中印度各王公起来公开反对英国,同时孟买军内部的哗变日益严重,那么对军事行动的一切算计目前都会落空,那时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将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所能做到的一切,充其量就是把决定性的事件推迟到 11 月,即欧洲兵开来的时候。甚至这一点是否能够办到,也还要看科林·坎伯尔爵士的才干。关于他,除了他本人的勇敢以外,我们迄今一无所知。如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那么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德里攻陷与否,成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可随时投入战斗的部队来进行野战。可是我们还要再说一遍:问题最终将取决于孟买军。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5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炮 兵³⁸⁷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利用它朝一定方向抛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天然硝石,因此当地居民自然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中国很早就用硝石和其他可燃物混合制成了烟火剂,用于军事和盛大的庆典。还没有资料说明人们究竟何时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成一种特殊的混合物,其爆炸性能使它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帕拉韦先生 1850 年在法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①所引证的某些中国史料,在公元前 618 年就有了火炮;在其他一些中国古代的著述中,也有用竹筒发射燃烧实心弹以及类似爆炸弹的记载。不过总的来说,火药和火炮在军事上的应用,看来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到公元 1232 年才证实第一次大量使用它们,当时被蒙古人围困在开封府的中国人,曾经使用抛射石弹的火炮来抵御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弹、炸药筒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烟火剂。

根据希腊著作家埃利安努斯、克提西阿斯、菲洛斯特拉特和泰米

① 可能指帕拉韦《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笔记》1850 年巴黎版。——编者注

斯提乌斯提出的证据,印度人似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已经使用了某种军用烟火剂。然而这种烟火剂并不是火药,尽管其中含有大量硝石。一些印度法典好像曾提及某种火器,当然其中也提到火药,按照霍·海·威尔逊教授的说法,印度古代的一些医书已载有火药的配方。但是,关于火炮的最初记载,和最早被确凿证实的火炮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大约写于1200年的哈泽德的一些诗篇,曾提到发射实心弹的引火装置,发射时的啸声在10寇司^①(1500码)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有的著作中提到,德里的王大约在1258年曾拥有装在炮架上的烟火剂。一百年以后,印度已广泛使用火炮,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发现印度人在使用火器方面竟和他们一样先进。

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剂。在阿拉伯,硝石有两种名称,意思是中国的盐和中国的雪。古代阿拉伯的一些著作家曾提到“中国的红火和白火”。阿拉伯人开始使用纵火器的时期几乎也就是他们大举侵入亚洲和非洲的时期³⁸⁸。拜占庭的希腊人最初则是从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制造烟火剂(以后发展成为“希腊火”)的,这是可以肯定的,——这里且撇开据说穆罕默德知道并使用过的一种神奇的火器“茂兼尼兹”不谈。9世纪的著作家马可·格雷克提到一个配方:六分硝石、二分硫磺、一分木炭,与真正的火药成分非常近似。^②在欧洲的著作家中,罗吉尔·培根大约在1216年在他的《论魔法的荒诞》³⁸⁹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相当精确的火药配方,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一百年中,西方各国并不知道

① 印度的长度单位,相当于1—3英里。——编者注

② 马可·格雷克《制敌之火》。——编者注

如何使用火药。不过,阿拉伯人看来却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知识。根据孔代所著西班牙摩尔人的历史一书,1118年萨拉戈萨围攻战³⁹⁰中就使用了火炮,1132年,西班牙除了其他火炮,还铸造了发射四磅炮弹的口径的长炮。大家知道,1156年阿卜杜尔·穆明利用火器夺取了阿尔及利亚波尼附近的马赫迪亚,第二年利用发射箭矢和石块的火器击退卡斯蒂利亚人,守住了西班牙的涅布拉城。如果说阿拉伯人在12世纪使用的发射器的特点至今还没研究清楚,那么可以完全肯定的是,火炮在1280年已被使用于攻打科尔多瓦,14世纪初火炮的知识已由阿拉伯人传给了西班牙人。1308年,斐迪南四世利用火炮夺取了直布罗陀。1312年和1323年在巴萨、1326年在马尔托斯、1331年在阿利坎特的强攻中都使用了火炮;在这几次围攻战中,还用火炮发射了燃烧弹。使用火炮的知识又从西班牙人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在1338年在皮纪尧姆围攻战中使用了火炮,同年,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³⁹¹也使用了火炮。到1350年,火器已流传到西欧、南欧和中欧各国。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那时,火炮是用锻铁条竖着焊成圆筒、外面用大铁箍箍紧而制成的。火炮由几个部分组成,可拆卸的炮尾是在射击时装填完毕后才装在炮筒上的。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们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属于同样早的年代,甚至更早。大约到14世纪,不论是欧洲的或是亚洲的火炮,构造都非常简陋,这说明炮兵当时还处在幼年时代。这样,如果说火药成分的发明及其应用于火器的时间还不能肯定,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最初成为军事上的重要因素的时间;在14世纪,不论什么地方的火炮都很笨重,这说明那时的火炮还刚刚开始作为常备武器。欧洲14世纪的火炮是很笨重的东西。大口径火炮只有拆卸

成几部分才能搬运,而且每一部分要占用一辆马车。甚至小口径火炮也异常笨重,因为那时还不知道火炮重量和炮弹重量之间以及炮弹和装药之间的正确比例。火炮放置在阵地上时,要为每门火炮设置一个木架或垫板之类的东西,以便将火炮架在上面射击。根特城内曾有一门火炮,连同它的垫板,共长 50 英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炮架。在大多数场合下,火炮和我们现在的臼炮一样,是以很大的射角进行射击的,因此在使用爆炸弹以前,射击效果一直是很小的。当时的射弹通常是球形石弹,小口径火炮有时发射铁箭。火炮虽然有上述缺点,但是它不仅在围攻和守城时使用,而且在野战中和战船上使用。早在 1386 年,英国人就缴获了两艘装备有火炮的法国战船。从由玛丽-玫瑰号(于 1545 年沉没)上取下的火炮可以看出,这些最初战船火炮就架设和固定在特制的挖成凹形的木座上,因此不可能有不同的射角。

在 15 世纪,火炮的构造和使用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火炮开始用生铁、紫铜或黄铜铸造。可拆卸的炮尾逐渐被淘汰,火炮铸成为一个整体。最好的铸造厂是在法国和德国。法国人还首先尝试在攻城时把火炮调上来,在掩护下架炮。大约在 1450 年,出现了类似堑壕的工事,不久毕罗兄弟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依靠这些炮队在一年内就把英国人以前夺去的所有地方都夺了回来。但是作了最大改进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开始铸造整体的黄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小口径火炮用于野战。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 35 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 2 匹到 24 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炮兵勤务有了专门

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特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能和骑兵并驾齐驱。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使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当时意大利的火炮仍由几个部分组成，仍然用犍牛驮运，在到达阵地以后还必须架设在垫板上；它们发射石弹，本身极其笨重，法国人一门火炮每一小时发射的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胜利的福尔诺沃会战(1495年)³⁹²，震慑了整个意大利，这一新兵种被认为是无敌的。马基雅弗利写的《兵法》，专门论述了如何布置步兵和骑兵以尽量防御这个新兵种的杀伤。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继续改进自己的野战炮，使它们更加轻便。弗朗索瓦把炮兵组成一个特殊部门，归炮兵司令指挥。他的野战炮在马里尼亚诺会战(1515年)中粉碎了一向无敌的、人数众多的瑞士长矛手，从一个翼侧阵地迅速转移到另一个翼侧阵地，从而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知道利用和制造爆炸弹的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后者传到欧洲各国的。不过，在欧洲开始使用这种射弹和这时用来发射这种射弹的臼炮，还是不会早于15世纪下半叶；一般认为，这种炮弹和炮的采用，应归功于里米尼的王公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最初的爆炸弹是把两个空心的金属半球体旋在一起制成的，后来才发明了铸造整个的空心爆炸弹的方法。

皇帝查理五世在野战炮的改进方面并不落后于他的对手法国人。他采用了前车，这样，在需要转移时，两轮火炮就成为四轮炮车，能够更快地运动和通过起伏不平的地面。在1554年的朗蒂会战³⁹³时，他的轻炮就是由于这种原因而能急速前进。

关于射击技术以及射弹飞行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

的。据说，意大利人塔尔塔利亚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射程。西班牙人科利亚多和乌凡诺也作过类似的研究。他们奠定了射击学的理论基础。大约与此同时，万努乔·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1540年），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这时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膛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门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制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为确定理论原则和一般的实验规则开辟了道路。

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是筑城术的彻底变革。从亚述和巴比伦王朝时代以来，筑城术只有很小的发展。而这时，新式火器已能在旧式石墙的任何地方打开缺口，因此就需要发明一种新式工事。防御工事的构造应当使暴露于围攻者火炮直射火力之下的石质部分尽量减少，使强大的火炮能够配置在垒墙上。旧式石墙被石块覆盖的土质垒墙代替，不大的侧防塔楼则改为大的五角棱堡。工事上的所有石砌部分，开始逐渐用外围土质工事加以掩护，以抵御敌人的直射火力；到17世纪中叶，要塞防御手段又胜过了进攻手段，直到沃邦再度使后者占据优势。

在这以前，装填的方法是把散装的火药直接填进火炮。大约在1600年，开始使用药包，即装有定量火药的布袋。这样，装填所需的时间就大大缩短，并且由于装药量更加一致而保证了更大的射击精度。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明，即葡萄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能发射空心弹的野战炮，也是在这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在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²²⁷时期的多次围攻战，使防守和攻击要塞用的火炮大有改进，特别是使臼炮和榴弹炮、爆炸弹、燃烧弹和炽热的实心弹的使用方法，以及点火具和其他军用烟火剂的制造方法有所

改进。17世纪初,人们还使用着各种口径的火炮——从四十八磅炮到口径最小的、只能发射半磅重的实心弹的小单炮。野战炮虽然有了许多改进,但毕竟还很不完善,必须有各种各样口径的火炮,才能取得我们今天用少量六磅到十二磅中口径火炮所达到的效果。那时,小口径火炮灵便,但是没有威力;大口径火炮威力大,但是不灵便;中口径火炮无论就威力或灵活性而言都不足以完成所有的任务。因此,当时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炮。火炮的射角用高低楔来确定。炮架仍和以前一样笨重,当然,每种口径的火炮仍需要有专门的炮架,所以在野战中几乎不可能携带备用的车轮和炮架。车轴是木制的,其尺寸根据火炮的口径而定。而且即使同一口径,火炮和炮架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当时各地还保留着许多旧式火炮,一个国家中几个工厂制造的火炮在构造上也有很多不同。药包仍然只用于要塞火炮;在野战中,用铲将散装火药装进火炮,然后再填进药塞和弹丸。点火孔内也要装填散装火药,整个装填过程非常缓慢。那时炮手不算做正规士兵,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行会,招收学徒,并且宣誓不泄露手艺的秘密。当战争爆发时,交战双方都尽量招募更多的炮手,超过平时的编制。招募来的每个炮手负责指挥一门火炮,配有一匹乘马和一个学徒,并按他要求的数量配备专业助手,不包括搬运重件所需的人员。炮手的报酬比士兵多三倍。战争爆发时,炮兵用的马匹由承包人供给,承包人还按照合同提供挽具和驭手。在战斗中,火炮成一线配置在战线前,从前车上卸下,马匹则卸套。接到前进的命令时,火炮架上前车,套上马前进;小口径火炮在短距离内有时就用人力转移。火药和炮弹用另外的车辆运送;前车上没有弹药箱。移动、装填、装导火药、瞄准和射

击,所有这些活动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来都是极端缓慢的,在机械装置这样不完善、几乎完全缺乏对射击技术的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命中率自然是不高的。

在三十年战争²²⁸时期,古斯塔夫·阿道夫攻入德国,标志着火炮的巨大进步。这位伟大的斗士取消了口径过小的火炮,最初代之以他的所谓蒙皮炮,即用绳子和皮革包扎着的轻锻铁管。这种炮只用来发射葡萄弹,这是葡萄弹第一次用于野战。在这以前,这种炮弹只用来保卫要塞的壕沟。除了葡萄弹和普通霰弹,他还在野战炮兵中使用了药包。蒙皮炮不够坚固,后来就代之以轻型四磅铁炮,其长度是口径的16倍,加上炮架共重6英担,用双马牵引。每个步兵团配有这种炮两门。这样,就出现了团炮,用来代替口径小而又比较笨重的旧式火炮,它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团炮最初只用来发射霰弹,但是很快也能用来发射球形实心弹了。重炮则单独编为强大的炮兵连,在军队翼侧或中央前占据有利的阵地。轻炮和重炮的这种区分和炮兵连的编成,奠定了野战炮兵战术的基础。瑞典炮兵总监托尔斯顿森将军大力推动了这些革新,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并有自己特殊的战斗规则。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还有两项重要的发明:1650年左右,发明了水平调整螺杆,它一直使用到格里博瓦尔时代;1697年左右,开始采用装满火药的管子作为引爆装置,以代替将散装火药装入点火孔内,这样,瞄准和装填过程都简便多了。另一个重大的改进是发明了 in 短距离内移动火炮用的牵引索。在17世纪,战场上使用的火炮数量很多。在格赖芬哈根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有火炮80门,炮兵2万人,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会战中,有火炮200门,炮兵18000人。³⁹⁴在路易十四战争时期,常常可以看到由100—200门火炮组成的炮兵纵列;在

马尔普拉凯会战³⁹⁵中,交战双方都有近 300 门火炮;这是当时集中在一个战场上的最大数量。大约这一时期,在野战中已普遍使用臼炮。法国人仍然保持了在炮兵方面的优势。他们首先废除了旧的行会制度,把炮手编入军队作为正规士兵,在 1671 年建立一个炮兵团,规定了不同的军官职务和等级。这样,这部分军队就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军官和士兵的训练由国家掌管。1690 年,法国创办了一所炮兵学校,它至少在其后五十年内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所炮兵学校。1697 年,圣雷米出版了一本炮兵学手册^①,这在当时是一本很好的教材。但是,由于射击技术的“秘密”仍然保守得非常严格,其他国家进行的许多改革,法国还不知道;而且欧洲各国的火炮构造和炮兵编制也各自大不相同。例如,荷兰发明的榴弹炮,到 1700 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采用,但是法军还没有装备这种火炮。拿骚的莫里茨首先采用的带弹药箱的前车,法国并不知道,而且它实际上并未被普遍采用。因为火炮、炮架和前车都过于笨重,已经无法再加上弹药的重量了。口径很小的火炮,包括三磅炮在内,实际上已不用了,但是法国还没有轻型的团炮。在此前的各个时期,火炮的装药一般都很重,最初和实心弹一样重。虽然当时火药的质量不好,但这些装药的效力仍然比现在使用的大得多,而这也是火炮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经受住这种装药的爆炸作用,铜炮的重量往往是炮弹重量的 250—400 倍。但减轻火炮重量的必要性迫使装药逐渐减少;大约到 18 世纪初,装药的重量通常只有炮弹重量的一半。臼炮和榴弹炮的装药量视目标距离而定,通常都很小。

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终于都编入了军

① 指圣雷米编的《炮兵学笔记》(两卷集)1697 年巴黎版。——编者注

队,不再保留中世纪行会的性质,被确认为一个兵种,因此得以取得更正规和更迅速的发展。结果,这个兵种很快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火炮的口径和类型既杂乱又繁多,一切已有的、凭经验得来的规则并不可靠,而确定不移的原则又根本没有,这种种情况这时已变得非常突出,令人难以容忍。因此,到处都大规模地进行试验,以确定不同口径的火炮的火力,口径同装药量、同火炮的重量和长度的关系,火炮各部分金属的比例,射程以及后坐力对炮架的作用等等。在1730—1740年这一时期,贝利多尔在法国拉费尔,罗宾斯在英国,帕帕契诺·丹东尼在都灵,曾领导这种试验。结果,火炮的口径大为简化,火炮各部分金属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降至炮弹重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取得这些改进的同时,射击学也获得进展。伽利略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伯努利、沃尔弗和欧拉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射弹飞行、空气阻力和弹着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验家对射击学中数学方面的发展也有重大的贡献。

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普鲁士的野战炮又一次大为减轻。短管轻型的团属火炮的长度不超过口径的14倍、16倍或18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80—150倍;在当时主要由步兵火力决定战斗结局的情况下,这样的火炮被认为已具有足够的射程。因此,这个国王便按照上述长度和重量方面的比例铸造了他所有的十二磅炮。奥地利人在1753年加以仿照,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群起效尤;但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却在他统治的后期又用威力强大的长管火炮装备了预备队炮兵,因为洛伊滕会战³⁴⁵的经验使他认识到这种火炮的火力优势。弗里德里希大帝让自己的一部分炮兵连的炮手乘马,从而建立了骑炮兵这样一个新的兵种。骑炮兵用于支援骑兵,就像步炮兵支援步兵

一样。这一新兵种具有很大的威力,立即被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采用;在某些国家如奥地利的军队中,炮手不是乘马,而是乘坐专用的车辆。在18世纪,各国军队中火炮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拥有的火炮数量是:1756年在7万名士兵中有206门火炮,1762年在67000名士兵中有275门,1778年在18万名士兵中有811门。这些火炮除团属火炮随各营行动外,编成大小不同的炮兵连,每个炮兵连有6至20门火炮。团属火炮随同步兵前进,炮兵连则在选定的阵地上进行射击,有时还前进到下一个阵地,但是通常在进入第二阵地后就停在该处,直到战斗结束。在运动性方面,这些火炮都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库讷斯多夫会战³⁴⁷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能在决定性时刻把火炮调上来。普鲁士将军泰佩尔霍夫还建立一些野战臼炮连,这些轻臼炮是用骡子驮载转移的;但是1792年和1793年的战争证明这种臼炮没有用处,不久就被淘汰了。这一时期,炮兵学在德国有了特别重大的发展。施特鲁恩泽和泰佩尔霍夫在这一方面写了一些有益的著作^①,但是当时最卓越的炮兵专家是夏恩霍斯特。他所写的炮兵手册是炮兵学方面第一部全面的真正的科学著作,他的一本早在1787年出版的军官手册,已经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野战炮兵的战术^②。夏恩霍斯特的著作尽管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至今仍不失其经典性质。奥地利的维加将军、西班牙的莫尔拉将军、普鲁士的霍伊尔和鲁弗鲁瓦也都写过有价值的炮兵学

① 施特鲁恩泽《炮兵学原理》1760年利格尼茨版和泰佩尔霍夫《普鲁士炮手,或论炮弹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1781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夏恩霍斯特《炮兵手册》1804—1814年汉诺威版和《军官手册——军事学的实用部分。第1部分:炮兵》1787年汉诺威版。——编者注

著作^①。1732年,法国人按瓦利埃的办法改编了炮兵;他们保留了二十四磅、十六磅、十二磅、八磅和四磅炮,并采用了8英寸榴弹炮。但是他们的火炮在结构上仍有许多不同的型号;火炮的长度为口径的22倍到26倍,重量大约为炮弹重量的250倍。格里博瓦尔将军在七年战争时期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知道普鲁士和奥地利新编炮兵的优越性,因此终于在1774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他提出的新编制。他把攻城炮兵与野战炮兵彻底分开。攻城炮兵完全由十二磅以上的火炮和十二磅的旧式重火炮编成。野战炮兵则由十二磅、八磅和四磅炮(长度均为口径的18倍,重量均为炮弹的150倍)以及6英寸榴弹炮编成。火炮的装药量确定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并采用了高低调整螺杆,火炮和炮架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固定的规格制造的,所以很容易用库存部件来替换。法国炮兵使用的所有运输工具只需7种规格的车轮和3种规格的车轴就够了。虽然大多数国家的炮兵都用带弹药箱的前车来运送弹药,格里博瓦尔在法国却没有采用它们。四磅炮配属给步兵,每个营两门;八磅和十二磅炮则编成单独的炮兵连,作为预备队炮兵,每个炮兵连有一个野战铁工场。建立了辎重和技工连队。总的说来,格里博瓦尔的炮兵是第一支根据当代的要求建立的炮兵。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分的比例上,在装备和编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炮兵优越,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

由于格里博瓦尔的各种改革措施,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实

① 维加《射击教范(附射表)》1787年维也纳版、莫尔拉《炮兵论文》1784年塞哥维亚版、霍伊尔《常用炮兵辞典》1804—1812年蒂宾根版和鲁弗鲁瓦《炮兵讲义》1811—1814年德累斯顿版。——编者注

力优于其他国家,在拿破仑手中很快就成为一个威力空前强大的兵种。1799年法国最后取消了团属火炮,同时,随着六磅和三磅火炮在欧洲各地的大量使用,法军也装备了这两种口径的火炮;除此之外,法国炮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的野战炮兵都编成炮兵连,每连有6门火炮,其中通常1门是榴弹炮,其余为普通火炮。但是,如果说在装备方面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炮兵的战术方面则有很大的改变。虽然火炮的数量由于团属火炮的取消而稍有减少,火炮在战斗中的作用却由于火炮的巧妙使用而增强了。当时,拿破仑使用配属给步兵师的一些轻炮来发起战斗,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等,而把大部分火炮留在预备队中,以待确定主要攻击目标;一经确定,就突然编成庞大的炮队,共同袭击这一目标,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预备队的最后攻击作准备。在弗里德兰会战^①中有70门火炮,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有100门火炮,都是如此列队的;在博罗季诺会战²⁶²中,由80门火炮编成的炮队为奈元帅攻击谢明诺夫村作了准备。另一方面,拿破仑编成的大量预备队骑兵需要相应的骑炮兵部队来支援,于是骑炮兵又受到很大的重视。法军有大量的骑炮兵,在实践中首创了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法。如果没有格里博瓦尔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产生炮兵的这种新的使用方法;改变战术的必要性,促使大陆各国军队都逐渐地、稍加改变地采用了这些改革措施。

截至法国革命战争初期,英国炮兵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国的炮兵。英军每个营有两门团属火炮,但是没有预备队炮兵。火炮用单马纵列牵引,驭手持长鞭随车步行。马和驭手都是雇来的。装备的构造非常陈旧,火炮在转移时,除了很近的距

^① 见恩格斯《博罗季诺》。——编者注

离外,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当时还没有骑炮兵。但是,自从1800年以后,经验已经表明原有的炮兵不能令人满意,斯皮尔曼少校对炮兵进行了根本改革。前车改用双马纵列牵引,火炮编成6门制炮兵连,总之是采用了大陆各国已经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改革措施。由于不惜金钱,英国炮兵很快就成为仪表最讲究、装备最精良和最豪华的一支炮兵了。新建立的骑炮兵很受重视,很快就表现出行动果敢、迅速和准确的特点。至于装备的革新,则仅限于炮车的构造方面。单尾炮架和运载弹药的前车,后来为大多数大陆国家所采用。

在这一时期,炮兵和军队其他各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些。火炮数量最多的是皮尔马森斯会战³⁹⁶中的普鲁士军队——1 000名士兵中就有7门火炮。拿破仑认为每1 000名士兵有3门火炮就足够了,这一比例已成为一种常规。这时还规定了每门火炮应有的炮弹数量,一门炮的炮弹不少于200发,其中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霰弹。在拿破仑垮台后的和平时期,欧洲列强的炮兵都逐步进行了改革。各国都取消了三磅和四磅的小口径火炮,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英国炮兵的经过改进的炮架和弹药箱。几乎各国都规定了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150倍或接近150倍;火炮的长度则为口径的16—18倍。法国人在1827年改编了炮兵。野战炮的口径规定为八磅和十二磅,长度为口径的18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150倍。他们采用了英国式的炮架和弹药箱;带弹药箱的前车在法军中初次采用。八磅和十二磅炮连的编成中分别包括有炮膛为15厘米和16厘米的两种榴弹炮。野战炮兵这种新编制的特点是非常简单。在法军野战炮连所使用的一切运输工具中,只有两种炮架、一种前车、一种车轮和两种车轴。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单独的山地炮兵,由炮膛为12厘米

的榴弹炮组成。

这时,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口径为九磅的火炮组成,其长度为口径的 17 倍,重量按炮弹重 1 磅、炮重 1.5 英担计算,装药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每个炮兵连有两门 5.5 英寸的二十四磅榴弹炮。在不久以前的对俄战争³⁸中,六磅和十二磅火炮根本没有使用。他们使用两种车轮。英国和法国的步炮兵,在转移时炮手都乘坐在运载弹药的前车上。

普鲁士军队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火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8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45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弹炮的炮膛为 5.5 英寸和 6.5 英寸。每个炮兵连有 6 门火炮和 2 门榴弹炮。他们使用两种车轮、两种车轴和一种前车。炮架是格里博瓦尔式的。在步炮兵中,为了迅速转移,5 名炮手(足够操纵火炮的人数)乘坐带弹药箱的前车和辕外马,其余 3 名炮手则尽力跟随前进。因此,弹药车不像法国军队或英国军队那样和火炮连在一起,而是单独组成一个纵列,作战时配置在敌人射程以外的地方。在 1842 年,采用了英国式的经过改进的弹药车。

奥地利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火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6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35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榴弹炮和普鲁士军队使用的榴弹炮相似。一个炮兵连由 6 门普通火炮和 2 门榴弹炮组成。

俄国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火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18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50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弹炮的炮膛为 5 英寸或 6 英寸。根据口径和目的的不同,炮兵连由 8 门或 12 门火炮组成,其中普通火炮和榴弹炮各占一半。

撒丁军队装备有八磅和十六磅火炮以及大小与此相应的榴弹

炮。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都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西班牙军队装备有八磅炮和十二磅炮；葡萄牙、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那不勒斯的军队则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

英国炮兵在斯皮尔曼少校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得到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炮兵界对于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的兴趣，还有英国庞大的海军炮兵的存在为炮兵的进步所提供的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切促成了许多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烟火剂和火药比其他各国都好，而英国的定时引信装置的准确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英国炮兵后来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榴霰弹（一种装满弹丸、在飞行过程中爆炸的空心弹），因此，霰弹的有效射程就和球形实心弹的射程一样远了。尽管法国的设计家和组织者的本领很大，法军恐怕是惟一未能采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射弹的军队。他们还不会配制引信所需的药剂，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路易-拿破仑曾要求使用一种新制式的野战炮，看来目前法国已在逐渐采用。目前使用的四种口径的普通火炮和榴弹炮，全部要用一种轻型的十二磅火炮来代替，它的长度是口径的 15.5 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 110 倍，装药量是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在减少装药后由同一火炮发射 12 厘米的爆炸弹（目前山地炮兵也使用这种炮弹），这样就可以代替专门发射空心弹的榴弹炮。法国四个炮兵学校就此进行的试验都很成功，据说在克里木战争中这种火炮显然优于大部分是六磅炮的俄国火炮。但是，英国人确信他们的九磅长管炮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优于这种新式火炮。这里必须指出，他们首先使用过这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轻型十二磅炮，但不久又放弃了。而这种炮显然是路易-拿破仑仿效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火炮发射爆炸弹，是向普鲁士军队学来的，普鲁士军队在围攻时用

二十四磅炮发射爆炸弹来完成一定的任务。但是路易-拿破仑的这种火炮的性能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由于没有专门公布过关于这种火炮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作用的任何资料,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可能对其优劣作出定论。

火炮发射实心弹、空心弹和其他射弹的规律以及通过实验得出的射击规则,射程、射角和装药量之间确定的关系,游隙以及造成射弹偏差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命中目标的概率,以及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这一切构成射击学的内容。在真空中一件重物朝非垂直方向被抛掷出去,在其飞行中都会形成一条抛物线,虽然这一事实是射击学的基本原理,但是随着运动物体速度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空气阻力,却使抛物线理论在射击技术的实际运用中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炮弹初速为每秒1 400—1 700英尺的火炮,其弹道和理论上的抛物线相差很大,大到在上述情况下,要获得最大的射程只需要20度左右的射角,而按照抛物线理论,射角应当是45度。人们根据实验的结果相当准确地确定了这种偏差量,并依此确定了每种火炮在装药量和射程既定的条件下应取的射角。但是,影响炮弹飞行的还有许多别的因素。首先是存在着游隙,即炮弹直径和炮膛直径有差别,因为为了便于装填,炮弹直径必须小于炮膛直径。游隙首先使装药爆炸时膨胀的气体漏失,换句话说,使爆炸力减弱,第二,使炮弹射击方向产生不规则变化,造成垂直偏差或水平偏差。其次,装药的重量和它在发射时的状况必然是不一样的;炮弹由于其重心与圆心不一致而产生的偏心现象引起各种偏差,偏差的大小决定于发射时重心与圆心的相对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使炮弹在看起来同样的飞行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各国野战炮的装药量几乎都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长度都是口径的16—18倍。在

采用这样的装药量时,火炮如果进行直射(炮身处于水平状态),那么炮弹会在约 300 码的距离上落地;如果增大射角,射程可增至 3 000 码或 4 000 码。但是射程这样远时,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所以,要取得实际效果,野战炮的射程不应超过 1 400 码或 1 500 码,而且即使在这样的距离上,6 发或 8 发炮弹中也难得有 1 发可以命中目标。在用球形实心弹和爆炸弹射击时,火炮能影响战争结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射程,是 600 码到 1 100 码;在这样的射程内,命中率的确要大得多。例如,据计算,六磅炮对标示步兵营攻击纵队正面的靶子(长 34 码,高 2 码)射击时,在 7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为 50%,在 9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35%,在 1 1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为 25%。九磅和十二磅炮的射击效果比较好一些。1850 年在法国进行的试验中,用当时装备的八磅炮和十二磅炮对长 30 米、高 3 米的靶子(标示骑兵团)射击时,取得了以下成绩:

距离(米)	500	600	700	800	900
命中率 十二磅炮	64%	54%	43%	37%	32%
八磅炮	67%	44%	40%	28%	28%

虽然这个靶子比前面所说的靶子高出一半,但是射击成绩仍然低于前面所说的成绩的平均数。野战榴弹炮的装药量与射弹重量的比例,比普通火炮的比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炮身短(相当于口径的 7 倍到 10 倍),而且射击时必须采用大射角。榴弹炮在以大射角进行射击时,如果采用重装药,冲向后下方的后坐力会使炮架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致在几次发射后炮架就会损坏。因此在大多数大陆国家的炮兵中,一门野战榴弹炮要采用不同的几种装药量,这样,炮手就能用不同的装药量,配合不同的射角来保证所要求的射程。在不这

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英国炮兵中,榴弹炮的射角必然很小,只稍稍大于普通火炮的射角;英国二十四磅榴弹炮在采用 2.5 磅装药和 4 度射角时,其射表中所标示的射程不超过 1 050 码;九磅普通火炮以同样射角射击,其射程能达 1 400 码。在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中,大多数都采用一种特殊的短管榴弹炮,这种炮可以采用 16 度到 20 度的射角,因此与臼炮相似;它的装药量必然小些。这种榴弹炮和普通的长管榴弹炮比较起来,它的优越性在于可以用爆炸弹轰击地褶后面的隐蔽阵地等目标。但是当射击移动的目标,如军队时,这种优越性就值得怀疑了;尽管在对付直射火力达不到的固定不动目标时,它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至于进行直射,这种短管榴弹炮因为炮身短(相当于口径的 6—7 倍)、装药少而几乎完全不适用。在根据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一定的射角(直射或曲射)射击时,为了获得不同的射程,装药量应当是各不相同的;在仍在使用这种短管榴弹炮的普鲁士野战炮兵中,采用的装药不下于 12 种。一般说来,榴弹炮是一种很不完善的火炮,因此越能早日用效果良好、发射爆炸弹的野战火炮来代替它越好。

在要塞中、在围攻时以及在舰船上使用的重炮,有不同的类型。在最近一次对俄战争以前,围攻战时一般不使用比二十四磅炮更重的火炮;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少量的三十二磅炮。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起,就不再区分攻城炮和舰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型舰炮在轰击堑壕和土质工事时的作用证明比一般轻型攻城炮大得多,所以从此以后这种重型舰炮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围攻战成败的武器。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往往同一种口径的火炮有不同的类型,有短管的轻炮,也有长管的重炮。这样,就较少考虑移动性能,往往为了专门的目的而制造一些炮身长度相当于口径

22—25 倍的火炮,其中有些火炮由于炮身更长,射击时竟和来复枪一样准确。在这类优良的火炮中,有一种就是普鲁士的二十四磅铜炮,其长度是 10 英尺 4 英寸,即口径的 22 倍,重 60 英担;围攻时没有任何一种火炮在击毁敌人火炮方面能和它相比。但是,一般认为,长度为口径的 16—20 倍,就足以完成大多数的任务了;通常,人们更重视火炮口径的大小,而不过分要求射击的精确度,因而,用 60 英担的生铁或铸炮金属来铸造长度为口径 16—17 倍的三十二磅重炮一般更为合适。用生铁铸造的新式三十二磅长管炮,是英国海军最好的火炮之一,其长度为 9 英尺,重 50 英担,长度仅为口径的 16.5 倍。有一种重 112 英担的六十八磅长管旋座火炮,装备在全部有 131 门火炮的螺旋桨大型舰船上,其长度为 10 英尺 10 英寸,即略大于口径的 16 倍;另一种重 98 英担的五十六磅长管旋座火炮,长 11 英尺,即为口径的 17.5 倍。直到现在,舰船仍然装备有大量威力较小的火炮,如长度仅为口径 11 倍或 12 倍的凿膛火炮以及长度为口径 7—8 倍的卡伦炮。但是还有另一种海军火炮,它是佩克桑将军在约三十五年以前发明的,而且从那时起具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发射爆炸弹的火炮。这种火炮经过了很多改进,目前,法国的发射爆炸弹的火炮是与这位发明者设计的火炮最近似的一种,它仍保留着圆柱形药室。在英国海军中,这种炮要么有一个稍小于炮膛直径的短截锥形药室,要么根本没有药室;其长度是口径的 10—13 倍,只用来发射空心弹;但是上面提到的六十八磅和五十六磅长管炮,既可发射实心弹,也可发射爆炸弹。在美国海军中,达尔格伦上校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发射爆炸弹的火炮,这是一种口径很大的短管炮(炮膛为 11 英寸或 9 英寸),一部分已被用来装备若干艘新式三桅快速战舰。这种炮的优越性尚待在实战中检验,实践会证明,它能否保证大型爆炸弹发挥巨大

的威力,而又不牺牲射击的精确度;但是为了达到远射程而采用大射角时,就不能不影响到射击精度。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有各种不同的装药,就如同火炮本身有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目标一样。为了在石质工事上打开缺口,要采用最重的装药,有些很重的大型火炮的装药量达到炮弹重量的一半。但是一般说来,相当于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装药,完全可以认为是围攻使用的中等装药量,其重量有时增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有时则减为炮弹重量的六分之一。在军舰上每门火炮通常使用三种装药:大号装药用于对远距离目标和逃敌等射击,中等装药用于海战中对中距离目标进行有效射击,减装药用于接舷战斗和发射链弹。三十二磅长管炮的装药有相当于炮弹重量十六分之五、四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三的三种。对于短管轻炮和发射爆炸弹的火炮来说,装药和炮弹重量的比例当然还要小些;不过发射爆炸弹的火炮所使用的空心弹又比实心弹轻。除了普通火炮和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还有重榴弹炮和白炮。榴弹炮是一种短管炮,以 12 度到 30 度的射角发射爆炸弹,它固定在炮架上;白炮是一种炮身更短的火炮,固定在托架上,通常以大于 20 度的射角,有时甚至以 60 度的射角发射爆炸弹。这两种都是带药室的火炮,即它们都有用来填放装药的一个小室或者说部分炮膛,其直径小于炮管,即炮膛的主要部分。榴弹炮的口径很少超过 8 英寸,但是白炮的炮膛达 13 英寸、15 英寸或更大一些。白炮发射炮弹时,由于装药量少(相当于炮弹重量的二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射角大,炮弹飞行时受到的空气阻力较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抛物线理论就可以用于炮兵射击的计算,而不致同实际结果相差很远。白炮发射的炮弹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作为燃烧弹,用从引信喷出的火使易燃物着火,它还可以靠自身的重量冲破拱形的和其他形式的防御工

事顶盖；在后一种场合，多采用较大射角，因为这能使炮弹飞行最高，在下落时产生最大的动量。榴弹炮发射的炮弹首先是起撞击作用，然后是起爆炸作用。臼炮由于射角大，炮弹初速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空气阻力不大，其射弹的射程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都要远。由于射击目标通常是整个城市，不要求火炮有很高的射击精确度。因此，重迫击炮的有效射程有时可达4 000码以上；英法的迫击炮艇就曾在这种距离上轰击了斯韦阿堡³⁸⁴。

围攻时上述不同种类的火炮、射弹和装药的使用问题，将在有关的条目^①中论述；海军炮兵的使用问题几乎是海军基本战术中有关战斗行动部分的全部内容，因而不属于本条目的范围。所以，这里只就野战炮兵的使用和战术问题稍作评述。

炮兵没有进行白刃战的武器；它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远距离进行射击。此外，只有当它占据阵地的时候，才处于战斗状态；一旦火炮架在前车上或连上牵引索进行转移，就暂时失去战斗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三个兵种中，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更多的防御特性；它的进攻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进攻本身是一种前进运动，而进攻的最高潮是白刃格斗。因此，在敌人火力下前进、占据阵地以及进行射击准备，对于炮兵来说是关键时刻。炮兵的成横队展开和射击前的运动应当利用地褶或步兵横队来作掩护。所以，炮兵应先配置在与规定要占据的阵地相平行的一线上，然后朝着正对敌人的方向进入阵地，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的侧射火力之下。阵地的选择，不论从保证炮兵连的射击效果来说，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连的射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自己火炮的配置应能对敌人造成

① 见恩格斯《筑城》。——编者注

最大的射击效果,这是首要的任务;防避敌人火力的伤害是第二位的任务。良好的阵地应当是在土质坚硬而平坦、适于放置车轮和架尾的地面上;如果车轮停放不平,火炮就不可能准确地射击,同时,如果架尾陷入土中,后坐力很快就会使炮架损坏。此外,阵地应当有开阔的视界,便于观察敌人占领的地形,并能保证最大的机动自由。最后,前方地形,即炮兵连和敌人之间的地形,应当有利于我方火炮射击,尽可能不利于敌人的火炮射击。坚硬而平坦的地面是最有利的地面,它有利于跳弹作用的发挥,此时炮弹即使是弹着点过近,在接触地面后也能跳起飞向敌人。不同性质的地面对于炮兵射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在松软的地面上,炮弹一触及地面,即使不立刻陷入土中,也会偏离方向,或者发生不规则的弹跳。耕地垅沟的方向对于射击,特别是对于用霰弹或榴霰弹进行的射击,有很大影响;如果垅沟是横的,那么大部分炮弹将陷入土中。如果紧挨我方阵地前方的是土质松软、波状起伏的地形,而往前靠近敌方则是土质坚硬的平坦地形,这将有利于我方的射击,并保护我方不受敌方火力的杀伤。在向下或向上倾斜五度以上的斜坡上进行射击,或者从一个山冈的顶部向另一山冈进行射击,是非常不利的。很小的物体也有助于掩蔽我方,防御敌方火力。勉强能掩蔽我方阵地的稀疏的栅栏、树丛或高杆作物,都能妨碍敌人进行正确的瞄准。利用陡峭的小土堤配置火炮,就能够承受住敌方最危险的射弹的袭击。壕沟可以作为很好的胸墙,而起伏不大的地形上的突起部则具有最好的防护作用,我们可以把火炮配置在突起部后面,使敌人只能看到火炮的炮口;如果选择这样的阵地,那么落在阵地前面的每一发炮弹,都将从我方阵地上面高高地跳过。如果在突起部上面为我方火炮挖掘一个深约两英尺的炮床,并朝反斜面方向开一个平坦的进出口,从而保证火炮能控制山

冈的整个正斜面,这样的阵地就更好了。拿破仑统率下的法国人善于巧妙地配置自己的火炮,其他国家就是从法国人那里学会这种技能的。选择阵地时,从御敌方面来说,它应当是敌人侧射火力和纵射火力达不到的地方,而从自己军队方面来说,它不应当妨碍他们的运动。火炮配置成横队时,各门火炮之间一般相距 20 码,但是没有必要死守这种练兵场上的规则。火炮进入阵地后,前车保持在火炮的直后,而弹药车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则仍处于掩蔽状态。如果弹药车用来载运炮手,那么它也不得不冒险停放在敌人的有效射程内。炮兵连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方阵地威胁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方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么炮兵连就或者要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们尚未被打哑的话),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如果他们暴露出来的话);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他们就应当成为火炮瞄准的目标,而先撇开对我射击的敌方炮兵。对敌方炮兵射击最有效的时机,是在敌方炮兵不能进行还击的时候,也就是在敌人正把火炮架上前车、正在转移或者正从前车上卸下的时刻。这时进行几次准确的射击,就能在敌人中间造成极大的混乱。过去曾有一项规则,即炮兵非万不得已不应当接近到距敌人步兵 300 码以内,即轻火器的射程以内;现在这一规则很快就要过时了。在现代步枪的射程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野战炮兵要发挥战斗力,已不可能继续保持在步枪的射程以外;火炮及其前车、马匹和炮手形成相当大的一个目标,散兵可以用米涅式来复枪或者恩菲尔德式来复枪从 600 码的距离上对这个目标进行射击。长久以来人们形成一个观念,认为谁想活得久一些,谁就去当炮兵,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以散兵从远距离进行射击,这在将来显然是袭击炮兵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散兵在距离炮兵阵地 600 码以内难道会找不到一

个可靠的掩蔽地吗？

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横队或纵队一向是具有优势的；用霰弹进行几次有效的齐射或者向长纵队发射两三个实心弹，就能大大挫伤敌人的士气。攻击者离炮兵越近，炮兵的射击就越有效；即使在最后的时刻，我们的火炮也能够轻易地转移，摆脱如此缓慢前进的敌人，尽管成散兵线跑步进攻的文森猎兵是否不能在我们把火炮架上前车以前追上我们还是个问题。

在与骑兵作战时，炮兵沉着应战就能保持优势。如果炮兵把霰弹留到敌人进到 100 码之内才使用，到那时进行准确的群射，那么当硝烟消散的时候，就会发现骑兵被压制在老远的地方。将火炮架上前车，试图退走，是一种下策，因为这时骑兵就肯定能截获火炮。

在炮兵对炮兵的战斗中，决定胜败的是：地形、火炮口径、火炮相对数量以及双方与此有关的对火炮的使用。然而必须指出，虽然大口径火炮在远距离上射击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但是随着射程的缩短，小口径火炮的作用就与大口径火炮逐渐接近，而在近距离上则几乎与之相等。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的炮兵主要由三磅炮和四磅炮组成，俄国人则以拥有大量十二磅炮而自鸣得意，但是法国不起眼的小型火炮却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炮兵支援步兵或骑兵时，应当始终在他们的翼侧占据阵地。步兵进攻时，炮兵应当以半连或排为单位与散兵一起前进，有时甚至稍稍在散兵之前；当步兵群准备刺刀冲锋时，炮兵应立即快速前进到离敌人 400 码的地方，用霰弹进行速射，为冲锋作准备。如果冲锋被击退，炮兵应对追击的敌人射击，直到不得不退却时为止；如果冲锋成功，炮兵的火力则能有力地促使战斗获得全胜，这时一半火炮继续射击，另一半火炮前进。骑炮兵作为支援骑兵的一个兵种，能够使骑兵

具有它原来当然完全没有的防御能力；现在，骑炮兵已成为最受重视的兵种之一，而且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发展得十分完善。虽然骑炮兵的任务是在骑兵行动地区和骑兵一起作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骑炮兵都能迅速通过本方骑兵只有牺牲整齐的队形才能通过的地形。各国骑炮兵都由军队中最勇敢、最熟练的骑手组成；在每次大规模野战演习中，他们都会神气十足地携带着火炮等等在可能使骑兵受阻的障碍面前一跃而过，勇猛地向前冲去。骑炮兵战术在于勇敢和沉着。迅速行动、突然出现、快速射击、随时准备转移并在骑兵难以通行的道路上运动，这些都是优秀的骑炮兵的基本素质。骑炮兵由于经常变换位置，所以不必专门去选择阵地；凡是离敌人近而敌人骑兵又不能到达的阵地，都是好阵地；炮兵要随着骑兵战斗的潮起潮落而进退，时刻表现出高超的骑术和沉着镇静，出入于汹涌澎湃的战争之海，跨越并不是所有骑兵都敢于或者愿意跟随前进的任何地形。

在攻击和防守据点时，炮兵也采用同样的战术。炮兵的主要作用始终是：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有效地阻止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炮兵的任务还包括破坏坚固的障碍物，这时，应根据火炮的特点及其作用而使用不同口径和不同种类的火炮；榴弹炮用来引燃建筑物，重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门、城墙和街垒。

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就各国军队中的师属炮兵来谈的。但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预备队炮兵取得的。预备队炮兵在战斗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配置在后面，在敌人视界和射程以外，只是在进行最后搏斗的关头才调到前面，集中轰击有决定意义的地点。预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里以上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相对较小的点进行破坏性射击。如果敌人

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火炮进行回击,那么半小时的速射就可以解决战斗。在呼啸的弹雨下,敌军开始退缩,这时未受损伤的步兵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一场激烈而短促的最后搏斗,并取得胜利。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就是这样为麦克唐纳的攻击做好准备的,因而成纵队前进的3个师还未来得及施放一枪一弹或进行刺刀冲锋,敌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可以说,正是从这些重大的时刻起才有了野战炮兵的战术。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

19日—11月27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印度 起 义

阿拉伯号的邮件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德里陷落的重要消息。我们根据手中有限的材料来判断,这个事件看来是同时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的结果:起义者发生了激烈的内讧,交战双方军队数量的对比起了变化,早在6月8日就期待的攻城炮兵纵列已于9月5日到达。

在尼科尔森的援军到达后,我们曾估计德里城下军队的总数为7 521人^①。我们的估计现在完全证实了。后来,在克什米尔部队的3 000人由朗比尔·辛格这位拉甲¹⁸⁸转交英国人指挥以后,据《印度之友》称,英军兵力共达11 000人左右。另一方面,伦敦《军事旁观者》断言,起义者的兵力减少到约17 000人,其中包括5 000名骑兵,《印度之友》则把他们的兵力计算为13 000人左右,包括1 000名非正规骑兵。由于在城墙被打开缺口和城内战斗开始以后,骑兵便完全无用,所以当英军突入城中,骑兵就弃城而逃。因此,无论根据《军事旁观者》的计算,或者根据《印度之友》的计算,西帕依⁶⁷全部兵力不可能超过11 000人或12 000人。由此看来,英军兵力几乎与哗变者的兵力相等,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前者增加了兵力,不

① 见本卷第433、434页。——编者注

如说是由于后者减少了兵力。英军在数量上略居劣势，但是这种劣势由于有效的炮击所造成的精神效果和进攻的有利条件，而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因为进攻者可以选择主攻地点，而防守者则不得不把他们不足的兵力分散在所有受到威胁的地点。

起义者兵力的减少，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大约十天以来不断出击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如说是由于内讧使整批部队离散。幽灵似的莫卧儿本人同德里的商人一样，都对于把他们积蓄的所有钱财洗劫一空的西帕依的统治感到十分不满，此外，西帕依内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宗教上的不和以及原守军和新增援部队之间的争吵，也足以瓦解他们表面凑合的组织，使他们必然遭到失败。尽管如此，英军不得不对付的仍然是这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数量上比他们稍占优势，却缺乏统一指挥，因内讧而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但是，他们在受到八十四小时的轰击之后，仍然在城内经受住了整整六天的炮击和巷战，然后从容地由舟桥渡过朱木拿河。所以必须承认，起义者毕竟以他们的主力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

攻占德里的经过看来是这样的：9月8日，英军把炮兵连配置在离部队原阵地前面很远、距城墙仅700码的地方。在8日和11日之间，英军的重炮和白炮推进得更接近防御工事，把炮兵连安置在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所受损失很小，因为已考虑到德里的守军在10日和11日曾两次出击，多次企图安置新的炮兵连，并从散兵壕不断进行扰乱性的射击。12日英军死伤约56人。13日晨，敌方一座棱堡上的军火库，以及一辆由郊区塔耳瓦腊纵射英军炮兵连的轻炮弹药车被炸毁，同时英军炮兵连在克什米尔门附近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14日对城市发动强攻。军队未遇严重抵抗就从

克什米尔门附近的缺口突入城中,占领了邻近的各大建筑物,沿垒墙向摩里棱堡和喀布尔门前进。这时,敌人开始顽强抵抗,因此英军遭受严重损失。英军准备利用已被占据的棱堡上的火炮转而对付城市,并另运一批火炮和白炮到俯控点去。15日,伯恩棱堡和拉合尔棱堡受到英军在摩里棱堡和喀布尔棱堡缴获的火炮的轰击,同时军火库被打开一个缺口,王宫也开始遭到炮击。9月16日拂晓,弹药库被攻下,17日,白炮从弹药库围墙后面继续轰击王宫。

从这一天起,关于攻城的官方消息就断绝了;据《孟买信使报》说,这是由于旁遮普和拉合尔的邮件在信德边境被劫。在给孟买省督^①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星期日,即20日,整个德里城被占领,哗变者的主力在当日早晨3时放弃该城,经舟桥过河,朝罗希尔肯德方向退走。英军在占领位于河岸的塞林加尔以前是不可能进行追击的,所以起义者显然从城市的极北端向东南端慢慢地打开一条退路,把掩护退却所需要的阵地扼守到20日。

至于攻占德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家权威报纸《印度之友》指出:

“英国人现在应当注意的是孟加拉的形势而不是德里的情况。迟迟才攻占德里,确实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如能早日成功即可取得的威信;叛军的力量和人数,也就会因城市被攻占而大减,正像因继续围攻而减少那样。”

与此同时,据说,起义正由加尔各答向东北扩展,并且经过中印度向西北扩展。在阿萨姆边境上,两个强大的普尔比^②团起义,它们

① 约·埃尔芬斯通。——编者注

② 普尔比(Poorbeah)原意是东部人;这里两个普尔比团具体指东孟加拉的两个团。——编者注

公开提出要恢复帕兰杜尔·辛格这位前拉甲的王位。迪纳杰布尔和伦格布尔的哗变者在库埃尔·辛格的领导下,经由班达和纳戈德向贾巴尔普尔进军,并迫使雷瓦的拉甲在自己军队的压力下也与他们会合。在贾巴尔普尔本身,孟加拉军第五十二土著团离开兵营,带走了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们留下未走的伙伴的人质。据报道,瓜廖尔哗变者已渡过昌巴耳河,驻扎在该河和托尔布尔之间的某地。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几项最重要的报道。焦特布尔军团似乎已经投向距贝阿沃尔西南 90 英里的阿瓦赫的那位起义的拉甲了。这个军团击败了焦特布尔的拉甲派来对付它的人数不小的部队,还打死了一个将军和蒙克·梅森上尉,缴获了火炮三门。乔·圣帕·劳伦斯将军率领一部分纳西拉巴德部队向他们进攻,逼迫他们退入一个城镇,但是再想夺取这个城镇并没有成功。由于欧洲部队撤出信德,该地区已发动一场范围很广的密谋,至少有五个地方,包括海得拉巴、卡拉奇和希卡布尔,已在酝酿起义。在旁遮普也有不祥之兆,木尔坦和拉合尔之间的交通曾中断了八天。

在本报另一处,我们的读者可以看到一份英国 6 月 18 日以来派出部队的统计表³⁹⁷;各有关船只开到的日期,是我们根据官方材料计算出来的,因而是对英国政府有利的。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除了从陆路派去的少数炮兵和工兵分遣部队,乘船的部队共计 30 899 人,其中步兵 24 739 人,骑兵 3 826 人,炮兵 2 334 人。从表中还可看出:10 月底以前不会有大量援军开到。

派往印度的部队

下表所列为自 1857 年 6 月 18 日起从英国派往印度的部队

到达日期	合计	加尔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9 月 20 日	214	214	—	—	—	—
10 月 1 日	300	300	—	—	—	—
10 月 15 日	1 906	124	1 782	—	—	—
10 月 17 日	288	288	—	—	—	—
10 月 20 日	4 235	3 845	390	—	—	—
10 月 30 日	2 028	479	1 549	—	—	—
10 月份小计	8 757	5 036	3 721	—	—	—
11 月 1 日	3 495	1 234	1 629	—	632	—
11 月 5 日	879	879	—	—	—	—
11 月 10 日	2 700	904	340	400	1 056	—
11 月 12 日	1 633	1 633	—	—	—	—
11 月 15 日	2 610	2 132	478	—	—	—
11 月 19 日	234	—	—	—	234	—
11 月 20 日	1 216	—	278	938	—	—
11 月 24 日	406	—	406	—	—	—
11 月 25 日	1 276	—	—	—	—	1 276
11 月 30 日	666	—	462	204	—	—
11 月份小计	15 115	6 782	3 593	1 542	1 922	1 276
12 月 1 日	354	—	—	354	—	—
12 月 5 日	459	—	—	201	—	258
12 月 10 日	1 758	—	607	—	1 151	—
12 月 14 日	1 057	—	—	1 057	—	—
12 月 15 日	948	—	—	647	301	—

到达日期	合计	加尔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12月20日	693	185	—	300	208	—
12月25日	624	—	—	—	624	—
12月份小计	5 893	185	607	2 559	2 284	258
1月1日	340	—	—	340	—	—
1月5日	220	—	—	—	—	220
1月15日	140	—	—	—	—	140
1月20日	220	—	—	—	—	220
1月份小计	920	—	—	340	—	580
9月至1月20日	30 899	12 217	7 921	4 441	4 206	2 114
由陆路派去的部队						
10月2日	工兵 235 名	117	—	—	118	—
10月12日	炮兵 221 名	221	—	—	—	—
10月14日	工兵 244 名	122	—	—	122	—
10月份小计	700	460	—	—	240	—
合计					31 599	
绕道好望角前去的部分已经到达的部队					4 000	
总计					35 599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1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布吕讷³⁹⁸

布吕讷, 吉约姆·玛丽·安娜——法兰西帝国元帅, 1763年3月13日生于布里夫拉盖亚尔德, 1815年8月2日卒于阿维尼翁。他的父亲曾送他去巴黎学习法律, 但离开大学后, 因经济困难而当了一名印刷工人。革命初期, 他同戈蒂埃、茹尔尼亚克·德·圣梅阿尔一起出版《农村和城市总汇报》。不久他加入革命政党, 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 并成为科尔德利俱乐部³⁹⁹的一名热心的会员。他魁梧的身材、威武的仪表和强烈的爱国心, 使他成为1791年玛尔斯广场示威⁴⁰⁰时人民的军事领袖之一, 这次示威遭到拉斐德的国民自卫军镇压。他身陷囹圄, 谣传保皇派企图以卑鄙手段除掉他, 这时幸亏丹东把他营救出来。他成为丹东的热心的拥护者, 由于后者的保荐, 他在著名的1792年九月事变⁴⁰¹中被委以军职, 并于1792年10月12日出人意料地被擢升为上校副官。在比利时, 他在杜木里埃手下服务; 曾被派去对付在皮塞将军指挥下进攻巴黎的卡尔瓦多斯省的联邦派, 而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后来, 他晋升为准将, 参加了翁斯科特会战⁴⁰²。救国委员会⁴⁰³派他去平定吉伦特省的叛乱⁴⁰⁴, 他极其严厉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丹东入狱后, 人们期待他快去营救他的这位朋友和庇护人, 但是

他一看到有风险,便审慎地袖手旁观,得以在恐怖时期保全了自己。热月九日²⁶⁷后,他又归附当时已取得胜利的丹东派⁴⁰⁵,随同弗雷隆去马赛和阿维尼翁。葡月十三日(1795年10月5日),他作为波拿巴麾下的一名准将镇压巴黎市区的叛乱⁴⁰⁶。他在帮助督政府³⁰⁶粉碎格勒内勒兵营密谋(1796年9月9日)⁴⁰⁷之后,加入了意大利军团的马塞纳师,在整个战争期间表现英勇。波拿巴为了笼络科尔德利派的首领们,把自己在里沃利会战³⁶⁷中的部分功绩归之于布吕讷的努力,在战场上提升他为师长,并敦促督政府派他担任意大利军团第二师师长,当时这个职位因奥热罗去巴黎而空缺。

坎波福米奥和约³⁰⁹签订以后,督政府交给他的使命是首先麻痹瑞士人,让他们感到可以高枕无忧,然后分裂他们的市政会,最后,集结军队进攻伯尔尼州,并夺取它的公共金库。当时布吕讷根本没有考虑要把虏获的财物登记造册。他再次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迫使撒丁国王卡尔-艾曼努埃尔这个法国的假盟友拱手交出都灵卫城(1798年7月3日)。持续大约两个月之久的巴达维亚战役⁴⁰⁸,是布吕讷军事生涯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次战役中,他击败了约克公爵指挥的英俄联军,约克公爵向他投降,并保证把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被英军俘虏的法军战俘全部遣返。雾月十八日政变²⁷¹以后,波拿巴委任布吕讷为新成立的国务会议成员,随后又派他去对付布列塔尼的保皇党人。

1800年布吕讷被派到意大利军团,他占领敌人在沃尔塔河边构筑的三个营垒,把敌人赶过河,并准备立即渡河。根据他的命令,军团应在两个地点渡河:杜邦将军指挥的右翼在沃尔塔河畔的一个磨坊和波佐洛村之间渡河;布吕讷本人指挥的左翼在蒙巴宗附近渡河。当时第二部分的行动遇到困难,布吕讷下令将其推迟24小时执行,

虽然在另一地点开始渡河的右翼已经与占尽优势的奥军交火了。全靠杜邦将军的奋战，右翼才没有被歼灭或被俘，从而危及整个战役的胜利。他因这次重大失误而被召回巴黎。

从1802年到180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表现乏善可陈，因为他的外交才能在那里不像在瑞士和皮埃蒙特那样有刺刀作为后盾。1804年12月返回巴黎，拿破仑封他为元帅，对他的器重超过了勒库尔布等那些将军。他一度任布洛涅兵营⁴⁰⁹的司令官，1807年，被派到汉堡，任汉撒各城市的总督兼大军预备队司令。他以这个身份积极协助布里安搜刮钱财。为了解决在施拉特科与瑞典签订的休战协定中的某些有争议的条款，他与古斯塔夫国王进行长时间的私人会谈，后者其实在建议他背叛自己的主子。他拒绝这个建议的方式引起了拿破仑的怀疑，使这位皇帝大发雷霆，因为布吕讷在草拟关于吕根岛移交法军的协定时只把法军和瑞典军称做缔约双方，而根本没有提及“皇帝和国王陛下”。布吕讷立即被贝尔蒂埃的一封信召回，贝尔蒂埃根据拿破仑的特别指示在信中指出：

“自法拉蒙德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

他回到法国以后，便退隐幽居。1814年，他对元老院的法令⁴¹⁰表示拥护，并从路易十八那里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在百日⁴¹¹时期，他又成了一个波拿巴分子，被任命为驻瓦尔河地区的监视部队司令官，在那里，他又像他当年当雅各宾党人那样坚决无情地镇压保皇党人。滑铁卢会战¹⁵⁹以后，他又对国王^①百般颂扬。他从土伦去巴黎的途中，于8月2日抵达阿维尼翁，当时该城已遭保皇党暴徒烧杀

① 路易十八。——编者注

了15天。他被人认出后遭到枪杀。暴徒们拖起他的尸体穿过一条条街道,最后把它抛入罗讷河。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曾说:“布吕讷、马塞纳、奥热罗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勇敢的破坏者。”^①

关于布吕讷的军事才能,他指出:

“布吕讷有一定的功绩,但是总的说来,与其说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军人,不如说他是一位检阅台上的将军。”^②

1841年,在他的故乡人们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11月
3日前后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
版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年英文版第18卷翻译

-
- ① 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可能引自《布吕讷》,载于《军事名人传记》第1卷第243页。——编者注
- ② 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2卷第VII章第64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1844 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⁴¹²

本月 5 日,英格兰银行把最低贴现率从 10 月 19 日确定的 8% 提高到 9%。英格兰银行自从恢复现金支付以来向无先例的这种提高,据我们推测,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由于金银的外流以及所谓银行券储备的减少而引起的。金银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外流:黄金因我们这里的破产而流向美国,白银则流向东方,因为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而且政府还要给东印度公司直接汇款。为了换取这些必需的白银,不得不把黄金送往欧洲大陆。

至于谈到银行券储备以及它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须简短地提一提罗伯特·皮尔爵士的 1844 年银行法⁴¹³,这项法令不仅影响英国,而且影响美国和整个世界市场。罗伯特·皮尔爵士在银行家劳埃德(即如今的奥弗斯顿勋爵)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下,打算用他的银行法来实现纸币流通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纸币流通额的增减将完全遵循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这样,按照他及其拥护者的说法,今后就永远不会有金融危机了。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部:发行部和银行部,前者只是一个印制银行券的工厂,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发行部依法有权发行银行券 1 400 万英镑;这个数目被认为是实际流通额不会比它再少的最

低点,而且有英国政府对这家银行的债务作为保证。除了这 1 400 万,发行银行券必须在发行部的金库中存有同等数量的黄金作为保证。受这种限制的全部银行券交由银行部投入流通。因此,如果发行部的金库里有 1 000 万英镑的黄金储备,它就可以发行 2 400 万银行券,把它们交给银行部。如果实际流通额只有 2 000 万,那么保留在银行部钱柜里的其余 400 万就是它的银行券储备,这实际上就是私人和国家交托给银行部的存款的惟一保证。

现在假定说,黄金开始外流,从发行部连续取出不同数量的黄金,例如提取 400 万英镑的黄金。在这种情况下,400 万的银行券将被抵消;这时,发行部发行的银行券将完全等于流通中的银行券,而银行部钱柜里可支配的银行券储备就将化为乌有。这样,银行部就都没有一分钱来应对储户的提存要求,只好宣布自己无力支付。这就就会影响其公共团体和私人的存款,并因而不得不停止支付公债券持有人应得的季度红利。这样一来,银行部就很可能破产,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保存着 600 万英镑的黄金。这不仅仅是一个假定。在 1847 年 10 月 30 日,银行部的储备减少到 160 万英镑,而存款却多达 1 300 万英镑。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是靠政府实行财政上的政变才缓和下来,如果它再延续几天,这家银行的储备就会告罄,银行部就不得不停止支付,尽管发行部的金库还存有 600 多万英镑的黄金。

显然,黄金外流和银行券储备的减少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从发行部的金库提取黄金直接造成银行部的储备的减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惟恐银行部无力支付,便压缩信贷,提高贴现率。但是,贴现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储户从银行部提取存款,按当时的高利率去放债,而储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储户惴惴不安,也从银行部提取存款。这样,本来为了维持储备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使储备告罄。

读者在看到这种解释之后一定会了解,在英国,人们怀着怎样的焦急心情注视着英格兰银行储备的减少,以及最近一期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金融评论犯了多么大的错误。这篇文章说:

“那些一向反对银行法的人又蠢蠢欲动了,现在什么话都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制造恐慌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说那些闲置的银行券的储备已为数不多,这种储备一旦耗尽,英格兰银行就不得不完全停止贴现。”

实际上按照现行法律,它一旦破产也只能这样做。

“但实际情况是,英格兰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以和过去同样的规模继续贴现,因为它每天收进的期票当然平均总是跟它通常应该付出的数量一样的。它不可能扩大规模,但是,很难设想在目前到处紧缩业务的情况下,会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要求政府采取弥补措施是毫无理由的。”^①

这种说法玩了一个障眼法:它故意让人忽视了储户的存在。不必多加思索就会明白,如果银行部一旦对自己的债权人宣布破产,它就不能再以贴现或借贷的方式向债务人提供贷款了。简单地说,罗伯特·皮尔爵士吹嘘的银行法在平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困难时期在贸易危机造成的金融恐慌之外又加上这项法令引起的金融恐慌;而正当这项法令按照它所依据的原则应该产生良好效果的时候,它却要因政府的干预而暂停实行。在平时,英格兰银行依法发行的最高数量的银行券,从来没有完全进入实际流通,——银行部的钱柜在这种时候始终保有银行券储备已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这一点,只要把英格兰银行1847年至1857年的公报对比一下,甚至把1819年至1847年银行券的实际流通额同法定的最高量比较一下,就能证实

^① 《英格兰银行今日增加收费……》,载于1857年11月6日《泰晤士报》第22831号。——编者注

了。在困难时期,例如在1847年和今年,由于英格兰银行被任意地截然划分为两个部,黄金外流的后果就人为地加剧,利息的提高人为地加快,英格兰银行面临无力支付的危险不是由于它真的无力支付,而是由于它的一个部表面上无力支付。

当真正的金融衰退这样被人为的恐慌加剧并因而造成大量牺牲的时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这项法令恰好就在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只有它多少能起些作用的时候暂停实行了。例如,1847年10月23日,伦敦的一些大银行家曾前往唐宁街⁸⁹求援,要求停止实行皮尔法令。于是约翰·罗素勋爵和查理·伍德爵士给英格兰银行总裁和副总裁去了一封信^①,建议他们增加银行券的发行,即超过法定的最大流通额;当时,他们承担了破坏1844年法令的责任,声明他们准备在议会召开时向议会提出一项补偿法案。现在,这出滑稽戏又将重演,就像1847年10月23日那个周末的事态发展那样,当时眼看着似乎要全部停业,停止一切支付了。可见,皮尔法令的惟一优点就是:它使全国上下完全依赖一个贵族政府——一切取决于像帕麦斯顿这样的冒失鬼的喜好。所以阁员们才那样偏爱1844年法令,——它使他们得到了从未拥有过的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

我们这样详细地论述皮尔法令,是因为它现在对美国有影响,还因为它在英国可能要暂停实行;但是,如果看到英国政府能卸去它本身加在英国公众肩上的困难,就以为伦敦金融市场上将出现的现象,即金融恐慌的起伏跌宕,就是能准确衡量出英国贸易界不得不经受

① 约·罗素/查·伍德《致英格兰银行总裁詹姆斯·莫里斯和副总裁H.J.普雷斯科特。1847年10月25日》,载于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第449页。——编者注

的危机强度的寒暑表,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危机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

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消息最初传抵英国海岸时,英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一种即使不算巧妙至少也算新颖的理论。他们说,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咳!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太不健康。健康的贸易只存在于贸易的一方——真亏英国的经济学家想得出来!①看一看英国贸易部最近发表的 1857 年上半年的报告书②,你就会看到,英国出口的全部原料和工业品,30%运往美国,11%运往东印度,10%运往澳大利亚。如今,美国市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不再进英国货,最近两年供过于求的印度市场因爆发起义而严重瘫痪,澳大利亚市场也存货过多,各种英国货在阿德莱德、悉尼、墨尔本比在伦敦、曼彻斯特或格拉斯哥卖得还要便宜。那些突然失去买主而宣告破产的英国工厂主的健康状况,可由以下两个例子来判断。在格拉斯哥一家花布印染厂厂主的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发现这个厂主负债达 116 000 英镑,而资产尚不足 7 000 英镑。同样,格拉斯哥的一个船主,负债 11 800 英镑,而全部资产不过 789 英镑。但是,这还只是一些个别现象;重要的是: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状态的震荡。美国 1837 年和 1839 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 1836 年的 12 425 601 英镑缩减到 1837 年的 4 695 225 英镑,在 1838 年缩减到 7 585 760 英镑,在 1842 年缩减到 3 562 000 英

① 参看 1857 年 10 月 20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② 《不列颠和爱尔兰工农业出口产品申报价格清单》,载于 1857 年 9 月 5 日《经济学家》第 732 期。——编者注

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已经开始了。它在当前无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1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震荡⁴¹⁴

英国贸易的震荡在其广泛发展过程中看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形式：伦敦和利物浦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萎缩不振，苏格兰银行业发生恐慌，各制造业地区的工业衰败萧条。这些事实，在我们星期五^①的报纸上已经以大量英国报纸摘要的形式作了详细叙述。但是它们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发生的后果还需要进一步阐明。

虽然，正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所预料的^②，政府终于被迫宣布1844年银行法暂停实行，而在此以前，这家银行为了挽救自己，已经大胆地坑害了许多主顾。但是，11月11日晚，英格兰银行的首脑人物终于举行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向政府求援；得到的答复就是暂停实行银行法的各项条款。政府的这项命令将立刻提交应该在月底召开的议会批准。如我们此前已指出的，暂停实行必然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所缓解。这样做就消除了银行法在贸易震荡时期金融市场的自然紧张之外所造成的人为的紧张。⁴¹⁵

在目前这次危机的进程中，英格兰银行妄图力挽狂澜，曾五次提

① 1857年11月27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7—478页。——编者注

高贴现率。上月8日,贴现率提高到6%,12日提高到7%,22日提高到8%;本月5日提高到9%,9日提高到10%。这样迅速的变动,与1847年危机时形成惊人的对照。当时,最低贴现率在4月曾提高到5%,在7月提高到5.5%,在10月23日才提高到最高点即8%。此后在11月20日就降到7%,在12月4日降到6%,在12月25日降到5%。此后的五年,是贴现率不断下降的时期,它均匀地下降,就像是按计算尺的滑动在进行。这样,在1852年6月26日,它达到了最低点,即2%。接下去的五年,从1852年到1857年,又出现了相反的变动。1853年1月8日的贴现率是2.5%,1853年10月1日是5%,从此以后,经过连续多次的变化,它终于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迄今为止,过去十年中利率的上下波动,对现代商业中周期性地出现的各个阶段来说只是一种常有的现象。简单地说,这些阶段就是在恐慌年份信贷极度收缩之后,开始是逐渐膨胀,在利率降到最低点时,膨胀达到最高限度;然后又开始相反的变动,即开始逐渐收缩,在利率涨到最高限度时,收缩达到最高点,于是恐慌年份再次开始。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目前这个时期的后半段,有些现象根本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在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伦敦的利率摇摆于3%和4%之间,也就是说,整个这段时期是信贷利息较低的时期。当1847年4月10日利率上升到5%时,危机已经开始,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危机的普遍爆发才推迟了几个月。另一方面,在1854年5月6日已经达到5.5%的利率,后来又连续下降到5%、4.5%、4%和3.5%;从1855年6月16日到9月8日,利率一直是3.5%。然后它又朝着相反的方向同样变化,上升到4%、4.5%、5%,到1855年10月又达到1854年5月开始变动时的水平,即5.5%。两个星期以后,1855年10月20日,短期期票的利

率上升到6%，长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7%。但是接着又开始倒退。在1856年，利率有降有升，到1856年10月，又达到6%和7%，也就是说，达到了上一年10月的水平。1856年11月15日，它上升到7%，但是其间屡次出现不规则的、往往是间歇性的向下波动，有三个月低到5.5%。直到今年10月12日它才恢复到原先的高度即7%，因为这时美国的危机开始影响英国。从此以后，利率不断地迅速增长，以致最后贴现几乎完全停止。

换句话说，在1848年至1857年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利率的波动更加剧烈更加频繁地周期性地出现；从1855年10月到1857年10月，这两年货币奇缺，利率在从5.5%到7%这个范围内来回波动。同时，尽管利率很高，生产和交换仍然以从未想到的速度不停地发展。一方面，所以出现这种例外现象，也许是因为黄金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及时流入，才使英格兰银行不时地放松一下控制；另一方面，很显然，危机本应该在1855年10月就开始，它由于一系列短暂的动荡而被推迟了，因此，它的最后爆发，无论就症状的强度或波及的范围而言，都将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利率在1855年10月20日、1856年10月4日和1857年10月12日周期性地回涨到7%，这个奇怪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上述论点，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英国在1854年已经有过一次崩溃的先兆，欧洲大陆在1855年10月和1856年10月已经反复出现过恐慌的迹象。然而，总的说来，姑且不谈这些使事态日益严重的情况，1848年至1857年这个时期是与1826年至1836年和1837年至1847年这两个时期很相似的。

的确，我们被告知，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是，如果说别的什么都还没有得到证实的话，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鼓吹自由贸易的医师们只不过是些骗人的庸医。就像以往各

个时期一样，连年丰收之后，随着是连年的歉收。尽管有自由贸易这副灵丹妙药，英国的小麦和其他各种农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在 1853 年至 1857 年甚至高于 1820 年至 1853 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尽管谷价高昂，工业却得到空前的发展，而现在，似乎是要使任何借口无立足之地，尽管农业丰收，工业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崩溃。

我们的读者当然明白，英格兰银行目前这种 10% 的贴现率只是名义上的，在伦敦，为第一流票据实际上支付的利息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每日新闻》写道：“在自由市场上，收取的贴现率远远超过了英格兰银行的牌价。”

《纪事晨报》写道：“英格兰银行自己也不按 10% 的利率办理贴现，除非是在极少数情况下，——那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室外交易中所收取的与官方牌价相差太远了。”

《先驱晨报》写道：“至于二三流的票据，不论按任何条件，都不能通融，这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地球报》说：“这样商务就陷于停顿；资产超过负债的公司也纷纷倒闭；似乎要发生一场普遍的商业革命。”

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由于美国产品的涌入，产品市场上的各种货物都降价了。在几个星期之内，利物浦的棉花价格跌了 20%—25%，食糖跌了 25%，谷物跌了 25%，咖啡、硝石、油脂、皮革等也都随之降价。

《晨邮报》写道：“期票贴现和产品抵押贷款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旗帜报》写道：“在明辛街^①，贸易一片混乱。除了以货换货，不可能销售

① 明辛街(Mincing Lane)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编者注

任何商品；根本没有人使用货币。”

但是如果苏格兰的银行界没有发生恐慌，这一切灾难也许就不会使英格兰银行很快屈服。在格拉斯哥，西区银行的倒闭以及随后格拉斯哥市银行的倒闭，促使中等阶级中的储户和工人阶级中的银行券持有者纷纷向银行挤兑提款，结果发生了骚动，格拉斯哥的市长大人不得不向刺刀求援。格拉斯哥市银行有幸在阿盖尔公爵这位大人物的管理之下，拥有实付资本 100 万英镑，储备金 90 595 英镑，有 96 个分行分布在全国各地。它可以发行货币 72 921 英镑，苏格兰西区银行可以发行 225 292 英镑，总共为 298 213 英镑，占苏格兰全部核定流通手段的将近十分之一。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大部分是农村居民的小额存款。

苏格兰的恐慌自然波及英格兰银行；它 11 月 11 日从金库提出 30 万英镑，11 月 12 日又提出 60 万到 70 万英镑汇往苏格兰。此外，还为爱尔兰的一些银行提出了几笔款项，英国的一些地方银行也抽回了大量存款，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已处于破产的边缘。也许，普遍危机只不过是给上述这两家苏格兰银行提供了一个光荣倒台的借口，因为这两家银行早已彻底腐烂了。尽管如此，经受住了 1825—1826 年、1836—1837 年和 1847 年摧垮英国和爱尔兰各家银行的风暴的著名的苏格兰银行系统，自从 1845 年苏格兰被迫实行皮尔法令以来，事实上还是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挤兑；第一次在那里听到“要黄金，不要纸币”的呼喊声；在爱丁堡，甚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也第一次遭到拒收。那些替皮尔的银行法辩护的人认为，它即使不能根本避免金融危机，至少能保证流通中的银行券的兑换，——这种想法现在破灭了；银行券持有者也分享了储户的命运。

至于英国制造业地区的一般状况,下面两段文字描述得是再好不过了——一段是摘自《经济学家》杂志上刊载的曼彻斯特贸易通报,另一段是摘自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的一封来自麦克斯菲尔德的私人信件。曼彻斯特通报对最近五年的棉花贸易作了一番比较,然后接着说道:

“本周内,价格逐日迅速下跌。多种物品不能标价,因为没有买主;而且即使标了价,这种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实际需求,还不如说取决于货主的处境和顾虑。当前根本没有什么需求。国内市场上,存货堆积,今年冬天也难望销完。”^①

关于国外市场存货过多的情形,通报当然没有谈起。

“现在到处都迫于必要缩短了工作时间,估计目前在整个生产部门中已有五分之一以上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反对广泛实行这种办法的抗议,一天比一天减少,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把工厂完全关闭一个时期是否更好一些。”^①

麦克斯菲尔德的来信者说道:

“至少有 5 000 名熟练的手工工匠及其家眷,每天清早起床后不知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只好向济贫院求助。他们都是体力强壮的贫民,只好或者去做碎石工作,每天领 4 个便士,或者到习艺所去接受罪犯般的待遇,去吃那份从墙壁上一个小洞递送的不卫生的少量食物。要那些双手只会操作纤细物质即纺织丝绸的人去做碎石工作,就等于对他们拒绝帮助。”^②

一些英国的作者认为,英国的这次危机与 1847 年的危机相比,

① 《工业地区的市场。曼彻斯特,11月5日星期四晚》,载于1857年11月7日《经济学家》第741期。——编者注

② 《麦克斯菲尔德。1857年11月5日》,载于1857年11月11日《自由新闻》第20号。——编者注

有一个优点,它没有形成大量吸收资本的投机,例如铁路股票的投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英国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国,都大量参与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们的过剩资本主要投于工厂企业,所以目前这次动荡比以往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从而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在欧洲大陆,这种传染病从瑞典蔓延到意大利,从马德里蔓延到佩斯。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汉堡这个关税同盟⁴¹⁶的最大进出口贸易中心、北德意志的主要金融市场。至于法国,法兰西银行已经把它贴现率抬高到英国的水平;禁止谷物出口的法令也作废了⁴¹⁷;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接到秘密警告,不许发表悲观沮丧的观点;金银兑换商都受到宪兵的威胁;路易·波拿巴本人也在一封口气浮夸的信^①中昭示他的臣民:他并没有感到须要进行一场财政上的政变,因此,“灾祸只存在于想像之中”⁴¹⁸。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13 日

载于 1857 年 11 月 30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518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拿破仑第三给财政大臣的信。1857 年 11 月 10 日》,载于 1857 年 11 月 11 日《总汇通报》第 315 号。——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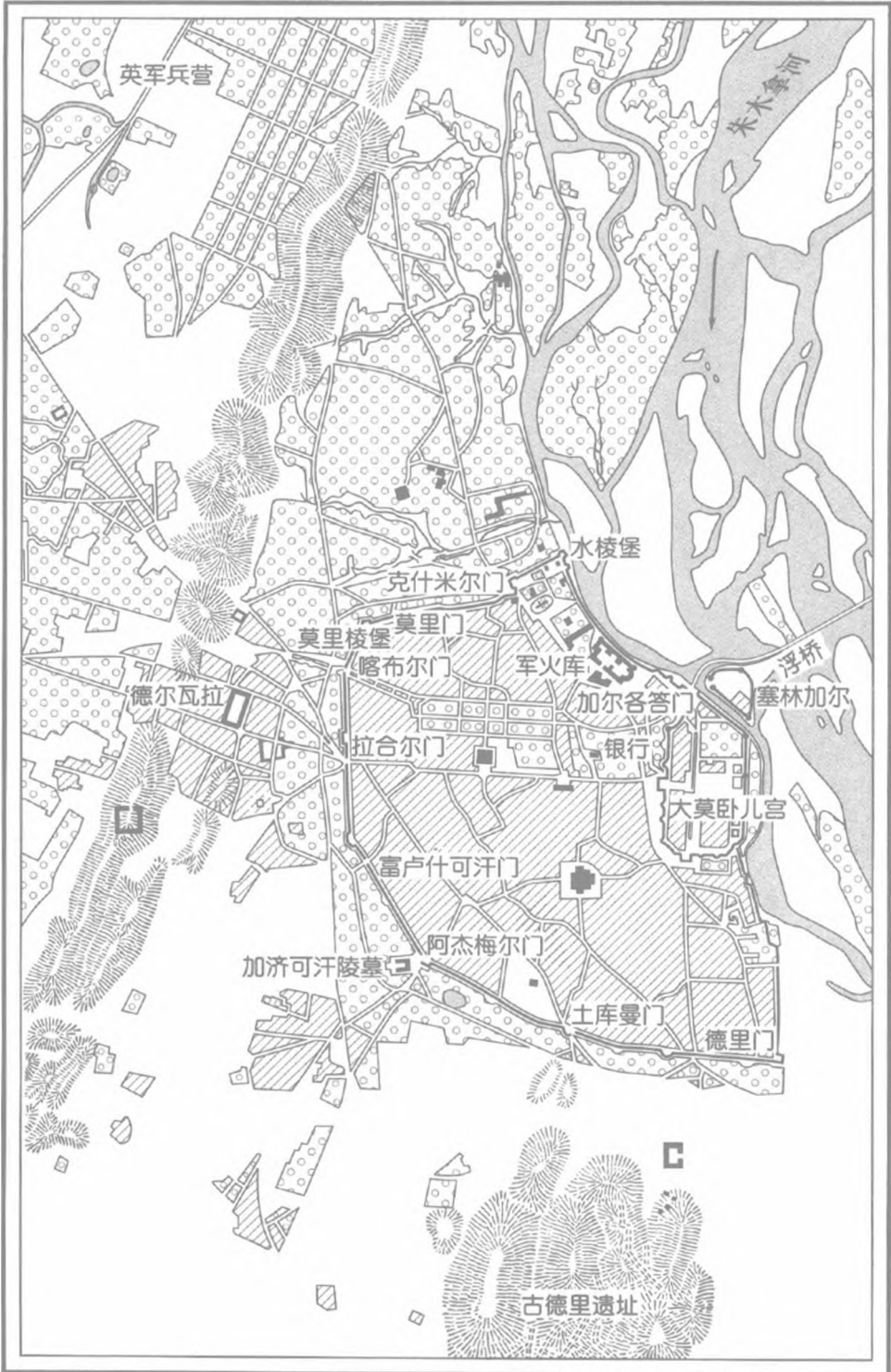
弗·恩格斯

*德里的攻占

我们不想参加目前在大不列颠举行的这场把攻克德里的军队的勇敢行为捧上天的乱嘈嘈的大合唱。在自我赞美方面，特别是在赞美自己的勇敢方面，没有人，甚至法国人，能够同英国人相比。然而，对实际情况略作分析，十之八九很快就能看出所炫耀的这种英勇精神原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因此，每一个正常的人必定会厌恶英国老爷们这种借别人的勇敢来抬高自己的行为；这些英国老爷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对于使他们冒最小的风险去获取战功的任何事情都绝对不愿意去做，却想把强攻德里时所表现的确实是勇敢、但并不是那么非凡的勇敢算上自己一份。

如果把德里同塞瓦斯托波尔比较一下，我们当然承认：西帕依不能与俄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对英军兵营的任何一次出击都完全不能同因克尔曼²³⁴相比；在德里没有托特列本；不管每一个西帕依⁶⁷和每一个连在大多数场合下作战如何英勇，但是他们不仅所有的旅和师，而且几乎所有的营，都没有任何统一的指挥；因此他们的协同动作不超出连的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科学知识，而如今军队没有这种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根本无法守住城市。虽然如此，在人数和作战手段方面的悬殊，西帕依比欧洲兵更能适应气候的优势，德里城下的军队在数

1857年的德里





量上有时出现的极端劣势，——所有这一切抵消了许多差别，使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两次围攻(姑且把这些行动称为围攻)加以比较。再说一遍，我们并不认为强攻德里是一件不平凡的或特别英勇的壮举，虽然这一次，和在所有的战斗中一样，双方无疑都有个别比较出色的行动，但我们还是认为，德里城下的英印军队所表现的坚韧、刚毅、判断能力和技巧，要胜过英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³⁶¹的那次考验中的表现。当时，英军在因克尔曼会战之后已经完全准备退回船上，如果不是为了法军，他们无疑会这样做。但是围攻德里的军队却不然，季节和因季节而产生的要命的疫病、交通的断绝、迅速获得援军的无望以及整个上印度的形势，曾迫使他们准备撤退，他们也确实考虑过采取这一步骤，但最终他们还是坚持留在了那里。

当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支机动纵队。当时只有两支部队可供使用，一支是哈夫洛克的小部队，但不久它就显得力不胜任；另一支是德里城下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兵德里城下，与难以攻破的敌人作无谓的战斗而消耗现有的力量，就犯了军事上的错误；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驻时多三倍的价值；这样它就可以肃清除德里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复交通，粉碎起义者集中兵力的各种企图，然后，德里的陷落就会是自然而然、轻而易举的了，——所有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对德里的围攻不能解除。应该受谴责的是大本营中那些自作聪明把军队派到德里去的人，而不是这支既被派去就在那里坚持下去的军队。同时应当指出，雨季对这支军队的影响比预料的要轻微得多，如果在这样的季节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引发的疫病达到通常的程度，军队就非撤退或瓦解不可。军队的危险处境一直持续到8月底。以后，援军开始到达；同时内讧继续削弱起义者的阵营。9月

初,攻城炮兵纵列到达,英国人就由守势转入攻势。9月7日,第一个炮兵连开火了,13日晚在城墙上打开了两个可以通过的缺口。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在这方面,如果只看威尔逊将军的官方报告,我们简直如堕五里雾中。这份报告混乱不清,就像在克里木战争³⁸时英军司令部所发表的那些文件一样。谁也无法根据这个报告来判定上述两个缺口的位置或强攻纵队各自的位置和队形。至于一些私人的报道,当然更是混乱不堪了。幸好在那些训练有素、理应享有几乎整个胜利荣誉的孟加拉工兵和炮兵军官中,有一位军官在《孟买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事情经过的报道^①,文章既简洁而朴实无华,又清晰而条理分明。在整个克里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英国军官能写出这样切实的报道。可惜,他在强攻的第一天就负了伤,他的通讯也就从此结束。因此,以后的事情,我们又完全不清楚了。

英国人曾加固过德里的城防,那只是为了能抵御亚洲军队的围攻。就我们现代的概念来说,德里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要塞,它只能抵御野战部队的强攻。它的石砌城墙高16英尺,厚12英尺,上面有厚3英尺高8英尺的胸墙,除了胸墙,高6英尺的石砌部分没有斜堤掩护,暴露在攻击者的直射火力之下。这道石砌垒墙很狭窄,除了一些棱堡和圆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火炮。棱堡和炮塔不能充分地以侧射火力掩护幕墙,同时因为攻城炮不难把3英尺厚的胸墙摧毁(野战炮可以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压制住防守者的火力,特别是压制住对护城壕进行侧射的火炮。在城墙和护城壕之间有一条很宽的护堤或平堤,容易造成一个可以通过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护城壕对

^① 《印度》,载于1857年11月16日《泰晤士报》第22839号。——编者注

任何陷入其中的队伍来说,不但不能成为陷阱,反而成为在进攻斜堤时乱了队形的队伍休整的场所。

按照围攻的原则,利用正规的堑壕向这样一个地点进攻,即使具备最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有足够的兵力把这个地点团团围住,也是荒谬绝伦的。鉴于防御工事的情况,鉴于防守者组织涣散,士气低落,除了已经采取的这种攻城法,使用任何其他方法都会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方法就是军人所熟知的强攻法(*attaque de vive force*)。既然防御工事只能抵御没有重炮的围攻者以暴露的兵力进行的攻击,那就要直接用火炮来加以轰击;同时,对城的内部也不断进行炮轰,一当城墙上的缺口能够通过时,部队就立刻向前实行强攻。

攻击的正面是正对着英军兵营的北城墙。这个地带有两个幕墙和三个棱堡,在居中的棱堡(克什米尔棱堡)形成一个稍稍内缩的凹角。东段即从克什米尔棱堡到水棱堡,比克什米尔棱堡和摩里棱堡之间的西段稍短而且稍向前突出。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前面的地带有一些未被西帕依夷平的矮丛林、菜园、房屋等等,进攻时可以借以掩蔽。(这个情况说明为什么英军常常能在要塞的炮口下追击西帕依。当时这被认为是无比英勇,其实他们有这些东西作掩护,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此外,距该正面约四五百码的地方,沿城墙有一道深沟,成为一道进攻用的天然的平行壕。再者,这条河可以作为英军左翼的极好的依托,因而选择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稍微向前突出的部位作为主攻点,是非常合适的。对西段幕墙和棱堡同时进行佯攻,这一机动很有成效,吸引了西帕依的主力。西帕依在喀布尔门外编成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威胁英军右翼。如果摩里棱堡和克什米尔棱堡之间的西段幕墙是最危险的地点,他们这一机动就会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有效的。西帕依的侧防阵地作为一种积极防御的手段是很

有力的，因为这一支兵力向前运动就能立即对每一个强攻纵队进行侧击。但是这个阵地对于东面位于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的那段幕墙却未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占领这个阵地，就使守军的精锐力量离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炮兵连阵地的选择、构筑、装备以及使用方法，都值得大加称赞。英军约有 50 门火炮和白炮，集中为一些强大的炮兵连，隐蔽在坚实的胸墙后面。根据官方报道，西帕依在被攻击的地段有 55 门火炮，但是都分散在小的棱堡和圆堡里，不能集中使用，而且只有可怜的 3 英尺高的胸墙勉强掩护着。毫无问题，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足以把防守者的火力压制下去，此后要做的事也就不多了。

8 日，第一炮兵连(10 门火炮)在离城墙 700 码的地方开火。当天夜间，上述的那条沟已被加修成一道堑壕。9 日，这条沟前面的起伏地和房屋未经抵抗即被占领。10 日，第二炮兵连(8 门火炮)投入战斗，这个炮兵连距离城墙五六百码。11 日，大胆而巧妙地配置在距水棱堡 200 码的一处起伏地上的第三炮兵连，开始用 6 门火炮射击，同时用 10 门重白炮轰击城区。13 日晚，据报告说，已经出现两个缺口——一个在与克什米尔棱堡右侧相邻的幕墙上，另一个在水棱堡的左正面和左侧——可以通过云梯攻城，于是即下令强攻。西帕依 11 日已经在两个受威胁的棱堡之间的斜堤上挖掘了一条反接近壕，并且在英军炮队前面约 350 码处挖掘了一条散兵壕。他们还从喀布尔门外的远处阵地前进实行侧面攻击。但是这些积极防御的企图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相互间的联系，也缺乏高昂的士气，因而没有取得成果。

14 日拂晓，英军五个纵队投入攻击。右翼上的一个纵队应与喀布尔门外的队伍接战，得手后即向拉合尔门进攻。给每一个缺口派

了一个纵队,另一个纵队被派去进攻要加以爆破的克什米尔门,还有一个纵队作为预备队。除第一队外,各纵队的行动都成功了。缺口处防守薄弱,但是城墙附近房屋内的抵抗却非常顽强。一个工兵军官和三个工兵士官以英勇的行动(确实是英勇的行动)炸开了克什米尔门,所以这个纵队也突入城内。到傍晚时,整个北段都落入英军手中。但是,威尔逊将军在这里停止前进。漫无秩序的冲杀停止了,火炮被调上来,向城内每一个据点射击。除了攻打军火库外,看来很少有真正的战斗。起义者士气沮丧,开始成批地弃城而去。于是威尔逊谨慎地向城内推进,17日以后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20日占领了全城。

我们已经谈了关于进攻行动的意见。至于守方,那么采取攻势的对抗性运动的企图、喀布尔门附近的侧防阵地、反接近壕、散兵壕,——这一切都说明:西帕依已经理解了科学作战方法的某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不是还不够清楚,便是还不够深刻,因而未被有效地运用。这些概念究竟出自印度人本身,还是出自和他们合作的一些欧洲人,当然很难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管这些企图在执行上还不完善,然而基本上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积极防御十分近似;同时从这些企图的执行情况来看很像是某个欧洲军官给西帕依制定了正确的计划,可是由于他们未能完全领会它的精神,或者是由于组织松懈和缺乏指挥,实际的执行计划都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1月
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12月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8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年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毕 若⁴¹⁹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伊斯利公爵——法国元帅,1784年10月生于利摩日,1849年6月10日卒于巴黎。1804年作为一名列兵加入法国军队,1805年战争时期⁴²⁰为下士,在普鲁士和波兰战争时期(1806—1807年)为少尉,1811年参加莱里达、托尔托萨和塔拉戈纳围攻战时为少校,在加泰罗尼亚的奥尔达尔河会战以后晋升为中校⁴²¹。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以后,毕若上校写了几首歌颂白百合花^①的蹩脚的诗,但人们对他的这些多情的诗作不屑一顾,于是在百日⁴¹¹时期他又投奔了拿破仑,后者派他到阿尔卑斯军团去指挥第十四基干团。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退隐于埃克斯西德伊他父亲的庄园。在昂古莱姆公爵入侵西班牙⁴²²时期,他表示愿为波旁王朝效劳,但是他的表示遭到拒绝,他因此成为自由派,并参加了那场最后导致1830年革命的运动。

1831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路易-菲力浦提升为少将。1833年他被任命为布莱卫城司令,受命监视贝里公爵夫人,但是他执行这项使命的方法很不光彩,所以以后被人称为“布莱的前任狱

①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编者注

吏”。1834年1月25日^①，在众议院辩论时，拉腊比先生指责苏尔特的军事独裁，毕若打断他的话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另一位议员杜隆先生嘲弄地问道：“要是命令他去当狱吏，那怎么办呢？”这场冲突引起了毕若和杜隆之间的一场决斗，后者在决斗时被打死。这件事使巴黎人十分愤慨，这种愤慨因毕若参加镇压1834年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⁴²³而更加强烈。镇压起义的部队分为三个旅，其中一个旅由毕若指挥。14日早晨，在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之后，少量还在特朗斯诺南街上坚守街垒的热情的起义者遭到占压倒优势的部队的残酷屠杀。虽然这个地点不在毕若旅的管辖范围之内，因而他也没有参与这次杀戮，但人民出于义愤，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件事连在一起，不管有些人怎样反对，还是坚决把他指斥为“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

1836年6月6日，毕若将军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令，几乎不受总督管辖。在接到与阿卜杜尔·卡迪尔作战并派出强大的部队以迫使对方屈服的命令后，他签订了塔夫纳条约⁴²⁴，从而坐失战机，使自己的军队在开始行动以前就处于危急状态。在签订条约以前，他曾进行过几次战斗。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应付给毕若将军3万布若（约合12000美元）。他被调回法国以后升为中将，并被任命为荣誉军团的高级将领。塔夫纳条约的那项秘密条款被曝光以后，路易-菲力浦批准毕若出资建造几条公用道路，以提高他在选民中的声誉，保住他在众议院的席位。

1841年初，毕若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他是第一个拥有一支归他统率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为16日。——编者注

的、足以完成任务的军队的总督,对下属将领有绝对权威,并且任职时间很长,足够完成需要若干年才能实现的计划。在伊斯利河会战(1844年8月14日)时,他以远远处于劣势的兵力击败了摩洛哥皇帝^①的军队。他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对伊斯兰教徒发动突然袭击。⁴²⁵1843年7月17日,已获得法国元帅称号的毕若被封为伊斯利公爵。在他返回法国以后,阿卜杜尔·卡迪尔再次集结军队,所以他又被派回阿尔及利亚,迅速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因而同基佐发生分歧⁴²⁶,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按照基佐的说法,这是要“使他能回来在法国享受荣誉”。

根据基佐的秘密建议,路易-菲力浦于1848年2月23日夜间接见毕若,任命他为包括基干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在内的全部武装力量的总指挥。24日中午,在吕利埃尔、贝多、拉莫里谢尔、德·萨尔、圣阿尔诺以及其他一些将军的陪同下,他到土伊勒里宫的总参谋部隆重地接受由奈穆尔亲王授予的总指挥职位。他对在场的军官们说,他“无论在战场上或在镇压叛乱时,从未遭到失败”,这一次带领他们去镇压巴黎革命者,也保证要迅速除掉这些“反叛的暴民”。然而他被任命的消息一经传出,事态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国民自卫军对任命他担任总指挥尤为不满,他们高呼:“打倒毕若!”,“打倒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并断然宣称,他们决不服从他的命令。路易-菲力浦被这次示威吓破了胆,只得收回成命,并在当天进行了没有结果的谈判。2月24日毕若成为路易-菲力浦的顾问中惟一坚持继续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人;但是国王已经认为,只有牺牲这位元帅才能同

① 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尔·拉曼。——编者注

国民自卫军取得和解。因此统帅权转入他人之手，毕若被免职。两天以后，他表示愿为临时政府⁴²⁷效劳，但是没有被接受。

路易-拿破仑当总统时，任命毕若为阿尔卑斯军团总司令；他还下夏朗德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发表过一些著作，内容主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⁴²⁸。1852年8月，在阿尔及尔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另一座纪念碑建立在他的家乡。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57 年
11 月 27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
版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年英文版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危机

当我们在大洋此岸奏响那后来震撼全球的宏大的破产交响乐的小小前奏曲时，我们那位性情怪僻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却高奏以英国贸易“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变奏曲。但是现在该报已换了另一种低沉忧郁的曲调。该报在欧罗巴号轮船昨天运抵我们这幸福之岸的最近一期即11月26日这一期上宣称：“英国的经商阶级已经病入膏肓。”接着，它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

“正是繁荣结束前的八年或十年中的那种混乱无序，导致了最可怕的灾难。正是由于造就出一群冒险的投机分子和专门开空头期票的人，并把他们誉为英国人勇于进取的榜样，因而人们不再相信靠诚实经营稳步致富，——正是这一切成为万恶之源。……这样形成的一个个腐烂的病灶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不想研究十年来一直强调贸易动荡时代已随着自由贸易的实行而永远结束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如今是否有理由从现代生财之道的热情歌颂者，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对它大加挑剔的罗马监察官。不过，以下这份提交最近在苏格兰举行的债权人会议的材料，倒可以作为对英国贸易“健康”的切实的注脚。

约翰·蒙蒂斯合股公司, 负债超过资产	430 000 英镑
麦克唐纳兄弟公司	334 000 英镑
戈弗雷-帕蒂森合股公司	240 000 英镑
威廉·斯密斯合股公司	104 000 英镑
特勒赫斯-鲁宾逊合股公司	75 000 英镑

共 计

1 183 000 英镑

《北不列颠邮报》说,“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按照破产者自己提供的数字,这五家公司的债权人就损失了 1 183 000 英镑。”

但是,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所以,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说在某一个贸易时期临近终结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预示崩溃将至的先兆,那么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产生的,因此它本身是一种结果,一种非本质的事物,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有些政治经济学家试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的有规律的痉挛,就像那些如今已经绝种的自然哲学家学派那样,把发烧看做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

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①,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说,大不列颠对我们在美国出现的崩溃的反应最初表现为金融恐慌,随之是产品市场普遍萧条,最后才出现制造业的衰退,如今则最上面是工业危机,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如果说,伦敦曾一度是大火灾的中心,那么,现在却是曼彻斯特了。英国工业曾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动荡,而且是惟一引起巨大

① 见本卷第 486—487 页。——编者注

社会变化的动荡,是 1838 年至 1843 年的工业衰退,与之相伴随的是,金融市场在 1839 年的一个短时间内一度收缩,但在大部分时间内利率一直很低,甚至降到 2.5% 和 2%。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伦敦金融市场情况的相对好转是它彻底复元的征兆,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决不反映贸易危机的强度和规模。试把同一天的伦敦报纸和曼彻斯特报纸比较一下。只注意黄金流出流入的伦敦报纸喜不自胜,因为英格兰银行最近收购一批黄金,从而“加强了它的地位”。而曼彻斯特的报纸却忧心忡忡,认为这种加强是靠牺牲它们的利益,靠提高利率和降低它们产品的价格而得到的。因此,甚至《价格史》的作者图克先生,尽管他善于分析伦敦金融市场和殖民地市场的各种现象,却不仅不能描述而且不能理解在英国产业的中心所发生的痉挛。

至于英国的金融市场,它在 11 月 27 日前的一周的情况表明:一方面破产的日子和非破产的日子不断交替出现,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地方银行却倒闭了。后者是二十一年以前建立的,有 408 个股东,拥有实付资本 562 891 英镑,总行设于纽卡斯尔,分支行设于阿尼克、贝里克、赫克瑟姆、莫珀斯、北希尔兹、南希尔兹、森德兰、达勒姆。它的债务据说已达 300 万英镑,单是通过它支付的每周工资就达 35 000 英镑。当然,达勒姆银行倒闭的第一个后果将是靠这家银行贷款的一些大煤矿和铁工厂的停工。成千上万名工人将因此被解雇。

据说,英格兰银行已经把它的黄金储备增加了大约 70 万英镑。黄金的注入,部分是由于它不再流往苏格兰,部分是由于从美国和俄国运去了一些黄金,再就是由于澳大利亚的黄金运到了。这种流动

并不奇怪,因为十分明显,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就会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把一部分投在国外的英国资本吸收回来,从而改变贸易差额,使相当数量的黄金流入英国。但是可以同样肯定的是,如果稍微放宽贴现的条件,黄金又会开始外流。问题就在于英格兰银行能把这些条件保持多久。

贸易部 10 月份的官方报告书——在这一个月里,最低贴现率连续提高到 6%、7% 和 8%——清楚地证明了,实行上述措施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停止工业生产,而是促使英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削减外国产品的进口。

尽管美国发生了危机,1857 年 10 月份向美国的出口比 1856 年 10 月份增加了 318 838 英镑,但是根据同一份报告书所反映的各种食品和奢侈品消费量的大量缩减,证明工业品出口的这种增加是很不合算的,或者说根本不是工业繁荣的自然结果。危机在英国工业上的反应,在贸易部下次报告书中将阐述得更加明显。把 1857 年 1 月到 10 月期间每个月的报告书比较一下就会看出,英国的生产在 5 月份曾达到其最高峰,当时的出口比 1856 年 5 月份超过了 2 648 904 英镑。在 6 月份,随着印度军队哗变的第一批消息传来,整个生产下降到 1856 年同月的水平以下,出口也相应减少了 30 247 英镑。在 7 月份,尽管印度市场缩小了,然而生产不仅恢复到 1856 年同月的水平,而且居然还比它多 2 233 306 英镑。因此,在这个月,其他市场除了它们通常的消费以外,必须不仅吸收平时运往印度的那一部分产品,而且吸收比英国平时生产的更多的大量产品。所以很清楚,在这一个月,外国市场大概存货太多,只好连续减少出口,从 7 月份的大约 230 多万英镑降到 8 月份的 885 513 英镑,9 月份的 852 203 英镑,10 月份的 318 838 英镑。对英国贸易报

告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目前英国经济动荡的唯一的可靠的线索。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2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2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9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昨天^①早晨加拿大号和亚德里亚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向我们再现了一周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经过。这段经过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汉堡仍然是动荡的中心,这次动荡使普鲁士受到剧烈影响,使英国金融市场又渐渐回到它似乎已经摆脱的不稳定状态。这场风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来。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劳动阶级的贫困,正在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另一方面,法国还在对这种传染病进行某种抵抗,这就像一个比普遍危机本身更难解的谜,使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人们曾估计,汉堡的危机随着保证贴现公司的建立,在11月21日以后已经过了最高峰,该公司股票的认购总数已达1200万马克。建立这个公司是为了保证盖有该公司图章的期票和银行券能够流通。但是过了几天,一些倒闭事件以及期票经纪人戈瓦自杀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预示着新的灾难将要来临。11月26日,恐慌又达到极点;贴现公司和政府先后设法遏止其蔓延。27日,参议会建议——并得到该市有产市民议会议员的许可——发行有息有价证券

^① 1857年12月3日。——编者注

(国债)1 500 万马克,用来发放以各种耐用商品抵押或以国家有价证券抵押的贷款;贷款数额为抵押品相应价值的 $50\% - 66\frac{2}{3}\%$ 。这第二次纠正贸易航程的努力,像第一次一样,也失败了,两次都像海难时发出的绝望呼救。贴现公司的保证本身也需要保证,此外,国家的贷款在数量上受到限制,而且受到作为抵押品的种类的限制,正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国家的贷款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变得相对地没有用处了。为了稳定价格,从而消除衰退的最活跃的原因,国家必须按照商业恐慌爆发前的价格支付,同时,只给国外的破产公司办理期票贴现。换句话说,应该用政府所代表的整个社会财富来补偿私人资本家的损失。这种只要求一方实行互助的共产主义,看来对欧洲的资本家是很有吸引力的。

11月29日,汉堡的20家大商行破产,还不包括阿尔托纳的许多商行,期票贴现停止了,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价格跌得很低,各种商务都停顿了。从倒闭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五起倒闭是在同瑞典和挪威的银行业务中发生的——乌尔贝里-克拉默公司的债务达到1 200万马克;五起是在殖民地商品贸易方面,四起是在波罗的海的商品贸易方面,两起是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两起是在保险业方面,一起是证券交易所,一起是造船业。瑞典完全依赖汉堡,把它当作自己的出口商、期票经纪人和银行家,所以,汉堡市场的历史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场的历史。因此,在倒闭事件发生两天以后,就有一份电报说,汉堡发生破产使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破产,政府的支持在那里也不见成效。瑞典在这方面是如此,丹麦在这方面更是如此,它的贸易中心阿尔托纳不过是汉堡的一个外围郊区。12月1日发生了大批的停业,其中包括两家很老的商行,一家是做殖民地的生意、主要是做食糖生意的康拉德·沃尼克商行,它拥有资本200万马克,同德

意志、丹麦、瑞典有广泛的联系；一家是同瑞典和挪威有业务往来的劳伦特·安姆·恩德公司。还有一个船主兼大商人因陷于困境而自杀了。

汉堡的贸易总额,可以根据以下的事实推算:这时汉堡商人积存在仓库和港口的各种商品,约值5亿马克。现在共和国为消除危机所采用的惟一办法,就是免除它的公民还债的义务。可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各种到期票延期一个月支付。至于普鲁士,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的衰退几乎没有受到报纸的关注,因为还没有引起大批破产,破产的只是斯德丁和但泽的一些谷物出口商,以及柏林的大约40个工厂主。普鲁士政府出面干预,授权柏林银行发放商品抵押贷款,并废除高利贷法。前一措施在柏林将同在斯德哥尔摩和汉堡一样地白费力气,后一措施只会使普鲁士处于与其他商业国同样的境地。

汉堡的倒闭事件,有力地回答了那些富于想像力的人,他们认为目前的危机是由于用纸币蓄意哄抬价格造成的。谈到通货,汉堡与美国完全相反。在汉堡,除了白银,没有别的货币。那里根本没有纸币流通,完全以金属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是汉堡引为自豪的事。然而,目前的恐慌却在那里凶猛肆虐,不仅如此,自从普遍贸易危机出现以来(它的出现并不像发现彗星那样久远),汉堡已成为危机喜爱光顾的场所。在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目前的景象曾在那里两次发生。如果说,汉堡有一个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大贸易中心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利率经常剧烈地波动。

现在撇开汉堡来看看英国,我们发现,伦敦的金融市场情况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已在逐渐好转,但从12月1日起又开始发生逆转。11月28日,白银的价格的确下跌了,但12月1日以后又见

回升,大概还会上涨,因为汉堡需要大量白银。换句话说,黄金又将从伦敦抽出去购买大陆的白银,黄金的这种再次外流将要求英格兰银行再次拧紧螺丝。除了汉堡的突然需求,在不久的将来还有一笔对印度的贷款,尽管政府力图推迟这个倒霉的日子,但早晚还是要拿出去的。本月1日以后发生的新的破产事件,也有助于消除关于金融市场已经度过最坏时刻的错觉。奥弗斯顿勋爵(银行家劳埃德)在上院开幕会议上指出:

“对英格兰银行的下一次压力,大概在调整汇率之前就要产生,那时的危机将比目前令我们望而生畏的这场危机更加严重。种种可怕的严重的困难正威胁着我国。”

汉堡的灾难,在伦敦还没有感觉到。借贷市场的好转对产品市场有良好影响;但是,不管货币量最终可能再次收缩,斯德丁、但泽和汉堡的产品价格的猛跌,显然不能不使伦敦的价格下跌。法国取消禁止谷物和面粉输出的法令⁴¹⁷,立即迫使伦敦的一些面粉厂主把每280磅的价格降低3先令,以阻止法国面粉流入。有报道说,粮食贸易方面发生了几起破产,但是这些破产只涉及一些小商行以及一些远途运货的粮食商。

英国的各个工业区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有专供印度需求的棉织品,如咖啡色的衬衫面料、细棉布、白棉布,以及也是这个市场需要的棉纱,这些货物1847年以后在印度第一次卖上了好价钱。从1847年起,做这种生意的一些曼彻斯特工厂主的利润,已不是来自他们在东印度出售的商品,而是来自他们在英国出售从东印度运回的商品。从1857年6月起,由于发生起义,向印度的输出几乎完全停止,这就使印度市场能吸收积存的英国货,甚至新运到的货

也能按高价销售。^①在通常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使曼彻斯特的贸易异常活跃。但目前,我们从一些私人来信中得知,这种情况只是使这些销路最广的商品的价格稍有提高,同时使大量的待雇劳动力去生产这些特殊商品,使它们短期内就足以充斥整整三个印度。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力近十年来普遍大有增长,即使工作量缩减三分之一以上,也能维持以往的规模,因为工厂主在自己的仓库里积存了大量产品。迪费伊公司在其曼彻斯特贸易月报中写道,“本月贸易曾经中断;交易很少,价格也都非常低。月交易总额从来没有像11月这样少”。

在这里,也许应该注意一下英国谷物法⁵⁵的废除将在1858年第一次经受严重考验这个事实。由于澳大利亚的黄金和工业繁荣的影响,由于歉收的自然结果,小麦的平均价格在1847年至1857年期间高于1826年至1836年期间。现在,国内的需求减少了,还要承受外国农产品的尖锐竞争;1815年至1832年英国史册上的那场似乎已被遗忘的农业衰退,大概又要来临了。诚然,皇帝敕令下达后,法国的小麦和面粉价格随之上涨,但这只是暂时的,在扩大向英国输出之前就停止了。但是,由于法国金融市场继续受到压力,法国将被迫向英国抛售自己的粮食和面粉,同时,德国也将把自己的产品强行倾销给英国。到了春天,货船将从美国满载而来,给英国的粮食市场以致命的打击。这些年来的价格涨落,使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如果连续几年丰收,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废除谷物法,首先对农业工人,其次对农场主,最后对整个英国土地所有制,将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① 参看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0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欧洲的危机

昨天抵达的尼亚加拉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以及我们对一批英国报纸的一份仔细研究,都完全证实了我们最近对英国危机前景的看法^①。伦敦金融市场正在明显地好转;这就是说,英格兰银行金库的黄金在积聚;向这家银行要求期票贴现的人在减少;第一流的票据在伦巴特街⁴²⁹可以按9.5%—9.75%贴现;公债券的行市保持坚挺,股市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好。然而,使这种祥和景象黯然失色的是,在伦敦,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些大的破产事件发生;每天的电讯都是有关各地灾难的可悲消息;伦敦《泰晤士报》大发雷霆,痛斥英国商业阶级腐败成风,无可救药。实际上,无争议票据贴现相对容易,已完全被公认的无争议票据越来越少这一情况所抵消。所以,从最近伦敦发表的一些金融评论中我们得知,针线街^②的业务活动非常“有限”,伦巴特街的交易也很少。可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和贴现所的供应量日益增加,它们所受的压力即它们的客户的需求日益减少,所以,金融市场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还是不敢

① 见本卷第507—509页。——编者注

②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编者注

降低贴现率,他们显然相信,金融危机的再次出现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贴现率问题,因此,降低贴现率必然会再次引起金融危机。

伦敦的金融市场虽有所好转,但英国商品市场的紧张程度依然在不断增加,尽管价格一直下跌,购买商品的人还是越来越少。甚至像油脂这种从前是例外的商品,现在迫于形势也只好降价贱卖。把12月18日以前一周的价格同11月份几周的价格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现在价格又达到了上个月一直存在的最低谷;但是这次并不是恐慌式的,而是有序地逐步浮动。至于工业品市场,兰开夏郡的六家纺织厂、西区做羊毛生意的三家主要商行、伍斯特一家做地毯生意的大商行的倒闭,现在证明了我们关于工业危机的预言^①是正确的。

产品市场和各工业部门的这种双重危机现象,不久之后将变得更加明显,现在不妨从曼彻斯特寄给本报专栏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引以下这一段话:

“对市场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压力及其严重后果,您是很难想像的。谁也卖不出去东西。每天都听到一片降价声。竟然连一些殷实大户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商品。纺织业者沮丧失望。棉纱商不向织布厂主出售棉纱,除非付现金,或者有双重的抵押。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一场可怕的崩溃。”^②

汉堡的危机刚刚平息。^③这是所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中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变得一钱不值了。一些老

① 见本卷第486—487、501—502页。——编者注

② 参见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引用时文字略有改动。本文还引用了该信中其他一些数据资料。——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06—507页。——编者注

商行倒闭,因为它们不能用现金支付一张到期的期票,虽然它们保险柜里的期票的价值百倍高于这张期票,然而这时已分文不值,并不是由于这些期票失去信用,而是由于不能贴现。例如,据说富有的克·马·施勒德的老商行在倒闭以前,他在伦敦的兄长约·亨·施勒德曾经要给他汇寄价值 200 万的白银,但是他在电报中回答:“300 万,否则分文不要。”300 万没有到来,于是,克·马·施勒德破产了。再看另一个不同的例子:欧洲报刊曾多次提到的乌尔贝里公司负债 1 200 万马克,其中期票 700 万,现在表明,这个商行用以经营其庞大业务的资本总共只有 30 万马克^①。

在瑞典,特别是在丹麦,危机显著加剧了^②。看来似乎已经过去的灾难又将临头,因为汉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有大笔款项到了支付期限。例如,在 12 月,一些从里约热内卢运咖啡到汉堡的商行手中价值 900 万的期票已经到期,却全部遭到拒付,这种数额巨大的拒付引起了新的恐慌。在 1 月,从巴伊亚和伯南布哥运来的食糖的期票,大概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同样又会再次引起危机。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1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 月 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① 参见恩格斯 1857 年 12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06—507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法国的危机⁴³⁰

法兰西银行不断降低贴现率,从11月12日以后规定的10%,降到11月26日的9%、12月5日的8%、12月17日的6%。帝国各家报刊当然以此作为确凿证据,证明贸易的震荡已渐趋平息,“法国将通过严峻考验而不会发生任何灾难”。据说,拿破仑第三的金融体制已经使“法国的贸易状态明显地优越于所有其他国家”,保证法国现在和将来永远“在发生危机时比同它竞争的国家遭受的损害要小”。可是,6%这一银行贴现率除了在1800年2月,在伯父^①建立法兰西银行几天后曾出现过,从本世纪初直到侄子^②执政时的1855年和1856年危险时期,在法国从未出现过。不过,即使法兰西银行再降低利率,比如降到4%,结果又会怎样呢?1847年12月27日,贴现率曾经降到4%,当时普遍危机还在继续,法国的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当时也像现在这样,政府庆贺法国幸免于普遍危机,只受了一点儿轻伤,并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两个月后,金融地震却掀翻了国王的宝座和高踞其上的那个聪明人^③。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即迄今为止危机对法国商业的影响比预料的要小。原因很简单:法国在同美国、大不列颠和汉撒各城市的交易中,贸易差额为顺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如此。所以,这些国家所发生的灾难要直接影响法国,那就必须是法国已经给了它们大量贷款,或者,已经冒着风险囤积了大量向它们出口的商品。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因此,美国、英国和汉撒所发生的事件不会引起法国的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之所以在几个星期之中把利率提高到英格兰银行的水平,也只是惟恐法国资本向国外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但是,不能否认,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阶段也已经影响了法国,其表现形式是同它与美国、英国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关系相适应的,即表现为慢性衰退。这种情况使曾在11月10日的信件中说“灾祸只存在于想像之中”的波拿巴不得不另外发表一项正式文告,大意是,“虽然法国商界历来审慎,政府一贯警觉,贸易危机仍迫使许多工业部门即使没有停产,至少也缩短了工时或降低了工资”,因而“大批工人苦于被迫赋闲”。所以他设立一笔100万法郎的贷款来救济贫民,给他们提供就业手段,命令在里昂采取军事预防措施,并通过自己的报纸向民间慈善团体发出呼吁。一些储蓄银行的提款额开始大大超过存款额。许多工厂主由于在美国和英国的破产而遭受巨大损失,巴黎、里昂、米尔豪森、鲁贝、鲁昂、里尔、南特、圣艾蒂安和其他工业中心的生产急剧缩减,同时马赛、阿弗尔和波尔多等地也普遍陷于严重的困境。

全国商业的普遍停滞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法兰西银行最近的一份月报中,这份月报表明12月份的流通额比10月份减少了7304万法郎,比11月份减少了48955900法郎。同时,贴现总额比10月

份减少约1亿法郎,比11月份减少77 067 059法郎。在法国报刊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弄清外省城镇发生的倒闭事件的确切状况,但巴黎的破产事件,尽管还不算十分严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在破产企业的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从11月17日至12月1日这两个星期中,巴黎共发生34起破产事件,其中至少有24起涉及的是旧衣商、牛奶商、成衣匠、假花匠、细木工、女式手提包制造商、镀金工匠、皮件商、珠宝商、缨穗制造商、米醋商、便帽制造商、水果商等等。从12月1日至8日至少发生了31起破产事件,从9日至15日增加到34起,其中包括几家大商行,如布尔东-迪比克银行、出租马车总公司、一家提花织机制造公司、一家植物油制造公司等等。另一方面,波拿巴以取消禁令来阻止小麦和面粉价格狂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从11月26日至12月21日价格不断下跌,尽管在伦敦出售可获厚利,截至12月22日,运去的小麦和面粉仍不超过3 000袋(110公斤装)。

但是,如果说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差额为顺差,那么对南俄、关税同盟⁴¹⁶、荷兰、比利时、黎凡特和意大利的贸易差额却是逆差。瑞士目前的贸易差额始终是逆差,但是法国却对它负有很多债务,——大多数亚尔萨斯工厂的生产都仰仗瑞士的资本,所以在它缺钱时,法国的金融市场总会受到很大压力。目前,也和以往那样,只要上述各国的贸易困难还没达到一定程度,法国就不会出现尖锐的危机。荷兰无法经受住目前这场风暴,这一点,只要考虑一下它经营的大宗贸易几乎仍然只是那些已经降价并且继续在大幅度降价的产品,就会明白了。在关税同盟的各工业中心,危机来临的预兆已明显出现。的里雅斯特的一些报纸都担心黑海和黎凡特方面的贸易可能会失败,只要这个行将来临的灾难稍有迹象,就足以使马赛

的一些大商行垮台。最后，正当金融恐慌在北欧似已平息的时候，它却在意大利猛烈爆发了，这一点，从12月18日米兰《舆论报》上的以下这段话可以看出来：

“当前的困难非常非常严重；破产事件令人心悸；在帕勒阿里、巴拉比奥公司、契格拉、雷达埃利、韦克勒和马佐拉相继破产之后，在国外的一些城市也反作用于我国之后，在维罗纳、威尼斯、乌迪内和贝加莫的一些最有信誉的商行已停止支付之后，我们的一些最有实力的商家也开始发生动荡并开始结账了。结算的情况很惨。只要看看我国几家最大的丝绸商行的仓库里无不堆放着至少5万磅的绸缎，就足以明白了；由此不难算出，按照现行价格，其中每一家都要损失50万到200万法郎，有些商行的存货超过了15万磅。布兰比拉兄弟公司靠一笔150万法郎的贷款在支撑，巴蒂斯塔·加瓦齐商行正在清理账目，其他公司也在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在自问前途何在。大量财产已经消失，很多财产减少了一半；许多从前富裕的家庭现在已穷得难以为继；许多工人没有工作，没有面包，没有任何生存手段。”

当法国的危机由于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日趋成熟的时候，它必然会打击那帮赌徒或者说商业冒险家，也会打击政府，这个政府在法国扮演的角色就完全像私人商业在美国、英国和汉堡所扮演的角色。危机将猛烈冲击证券市场并危及它的主要支柱即国家本身。法国工商业缩减的自然后果是，使货币受交易所的支配，尤其是法兰西银行必须发放以公债券和铁路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目前法国工商业的停滞并没有抑制证券投机，反而使它更加活跃。例如，我们从法兰西银行最近一次的月报中看到，该行以铁路股票为抵押的贷款，随着贴现和流通的缩减而有所增加。因此，尽管大部分法国铁路收入锐减，但其证券牌价却在看涨；例如，奥尔良线的收入以11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2.5%，但是它的证券牌价，12月22日为1355法郎，而10月23日只有1310法郎。

当法国的商业开始萧条时,几家铁路公司立即被迫停止营业,同样的命运也威胁着所有的公司。为了扭转局势,皇帝强迫法兰西银行同这些公司签订合同,由于合同的关系,这家银行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铁路承包人。它必须以以下几种新的债券为抵押发放贷款,这些债券是:1856年11月30日的协议授权这些公司在1858年发行的债券、本应在1857年发行的那部分债券、授权在1858年发行的总额为4250万的债券。看来动产信用公司¹²⁶很可能会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垮台。12月3日,它只好将其大量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忍痛抛售。目前有一个把它同土地信用公司⁴³¹和巴黎全国贴现局⁴³²合并起来的方案,目的是使它也能分享这些机构所享有的优惠,能在法兰西银行办理期票贴现,让法兰西银行接受它们的有价证券。因此,这个计划显然是要法兰西银行为这些企业承担责任,从而使它们经受住风暴。这样做当然会使这家银行本身遭到破产的危险。但是,甚至拿破仑第三也不会想到要这家银行按照对各种股份公司的私人股东交付股金的要求去付款。不算小额款项,到12月底需要付款的有:马德里工商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每股30美元,法美航运公司每股10美元,维克多-艾曼努埃尔铁路公司每股30美元,埃尔瑟朗日铁制品公司每股20美元,地中海公司每股30美元,奥地利铁路公司每股15美元,萨拉戈萨公司每股10美元,法国瑞士公司每股10美元,皮革总公司每股10美元,炼焦公司每股10美元,等等。在年初需要付款的有:希迈-马里昂堡铁路公司每股20美元,伦巴第一威尼斯铁路公司每股12.5美元,比利时和南美洲各轮船公司每股20美元。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议,1858年单是法国铁路的付款要求总额就有大约有5000万美元。这当然很危险,法国在1858年可能因无力支付这种巨额的约定款项而崩溃,就像英国在

1846—1847年那样。不仅如此，德国、瑞士和尼德兰的资本家们还持有大宗法国有价证券，一旦危机在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这些证券的大部分将被投入巴黎交易所，不管价格高低都要把它们变为现金。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2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1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6 年英文版第 15 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山地战的今昔》是恩格斯应马克思 1856 年 12 月 22 日来信中提出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写作时间应是 1857 年 1 月 1—10 日之间。马克思 1857 年 1 月 10 日曾给恩格斯写信说他已收到这篇文章。

这篇涉及纳沙泰尔冲突(见注 2)以及普鲁士入侵瑞士作战计划的文章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分析山地战一般战略战术的第 1 部分,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7 年 1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21 号。分析普军入侵瑞士的可能的方案和瑞士如何组织防御的问题的第 2 部分当时未能见报,只保留下来马克思誊写的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不再发表第 2 部分,是因为瑞士政府释放了被捕的保皇派,对普鲁士作出了让步,冲突已经解决了(见德纳 1857 年 3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3、12。

- 2 指 1856 年秋发生的纳沙泰尔冲突中瑞士可能遭到普鲁士军队的入侵。

纳沙泰尔公国及其领地瓦兰壬(德国称诺恩堡和瓦连迪斯)在 1707—1806 年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 年,拿破仑战争期间并入法国。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被划归普鲁士,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鲁士王国之外,仍旧是瑞士联邦的第 21 个州。在 1848 年 2 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纳沙泰尔州宣布彻底脱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在 1852 年 3 月 24 日的伦敦议定书中仍然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重申,维也纳会议决定给予他的对纳沙泰尔的“主权”继续有效。1856 年 9 月,纳沙泰尔爆发了保皇派的起义,瑞士政府逮捕了起义者。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则要求普鲁士放弃对纳沙泰尔的权利。普鲁士国王的要求被拒绝后便以战争相威胁。最初,瑞士政府表示,如果普军入侵,决心予以最坚决的抵抗。但是拿破仑第三不希望在法国边境发生战争。在法国的干涉下,瑞士政府于 1857 年 1 月 16 日决定释放被捕的保皇派。普鲁士国王也撤销了向瑞士进军的命令。最后,欧洲国家

根据法国的建议于1857年3月在巴黎召开了结束纳沙泰尔问题的会议，冲突才算平息。——3。

- 3 这里列举了瑞士取得胜利的几次会战：1386年6月9日森帕赫(琉森州)会战，结果瑞士军队战胜了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

1315年11月15日莫尔加滕会战，结果瑞士民军战胜了列奥波特·哈布斯堡的军队。

1476年6月22日穆尔滕(弗赖堡州)会战和1476年3月2日格朗松(瓦特州)会战，结果瑞士人击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率领的军队。——3。

- 4 瑞士对奥地利的战争指瑞士的三个森林州结成联盟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由八个州组成的瑞士联邦于1389年成立。1499年，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

勃艮第战争(1474—1477年)是由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发动的反对法国的战争。

瑞士联邦作为法国的盟国于1476年向大胆查理宣战。纳沙泰尔公国根据与伯尔尼的条约站在瑞士联邦一边。大胆查理的军队于1477年1月5日在南锡城(法国东北部)被联军击败，查理本人也在会战中阵亡。他的失利导致勃艮第公国瓦解，纳沙泰尔和瓦朗然与瑞士联邦的关系更加紧密。——4。

- 5 1798年春法国督政府的军队占领了瑞士，开始废除这个国家的封建关系，支持经济发达的各州。1798年4月12日在瑞士境内宣布成立完全依附于法国的海尔维第共和国，并通过了一部以1795年法国宪法为模式的宪法，加剧了已经发展资产阶级关系的进步各州同社会经济关系落后的所谓旧森林州的斗争。恩格斯所说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是指这些州在1798年4月、5月和8月反抗法军的行动。由于瑞士人在这几次起义中都遭到了失败，各旧州被迫投降并加入了海尔维第共和国。1798—1801年的反对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期间瑞士成为主要战场之一。与法国订立了攻守同盟的海尔维第共和国站在法国一边参加了这次战争。——7、11。

- 6 1798—1801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期间，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在亚·苏沃洛夫的率领下，于1799年春夏把法国军队逐出了上意大利。

然后,在奥地利政府的帮助下,苏沃洛夫的军队到达瑞士,以便与受到法国将军马塞纳的军队威胁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军团会合。俄军在穿过圣哥达山口以及其他几个山口之后,被曾于9月25日击败科尔萨科夫军团的法军包围。苏沃洛夫的部队被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一连串阿尔卑斯山口,于10月12日到达上莱茵河。向蒂罗尔进军的法国军队在麦克唐纳率领下在严冬越过了三座难以通过的山岭。——8。

- 7 19世纪30—70年代,法国殖民者为征服阿尔及利亚派兵进入这个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当地居民,到1847年基本上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十年,直到1871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9。
- 8 蒂罗尔起义指1809年4月奥地利西部蒂罗尔爆发的农民起义。安·霍弗所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反对法国占领者和巴伐利亚当局的民族解放斗争。根据1805年签订的普雷斯堡和约,蒂罗尔被拿破仑第一划归巴伐利亚。最初,起义在奥地利支持下曾取得胜利。1809年申布伦和约(见注315)之后,奥地利同意将蒂罗尔合并给巴伐利亚,拿破仑第一调集大军于1810年最终镇压了蒂罗尔农民起义。——10。
- 9 西班牙游击战发生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173)期间,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的独立战争。1808年初,拿破仑第一的军队进入西班牙。西班牙人民举行起义。查理四世被迫让位于其子斐迪南七世。然而,拿破仑却迫使斐迪南七世让出权力并宣布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送往法国。游击战的烈火熊熊燃烧,革命力量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西班牙还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在1810年进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并在1812年通过加的斯宪法。宪法限制国王的权力,把立法权转交给由普选(家庭佣工没有选举权)产生的一院制议会。当法国军队撤出西班牙时,斐迪南七世回到马德里。他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并恢复了反动专制制度。——10。
- 10 卡洛斯派叛乱指1833—1840年在西班牙发生的国内战争。卡洛斯派是由西班牙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支持者所组成的教权专制主义团体。卡洛斯派依靠军队和天主教教士,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巴斯克

省、纳瓦拉、旧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卡泰罗尼亚等)落后农民的支持,于1833年发动内战,卡洛斯以王位归属者自居想夺取国王之女伊萨伯拉二世的王位,反对伊萨伯拉二世之母、女摄政王玛丽-克里斯蒂娜。女摄政王不得已而寻求自由派的支持,对他们许以一系列让步。这场战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封建天主教分子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导致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1839—1843年)。这场战争于1840年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10。

- 11 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指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北高加索山区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的领导人沙米尔于1834年被立为达吉斯坦的伊玛目。北高加索山民在达吉斯坦和车臣建立了以沙米尔为首的军事国家组织,这一战争继续了几十年,一直到1859年,沙米尔领导的解放斗争才被镇压下去。——10。

- 12 法国革命战争指二十三年战争,即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又称反法同盟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对革命的法国发动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1793年春,反法同盟从四面向法国本土进攻,并支持法国王党叛乱。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反法联军被击败。1797年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见注309),同盟瓦解。

1798年12月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1800年6月,拿破仑在意大利马伦戈战役中击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于1801年2月9日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后又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同盟解散。

1805年夏,英、俄、奥、瑞典等国第三次组成反法同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俄、奥联军,签订普拉茨堡和约。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击败普军主力,1807年2月8日在埃劳,6月14日在弗里德里兰战役中打败俄军,迫使俄、普签订蒂尔西特和约(见注313),第四次反法同盟联军失败。

1809年春,英、奥等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同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

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的 1813 年 10 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1814 年 3 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 月 6 日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 年 3 月拿破仑回到巴黎复位,英、俄、普、奥等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6 月 18 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6 月 22 日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反法同盟战争最后结束。——13、257。

- 13 民军是一种属于二级民兵的武装力量。最早于 1809 年在蒂罗尔组建。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存在于德国、奥-匈帝国、荷兰、瑞士和瑞典,在国家出现危急情况时征召。在瑞士,凡未参加正规军或战时后备军的年龄在 17—50 岁的人都编入民军。——14。
- 14 19 世纪 50—6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当时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的英勇斗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和《英人对华的新远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见本卷第 92 页),揭露了英国政府发动这场战争的荒唐借口,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17、90、102。
- 15 18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水师在走私船亚罗号划艇上拘捕了 12 名水手。该船船主和水手均为中国人,只是雇用一名英国人作船长,并持有一张已过期失效的香港执照。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只,并指控中国水师扯下了该船事实上并未悬挂的英国国旗。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命令英国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于 23 日率部进犯广州。第二次英中冲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自此开始。——17、62、74、91、142、165、173。
- 16 指 1843 年 10 月 8 日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通常所说的虎门条约。这个条约是 1842 年南京条约(见注 18)的附约。这里涉及的其中第九款规定:“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察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罪犯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17、62。

- 17 1840—1842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要求准许他们进入广州城。1846年两广总督耆英答应将广州对外国人开放,但由于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此事未付诸实行。1847年耆英又对英国人许诺两年以后开放广州。1849年4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文翰向中国当局要求实现开放广州的诺言。继耆英之后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和当时的广东巡抚叶名琛以“民情未洽,众怒难犯”的理由加以拒绝。文翰在广州人民力量的威慑下,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并自出告示,严禁英国人进入广州城。——20。
- 18 指中英双方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它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同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22、62、106。
- 19 威·沃克是美国的冒险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对中美洲各国进行了一系列冒险远征活动。1855年,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发生内乱,沃克在混战一方支持下占领了共和国的首都格拉纳达,不久即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在那里进行独裁统治,并企图恢复奴隶制。沃克在对洪都拉斯进行冒险远征时被俘,于1860年被枪决。沃克实际上是美国大财阀万德比尔特和摩尔根夺取尼加拉瓜政权的工具。他们打算通过这个国家的领土开凿一条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的运河。——22。
- 20 马克思在《对波斯战争》这一标题下面写了四篇草稿,标明一、二的前两篇是有关英国和波斯战争的,第三、四篇,虽然分别加上《实际材料》和《帕麦斯顿在国会上的声明》的小标题,但谈的仍属同一问题。

草稿的写作时间应是1857年1月2日以后,因为草稿中提到的《泰晤士报》上有关中国的文章是1857年1月2日发表的。这些草稿中增删的字句很多,对此本卷没有加注说明。

后来,大约在1月27日前后,马克思在这些草稿的基础上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和波斯冲突的文章(誊写的手稿都保存下来了),《纽约每日论坛报》把它们合为一篇,作为社论发表在该报1857年2月14日第4937号。本卷在发表时,根据马克思的草稿加上了《对波斯战争》这一标

题。——24。

21 指 1856—1857 年英国对波斯进行的战争。19 世纪中叶,英国企图征服波斯和阿富汗,以便在中东和亚洲实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1856 年 10 月,波斯占领了波阿两国有争议的领土赫拉特。英国以此为借口于 11 月对波斯宣战,先后占领了哈尔克岛、布什尔港、穆罕默德市和阿瓦士市。由于俄国在外交上对波斯的支持、印度人民起义(见注 147)的爆发以及向中国调兵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英国不得不在 1857 年 3 月 4 日同波斯签订和约,英军撤出波斯,波斯撤出赫拉特,放弃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24、45、58、67、142、159、162、165、188、298、332。

22 莫卧儿是 16 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因该帝国的创始人(巴卑尔,1483—1530 年)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大莫卧儿帝国在 17 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剧,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到 18 世纪的上半叶大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

1803 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见注 63)的赡养费过活,成了该公司的傀儡。1858 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颠帝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帝国遂亡。

已故的德里莫卧儿的继承人指亚格伯二世的儿子大莫卧儿巴哈杜尔沙赫二世。——24、166、185、218、384。

23 锡克教是 16 世纪在旁遮普(印度西北部)地区出现的一个宗教派别。由印度教分裂而成,创始人那那克(1469—1538 年)。锡克为印地语 Sikh(意为门徒)的音译。锡克教主张一神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是神的表现;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种姓分立和歧视妇女等都是违背神意的;只有使个人灵魂和神结合才能获得最后解脱。锡克教里奉行祖师崇拜制。祖师共十代。第一代祖师即创始人那那克。锡克教人人平等的教义成了 17 世纪末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徒分化出的封建上层于 18 世纪末在旁遮普建立了锡克国,锡克国被英国征服后,锡克教徒曾多次举行反英起义。——24、213、219、383。

- 24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产生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是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
- 什叶派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及其后代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即伊玛目。哈里发不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而逊尼派则主张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选举哈里发。后来在仪式和规章方面什叶派与逊尼派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25、218。
- 25 古利斯坦条约于1813年10月24日签订。该条约结束了1804—1813年的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正式规定把下列各地区划入俄罗斯帝国:达吉斯坦、格鲁吉亚连同舒拉格省、依梅雷蒂亚、古里亚、明格列利亚和阿布哈兹,此外还有卡拉巴赫、干扎、舍金、希尔万、杰尔宾特、库宾、巴库等诸汗国以及塔雷什汗国的北部。俄国享有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条约还规定双方商人可以进行自由贸易。这个条约直至1828年俄国与波斯之间签订图尔克曼恰伊条约(见注26)之前一直有效。——25。
- 26 图尔克曼恰伊条约是俄国和波斯两国于1828年2月22日在图尔克曼恰伊村签订的,该条约结束了1826—1828年的俄波战争。条约规定了俄国和波斯新的国境线,即基本以阿拉斯河为共同边界,跨阿拉斯河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划归俄国。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里海自由航行和俄国独自享有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与此同时,波斯必须作出不在里海驻留舰队的保证。——25、47。
- 27 在波斯王位的继承人阿拔斯·米尔扎于1833年10月去世后,他的儿子、已被任命为阿塞拜疆统治者的穆罕默德·米尔扎被宣布为他的继承者。但是,在穆罕默德·米尔扎的祖父法特赫·阿里·沙赫1834年10月去世后,法特赫的三个儿子出来争夺王位。穆罕默德·米尔扎在俄国与英国的支持下于1835年初成为波斯国王。英国人为了巩固自己在波斯的地位而派遣了一个大的军团携带大量武器来到波斯,在那里一直待到1838年。英国军官杜赛曾一度指挥过国王的军队。——26。
- 28 指1814年12月25日签订的《英国波斯友好同盟条约》中的第9项条款。——26。
- 29 指第一次英阿战争(1838—1842年)。1837年秋波斯进攻赫拉特;对它的围攻持续到1838年8月15日。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

尔)拒绝同英国结盟反对波斯和俄国,英国未能把阿富汗变成自己的工具,于是决定用军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1838年12月英国军队为扶助王位追求者、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舒扎沙赫为王,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抢劫一空,1839年8月占领喀布尔,俘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了人民起义,英国军队被迫溃退。1842年英国人再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29、332。

- 30 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是专门批判布·鲍威尔的对外政策观念,特别是批判他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各族人民命运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鲍威尔就政治信念来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克里木战争(见注38)期间的1854年发表过一些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分析各种战争事件和早先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列强一败涂地,俄国将成为全欧洲的仲裁者。马克思在1855年4月17日给摩·埃尔斯纳的信中就已经表明他打算批驳“批判的批判”的“高傲的愚蠢”,即批驳布·鲍威尔。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提到鲍威尔时,也表达了要对他的观点进行分析的想法。这篇手稿可能是1857年1月写成的,是实现这一想法的尝试。马克思写这篇手稿时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两本小册子:《俄国和英国》(1854年6月在沙洛顿堡出版,译自德文的法文版)和《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出版的德文版)。

马克思1857年的摘录笔记本是以这篇手稿开始的,第1页上注有:“1.笔记A”;第2页上注有:“A.斯帕达。俄国大事记”;指斯帕达的书《1816年以前的俄国政治、文学、历史和已故名人等大事记》1816年圣彼得堡版,注明日期是:“1857年(1月)”。从第3页开始是手稿本身,手稿总共六页。手稿标题前有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1。手稿发表时,有些地方被划掉,现用脚注注出。手稿最初用俄文发表在1928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6卷上,标题是《布·鲍威尔关于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30。

- 31 “批判”(原文大写字母起头)一词是对布·鲍威尔的谑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就这样称呼鲍威尔。他们在1844年9—11月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原来的书名即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

- 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30。
- 32 通过政变来行使权力的有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1849年3月实施反动宪法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以及1848年12月5日,在普鲁士强制立宪并解散国民议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31。
- 33 匆忙退却指1854年5—9月间俄军在多瑙河的行动,主要是指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参见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军的撤退》、《多瑙河战争》、《俄土战争形势》和《无聊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32—345、354—358、379—384、346—353和441—446页)等。——31。
- 34 指布·鲍威尔在1854年沙洛顿堡版《俄国和英国》中的论点:“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坚定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分摊的角色则是一个拥有实力积极行动的政府。”后来,鲍威尔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的开头又提到了这句话。“前面引用的”这几个字是马克思加到这段引文中的。——31。
- 35 人民银行指1849年1月蒲鲁东曾尝试借助这样一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施他的“社会主义”: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成立以后两个月就破产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2章即《货币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9—192页)中,对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和“劳动货币”理论作了详细批判。——34。
- 36 1774年安·杜尔哥当上财政总稽核之后,在法国实行谷物和面粉自由贸易。这一措施如同杜尔哥后来的改革一样遇到宫廷人士、上层僧侣、贵族、官吏方面的坚决反抗。1776年路易十六签署命令免去了杜尔哥的职务。——34。
- 37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施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争取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

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34、88、98、112。

- 38 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这场战争是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四国联盟之间为争夺近东而进行的,因主要战场在黑海的克里木半岛而得名。1853年3月,俄国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俄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臣民拥有特别保护权,遭拒绝,与土断交,并于7月出兵占领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属地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10月,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对俄宣战。1854年1月,英法联军的舰队开进黑海。3月,英法对俄宣战。1855年1月,撒丁王国也参加了战争。1854年9月,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半岛登陆,10月起展开了对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长达11个多月的围困,终于将其攻克,决定了俄国的败局。1856年3月,战争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见注70)结束了这场战争。——35、68、82、125、144、172、198、265、332、428、452、492。
- 39 改革法案是辉格党(见注40)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于1831年3月在议会中提出的一项选举法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取消某些“腐败的城镇选区”(见注53)选派代表的权利,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1832年6月7日这个法案被英国上院最后批准。但是为此项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未获得选举权。——35、84、87。
- 40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见注92)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72)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69)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35、59、79、86、99、108。
- 41 暗指戴·乌尔卡尔特的看法,他认为帕麦斯顿是沙皇政府的直接代理人。——36。

- 42 第二次瓜分波兰是根据 1793 年圣彼得堡协定进行的。俄国得到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托伦及大波兰的部分地区。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

关于福克斯把他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家罗·阿代尔派往圣彼得堡去破坏威·皮特的计划等,见托姆林《威廉·皮特阁下生平追忆》(共三卷)1821 年伦敦版。——36。

- 43 对俄国在 1787—1791 年俄土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感到不安的小皮特,曾企图阻止将克里木和库班并入俄国的雅西和约的实现。俄国外交利用英国报界,并同反对派领袖查·詹·福克斯建立关系,得以避免同英国外交关系的破裂。福克斯在下院尖锐地批评了皮特的政策。叶卡捷琳娜在外交上取得对皮特的胜利之后,故意下令为她在伦敦购买福克斯的半身像,把它放在皇村狄摩西尼与西塞罗的全身像之间。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福克斯同叶卡捷琳娜的“私下的联系”。——36。

- 44 暗指卡马森侯爵为获得在俄国的烟草贸易垄断付给彼得一世 15 000 英镑。——36。

- 45 1716 年英国和法国在汉诺威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在路易十五无后死去时,英国充当维护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保证人。条约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外交大臣斯坦霍普和法国的红衣主教杜布瓦签订的。根据这项条约,英国、法国和荷兰于 1717 年缔结三国同盟,1718 年奥地利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关于这些事件马克思在本文中还将谈到。——37。

- 46 乌得勒支和约是结束 1701—1714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 179)时,由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中的一个。其他的和约还有:1713 年 4 月法国分别与荷兰、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伊签订的和约;1714 年 6 月的西荷条约和 1715 年 2 月的西葡条约;以及 1714 年 3 月和 9 月法国同神圣罗马帝国签订的拉施塔特条约和巴登条约。

根据法国和英国 1713 年 4 月 11 日签署的乌得勒支条约的第 6 款,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波旁王族的非利浦·安茹公爵,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

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37。

- 47 1834年的四国同盟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834年4月22日在伦敦签订的有关比利牛斯半岛的协定。在签订这个条约时英法利益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这个条约在形式上是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加强其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37。
- 48 指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国在这一同盟的威胁下,最后只好放弃对埃及的支持。——37。
- 49 伊顿英才(Captain of Eton)是伊顿公学的学生由于参加按议会辩论形式举行的政治辩论会而获得的荣誉称号。1788年毕业于该校的坎宁曾获得这一称号。——37。
- 50 指坎宁1826年12月12日就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在英国下院的发言。坎宁声称英国在各国之间的原则(或见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伊奥拉斯的角色,伊奥拉斯“……拿着帝王权杖,坐在高高的小堡垒中,缓和它们的情绪,平息它们的怒气……”(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55—59页)。在葡萄牙内战(1823—1834年米格尔战争)时期英国把军队派往葡萄牙,促成了当地立宪派的胜利。——38。
- 51 指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老皮特)的反法政策,他在策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争使英国差不多占据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所有领地。——38。
- 52 1810—182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的人民不断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结果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于1826年宣布独立(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于1822年宣布独立。——38。
- 53 腐败的城镇选区是指英国那些18—19世纪时居民已经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享有选举代表进入议会的权利。然而这些代表实际上是由当地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这种特权先后被1832年的改革(见注39)和1867年、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

38、97。

- 54 “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38。
- 55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见注92）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滑动比率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38、79、109、509。
- 56 这里的原文是“Stämme”，德语“Stamm”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Gens）和部落两个概念。这里根据其实际内容译成“民族”。——41。
- 57 组织规程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两国于1829年9月14日缔结的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所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42。

- 58 对埃内兹的封锁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见注130)中的一次战斗,1829年夏季俄军攻打君士坦丁堡,于1829年6月11日击败了土耳其军队。俄军围攻爱琴海的港口埃内兹。埃内兹于1829年8月26日被西韦尔斯将军的部队占领。随后双方于1829年9月14日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43。
- 59 鲍威尔在《俄国和英国》1854年沙洛顿堡版第40页引用的利文急电中的话是:“和约就是应当在我们的营垒内签订;只有在它签订之后,欧洲才能知道它的条件;那时抗议的时间就错过了,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将无法阻止的事情。”马克思引用的利文的话,见利文和马图舍维奇伯爵1829年6月13日致涅谢尔罗德的急电,见《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期第24页。——43。
- 60 1836年11月25日,在苏茹克-卡列港(高加索的黑海沿岸)英国“雌狐号”商船被一艘俄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67—478页)中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并揭露了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德在这一问题上耍弄的手腕。——43。
- 61 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44。
- 62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857年1月底至2月初之间。因为马克思在1857年1月2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在星期二以前……寄来一篇关于波斯的军事文章。”这里的星期二即1月27日。而马克思在1857年2月6日给恩格斯写信说,接到回信前他不给《论坛报》寄文章。
文章于1857年2月19日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41号。——45。
- 63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

- 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 19 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的趋势,都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 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中心问题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 1854 年 4 月 30 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成为英王的领地。——45、90、164、188、207、329。
- 64 俄国在威海沿岸修筑大量堡垒指奥伦堡军事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沿锡尔河修筑的大量堡垒。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俄军尚未占领希瓦。1873 年 8 月 12 日俄国与希瓦签订条约后,希瓦可汗国才被俄国占领。——47。
- 65 1839 年 11 月奥伦堡军事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将军率领远征军进攻希瓦可汗国时遭到失败。由于对冬天穿越荒原的困难估计不足,这支由五千人组成的、带有若干火炮和粮秣车队的远征军因病折损半数,佩罗夫斯基未到希瓦即被迫返回奥伦堡。——48。
- 66 克里木战争(见注 38)期间,英军和法军于 1854 年 11 月 5 日在因克尔曼附近击败俄军。俄军失利的原因在于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零散地使用兵力,哥尔查科夫将军所部在战事正酣之际停止作战,总司令缅施科夫公爵领导不力。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82—687 页)中详细地描绘了这次会战。——50。
- 67 西帕依(Sepoys,意即士兵,当时欧洲籍士兵称 gora)是 18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受英国军官的统领。在英印军队中的西帕依被英国人用于征服印度以及阿富汗、缅甸和其他邻国的战争。西帕依和印度人民群众一样,对殖民制度抱有不满的情绪,甚至在 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中成为反英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50、165、185、207、212、223、325、334、465、488。
- 68 马克思 1857 年 2 月 20 日写的这篇文章在他 1857 年的笔记本中标题是《路易斯的预算》。文章的手稿分为两部分:《乔·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和《直接税和间接税》。1857 年 3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56 号发表

时用了这一标题。——52。

- 69 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55)。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7)。40—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53、69、86、96、108。
- 70 指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签订的这一和约,结束了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38)。条约规定俄国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俄国还必须拆除黑海沿岸要塞,放弃其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承认多瑙河在国际监督下的通航自由等等。——54、69、288。
- 71 联合内阁(1852—1855年)即阿伯丁联合内阁,是由一部分辉格党(见注40)的寡头政治家、皮尔派(见注72)、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团的某些代表组成。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见注92)反对派在下院席位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60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有人讽刺地称它为“群贤内阁”。——56、67、68、110。
- 72 皮尔派是联合在罗·皮尔爵士周围的温和的托利党人(见注92),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见注55),引起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小型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政府(见注71)。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58、69、86、108。

- 73 英国侵略者在 1856 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见注 15)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 1856 年 10 月 27 日起,向广州城内开炮轰击。29 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奸淫烧杀的暴行依然继续。——58、62、69、72、77、146。
- 74 法国和英国鉴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国内实行的恐怖政策有可能引起革命运动的爆发,乃于 1856 年 5 月照会王国政府,要求它改变国内的政策。在遭到王国政府拒绝之后,法英两国准备对那不勒斯进行武装干涉。后因两国发生分歧,武装干涉未付诸实施。——58、69。
- 75 习艺所是依据英国 1834 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令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59。
- 76 马克思 1857 年 2 月 27 日写的这篇文章,在他 1857 年的笔记本中,标题是《关于中国的辩论》,1857 年 3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62 号发表时用了《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这一标题。收入本卷的文章开头部分与手稿中有所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给以说明。——61。
- 77 “民意即天意”这句拉丁文谚语出自赫西俄德长诗《劳动和时间》。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提出的口号。——64。
- 78 和平协会是贵格会教徒(见注 114)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见注 69)的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这里指曼彻斯特和平协会,该协会会长是包令。——64。
- 79 指英国在 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第一次选举改革见注 39)。它的目的就是扩大选举权,最终消灭“腐败的城镇选区”(见注 53)。帕麦斯顿反对这一改革。——67。

- 80 白厅是伦敦的一条大街,英国政府的许多重要部门设在这条街上及其附近。因此,白厅也是英国政府的代称。这里的白厅首脑即指帕麦斯顿。——67。
- 81 四个夜晚的激烈争吵指英国下院在 1857 年 2 月 26、27 日,3 月 2、3 日进行的关于中国的辩论,辩论结果以 263 票对 247 票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随即解散了议会。——68。
- 82 立法团是波拿巴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根据 1852 年 2 月 14 日颁布的宪法建立的,它与参议院、元老院一起构成帝国的立法体制。参议院由皇帝任命,负责准备法案和审查法令修正案。另一个由皇帝任命的元老院批准由立法团通过的法令。立法团的权力仅限于对参议院提交的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立法团主席和副主席由皇帝任命,成员由选举产生,但选举受到国家官员和警察的监督,以保证当选者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效忠政府。它实际上成为拿破仑第三的无限权力的一种掩饰。——68、96、157。
- 83 克里木战争(见注 38)中 1855 年 6 月 18 日和 9 月 8 日英军两次突袭塞瓦斯托波尔工事的第三号棱堡(即所谓凸角堡),均以失败告终;同年 11 月,土耳其卡尔斯要塞的英国守军向俄军投降。——69。
- 84 同美国发生的误解指 1855 年底英国和美国因彼此在中美洲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发生的纠纷。1850 年的克莱顿-布尔韦尔条约规定,英美两国有责任保证计划在尼加拉瓜修建的沟通两大洋之间的运河的中立,并且不对尼加拉瓜、莫斯基托海岸以及中美洲的其他地区强加侵占和统治。但是英国继续霸占莫斯基托海岸和在 40 年代夺得的其他领土。美国因而对 1855 年 5 月自封为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的冒险家威·沃克(见注 19)给以支持。两国相互指责对方破坏 1850 年条约,提出抗议并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为了维持两国密切的经济关系,双方相互做出让步,于 1856 年 10 月签定解决这场纠纷的协定。协定确立莫斯基托海岸和与之相连的地区的中立。英国放弃对该地区的领土要求,美国对沃克的冒险行动给以事后的谴责。——69。
- 85 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指 1856 年巴黎和约(见注 70)以后英国和法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矛盾。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一时期法国同俄国有所

接近。但矛盾性质并不严重,也未导致任何严重后果。——69。

- 86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和埃米利奥)是意大利籍奥地利海军军官,“青年意大利”的成员,他们于1844年6月率领一支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目的是在意大利举行起义,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有人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军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和他们的7名同伴在1844年7月遭秘密审判后被处死。当时任英国内务大臣的詹·格雷厄姆授权邮政主管部门对流亡英国的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件实行检查,把信件的内容转告那不勒斯和奥地利政府。英国的舆论认为,邦迪埃拉兄弟的牺牲与此有关,因为他们同流亡在英国的马志尼保持着联系。——71。
- 87 马克思1857年3月13日写的这篇文章,在他1857年的笔记本中标题是《帕麦斯顿和普选》。1857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75号发表时用了《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这一标题。——75。
- 88 “尸首贩子”指英国19世纪20年代偷掘死尸售与解剖所的人。当时爱丁堡的尸首贩子威·伯克为了出售死尸,甚至想出了一个把人憋死而不露任何犯罪痕迹的办法。——75。
- 89 唐宁街是伦敦与白厅大街(见注80)相联的一条街,为英国主要政府部门所在地,其中包括首相和财政大臣的官邸。因此唐宁街也是英国政府的代称。——76、97、478。
- 90 大科夫塔是18世纪意大利冒险家卡利奥斯特罗(朱泽培·巴尔萨莫)凭空臆造出来的一个全知全能的大祭司。——77。
- 91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77、302。
- 92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成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40)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教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

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5)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的保守党。——79、84、98、108。

- 93 1817年,利物浦领导的托利政府(卡斯尔里任外交大臣,西德默思任内务大臣,帕麦斯顿任掌管军事财政的军务大臣(不在内阁大臣之列))为了制止争取选举改革(见注39)和反对谷物法(见注55)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实行所谓“禁口律”(Gagging act)。按照此项法律,集会权受到限制,激进派的俱乐部被封闭,出版刊物要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出版和言论自由。——79。
- 94 人身保护法是英国议会于1679年5月27日通过的。这项法令规定,未经法院授权,不准逮捕任何人。凡被捕者,均可要求说明其被捕原因,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应予以释放。此外,多数被告有权在被起诉前交保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79。
- 95 曼彻斯特大屠杀指1819年8月16日英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实行的血腥镇压。这次争取选举改革(见注39)和反对谷物法(见注55)的群众大会是在曼彻斯特附近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当时的人们仿照滑铁卢会战的叫法,把这一事件叫做彼得卢大惨案。——79。
- 9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署名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指美国,“我们”指美国人。——80、102。
- 97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订立条约的年代是1787年。实际上1787年中俄并未订立任何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对1727年恰克图条约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这里根据史实改为1768年。——81。
- 98 俄国海军上将根·讷维斯科伊1849—1855年率军远征黑龙江。其目的是考察黑龙江邻近地区以及库页岛和乌苏里地区。东西伯利亚总督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积极参与了这次行动。俄国对黑龙江地区缺乏了解是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没有明确勘定中俄边界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次远征绘制出了该地区的精确地图,还收集了一些地理和人口方面的颇有价值的资料,为1858年瑗琿条约确立中俄边界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占领了从额尔古纳河直到其河口的黑龙江左岸地区。——82。

- 99 指路易·波拿巴在准备和实行1851年政变时期所采用的蛊惑手段,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六、七两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02—240页)。——84。
- 100 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七月革命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代表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保皇党,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他们与正统派联合组成所谓秩序党。——85。
- 101 指罗素参加了根据奥地利1854年12月的倡议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有俄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土耳其代表参加的这次会议从1855年3月一直开到1855年6月。会议的目的是就克里木战争(见注38)参战国之间的和平谈判进行协商。罗素曾打算促使奥地利将其限制俄国黑海海军的提案改为最后通牒,但未能得到伦敦内阁的赞同。俄国拒绝了西方各国的这项限制其海军驻留黑海的要求,因此谈判遭到失败。罗素只好辞职,帕麦斯顿从而达到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他的对手威信扫地。——87、111。
- 102 宣誓法是英国议会于1673年通过的,它规定只有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政府职务。这项法令要求公职人员宣誓否认罗马教皇的统治权并承认英国国教会的教义,这是于1660年重新建立的君主制为反对教皇的统治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宣誓法当初是为防止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可能引起危险而制定的,后来变成反对在一定程度上违背英国国教会教义的各教派的武器。宣誓法于1687年被詹姆斯二世下令废除;在1688年光荣革命(见注54)中,这一命令被撤销。1828年2月,约·罗素在下院提议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见注103)。提案在两院获多数票通过,于1828年5月9日生效。——87。

- 103 市镇机关法 是英国议会为了消除清教徒在城镇中的巨大影响于 1661 年通过的。它要求市镇机关的选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和戒律,规定在一年前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领食圣餐者,才能当选为市长和市参议员。选职人员在宣誓就职时,必须发表效忠誓词并承认英国国王对国教的最高统治权。1828 年 2 月,约·罗素在下院提议废除宣誓法(见注 102)和市镇机关法,提案在两院均获得多数通过,于 1828 年 5 月 9 日生效。——87。
- 104 这里是指苏格兰市政法(1833 年)和英格兰市政改革法(1835 年),它们给各大城市(除伦敦以外)规定了城市自治的统一系统。市政机关在苏格兰是由年收入不少于 10 英镑的房主选举的,在英格兰是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由于这些法律,辉格党(见注 40)的资产阶级在许多大城市中获得了政权。——87。
- 105 教会什一税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 16 世纪起被迫向英国国教会缴纳的税,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于 1838 年废除。但是废除什一税,取消实物租以后,教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继续以特殊的货币租的形式得到收入。——87。
- 106 非国教徒(源自拉丁文 *dissidere*——持异议者)是新教各教派、宗派的教徒,不拥护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会,抵制国教会的祈祷书和教会仪式,不承认国教会的信条。他们长期遭受迫害,从 1689 年起得到宽容,从 1747 年起被允许担任某些职务,特别是 1828 年废除宣誓法(见注 102)和市镇机关法(见注 103)之后,他们得到了国家的承认。1834 年罗素又提出一项允许非国教徒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举行婚礼的非国教徒婚礼法案。——87。
- 107 印花税和广告税是英国于 1712 年施行的对报刊征收的两种捐税,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和限制反对派的刊物。印花税和广告税使报刊价格日益昂贵,影响了报刊的销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断要求取消这些税收。议会曾于 1836 年降低印花税,到 1855 年又废除了印花税。在此之前 1853 年已废除了广告税。这些捐税的废除引起大量廉价刊物的出现,它们与旧报刊进行竞争,使后者收入减少。——88。
- 108 契约华工指被拐卖到国外的华工。从 19 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曾在中

- 国东南沿海拐骗一批又一批的劳动人民,强迫他们接受定期的卖身契约,然后运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等地,从事牛马般的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参加了这个罪恶的拐卖华工勾当。在 1845—1875 年间,被卖往海外的“契约华工”,总数不下 50 万人。——93。
- 109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最后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93。
- 110 马克思 1857 年 3 月 31 日写的这篇文章,利用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3 月的几封来信中的资料。——96。
- 111 指 1857 年 3 月 18 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尖锐地批评了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他对中国和波斯的侵略政策。同时,科布顿对鲍·娄以及其他受到政府支持的议会候选人作了否定的评价。——97。
- 112 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是马克思对那些在议会内外积极参加争取取消印花税和广告税(见注 107)的宣传的曼彻斯特资产阶级激进派(包括约·布莱特)的称呼。——99。
- 113 约·布莱特和理·科布顿作为英国自由贸易派(见注 69)的领袖,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见注 38),认为英国不必采用战争手段,只要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99。
- 114 贵格会(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后广泛流行于北美。该教派反对官方的英国国教会及其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有自己的仪式。19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会信条的拥护者的教会被称为“湿贵格会”(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干贵格会”)。——99。
- 115 残余国会是长期国会的余党。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 13 年(1640—1653 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 1640 年 11 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 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 年 4

- 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长期国会的余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立党的拥护者,新教教会的信徒。1648年底长老会信徒被赶出下院以后,他们仍留在下院中,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国会的余党。——100。
- 116 真正的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引用了“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这句古罗马享有种种特权和尊贵地位的罗马公民使用的傲慢用语。帕麦斯顿在1847年英希冲突中以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非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烧毁为借口,把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其真实目的是想夺取爱琴海中希腊的几个战略要地。帕麦斯顿就此问题在议会发表演说中宣称,正如“我是罗马公民”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然无恙。这次演说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对此罗素说道:“只要我们还继续治理这个国家,我就可以回答我尊贵的朋友,他不应该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大臣,而应该成为英国的大臣。”——100、116。
- 117 这里原文是 Ching-Kiang-Foo,按拼音应译为靖江府。当时靖江的建制是县,镇江的建制是府。按这里所描述的地理位置和特点此地应该是靖江,按下文所记载的事件则应该是镇江。本篇译文作镇江处理。——105。
- 118 这里讲的是太平军起义。1851年太平军建立了“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被立为“天王”。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即以南京作为天国首都。——107。
- 119 对赦德萨的宽恕指克里木战争(见注38)中英法航空中队1854年4月轰炸赦德萨一事。轰炸更多地带有示威性质,给城市造成的损害很少。英国议会反对派和报刊严厉批评执政的皮尔派(见注72)在作战时优柔寡断。——111。
- 120 衡平法庭或称大法官法庭,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主持,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高等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

- 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衡平法”进行的。衡平法庭以诉讼费用昂贵和办案拖拉著称。——113。
- 121 1856年10月英国人炮轰广州(见注73),英国海军一共只损失三人。——114。
- 122 1833年英国议会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124。
- 123 恩格斯1857年4月16日前后写的这篇文章,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加的。马克思笔记本上写的是:“4月17日。俄国军队的变革”。——125。
- 124 “无俸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治安法官的谑称,这种法官只担任职务,官衔虽高但不领一文薪俸。——129。
- 125 马克思1857年5月12日和15日写的这篇文章,标题是根据他1857年的笔记本加的。——134。
- 126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 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它的保护下从事投机活动。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类似的机构。——134、174、339、518。
- 127 大军是指从1805年起在拿破仑战争的主要战区内作战的法兰西帝国军队的主力。大军中除法军之外,还包括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意大利、荷

兰、德国、波兰等国)的军队。——134、312、350。

- 128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二月革命(见注 139)前是路易-菲力浦的宫殿,后常以它作为法国最高统治者的代称。从1848年12月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爱丽舍宫作为总统官邸。——140。
- 129 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5月22日。中国和波斯(战争)(写给《论坛报》的文章)”。——142。
- 130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1828 年夏(4—9月)进行了第一个战役,1829 年夏(5—8月)进行了第二个战役。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纳等要塞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8 年 10 月 11 日瓦尔纳被俄军攻占。1829 年 5 月 30 日库列夫查(保加利亚)会战中土军被击溃。1829 年夏,俄国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于 6 月 11 日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829 年 9 月 14 日,土耳其接受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142。
- 131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是拿破仑第一利用俄土矛盾即土耳其违反俄土条约的某些条款挑起的。除 1807—1809 年战事中断外,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 年,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结果俄土两国于 1812 年 5 月 28 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143。
- 132 这里是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见注 38)中发生的几次会战。
1853 年 11 月 4 日,土耳其的军队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俄军在多瑙河左岸的奥尔泰尼察阵地。
1854 年 1 月 6 日,在切塔泰村进行了一场血战,俄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才把土耳其军队赶至卡拉法特。
1855 年 9 月 29 日,俄军对被围困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进行突袭,因力量准备不足,且对方事先已有准备,突袭失败。
1855 年 11 月 6 日,俄军在因古里河一战中,被优势的土耳其军队赶出了明格列里亚。——144。
- 133 指 1856 年秋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内讧。这次内讧是义军领袖之间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压倒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结果。内讧中有三个起义

- 领袖以及成千上万的义军士兵被杀害。它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48。
- 134 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中,有以下与本文有关的说明:“5 月 26 日。5 月 18 日奥当奈尔在参议院的演说”。1857 年 6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38 号发表这篇文章时使用了《有趣的揭露》这一标题。——149。
- 135 波拉科斯派最早是 18 世纪中叶对马德里德拉克鲁斯戏剧爱好者的称呼。19 世纪中叶,波拉科斯派被用来指 1850—1854 年在西班牙当政的一个政治派别,即萨尔托里乌斯的追随者。萨尔托里乌斯从 1853 年 9 月起成为政府首脑,一直到 1854 年 7 月西班牙第四次革命(1854—1856 年)爆发。——149。
- 136 克里斯蒂娜派暴动指 1843 年 5 月纳尔瓦埃斯将军、孔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叛乱,其目的是反对进步派领袖埃斯帕特罗的独裁。这次叛乱得到一部分对独裁政策不满的进步派人士的支持。1843 年 7 月 30 日,埃斯帕特罗逃离西班牙,温和派领袖纳尔瓦埃斯依靠大地主,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49。
- 137 1854 年军队起义指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 年),这次革命一开始,代表进步派和自由派右翼分子的埃斯帕特罗元帅上台执掌政权。——149。
- 138 曼萨纳雷斯纲领是奥当奈尔和杜尔塞在 1854 年 6 月 28 日马德里守备部队哗变之后为了推翻萨尔托里乌斯的政权和夺取权力于 7 月 1 日发表的宣言。这个宣言于 7 月 7 日在曼萨纳雷斯获得通过,被称为曼萨纳雷斯纲领。它的主要主张是:保留君主制,但要求剪除宫廷奸党,遵守法律,成立国民军等。奥当奈尔及其追随者试图用它来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150。
- 139 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

- 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 1848—1849 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55、156、320。
- 140 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关于政变的分析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127—240 页）。——155、156。
- 141 专题委员会是为了对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而由法国立法团（见注 82）的主席召集一些立法团代表组成的。通常有几个委员会，其成员定期地更换。——157。
- 142 马克思 1857 年 6 月 30 日写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根据他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文章于 1857 年 7 月 15 日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65 号。——164。
- 143 信德省是印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在 1838—1842 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 29）开始时，英国军队于 1838 年 12 月开进信德省，东印度公司（见注 63）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强使该地区屈服，1843 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在镇压了信德的土著居民俾路支各部族起义后，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164、221。
- 144 旁遮普（印度西北部）是在英国人同锡克教徒（见注 23）的战争（1845—1846 年、1848—1849 年）中被征服的。1845 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贵族叛变分子挑起了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 1846 年使锡克国变成了自己的藩属。1848 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1849 年起义被镇压，锡克国丧失了独立，旁遮普也被英国人占领，整个印度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164。
- 145 1856 年，英国驻印当局不顾签订过的条约，宣布废黜奥德（印度北部的一个公国）的土著执政者，而将其领土并入东印度公司（见注 63）直接管辖地区之内。——164。
- 146 管区是当时印度的行政区划单位。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印度有三大管区：由东印度公司（见注 63）任命的省督管辖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地区。根据 1773 年的印度管理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领地的总督。——165、185、385。

147 指印度 1857—1859 年的起义。这是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英国殖民者 1849 年征服印度后,在当地征收的赋税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致印度农民被掠夺一光,某些封建主阶层被剥夺了领地;对尚保持独立的印度地区实行吞并政策;殖民当局在收税时使用刑罚和恐怖手段;殖民者还粗暴地破坏印度自古以来的传统和风俗。这一切引起了印度各阶层的普遍不满。1857 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军、驻扎在印度北部的西帕依部队(见注 67)中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中部的最大地区,其中主要有德里、勒克瑙、坎普尔、罗希尔肯德、中印度和本德尔肯德。起义的主力是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封建主的手里。这些封建主绝大多数在 1858 年殖民当局保证绝不侵犯他们的领地以后出卖了起义。起义失败的原因,除了英国人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和封建主的叛卖行径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起义者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共同的行动计划,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局面,居民种族复杂,印度人的宗教和种姓界限分明所造成的。1857—1859 年的印度起义尽管没有直接触及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英国人设法使起义没有蔓延到旁遮普、孟加拉和印度南部),但它震撼了全印度,迫使英国政府对印度的行政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印度起义不仅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阵地,还把他们对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侵略计划推迟了几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专栏文章中多次涉及这次起义。——165、173、298。

148 圣威廉堡(威廉堡)是英国人于 1696 年在加尔各答修建的一个城堡,以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威廉三世的名字命名。英国人在 1757 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设在这个城堡中,城堡的名字遂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指“印度英政府”。——166、214。

149 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第一批词条之一。

《美国新百科全书》是一部“一般知识性的大众化辞典”,由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查·德纳和乔·里普特编辑,纽约丹·阿普耳顿公司出版,从 1858 年至 1863 年共出版 16 卷。

《百科全书》编辑查·德纳于 1857 年 4 月 6 日写信给马克思邀他为《百科全书》撰稿。为了使马克思能继续研究经济学,恩格斯承担了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在恩格斯 1857 年 5 月 28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附有

他为德纳按英文“A”字头拟出的词条目录初稿,让马克思寄给德纳,以征得同意。目录中的词条有:阿本斯贝格、阿布基尔、车轴(炮兵学)、阿克(圣让达克,围攻)、阿克兴(会战)、副官、阿富汗(英国的入侵)、奥兰群岛——见博马尔松德、阿尔布埃拉(会战)、阿尔登霍芬 1797 年的会战、亚历山大里亚(要塞和几次围攻)、阿尔及利亚(法国的侵占和英国的轰击)、阿尔梅达(西班牙战争时期的围攻)、阿穆塞特炮(炮兵)、安格尔西(侯爵)、阿尔梅达、攻击(在会战中和围攻中)、安特卫普(要塞和几次围攻)、接近壕、阿尔贝雷(会战)、火绳枪、阿斯佩恩和埃斯林、(1809 年的会战)、奥热罗(元帅)、前卫队。从当时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 1857 年 7 月 14 日已经收到第一批词条,在 7 月 24 日又收到第二批词条。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上记录的第一批词条寄往纽约的时间是 7 月 24 日。这些词条大部都刊登在《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1 卷。但是词条目录中提到的“车轴”、“接近壕”、“前卫”等,并没有在《百科全书》上发表,而且可能不是恩格斯撰写的。另外,没有资料说明《安格尔西》和《奥热罗》这两个条目是出自恩格斯之手。

恩格斯最初开列的词条目录中没有《艾雷》,但他在 1857 年 5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打算写一个关于艾雷的词条,并要求马克思提供艾雷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38)之前的军事生涯的资料。马克思对一些英文书籍,如《二级巴斯勋爵士、少将、军需总长艾雷爵士向切尔西将军委员会的申述》1856 年伦敦版,作过摘录,并把有关的资料寄给了恩格斯。刊登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的《艾雷》条目中那段引文即出自这一《申述》。词条的结尾可能是马克思加上的,也可能是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给他提供的资料写出的。——168。

- 150 马克思 1857 年 7 月 10 日写的这篇文章在他 1857 年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是《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是编者加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7 年 7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75 号。——172。
- 151 指法国 1857 年夏季立法团(见注 82)的选举。在选举期间为确保官方代表获选,政府不惜动用警察。尽管如此,得到工人支持的反波拿巴派还是在第二帝国历史上首次有 5 位代表当选。——173。
- 152 西班牙风潮指 1856 年夏季马德里的革命事变及安达鲁西亚等地的农民暴动。这次风潮被镇压也就是 1854—1856 年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

- 命的结束。见马克思 1856 年 7 月 25 日写的《西班牙的革命》一文。——175。
- 153** 意大利风潮指 1857 年发生的反对奥地利压迫和某些意大利公国封建君主制政府的革命浪潮。1857 年 6 月底,一小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遵循马志尼的指示,截获了一艘从热那亚开往突尼斯的轮船,并在那不勒斯王国登陆。结果这次远征和热那亚等地的多次起义一样均遭到了失败。——175。
- 154** 1485 年 8 月 22 日博斯沃思(英国莱斯特郡)会战是英国蔷薇战争(1455—1485 年)期间的一次会战。交战双方是郎开斯特王室的远亲亨利·都铎的部队和约克王朝的英王理查三世的军队。会战以理查的失败和阵亡告终。亨利·都铎被宣布为国王亨利七世。从此结束了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即纹章上饰有白蔷薇的约克家族和纹章上饰有红蔷薇的郎开斯特家族之间进行的蔷薇战争。这次战争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几乎完全灭绝,结果在英国建立了实行专制政体的新的都铎王朝。——177。
- 155** 1415 年 10 月 25 日阿赞库尔会战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 年)期间的一次会战。它与 1346 年 8 月 26 日的克雷西会战,1356 年 9 月 19 日普瓦捷会战一样,是百年战争中的几次大规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巧妙地利用英国大弓对法国弩的优势,并利用下马骑士同弓箭手之间紧密的协同动作,击败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为主力的法国军队。——177、182、246。
- 156** 1525 年 2 月 24 日帕维亚会战是意大利战争(1494—1559 年)期间的一次会战。会战双方是法国国王弗朗斯瓦和查理五世(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在帕维亚会战中,法军遭到惨败,弗朗斯瓦本人被俘。查理五世军队中的德意志雇佣兵和有效地使用火器抵抗法国骑士的西班牙步兵在会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次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到 1559 年,法国不得不放弃统治意大利的野心,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中。——177、250。
- 157** 英国内战指 17 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力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的保皇党人与议会党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在第一次内战

- (1642—1646年)的初期,主张与保皇党人妥协的分子领导下的议会军遭到失败。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克伦威尔成功地改组了议会的武装力量,再加上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最后打败了国王的军队。但是由于保皇党人叛乱和苏格兰封建贵族支持查理一世,1648年春天爆发了第二次内战,这次内战于1648年8月以革命军队的新的胜利告终。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78。
- 158 1814年战役指拿破仑第一同第六次反法同盟(见注12)之间于1814年初开始的持续的会战。1813年10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此后,拿破仑在防御性战斗中还能不断地进行攻击战,使联军遭受了一连串失败。但是在1814年3月,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联军还是占领了巴黎,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0、310。
- 159 1815年战役指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见注12)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即滑铁卢会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比利时)中击败由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威灵顿率领的英荷军队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1815年6月18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图包围其侧翼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终于失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一第二次退位,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180、430、473。
- 160 马拉松会战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49年)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490年9月,米太亚得统率的雅典人和普拉迪人的军队在马拉松盆地(阿提卡)击溃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这次会战决定了波斯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失败结局。——181、229。
- 161 温泉关会战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49年)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480年7月温泉关会战中的头两天,希腊一支人数不多的联军在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的指挥下,英勇地击退了薛西斯的庞大的波斯军队的进攻,拒绝了他们通过温泉关峡谷进入希腊中部的企图。第三天,波斯军队成功地包抄了希腊军队。莱奥尼达斯使主力突出包围,自己率领三百名斯巴达人继续防守山道,抗击波斯军队,在众寡不敌的战斗中全部英勇阵亡。——181、229。

- 162 布拉底会战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49年)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479年秋,在希腊中部的布拉底,斯巴达人包散尼和雅典人亚立司泰提统率的希腊联合部队大败波斯军队。——181、229。
- 163 阿斯珀恩和埃斯灵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五次反法同盟(见注12)进行的一次会战。阿斯珀恩和埃斯灵是多瑙河左岸的一个城镇和一个村庄,距维也纳不远。1809年5月21—22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与奥地利卡尔大公的军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结果奥地利军队获胜。拿破仑第一为了挽救军队免遭毁灭,撤离多瑙河左岸。——182、413。
- 164 1812—1814年的战争是由于英国力图恢复它在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见注232)后丧失的在北美的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英美战争。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复辟的危险,并把这次斗争看做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却把向邻国扩张领土的计划同这个战争联系起来。1812年,战争的形势有利于英军,但是,1813年美军终于肃清了同加拿大接壤的密歇根州的英军。1814年,英国虽然暂时还占领着华盛顿,但是由于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力量消耗殆尽,并由于美国海军的胜利出击而遭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地位的基础上在根特缔结和约。军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182。
- 165 坎尼在意大利南部。公元前216年8月2日,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在坎尼击溃了罗马人的军队。这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次主要会战,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182。
- 166 留克特拉会战是贝奥蒂亚战争(公元前378—362年)期间的一次会战。民主派执政的忒拜军队和寡头政体的斯巴达军队之间在公元前371年进行的这次会战中,忒拜统帅埃伯米农达斯在战争史上第一个采用“斜形战斗队形”,不沿正面平均分配兵力,而把强大的突击力量集中在左翼,即主要突击方向上。埃伯米农达斯的战术规定防御和进攻互相结合,骑兵和步兵协同动作。留克特拉会战中的失败使斯巴达的威力丧失殆尽,并导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瓦解。忒拜在希腊暂时取得了优势。——182、234。
- 167 曼丁尼亚会战是贝奥蒂亚战争(公元前378—362年)期间的一次会战。

- 忒拜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在埃帕米农达斯的统率下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岛时,于公元前 362 年在曼丁尼亚(伯罗奔尼撒)采用留克特拉会战(见注 166)所采用的战术,击败了斯巴达军队。但是,忒拜人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及其统帅的阵亡,使他们不能巩固胜利。忒拜最终未能保持住在希腊的霸权。——182、235。
- 168 丰特努瓦会战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时期的一次会战。1745 年 5 月 11 日在丰特努瓦(比利时)会战中,英国军队放弃了两列横队攻击方法,结果在萨克森的摩里茨的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击溃了英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的联军。——183。
- 169 奇珀瓦会战是 1812—1814 年的英美战争(见注 164)时期的一次会战。1814 年 7 月 5 日美国人在奇珀瓦打败了采用纵队攻击战术的英国军队。——183。
- 170 拉杰布特人是印度的高级种姓之一,也是印度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拉杰布坦纳(现名腊贾斯坦)。孟加拉管区也有很多拉杰布特人,主要居住在比哈尔。拉杰布特人被认为是属于刹帝利武士等级的。在莫卧儿帝国(见注 22),拉杰布特人作为军人很受重视,因为他们具有雇佣军所缺乏的团结性。英国人很乐意接受拉杰布特人加入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见注 67)。——186、215。
- 171 婆罗门是梵文 Brāhmana 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 7 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通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186、213、305。
- 172 专员官邸是英籍专员(各印度公国的政治顾问)的驻在地,此处专指奥德专员的驻在地。——187。
- 173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也称西班牙战争,是西班牙军队及其盟国英国的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于 1808—1814 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它与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领的战争(见注9)交织在一起。在反击拿破仑军队时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运用了山地游击战的方法。1811年,与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同时在比利牛斯半岛行动的英国军队,在威灵顿指挥下对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进行围攻。威灵顿曾两次撤围,去迎击前来救援的法国守备部队。最后于1812年4月6日强攻夺得巴达霍斯。拿破仑第一在同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中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军。——187、392。

- 174 1809年9月19—23日法国和奥地利在巴伐利亚进行了历时五天的会战。这是法国和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期间的会战。会战的地点是4月20日在阿本斯贝格、21日在兰茨胡特、22日在埃克米尔和23日在雷根斯堡。拿破仑在阿本斯贝格的胜利是兰茨胡特和埃克米尔胜利的前奏。最后,4月23日战败的奥地利军队迫于法军的压力,只好从雷根斯堡撤退,而法军的先遣队则直逼维也纳。奥军在撤退中虽保存了部分实力,在维也纳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失败了。——189。
- 175 巴达霍斯包围战发生于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173)时期。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要塞巴达霍斯,1811年3月被法军占领。同年5月,威灵顿统率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军对巴达霍斯进行围攻,因伤亡重大以及法国预备队的到来而于6月初撤除包围。1812年3月,以英国为首的联军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并于同年4月6日强攻夺得了要塞。恩格斯在本文中所说的围攻是在1851年5月16日阿尔布埃拉会战后过了几天撤除,这一日期并不确切。从1858年2月18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错误源于《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192、392。
- 176 这是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A”字头词条之一(见注149)。在1857年5月28日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词条目录中,恩格斯在阿耳登霍芬后面写有“1797年的会战”,也许他还打算在这个条目里写1797年的战事,但这个打算没有实现。——194。
- 177 《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中有两个词条用了《亚历山德里亚》这个标题。前一个词条写的是:“亚历山德里亚。I. 皮埃蒙特的一个地区,有约55万居民,生产玉蜀黍、酒、丝绸、茜草和亚麻。”后一个词条即本卷所刊载的是恩格斯所写的这一篇。——196。

178 1848 和 1849 年战争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君主立宪派和共和主义派反对封建分裂和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交织在一起。1848 年 1 月西西里岛首先发生人民起义,11 月罗马又爆发人民起义。1849 年 2 月 9 日罗马建立世俗的共和国。当年 7 月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双西西里王国组成联军,颠覆了罗马共和国。——196。

179 萨瓦亲王欧根率领的奥地利和萨瓦联军于 1706 年 10 月占领亚历山大里亚,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一次会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年)是以法国、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皇帝为首的其他若干德意志邦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这场西班牙王位的各种追求者之间的王朝战争,实际是西欧国家为瓜分已经衰落的封建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和它的殖民地的斗争以及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而进行的斗争。法王路易十四力图吞并西班牙君主国,而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断绝了男嗣以后,达到了选自己的孙子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目的。英国、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王朝的代表是德意志皇帝)、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就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它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见注 46)和拉施塔特和约,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虽然西班牙王位已保留给菲力浦·波旁;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萨瓦公国得到了西西里岛、蒙费拉托以及米兰公爵的一部分土地;萨瓦大公子 1713 年取得了国王的称号。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英国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的目的,获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尔卡岛屿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196。

180 1802 年 9 月并入法国的皮埃蒙特,以及 1805 年并入法国的热那亚均由法国军事总督统治。1814 年,皮埃蒙特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恢复独立。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前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划归皮埃蒙特。——196。

- 181 恩格斯在 1857 年 5 月 28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所列出的词条目录初稿(见注 149)中本来没有词条“阿利马”。可是后来,恩格斯在 1857 年 7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准备在几天后把以 A 字开头的词条寄给他,其中包括“阿利马”。显然,马克思收到这批词条后,把它与第一批词条一起寄往纽约。德纳在 1857 年 9 月 2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词条已经收到。——198。
- 182 安特卫普遭西班牙人焚烧等事件都发生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566—1609 年),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是与反对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自 16 世纪以来,西班牙就一直统治着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北部各省联合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荷兰最后于 1609 年获得了独立)而尼德兰南部仍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1576 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人烧毁,第二年又被起义者占领,1579 年它加入了反对西班牙的北部联合省。不过,西班牙人在 1585 年又重新占领了安特卫普。——203。
- 183 安特卫普围攻战发生于 1832 年秋。1830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比利时从尼德兰王国独立出来,1831 年伦敦条约承认了比利时的独立,并把安特卫普割让给比利时。由于荷兰王国威廉一世拒绝承认比利时独立,为了迫使荷兰承认和履行伦敦条约,1832 年秋,英法舰队封锁了荷兰港,法国热拉尔元帅率领联合舰队围攻安特卫普。安特卫普要塞于 1832 年 12 月底投降。——203、423。
- 184 “死寂的下院”可能指夏季会议期间的英国下院,下院议员在这段时间经常不履行其议员职责,而去作各种消遣和料理私事,因此演说者时常不得不在几乎空荡荡的会场发表演说。——205。
- 185 技工学校是英国给工人传授一般知识和技术的夜校。这种学校最早是 1823 年在格拉斯岛、1824 年在伦敦建立的。到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业城镇,这种学校多达 200 余所。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培养熟练工人,使工人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开始时曾遭到工人阶级活动家的抵制。——206。
- 186 “失去作用的党”指英国的托利党(见注 92)。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议会垄断权。——206。

- 187 参事会是印度总督下属的一个机构。177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见注63)在其印度的领地内有三个省督,分别驻在加尔各答(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每一省督下面设一由公司职位较高的职员组成的参事会。根据1773年颁布的《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令》,加尔各答省督(已称为孟加拉总督)下面设立由四人组成的参事会。总督和参事会的参事不再由公司任命,而由英国政府指名委任,任期五年;任期届满以前只能按公司参事会提名由国王免职。参事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其参事的票数各半,则总督的一票具有决定意义。总督应该对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民政和军事管理,同时对他管辖的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有关进行战争和签订和约的问题享有最高监督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后几省才能独立行事。按照1784年法案,孟加拉参事会的参事减至三人,其中包括总司令。根据1786年的补充法案,总督获得在特殊情况下行动不受参事会限制的权利以及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权利。按照1833年的法案,孟加拉总督成为印度总督,同时仍然是孟加拉省督;其下所设参事会的成员重新增至四人,同时可把总司令加进去作为参事会的第五个成员。总督及其参事会获得对整个不列颠治下的印度颁布法律的权利。孟买和马德拉斯政府则失去这一权利;其省督下面的参事会应由两人组成。按1853年法案,除了组成具有执行机关职能的所谓小参事会的四个参事之外,规定设立具有立法职能的扩大参事会,其中应包括总督、总司令、孟加拉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中的一名法官。印度总督下设参事会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1858年。——207、331。
- 188 拉甲是古代印度贵族的称号,指一族的首长或一地的首领。最初由人民推选,后演变成世袭职位。近代英国殖民政府称印度土著王公为拉甲。——207、220、465。
- 189 札吉达尔是大莫卧儿帝国(见注22)的伊斯兰教封建主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大片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份额的军队给养。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208。
- 190 伊纳达尔是指永久免税或享受优惠条件的赏赐土地(伊纳)的所有者。伊纳主要赏赐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宗教和慈善机关。在印度南部,村社的上层人物有时也获得伊纳。——208。

- 191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自由农的选举财产资格规定为年纯收入 40 先令(2 英镑)。——208。
- 192 恩格斯这篇文章写于 1857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1 日之间。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中 8 月 11 日后面注有:“百科全书。阿富汗。鹿砦。”马克思把这两篇文章寄往纽约后,收到德纳 1857 年 9 月 2 日来信,确认已收到了这两篇文章。——211。
- 193 马克思 1857 年 7 月 31 日写的这篇文章,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212。
- 194 管理印度事务的督察委员会是根据 1784 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印度领地的行政管理法令》成立的。督察委员会由国王委派枢密院的六个委员组成。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内阁阁员担任,实质上他是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督察委员会设在伦敦,它的决议通过由东印度公司(见注 63)三个董事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传达到印度。这样,1784 年的法令就设立了一套通过督察委员会(英国政府)和董事会(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双重性制度。督察委员会于 1858 年撤销。——212。
- 195 恩格斯打算撰写一篇关于阿富汗的文章,准备着重论述 1838—1842 年的英阿战争(见注 29)。这可以从他 1857 年 5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开列的词条目录(见注 149)中清楚地看到。他于 1857 年 7 月动手写《阿富汗》,1857 年 7 月 11 日他给马克思写信说,这一词条未能如期于 7 月 14 日完成。显然它比原来设想的要长。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还参考了约·威·凯的《阿富汗战争史》(两卷集)1851 年伦敦版。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中 8 月 11 日后面注有:“百科全书。阿富汗。鹿砦。”看来这篇文章完稿不会迟于 11 日。马克思把它和《鹿砦》一起寄往纽约后收到德纳 1857 年 9 月 2 日的来信,确认已收到了这两篇文章。——216。
- 196 克兰是凯尔特民族(主要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氏族的称呼。恩格斯用流行于西欧的“克兰”这个术语表示组成阿富汗各部落的大的氏族群体(贺利)。——218。
- 197 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 17 世纪中

叶起,这个部族开始进行反对莫卧儿(见注 22)封建主的武装斗争,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17 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 18 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peshwa)为首的诸马拉塔公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 年遭到惨重的失败。在 1803—1805 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诸马拉塔公国被东印度公司(见注 63)征服。——219、386。

- 198 恩格斯在《军队》这一词条中既概述了武装力量、军事学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史,又评述了与其同时代的军队的状况和组织。

为了写这个词条,恩格斯利用了许多专门的资料,从古代历史学家和军事著作家(希罗多德、色诺芬、萨吕斯提乌斯、波利比乌斯、维格齐等)的著作到 19 世纪的著作家威金逊、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和吕斯托夫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利用了各种参考书刊。恩格斯在他写的词条中提到了其中一些资料。在恩格斯的准备材料中保存下来的,有他对 1855 年在哥达出版的吕斯托夫的《尤利乌斯·凯撒时代的军事和他的统帅艺术》一书,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7 版(1842 年版第 3 卷)的《军队》这一条所作的摘录。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把写作的进展情况随时告诉马克思,马克思也竭尽所能地帮助恩格斯收集资料并把一些书籍以及他自己从一些参考书中所作的摘录寄给了恩格斯。马克思从 1837 年在伦敦出版的威金逊的三卷集著作《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以及从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波利比乌斯、约·弗拉维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所作的摘录也保存下来了。

在《军队》这一词条中,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军事、军事史及他那个时代的各次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深刻研究。马克思收到已写好的《军队》后,在 1857 年 9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马克思也就古代雇佣军队(迦太基人的雇佣军队)的产生以及 15—16 世纪意大利人和东方各民族军事科学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意见,认为对这些问题叙述得不够充分。恩格斯后来在写作《军队》的补充词条《炮兵》、《骑兵》、《筑城》和《步兵》时参考了这些意见。从 1857 年笔记本上的记录来看,马克思是于 1857 年 9 月 25 日把这个词条寄往纽约的,德

- 纳在 1857 年 10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已经收到《军队》。——226。
- 199 龟甲盾 (Testudo, 直译是: 龟甲) 古代用攻城槌破坏敌人要塞的围墙等围攻战中用来保护围攻者的一种遮护棚。——227。
- 200 米卡莱角会战是希波战争 (公元前 500—449 年) 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 479 年希腊登陆部队在小亚细亚的米卡莱角击溃了波斯军队, 并毁坏了那些被拖上岸的、用来构成营垒的波斯船只。这些胜利彻底消除了波斯侵犯巴尔干的威胁。根据公元前 449 年签订的和约, 波斯国王被迫放弃对爱琴海地区的领土要求, 承认小亚细亚希腊城市的独立。——229。
- 201 格拉尼库斯会战是公元前 334 年 5 月,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 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格拉尼库斯河地区和波斯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结果马其顿军队击溃了波斯军队。——230。
- 202 雅典共和国自由民必须服兵役。从梭伦改革时期 (公元前 594 年) 起, 雅典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 根据每年农田收入的多寡划分为四个财产等级。这种等级划分也是雅典军事组织的基础。头两级的人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 但必须服兵役, 并且开支很大 (第一等级的人要建造战船, 第二等级的人要当骑兵)。第三等级的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限制, 但他们组成军队中的骨干——重步兵。第四等级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公民, 长期被剥夺担任任何职务的权利, 最初不服兵役, 但是后来由他们组成轻步兵。——230。
- 203 雅典同盟者指加入雅典海上同盟 (最初叫做提洛同盟) 的希腊各城邦 (主要位于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雅典海上同盟是希波战争 (公元前 500—449 年) 时期在公元前 478 年建立的。这个同盟起初具有平等国家联合的性质, 但是随着雅典力量的增长, 雅典使同盟者屈服于它的权势, 并把它们变成纳贡者。雅典海上同盟于公元前 5 世纪末瓦解。公元前 378 年, 雅典人又局部地恢复了同盟, 但新的同盟仅存在到公元前 355 年。——231。
- 204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 431—404 年) 是希腊城邦的两个集团——雅典海上同盟 (见注 203) 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是雅典和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竞争以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和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寡头制之间的政治

- 矛盾。雅典奴隶制国家的内部危机和雅典同盟者对雅典独裁统治的不满的增长,终于促成了斯巴达的胜利。根据公元前404年的和约规定,雅典应交出几乎整个舰队并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231。
- 205** 这次远征指西西里远征,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注204)期间雅典为征服西西里的希腊各城邦,首先是叙拉古,于公元前415年进行的。雅典指望通过这次远征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权,扩充资源,以打击其主要竞争者——斯巴达。西西里远征持续到公元前413年,以雅典海军和陆军围攻叙拉古遭到惨败而告终。这次惨败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使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集团处于有利地位。——233。
- 206** 五长团是古代斯巴达自由民大会每年选举产生的组织,由五名斯巴达执法官组成,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动用国库,任命军事指挥官,左右国王的行动。——233。
- 207** 珀里俄基人是古代斯巴达的无全权的特殊等级。珀里俄基人拥有土地和财产,其中最富裕的还占有奴隶。他们享有人身自由,甚至享有某些自治权,但是被剥夺了其余的一切政治权利。——234。
- 208** 赫罗泰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部伯罗奔尼撒的农民,是斯巴达国家的财产,他们耕种归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纳国家规定的地租,这种地租大约占收成的一半。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实质上毫无差别。赫罗泰不断举行起义,但都被奴隶主残酷地镇压下去了。——234。
- 209** 萨摩斯围攻战指雅典于公元前440年对位于爱琴海东南部萨摩斯岛上的萨摩斯城的围攻。当时,加入雅典海上同盟(见注203)的萨摩斯岛的居民举行了争取脱离雅典同盟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雅典派出了以伯利克里统率的一支强大的海军远征队包围了萨摩斯城,围攻战进行了几个月,萨摩斯城才被迫投降,萨摩斯岛上重新建立了雅典的统治。——235。
- 210** 征服希腊指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征服希腊各城邦。菲力浦二世在位时,马其顿王国日益强盛并向外扩张,企图征服整个巴尔干半岛。菲力浦依靠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寡头,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并干涉他们的冲突,从公元前357年起逐渐地巩固了自己在希腊的地位。公元前339年,形成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的反马其顿同盟,同盟的军队于公元前338年被菲力浦的军队击溃。结果,希腊反马其顿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希腊各城

- 邦的政权落入了菲力浦的傀儡的手中。公元前 337 年,在科林斯召开的全希腊会议通过决议宣布马其顿王为全希腊军队的统帅,从而巩固了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的领导权,但希腊城邦在形式上仍然被认为是独立的。——237。
- 211** 阿尔贝拉会战,即公元前 331 年 10 月 1 日在亚述城市阿尔贝拉西北的高加米拉村进行的一次古代规模极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波斯的大流士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彻底击败,这一胜利对马其顿人征服波斯帝国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此之前,马其顿军队曾与波斯军队进行过两次会战:公元前 334 年 5 月在格拉尼库斯河(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的会战,公元前 333 年 11 月在伊苏斯(一个小镇,位于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的奇里乞亚)的会战。三次会战均以马其顿人获胜告终。——237。
- 212** 亚该亚同盟是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奴隶制城邦为了对抗马其顿以及镇压奴隶和城市贫民的运动而于公元前 280 年成立的同盟。该同盟拥有雄厚的兵力,并且摆脱了马其顿君主国的控制。公元前 146 年该同盟的军队被罗马人击溃,它的领土并入马其顿(从公元前 148 年起已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238。
- 213** 特里布斯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王实施改革的时期(公元前 6 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划分为四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划分,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种划分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239。
- 214** 骑士是古罗马早期对构成一个特权阶层并须在骑兵中服兵役的富裕公民的称呼。后来,罗马奴隶主中属于骑士阶层的商人和高利贷者,也称为骑士。——239。
- 215** 古罗马的第一次国内战争(公元前 88—82 年)是由两个敌对的奴隶主集团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引起的。一个集团以代表奴隶主贵族的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为首,另一个集团则以依靠商人和高利贷阶层并力图利用城乡平民的凯尤斯·马利乌斯为首。战争以马利乌斯的失败和苏拉专政的建立而结束,它促进了罗马共和国的消灭和罗马帝国的建

立。——240。

- 216 指公元前 109 年在穆士拉河(北非)地区的会战。在会战中,由昆图斯·采齐利乌斯·梅泰卢斯统率的罗马军队击败了努米底亚王尤古尔塔的军队。这是一开始曾经失利的罗马人在尤古尔塔战争(公元前 111—105 年)中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后来罗马人最终打败了尤古尔塔。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罗马历史学家萨吕斯提乌斯的著作《论尤古尔塔战争》第 48—53 章的内容。——240。

- 217 罗马的每一级军事单位都有特殊的军徽。从凯尤斯·马利乌斯时代起,军团的军徽是固定在矛杆上的银鹰。——240。

- 218 罗马和伊皮罗斯(希腊西北部)皮洛士之间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80—275 年。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战象的使用在皮洛士的战术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罗马曾在战争初期遭到两次惨败,但后来在迦太基的援助下击溃了皮洛士的雇佣军队,并把他逐出了亚平宁半岛。对皮洛士的胜利加速了罗马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241。

- 219 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00—197 年)时期公元前 197 年的基诺斯克法耳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罗马军队在梯特·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的指挥下击溃了马其顿王菲力浦五世的军队。马其顿的军事力量被摧毁,罗马在希腊的势力得到巩固,随后在希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242。

- 220 同盟战争(公元前 90—88 年)是罗马同反抗罗马统治而举行起义的意大利各部落之间的战争。罗马共和国和这些部落之间的“同盟关系”是罗马奴隶主统治他们所征服的部落和民族的一种形式。反对罗马统治的古意大利人举行起义,脱离罗马的古意大利人结成联盟。战争的结果是罗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罗马不得不满足后者所提出的给予他们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一主要要求。最初是为了瓦解联盟,只向“忠实的同盟者”作让步的办法,加入罗马国籍要有一定的政治限制,后来渐渐地所有自由的古意大利人都可以加入了。——242。

- 221 罗马高卢是高卢的一部分,相当于法国南部的旧行省普罗旺斯,在公元前 2 世纪末被罗马人占领。——243。

- 222 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是德意志封建主为掠夺意大利城市和霸占土

地而进行的侵略性远征。首次进行远征的是962年在罗马登上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皇帝奥托一世。这种远征在10—13世纪最为频繁,后来虽然德意志帝国已衰落,国内封建割据加剧,但是这种远征一直延续到16世纪。——246。

- 223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历时近二百年的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1096—1099、1147—1149、1189—1192、1202—1204、1217—1221、1228—1229、1248—1254和1270年)。不仅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受到侵犯,而且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也成为十字军征讨的对象。不过,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伊斯兰教徒很快就收复了这些地区。——246、407。
- 224 波兰和西里西亚同蒙古人作战时期指1241—1242年。蒙古人在1237—1240年进犯俄罗斯领土之后又侵入中欧。中欧各国除波兰外,摩拉维亚、匈牙利和达尔马提亚都成了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战场。蒙古人在与欧洲骑士作战时曾获得一连串的胜利,其先头部队几乎抵达了威尼斯。但是在征战过程中遇到的抵抗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最后,蒙古人不得不退回到他们在东欧和亚洲的领地。——247。
- 225 指14—15世纪瑞士各州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以及1474—1477年瑞士人同企图吞并瑞士联邦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瑞士人之所以能够捍卫自己的独立,主要因为由自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组织严密和团结一致的步兵优于对方的骑兵。——247。
- 226 马里尼亚诺会战是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军队在他的威尼斯同盟者的支援下,于1515年9月13—14日,在意大利北部的马里尼亚诺击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佣军。在整个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所。除意大利各公国君主外,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参加过这一斗争。斗争的最后结局是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

而意大利陷入西班牙的统治。——250。

227 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指 1566—1609 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在 16 世纪统治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结合在一起。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尼德兰北方各省建立了荷兰共和国(尼德兰联合省),并于 1609 年获得了独立。尼德兰南部仍处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1621 年,荷兰和西班牙之间又发生战争,这一战争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见注 228)交织在一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的独立于 1648 年最后巩固下来。——251、443。

228 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德意志为主要战场。1618 年 5 月 23 日捷克布拉格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

(1)捷克时期(1618—1624 年),主要的斗争是在捷克新教徒和皇帝天主教阵营之间进行的,结果捷克战败。1625 年,英国、荷兰和丹麦在法国的协助下结盟,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2)丹麦时期(1625—1629 年),这个时期一开始,战争就具有全欧洲的性质。但是,丹麦军队被皇帝天主教的军队击溃。1630 年,瑞典参战,它在保护新教诸侯的旗帜下,力图在波罗的海南岸站住脚。

(3)瑞典时期(1630—1635 年),以瑞典军队的一连串胜利开始,在这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之间进行过几次会战。1630 年 12 月,古·阿道夫的军队逼近奥得河畔的格赖芬哈根要塞,并在两次强攻之后迫使守军放弃了要塞。1631 年 4 月,古·阿道夫的军队以猛攻夺取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在这两次会战中,瑞典炮兵起了很大的作用。古·阿道夫的军队于 1631 年 9 月 17 日在莱比锡(即在布雷滕费尔德)和 1632 年 4 月 15 日在巴伐利亚的莱希河地区击溃了由梯利统率的皇帝天主教军队。1632 年 11 月 16 日,古·阿道夫在吕特岑(萨克森)击败了由华伦斯坦统率的皇帝的军队。但在 1634 年瑞典

军队被皇帝和西班牙联军击溃。1635年法国公开站到瑞典和新教诸侯方面。

(4)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战争在第一阶段具有反抗封建专制欧洲的反动势力的性质,最后,特别自1635年起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外国侵略者对德国的一系列入侵。1643年5月19日,在罗克鲁阿(比利时边境上的法国要塞)会战中,围攻要塞的西班牙军队全军覆没。一向被认为是无敌的西班牙步兵的失败使战争进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这一和约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252、360、445。

- 229 指三十年战争瑞典时期中的三次会战,即1631年9月17日在莱比锡、1632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的莱希河地区和1632年11月16日在吕特岑的三次会战(见注228)。——253。
- 230 边屯区是奥地利帝国16世纪为了防御土耳其入侵而在南部边境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巴纳特)设立的军事驻点。这些地区的居民必须服边防兵役、缴税和履行一些公务才能使用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254。
- 231 莫尔维茨会战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时期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西里西亚的莫尔维茨击败了奥地利军队。——255。
- 232 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它是英国13个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解放战争。七年战争(见注233)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于1783年9月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建立了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在战争中站在北美人一边。——257、311。

- 233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英法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之间争夺西里西亚是战争的起因。

在欧洲,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而结束,根据1763年签订的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夺得西里西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新兴强国。

英法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海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1755年英国不断攻击法国商船,法国遂占领英国梅诺卡岛。1756年英国对法宣战,在东方主战场印度与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1757年控制了印度孟加拉,1761年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与此同时,法国在北美失去了加拿大,在非洲的塞内加尔以及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蒙受巨大损失,被迫讲和,于1763年签订了巴黎和约。该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得的殖民地,此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259、315。

- 234 因克尔曼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38)时期俄国军队和英法联军于1854年11月5日进行的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在恩格斯的《因克尔曼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2—687页)。——260、392、411、488。

- 235 战时后备军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的一支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265。

- 236 1854年10月初,当克里木战争(见注38)战事正酣之时,巴黎谣传联军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随后,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的官方报刊也相继刊登了这个谣言。可是几天以后,法国报纸就不得不进行辟谣。事实是:塞瓦斯托波尔直到1855年9月才被攻陷。——270、294。

- 237 《阿尔及利亚》是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A字开头的词条之一(见注149),按计划应于7月中旬写成,但是恩格斯到9月中旬才把该词条写完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在1857年的笔记本中记录着他于9月18日把《阿尔及利亚》、《弹药》寄往纽约,并在9月21日把此事告诉了恩格斯。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对这一词条作了某些修改。从1857年9月2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删略了原稿中有关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进行反对

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战争的记述和关于毕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的内容。这大概是由于在百科全书中已经列入关于阿布德-艾尔-喀德的专门词条,并且向马克思预约了《毕若》这一词条(见本卷第524—527页)。此外还有编辑部改动的其他某些痕迹。

在写作本文时,恩格斯利用了《维干德百科辞典》1846年莱比锡版第1卷中的词条《阿尔及利亚》。——274。

- 238 柏柏尔人是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在内的北非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土著居民。由于当地的土著居民为柏柏尔人,欧洲人过去把该地区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称为柏柏尔国家。在19世纪欧洲列强侵占这个地区以前一直沿用此名。——275、279。
- 239 库鲁格鲁人是土耳其人与阿尔及利亚妇女结婚所生的后代。——275。
- 240 马耳他骑士是12世纪初由十字军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僧侣骑士团的成员。最初的驻地在耶路撒冷,13世纪末从东方撤走,1530—1798年的驻地在马耳他岛,故称马耳他骑士团。——279。
- 241 土耳其近卫军是土耳其封建时代的步兵警卫部队的主力,主要由年轻的战俘和苏丹臣民中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组成。近卫军参与征服战争,在被征服国担负守备任务。近卫军逐渐成为一种独立势力,能在政治生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参与了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封建斗争。近卫军军团于1826年被取消。——279。
- 242 1827年4月30日,阿尔及尔的德依侯赛因在他的官邸举行招待会,因法国政府拖欠阿尔及利亚臣民——犹太商人的债款与法国总领事德瓦尔发生争执,在反击德瓦尔横蛮无礼的挑衅行为时,用蒲扇打了他的脸。这一由法国总领事挑起的事件成了查理十世政府于1827—1829年对阿尔及利亚海岸实行封锁的借口。封锁以后,法国殖民者于1830年开始征服这个国家。——280。
- 243 查理十世政府曾打算在形式上把阿尔及利亚交给土耳其政府管理,而法国政府则实际控制阿尔及利亚并使奥斯曼帝国在财政上更加依赖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实际是法国傀儡的特别政府。因为土耳其政府软弱且没有管理远方领地的能力,阿尔及利亚的四个港口交给法国,并给予法国经营珊瑚业的权利;苏丹对于法国在把阿尔及利亚“归还”苏丹的问题上

的“援助”应付给法国 2 000 万法郎。利用土耳其军队征服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统治集团的打算。但是 1830 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后查理十世被推翻,奥尔良王朝取代了波旁王朝,随即停止了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七月王朝的方针是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法国的直接统治。——281。

- 244 指 1836 年秋法军第一次远征君士坦丁。克洛塞尔元帅指挥下的法军试图以强攻占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控制的君士坦丁,但被起义者的部队击退。

1837 年秋天,接替克洛塞尔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达雷蒙将军率兵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法军虽伤亡惨重,但强攻占领了君士坦丁。法国士兵对该城居民进行了残暴的迫害。——283。

- 245 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阿尔及利亚人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斗争从 1832 年持续到 1847 年。最初,阿卜杜尔·卡迪尔依靠阿尔及利亚广大的居民,联合了一些阿拉伯部落,取得了胜利,迫使法国人于 1834 年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几个沿海城市除外)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法国殖民者经常违反与阿卜杜尔·卡迪尔签订的条约,一再入侵阿尔及利亚西部。1839—1844 年期间,阿卜杜尔·卡迪尔的国家虽然与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到 1844 年仍旧被征服,他本人也被迫退到摩洛哥。1845—1847 年,阿卜杜尔·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西部重新领导群众举行起义。这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他在撒哈拉绿洲区继续领导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游击战争。1847 年阿卜杜尔·卡迪尔被俘。但此后不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还是东部,仍不断有阿尔及利亚人举行起义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283。

- 246 马拉布特是伊斯兰教的修道士;他们曾积极参加北非各国人民反对欧洲征服者的解放斗争。——283。

- 247 阿拉伯局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名称。在每个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的区都设有这种局,它们拥有极大的权力。——284。

- 248 欧洲各国在 1856 年巴黎会议上和会议后,围绕着多瑙河问题,即土耳其统治下的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合并问题展开了外交斗争。法国想以波拿巴王朝的代表人物来领导这两个公国,建议把它们合

并成一个罗马尼亚国家,由一个属于在欧洲居统治地位的王朝的外国亲王统治。支持法国的有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土耳其由于害怕罗马尼亚国王会起而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因而反对两个公国合并,支持土耳其的有奥地利和英国。会议认为必须弄清楚(通过在公国举行御前会议的选举)当地居民自己对合并问题的态度。因此而举行了选举,但是由于作弊,反对合并的人在摩尔多瓦的御前会议中获得多数,这引起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反对,它们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土耳其迟迟不作答复,这些国家就在1857年8月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次冲突在拿破仑第三的调停下解决了,他说服英国政府不要阻挠法国的计划,这些计划对英国也是同样有利的。公国的选举被宣布无效,但是新的选举并没有解决公国合并的问题。1859年库扎在政变后当选为两公国的君主。1862年两公国合并为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288、300。

- 249 华沙会议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俄国倡议下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会上沙皇尼古拉一世以仲裁人身份,裁决普奥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争端。普鲁士在俄、奥压力下被迫放弃在它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各邦联盟的计划。——289。
- 250 萨拉戈萨因其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英勇斗争而闻名。拿破仑的军队在1808年和1809年两次对这个城市进行围攻。萨拉戈萨在第二次被围期间曾进行长达两个月的顽强抵抗,1809年2月20日才被攻占。——300。
- 251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百年来一直处于丹麦国王统治之下。1852年5月8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诸国,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的有关丹麦君主国家的完整的伦敦议定书,承认这两个公国有自治权,但仍处于丹麦国王的最高统治之下。可是,丹麦政府不顾伦敦议定书,于1855年颁布了宪法,宪法取消了丹麦统治下的这两个公国的独立和自治。为此,德意志国会于1857年2月发表公告,抗议在这两个公国里实行丹麦宪法,但公告上却把两公国误写为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另一个在丹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公国),而没有提到石勒苏益格。丹麦政府利用这一点,准备把漏写的石勒苏益格并入自己的领土。结果不仅招致了不愿同荷尔斯泰因人分离的石勒苏益格人的抗议,而且也引起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抗议,它们认为丹麦的行动破坏了伦敦

- 议定书。这个问题直到 1864 年丹麦战争后才得以最终解决,石勒苏益格并入普鲁士,荷尔施泰因则并入奥地利。1866 年奥普战争之后,荷尔施泰因也并入普鲁士。——301。
- 252 1852 年伦敦条约指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等国同丹麦共同签订的有关丹麦君主国家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没有确保斐迪南亲王取得丹麦王位,而是承认格留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继承无嗣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王位。——301。
- 253 马克思《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一文,在他 1857 年的笔记本中注明的写作日期是 8 月 28 日。但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把它放在了马克思 9 月 4 日写的《印度起义》之后,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发表在该报第 5120 号。所以文章开头说的昨天刊载的通讯,见本卷第 334—338 页。——302。
- 254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一身兼任地方税总收税官、行政长官和首席法官之职。作为收税官, he 可以把欠税者送交法庭;作为法官, he 可以对欠税者作出判决;作为行政当局的代表, he 可以执行判决。——302。
- 255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村社以前,莱特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 1793 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 19 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国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税;因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303、335。
- 256 《巴克莱-德-托利》和《下尼格先》两篇文章的第一稿是恩格斯起草的(下尼格先和巴克莱)。他在 1857 年 9 月 10 日把草稿寄给了马克思。现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根据这封信加上的。从恩格斯手写的准备材料,如 1827 年巴黎出版的若米尼的《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的摘录等可以看出这两个词条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著作。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草稿基

础上进行了最后的补充和加工。——308、315。

- 257 指 1807 年 2 月 7—8 日法俄军队在普鲁士埃劳(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的会战,这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中最残酷的会战之一。1806 年普军被拿破仑军队击溃以后,东普鲁士就成了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拿破仑的军队在那里遇到了俄普联军的顽强抵抗。拿破仑在普鲁士埃劳尽管损失惨重,但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结果,法军暂时中止了行进,把俄军阻截在俄国边境的企图未能实现。——308、317、412。
- 258 在俄国瑞典战争(1808—1809 年)期间,俄军在巴克莱-德-托利的统率下于 1809 年 3 月从芬兰开进瑞典,这使瑞典贵族密谋推翻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计划得以提前实现。古斯塔夫四世在 1809 年 3 月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宣布为国王查理十三。同年 9 月,瑞典被迫与沙皇俄国在腓特烈港缔结和约,把芬兰割让给俄国。
- 恩格斯把俄军横渡波的尼亚湾的进军比做过去瑞典人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小的类似的军事行动,即 1657—1658 年丹麦和瑞典战争期间,瑞典国王查理十世 1658 年 1 月底率军横渡封冻的大、小贝尔特海峡开入丹麦领土,迫使丹麦签订有利于瑞典的腓特烈港和约。——308、354。
- 259 根据富尔的计划,拿破仑一旦入侵,俄国军队应分为三个军团,其中第一军团以 1811—1812 年在德里萨(立陶宛)特别构筑的营垒为据点,顶住敌人的主力突击,而另两个军团应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机动。富尔根据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普鲁士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计划分散了俄军的兵力,很有可能会使他们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各个击破。俄国指挥部(其中包括巴克莱-德-托利)看清了这个计划的漏洞,在支持富尔计划的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不参与指挥作战以后,及时下定决心放弃德里萨营垒并退向俄国内地,以便各个军团得以会合。——309。
- 260 斯摩棱斯克会战是 1812 年 8 月 16—17 日拿破仑军队同掩护俄国军队(巴格拉季昂和巴克莱-德-托利的部队于 1812 年 8 月 3 日会合后的军队)退却的俄国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会战。拿破仑想强使俄军进行决战的计划落了空,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占领了俄国后卫部队在主力被击退以后所放弃的城市。斯摩棱斯克会战表明了拿破仑迅速歼灭俄军的图谋的破产。会战以后,拿破仑试图缔结和约,但未达目的。——309。

- 261 指在格扎茨克西南的察列沃-宰米谢附近的俄军阵地,俄军于1812年8月29日抵达该地。上任不久的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打算在兵力略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法军进行决战,为此需要争取时间,等待援军与主力会合。因此库图佐夫决定将俄国军队从察列沃-宰米谢撤到博罗季诺。——309。
- 262 博罗季诺会战是俄法两军于1812年9月7日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博罗季诺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庄。拿破仑的军队于1812年6月越过俄国边境后,企图在此彻底粉碎俄国军队。但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自己的法国军队却损失了一半左右。库图佐夫的俄国军队损失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在这次会战以后俄军被迫一度放弃莫斯科(见注275)。最后还是把拿破仑赶出了俄国。恩格斯在后来写的《博罗季诺》中对这次会战有详细描述。——309、389、450。
- 263 1813年战役指拿破仑第一同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中1813年的一系列会战。1812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的溃败成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起义信号。1813年2月,俄军进入波兰和普鲁士以后,缔结了反拿破仑的俄普同盟。1813年春天,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组成了反拿破仑同盟,同年秋天,奥地利也公开参加了同盟。在1813年战役中,拿破仑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的军队已被同盟国的联军击溃,并被赶出了普鲁士。

托恩是位于维斯图拉河畔的一个波兰要塞,由法国守军控制,1813年2月中旬巴克莱-德-托利率俄军围攻这个要塞。4月16日,要塞停止抵抗,4月18日签订和约,要塞投降并交付给普俄联军。在1813年5月2日的吕岑会战中,拿破仑以巨大伤亡为代价迫使普俄联军撤退。在1813年5月19日的柯尼希斯瓦尔塔(萨克森)会战中,巴克莱-德-托利率俄普联军打败了法军。洛里斯顿的军队损失最为惨重。

1813年5月20—21日在包岑(萨克森)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战胜了俄普联军,但是联军在巴克莱-德-托利统率的俄国后卫部队的掩护下秩序井然地撤退。次日,从包岑撤退的俄国部队在格尔利茨附近与法军进行后卫战,俄军取得了胜利。1813年5月26日,布吕歇尔指挥的俄普军队派骑兵埋伏在海瑙城(西里西亚)附近,击溃了拿破仑军队的前卫。

1813年8月26—27日,在德累斯顿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击败了俄普

奥联军。1813年8月30日,联军在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下在库尔姆会战中包围了法国的旺达姆军团并迫使其投降。

在1813年10月16—19日的莱比锡会战中,巴克莱-德-托利指挥联军的中路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310、318、367、412。

264 马克思在《贝尔蒂埃》一文中使用了恩格斯1857年9月11日来信中有关贝尔蒂埃的生活及军事活动的资料。——311。

265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从巴黎来到凡尔赛的人民群众与国王近卫军发生流血冲突,结果迫使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从而粉碎了宫廷在凡尔赛准备的反制宪议会的反革命阴谋。

1791年2月19日,因国王眷属试图逃往国外,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311。

266 索米尔保卫战是旺代战争(见注293)中的著名事件。1793年6月旺代人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但不久就遭到一连串失败。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1。

267 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28日)指法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政府,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的丹东派也参加了热月政变。

热月九日之后,凯勒曼统领法兰西共和国驻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的军队,守卫边疆防止奥地利和皮埃蒙特的入侵。——311、472。

268 这里列举的是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中1796—1797年战役中的一系列会战。在1796年4月22日蒙多维会战中,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大败皮埃蒙特军队,从而迫使皮埃蒙特国王单独媾和;在1796年5月9日的科多尼奥会战和1796年5月10日的洛迪会战中奥军战败,法国军队占领了米兰。法国获得胜利的里沃利会战(1797年1月14—15日)在夺取意大利北部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整个战役最终向对法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经过九个月的围攻,法军终于在1797年9月2日迫使曼图亚守军投降。奥地利人被迫将曼图亚要塞交给法国人,并于1797年10月缔结坎波福米奥和约,这一和约意味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彻底瓦解。——312。

- 269 拿破仑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利用反法同盟(见注 12)失败后在意大利强大起来的反专制制度运动,在支援意大利共和派的幌子下力求在意大利以“女儿”共和国的形式建立法国的统治。1798年3月,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教皇庇护六世逃跑。但在1799年,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军队进入意大利以后,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被推翻,并在罗马教皇国恢复了教皇的政权。随着法国在意大利统治的恢复,拿破仑先把一部分教皇国领土并入附庸的意大利王国,而于1809年又把教皇国划入法兰西帝国。——312。
- 270 法军远征埃及(1798—1801年)的目的是为了从土耳其手中抢夺埃及,破坏英国和印度的交通线,确立法国在近东的统治地位。拿破仑率军进行三年多的这次远征最后以失败告终。1799年春在圣让达克会战中,拿破仑从3月到5月一直对属于土耳其的叙利亚要塞圣让达克进行围攻,最后被土耳其军队打败。1799年7月25日在阿布吉尔会战中,法国军队击败了由英土舰队送到埃及海岸的土耳其登陆队。但是第二次反法同盟(见注 12)的俄奥联军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法军,俄国舰队在地中海又取得了胜利。最后,拿破仑于1799年秋把军队留在埃及,自己回到法国。1801年留下的军队被迫向英军投降。——312、412。
- 271 波拿巴雾月18—19日阴谋指1799年11月9—10日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拥护者实行的政变,政变结果是执政官行政委员会取代了督政府(见注 306),在国内建立了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1804年5月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被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从此开始了为时15年的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312、472。
- 272 马伦戈会战(1800年6月14日)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时期的一次会战。1800年初,奥地利军队总司令梅拉斯在瓦尔河附近攻击法军右翼获胜,但在5月下半月,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奥军的后方,6月2日占领米兰,并渡到波河南岸。在1800年6月14日的马伦戈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尽管由于情报不确实受到奥军的突然袭击,但仍然战胜了奥军。法军在马伦戈的胜利以及在其他前线的成功行动导致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瓦解。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见注 271)后的这一胜利,巩固了他作为法国第一执政的权力。——312、412。
- 273 乌尔姆会战(1805年10月)是拿破仑同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时

- 期的一次会战。1805年10月奥地利马克将军的军队在乌尔姆地区被法军包围,结果被迫签约投降。——313。
- 274** 瓦格拉姆会战(1809年7月5—6日)是拿破仑同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战胜了奥地利军队。因为这次胜利,贝尔蒂埃获得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奥地利在这次失败以后,于1809年10月在苛刻的条件下与拿破仑缔结了和约。——313、352、362。
- 275** 指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越过俄国边境,并于当年9月12日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城防司令官下令撤退并在城内点起大火,城市在火中燃烧了五个昼夜。远离粮秣弹药供应的拿破仑军队在严寒中不断减员,最后,在俄军的不断反击下于1812年10月19日被迫撤退。——313、318。
- 276** 临时政府是拿破仑军队被击溃和反法同盟联军(见注12)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以后,1814年4月由元老院建立的,主席是达来朗。临时政府促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314、401。
- 277** 奥恰科夫围攻战是俄土战争(1787—1791年)时期的一次会战。1788年俄军对黑海北岸的土耳其人的据点奥恰科夫要塞进行了长期的围攻,最后终于占领了该要塞。——315。
- 278** 维尔纳战役是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的一次战斗,1794年6月下旬格先率领的俄国部队在奥什米亚内和索番附近击败了波兰军队。同年8月,俄军打败了防守维尔纳城的波兰军队,进入该城。
俄军镇压了这次起义后,1795年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这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不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315。
- 279** 1796年,即波斯沙赫阿加-穆罕默德于1795年入侵格鲁吉亚后的第二年,卞尼格先率领的俄国军队围攻并占领了杰尔宾特城。——316。
- 280** 1806—1807年战争指拿破仑第一同第四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的战争(见注12)。——316。
- 281** 围攻但泽(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仑第一同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

期拿破仑军队于1807年3月发起的。由普鲁士军队和联军俄国部队组成的要塞守军对占优势的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要塞守军于1807年5月底投降。——317。

- 282 马克思在1857年8月26日给恩格斯写信说,德纳要求撰写的《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以B字开头的词条中“只有两条非军事词条:《勃鲁姆》和《布里安》”。他在9月15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已经把这两个词条连同其他资料一起寄往纽约。但是,从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中的记载来看,他是在一周之后才写完这两个词条,1857年9月22日才把它们寄往纽约的。

马克思在撰写《勃鲁姆》时,从迈耶尔《名人录》中篇幅较大的传记词条《勃鲁姆》(1853年版第2补卷第240—246页)、施特格尔的《名人录补遗》(184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53—160页)以及其他资料中作过一些摘录。——319。

- 283 莱比锡的席勒协会和德国作家联合会是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团结为在德国实现出版自由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而斗争的德国作家的组织。——320。

- 284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产生的、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派别。“德国天主教徒”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320。

- 285 开枪屠杀民众的事件指1845年的莱比锡大屠杀。1845年8月12日莱比锡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萨克森政府镇压“德国天主教徒”(见注284)和迫害其领袖约·隆格牧师。萨克森亲王约翰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恩格斯在1845年写的《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中描述过这次事件。——320。

- 286 祖国联合会是欧洲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萨克森的一个广泛的民主组织,于1848年3月底在莱比锡建立,领导人是勃鲁姆、卢格、叶凯尔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该联合会在萨克森各地都设有分会。——320。

- 287 预备议会是指 184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代表会议。预备议会的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在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在全德国民议会召开之前使预备议会成为制宪机构的提议遭到否决之后,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一部分共和派退出了预备议会,但是以勃鲁姆为首的一部分比较温和的共和民主反对派则留下参加组织自由派提出的五十人委员会。温和的共和派在委员会中一共只得到 12 个席位。该委员会的任务是与联邦议会协调一致,以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该草案仅仅宣布了德国公民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并未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320。
- 288 法兰克福议会于 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制定宪法。在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把国民议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争论俱乐部,并在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向反革命势力屈服。1849 年春,自由派在他们起草的帝国宪法遭到普鲁士等政府反对之后退出了国民议会。随后议会迁往斯图加特,并于 1849 年 6 月 18 日被符腾堡当局解散。——321。
- 289 1848 年 10 月 6 日维也纳起义是由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保皇派试图取消 1848 年奥地利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引起的。德国皇帝下令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是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 1848 年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 日的激烈战斗,起义最后被德国政府军队镇压。——321。
- 290 指 1853 年关于东印度公司(见注 63)特许状的法令。该法令削弱了公司在印度的某些特权,而把它们移交给了英国国王。公司董事会被剥夺了任命官员的权利,董事人数由 24 人减到 18 人,其中 6 人由国王任命;督察委员会主席(见注 194)的地位与印度事务大臣的地位相当。不过公司的股东们仍然可以靠印度的捐税取得固定的红利。——329。
- 291 缅甸战争指 19 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征服缅甸而发动的战争。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 年)的结果是,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姆省和沿海的阿拉干、典那沙冷。根据 1826 年 2 月 24 日签订的杨端波条约,上述地区脱离缅甸。马克思在本文中指的是 1852 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其结果是缅甸的勃固省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由

于第二次英缅战争结束之后没有签订和约以及 1853 年 2 月即位的新的缅甸国王不承认勃固省被占领,所以在 1853 年,人们估计英国会对缅甸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又强加给缅甸许多不平等条约,并在 1885 年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吞并了整个缅甸的领土。——332。

292 中国战争指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又称鸦片战争。

1840—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强迫中国缔结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见注 18 和注 16)。这次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

1856 年 10 月,英国政府又利用亚罗号事件(见注 15)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年)。法国也参加了这次侵华战争。清朝政府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敌人采取息兵为要的政策,最后战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款、以及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和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由中国东南沿海侵入中国内地,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332、335。

293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 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被称为蓝制服)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 1795 年被平定,但是在 1799 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34、350。

294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 1848 年 2 月 25 日法令,为对付革命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 15—20 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分子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

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别动队作过具体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47—148 页)。——334。

295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 1849 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 1848 年 12 月 10 日经普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对共和派及

-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进行大规模镇压,后来它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它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4—187页)。——334。
- 296 柴明达尔是大莫卧儿(见注22)帝国时代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大土地税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其他某些地区实行起来。——336。
- 297 在1845年法国军队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佩利西埃将军(后来升为法国元帅)下令用烟熏死藏在山洞里的一千个起义的阿拉伯人。——337。
- 298 关于凯撒下令砍去几千个高卢军人的右手一事,见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第8册第44章,这一册是凯撒的朋友、曾在他手下任执政官的奥·希尔提乌斯写的(他为凯撒续写了关于高卢战争的纪事)。——337。
- 299 查理五世刑律又称加洛林纳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即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刑律》。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有火刑、四马分尸、投水溺毙、车磔、绞刑、斩首、断肢、割舌、砍手、剜眼、活埋等等。——337。
- 300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信徒身上和铺张奢靡的节日庆典获取大量收入。该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狂热的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把自己轧死。——337。
- 301 耶利哥城墙由于声浪的震荡而倒塌,指基督教徒圣经中耶利哥城墙在号角声中倒塌的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

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使久攻不破的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338。

- 302 这是1857年夏马克思撰写的以B字开头的词条之一。马克思在1857年8月26日给恩格斯写信说德纳提供的词条目录现已丢失,不过马克思在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重新列出了下面这个词条目录:《炮座》、《梭堡》、《刺刀》、《巴克莱-德-托利》、《炮兵连》、《会战》、《贝姆》、《下尼格先》、《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贝西埃尔》、《露营》、《掩障》、《布吕歇尔》、《勃鲁姆》、《玻利瓦尔-庞特》、《爆炸弹》、《炮手》、《轰击》、《双桅炮艇》、《防弹工事》、《炮艇》、《垛墙》、《博斯凯》、《布里安》、《桥(浮桥)》、《布朗(乔治爵士)》、《布吕纳》、《毕若》。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的最后也有一个以B字开头的词条目录。

马克思在1857年8月26日给恩格斯写信要求他尽快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寄来。到9月15日,他收到了三个词条,并于当天把这三个词条连同《巴克莱-德-托利》和《贝尔蒂埃》一起寄往了纽约。他笔记本上这一天的记录是:“巴克莱、贝尔蒂埃、刺刀、炮座、梭堡寄往《百科全书》”。马克思还在9月15日给恩格斯写信说,除了这些词条之外,他还给德纳寄出了《勃鲁姆》和《布里安》,不过,从他的笔记本来看,他是一周之后才把这两个词条与另外的材料一起寄往纽约的。——343、344、346。

- 303 1703年11月15日施派尔(德国西部)会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179)期间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步兵废除了长矛,改用刺刀,结果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军队。——346。
- 304 马克思在1857年9月—10月15日写《贝尔纳多特》这一词条时,为了对首先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贝尔纳多特作出全面的评述,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材料,包括:《古今世界名人传记》、《英国百科全书》、迈耶尔《名人录》、施洛塞尔《评拿破仑及其同时代的指摘者和颂扬者》,从这些参考书刊和历史文献中作了摘录。马克思在1857年9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了不同历史学家对贝尔纳多特的不同评价。恩格斯对这个词条的写作也给予很大帮助,他在1857年9月11日,尤其是9月21日和22日的信中,向马克思提供了关于贝尔纳多特的军事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他参加拿破仑1806年对普鲁士的战争和1809年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许多实际材料。

恩格斯主要以若米尼的《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为依据,对贝尔纳多特在这些战争中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几乎被马克思一字不改地用在该词条里。

马克思 1857 年 10 月 15 日在笔记本中作了如下的记载:“百科全书。军用桥。布朗。贝尔纳多特”,说明他是在这一天把这些词条寄往纽约的。——348。

- 305** 1794 年 6 月 26 日,茹尔丹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在弗列吕斯(比利时)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奥地利军队。这个胜利严重地打击了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 12);法国的革命军队乘胜占领了比利时,并在荷兰和莱茵河西岸发动攻势。1794 年 10 月初,法国军队渡过鲁尔河,占领幽里希要塞,并于同年 11 月 4 日迫使马斯特里赫特要塞投降。——348。
- 306** 督政府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 1794 年夏失败后所通过的 1795 年宪法建立的法国最高政权机关,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在 1799 年波拿巴政变以前,督政府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348、472。
- 307** 伊斯特里亚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省。法国军队于 1796—1797 年在意大利北部同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 12)的奥地利军队作战时,波拿巴的军队于 1797 年入侵伊斯特里亚,当年 5—6 月占领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最后,拿破仑在他所夺取的意大利北部土地上建立了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根据法奥双方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见注 309),波拿巴让出了包括伊斯特里亚在内的威尼斯的最后部分领土,作为交换,法国得到了除科隆以外的莱茵地区。——348。
- 308** 果月十八日(1797 年 9 月 4 日),根据波拿巴所支持的督政府(见注 306)的命令,政府军占领了立法团大厦,逮捕了勾结流亡贵族和准备发动君主制政变的保皇党议员。督政府本身也进行了改组,对保皇党采取镇压措施。具有政变性质的果月十八日事件反映了督政府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不稳固和它的左右摇摆。——349。
- 309** 1797 年 10 月 17 日的坎波福米奥条约结束了法国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 12)的奥地利的战争。根据条约,法国得到了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将莱茵河左岸让给法国,并且放弃

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这块土地划入在法国保护下成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过去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曾属于这个共和国的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土地让与奥地利。——349、472。

- 310 牧月三十日(1799年6月18日)政变以前,法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以及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引起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迫使立法团在牧月三十日撤换了督政府的成员,把三个露骨的反动分子赶出了督政府。——350。
- 311 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是第三次反法同盟(见注12)与法国进行的一次会战。在俄奥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这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取得了胜利。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彼得斯贝格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并于1806年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法同盟。——350、407、412。
- 312 奥尔施泰特会战和耶拿会战都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两次会战统称为耶拿会战)。第四次反法同盟同法国的战争(见注12)期间,法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在耶拿击溃了一部分普军。就在同一天,拿破仑的元帅达武的部队在奥尔施泰特附近击败了普军的主力。普鲁士由于在这两次会战中战败而丧失了将近一半的领土,最后,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7日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313)。——351、366、412。
- 313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见注12)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7日(同俄国)和9日(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对俄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的大陆封锁,见注316)。在蒂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始同自1806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未能缔结和约;1809年军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败后才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在蒂尔西特,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还达成了一项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巴尔干

半岛和瑞典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将在埃及和其余的非洲国家扩张势力,并可在欧洲为所欲为。

法国同丹麦的反对瑞典的军事同盟于1807年10月31日签订。——351、367。

- 314** 对瓦尔赫伦岛的远征指欧洲各国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英国舰队于1809年7月向斯海尔德河口进行的远征。远征是在拿破仑的主力因同奥地利作战而被牵制住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军在夺得瓦尔赫伦岛以后,未能利用它作为对安特卫普以及法军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其他据点展开军事行动的基地,而且4万名登陆部队由于饥饿和疾病损失了约1万人,因而被迫于1809年12月撤离该岛。——353、412、419。
- 315** 申布伦是维也纳的一座宫殿,奥皇的夏宫。奥地利军队在1809年的战争中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一于1809年秋季在这座宫殿里迫使奥地利接受媾和条件,同意将蒂罗尔合并给巴伐利亚。并于当年10月14日签订维也纳和约。——353。
- 316**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在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于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等国。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封锁便瓦解了。——354、400。
- 317** 布加勒斯特和约是1812年5月28日俄国和土耳其结束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把到普鲁特河为止的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省份割让给俄国,俄国获得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和约还规定土耳其应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约确认俄土两国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还确认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两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同土耳其签订这一和约,是由俄军的胜利和俄军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的外交手腕所促成的,它使俄国能够抽出大量兵力去对付拿破仑法国。——355。
- 318** 厄勒布鲁和约是1812年7月18日俄国和英国之间以及英国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旨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和平和同盟条约。——355。

- 319 奥布条约是1812年8月30日俄国和瑞典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形成了两国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还规定,如果丹麦拒绝把挪威让给瑞典国王,那么俄国有义务给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公国的领土要求。——356。
- 320 1813年3月3日条约是英国和瑞典之间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瑞典军队参加反拿破仑军队的军事行动,而英国须为此向瑞典提供资助。条约的第二条规定英国有义务支持瑞典占有挪威的要求。——356。
- 321 指第六次反法同盟(见注12)的俄国和普鲁士同拿破仑第一于1813年6月5日签订的休战协定。休战的最初期限到7月20日,后来延长到8月10日。在休战期间,亚历山大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贝尔纳多特于1813年7月12日在特拉亨贝格(西里西亚)城堡会晤,对今后的作战计划达成了协议。在休战期间进行的和谈破裂以后,奥地利正式加入了反拿破仑的同盟。1813年8月恢复了军事行动。——356、367。
- 322 莱比锡会战(1813年10月16—19日)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中1813年战局(见注263)中的一次决战。在会战中,巴克莱-德-托利指挥俄、奥、普和瑞典联军的中路。在这次历史上称为“民族之战”的会战中,双方参战的多达50万人。联军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整个战局中的胜利,德国也因此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莱比锡战役后,同盟国军队于1814年3月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于4月6日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357、370。
- 323 1830年法国革命指1830年7月在巴黎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357。
- 324 指1830年11月至1831年10月在波兰发生的民族解放起义。1830年11

月 29 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曾经赶走了沙皇军队,但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未能把农民吸引过来,最后起义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

恩格斯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他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说和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第 4 节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513—515 页)。——358、415。

- 325 瑞典的议会迫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压力于 1844 年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废除允许政府查封报纸的法律;规定议会每三年召集一次;男女同样享有土地继承权;用自由主义原则改革刑法典;在议会中成立一个专门实施选举改革的委员会。1845 年议会又使这些决议成为法律。——358。
- 326 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16 日开始撰写《军用桥》,但到 10 月中旬才写完。因为在曼彻斯特找不到必要的资料,他在 9 月 11 日或 12 日的信中请马克思在伦敦为他收集所需要的资料,包括霍·道格拉斯 1853 年伦敦版的《军事桥梁》。恩格斯收到马克思为这一词条摘录的许多资料后,在 1857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写信说:“非常感谢关于桥的资料。已完全够了。”——359。
- 327 凯撒横渡莱茵河发生在凯撒征服高卢时期(公元前 58—51 年)。公元前 55 年罗马军队追击溃败的条顿人,在莱茵河的中游地区渡河,在右岸停留了 18 天。横渡莱茵河是为了显示罗马的军事威力和恐吓日耳曼部落,在凯撒的《高卢战记》第 4 册中记载了这次渡河情况。——359。
- 328 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1848 年)是由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侵占墨西哥土地而发动的。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侵占了墨西哥几乎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北部、新墨西哥等地区。——361。
- 329 《布吕歇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又一词条。这一点从马克思 1857 年 9 月 17 日和 21 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 9 月 18、21 和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有关布吕歇尔的大量资料主要是马克思收集的。其中马克思作过摘录的主要著作就有:1856 年伦敦版《英国百科全

书》第5卷、1854年版的迈耶尔《名人录》第4卷、1854年巴黎版《古今世界名人传记》第4卷以及缪弗林1853年伦敦版的《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役的回忆》。恩格斯也对缪弗林这一著作作过摘录笔记。他在1857年9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军事活动家布吕歇尔作了总的评价并评述了在他所参加的主要战役中的活动。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评述补充了事实材料,这些评述构成本文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对全文作了最后的审定和文字的修饰。马克思在1857年10月31日给恩格斯写信说《布吕歇尔》这个词条已寄给德纳。——365。

330 指1787年普鲁士在英国政府支持和资助下对荷兰的武装干涉。这次武装干涉的目的,是使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五世重新执政。后者在1784年由于参加革命运动而被逐出荷兰。这次由主张对荷兰的殖民对手英国进行积极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爱国者”领导的革命运动,旨在反对贵族和商业寡头的联盟。普鲁士军队侵入荷兰后没有遇到荷兰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特别抵抗就恢复了威廉五世的政权。——366。

331 1794年普鲁士军队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12)军队作战,在摩塞尔河以南地区和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因同盟国英奥军队在比利时被击溃以及奥军在德国西部败北,普军司令部不得不在1794年秋天将它的军队撤到莱茵河右岸。

在这些战斗中担任普军轻骑兵指挥官的布吕歇尔写有《1793年和1794年战争日志》,该书由他的副官哥尔茨伯爵于1796年在柏林出版。——366。

332 巴塞尔和约是1795年4月5日参加了反法同盟(见注12)的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法国与普鲁士媾和是反法同盟瓦解的开始。1795年7月22日,西班牙也在巴塞尔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和约。——366。

333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其成员为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唤起爱国热情,争取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建立立宪制度,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普鲁士

- 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秘密存在到反拿破仑战争(见注 12)结束。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要求制定宪法而遭迫害,很快就瓦解了。——367。
- 334 德累斯顿会战(1813年8月26—27日)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中的一次会战。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击败了奥地利元帅施瓦尔岑堡指挥的同盟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联军(波希米亚军团,即主力军团)。联军在会战中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瓦尔岑堡没有采纳巴克莱-德-托利提出的反击拿破仑军队的翼侧的计划。波希米亚军团在布吕歇尔率领下艰难地退往山区。——369。
- 335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 16 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这些邦的军队都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包括 1812 年对俄国的战争。1813 年拿破仑军队战败后联邦瓦解。——373。
- 336 沙蒂永和该是 1814 年 2 月 4 日—3 月 19 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国(见注 12)代表同拿破仑第一的全权代表在沙蒂永城(塞纳河畔)举行的。同盟国提出媾和的主要条件是拿破仑放弃法国征服的一切领土以及法国恢复到 1792 年的疆界。由于拿破仑坚决拒绝这个条件,和谈破裂。——374。
- 337 拿破仑的皇家近卫军中新编部分自 1807 年起称为新近卫军,以区别于以前的近卫部队,即所谓老近卫军。对编入新近卫军的士兵和军官要求的条件较低,另一方面,新近卫军是补充老近卫军的后备部队。——374。
- 338 第一次巴黎和约是反法同盟(见注 12)战胜拿破仑后,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同法国于 1814 年 5 月 30 日签订的。根据这个和约,法国丧失了自 1792 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领土,仅边境附近的几个要塞和西萨瓦除外。

第二次巴黎和约是在拿破仑百日执政和第二次被推翻后,原来那些战胜国同法国于 1815 年 11 月 20 日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迫使法国交出了边境附近的几个要塞和西萨瓦,恢复到 1790 年 1 月 1 日的疆

界。——381。

- 339 指布吕歇尔在1815年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中的两次会战中的功绩。在1815年6月16日利尼会战中拿破仑战胜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这是拿破仑打的最后一次胜仗。普军虽然战败,但布吕歇尔却率领他的军队摆脱了法军的追击,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

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的决定性时刻,联军对法国军队紧追不放,最后拿破仑被击败,同年6月22日第二次退位,反法同盟的战争就此结束。——381。

- 340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驻伦敦记者指匈牙利作家兼记者弗·普尔斯基。他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任该报常任通讯员,主要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383。

- 341 廓尔喀人又称廓尔克赫人,是构成尼泊尔居民主要成分的民族,居住在尼泊尔中部及西南地区。一部分廓尔喀人住在印度北方邦(过去的英属印度时代的联合省)和同尼泊尔毗邻的西孟加拉各区。——384。

- 342 穆哈莱姆是伊斯兰教的阴历正月,这个月的最初十天被认为是哀悼忌期,纪念传说中的伊玛目(教主)侯赛因的殉难。在这个大斋期间,人们举行通常带有自我折磨性质的宗教仪式。穆哈莱姆节的第一天就是新年元旦。——385。

- 343 阿富汗惨剧指第一次英阿战争(1838—1842年)期间英军的一次溃退。英国军队于1839年占领了喀布尔。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向印度撤退,后来变为仓皇溃退。结果,4500名英国士兵和12000名随军服务人员中只有一人逃到了印度边界。——387。

- 344 恩格斯的《会战》写于1857年9月18—21日之间。他在1857年9月18日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时间允许,他将按德纳的要求把《会战》、《炮兵连》和其他以B字开头的词条给马克思寄来。不过,到所说的时间他只完成了第一个词条。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上的记载,他是1859年9月22日把《会战》与《勃鲁姆》、《布里安》和《下尼格先》一起寄往纽约的。《会战》刊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388。

- 345 洛伊滕会战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见注233)期间的一次会战。

- 1757年12月5日在西里西亚洛伊滕发生的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389、447。
- 346 科林会战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见注233)期间的一次会战。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捷克)发生的这次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军队被奥地利军队击败。——389。
- 347 库讷斯多夫会战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见注233)期间的一次会战。1759年8月12日在库讷斯多夫(普鲁士)发生的这次会战是七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俄国军队在萨尔蒂科夫的总指挥下大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普军失败的后果是1760年俄国军队暂时占领柏林。只是由于俄国同它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登上俄国王位,普鲁士才免于覆灭。——389、448。
- 348 《布朗》是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以“B”字开头的词条之一(见注302)。马克思在1857年8月26日给恩格斯写信说他收到了德纳寄来的B字开头的词条目录。他在9月17日和21日的信中曾要求恩格斯谈谈对布朗以及其他军事领导人的看法。接着,马克思又从《英国百科全书》(1856年)伦敦版第5卷第948页摘录了相关的材料。他未采用赞美布朗在克里木战争(见注38)中的作用的材料,主要对布朗之所以受到士兵爱戴的军事素养进行描述。根据马克思1857年笔记本上的记载,马克思在1857年9月21—10月15日之间写好的《布朗》是10月15日寄往纽约的。但是该词条的原稿可能丢失了。从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58年笔记本中4月17日的记录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得不将原稿的副本,或者是重新写的词条再次寄出。《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收入的就是后来寄出的词条。——392。
- 349 英军对哥本哈根的轰击发生在1807年9月,目的是阻止丹麦参加大陆封锁(见注316)。——392。
- 350 塔拉维拉会战(1809年7月27—28日)发生于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173)时期。会战中威灵顿和拉·库埃斯塔率领的英国和西班牙联军,在西班牙托莱多省的塔拉维拉击退了法国军队的进攻,法军遭受重创被迫放弃阵地。——392。

- 351 布莱登斯堡会战和攻占华盛顿是1812—1814年英美战争(见注164)最后阶段发生的两次会战。1814年8月,罗斯少将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英军特遣队在切萨皮克湾登陆。他们在离华盛顿6英里的布莱登斯堡村击溃了保卫首都的美国志愿军,并一度占领了首都。他们在放火烧了国会大厦、白宫和其他政府建筑后又回到他们的军舰上。——392。
- 352 阿利马会战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38)期间发生的一个战役,恩格斯在《阿利马》一文(见本卷202—204页)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描述。——392、410。
- 353 凸角堡战斗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38)期间发生的一场会战,凸角堡是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中的第三棱堡。1855年6月18日即滑铁卢会战40周年纪念日,英法等国的联军对它进行全面强攻,但结果遭到失败。马克思《六月十八日的失利。——增援部队》、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和《联军的最近一次失败》中,都有对这次会战的描述。——392。
- 354 恩格斯在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写信说,他打算写一个关于阿亚库乔的词条,但他是在9月21日马克思寄来收集的有关材料之后才开始动笔的。马克思的材料是从下列著作所作的摘录,即《世界名人百科全书》1833年巴黎版第2卷,《南美概况》1826年纽约版,何·塞·弗洛雷斯的《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第1—4卷,米·奥·普林西佩、希龙、萨托雷斯、里博的《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1848年马克思做的摘录。阿亚库乔会战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词条的结尾部分是马克思写的。这里对埃斯帕特罗及其拥护者的评述,同马克思在1854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埃斯帕特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47—455页)中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根据马克思1857年笔记本上的记载,这个词条是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起于10月23日寄往纽约的。——394。
- 355 在1824年8月6日的胡宁会战(秘鲁)中,西·玻利瓦尔指挥的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军队勇敢地越过安第斯山脉,击败了西班牙军队。这一会战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最后阶段。拉丁美洲的解放斗争开始于1810年,1816年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在过去

的总督管辖地拉普拉塔宣告成立了独立共和国(后来的阿根廷共和国)。玻利瓦尔重新恢复了争取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基多(厄瓜多尔)独立的战争,这一战争促使这些地区于1819—1822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墨西哥的解放战争重新恢复。在拉普拉塔(阿根廷)共和国军队的支持下,智利于1817年宣告独立,而秘鲁则于1821年宣告独立。玻利瓦尔的哥伦比亚军队于1824年为支援秘鲁共和国军队的进军,通过胡宁和阿亚库乔两次会战,彻底打击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西班牙残余部队于1826年被赶出了秘鲁沿岸地区。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在过去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成立了独立共和国:墨西哥、中美合众国(后来分裂为五个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后来分裂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秘鲁和智利。——394。

- 356 恩格斯在1857年5月2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经提出搜集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和《阿亚库乔》的资料问题。马克思接到信后就着手收集资料并从当年7月开始把资料寄给恩格斯(参看燕妮·马克思1857年8月11日和13日之间给恩格斯的信)。这些资料是对各种不同的材料经过精心编选后作出的摘录,其中包括《英国百科全书》中的词条《伊丽莎白》(1856年伦敦版第5卷第761—764页)和某些有关当时时事的著作。《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一词条的最后定稿只使用了马克思所提供的部分资料。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词条中没有提到《梅迪纳公爵等在驶往英国途中发布的命令》(1588年伦敦版),也没有提到佛罗伦丁作家佩·乌巴迪奴翻译的该书英译本《论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入侵英国并被女王陛下的海军击沉》(1590年伦敦版)。马克思所使用的是《哈雷杂录:奇书集》(1808年伦敦版第1卷)中收入的该书内容。恩格斯是在9月21日到10月19日之间写出这个词条的。他对马克思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摘录、编辑并补充了一些事实,于10月19日把手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对这个词条进行了最后的润色。从他1857年笔记本上的记录来看,这一词条是在1857年10月23日与《阿亚库乔》一起寄往纽约的。——396。

- 357 1792年6月20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群众冲入了王宫。这次游行是由大资产阶级党派吉伦特派组织的,目的本来是对国王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迫使他撤销关于解除吉伦特派内阁职务的决定,但结果成了反对王权和反对宫廷与外国干涉者勾结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反

对君主制度的情绪日益增长。后来事件发展为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义,结果在法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400。

358 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指法国与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时期拿破仑于 1800 年对意大利北部的进军,这次进军以法军在马伦戈战役(见注 272)中的胜利而告终。——400。

359 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写信说打算近日内把《炮兵连》寄给他。但在 9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又说他将着手写这个词条,也许会在第二天即 9 月 25 日开始动笔。实际上恩格斯在 9 月底才写完这个词条。马克思 1857 年笔记本中 9 月 29 日有将这个词条寄往纽约的记载:“百科全书。贝姆、贝西埃尔、博斯凯、露营、炮兵连、掩障、堞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词条时,编辑部把它与另一作者写的另一词条《浮动炮台》(“Floating Batteries”)合并在一起。后一词条包括了美国建造此种战舰的资料。——404。

360 马克思为撰写《博斯凯》曾从以下资料作过摘录:《英国百科全书》1856 年伦敦版第 5 卷和施特格尔的《名人录补遗》1856 年莱比锡-迈森版第 10 卷。由此可以看出,本文第一段是马克思执笔的。关于博斯凯参加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见注 38)的一段是恩格斯写的(见 1857 年 9 月 22 日他给马克思的信)。——410。

361 巴拉克拉瓦会战是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见注 38)期间的一次会战。1854 年 10 月 25 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进行的这次会战中,俄军准备切断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土联军与基地的联系,虽然俄军的进攻使联军,特别是英军骑兵遭到很大损失,但他们的主要作战意图并未实现。在恩格斯的《东方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71—681 页)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411、491。

362 对马拉霍夫冈的强攻是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见注 38)期间发生的一次会战。1855 年 9 月 8 日英法军队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事马拉霍夫冈进行强攻。结果,法军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领了该工事。俄军坚守十一个月之久的塞瓦斯托波尔终于被联军攻克(见注 385)。恩格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和《战争的决定性事件》这两篇文章中叙述了 9 月 8 日的强攻。——411。

363 马克思为撰写《贝西埃尔》曾从以下资料作过摘录：穆利耶《1789年至1850年间的军事名人传记》巴黎版第1卷、《英国百科全书》1856年伦敦版第5卷、迈耶尔《名人录》1845年版第40卷和《古今世界名人传记》1854年巴黎版等。

马克思在1857年9月17日给恩格斯写信询问包括贝西埃尔在内的军事将领的战功以及他们在某些会战中的作用等。恩格斯在9月21日回信中称贝西埃尔为勇敢的骑兵将领，从文章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接受了这一看法。——412。

364 立宪自卫军是按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过的1791年宪法，在废除过去的王室警卫部队以后担负保卫国王以及宫廷职责的特种部队。1792年5月，立法议会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解散立宪自卫军的法令。——412。

365 基准兵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的向导的部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军队中，基准兵担任拿破仑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也是他的私人卫队。——412。

366 罗韦雷多会战是法国同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的一次会战。波拿巴将军统率法军向意大利进军时于1796年9月4日在罗韦雷多（意大利北部）附近击败了奥地利的军队。——412。

367 里沃利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的一次会战。这次会战是1796—1797年战役中的一次重要会战（见注268）。——412、472。

368 弗里德兰会战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的一次会战。1807年6月14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进行的这次会战以拿破仑获胜而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卜尼格先》中对这一战役有具体的描述，见本卷第323—324页。——412。

369 《贝姆》的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写的。为撰写本词条，他曾从1865年伦敦版《英国百科全书》第5卷以及迈耶尔《名人录》1845年比尔德堡豪森、阿姆斯特丹、巴黎和费城版的第40卷中的同一词条作了摘录。他对贝姆作了政治上的评价，对词条全文进行了最后校订和文字上的润饰。同时马克思吸收了恩格斯对作为军事活动家的贝姆的评价（见1857年9月18日

-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和他为马克思而写的专题短评),以及对他在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期和1848—1849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的估价。此外,恩格斯还帮助马克思选择和校正了传记材料。——414。
- 370 但泽保卫战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普俄联军和拿破仑的一次会战。1813年初普俄军队包围了由拿破仑军队占领的但泽(格但斯克)。该城被围困十一个半月,在此期间,守军(拉普将军指挥下的法军和波兰军队)经受住了三次正规围攻,但是最后被迫投降。法军损失19000人,普俄军队虽然也损失了一万人,最后还是于1814年1月2日攻入该城。——414。
- 371 彼得堡起义指1825年12月14日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十二月党是一个由俄国反对贵族和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贵族所组成的秘密团体,在它的领导下,1825年12月14日彼得堡卫戍部队举行起义。十二月党人试图阻止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保证实行公民自由,召开制宪会议以解决宪法问题。起义被沙皇的军队镇压,参加者受到严厉的处罚。五位领导人被判绞刑,121名参加者被判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和流放。——415。
- 372 奥斯特罗文卡会战发生在波兰起义(见注324)时期。1831年5月26日在奥斯特罗文卡附近由吉比奇统率的沙皇军队击败了波兰起义军。最后俄国于1831年9月6日袭击华沙郊区的沃利亚之后随即占领了华沙。起义军的残余逃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415。
- 373 贝姆于1833年为唐·彼得鲁招募波兰军团。当时贝姆打算参加葡萄牙内战(1828—1834年)。这次内战是在以1828年夺得葡萄牙王位的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主义者(封建教权派)和聚集在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女王及其父亲唐·彼得鲁周围的立宪主义者(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415。
- 374 维也纳机动自卫军是贝姆在维也纳1848年十月起义(见注289)时组织的,其成员大多数是维也纳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它是一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和最勇敢的起义武装力量。——415。
- 375 特兰西瓦尼亚战争发生于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期间。1849年2—3月间,贝姆率领的匈牙利革命军用强行军向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推进,

- 沿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队，把一支俄国军队赶出了城，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俄军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接着贝姆又和佩尔采尔的部队完成了向巴纳特的进军。1849年夏天，由于沙皇军队全面进攻，贝姆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他又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并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出了城，但由于沙皇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优势兵力，最后不得不撤退。——416。
- 376** 护国军(匈牙利文 Honved, 意为祖国保卫者)原来是中世纪匈牙利步兵的名称。在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是对1848年夏匈牙利革命政府建立的匈牙利革命军士兵的称呼。后来有时人们也把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士兵叫护国军。——416。
- 377**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416。
- 378** 贝姆率军远征巴纳特(塞尔维亚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是在1849年春天。1848年革命初期，在伏伊伏迪纳兴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城乡民主阶层反封建的斗争也随之加强。但是由于当地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软弱和叛变，民族运动很快就被与奥地利反革命结成同盟的反动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控制了。塞尔维亚人争取自治的运动被哈布斯堡王朝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1848年夏天，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之间发生战事，巴纳特塞尔维亚居民与非塞尔维亚居民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使战事复杂化。1849年春天，贝姆和匈牙利将军佩尔采尔的军队在巴纳特多次击败奥军和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但是这些胜利未能影响匈牙利人革命战争的总进程。在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当时属于匈牙利的民族地区，匈牙利资产阶级贵族革命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阻碍了他们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直到1849年他们才认识到与被压迫民族合作的必要性，并于当年7月28日颁布了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417。
- 379** 1849年8月9日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决战是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海瑙统率的奥军击败了力图扼守自己的阵地直到与匈牙利总司令戈尔盖率领的北方军团会合的匈牙利南方军团。在这次失败以后过了四天，北方军团就向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遭到镇压。——417。

- 380 1850年秋,在阿勒颇(哈勒布)城发生了阿拉伯居民反对当地的基督教徒和土耳其当局的事件,随后又发展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11月,起义被土耳其军队镇压。——418。
- 381 马克思在1857年9月29日和10月6日写的两篇《印度起义》中,不仅对印度起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政治目的作了评价,而且也从军事观点介绍了起义中作战双方的情况。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利用了恩格斯1857年9月24日给他的来信。这封信中某些文字下面有马克思划的横线、加的着重号。——419、432。
- 382 《爆炸弹》是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篇以B字开头的词条。马克思曾从英国博物馆的藏书如帕汀顿的《不列颠艺术和科学百科全书》作了一些摘录,大约于1857年9月15日把它与有关桥的摘录一起寄给了恩格斯。马克思1857年笔记本上10月6日有如下记载:“百科全书。爆炸弹、轰击、双桅炮艇、炮艇、炮手、防弹工事”,表明他是在那一天把这些条目寄往纽约的。——423。
- 383 瓦朗谢纳剂是由硝石、硫磺和火药制成的混合燃烧剂。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见注12)时期,1793年奥英军队围攻法军防守的瓦朗谢纳城时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混合燃烧剂。——423。
- 384 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期(见注38),1855年8月9—11日英法舰队对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俄国要塞斯韦阿堡(芬兰堡)进行长达45小时的轰击。关于这次轰击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法对俄战争》一文。——428、431、459。
- 385 塞瓦斯托波尔尔围攻战(1854年9月28日—1855年9月8日)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38)时期的一次主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尔被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包围后,被围困的俄军曾坚守11个月之久,最后,在1855年9月8日终于被联军强行攻克。这一战役决定了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败局。——431。
- 386 桑塔尔人是印度的一个民族,祖先是德拉维达人。桑塔尔人居住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北奥里萨等地的山区。——437。
- 387 德纳1857年5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炮兵’这个词条应该介绍关于这个兵种的全部科学和实践,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情况,——与火炮有

关的情况除外,这方面的内容将归入另外的词条。”

从恩格斯 1857 年 7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打算在完成以 A 字开头的一些小词条之后,立即动手写《炮兵》和《军队》。但是,由于他忙于撰写《军队》和以 B 字开头的词条,到 10 月 19 日才开始写《炮兵》。他在这一天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现在我着手写《火炮史》”。在随后几封来往信件(恩格斯 185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5 日和 17 日致马克思,马克思 185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3 日和 1858 年 1 月 23 日致恩格斯)中,这篇文章都被称为《火炮史》或《火炮》。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先并未想到它会收入以 A 字开头的第 2 卷。从马克思 1857 年笔记本的记载来看,这篇文章是 11 月 27 日寄往纽约的,因而来得及收入《百科全书》第 2 卷,收入时用了原来的标题《炮兵》。——438。

- 388** 阿拉伯人大举侵入亚洲和非洲的时期,指 7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国并建立阿拉伯伊斯兰教国的时期。——439。
- 389** 《罗吉尔·培根修道士论艺术和自然界的秘密以及论魔法的荒诞的信》这一著作的写作时间以及作者的出生年代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资料。在 19 世纪的军事学术史方面的文献中,一般都认为它的写作年代是 1216 年。恩格斯这里也沿用这一说法。但据后来的考证,该著作写于 13 世纪 40 年代,第 1 版于 1524 年在巴黎问世。——439。
- 390** 1118 年萨拉戈萨围攻战指阿腊贡国王阿尔丰斯一世的军队收复自 712 年以来被伊斯兰教徒侵占的萨拉戈萨城(阿腊贡)的战争。收复萨拉戈萨是收复失地行动即收复 8 世纪初阿拉伯人侵入时期被阿拉伯人和非洲柏柏尔人(“摩尔人”)所侵占的比利牛斯半岛领土的一个阶段。在 8—9 世纪就已开始的收复失地运动中,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以及葡萄牙起了主要作用。12 世纪下半叶,由于阿尔摩哈德派教徒侵入比利牛斯半岛,收复行动曾一度停止。阿尔摩哈德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它联合了周围山地的柏柏尔部落,并且在第一个伊玛目-哈利发阿卜杜尔-穆明时期曾统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伊斯兰教地区。13 世纪初,卡斯蒂利亚和阿腊贡在其他国家的十字军的支援下,击溃了阿尔摩哈德派并恢复了收复行动。1236 年,卡斯蒂利亚人收复了科尔多瓦——以前的哥多瓦伊斯兰教王国(于 1031 年崩溃)的首都,13 世纪

末,伊斯兰教的统治地区只限于南部的格拉纳达伊斯兰教国。西班牙人继续同这个伊斯兰教国进行斗争,1492年终于占领了这个国家。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是收复行动历史中的一系列事件。——440。

- 391 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即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征讨(见注223)时期建立的僧侣骑士团。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残杀东普鲁士的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条顿骑士团和另一个德意志骑士团(即立风骑士团,它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合并。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波兰,1525年骑士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地变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440。
- 392 1495年7月6日福尔诺沃(意大利北部)会战发生在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初期。会战中意大利北部封建国家的军队进攻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拥有强大炮兵的法军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法王查理的军队在对意大利进行掠夺性的征讨之后,经过亚平宁山脉返回法国。——442。
- 393 朗蒂(佛兰德)会战发生在1554年8月13日,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联合德意志新教诸侯共同反对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时期的一次会战,会战中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撤除了对朗蒂城的包围并退回到法国边境。——442。
- 394 格赖芬哈根会战和法兰克福会战发生在三十年战争(见注228)中的瑞典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于1630年12月逼近奥得河畔的格赖芬哈根要塞,并在两次强攻之后迫使德意志帝国的守军放弃了要塞。1631年4月,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又以强攻夺取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在这两次会战中,瑞典炮兵起了很大的作用。——445。
- 395 1790年9月11日马尔普拉凯(比利时)会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178)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英奥荷联军在萨瓦亲王奥伊根和马尔波罗公爵的指挥下击败了维拉尔元帅的法军。——446。
- 396 1793年9月14日皮尔马森斯(德国西部)会战是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12)时期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成功地使用了大量炮

兵,击败了法国摩塞尔军团。——451。

- 397 附在本文最后的这个统计表 469—470,大概是与本文一起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把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7 年 11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0 号,把表格单独排在同一号报纸的第 6 页上。——468。

- 398 马克思 1857 年 9 月 17 日给恩格斯写信说他打算写一篇关于布吕讷的文章。但在 9 月底以前他都没有动笔。《布吕讷》的写作时间大约在 1857 年 11 月 27 日和 1858 年 1 月 8 日之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没有关于这篇文章的寄送情况的记载。马克思 1858 年 2 月 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德讷已经收到的词条中包括了《布吕讷》。

马克思为布吕讷词条准备的资料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35 年出版的施洛塞尔的《评拿破仑及其同时代的指摘者和颂扬者,特别是在 1800—1813 年这段时期内》一书的摘录。《布吕讷》还有一篇比本篇更详细的草稿,它主要是依据施洛塞尔这本书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献,如《古今世界名人传记》1854 年巴黎版《世界名人传记》第 6 卷和《英国百科全书》1856 年伦敦版第 5 卷写成的。——471。

- 399 科尔德利俱乐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790 年在巴黎建立的人民俱乐部之一。俱乐部的这个名称源自其集会地点、过去的法兰西斯科教派科尔德利修道院,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它与雅各宾俱乐部一样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科尔德利俱乐部最初联合了后来组成雅各宾集团右翼(丹东派)和左翼(阿贝尔派)的各派代表。随着革命的深化,左派分子在俱乐部取得了优势。在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俱乐部是阿贝尔派的堡垒,它一直存在到 1794 年 3 月阿贝尔派被击溃。

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都用“科尔德利”这个词称呼属于雅各宾左派的或是接近他们的革命者。——471。

- 400 玛尔斯广场示威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1 年 7 月 17 日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举行的反君主制度的示威。科尔德利俱乐部(见注 400)的首领们领导了这次示威,他们草拟了向制宪议会提出的要求国王退位的请愿书。示威遭到政府军队和拉斐德率领的国民自卫军的镇压。——471。

- 401 九月事变指 1792 年 9 月 2—5 日在巴黎发生的人民骚动。由于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 12)的军队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跃,巴黎群众占领了监狱,设立了对被监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积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471。
- 402 1793 年 9 月 6—8 日翁斯科特会战是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时期进行的一次会战,会战中法国军队击败了同盟国英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的军队。——471。
- 403 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1793 年 4 月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成立。委员会分六个部,分别主管军事、海军、外交、税收、内政、司法。据 1793 年 12 月 4 日法令,救国委员会成为国民公会所有 21 个委员会的领导者,负责监督和推动政府各部的工作。1793 年 4—7 月,救国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成员是丹东;7 月,国民公会改组救国委员会,由 9 人组成,丹东落选。此后,委员会改由 12 人组成,成员有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库东、卡尔诺等人,又称“大救国委员会”,领导人是罗伯斯比尔。1794 年春,救国委员会内部分歧日益尖锐,以卡尔诺为首的多数派,在公安委员会(Comite de sêreté générale)支持下,发动了热月政变(见注 267),罗伯斯比尔被处死,救国委员会权力削弱。1795 年 10 月 26 日,它同国民公会一起被解散。——471。
- 404 吉伦特派叛乱指 1793 年夏天吉伦特派(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党派)联合反革命保皇党人在吉伦特省以及卡耳瓦多斯省和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其他许多省发动的叛乱。吉伦特派在保护各省自治权和联邦权的幌子下反对雅各宾政府,反对支持政府的革命群众。1793 年秋天,吉伦特派的反革命“联邦制”运动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镇压。之后包括巴巴鲁在内的许多吉伦特派领袖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471。
- 405 丹东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右翼,由 1793—1794 年集结在丹东周围的一批人组成,代表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所谓新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减少革命恐怖,取消最高限价等。在丹东和他的战友 1794 年 4 月被处死之后幸存的丹东的拥护者,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积极地参加了 1794 年热月九日的政变(见注 267)。——472。

- 406 巴黎市区的叛乱指 1795 年 10 月 4—5 日保皇党人在巴黎举行的叛乱。这一叛乱被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政府军队镇压。——472。
- 407 格勒内勒兵营密谋指 1796 年 9 月 9 日巴贝夫派在巴黎格勒内勒兵营发动的起义。巴贝夫派是巴贝夫的拥护者，他们力求以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巴贝夫和他的亲密战友 1796 年 5 月被捕以后，巴贝夫派试图解救他们，在推翻督政府（见注 306）和恢复 1793 年雅各宾宪法的口号下在格勒内勒兵营发动了起义。巴贝夫派的起义被政府军队镇压。——472。
- 408 巴达维亚战役是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12）时期，1799 年 8—10 月布吕讷将军率领的法国和荷兰军队对在荷兰登陆的英俄军队进行的成功的战役。荷兰被法国占领并宣告成立傀儡的巴达维亚共和国以后，已成了依附于法国的国家。英俄远征的目的是要把法国人赶出荷兰，并在该国恢复革命前的君主制度和夺取荷兰的舰队。同盟国军队的总司令约克公爵被布吕讷军队击败以后，不得不于 1799 年 10 月 18 日签订阿尔克马投降书，根据投降书他必须遣返 8 000 名法国和荷兰的战俘，并且从荷兰撤走自己的军队。——472。
- 409 布洛涅兵营是拿破仑第一为实现通过拉芒什海峡入侵英国的计划，于 1803—1805 年在布洛涅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他在这里集中了约 2 500 只小运输船和 10 万—15 万人的登陆部队。由于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军打败，以及俄奥普等国参加的第三次反法同盟（见注 12）的建立，拿破仑被迫放弃了他的入侵计划。——473。
- 410 指 1814 年 3 月 31 日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军队进入巴黎以后，法国元老院通过的关于废黜拿破仑和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法令。——473。
- 411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率军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 6 月 22 日他在滑铁卢（见注 158）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止。——473、496。
- 412 马克思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参考过托·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57 年伦敦版。文章于 1857 年 11 月 6 日写成，作为社论发表于 1857 年 11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6 号。马克思在 1857 年 12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论坛报》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快

意的事情。11月6日我在给它写的一篇解释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的文章中说,过不了几天就会看到该法令暂停实行的滑稽戏,不过,特别令人关注的倒还不是这种金融恐慌,真正的关键在于正在到来的工业衰败。”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24日,《纽约时报》出来反对马克思的论断,宣称“所谓英国‘工业衰败’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然而,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接到来自大西洋的电报,传来银行法暂停实行的消息,同时还有‘工业衰退’的消息”。——475。

- 413 1844年银行法是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于1844年7月19日公布的《银行券发行改革法》,它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475。
- 414 在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金融危机。皮尔法令暂停实行》。——481。
- 415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句话后面附加了一句话:“富尔顿号带来的消息,即我们通过电报收到并于今晨发表在本报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看法。”——481。
- 416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487、516。

- 417 拿破仑第三于1857年11月10日签署一项法令,该法令废除了1856年9月8日和1857年9月22日的关于禁止谷物、面粉以及其他食品出口的法律。——487、508。
- 418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句话的后面添加了下面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在我国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有些哲学家像我们的《泰晤士报》和《独立报》的同仁那样,认为只要人民假装高兴并三呼万岁,灾难就能避免。”——487。
- 419 《毕若》这一词条,马克思大约是11月底写成的。从马克思1857年笔记本来看,他是11月27日将本词条和恩格斯的《炮兵》一起寄往纽约的。
马克思在撰写B字开头的一些军事领袖和政治家的词条时,曾询问恩格斯对他们(包括毕若在内)的看法(见他于1857年9月17日和21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在9月22日的回信中介绍了毕若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活动。马克思参考了恩格斯的意见。此外,马克思还参阅了以下著作:摩·瓦格纳《阿特拉斯上空的三色旗,或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征服》1854年伦敦—爱丁堡—纽约版和丹·斯特恩《1848年革命史》1850年巴黎版第1卷,并对这些资料作出摘录。——496。
- 420 1805年战争时期指第三次反法同盟(见注12)。各国军队和法国军队的那些会战。——496。
- 421 毕若1811年参加的这些战斗均发生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173)时期。——496。
- 422 指法国军队为了镇压1820—1823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对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1822年7月7日试图占领革命的马德里,遭到失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15年结成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援助他镇压革命。根据神圣同盟维罗纳会议的决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昂古莱姆公爵指挥的法国军队于1823年进入西班牙,在该国恢复了专制制度,并在西班牙一直驻留到1828年。——496。
- 423 指巴黎工人和站到工人这一边的巴黎小资产阶级阶层于1834年4月13—14日举行的反对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争取成立共和国的起义。巴黎事件是对当时在里昂爆发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起义的响应,里昂起义

- 还引起了法国其他一些城市的革命运动。正像里昂起义一样,巴黎起义也是由秘密组织,主张共和民主运动的人权和公民权之友社这一秘密组织领导的。起义的主力是巴黎工人,他们同政府的军队进行了两天残酷的街垒战。最后,在军人集团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和政府对民主派的迫害下遭到镇压。——497。
- 424 塔夫纳条约是毕若和阿卜杜尔·卡迪尔于1837年5月30日在塔夫纳河畔签订的。1835年,法国殖民者破坏1834年同阿卜杜尔·卡迪尔签订的和约,重新向他开战,以夺取获得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西部。既没有取得重大战果,同时又需要抽调兵力去镇压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的起义,法国政府只得批准毕若签订的新和约。根据塔夫纳条约,法国被迫再次承认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不包括法国控制的某些沿海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阿尔泽等)的阿卜杜尔·卡迪尔国家的独立。1839年,法国再一次破坏和约。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下重新恢复反对法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245)。——497。
- 425 在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斗争(见注245)期间,1844年毕若和其他的法国将领通过收买当地封建主和采取恐怖手段对付阿尔及利亚部落的方法,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西部。毕若以摩洛哥苏丹拒绝交出转到摩洛哥的阿卜杜尔·卡迪尔为借口,率领军队侵入摩洛哥领土。1844年8月,毕若在伊斯利河会战中击溃了摩洛哥人的武装力量。同时,法国舰队毁坏了丹吉尔城和摩加多尔城。但是,因为英国对法国在北非的领地的扩大趋势感到不安而威胁要进行干涉,法国殖民者被迫暂时放弃对摩洛哥的占领。毕若根据1844年9月10日的丹吉尔条约,迫使苏丹逐走阿卜杜尔·卡迪尔和解散摩洛哥的边防部队,然后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摩洛哥领土。——498。
- 426 毕若和基佐之间的分歧是因为毕若想利用镇压1845—1847年阿尔及利亚起义的机会,进一步侵占北非(他于1847年5月远征卡比利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和再度入侵摩洛哥。而一贯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的基佐政府当时则认为毕若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很尖锐的英法矛盾。——498。
- 427 指1848年2月24日七月王朝被推翻(见注139)后所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政府成员大多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有三个社会民

- 主党改良派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弗洛孔、路易·勃朗和一个工人阿尔伯特(真名马丁)。——499。
- 428 指毕若在不同时间出版的著作,这些著作叙述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各次战争和对这个国家实行侵略和殖民化的计划。——499。
- 429 伦巴特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一些大银行和贴现所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英格兰银行只贴现各家银行的第一流票据,而伦巴特街则贴现一切票据,并且这里的贴现率,即所谓的市场贴现率,一向高于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511。
- 430 马克思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8年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19号。现在的标题源自他1857年笔记本上的记录:“12月25日,法国的危机”。他在同一天,即1857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谈到了自己对法国危机的看法。——514。
- 431 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土地信用公司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50年)。土地信用公司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518。
- 432 巴黎全国贴现局成立于1848年。起初它贴现有两个背书的期票并发放以存放在公共仓库中的商品作抵押的贷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成了股份公司(从1853年起)并取得发放以法国无期证券、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作抵押的贷款的特权。——518。

人名索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42、43、58、73、110。
- 阿卜杜尔·卡迪尔(Abd-el-Kader 1807—1883)——阿尔及利亚埃米尔, 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斗争(1832—1847)的领袖, 1847年被法军所俘, 1852年经法国政府允许流亡大马士革。——276、283、497、498。
- 阿卜杜尔·拉曼(Abd ur Rahman 1790—1859)——摩洛哥苏丹(1822—1859)。——498。
-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Medjed I 1823—1861)——土耳其苏丹(1839—1861)。——417。
- 阿卜杜尔·穆明(Abd el Mumen 1094—1163)——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阿尔摩哈德王朝伊斯兰教国家第一个哈利发(1130—1163)。——440。
- 阿代尔, 罗伯特(Adair, Robert 1763—1855)——英国外交家, 查·詹·福克斯的老搭档。——36。
- 阿尔布雷希特第三(Albrecht III 1350左右—1395)——奥地利大公(1365—1395)。——3。
- 阿尔古伯爵, 安东·莫里斯·阿波利内尔(Argout, Antoine-Maurice-Apollinaire comte d' 1782—185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 1830—1834年历任内阁大臣, 法兰西银行总裁(1834—1857)。——155、156。
- 阿尔科伊——见龙卡利, 费德里科, 阿尔科伊伯爵。
- 阿尔瓦公爵, 费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皮门特尔(Alba, 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y Pimentel, duque de 1507—1582)——西班牙统帅, 1567—

1573年为尼德兰总督,曾残酷镇压尼德兰人民起义。——203、251。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Duke of 1823—1900)——英国国务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掌玺大臣(1853—1855、1859—1866、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和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485。

阿革西拉乌斯(Agesilaus 公元前444—361)——斯巴达王(公元前401—361)。——235。

阿克罗伊德,爱德华(Ackroyd, Edward)——英国厂主,辉格党人,议会议员。——98。

阿利安,弗拉维(Arrianus, Flavius 约95—180)——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写有许多古代史方面的著作。——359。

阿列科帕沙——见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

阿米蒂奇,埃尔卡纳(Armitage, Elkanah)——英国议会议员,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96。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出名。——361。

阿什伯纳姆,托马斯(Ashburnham, Thomas 1807—1872)——英国将军,1857年奉命率兵侵华;由于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爆发,被调往印度。——167。

阿什拉夫(Ashraf 死于1730年)——波斯沙赫(1725—1730)。——24。

埃尔比荣,埃米尔(Herbillon, Émile 1794—1866)——法国将军,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284。

埃尔芬斯通,蒙特斯图亚特(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779—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796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1808年任驻喀布尔大使,1819—1827年任孟买省督;《印度史》一书的作者。——220。

埃尔芬斯通,威廉·乔治·基思(Elphinstone, William George Keith 1782—1842)——英国将军,1841年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中任喀布尔英军指挥官。——222、223。

埃尔芬斯通,约翰(Elphinstone, John 1807—1860)——英国将军,曾任马德拉斯省督(1837—1842)和孟买省督(1853—1859)。——467。

埃克斯茅斯,爱德华·佩留(Exmouth, Edward Pellew 1757—1833)——英国海军上将,1816年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作战的舰队司令。——280。

- 埃利安努斯(Aelianus 2 世纪)——希腊军事著作家。——438。
- 埃利斯,亨利(Ellis, Henry 1777—1855)——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14—1815),后任大使(1835—1836)。——26。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224、273。
- 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 公元前 420 左右—362)——古希腊统帅和国务活动家。——181、183、234。
- 埃瑟里奇(Etheridge 死于 1857 年)——英国海军上将,1856—1857 年英国波斯战争中任英国海军指挥官;后自杀。——160。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进步党领袖;政府首脑(1839—1841 和 1854—1856),西班牙摄政(1841—1843)。——149、153、395。
- 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ed-Shah Durrani 1724—1773)——阿富汗的沙赫(1747—1773),阿富汗国家和杜兰尼王朝的创立者。——24、217、218。
- 艾雷,理查德(Airey, Richard 1803—1881)——英国将军,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军军需长,后为英军兵站总监(1855—1865)。——168。
- 安德烈,厄内斯特(Andrée, Erneste)——法国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之一。——341。
- 安德森,罗伯特(Anderson, Robert 死于 1696 年)——英国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7。
- 安森,乔治(Anson, George 1797—1857)——英国将军,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856—1857)。——185。
- 昂古莱姆公爵,路易·安东(Angoulême, Louis-Antoine, duc d' 1775—1844)——法国亲王,1823 年曾指挥法国军队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查理十世的儿子。——496。
- 奥当奈尔-霍里斯(奥当奈尔),莱奥波多,卢塞纳伯爵和得土安公爵(O' Donnell y Jorris [O' Donnell], Leopoldo, conde de Lucena y duque de Tetuán 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之一;曾任古巴总督(1843—1848);1854 年利用国内革命危机建立军事专政,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1854—1856)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政府首脑(1856、1858—1863 和 1865—

1866);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任西班牙远征军总司令。——149、150、151、153。

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见阿尔布雷希特第三。

奥尔登堡亲王,格奥尔格·彼得·弗里德里希(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Oldenburg, Georg Peter Friedrich(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Prinz 1784—1812)——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女婿,1809—1812年任特维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和诺夫哥罗德省总督,俄国交通总监。——353。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

奥尔苏费耶夫,查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Олсуфьев, Заха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773—1835)——俄国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5。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244、245。

奥古斯特(August 1779—1843)——普鲁士亲王,将军和军事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8—1843年任普鲁士炮兵司令,并领导改编炮兵。——377。

奥古斯滕堡公爵,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Augustenburg, Christian August, Herzog 1768—1810)——丹麦贵族,将军,1810年1月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收为养子,称查理-奥古斯特。——353。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Auckland, George Eden, Earl of 1784—184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26、221。

奥鲁治·巴巴罗萨(Horuk Barbarossa 1473左右—1518)——土耳其海盗,阿尔及尔统治者(1515—1518)。——276。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儿子,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1848);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83、498。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奥热罗,皮埃尔·弗朗索瓦,沙尔(Augereau, Pierre-François-Charles 1757—

1816)——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77、472、474。

奥斯本,托马斯,丹比伯爵,卡马森侯爵,利兹公爵(Osborne, Thomas, Earl of Danby, Marquis of Carmarthen, Duke of Leeds 1631—171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674—1679和1690—1695);1695年被议会指控犯有贪污罪。——36。

奥斯卡尔一世(Oskar I [Oscar] 1799—1859)——瑞典和挪威的国王(1844—1859)。——300。

奥斯滕-萨肯,法比安·威廉莫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 Фабиян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1752—1837)——俄国将军,1826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68、373、376、377。

B

巴卑尔(Baber 1483—1530)——印度的钵谿沙赫(1526—1530),大莫卧儿国家和王朝的创立者;帖木儿的后裔。——217。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格拉齐昂公爵,彼得·伊万诺维奇(Багратион,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нязь 1765—1812)——俄国统帅,苏沃洛夫历次远征和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309。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Bahadur-Shah II 1767—1862)——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钵谿沙赫(1837—1858),1849年起靠英国人供养,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权;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57)时被起义者重新立为皇帝;1857年9月德里陷落后被英军逮捕并流放到缅甸(1858)。——185、419。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俄国统帅和军事家,1814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国指挥官,曾任陆军大臣(1810—1812),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1813—1814年任俄军和俄普军队指挥官。——308—310、318、368。

巴伦西亚公爵——见纳尔瓦埃斯,拉蒙·马利亚,巴伦西公爵。

巴罗,阿道夫(Barrot, Adolphe 1803—1870)——法国外交官,1845年任驻埃及总领事。——162。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

- 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173。
- 巴纳德,亨利·威廉(Barnard, Henry William 1799—1857)——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1857年是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围攻德里的英国军队指挥官。——212、270—273、294—296、322—324、434。
- 巴夏礼,斯密斯(Parkes, Harry Smith 1828—1885)——英国外交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曾参加攻占镇江的战役;1856年任驻广州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英军窃踞广州后为驻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员之一(1858—1859);1860年随额尔金北上,随同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曾任驻上海领事(1863—1865)、驻日公使(1865—1883)和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1883—1885)。——18—20、63、78、91、92。
- 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Buckingham, Henry Stafford, Duke of 1454左右—1483)——英国封建主,曾助理查三世登上王位,后叛变被处死。——73。
- 拜伦勋爵(Byron, Lord)——1588年同西班牙舰队作战时为英国海军司令。——398。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对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95。
- 邦迪埃拉,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1844)。——71。
-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议会议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继文翰任香港的总督兼驻华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主张对中国积极进行侵略;1856年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9、63—67、72、73、74、78、92、337。
-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316。
- 鲍彻,乔治(Bourchier, George 1821—1898)——英国军官,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433。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30—31、33、36—42、43、44。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法国,1859年回国。——498。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Berthier, Louis-Alexandre 1753—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拿破仑第一的陆军总参谋长,拿破仑帝国倒台(1814)以后转向波旁王朝。——311—314、374、473。

贝尔蒂埃,让·巴蒂斯特(Berthier, Jean-Baptiste 1721—1804)——法国军事工程师,贝尔蒂埃元帅的父亲。——311、312。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74。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319、327、348—358、366、368、370—372、412。

贝勒加德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Bellegarde, Friedrich Heinrich Graf von 1756—1845)——奥地利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52。

贝雷斯福德子爵,威廉·卡尔(Beresford, William Carr, Viscount 1768—1854)——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多次殖民远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任葡萄牙军队总司令(1809—1823),英国炮兵总监(1828—1830)。——192。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斐迪南达·路易莎(Berry Marie-Caroline-Ferdi-

- nande-Louise, duchesse de 1798 — 1870)——正统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年企图在旺代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利浦一世。——496。
- 贝利多尔,贝尔纳·福雷·德(Belidor, Bernard-Forest de 1693 — 1761)——法国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筑城学、炮兵学和数学方面的著作。——447。
- 贝列拉,雅克·埃米尔(Péire, Jcques-Émile 1800 — 1875)——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弟伊·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136—137、138—141、175、342。
- 贝列拉,伊萨克(Péire, Isaac 1806 — 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134—137、138—141、341—342。
-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 — 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414—417。
- 贝瑟尔,理查,韦斯特伯里男爵(Bethell, Richard, Baron Westbury 1800 — 1873)——英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副检察长(1852—1856)、首席检察官(1856—1858、1860—1861)、大法官(1861—1865)。——71。
-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 — 1813)——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412。
- 比肯费尔德,威廉(Birkenfeld, Wilhelm)——贝尔蒂埃元帅的岳父。——314。
- 比拉戈,卡尔(Birago, Karl 1792 — 1845)——奥地利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舟桥体系,19世纪中叶被许多欧洲国家用来装备军队。——360。
- 比林古乔,万努乔(Biringuccio, Vannuccio 1480 — 1539)——意大利化学家和冶金工程师,《论烟火制造术》一书的作者。——443。
- 比雄男爵,路易·安德烈(Pichon, Louis-André, baron de 1771 — 1850)——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30年代初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政长官。——282。
-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 — 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25、290。
- 毕罗,让(Bureau, Jean 死于 1463年)——法国军事工程师,30—50年代曾领导

- 法国炮兵,对炮兵作了一系列改进,加斯帕尔·毕罗的兄弟。——441。
- 毕罗,加斯帕尔(Bureau, Gaspard 死于 1469 年)——法国军事工程师,30—50 年代曾领导法国炮兵,对炮兵作了一系列改进。——441。
-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爵(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Dennewitz 1755—1816)——普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56、370、373、378。
-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 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 年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8—1849)。——496—499。
-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63。
- 卜尼格先,阿马利亚·厄尔加德(Bennigsen, Amalie Oelgarde)——莱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卜尼格先的第三个妻子。——315。
- 卜尼格先,莱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列昂节·列昂节耶维奇)(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俄国将军,汉诺威人,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7 年为总司令,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315—318。
- 波波夫(Попов)——俄国驻摩尔达维亚领事。——291。
- 波将金公爵,格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нязь 1739—1791)——俄国国务活动家,1784 年起为元帅,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1787—1791);曾领导俄罗斯南方边区的垦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315。
- 波利特,威廉·约翰·弗雷德里克(Powlett, William John Frederick)——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110。
- 波洛克,乔治(Pollock, George 1786—1872)——英国将军,后为元帅,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的参加者。——224—225。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

-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 Plon-Pr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201。
- 波拿巴,律西安(Bonaparte, Lucien 1775—1840)——1799年雾月十八日(11月9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驻西班牙公使(1800—1802);拿破仑第一的弟弟。——353。
-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拿破仑第一的长兄。——349。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289。
-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Poniatowski, Stanisław August 1732—1798)——波兰国王,称斯塔尼斯拉夫二世(1764—1795)。——400。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357、496。
- 波特尔,约翰(Potter, John)——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98。
- 伯恩斯,亚历山大(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策划者之一;1836—1838年在喀布尔执行特殊使命,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军司令部顾问,1841年喀布尔发生起义时被杀。——220、221、223。
- 伯克,菲力浦·奥古斯特(Böckh, Philipp August 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写有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232。
- 伯里克利(Perikles [Percles] 公元前495左右—429)——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前444—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232。
- 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Burleigh, William Cecil, Baron 1520—1598)——英国国务活动家,首相(1558—1598)。——396。
- 伯努利,约翰(Bernoulli, Johann 1667—1748)——瑞士数学家,格罗宁根(荷兰)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以微分学和积分学以及力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447。

- 勃鲁姆, 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为左派领袖之一; 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 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319—321。
- 博阿尔奈亲王, 欧仁(Beauharnais, Eugène, prince 1781—1824)——法国将军, 拿破仑第一的继子,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意大利总督(1805—1814)。——352。
- 博斯凯, 玛丽·约瑟夫——见博斯凯, 皮埃尔·约瑟夫·弗朗索瓦。
- 博斯凯, 皮埃尔·约瑟夫·弗朗索瓦(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将军, 1856年起为元帅, 30—50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1854), 后任军长(1854—1855)。——198、201、410—411。
- 布伯纳·冯·利蒂茨伯爵, 斐迪南(Bubna von Litić, Ferdinand, Graf von 1768—1825)——奥地利将军和外交家, 原系捷克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13—1814和1815)。——377。
- 布尔蒙, 路易·奥古斯特·维克多·德(Bourmont, Louis-August-Victor de 1773—1846)——法国将军, 1830年起为元帅, 保皇党人; 1830年为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远征军指挥官。——281。
- 布尔沃, 爱德华·乔治·利顿男爵(Bulwer, Edward George, Baron Lytton 1803—1873)——英国政治家和作家, 辉格党人, 1852年起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殖民大臣(1858—1859)。——61、71。
- 布尔沃, 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e 1801—1872)——英国外交家, 议会议员(1830—1837), 辉格党人; 1839年和1840年任英国驻巴黎代办, 后任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大使(1849—1852)、驻佛罗伦萨大使(1852—1855)、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8—1865)。——291、292。
- 布克斯格夫登伯爵, 费多尔·费多罗德奇(Буксгевде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50—1811)——俄国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5和1806)。——316。
- 布拉沃·穆里略, 胡安(Bravo Murillo, Juan 1803—1873)——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曾任政府首脑(1851—1852)和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4)。——150—151。

- 布莱克, 罗伯特(Blake, Robert 1599 —1657)——英国海军上将,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克伦威尔的助手; 50 年代在英国西班牙战争中任舰队司令, 曾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作过斗争。——279。
- 布莱克斯顿, 威廉(Blackstone, William 1723 —1780)——英国法学家和作家, 议会议员, 立宪君主制的辩护人。——337。
- 布莱特, 约翰(Bright, John 1811 —1889)——英国政治家, 棉纺厂主,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60 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 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88、96 —100。
- 布赖登, 威廉(Brydon, William 1811 —1873)——英国军医, 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 —1842)的参加者。——224。
- 布兰查德(Blanchard)——英国军官, 1828 年曾研究出一种舟桥体系。——361。
- 布朗, 汉弗莱(Brown, Humphry)——英国企业家, 议会议员, 英国皇家银行董事之一(1853 —1856), 因舞弊被判罪。——129 —132。
- 布朗, 乔治(Brown, George 1790 —1865)——英国将军,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 —1814)和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1855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 1860 —1865 年任爱尔兰军总司令。——201、392。
- 布朗德尔, 弗朗索瓦(Blondel, François 1617 —1686)——法国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 写有关于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7。
- 布里安, 路易·安东·福韦勒·德(Bourrienne, 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1769 —1834)——法国外交家和政治家, 拿破仑·波拿巴的同学和私人秘书(1797 —1802), 驻汉堡代办(1804 —1813), 后投归波旁王朝。——400 —401、473。
- 布里尔顿(Brereton)——驻印度的英国官员, 旁遮普卢迪亚纳区专员(1855)。——306。
- 布吕讷, 吉约姆·玛丽·安娜(Brune, Guillaume-Marie-Anne 1763 —1815)——法国元帅,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 丹东派, 后为波拿巴的拥护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799 年指挥驻荷兰的法国军队。——471 —474。
-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 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 —1819)——普鲁士元帅, 1793 —1794 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1806 和 1813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351、357、365 —381。

C

-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279、337、442。
- 查理七世(Charles VII 1403—1461)——法国国王(1422—1461)。——248、441。
-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250、441、442。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281、301。
-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Karl X Gustaf 1622—1660)——瑞典国王(1654—1660)。——308。
- 查理十二世(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254。
- 查理十三世(Karl XIII 1748—1818)——瑞典国王(1809年起),后为瑞典和挪威国王(1814—1818)。——353、354、357。
- 查理-奥古斯特——见奥古斯滕堡公爵,古里斯蒂安·奥古斯特。
- 查理·路德维希·欧根(Karl Ludvig Eugène 1826—1872)——瑞典皇太子,1857—1859年摄政,瑞典和挪威国王(1859—1872),称查理十五世,奥斯卡一世的儿子。——300。
- 查理·约翰——见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
- 车尔尼晓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军官,1812年起为将军,国务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9—1812年为驻拿破仑第一司令部的军事外交代表,1828—1852年为陆军大臣。——354、355。
- 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218。

D

- 达尔格伦,约翰·阿道夫(Dahlgren, John Adolf 1809—1870)——美国海军军官和军事发明家,1863年起为海军上将,写有关于海军军械方面的著作。——457。
-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得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 James Andrew

- Broun-Ramsay, Marques and Earl of 1812 —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 —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209、303、306。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 —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 —1799、1799 —1807、1814 —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 —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 —1834)。——86、349、357。
- 达斯普雷男爵,康斯坦丁(D'Aspre, Constantin Baron von 1761 —1809)——奥地利将军,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52。
- 达武,路易·尼古拉(Davout, Louis-Nicolas 1770 —1823)——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密友,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13、318、351、366、414。
-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普(Darius I Hystaspes 公元前 558 —486)——古波斯王(公元前 522 —486);希斯塔斯普之子。——228、359。
- 大莫卧儿——见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 大莫卧儿王朝——见莫卧儿王朝。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 —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71 —472。
- 丹纳尔女伯爵,路易莎·克里斯蒂娜(Danner, Luise Christine, Countess von 1815 —1874)——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门户悬殊的配偶。——301。
- 道光(1782 —1850)——中国清朝皇帝(1821 —1850)。——105。
-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 —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 —1834 和 1841 —1845),内阁首相(1852、1858 —1859 和 1866 —1868)。——58、61 —64、66、69、73、79、110。
- 德尔维涅,昂利·古斯塔夫(Delvigne, Henri-Gustave 1799 —1876)——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260。
- 德雷克,弗兰西斯(Drake, Francis 1540 左右—1596)——英国航海家,海军上将,1588年曾参加击溃西班牙舰队。——398。
- 迪凯特,斯蒂文(Decatur, Stephen 1779 —1820)——美国海军军官,1815年为

- 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作战的分舰队指挥官。——280。
- 迪斯考, 尤利乌斯(Dieskau, Julius)——萨克森议会反对派议员。——320。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52—53、60、70—72、85、108、112、205—209、299、300。
- 蒂利伯爵, 约翰(Tilly, Johann Graf von 1559—1632)——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统帅, 1610年起为天主教联盟军队指挥官, 曾任帝国军队指挥官(1630—1632)。——253。
- 杜邦·德莱唐伯爵, 皮埃尔·安东(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comte 1765—1840)——法国将军,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8年在西班牙拜伦会战中率部队投降。——472。
- 杜尔哥, 安娜·罗伯尔·雅克, 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重农学派的最大的代表, 魁奈的学生; 财政总稽查(1774—1776)。——34。
- 杜坎侯爵, 阿伯拉罕(Duquesne, Abraham, marquis de 1610—1688)——法国海军上将, 1680—1683年曾对阿尔及利亚和的黎波里采取军事行动。——279。
- 杜科, 罗日(Ducos, Roger 1747—1816)——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职业是律师, 1794年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 后参加拿破仑的1799年政变。——350。
- 杜隆, 弗朗索瓦·沙尔(Dulong, François-Charles 1792—183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1831年起为众议院议员, 属于自由主义反对派。——497。
- 杜木里埃, 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 [Dü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 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 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194、471。
- 杜帕, 皮埃尔·路易(Dupas, Pierre-Louis 1761—1823)——法国将军,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52。
- 杜瓦诺, 奥古斯特·爱德华(Doineau, Auguste-Edouard 生于1824年)——法国军官, 1853年起为阿尔及尔的某阿拉伯局局长, 1856年因杀死一个阿尔及利

亚人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1857年被拿破仑第三改为无期徒刑;1859年遇赦。——284。

多德,乔治(Dodd, George 1808—1881)——英国政论家;写有许多有关工业问题的著作;曾为各种参考性出版物撰稿。——129。

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Muhammad Khan [Dost-Mahomed] 1793—1863)——阿富汗埃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29、220—222、225。

E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官,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印度总督(1862—1863)。——167。

恩格尔哈特,安东·叶甫斯塔菲耶维奇(Энгельгардт, Антон Евстафьевич 1795—1872)——俄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416。

恩斯特第三(Ernst III 1784—1844)——萨克森-科堡公爵(1806—1826)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称恩斯特第一(1826—1844);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3。

F

法尔奈泽,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帕尔马公爵(Farnese, Alexander [Alessandro], duc de Parma 1545—1592)——西班牙统帅和国务活动家;1578—1592年任尼德兰总督。——203、397—399。

法特赫·琼格(Fath Dschung)——阿富汗沙赫舒扎的儿子,1842年做过几个月阿富汗沙赫。——225。

法特赫汗(Fath-Khan 死于1818年)——阿富汗沙赫马茂德的大臣。——220。

范考特兰特,亨利·查理(Van Cortlandt, Henry Charles 1815—1888)——英国将军,1832—1839年在锡克军队中供职,曾站在英军方面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1848—1849);参加镇压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96、326、383、435。

菲利浦第二,奥尔良公爵(Philippe II, duc d'Orléans 1674—1723)——法国摄政王(1715—1723)。——341。

菲茨威廉,威廉(Fitzwilliam, William 1526—1599)——英国国务活动家,爱尔兰

- 兰总督(1572—1575和1588—1594)。——399。
- 菲利浦二世(Felipe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396。
- 菲利浦二世(马其顿的)(Philip [Philippos]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382—336)——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236、237。
- 菲利浦五世(Philip V 公元前237左右—179)——马其顿王(公元前221—179)。——242。
- 菲利莫尔, 罗伯特·约瑟夫(Phillimore, Robert Joseph 1810—1885)——英国法学家, 辉格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852—1857); 约翰·乔治·菲利莫尔的弟弟。——110。
- 菲利莫尔, 约翰·乔治(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52—1857)。——110。
- 菲洛斯特拉特(Philostratos 170左右—245)——希腊雄辩家、诡辩学派哲学家和作家。——438。
- 斐迪南四世——见费南多四世。
- 斐迪南五世(天主教徒)(Ferdinand V el Católico 1452—1516)——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和执政者(1507—1516), 阿腊贡国王, 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276。
- 斐迪南七世——见费南多七世。
- 斐迪南大公, 卡尔·约瑟夫·冯·埃斯特(Ferdinand, Karl Josef von Este, Erzherzog 1781—1850)——奥地利陆军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50。
- 费鲁赫汗(Ferukh Khan)——波斯外交家, 1857年英波条约的签字人; 曾任驻伦敦公使(1857)。——159、161—162、298。
- 费南多四世(斐迪南四世)(Fernando IV [Ferdinand IV] 1285—1312)——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1295—1312)。——440。
-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395。
- 费特赫-阿里沙赫(Feth-Ali-Shah 1762—1834)——波斯沙赫(1797—1834)。——26、219。
- 芬尼斯, 托马斯·奎斯特德(Finnis, Thomas Quested)——伦敦市长(1856—1857)。——90。

- 弗拉米尼努斯(梯特·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 公元前 228 左右—174)——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执政官(公元前 198),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200—197)中为罗马军队指挥官。——242。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31、290。
-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250、442。
- 弗雷德伯爵,法比安(Wrede, Fabian, Graf 1760—1824)——瑞典将军,1816年起为元帅;1810年负特别使命出使巴黎,曾促成贝尔纳多特当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353。
- 弗雷德,卡尔·菲利浦(Wrede, Karl Philipp 1767—1838)——巴伐利亚将军,1814年起为元帅;曾指挥巴伐利亚军队,这支军队自1805年起参加拿破仑法国的战争,而自1813年起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374、377。
- 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VI 1768—1839)——丹麦-挪威国王(1808—1814),后为丹麦国王(1814—1839)。——353、357。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301。
- 弗雷德里克-斐迪南(Frederik-Ferdinand 1792—1863)——丹麦亲王。——301。
- 弗雷隆,路易·玛丽·斯塔尼斯拉斯(Fréron, Louis-Marie-Stanislas 1754—180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后为热月反革命领袖之一。——472。
- 弗雷莫萨,艾曼努埃尔(Fremosa, Emanuel)——西班牙水兵,1588年西班牙舰队远征的参加者,被英国人所俘。——399。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4、255—258、260、365、389、447。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普鲁士国王(1713—1740)。——255。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314、356、366、367、38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2、31。

- 弗伦茨贝格, 格奥尔格·冯(Frundsberg, Georg von 1473—1528)——日耳曼军人, 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 1525年帕维亚会战的指挥官; 1525年受士瓦本联盟的委托镇压阿尔高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农民起义。——250。
- 弗洛雷斯, 何塞·塞贡多·德(Flórez, José Segundo de 生于1789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自由主义者; 《埃斯帕特罗的历史》一书的作者。——395。
- 弗洛伊德, 约翰·布坎南(Floyd, John Buchanan 1807—1863)——美国国务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弗吉尼亚州州长(1850—1853), 曾任陆军部长(1857—1860), 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69。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205。
- 符腾堡公爵, 斐迪南·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Württemberg, Ferdinand Friedrich Auguste, Herzog von 1763—1834)——奥地利元帅, 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4、377。
- 福蒂阿代斯(Fotiades)——摩尔多瓦政府驻君士坦丁堡代办。——290。
-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1806)。——36、37。
- 福克斯, 威廉·约翰逊(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家、传教士和政论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96。
- 福拉尔, 让·沙尔(Folard, Jean-Charles 1669—1752)——法国军官, 军事理论家和著作家。——360。
- 福雷, 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 Elie-Frédéric 1804—1872)——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 1854—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指挥官; 1855年4月被任命为奥兰省(北非)总督;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师长。——201。
- 富尔, 卡尔·路德维希·奥古斯特(Phull, Karl Ludwig August 1757—1826)——普鲁士将军, 1806年任普军总参谋长, 1806—1812年在俄国军队中供职。——309。
-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奥尔良党人, 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 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 财政大臣(1861—1867),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

大臣(1852—1860)。——136。

富歇,约瑟夫(Fouché, Joseph 1759—1820)——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第一内阁警务大臣;以毫无原则著称。——352。

G

哥尔查科夫公爵,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1)——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方军团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126。

哥尔茨,卡尔·亨利希·弗里德里希(Goltz, Karl Heinrich Friedrich 1772—1822)——普鲁士将军和外交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2)。——366。

戈登,阿瑟·查理·汉密尔顿(Gordon, Arthur Charles Hamilton 1829—1912)——英国国务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1854—1857年为议会议员;1861—1890年历任英国各殖民地总督;阿伯丁勋爵的儿子。——110。

戈蒂埃,雅克·路易(Gautier, Jacques-Louis)——法国新闻工作者,保皇党人,18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农村和城市总汇报》编辑之一。——471。

格德尔·拉努瓦,奥斯卡尔(Goedel lannoy, Oscar)——奥地利驻摩尔多瓦领事。——292。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52、53、56—59、60、72、73、85、110、111、112。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和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1855—1858和1859—1865)。——73、188。

格劳秀斯,许霍(赫罗特,赫伊赫·德)(Grotius, Hugo[Groot, Huig de]1583—1645)——荷兰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161。

格雷伯爵,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835—1839),陆军大臣兼殖民大臣(1846—1852);查·格雷的儿子。——66、73。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61、73、85、86、88、110、111。

格里博瓦尔,让·巴蒂斯特·德(Gribeauval, Jean-Baptiste de 1715—1789)——法国将军,军事发明家;1764—1789年断续地任法国炮兵总监,在改编炮兵和改进火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259、445、449—450、452。

格奈泽瑙伯爵,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Neithart von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25年起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与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1813—1814年和1815年是布吕歇尔将军的参谋长。——367、377、382。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f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联盟;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成立的新教联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252—254、445。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f IV Adolf 1778—1837)——瑞典国王(1792—1809),1809年由于军事阴谋而被赶下王位。——308、351、355、473。

H

哈布里(Chabrias 约死于公元前357年)——雅典统帅。——235。

哈丁子爵,亨利(Hardinge, Henry, Viscount 1785—1856)——英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5年起为陆军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1815)的参加者,曾任陆军大臣(1828—1830和1841—1844),印度总督(1844—1848年1月),英军总司令(1852—1856)。——192。

哈夫洛克,亨利(Havelock, Henry 1795—1857)——英国将军,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和第一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的参加者;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327—328、383—384、419、421、422、436、491。

- 哈科特, 弗兰西斯·弗农(Harcourt, Francis Vernon)——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10。
- 哈蒙德, 埃德蒙(Hammond, Edmund 1802—1890)——英国外交家, 曾任外交副大臣(1854—1873)。——74。
- 哈特曼, 格奥尔格(Hartmann, Georg 1489—1564)——德国物理学家和力学家。——443。
- 哈维, 阿尔弗勒德(Hervey, Alfred)——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10。
- 哈泽德(Hased)——13世纪初的印度诗人。——439。
- 海尔埃丁·巴巴罗萨(Cheireddin Barbarossa 1467左右—1546)——土耳其海盗, 阿尔及尔执政者(1518—1546)。——276。
- 汉密尔顿, 詹姆斯(Hamilton, James 死于1580年)——苏格兰贵族,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拥护者。——178。
- 汉尼拔(Hannibal 公元前247左右—183)——迦太基统帅。——238。
-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230。
- 赫伯特, 悉尼, 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 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72、110—111。
- 赫德森, 乔治(Hudson, George 1800—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 铁路公司所有者之一, 有“铁路大王”之称。——129。
- 赫西俄德(Heisiodos 约公元前700)——古希腊诗人。——64。
- 黑森选帝侯——见威廉第二。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178、252。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177。
- 洪秀全(1814—1864)——148。
- 侯赛因(Husseïn 1773左右—1838)——阿尔及尔德依(1818—1830)。——280—281。
- 侯赛因汗(Husayn Khan)——波斯驻英国的大使(1838—1839)。——29。
- 华伦斯坦, 阿尔布雷希特(Wallenstein, Albrecht 1583—1634)——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 曾任帝国军队指挥官(1618—1630和1632—1634)。——253。

华廷杰——19、21。

怀特赛德,詹姆斯(Whiteside, 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58—1859和1866)。——71。

惠勒,休·马希(Wheeler, Hugh Massy 1789—1857)——英国将军,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的参加者(1838—1839);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和1848—1849)的参加者,曾任康波尔驻防军指挥官(1856—1857),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327、421。

霍策,弗里德里希(Hotze, Friedrich 1739—1799)——奥地利元帅。——8。

霍尔,爱德华(Hall, Edward 1498左右—1547)——英国编年史家。——177。

霍尔卡,图卡吉(Holkar, Tukadji 约生于1836年)——印度印多尔公国的国君,马拉地人,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386。

霍格,詹姆斯·韦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846—1847和1852—1853);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8—1872)。——90、110。

霍华德,查理(Howard, Charles 1536—1624)——英国海军上将,1585—1618年领导海军部,1588年任英国舰队总司令,该舰队击溃了西班牙舰队。——398。

霍亨索伦-海辛根公爵,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克萨维尔(Hohenzollern-Hechingen, Friedrich Franz Xaver, Fürst von 1757—1844)——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413。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115。

霍伊尔,约翰·哥特弗里德(Hoyer, Johann Gottfried 1767—184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史学家,写有关于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8。

J

吉本,爱德华(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议会议员;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206。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88、96—98。

- 基恩, 约翰(Keane, John 1781—1844)——英国将军, 1839年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中任英军指挥官。——221。
- 基谢廖夫伯爵,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ф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将军;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1829—1834), 枢密院农民问题委员会常务委员(1835), 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 1837—1841年实行了温和的改革; 俄国驻巴黎大使(1856—1862)。——42。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 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498。
- 加当, 克劳德·马蒂约·德(Gardane, Claude-Mathieu de 1766—1817)——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7—1808年在德黑兰执行特殊使命。——219。
- 加尔涅-帕热斯, 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Garnier-Pagès, Étienne-Joseph-Louis 1801—1841)——法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0年革命后领导共和党反对派; 众议院议员(1831—1834、1835—1841)。——206。
-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安东(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 曾任财政部长(1848年3—6月);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0); 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206。
- 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 格雷戈里(Garci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412。
- 加尼特, 耶利米(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英国新闻工作者, 《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 1844—1861年任该报编辑。——99。
- 伽利略, 伽利莱(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力学原理的创始人, 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 维护太阳中心说, 为此遭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633); 晚年在流亡中度过。——447。
- 剑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

英军总司令(1856—1895)。——201。

久洛伊伯爵,伊格纳茨(Gyulay, Ignaz, Graf 1763—1831)——奥地利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4。

居斯丁伯爵,亚当·菲利浦(Custine, Adam-Philippe, comte de 1740—1793)——法国将军,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各国同盟战争的参加者。——311、348。

K

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最初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110。

卡尔-艾曼努埃尔二世(Carlo-Emanuel II 1751—1819)——撒丁国王(1796—1802)。——472。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和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陆军大臣(1805—1809)。——10、313、348。

卡尔斯·冯·卡尔斯,威廉斯——见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73、283、334。

卡龙赫-费诺莱特,欧塞维奥(Calonge y Fenollet, Eusebio 1814—1874)——西班牙将军;曾参加卡洛斯派战争,站在女王伊萨伯拉二世方面;1854年为潘普洛纳军区司令。——149—150。

卡梅伦,休·英尼斯(Cameron, Hugh Innes)——英国皇家银行经理(1849—1855),曾因舞弊被判罪。——130—132。

卡缅斯基伯爵,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Каме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38—1809)——俄国元帅,1806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中任总司令。——316。

- 卡姆朗(Kamran)——阿富汗沙赫马茂德的儿子,1829年起是赫拉特的执政者。——220。
- 卡普策维奇,彼得·米哈伊洛维奇(Капцевич, Пе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72—1840)——俄国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6。
- 卡萨斯——见拉斯卡萨斯,曼努埃尔·马里亚。
- 卡思卡特,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战役(1815),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201。
-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798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99—1801),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79。
- 凯勒曼,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Kellermann, François-Christophe 1735—1820)——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后为正统主义者。——311。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G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3、181、242—244、337、359。
- 坎伯尔,科林,克莱德男爵(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英国将军,1862年起为元帅,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1854—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437。
- 坎宁伯爵,查理·约翰(Canning, Charles John, Earl of 1812—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邮政大臣(1853—1855),印度总督(1856—1862),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策划者。——385。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托利党领袖,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37—38。
- 康格里夫,威廉(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1808年发明火箭,被命名为康格里夫火箭。——414。
- 康罗贝尔,弗朗索瓦·塞尔坦(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年9

- 月—1855年5月),克里木战争和奥意法战争期间任军长,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在梅斯被俘。——201、284。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415。
- 康泰拉克,何塞(Canterac, José 1779左右—1835)——西班牙将军,1816—1824年任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塞尔纳将军部队的参谋长。——394。
- 科堡亲王,弗里德里希·萨克森-萨尔费尔德(Courburg, Friedrich Sachsen-Saalfeld Prinz von 1737—1815)——奥地利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和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参加者。——194。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337。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61、66、71、76、86—89、96—100、110。
- 科尔多瓦,何塞·马里亚(Córdoba, José Maria 1799—1829)——哥伦比亚将军,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394。
- 科尔霍夫(Kohlhoff)——304。
-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左右—1752)——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345。
- 科尔萨科夫——见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 科利亚多,路易斯(Collado, Luis 16世纪)——西班牙军事工程师。——443。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95。
- 克拉克,乔治(Clerk [Clark], George 1787—1867)——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财政部秘书长(1834—1835和1841—1845)、商业副大臣和造币厂厂长(1845—1846)。——110。
- 克拉里,欧仁妮·贝尔纳丹娜·德西雷(Clary, Eugénie-Bernardine-Désirée

- 1777—1860)——贝尔纳多特的妻子。——350。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曾镇压爱尔兰 1848 年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 1865—1866, 1868—1870)。——73—74、90、291。
- 克拉马伊伯爵, 阿德里安·德·蒙吕克(Cramail, Adrien de Montluc, comte de 1588—1642)——法国作家。——293。
- 克莱, 威廉(Clay, Sir William 1791—1869)——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1832—1857); “通货原理”的拥护者。——53。
- 克莱贝尔, 让·巴蒂斯特(Kléber, Jean-Baptiste 1753—1800)——法国将军,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348。
- 克莱斯特,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斐迪南·埃米尔(Kleist, Friedrich Heinrich Ferdinand Emil 1762—1823)——普鲁士将军, 后为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3、376、378。
- 克兰沃思男爵, 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1790—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 辉格党人; 曾任大法官(1852—1858 和 1865—1866)。——61。
- 克拉赖, 帕尔(Kray, Pál 1735—1804)——奥地利将军, 原系匈牙利人, 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48。
-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 公元前 10—公元 54)——罗马皇帝(41—54)。——3。
- 克累尔费, 卡尔(Clerfayt, Karl 1733—1798)——奥地利元帅, 奥土战争(1788—1789)的参加者, 1794—1795 年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任奥军总司令。——183、348。
- 克里昂米尼三世(Cleomenes III 公元前 255—219)——斯巴达王(公元前 235—221)。——233。
- 克里昂姆布鲁图斯一世(Cleombrotus I)——斯巴达王(公元前 380—371)。——234。
- 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Christian-Frederik 1786—1848)——丹麦亲王, 总督(1813—1814), 挪威国王(1814), 丹麦国王(1839—1848), 称克里斯蒂安八

世。——353、357。

克里斯蒂娜——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克洛塞尔伯爵, 贝尔特朗(Clausel, Bertrand, comte 1772—1842)——法国将军, 1831年起为元帅;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的参加者(1809—1814), 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1835—1837)。——281、283。

克提西阿斯(Ctesias 公元前5世纪中叶—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医生, 写有关于古代印度和波斯历史方面的著作。——438。

孔代, 何塞·安东尼奥(Conde, José Antonio 1765—1820)——西班牙历史学家, 阿拉伯语文学家, 写有关于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的历史著作。——440。

库埃尔·辛格(Kuer Singh 死于1858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奥德的起义者领袖之一。——468。

库埃斯塔——见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 格雷戈里。

库霍尔恩(科霍尔恩)男爵, 梅诺(Coehoorn, Menno, baron van 1641—1704)——荷兰将军, 军事工程师, 写有关于筑城学方面的著作。——345。

库图佐夫, 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 斯摩棱斯克公爵(Кутуз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Смоленский князь 1745—1813)——俄国统帅, 陆军元帅, 俄土战争和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12年任俄军总司令。——309。

L

拉布谢尔, 亨利, 汤顿男爵(Labouchere, Henry, Baron Taunton 1798—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商业大臣(1839—1841、1847—1852), 殖民大臣(1855—1858)。——78。

拉菲特, 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金融资产阶级代表, 政府首脑(1830—1831)。——358。

拉斐德侯爵, 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 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 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 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 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311、471。

拉格尔比耶尔克伯爵, 古斯塔夫(Lagerbijelke, Gustav, Graf 1777—1837)——

- 瑞典外交官, 驻巴黎临时全权代表(1810—1813)。——353。
- 拉格伦男爵, 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 1854年起为元帅; 曾以威灵顿的大本营参谋身份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15), 曾任总司令部军务秘书(1827—1852), 军械总长(1852—1854), 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201、168。
- 拉腊, 胡安·哈辛托(Lara, Juan Jacinto 1778—1859)——委内瑞拉将军,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394。
- 拉腊比, 玛丽·德尼(Larabit, Marie-Denis 1792—1876)——法国政治活动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 属于自由主义反对派;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497。
- 拉马尔, 何塞(La Mar, José 1778—1830)——秘鲁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玻利瓦尔的反对者, 秘鲁总统(1827—1829)。——394。
-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埃及法老(公元前1317—1251)和统帅。——226。
- 拉莫里谢尔, 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 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 1857年回到法国; 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498。
- 拉纳, 让(Lannes, Jean 1769—1809)——法国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16—317、350。
- 拉皮耶, 皮埃尔(Lapie, Pierre 1779—1850)——法国军事工程师和地形测绘师。——353。
- 拉斯卡斯伯爵, 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 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 comte de 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 拿破仑第一的秘书; 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474。
- 拉塔什, 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ş, 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 原籍克罗地亚; 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

- 1854), 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44。
- 拉欣顿, 查理·曼纳斯(Lushington, Charles Manners)——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854—1857)。——110。
- 莱斯特伯爵, 罗伯特·达德利(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1532 左右—158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 1588 年为奉命保卫英国抵御西班牙入侵的英军司令。——397。
- 莱斯托克, 安东·威廉(L'Estocq, Anton Wilhelm 1738—1815)——普鲁士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06—1807)。——317。
- 莱西·伊文思——见伊文思, 乔治·德·莱西。
- 朗比尔·辛格(Ranbir Singh)——印度拉甲, 克什米尔人;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465。
- 朗东伯爵, 雅克·路易·塞扎尔·亚历山大(Randon, Jacques-Louis-César-Alexandre, comte de 1795—1871)——法国将军, 1856 年起为元帅, 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 和 1859—1861), 阿尔及利亚总督(1851—1858)。——284。
- 朗吉特·辛格(Randschit Singh 1780—1839)——旁遮普的执政者(1797—1839)。——220。
- 朗热隆伯爵, 路易·亚历山大·安德罗(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Langeron, Louis-Alexandre Andrault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Graf 1763—1831)——俄国将军, 原系法国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68—369、373—375、378。
- 劳埃德, 赛米尔·琼斯, 奥弗斯顿男爵(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议会议员(1819—1826)。——475、508。
- 劳伦斯(Lawrence)——英国驻印军队的一个军官。——270。
- 劳伦斯, 亨利·蒙哥马利(Lawrence, Henry Montgomery 1806—1857)——英国军官; 曾任尼泊尔驻扎官(1843—1846), 英国驻旁遮普当局首脑(1849—1853), 奥德首席专员(1857), 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任勒克瑙英军指挥官。——214、328、421。
- 劳伦斯, 乔治·圣帕特里克(Lawrence, George Sain-Patrick 1804—1884)——英国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曾任拉吉普坦纳驻扎官(1857—1864)。——468。

- 劳伦斯, 约翰·莱尔德·梅尔(Lawrence, John Laird Mair 1811—1879)——英国负责殖民事务的高级官员;曾任旁遮普首席专员(1853—1857)、印度总督(1864—1869)。——306、335、434、435。
- 勒尔松迪-奥马切亚, 弗朗西斯科·德(Lersundi y Ormaechea, Francisco de 1817—1874)——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151。
- 勒库尔布, 克劳德·雅克(约瑟夫)(Lecourbe, Claude-Jacques [Joseph] 1759—1815)——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8、473。
- 雷卡尔德——见马丁内斯·德·雷卡尔德,胡安。
- 雷诺(Renaud 死于 1857 年)——英国军官,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327。
- 雷希施塔特公爵, 约瑟夫·弗朗索瓦·沙尔·波拿巴(Reichstadt, Joseph-François-Charles-Bonaparte, duc de 1811—1832)——法国王位继承者,拿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莎的儿子。——354。
- 累恩(Lane)——美国军官,军事桥梁建筑师。——361。
- 李比希男爵, 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145。
- 李必达(小李必达)(马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 (Minor)公元前 89—12)——罗马国务活动家,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执政官(公元前 46—42),后为三头执政之一(公元前 43—36),与另外两个执政——屋大维和安东尼相比在三头执政中起次要作用,于公元前 36 年被剥夺三头执政的权力。——355。
- 李斯特——见马沙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
- 里德,托马斯(Reed, Thomas 1796—1883)——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323—324、434。
-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53—1840)——俄国将军,驻瑞士的俄国军队指挥官(1799);国家参议院议员(1830 年起)。——8。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75。
- 利文公爵, 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42、43。

- 利希滕施坦公爵, 温采尔(Liechtenstein, Wenzel Fürst von 1767—1842)——奥地利军官, 后为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7。
- 林德赫斯特男爵,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Baron 1772—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大法官(1827—1830, 1834—1835 和 1841—1846)。——61、62、65、66。
- 林格尔哈特(Ringelhardt)——科隆一家剧院的经理, 1832年起为莱比锡一家剧院的经理。——319—320。
- 林克莱特(Linklater)——130—132。
- 刘易斯, 乔治·康沃尔(Lewis, George Cornwell 1806—1863)——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 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 财政大臣(1855—1858), 内务大臣(1859—1861), 陆军大臣(1861—1863)。——52—53、56—59。
- 龙卡利, 费德里科, 阿尔科伊伯爵(Roncali, Federico, conde d' Alcoy 生于 1809)——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政府首脑, 外交大臣(1852—1853)。——151。
- 娄, 罗伯特(鲍勃), 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 财政大臣(1855—1858 和 1868—1873)和内务大臣(1873—1874)。——78、97。
- 鲁宾逊, 斯密斯(Robinson, Smith P.)——反谷物法同盟名誉书记。——100。
- 鲁弗鲁瓦,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Rouvroy, Friedrich Gustav 1771—1839)——萨克森军官, 写有关于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8。
- 鲁缅采夫伯爵,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Румянцев,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аф 1725—1796)——俄国统帅, 元帅, 国务活动家, 1768—1774年俄土战争时期任俄军指挥官。——315。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国际银行。——157、518。
- 路易十二(Louis XII 1462—1515)——法国国王(1498—1515)。——442。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279、445。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259。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 18世纪末法国

-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11、412。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314、401、473。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33、37、155、157、173、206、281、283、496—498、514。
-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吕德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5年任南方军团指挥官,1856年初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1861—1862年任波兰总督。——417。
- 吕克纳尔,尼古拉(Luckner, Nicolas 1722—179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311。
- 吕利埃尔,纳瑟夫·马塞兰·德(Rullière [Ralhère], Joseph Marcelin de 1787—186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和陆军部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退职。——498。
- 罗,约翰(Law, Joh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341。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72、85。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36。
- 罗宾斯,本杰明(Robins, Benjamin 1707—1751)——英国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数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7。
- 罗林森,亨利·克雷齐克(Rawlinson, Henry Creswicke 1810—1895)——英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曾在波斯任军官;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1858—1859和1868—1895),驻德黑兰公使(1859—1860),议会议员,皇家亚洲协会主席

(1878—1881)和皇家地理协会主席(1871—1872和1874—1875);曾为许多英国报纸撰稿。——160。

罗曼纳侯爵(朝圣侯爵),佩德罗·卡罗-苏雷达(Romana [Romerias], Pedro Caro y Sureda, marqués de la 1761—1811)——西班牙将军,1807—1808年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西班牙驻军指挥官,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阿斯图里亚斯中央洪达委员。——352。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35—36、58、60、61、69、71、73、85—88、111、478。

罗斯,罗伯特(Ross, Robert 1766—1814)——英国将军,曾率领军队远征美国。——392。

洛里斯顿,雅克·亚历山大·贝尔纳·罗(Lauriston, Jacques-Alexandre-Bernard Law 1768—1828)——法国将军,后为元帅和国务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10。

M

马丁内斯·德·雷卡尔德,胡安(Martinez de Recalde, Juan 死于 1588年)——西班牙海军上将,西班牙舰队副司令(1588)。——397、399。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邱吉尔(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家,1702—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4。

马尔格雷夫伯爵,乔治·奥古斯塔斯·菲普斯(Mulgrave, George Augustus Phipps, Earl of 1819—1890)——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王室司库(1853—1858),后历任英国殖民地的总督。——78。

马尔科姆,约翰(Malcolm, John 1769—1833)——英国外交家,东印度公司官员,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799—1801、1808—1809和1810),孟买省督(1826—1830);写有关于印度和波斯的著作。——219。

马尔蒙,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Marmont, August-Frédéric-Louis de 1774—1852)——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为查理十世军队的指挥官。——372、373、

375—377、378—379。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250、442。

马可·格雷克(格拉古)(Marcus Graecus)——中世纪拜占庭炼金术士。——439。

马克·冯·莱伯里希,卡尔·弗里德里希(Mack von Leiberich, Karl Friedrich 1752—1828)——奥地利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5年任奥军指挥官,1805年10月17日率全军在乌尔姆投降。——313。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Maximilien I Joseph 1756—1825)——巴伐利亚选帝侯(1799年起)和国王(1806—1825),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年转向欧洲各国反法同盟方面。——313。

马拉泰斯塔,西吉斯蒙多·潘多尔福·迪·里米尼(Malatesta, Sigismondo Pandolfo di Rimini 1417—1468)——意大利雇佣兵队长。——442。

马略,盖尤斯(Marius, Gaius 公元前156左右—86)——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07、104—100、86)。——240。

马茂德(Mahmud 1699—1725)——波斯沙赫(1722—1725)。——24。

马茂德·比哈尔(Mahmoud Bihar)——古吉拉特沙赫(1458—1511)。——424。

马茂德·伽色尼(Mahmoud Ghazni 971—1030)——版图包括呼罗珊、锡斯坦和阿富汗的突厥人的加兹尼国家元首(998—1030),统帅和征服者,曾对印度进行了多次掠夺性远征。——217—218。

马茂德沙赫(Mahmoud Shah 死于1829年)——阿富汗沙赫(1800—1803和1809—1818),后为赫拉特的统治者。——219。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73。

马塞纳,安德烈(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1814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7、8、15、312—313、352、472、474。

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Masham, Samuel Cunliffe Lister, Baron 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123。

- 玛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3),路易十六的妻子,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6。
- 玛丽-伊丽莎白-阿马利亚(Marie Elisabeth Amalie 1784—1849)——普法尔茨-茨韦布吕肯-比肯费尔德系的巴伐利亚公威廉的女儿。——313。
-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摄政女王(1833—1840)。——11。
- 迈奥尔,爱德华(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非国教徒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教会的斗争;议会议员(1852—1857和1869—1874),《非国教徒》报编辑(1841—1879),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96。
- 麦克尼尔,约翰(McNeill [M'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36—1842),调查克里木英军军需状况的政府全权代表(1855)。——26。
- 麦克诺顿,威廉·海伊(Macnaghten, William Hay 1793—1841)——英国外交家,驻喀布尔公使(1838—1841),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组织者之一,在发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中起了主要作用。——221—222。
- 麦克唐纳,雅克·埃蒂耶纳·约瑟夫·亚历山大(Macdonald, Jacques-Étienne-Joseph-Alexandre 1765—1840)——法国元帅,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799年在意大利远征和瑞士远征期间为法军总司令;拿破仑第一退位后,为波旁王朝服务,1816—1830年在宫廷中任要职。——8、368、369、375—379、414、464。
- 麦姆农(罗陀斯的)(Memnon Rhodus 死于公元前333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希腊雇佣军队的首领。——230。
- 曼顿,约瑟夫(Manton, Joseph 1766左右—1835)——英国武器专家和发明家。——178。
- 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Medina Sidonia, Alonzo Perez de Guzman, duque de 1550—1615)——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宠臣,1588年任西班牙舰队司令。——397。
- 梅拉斯,米夏埃尔·弗里德里希·贝奈狄克特(Melas, Michael Friedrich Benedikt 1729—1806)——奥地利将军,曾参加七年战争(1756—1763),1799—1800年任意大利奥军总司令。——312。
- 梅森,乔治·亨利·蒙克(Mason, George Henry Monck 1825—1857)——英国

- 军官, 焦特布尔驻扎官,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击毙。——468。
- 梅松, 尼古拉·约瑟夫 (Maison, Nicolas-Joseph 1771—1840)——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67。
- 梅泰卢斯(努米底亚的)(昆图斯·采齐利乌斯·梅泰卢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Numidicus 公元前2—1世纪)——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公元前109年为执政官, 公元前109—107年在尤古尔塔战争(公元前111—105)时期任罗马军队指挥官。——240。
- 蒙, 亚历山大罗 (Mon, Alejandro 1801—188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温和派, 曾任财政大臣(1837和1844—1846), 1864年为政府首脑。——151。
- 蒙克里夫, 詹姆斯 (Moncreiff, James 1811—1895)——英国律师, 议会议员; 曾任苏格兰检察长(1851—1852、1852—1858、1859—1866和1868—1869)。——71。
- 蒙吕克——见克拉马伊伯爵, 阿德里安·德·蒙吕克。
- 蒙尼奥斯夫人——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 蒙塔朗贝尔侯爵, 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196、345。
-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206。
- 米尔纳·吉布森——见吉布森, 托马斯·米尔纳。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的发明者。——202、260、461。
- 米太亚得 (Miltiades 死于公元前489年)——古希腊统帅和国务活动家。——231。
- 缅施科夫公爵,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нязь 1787—1869)——俄国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 1836—1853年任海军大臣, 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 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任陆海军总司令。——198—201、288。
- 缪弗林男爵,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 (Mu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 Freiherr von 1775—1851)——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9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公使。——368—369、374、377、381。
- 缪拉特,约阿希姆(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年任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拿破仑第一的妹夫。——351、366。
- 莫尔蒂埃,爱德华·阿道夫·卡齐米尔·约瑟夫(Mortier, Édouard-Adolphe-Casimir-Joseph 1768—1835)——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17、376—377、378。
- 莫尔拉,托马斯·德(Morla, Tomás de 1752—1820)——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最高洪达委员,1808年投向法国占领者,曾任约·波拿巴政府陆军和海军大臣(1808—1813)。——448。
-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136。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338。
- 莫里茨(拿骚的),拿骚伯爵(奥伦治亲王)(Moritz von Nassau, Graf von Nassau [Prinz von Oranien] 1567—1625)——尼德兰总督(1585—1625),军事活动家,尼德兰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251、446。
- 莫里斯,詹姆斯(Morris, James)——英格兰银行总裁(1848)。——478。
- 莫卧儿王朝(大莫卧儿王朝)——印度钵帝沙赫王朝(1526—1858)。——24。
-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337。
- 墨里伯爵,詹姆斯·斯图亚特(Murray, James Stuart, Earl of 1531左右—1570)——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哥哥,1567年起为苏格兰摄政王,曾进行反对玛丽·斯图亚特及其拥护者的斗争。——178。
- 默尔纳男爵,卡尔·奥托(Mörner, Karl Otto, Baron 1781—1868)——瑞典军官,曾促成贝尔纳多特当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353。

默里, 查理·奥古斯塔斯(Murray, Charles Augustus 1806—1895)——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埃及总领事(1846—1853), 驻德黑兰公使(1854—1859)。——162、298。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左右—632)——伊斯兰教创始人。——439。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 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280。

穆罕默德汗(Machmud Khan)——白沙瓦执政者(1818—1834)。——220。

穆罕默德沙赫(Muhammed Shah 1810—1848)——波斯沙赫(1834—1848)。——26。

穆苏鲁斯帕沙(康斯坦丁)(Musurus-Pasha (Konstantin) 1807—1891)——土耳其外交官, 原系希腊人, 曾任驻伦敦公使, 后为大使(1851—1885)。——290。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7、8、10、31、180—182、189、196、203、219、223、258、260、266、268、309—310、311—314、316—317、337、348—357、366—371、372—381、389、400—401、407、412、414、419—420、450—451、461—462、472—474、496、514。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8、9、80、84、85、112、134、137、139、140、141、156—158、163、173—175、261、289、290、300、334、340、410、453—454、487、499、514—516、518。

拿破仑亲王, 日罗姆——见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Nadir Shah [Khuli Khan] 1688—1747)——波斯沙赫(1736—1747), 统帅和征服者, 1738—1739年曾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远征。——24、218。

纳尔瓦埃斯, 拉蒙·马利亚, 巴伦西亚公爵(Narváez, Ramón Maria, duque de Valencia 1800—1868)——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温和派领袖, 政府首脑(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149—151、153。

- 纳那·萨希布(Nana Sahib 约生于 1825 年)——印度的封建主,最后一个派施华(马拉提国的统治者)巴吉·拉奥二世的养子,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之一。——327、328、436。
- 纳皮尔,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42—1843 年率领军队攻占信德,1843—1847 年为信德执政者。——50、213、295。
- 纳赛尔丁(Nasr-ed-Din 1831—1896)——波斯沙赫(1848—1896)。——161。
- 奈,米歇尔,埃尔兴根公爵,莫斯科亲王(Ney, Michel, duc d'Elchingen, prince de La Moscova 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75、377、378、450。
- 奈穆尔公爵,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斐尔(奥尔良的)(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将军,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的第二个儿子。——498。
- 内克,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从 1770—1789 年多次任财政大臣;在法国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某些改革。——36。
-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121。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25、36、37、127、252、358。
- 尼科尔森,约翰(Nicholson, John 1821—1857)——英国将军,1842 年参加第一次英国阿富汗的战争,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1857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攻打德里时指挥一支英国军队。——419、433、465。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 年起)。——43。
-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447。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73。

诺兰,刘易斯·爱德华(Nolan, Lewis Edward 1820左右—1854)——英国军官,在印度服役,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写有关于骑兵的著作。——143。

诺塞达尔,康迪多(Nocedal, Cándido 1821—1885)——西班牙政论家,属于温和派,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56—1857)。——150。

诺思科特,斯塔福德·亨利(Northcote, Stafford Henry 1818—1887)——英国国务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855—1857和1858—1885),屡任内阁大臣。——110。

诺特,威廉(Nott, William 1782—1845)——英国将军,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的参加者。——221,224。

O

欧根,萨瓦亲王(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奥地利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外交家。——4,196。

欧拉,莱昂哈德(Euler, Leonhard 1707—1783)——瑞士数学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在彼得堡科学院(1727—1741和1766—1783)和柏林科学院(1741—1766)工作。——447。

欧仁亲王——见博阿尔奈,欧仁。

P

帕尔马公爵——见法尔奈泽,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帕尔马公爵。

帕尔默伯爵,朗德尔(Palmer, Roundell, Earl of 1812—1895)——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早期依附于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分子,后来是自由党人;副首席检察官(1861—1866)、首席检察官(1863—1866)、大法官(1872—1874和1880—1885)。——110。

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汉普顿男爵(Pakington, John Somerset, Baron Hampton 1799—188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72。

帕拉韦,沙尔·伊波利特·德(Paravey, Charles-Hippolyte de 1787—1871)——法国工程师和东方学家。——438。

- 帕兰杜尔·辛格(Parandur Singh)——印度拉甲。——468。
- 帕连伯爵,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Пале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граф 1745—1826)——俄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圣彼得堡军事总督(1798—1801),谋杀保罗一世的组织者和参加者。——316。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26、36—38、43、53、57—60、66、67、68—74、75—79、80、84—89、90、96—98、100、108—112、159—160、205、289、292、295、297、298—299、358、478。
- 帕帕契诺·丹东尼,亚历山大罗·维多里奥(Papacino d'Antoni, Alessendo Vittorio 1714—1786)——撒丁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炮兵学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447。
- 帕斯·萨拉斯,佩德罗·德(Paz Salas, Pedro de 16世纪)——关于西班牙舰队报告书的编写者。——396。
- 帕英达汗(称号为萨腊弗腊兹汗)(Payinda-Khan [Sarafra-Khan] 死于1800年)——阴谋反对阿富汗赫泽曼的首领。——219。
- 培根,罗吉尔(Bacon, Roger 1214左右—1294)——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科学上实验方法的拥护者;圣芳济教派教士。——439。
- 佩德罗一世,唐·佩德罗(Pedro I, Don Pedro 1798—1734)——巴西皇帝(1822—1831),葡萄牙国王,称佩德罗四世(1826),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415。
- 佩顿,约翰·斯塔福德(Paton, John Stafford 1821—1889)——英国军官,后为将军;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和1848—1849)的参加者,后又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434。
- 佩尔蒂埃,让·巴蒂斯特(Pelletier, Jean-Baptiste 1777—1862)——法国将军,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曾任法国多所炮兵学校校长之职。——414。
- 佩克桑,昂利·约瑟夫(Paixhans, Henri-Joseph 1783—1854)——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和发明家,写有许多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57。
-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iss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

- 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岗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283。
- 佩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俄国将军，奥伦堡军事总督（1833—1842），奥伦堡和萨马拉两省总督（1851—1857）；曾任希瓦远征军指挥官（1839—1840）。——48。
- 皮达尔侯爵，佩德罗·何塞（Pidal, Pedro José, marqués de 1800—1865）——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属于温和派，曾任议会议长（1843），内务大臣（1844），外交大臣（1848—1851）。——151、153。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52—53、55、72、109、110、111、475、477—478、485。
- 皮洛士（Pyrrhus 公元前319—272）——伊皮罗斯皇帝（公元前307—302和296—272），古代的著名统帅。——241。
- 皮塞伯爵，约瑟夫·热纳维埃夫（Puisaye, Joseph-Geneviève, comte de 1755—1827）——法国将军，保皇党人，1793—1797年朱安党人反革命叛乱的领导人之一；后为流亡者。——471。
-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1756—1761），陆军大臣（1757—1761），首相（1766—1768）。——38—39。
-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76。
- 璞鼎查，亨利（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家和将军，1841—1842年任驻华公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司令，1843年任香港总督，1847—185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105。
- 普赫纳男爵，安东（Puchner, Anton Baron von 1779—1852）——奥地利将军，1848—1849年为在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革命军队作战的奥军指挥官。——416。
- 普加乔夫，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左右—

- 1775)——1773—1775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和哥萨克的反农奴制起义的领袖。——315。
- 普拉斯,昂利(Place, Henri)——法国金融家,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之一。——340。
- 普拉斯,维克多(Place, Victor)——法国驻摩尔达维亚领事。——291。
- 普雷斯科特(Prescott, H. J.)——英格兰银行副总裁(1847)。——478。
- 普林西佩-比道德,米格尔·奥古斯坦(Principe y Vidaud, Miguel Augustin 1811—1866)——西班牙作家和历史学家,进步党人,写有西班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395。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普罗凯施-奥斯滕伯爵,安东(Prokesch-Osten, Anton Graf von 1795—1876)——奥地利将军、外交家和作家,曾任驻雅典公使(1834—1849),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71)。——290。
- 普萨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 I)——埃及法老(公元前663—610)和统帅。——227。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34。

Q

- 契查哥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Чичаг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67—1849)——俄国海军上将和国务活动家,海军大臣(1807—1811),1812年任摩尔多瓦(多瑙河)军团和黑海舰队总司令,同年11月指挥军队进驻拿破仑第一溃退的军队后方。——309、355。
- 清朝——中国皇朝(1644—1911)。——147。
-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1714—1727)。——36—38。
-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315。
-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英国摄政王(1811—1820),英国国王(1820—1830)。——381。

R

- 热拉尔,埃蒂耶纳·莫里斯(Gérard, Étienne-Maurice 1773—1852)——法国将

- 军,后为元帅,奥尔良党人;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203。
-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利浦的儿子。——283。
- 茹尔当,让·巴蒂斯特(Jourdan, Jean-Baptiste 1762—1833)——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统帅;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统率驻西班牙的法国军队(1808—1814),七月革命后任外交大臣。——348。
- 茹尔尼亚克·圣梅阿尔,弗朗索瓦·德(Journiac Saint-Méard, François de 1745—1827)——法国军官和政论家,保皇党人。——471。
-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350、474。

S

- 萨顿,约翰·亨利·曼纳斯(Sutton, John Henry Manners)——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1847—1857)。——110。
- 萨尔,沙尔·玛丽·德(Salles, Charles-Marie de 1803—1858)——法国将军,30—5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军长。——498。
- 萨尔托里乌斯,费南多·路易斯·何塞,圣路易斯伯爵(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温和派领袖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47—1851),政府首脑(1853—1854)。——149、150、151、153。
- 萨克森—科堡公爵——见恩斯特第三。
- 萨腊弗腊兹汗——见帕英达汗。
- 萨朗萨(Salanza)——西班牙将军。——153。
- 萨卢斯提乌斯(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公元前86—35)——罗马历史学家。——240。
- 萨瓦里,安娜·让·玛丽·勒奈,罗维戈公爵(Savary, Anne-Jean-Marie-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法国

- 历次战争的参加者,警务大臣(1810—1814),阿尔及利亚总督(1831—1833)。——282—283。
-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en, Horace-François-Bastien, comte d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外交使节;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06—1807),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375—376。
- 塞尔纳,何塞·德·拉(Serna, José de la 1770—1832)——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16—1824年为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军队指挥官。——394—395。
- 塞里姆一世·亚乌兹(勇猛者)(Selim I Jauz 1467—1520)——土耳其苏丹(1512—1520)。——276。
- 塞里姆·库泰米(Selim Eutemi 死于 1515 年)——迈提贾(阿尔及利亚)艾米尔。——276。
- 塞拉诺-多明格斯,弗朗西斯科,圣安东尼奥伯爵,托雷公爵(Serrano y Domínguez, Francisco, conde de San Antonio, duque de la Torre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陆军大臣(1843),1854年七月革命和1856年国家政变的参加者;马德里镇守司令(1859—1862),外交大臣(1862—1863),临时政府首脑(1868—1869),王国摄政(1869—1871),内阁首相(1871,1874)。——152。
- 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鲁齐乌斯·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46—211)——罗马皇帝(193—211)和统帅。——244。
- 塞西尔,威廉,伯利男爵——见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
- 塞西杰,弗雷德里克,切尔姆斯福德男爵(Thesiger, Frederick, Baron Chelmsford 1794—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40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45—1846和1852),大法官(1858—1859和1866—1868)。——71。
- 赛尔,罗伯特·亨利(Sale, Robert Henry 1782—1842)——英国上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的参加者。——224。
-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 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233。

瑟美列, 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 1865 年回到匈牙利。——95。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66、75、132。

舍夫茨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40 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 1847 年起为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1855 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帕麦斯顿的女婿。——75。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 1852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36—1851 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1854 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201、284、498。

圣克鲁斯侯爵, 阿尔瓦罗·德·巴桑(Santa Cruz, Alvaro de Bazan, marqués de 1526—1588)——西班牙海军上将, 1576—1588 年任西班牙海军指挥官。——397。

圣雷米, 皮埃尔·苏里雷·德(Saint-Remy, Pierre-Suirey de 1650 左右—1716)——法国将军, 1703 年起为法国炮兵副司令。——446。

圣路易斯——见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何塞, 圣路易斯伯爵。

圣米格尔-巴列多, 埃瓦里斯托(San Miguely Valledor, Evaristo 1785—1862)——西班牙将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后为温和派,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任陆军大臣。——153。

圣普里, 艾曼纽埃尔·弗朗佐维奇(吉约姆·艾曼纽埃尔·吉尼亚尔)(Saint-Priest, Emmanuel Franzowitsch [Guillaume-Emmanuel Guignard] 1776—1814)——俄国将军, 原系法国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8、380。

施勒德, 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Schröder, Christian Matthias)——德国银行家, 汉堡一家大银行的经理, 于 1857 年底破产; 约·亨·施勒德的兄弟。——513。

施勒德, 约翰·亨利(Schröder, John Henry 1784—1883)——英国银行家, 原系德国人, 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经理。——513。

- 施泰因贝格男爵(Steinberg, Baron)——汉诺威驻维也纳公使。——315。
- 施特鲁恩泽, 卡尔·奥古斯特(Struensee, Karl August 1735—1804)——普鲁士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448。
- 施瓦尔岑堡公爵, 卡尔·菲利浦(Schwarzenberg, Karl Philipp Fürst von 1771—1820)——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1813—1814)。——374、375、377—378、380。
- 施维赫尔特——见卞尼格先, 阿马利亚·厄尔加德。
- 施韦特,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Schwedt, Heinrich Friedrich 1709—1788)——最后一代勃兰登堡—施韦特侯爵(1771—1788)。——365。
- 舒扎沙赫(Shudsha Shah 死于 1842)——阿富汗沙赫(1803—1809 和 1839—1841)。——219—223、225。
- 斯迈思, 约翰·乔治(Smythe, John George)——英国政治活动家, 上校, 皮尔分子, 议会议员。——110。
- 史密斯, 罗伯特·弗农(Smith, Robert Vernon 1800—1873)——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军务大臣(1852),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212、214。
- 史密斯, 约翰·马克·弗雷德里克(Smith, John Mark Frederick 1790—1874)——英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议会议员。——300。
- 斯皮尔曼(Spearman)——英国军官, 19 世纪初曾改编英国野战炮兵。——451、453。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拉特福·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 议会议员(1828—1841);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5—1828 和 1841—1858)。——159。
- 斯图亚特, 查理·威廉(Stewart, Charles William 1778—1854)——英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1813—1814 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357。
- 斯图亚特, 唐纳德·马丁(Stewart, Donald Martin 1824—1900)——英国军官, 后为元帅, 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的参加者, 曾任驻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1881—1885), 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1885—1900)。——386。
- 斯托克, 福斯特(Stalker, Forster 死于 1857 年)——英国将军, 1856—1857 年英国波斯战争中任英国陆军司令, 后自杀。——160。
- 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Gaius

- Suetonius Tranquillus 约 70—140)——罗马历史学家。——3。
- 苏尔特, 尼古拉·让, 达尔马提亚公爵 (Sa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 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 (1830—1834、1840—1845)、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156、192、193、350—351、366、497。
- 苏赫帖连, 彼得·科尔尼洛维奇 (Сухтелен, Петр Корнилович 1751—1836)——俄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和外交家, 原系荷兰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08 年指挥围攻斯韦阿堡要塞, 驻斯德哥尔摩大使 (1809 年起)。——355。
- 苏克雷, 安东尼奥·何塞 (Sucre, Antonio José 1795—1830)——南美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导人之一, 玻利瓦尔的拥护者, 玻利维亚总统 (1826—1828)。——394。
- 苏里曼一世·坎努尼 (苏里曼大帝) (Süleyman I el Kanuni [Soliman I, Soliman the Magnificent, Soliman the Great] 1494—1566)——土耳其苏丹 (1520—1566)。——276。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1730—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 七年战争 (1756—1763) 和俄土战争 (1768—1774 和 1787—1791) 的参加者, 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1799); 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 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8、315。

T

- 塔尔塔利亚, 尼古洛 (Tartaglia, Niccolò 1499 左右—1557)——意大利数学家, 同时研究炮兵学和筑城学问题。——443。
- 塔赫马斯普二世 (Tahmasp II 死于 1736 年)——波斯沙赫 (1730—1732)。——24。
- 泰米斯提乌斯 (Themistius [-os] 317 左右—388 以后)——希腊政治活动家, 雄辩家和折中主义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438—439。
- 泰佩尔霍夫,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Tempelhoff, Georg Friedrich 1737—1807)——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写有关于数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8。

- 特纳,詹姆斯·阿斯皮诺尔(Turner, James Aspinall 1797—1867)——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60年代接近自由党,议会议员,曼彻斯特商会主席(1854)。——98。
- 提摩太(Timotheos 死于公元前354年)——雅典统帅和国务活动家。——235。
-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ūr-i-lang [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218。
- 帖木儿沙赫(Timur Shah 1746—1793)——阿富汗沙赫(1773—1793)。——219。
- 图尔恩埃桑,奥古斯特(Thurneyssen, Auguste)——法国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之一。——340—341。
- 图尔恩埃桑,沙尔(Thurneyssen, Charles)——法国银行家,奥古斯特·图尔恩埃桑的侄子。——340—341。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502。
-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 53—117)——罗马皇帝(98—117)和统帅。——244。
- 图沃奈尔,爱德华·安东(Thouvenel, Édouard Antoine 1818—186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60),外交大臣(1860—1862)。——289。
- 图沃南,路易·埃蒂耶纳(Thouvenin, Louis-Étienne 1791—1882)——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260。
- 托尔斯顿森,伦纳尔特(Torstensson, Lennart 1603—1651)——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瑞典统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编炮兵时的主要助手,瑞典军队总司令(1641—1645)。——445。
-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 Claudius 约90—160)——古希腊天文学家、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274。
- 托勒密·拉格(Ptolemaeus Lagi 公元前360左右—283)——马其顿统帅,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各次远征的参加者,公元前323年起为总督,后为希腊化的埃及国王(公元前305—285),托勒密王朝的奠基人。——230。
- 托里拆利,埃万杰利斯塔(Torricelli, Evangelista 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水银温度计的发明者,伽利略的学生。——447。

托特, 卡尔·哥特霍尔德(Todt, Karl Gotthold 1803—1852)——萨克森议会反对派议员。——320。

托特列本, 爱德华·伊万诺维奇(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俄国军事工程师, 将军, 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488。

W

瓦利埃, 让·弗洛朗·德(Vallière, Jean-Florent de 1667—1759)——法国将军, 法国炮兵司令(1720—1747), 按照自己的办法改编了法国炮兵。——449。

瓦罗尔男爵, 泰奥菲尔(Voirol, Théophile, baron de 1781—1853)——法国将军,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阿尔及利亚总督(1833—1834)。——283。

旺达姆, 多米尼克·勒奈(Vandamme, Dominique-René 1770—1830)——法国将军,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3年在库尔姆附近率军投降。——310。

威尔逊, 阿奇代尔(Wilson, Archdale 1803—1874)——英国将军,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围困和强攻德里时(1857)任指挥官, 在围困勒克瑙时(1858)任炮兵指挥官。——419、434、492、495。

威尔逊, 霍拉斯·海曼(Wilson, Horace Hayman 1786—1860)——英国东方学家, 曾研究医学和化学, 写有关于梵文和梵文文学的著作。——439。

威尔逊, 乔治(Wilson, George 1808—1870)——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反谷物法同盟主席(1841—1846)。——100。

威尔逊, 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1847—1859), 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 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59。

威尔金森, 约翰·加德纳(Wilkinson, John Gardner 1797—1875)——英国旅行家, 古埃及学家, 写有关于埃及的著作。——227。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鲁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372。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

- 1702), 英国国王(1689—1702)。——36。
- 威廉斯, 威廉·芬威克, 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 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 后投降俄国军队; 议会议员(1856—1859)。——72。
- 威灵顿公爵, 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 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 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 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1835)。——42、43、381。
- 韦切伊, 卡罗伊(Vécsey, Károly 1807—1849)——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417。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6。
- 维多利亚公爵——见埃斯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
- 维尔马雷, 沙尔·马克西姆·德(Villemarest, Charles-Maxime de 1785—1852)——法国文学家。——401。
- 维格齐(弗拉维·维格齐·雷纳特)(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4世纪末)——罗马军事著作家。——245。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37。
- 维加男爵, 格奥尔格(Vega, Georg Baron von 1756—1802)——奥地利军官和数学家, 对数表制作者。——448。
- 维克多, 克劳德·维克多·佩兰, 贝冷公爵(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duc de Bellune 1764—1841)——法国将军, 1807年起为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21—1823年任陆军大臣, 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策划者之一。——367、375、377、378。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 撒丁国王(1849—1861), 意大利国王(1861—1878)。——518。
- 维特根施坦伯爵, 彼得·克里斯蒂安诺维奇(Витгенштейн, Пет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граф 1768—1842)——俄国将军, 后为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13年4—5月任俄普联军总司令。——367、377。
- 温钦格罗德男爵, 斐迪南·费多罗维奇(Винцингероде, Фердинанд Федорович,

- барон 1770—1818)——俄国将军,原系德国人,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370、378、379。
-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埃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321、416。
- 文翰,赛米尔·乔治(Bonham, Samuel George 1803—1863)——英国殖民官员,1847—1852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21、92。
- 沃邦,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345、443。
- 沃恩,约翰·路德(Vaughan, John Luther 生于1820年)——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57—186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15。
-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 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447。
-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尼古拉(Vogorides, Nikolas 1821—1863)——摩尔多瓦的卡马康(代理国君)(1857—1859),原系保加利亚人;亚·沃戈里德斯的哥哥。——288—292。
- 沃戈里德斯,斯蒂凡(博戈罗夫,斯托伊科)(Vogorides, Stefanaki [Bogorow, Stoiko] 1775—1859)——摩尔多瓦的卡马康(代理国君)(1821—1822),原系保加利亚人;亚·沃戈里德斯和尼·沃戈里德斯的父亲。——290。
-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阿列科帕沙)(Vogorides, Alexandros [Aleko-Pasha] 1823左右—1910)——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原系保加利亚人,驻伦敦大使馆参赞(1856—1861),驻维也纳大使(1876—1878),东鲁米利亚总督(1879—1884)。——290、292。
- 沃克,威廉(Walker, William 1824—1860)——美国冒险家,曾进行多次以征服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中美国家为目的的远征活动;1856年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1860年第三次去中美洲,在洪都拉斯登陆时被英国海军捕获,引渡给洪都拉斯当局处决。——22。
- 沃龙佐夫公爵,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князь

- 178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1854)。——111、379。
-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Oudinot, Nicolas-Charles 1767—1847)——法国将军,1809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375—378。
- 乌尔贝里-克拉默公司(Ullberg & Cramer [Ullberg & Kramer])——在汉堡的瑞典贸易公司;于1857年底破产。——506。
- 乌尔班男爵,卡尔(Urban, Karl Baron von 1802—1877)——奥地利军官,1850年起为将军,原系罗马尼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运动右派领袖;曾参加镇压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416。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33。
- 乌凡诺,迭戈(Ufano, Diego 16世纪—17世纪初)——西班牙军事工程师,写有炮兵学方面的著作。——443。
- 乌特勒姆,詹姆斯(Outram, James 1803—1863)——英国将军,勒克瑙驻扎官(1854—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任英军指挥官;奥德首席专员(1857—1858);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436。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478。
- 伍德伯恩(Woodburn)——英国将军,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14。

X

-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Sieyès, Emmanuel-Joseph 1748—1836)——法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复辟后被放逐,定居布鲁塞尔,1830年7月回到巴黎;《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作者。——350。
-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

- 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7—1821)。——79。
- 西格纽尔(Signeul)——19世纪初瑞典驻巴黎总领事。——353、354。
- 西马糜各厘(Seymour, Michael 1802—1887)——英国海军将领,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58)任海军司令,其间曾率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及广州,随后又率舰队北上攻占大沽炮台。——17—22、74、78、92。
- 西蒙尼奇,伊万·斯捷潘诺维奇(Симонич,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792—1855)——俄国将军,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32—1839)。——26。
- 西摩尔(Seymour)——英国海军上将,1588年曾指挥分舰队追逐西班牙的舰队。——399。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146。
- 希,威廉(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皇家法院法官(1863—1868)。——71。
-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 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229、359。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320。
-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德(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活动家;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367、448。
- 夏绿蒂(Charlotta 1796—1865)——郡主,律·波拿巴的女儿。——353。
-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9、107、148。
- 辛迪亚,阿里·扎·吉阿吉(巴吉拉特·拉奥)(Sindhia, Ali Jah Jaijaji [Bagirat Rao] 约生于1835年)——马拉提人,1853年起为印度瓜廖尔公国的国君;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站在英国人一边。——386。
- 休伊特(Hewitt)——英国将军,1857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为密拉特守军指挥官。——420。
- 徐广缙(1797—1869)——中国清朝官员,两广总督(1848—1852)。——21。
- 薛西斯一世(Xerxes I 公元前519左右—465)——古波斯国王(公元前486—

465)。——227、230、359。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206。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25、309—310、316、318、354—357、371、381、400、414。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 3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181、230、236—238、246、359、439。

雅科布,乔治·勒·格兰德(Jacob, George le Grand 1805—1881)——英国上校,后升将军;英国波斯战争的参加者(1857),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98。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36、81、315—316。

叶名琛(1807—1859)——中国清朝官员,1848 年起任广东巡抚,1852—1858 年任两广总督;1858 年底广州陷落后被英军俘虏,送往印度;1859 年 4 月歿于加尔各答。——18—22、74、92。

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 约公元前 419—353)——雅典统帅。——231、235。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178、246、397。

伊萨伯拉二世(Isabel [Esabella] II 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149。

伊思迈尔一世(Ismail I 1487—1524)——波斯沙赫(1502—1524),萨菲王朝(1502—1736)的创立者。——24。

伊索(Aesop [Aisopos] 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97。

伊文思,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201、294、298—299。

- 易卜拉欣(Ibrahim)——阿尔及尔德依。——279。
- 耶格尔费尔德(Jägersfeld)——普鲁士军官。——365。
- 英格兰,理查(England, Richard 1793 —1883)——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201。
- 尤巴一世(Juba I 死于公元前46年)——努米底亚国王,庞培及其拥护者反对凯撒的战争(公元前49—46)的参加者。——276。
- 尤古尔塔(Jugurtha 公元前160左右—104)——努米底亚国王,公元前111—106年同罗马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战争。——240。
- 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York, Frederick August, Duke of 1763 —1827)——英王乔治三世的次子,1795年起为元帅,曾任英军总司令(1798—1809和1811—1827)。——472。
-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汉斯·大卫·路德维希(York [Yorck] 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 —1830)——普鲁士将军,1821年起是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368、373—376。

Z

- 泽德利茨,弗里德里希·威廉(Seydlitz, Friedrich Wilhelm 1721 —1773)——普鲁士将军;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对改编普鲁士骑兵起过重大作用。——256。
- 泽曼沙赫(Seman Shah)——阿富汗沙赫(1793—1800)。——219。
- 詹姆斯(James)——英国军官。——178。
- 詹姆斯,乔治·佩恩·雷恩斯福德(James, George Payne Rainsford 1799 —1860)——英国作家,写有历史方面的小说。——178。
- 张伯伦,内维尔·鲍尔斯(Chamberlain, Neville Bowles 1820 —1902)——英国将军,后为元帅,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和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曾指挥过旁遮普的非正规军(1854—1858),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76—1881年任马德拉斯军队司令。——323、434。
- 章格·巴哈杜尔(Jang Bahdur 1816 —1877)——尼泊尔执政者(1846年起);曾站在英国人一边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38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245。

阿格拉曼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摩尔国皇帝。——323。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惟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69。

埃俄洛斯——古希腊神话中风的主宰者。——37。

D

答尔乔夫——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338。

F

法拉蒙德——传奇式的法兰克国王，相传其活动于5世纪。——473。

H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他的 12 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70、312。

L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 9—8 世纪时候的人。——233。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245。

T

泰门——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132。

X

辛伯达——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航海家。——109。

Y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228。

约翰牛——18 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 1712 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59、86、101、172、214、299、338。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东方问题》，载于 1857 年 8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02 号 (The Oriental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02, August 27, 1857)。——288—293。
- 《动产信用公司》，载于 1857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27、5028 号 (Crédit Mobilie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s. 5027 and 5028, May 30 and June 1, 1857)。——174、339、340。
- 《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载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0 号 ([Investigation of Tortures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20, September 17, 1857)。——334。
- 《来自印度的消息》，载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91 号 (Indian New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091, August 14, 1857)。——272。
- [《欧洲的金融危机》]，载于 1857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02 号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202, December 22, 1857)。——505。
- 《帕麦斯顿勋爵》，载于 1853 年 10 月 22 和 29 日，11 月 5、12 和 19 日，12 月 10、17 和 24 日《人民报》第 77、78、79、80、81、84、85 和 86 期 (Lord Palmerston. In: The People's Paper, Nos. 77, 78, 79, 80, 81, 84, 85 and 86; October 22 and 29, November 5, 12 and 19, December 10, 17 and 24, 1853)。——43。
-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载于 1857 年 6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45 号 ([The New French Bank Ac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045, June 20, 1857)。——174。

- [《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 载于1857年11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76号([The Bank Act of 1844 and the Monetary Crisis in Englan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76, November 21, 1857)。——481。
-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载于1857年3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62号(Parliamentary Debates on the Chinese Hostiliti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4962, March 16, 1857)。——68。
- [《印度起义》], 载于1857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18号([The Revolt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18, September 15, 1857)。——386、434。
- [《印度起义》], 载于1857年10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34号([The Revolt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34, October 3, 1857)。——422。
- [《印度起义》], 载于1857年10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51号([The Revolt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51, October 23, 1857)。——465。
- 《印度起义的现状》, 载于1857年8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94号(State of the Indian Insurrec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094, August 18, 1857)。——294。
- [《英国的贸易危机》], 载于1857年12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96号([The Trade Crisis in Englan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96, December 15, 1857)。——512。
- 《英国的震荡》, 载于1857年1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83号(The British Revuls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183, November 30, 1857)。——501、512。
- [《英中冲突》], 载于1857年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18号([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4918, January 23, 1857)。——67。

弗·恩格斯

- 《博罗季诺》,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rodino. In: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Vol. III, 1858)。——450。
- 《筑城》,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7卷(Fortification. In: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Vol. VII, 1859)。——459。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阿利安, 弗·《亚历山大的远征》(Arrianus, F. : *The Anabasis, or Ascent of Alexander*)。——359。

埃伦伯勒, [爱·][《1857年7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8月1日《泰晤士报》第22748号(Ellenborough,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uly 3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48, August, 1, 1857)。——273。

奥弗斯顿, 赛·琼·劳·[《1857年12月3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12月4日《泰晤士报》第22855号(Overstone, S. J. L.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December 3, 1857.] In: *The Times*, No. 22855, December 4, 1857)。——508。

B

巴特鲁姆, R. H.《贝拿勒斯。7月13日》, 载于1857年9月2日《泰晤士报》第22775号(Bartrum, R. H. : *Benares, July 13*. In: *The Times*, No. 22775, September 2, 1857)。——336。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31—35。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 译自德文, 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Charlottenburg, 1854*)。——30—44。

鲍威尔, 布·《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 *De la Dictature accidentale. Charlottenburg, 1854*)。——41。

[贝尔蒂埃, 路·亚·][《贝尔蒂埃元帅回忆录》1827年巴黎版第1部([Berthier, L. A.]: *Mémoires du Maréchal Berthier, prince de Neuchatel et de Wagram, Major-Général des Armées Françaises. Campagne d'gypte, I^{re} Partie, Paris,*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姓名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1827)。——314。

贝列拉,伊·《[关于沙·图尔恩埃桑先生破产的通讯]。5月25日于巴黎》,载于1857年5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92号(Péire, I.: [The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the failure of M. Charles Thurneysen.] Paris, May 25. In: The Times, No. 22692, May 28, 1857)。——341。

贝姆,约·《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Bem, J.: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u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nischen Artillerie gesammelt und an Seine Kaiserliche Hoheit den Grossfürst Constantin, General en Chef aller Königl. Polnischen Truppen, berichtet von Joseph Bem, Hauptmann in der Königl. Polnischen reitenden Artillerie, Weimar, 1820)。——414。

贝姆,约·《酒精蒸馏法》1829年利沃夫版第1卷(Bem, J.: O machinach parowych, Tom I, Lwów, 1829)。——415。

贝瑟尔,理·《1857年2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16号(Bethell,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7,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16, February 28, 1857)。——71。

比林古乔,万·《论烟火制造术》1540年威尼斯版(Biringoccio, V.: Pirotechnia, Venetia, 1540)。——443。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罗·]《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总督和军团总司令毕若将军论殖民地资源的保护及利用》1842年巴黎版([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 R.]: L'Algérie. Des moyens de conserver et d'utiliser cette conquête, par le Général Bugeaud, Gouverneur-Général de l'Algérie, Paris, 1842)。——499。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罗·]《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化》,署名伊斯利男爵,1847年巴黎版([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 R.]: De la colonisation de l'Algérie, Paris, 1847. Signed Duc d'Isly)。——499。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罗·]《非洲北部法属殖民地军团的建立,政府和议院的侵略计划》1838年巴黎版([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 R.]: De l'établissement de légions de colons militaires dans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es du nord de l'Afrique, suivi d'un projet d'ordonnanc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et aux chambres; par M. Bugeaud, Lieutenant-Général Paris, 1838)。——499。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罗·]《回忆和平时期我们在奥尔省的布署》1838

- 年巴黎版([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 R.]: Mémoire sur notre établissement dans la province d'Oran, par suite de la paix; par M. le Lieutenant-Général Bugeaud (Juillet 1837), Paris, 1838)。——499。
-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罗·][《1834年1月25日下院的评论》],载于1834年1月26日《总汇通报》第26号(增刊)([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 R.]: [Remark in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on January 25, 1834.]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26(first supplement), January 26, 1834)。——497。
- [伯克,奥·][《雅典人的国家经济》(四卷集)1817年柏林版第1卷([Böckh, A.]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vier Bücher von August Böckh. Mit einundzwanzig Inschriften. Erster Band, Berlin, 1817)。——232—233。
- 布尔沃,爱·乔·[《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Bulwer, E. G.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6, 1857.]In: The Times, No. 22615, February 27, 1857)。——71。
- [布莱克斯顿,威·][《英国法律释义》(四卷集)1765—1769年伦敦版([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In four books, London, 1765—1769)。——337。
- [布里安,路·安·福·德·][《国务大臣布里安先生关于拿破仑、督政府、执政内阁、帝制时期、复辟时期的回忆录》(共十册)1829年巴黎版([Bourrienne, L. A. F. de]: Mémoires de M. De Bourrienne, Ministre d'Etat, sur Napoléon, le directoire, le consulat,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t. I-X, Paris, 1829)。——401。
- [布吕歇尔,格·勒·冯·][《1793—1794年战局日志》1796年[柏林]版([Blücher, G. L. von]: Kamp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 angefertigt von C. L. von Blücher. [Berlin.]1796)。——366。

D

- 德比,爱·[《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Derby, E.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24, 1857.]In: The Times, No. 22613, February 25, 1857)。——61—64。
- 迪斯累里,本·[《1857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4日《泰晤士报》第22619号(Disraeli, B.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3, 1857.]In: The Times, No. 22619, March 4, 1857)。——71。

- 迪斯累里,本·〔《1857年7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7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744号(Disraeli, B.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ly 27,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44, July 28, 1857)。——205。
- 迪斯累里,本·〔《1857年8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8月12日《泰晤士报》第22757号(Disraeli, B.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1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57, August 12, 1857)。——299。
- 迪斯累里,本·〔《1857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8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765号(Disraeli, B.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65, August 21, 1857)。——300。

F

- 弗洛雷斯,何·塞·《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四卷集)1844—1845年马德里版(Florez, J. S. : Espart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y Poli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aneos, t. I-IV, Madrid, 1844—1845)。——395。
- [福拉尔, M. de]《福拉尔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短评》1754年巴黎版第3卷([Folard, M. de] : Abregé des commentaires de M. De Folard, sur l' Histoire de Palybe. Par M. Mestre de Camp de Cavalerie, Tome Troisième, Paris, 1754)。——360。

G

-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十二凯撒传》(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Vitae XII Caesarum)。——3。
- 格莱斯顿,威·尤·〔《1857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610号(Gladstone, W. E.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10, February 21, 1857)。——58。
- 格兰维尔,乔·〔《1857年7月16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7月17日《泰晤士报》第22735号(Granville, G.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uly 16,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35, July 17, 1857)。——188。
- 格雷,亨·乔·〔《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Grey, H. G.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24,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13, February 25, 1857)。——66。

- 格雷厄姆, 詹·〔(1857年2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16号(Graham,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7,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16, February 28, 1857)。——73。
- 格雷厄姆, 詹·〔(1857年3月16日在卡莱尔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3月19日《泰晤士报》第22632号(Graham, J.: [Speech before the Carlisle constituents on March 16,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32, March 19, 1857)。——86。

H

- 赫伯特, 悉·〔(1857年4月1日在南威尔特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4月2日《泰晤士报》第22644号(Herbert, S.: [Speech before the electors of the Southern Division of Wiltshire on April 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44, April 2, 1857)。——111。
- 华廷杰《触藩始末》。——19、21。
- 霍尔, 爱·《高贵而光荣的兰开斯特王室和约克王室的联合》1548、1550年伦敦版(Halle, E.: 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ate Famelies of Lancastre & Yorke, London, 1548, 1550)。——177。
- 霍伊尔, 约·哥·《常用炮兵辞典》(共两册)1804—1812年蒂宾根版(Hoyer, J. G.: Allgemeines Wörterbuch der Artillerie, Tübingen, Th. 1-2, 1804—1812)。——449。

J

- 吉本, 爱·《罗马帝国衰亡史》(四卷集)1776—1788年伦敦第1版(Gibbe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V. The 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London in 1776—1788)。——206。

K

- 凯撒, 盖·尤·《高卢战记》(Caesar, Gaius Julius: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359。
- 科布顿, 理·〔(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Cobden,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6,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15, February 27, 1857)。——61、66、71、

76。

科布顿,理·〔〈1857年3月18日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633号(Cobden, R.: [Speech in the Free-Trade Hall, Manchester, on March 18,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33, March 20, 1857)。——86、89、97。

〔科尔蒙太涅,路·德·〕《军事建筑学,即筑城工艺》1741年海牙版第1部分〔Cormontaigne, Loui de〕: Architecture militaire, ou l' art de fortifier, Première Partie, La Haye, 1741)。——345。

克提西阿斯《印度史》(Ctesias: Indian History)。——438。

孔代,何·安·《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史。根据阿拉伯人的各种手稿和回忆录写成》1820—1821年马德里版第1—3卷(Conde, J. A.: Historia de la dominacio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abigas, t. I-III, Madrid, 1820—1821)。——440。

L

拉布谢尔,亨·〔〈1857年3月11日在汤顿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27号(Labouchere, H.: [Speech before the Taunton constituents on March 1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27, March 13, 1857)。——78。

拉腊比〔〈1834年1月2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34年1月26日《总汇通报》第26号(Larabit: [Speech in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January 25, 1834.] In: La Moniteur universel, No. 26, January 26, 1834)。——497。

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1823—1824年巴黎版(Las Cases: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ou journal où se trouve consigné, jour par jour, ce qu' a dit et fait Napolé on durant dix-huit mois, Paris, 1823—1824)。——474。

《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海军在爱尔兰海岸附近遭到的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1588年伦敦版(Certaine Advertisements out of Ireland, concerning the lastes and distresses happened to the Spanish Navie, upon the west coastes of Ireland, in their voyage intended from the Northerne Isles beyond Scotland, towards spaine, London, 1588)。——399。

林德赫斯特,约·〔〈1857年2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613号(Lyndhurst,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

- ary 24, 1857.]In: The Times, No. 22613, February 25, 1857)。——65。
- 刘易斯, 乔·康· [《1857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2月14日《泰晤士报》第22604号(Lewis, G. C.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3, 1857.]In: The Times, No. 22604, February 14, 1857)。——52。
- 娄, 罗· [《1857年3月10日在基德明斯特尔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3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27号(Lowe, R. : [Speech before the Kidderminster constituents on March 10, 1857.]In: The Times, No. 22627, March 13, 1857)。——78。
- 鲁弗鲁瓦, 弗·古·《炮兵建设手册》1809年莱比锡版(Rouvroy, F. G. : Handbuch des Batteriebaues oder die Anlegung und Erbauung der Batterien beim Angriff fester Plätze, Leipzig, 1809)。——448—449。
- 鲁弗鲁瓦, 弗·古·《炮兵讲义》(三卷集)1811—1814年德累斯顿版(Rouvroy, F. G. : Verlesungen über die Artillerie zum Gebrauch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artillerie-akademie von F. G. Rouvroz, directeur der Artillerie-Akademie und Major im Königl. Artillerie-Korps. Th. 1-3, Dresden, 1811—1814)。——449。
- 鲁弗鲁瓦, 弗·古·《萨克森王国炮兵指挥官中将 W. H. 鲁弗鲁瓦的拉式火器理论的动力学初探》1858年德累斯顿版(Rouvroy, F. G. : Dynamische Vorstudien zu einer Theorie der gezogenen Feuerwaffen von W. H. Rouvroy, Generalleutnant und Commandant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Artillerie, Dresden, 1858)。——448—449。
- 罗林森, 亨·克· [《在皇家地理学协会会议上的讲话。1857年5月11日》], 载于1857年5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679号(Rawlinson, H. C. : [Speech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held on May 11, 1857.]In: The Times, No. 22679, May 13, 1857)。——160。
- 罗素, 约· [《1857年2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615号(Russell, J.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6, 1857.]In: The Times, No. 22615, February 27, 1857)。——71。
- 罗素, 约· [《1857年3月19日在伦敦饭店举行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633号(Russell, J. : [Speech before the electors assembled at the London Tavern on March 19, 1857.]In: The Times, No. 22633, March 20, 1857)。——86。
- 罗素, 约· [《1857年3月27日在伦敦城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3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2640 号 (Russell, J. : [Speech before the electo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on March 27,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40, March 28, 1857)。——111。

罗素, 约/查·伍德[《致英格兰银行总裁詹姆斯·莫里斯和副总裁 H.J. 普雷斯科特。1847 年 10 月 25 日》], 载于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 年。附货币流通问题概述》1848 年伦敦版 (Russell, J., Ch. Wood: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Governor and Deputy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25th Oct. 1847.] In: 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7 & 8 Vict. c. 32.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3 to 1839. London, 1848)。——478。

M

马尔格雷夫, 乔·[《1857 年 3 月在斯卡伯勒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7 年 3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2627 号 (Mulgrave, G. : [Speech before the Scarborough constituents in March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27, March 13, 1857)。——78。

[马基雅弗利, 尼·]《兵法七卷》, 载于《尼古洛·马基雅弗利全集》(共两册) 1747 年伦敦版 ([Machiavelli, N.]: I sette libri dell' arte della Guerr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cittadino e segretario fiorentina. In: Tutte le oper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cittadino e segretario fiorentino, divise in II tomi, e di nuovo con somma diligenza carrette e ristampate, Londra, 1747)。——250、442。

[马可·格雷克]《制敌之火》1804 年巴黎版 ([Marcus Graecus]: Liber ignium ad comburendos hastes, auctore Marco Graeco, Paris, 1804)。——439。

《迈耶尔百科全书。知识阶层大百科全书》1845 年希尔德堡豪森—阿姆斯特丹—巴黎—费城版第 4 卷 (Meyer's Conversations - Lexicon. Das grosse Conversations - Lexicon für die gebildeten Stände, Hildbrughausen, Amsterdam, Paris und Philadelphia, Bd. 4, 1845)。——365、367。

[孟德斯鸠, 沙·]《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 年阿姆斯特丹第 1 版 ([Montesquieu, Ch.]: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Amsterdam in

1734)。——206。

缪弗林, 弗·斐·卡·《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 1813 年和 1814 年战役的回忆》, 附科洛内尔·菲力浦·约克的注释, 1853 年伦敦修订第 2 版 (Muffling, F. F. K.: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Edited, with Notes, by Colonel Philip York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1853)。——368—369, 374。

莫尔拉, 托·《炮兵论文》(三卷集) 1784—1786 年塞哥维亚版 (Morla, T.: *Tratado de artillería*. T. 1-3, Segovia, 1784—1786)。——449。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 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 年巴黎版 (Napoléon I.: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Paris, 1823)。——309。

拿破仑第三[《1850 年 4 月 7 日在农商总会公开集会上的演说》], 载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演说和书信集》1853 年巴黎版 (Napoléon III.: [*Speech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Council-General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n April 7, 1850*]. In: *Discours et Messages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Depuis son retour en France jusqu'à 2 décembre 1852*. Paris, 1853)。——175。

诺兰, 刘·爱·《骑兵的历史与战术》1854 年伦敦第 2 版 (Nolan, L. E.: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 Sec. ed. London, 1854)。——143。

P

[帕拉韦, 沙·伊·德·]《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笔记》1850 年巴黎版 ([Paravey, Ch. H. de]: *Mémoire sur la découverte très-ancienne en Asie et dans l'Indo-Perse de la poudre à canon et des armes à feu*, par M. le Chevalier de Paravey, ancien inspecteur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 Paris, 1850)。——438。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7 年 3 月 20 日在议会大厦举行的内阁宴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7 年 3 月 21 日《泰晤士报》第 22634 号 (Palmerston, H. J. T.: [*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banquet at the mansion House on March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34, March 21, 1857)。——90。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7年3月27日在蒂弗顿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7年3月28日《晨邮报》第25972号(Palmerston, H. J. T. : [Speech before the electors at the meeting in Tiverton on March 27, 1857.] In: The Morning Post, No. 25972, March 28, 1857)。——98。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7年5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5月19日《泰晤士报》第22684号(Palmerston, H. J. T.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18, 1857.] In: The Times, No. 22684, May 19, 1857)。——159。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7年8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8月12日《泰晤士报》第22757号(Palmerston, H. J. T.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1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57, August 12, 1857)。——295、298。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7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8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765号(Palmerston, H. J. T.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65, August 21, 1857)。——298、299。

帕斯·萨拉斯, 佩·德·《我国元首唐·菲利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集结的最幸运的无敌舰队。关于海轮的综合报告》1588年里斯本版(Paz Salas, P. de: La felicissima armada que el rey don Felipe uestro Se ior mando juntar en el Puerto de Lisboa. Relación sumaria de los nauios, Lisboa, 1588)。——396。

[培根, 罗·]《罗吉尔·培根修士的信: 论艺术和自然界的秘密以及论魔法的荒诞》1542年巴黎版([Bacon, R.]: Epistolae fratris Rogerii Baconis, 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 et de nullitate magiae, Paris, 1542)。——439。

[普林西佩, 米·奥·/R. 希龙/R. 萨托雷斯/A. 里博]《埃斯帕特罗: 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48年马德里版([Principe, M. A., R. Giron, R. Satorres, A. Ribot]: Espartero: Su pasado, su presente, su porvenir, Madrid, 1848)。——395。

R

若米尼, 昂·《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四卷集)1827年巴黎版(Jomini, A. :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 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 t. 1—4, Paris, 1827)。——350、474。

S

- 萨卢斯提乌斯《论朱古达战争》(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Jugurtine War)。——240。
- [圣雷米,皮·苏·德·]《炮兵学笔记》(两卷集)1697年巴黎版([Saint-Rémy, P. S. de]: Mémoires d'artillerie, Recueillis par le Sr Surirey de Saint Remy, Commissaire Provincial de l' Artillerie, et l'un des Cent et un Officiers Privile giez de ce Corps, t. 1—2, Paris, 1697)。——446。
- 施特鲁恩泽,卡·奥·《炮兵学原理》1760年利格尼茨版(Struensee, K. A. : Anfangsgründe der Artillerie, Liegnitz, 1760)。——448。
- 斯密斯,弗·[《1857年6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6月30日《泰晤士报》第22720号(Smith, V.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9,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20, June 30, 1857)。——212。
- 斯密斯,弗·[《1857年7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7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744号(Smith, V.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ly 27,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44, July 28, 1857)。——214。
- 斯密斯,[约·马·]弗·[《1857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8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765号(Smith, [J. M.] F. :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65, August 21, 1857)。——300。

T

- [泰佩尔霍夫,格·弗·]《普鲁士炮手,或论炮弹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1781年柏林版([Tempelhof, G. F.]: Le bombardier prussien ou du mouvement des projectiles en supposant la résistance de l' air proportionnelle au carré des vitesses par Mr. Tempelhof, Capitaine d' Artillerie au service de sa Majesté le Roi de Prusse, Berlin, 1781)。——448。
-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两卷集)1838年伦敦版(Tooke, Th. :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Preceded by a Brief Sketch of the State of the Corn Trade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38)。——50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年和1839年》1840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with Remarks on the Corn Laws, and on some of the Alterations Proposed in our Banking System.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3 to 1837. London, 1840)。——50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附货币流通问题概述》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7 & 8 Vict. c. 32.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3 to 1839. London, 1848)。——478、502。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 Th. and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two volumes; Forming the Fifth and Sixth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V-VI. London, 1857)。——502。

W

威尔金森,约·加·《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三卷集)1837年伦敦版第1卷(Wilkinson, J. G.: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Including Their Private Life, Government, Laws, Arts, Manufactures, Religion, and Early History; Derived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Paintings,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Still Existing, with the Accounts of Ancient Authors. In three volumes, Vol. I, London, 1837)。——227。

维格齐《军事简述》(Vegetius: Epitome Institutorum Rei Militaris)。——245。

维加,格·《射击教范(附射表)》1787年维也纳版(Vega, G.: Praktische Anweisung zum Bombenwerfen mittelst dazu eingerichteter Hilfstafeln, Wien, 1787)。——449。

《为对付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召集的英国兵力的详细记述。手稿》(Details of the English Force Assmled to Oppose the spanish Armada, MS.)。——397。

X

- 《西班牙远征英国的真实记述》1588年版(*Espeditio Hispanica in Angliam. Vera Discriptio. A. D. 1588*)。——396。
-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论神之本性》(*Cicero, Marcus Tullius: De Natura Deorum*)。——146。
- 《戏剧百科》(七卷集), 出版者为德国专业作家罗·勃鲁姆、卡·赫尔洛斯宗和海·马格拉夫, 1839—1842年阿尔滕堡—莱比锡版(*Allgemeines Theater-Lexikon oder Encyclopädie alles Wissenswerthen für Bühnenkünstler, Dilettanten und Theaterfreunde unter Mitwirkung der sachkundigsten Schriftsteller Deutschlands herausgegeben von R. Blum, K. Herlassohn, H. Marggraff, Bd. 1—7, Altenburg und Leipzig, 1839—1842*)。——320。
-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History*)。——229、359。
- 夏恩霍斯特, 格·《炮兵手册》1804—1814年汉诺威版第1—3卷(*Scharnhorst, G.: Handbuch der Artillerie, Bd. 1-3, Hannover, 1804—1814*)。——448。
- 夏恩霍斯特, 格·《军官手册——军事学的实用部分。第一部分: 炮兵》1787年汉诺威版(*Scharnhorst, G.: Handbuch für Officiere, in den anwendbaren Theilen der Krieges-Wissenschaften, Hannover, 1787*)。——448。

Y

- 亚里士多德《诗学》(*Aristoteles: De Poetica*)。——206。
- 《1852年11月内史密斯工程师给伦·霍纳的信》, 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A letter from Engineer Mr. Nasmyth to L. Horner.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121。
- 《1789—1850年陆海军军事名人传记》巴黎版第1卷(*Biographie des célébrités militaires des armées de terre et de mer de 1789 à 1850, par M. C. Mullié, membre de l'université,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Lille, de la commission du Département du Nord,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et auteur des fastes de la France, etc., Tome Premier, Paris —“Brune”*)。——473。
- 伊文思, 乔·德·莱·[《1857年8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8月

12日《泰晤士报》第22757号(Evans, G. de L.: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11,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57, August 12, 1857)。——294。

伊文思, 乔·德·莱·〔(1857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7年8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765号(Evans, G. de L.: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0, 1857.] In: The Times, No. 22765, August 21, 1857)。——298—299。

文 件

A

[艾雷, 理·]《军需总监、少将理查·艾雷向切尔西军事委员会的公开申述》1856年伦敦版([Airey, R.]: Opening Address of Major-General Sir Richard Airey, K. C. B., Quartermaster-General of the Forces. Before the Board of General Officers Assembled at the Royal Hospital, Chelsea. London, 1856)。——168。

B

巴纳德, 亨·〔(6月8日攻占德里制高点的公报)〕, 载于1857年8月1日《泰晤士报》第22748号(Barnard, H.: [Bulletin of June 8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heights of Delhi.] In: The Times, No. 22748, August 1, 1857)。——272。

巴夏礼〔(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年10月21日)〕, 载于185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第22571号(Parkers: [Letter to Yeh, Governor-General of the two Kwangs Provinces, October 21, 1856.] In: The Times, No. 22571, January 7, 1857)。——18。

[贝尔纳多特]《贝尔纳多特将军所属的市民自卫军第三师致督政府》, 载于1797年8月12日《国民报, 或总汇通报》第325号([Bernadotte]: Adresse des citoyens composant la troisième division, commandée par la general Bernadotte, au directoire exécutif. In: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325, August 12, 1797)。——349。

《不列颠和爱尔兰工农业出口产品申报价格清单。1857年上半年》, 载于1857年9月5日《经济学家》第732期(An Account of the Declared Value of British

and Irish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Exporte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each Foreign Country and British Possession in the Half-year ended June 30,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32, September 5, 1857). —479。

C

- 《参议院保守党党员名册副本。1814年4月3日星期日会议》，载于1814年4月4日《总汇通报》第94号(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Sénat-Conservateur. — Séance du Dimanche 3 avril 1814, présidé e par M. le sénateur comte Barthélemy.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94, April 4, 1814)。—473。
- 《参议院保守党党员名册副本。1814年4月6日星期三会议》，载于1814年4月8日《总汇通报》第98号(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Sénat-Conservateur. — Séance du Mercredi 6 avril 181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98, April 8, 1814)。—473。

D

- 《大不列颠和波斯在德黑兰签订的友好与结盟正式条约。1814年11月25日》，载于《英国及外国文件汇编。1812—1814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1部分(Definitiv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Persia. — Signed at Teheran, 25th November 1814. In: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12—1814. Vol. 1, Part I, London, 1841)。—26。
- 《大不列颠和波斯在德黑兰签订的关于赫拉特城独立的协定条款。1853年1月25日》(Articles convenus entre la Grande-Bretagne et la Perse relatifs à l'indépendance de la Ville de Hérat; signés à Télérán, le 25 janvier 1853)。—161。
-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波斯沙赫陛下之间的和约》，载于1857年6月11日《泰晤士报》第22704号(Treaty of Peace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His Majesty the Shah of Persia. In: *The Times*. No. 22704, June 11, 1857)。—159。
- 《东印度(刑罚)》1855—1857年伦敦版(*East India (Torture)*, London, 1855—1857)。—302。

F

- 《法国和瑞典军队在施拉特科缔结的停战协定。1807年4月18日》，载于G. F.

- 马尔滕斯《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8部分：1803—1808年》1835年格丁根版(Armistice entre les troupes françaises et suédoises conclu à Schlatkow, le 18 avr. 1807. In: G. F. Martens,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VIII, 1803—1808, Gottingue, 1835)——473。
- 《法国皇帝陛下、意大利国王陛下和俄国沙皇陛下在蒂尔西特签订的和平条约。1807年7月7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8部分：1803—1808年》1835年格丁根版(Traité de paix entre S. M. l' Empereur des Français Roi d' Italie et S. M. l' Empereur de toutes les Russies; signé à Tilsit, le 7 Juillet 1807. In: G. F. Martens,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VIII, 1803—1808, Gottingue, 1835)——351。
- 《法国将军毕若和埃米尔·阿卜杜尔·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塔夫纳签订的条约。1837年5月30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15部分：1830—1838年》1840年格丁根版(Traité entre le Général français Bugeaud et l' Emir Abd-el-Kader, conclu à Tafna dans la province d' Oran en Algérie, le 30 mai 1837 et ratifié par la France.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XV, 1830—1838, Gottingue, 1840)——497。
- 《法兰西共和国和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皇帝在坎波福米奥签订的和约。共和6年葡菊月26日(1797年10月17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6部分：1795—1799年》1829年哥丁根版(Traité de paix conclu à Campo-Formio, le 26 vendemiaire an 6(17 oct. 1797) entr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 empereur, roi de Hongrie et de Bohême.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v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VI, 1795—1799, Gottingue, 1829)——349、472。
- 弗里德里克-吉约姆三世(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的宣言。1813年3月17日》，载于《英国及外国文件汇编。1812—1814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2部分(Frederic Guillaume III. Proclamation du Roi de Prusse, de Guerre contre la France — Breslau, le 17 mars 1813. In: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12—1814, Vol. 1, Part II, London, 1841)。——367。
- 《法兰西银行及其分行的现状》，载于1857年10月9日, 11月13日和12月11

日《总汇通报》第 282、317 和 345 号 (*Situation de la banque de France et de ses succursale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s. 282, 317, 345, 9 octobre, 13 ovembre, 11 décembre 1857)。——515、517—518。

G

〔给波拿巴的信〕, 载于 1797 年 8 月 12 日《国民报, 或总汇通报》第 325 号 ([*Letters to Bonaparte*.] In: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325, August 12, 1797)。——349。

《工厂视察员半年来的报告》, 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Half-yearly Joint Report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117—124。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6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6*. London, 1857)。——117。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113、114、117。

《关于进一步修正工厂劳动条例的法令》(*An Act for the further Amendment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113。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 1857 年 4 月为止的四个月》, 载于 1857 年 5 月 30 日《经济学家》第 718 期 (*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Four Months ended April,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18, May 30, 1857)。——503—504。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 1857 年 5 月为止的五个月》, 载于 1857 年 6 月 27 日《经济学家》第 722 期 (*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Five Months ended May,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22, June 27, 1857)。——503—504。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 1857 年 6 月为止的六个月》, 载于 1857 年 8 月

- 1日《经济学家》第727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June,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27, August 1, 1857.*)。——503—504。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7年7月为止的七个月》，载于1857年8月29日《经济学家》第731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Seven Months ended July,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31, August 29, 1857.*)。——503—504。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7年10月为止的十个月》，载于1857年11月28日《经济学家》第744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Ten Months ended October,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44, November 28, 1857.*)。——503—504。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7年9月为止的九个月》，载于1857年10月31日《经济学家》第740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Nine Months ended September, 1857. In: The Economist, No. 740, October 31, 1857.*)。——503—504。
- 《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下院。1857年》185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sults in China. Presen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7. [London,]1857.*)。——77。

H

- [霍纳, 伦·]《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先生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Horner, L.*]: “*Report of Leonard Horner, Esq., Inspector of Factories,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the 31st of October 1856.*”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115。

J

- 《交战国在普莱斯维茨签订的停战协定。1813年6月》，载于G.F.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1部分：1808—1814年》1817

年格丁根版(Armistice conclu entre les puissances belligérantes, à Pleiswitz le 5 juin 1813.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I, 1808 — 1814, Gottingue, 1817)。——356。

L

[《利物浦财政改革委员会主席及全体成员向联合王国各阶级发出的呼吁书》], 载于 1856 年 12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2561 号([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and Council of the Liverpool Financial Reform Association to the Middle, Commercial,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Class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Times, No. 22561, December 26, 1856. “Liverpool Revision of Taxation”)。——56。

M

《马德拉斯刑讯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5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Cases of Torture at Madras. London, 1855)。——302 — 303。

《马伦戈会战后法意签定的军事协定》, 载于 G. F. 马尔滕斯《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 7 部分: 1800 — 1803 年 1831 年格丁根版(Convention arrêtée entre le citoyen Alex. Berthier, général en chef de l'armée française en Italie, et S. Excellence le baron de Mélas, général en chef de l'armée impériale en Italie, après la bataille de Marengo. In: G. F. Martens,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VII, 1800 — 1803, Gottingue, 1831)——312。

《摩尔多瓦不同政治人物的秘密信件摘录》, 载于 1857 年 8 月 8 日《多瑙河之星》第 50 号(Extraits de lettres confidentielles adressées au ca macam de Moldavie par différents personages politiques. In: L' Etoile du Danube, No. 50, 8 août 1857)。——291 — 293。

N

拿破仑第一《在里昂签署的[一项命令]。1815 年 3 月 13 日》, 载于 1815 年 3 月 21 日《总汇通报》第 80 号(Napoléon I. : A Lyon, le 13 mars 1815 [a decree].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80, March 21, 1815)。——400 — 401。

拿破仑第三[《给财政大臣的信。1857年11月10日》,载于1857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第315号(Napoléon III. : Lettre à S. Exc.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 Le 10 novembre 1857.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315, 11 novembre 1857)。——487。

拿破仑第三[《1857年11月10日的法令。废除1856年9月8日和1857年9月22日的法律》],载于1857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第315号(Napoléon III. : [Decree of November 10, 1857, repealing the laws of September 8, 1856 and September 22, 1857.]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315, 11 novembre 1857)。——487。

P

帕麦斯顿,亨·约·坦·[《致英国驻香港公使的急件。1849年8月18日》],载于1857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616号(Palmerston, H. J. T. : [Dispatch to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at Hong-Kong, August 18, 1849.] In: The Times, No. 22616, February 28, 1857. Quoted from J. Graham'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February 27, 1857)。——73。

《普鲁士国王陛下、法国皇帝陛下和意大利国王陛下在巴黎签订的同盟条约。1812年2月24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1部分:1808—1814年》1817年格丁根版(Traité d'alliance entre S. M. le Roi de Prusse et S. M. l'Empereur des Français Roi d'Italie; signé à Paris le 24 févr, 1812.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I, 1808—1814, Gottingue, 1817)——367。

《普鲁士国王陛下和法兰西共和国国王陛下在巴勒签订的和平条约。1795年4月5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6部分:1795—1799年》1829年格丁根版(Traité de paix entre Sa Majesté le Roi de Prusse et la R épublique française, conclu et signé à Bâle, le 5 d'avril 1795.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d'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VI, 1795—1799, Gottingue, 1829)——366。

R

《瑞典国王陛下和丹麦国王陛下在基尔签订的和平条约。1814年1月14日》,

载于 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 中立等条约汇编。第 1 部分：1808—1814 年》1817 年格丁根版 (*Traité de paix entre L. L. M. M. les Rois Suè de et de Danemarc, conclu à Kiel le 14 janv. 1814.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I, 1808—1814, Gottingue, 1817*)——357。

《瑞典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1812 年 4 月 5 日》，载于《英国及外国文件汇编。1812—1814 年》1841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 部分 (*Traité d' alliance offensive et défensive entre la Suè de et la Russie. — Signé à St. Pétersbourg, le 5 avril 1812. In: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12—1814, Vol. I, Part I, London, 1841*)。——355。

《瑞典和俄国在奥布签订的同盟第二公约补充条款。1812 年 8 月 30 日》，载于《英国及外国文件汇编。1812—1814 年》1841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 部分 (*Seconde convention Additionnelle d' Alliance entre la Suè de et la Russie. — Segnée à Abo, le 30 août, 1812. In: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12—1814, Vol. I, Part I, London, 1841*)。——356。

《瑞典和俄国在腓特烈港签订的和平条约。1809 年 9 月 5—17 日》，载于 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 中立等条约汇编。第 1 部分：1808—1814 年》1817 年格丁根版 (*Traité de paix entre la Suè de et la Russie, signé à Friedrichshamm le 5/17 sept. 1809 ratifié à Stockholm le 3 oct. et à St. Petersbourg le 1/13 oct. 1809.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I, 1808—1814, Gottingue, 1817*)——354。

X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 年 10 月 30 日》]，载于 1857 年 1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2567 号 (Seymour M. : [A letter to Yeh, Governor-General of two Kwangs Provinces, October 30, 1856.] In: The Times, No. 22567, January 2, 1857)。——20。

西马糜各厘[《致两广总督叶名琛。1856 年 11 月 2 日》]，载于 1857 年 1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2567 号 (Seymour M. : [A letter to Yeh, Governor-General of two Kwangs Provinces, November 2, 1856.] In: The Times, No. 22567, January 2, 1857)。——19、20、21。

Y

叶名琛〔致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1856年11月3日〕，载于185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第22571号（Yeh: [A letter to the Naval Commander-in-chief M. Seymour of November 3, 1856.] In: The Times, No. 22571, January 7, 1857）。——20、22。

《英国国王陛下和瑞典国王陛下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联合及援款条约。1813年3月3日》，载于G. F. 马尔滕斯《新的同盟条约、和约、停战和中立等条约汇编。第1部分：1808—1814年》1817年格丁根版（Traité de concert et de subsidie entre S. M. Britannique et le Roi de Suède, signé à Stockholm le 3 mars 1813. In: G. F.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d' 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 de Neutralité. . . , t. I, 1808—1814, Gottingue, 1817）——356。

《英格兰银行券发行管理法。1844年7月19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4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and for Giving to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ertain Privileges for a Limited Period. [19th July 1844.]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 & 8 Victoria, 1844. London, 1844）。——475、478、481。

Z

《致维也纳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声明〕》，载于1848年10月22日《维也纳日报》第290号（An die Wiener [an address of the Left wing of the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In: Wiener Zeitung, No. 290, October 22, 1848）。——321。

报刊中的文章或通讯

C

《晨报》

—1857年10月5日第20686号：《我们当前在印度的形势》。——436。

《晨邮报》

- 1857年3月27日第25971号:《全国候选人游说实情》。——96。
—1857年8月13日第26090号:《印度邮政收入》。——295。
—1857年11月12日第26168号:《英国资金市场波动……》。——484。

G

《国民报,或总汇通报》

- 果月29日[1799年]第359号:《可靠的公民贝尔纳多特……》。——350。

J

《经济学家》

- 1856年11月15日第690期:《茶叶税和食糖税》。——58。
—1857年6月27日第722期:《到5月为止的5个月的贸易》。——502—503。
—1857年8月1日第727期:《6个月的贸易》。——502—503。
—1857年8月29日第731期:《贸易和航运报告书》。——502—503。
—1857年11月28日第744期:《商务部报告书》。——502—503。

T

《泰晤士报》

- 1857年1月2日第22567号:《我们现在拥有来自中国的全部报道》。——17。
—1857年2月27日第22615号:《两院就中国问题进行激烈争论》。——67。
—1857年3月5日第22620号:《可能立即上诉……》。——72。
—1857年4月7日第22648号:《什么使普选改变?……》。——108。
—1857年4月30日第22668号:《大不列颠皇家银行》。——132。
—1857年5月15日第22681号:《评战争中的胜利》。——160。
—1857年6月29日第22719号:《印度起义详情。本报通讯员报道》。——165。
—1857年7月9日第22728号:《金融市场与伦敦城信息》。——172。
—1857年7月15日第22733号:《印度起义》。——187。
—1857年7月23日第22740号:《印度起义让我们了解……》。——213。
—1857年8月19日第22763号:《印度起义》。——336。
—1857年8月21日第22765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但……》。——300。

- 1857年8月25日第22768号：《印度起义》。——336。
- 1857年9月4日第22777号：《印度起义。德里》。——383。
- 1857年9月18日第22789号：《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383。
- 1857年9月29日第22798号：《驻马耳他海军少将致伦敦海军大臣。9月25日下午6点》。——419。
- 1857年10月1日第22800号：《印度》。——433。
- 1857年10月5日第22803号：《1857年8月13日来自孟加拉的一位炮兵军官的信》。——433。
- 1857年11月6日第22831号：《英格兰银行今日增加收费……》。——477。
- 1857年11月16日第22839号：《印度》。——492。
- 1857年11月26日第22848号：《金融市场和城市情报》。——500。

Z

《自由新闻》

- 1857年11月11日第20号：《麦克斯菲尔德。1857年11月5日》。——486。

《总汇通报》

- 1856年3月9日第69号：《巴黎。3月8日》。——136。

文学著作

F

- 伏尔泰《浪子》。——205。

G

- 《感恩赞》。——317。

H

- 荷马《伊利亚特》。——230。
- 赫西俄德《劳动和时间》。——64。

M

蒙吕克《格言剧》1618年巴黎版。——293。

莫扎特《后宫诱逃》。——337。

P

平达《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76。

S

莎士比亚《约翰王》。——75。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75。

莎士比亚《量罪记》(又译《一报还一报》或《请君入瓮》)。——66。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32。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37。

Y

《一千零一夜》。——72、109。

伊索《狐狸和乌鸦》。——97。

圣经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162。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228。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1。

报 刊 索 引

B

-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The North British Daily Mail)——苏格兰的一家报纸, 1847年在格拉斯哥创刊;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501。
-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Punch),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是威·梅·萨克雷。——77。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111、436。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96、98、108、111、295、484。

D

- 《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英国官方的报纸。简称《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1859年在维多利亚(香港)出版。——63。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484。
- 《多瑙河之星》(L'Etoile du Danube)——罗马尼亚自由派的法文报纸,1856—1857年在布鲁塞尔出版。——290—293。

G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09。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巴黎创刊;1852—1870年是波拿巴政府的半官方报纸。——272。

《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au Moniteur universel)——见《总汇通报》。

《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见《总汇通报》。

H

《彗星》(Der Kome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日报,1830—1848年出版,出版地由最初的阿尔滕堡转到莱比锡。——320。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484。

《纪事报》(Chronicle)——见《纪事晨报》。

《加尔各答日报》(The Calcutta Gazette)——1784年起在孟加拉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官方喉舌。——384。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58、479、486。

《军事旁观者》(Military Spectator)——英国的军事周报,1857—1858年在伦敦出版。——465。

M

《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661年创刊,起初为月刊,后为周报,1890年起改为日报;1698年起为政府的官方报纸。——

151。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99。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J.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斯·霍奇斯;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23、323、325、437、484。

《孟加拉日报》(The Bengal Gazette)——见《加尔各答日报》。

《孟买日报》(The Bombay Gazette)——1791—1914年在孟买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492。

《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1838—1861年在孟买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270、271。

《孟买信使报》(The Bombay Courier)——一家英文报纸,1790—1861年在孟买出版,东印度公司的机关报。——467。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62、290、432。

P

《佩斯劳埃德氏报》(Pester Lloyd)——匈牙利一家自由派德文报纸,匈牙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1853—1944年在布达佩斯出版,每天两次。——94。

Q

《前进》(Vorwärts)——德国的一家通俗文集,1843—1847年由罗·勃鲁姆和弗·施泰格在莱比锡出版。——320。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约1917年在伦敦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484。

S

《萨克森祖国报》(Sächsische Vaterland-Blätter)——德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1837年起在德累斯顿出版,1840—1845年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版。——320。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一家报纸,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持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倾向。——111。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第二,约·瓦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茵(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17、18—22、52、56、58、61、63—67、71—73、

76—78、86、89、90、97、108、111、132、159、160、165、172、186、187、212—215、
300、323—325、336—338、392、419—420、433、477、486、492、500、511。

《通报》(Le Moniteur)——见《总汇通报》。

W

《晚报》(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消遣文艺报,1805—1806、1817—1843年由卡·哥·泰·温克勒化名泰奥多尔·赫尔(1826年以前同弗·金德一起)编辑出版,主要刊登无名作者的肤浅的消遣文艺作品;1836—1843年还每周出版两期附刊《文学和艺术报》(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320。

X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484。

《宪法之友》(Verfassungsfreund)——德国一家自由派报纸,1843年由罗·勃鲁姆和弗·施泰格在莱比锡出版;该报只出版了两号,就被书报检查官查禁了。——320。

《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的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108、272。

《乡巴佬》(The Mofussilite)——印度一家自由派英文周报,1845—1870年中期出版,最初在密拉特,后在阿格拉和安巴拉出版。——326。

Y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孟加拉的一家英文报纸,1818年在塞兰布尔创刊,19世纪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465、467。

《舆论报》(L'Opinione)——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卡富尔的自由保皇派的机关报,1848年在都灵创刊。——517。

Z

《中华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见《大陆上中华之友》。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周刊)。1855—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曾发表过马克

思的一些文章。——486。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第二帝国时期报纸加副标题《法兰西帝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Empire Français);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136、137、139、141、349—350、487。

地名索引

A

- 阿巴西努姆城 189。
 阿本斯贝格 189、313。
 阿波尔达 351。
 阿布吉尔 412。
 阿德莱德 479。
 阿德勒克拉 352。
 阿德里安堡 42。
 阿迪斯库姆 330。
 阿尔卑斯山脉 8、10、238。
 阿尔贝格 15。
 阿尔贝拉 237、238。
 阿尔布埃拉 192。
 阿尔布埃拉河 192。
 阿尔登霍芬 194。
 阿尔及尔 275、276、279、280、281、
 282、284、499。
 阿尔及尔湾 280。
 阿尔及利亚 9、274、275、276、280、
 281、282、283、284、440、497、498。
 阿尔托纳 506。
 阿尔泽 282。
 阿弗尔 515。
 阿富汗 24—29、45、46—49、159、
 160、161、216—217、219、222、225。
 阿格拉 165、270、325、326、383—
 385、421、434、437。
 阿卡迪亚 234。
 阿肯 371。
 阿拉 385。
 阿拉伯 281。
 阿拉斯河 47。
 阿兰胡埃斯 152。
 阿勒河 13、14、15、16、317。
 阿勒颇 417。
 阿雷基帕(省) 395。
 阿里布尔 324。
 阿利丹 224。
 阿利坎特 440。
 阿利马村 201。
 阿利马河 198、201、392、410。
 阿马 119。
 阿姆斯特丹 203。
 阿尼克 502。
 阿萨姆(邦) 467。
 阿斯珀恩 182。
 阿斯泰拉巴德 46—50。
 阿斯特拉罕 47—49。
 阿塔克 217。

- 阿特拉斯山脉 274、276。
阿提卡 232。
阿瓦赫 468。
阿维尼翁 471—472。
阿亚库乔 394。
阿赞库尔 177、181、246。
埃德斯海姆 366。
埃登科本 366。
埃尔比斯 378。
埃尔金 392。
埃尔斯特 370。
埃尔祖鲁姆 29。
埃格米尔 189。
埃及 226、227、297、312、412、227、
312。
埃克斯西德伊 496。
埃劳——见普鲁士埃劳。
埃默河 15。
埃纳河 378、379。
埃内兹 42—43。
埃佩尔奈 375。
埃施韦勒 194。
埃斯灵 182、412。
埃斯特雷马杜拉 192。
埃托日 376、377。
埃兹沃尔德(埃兹沃尔) 357。
艾克斯拉沙佩勒(亚琛) 194。
爱丁堡 485。
爱尔福特 366、378。
爱尔兰 87、399。
爱森纳赫 372。
安巴拉 165、186、273、322。
安达卢西亚 192—219。
安拉阿巴德 165、327、422、436、
437。
安斯巴赫 366。
安特里姆 119。
安特卫普 194—203、204、423。
安特卫普省 353。
昂格吕尔 318。
敖德萨 111。
奥布(城) 356、162。
奥布河 373、375、378。
奥布河谷 374。
奥布河畔阿尔西 380。
奥布河畔巴尔 373。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445。
奥德(省) 164、166、187、208、300、
327、384、421、433、436。
奥地利 3、4、10、12、37、40、42、43、
162、196、247、262、263、264、288、
289、290、301、313、429。
奥尔达尔河 496。
奥尔德姆 96。
奥尔施泰特 351、352、366。
奥尔泰尼察 144。
奥格斯堡 313。
阿克尼群岛 399。
阿克苏斯河(阿姆河) 46、49、238。
奥兰(省) 276、283、284、497。
奥兰加巴德 214、296、385、386。
奥伦堡(契卡洛夫) 48、49。
奥恰科夫 315。
奥什米亚内 315。

奥斯特利茨(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 350、366、407、412。
 奥斯特罗文卡 415。
 澳大利亚 澳洲 130、172、483、502。
 澳门 17。

B

巴比伦 443。
 巴达霍斯 192、392。
 巴达维亚 472。
 巴尔干山脉 13。
 巴尔赫 46—49、217。
 巴伐利亚 189、313。
 巴格达 159。
 巴赫奇萨赖 198。
 巴库 47、48。
 巴拉克拉瓦 168、410、491。
 巴拉希萨尔 223。
 巴雷利 325。
 巴黎 85、139、157、159、173、174、180、301、352、353、354、357—368、373、375—381、400、401、415、471、472、473、496、515、516。
 巴里奥斯(洛斯巴里奥斯) 152。
 巴利阿里群岛 243。
 巴利亚多利德 412。
 巴纳特 417。
 巴萨 440。
 巴塞爾 15。
 巴士拉 160。
 巴斯克 10。
 巴特那 328。
 巴伊亚(萨尔瓦多) 513。
 巴约讷 151、346。
 白沙瓦 24、49、50、217、219、220、224、225、296、328、335。
 拜罗伊特 366。
 班贝格 311、314。
 班达 468。
 班加罗尔 336。
 班特尔恩 315。
 包岑 310、367、369、370。
 保加利亚 13。
 北非 274。
 北海 280、399。
 北京 73、80、105、147、148。
 北希尔兹 502。
 贝阿沃尔 468。
 贝恩堡 371。
 贝尔特海峡 351。
 贝汉布尔 165、385。
 贝加尔湖 81。
 贝加莫 517。
 贝拉尔(地区) 208。
 贝里克 502。
 贝里欧巴克 379。
 贝拿勒斯(瓦拉纳西) 213、327、328、336、384、385、436。
 贝热尔 376、377。
 本德尔肯德 296、300。
 本特尔布尔 328。
 比哈尔(邦) 384、437。
 比利牛斯山脉 比利牛斯地区 比

- 利牛斯半岛 187、392、412。
比利时 33、55、203、401、415、453、516。
比萨拉比亚 318。
比绍夫斯韦达 369。
比斯克拉 276。
比图尔 327、384、436。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彼得斯贝格(德) 372。
俾路支 47、216。
秘鲁 93、394。
滨海山脉 7。
波城 348、410。
波的尼亚湾(北部湾) 308。
波尔多 395、515。
波河 8、196。
波兰 36、44、126、249、268、310、414、496。
波兰的西里西亚 365—366。
波罗的海(东海) 309、397、506。
波美拉尼亚(波莫瑞)(地区) 355、366、367。
波尼(安纳巴) 275、282、440。
波斯(伊朗) 24、25、29、45、46—49、58、69、142、143、145、160—163、216、219、220、228、232、316。
波斯湾 29、45、46、47、49、50、298。
波希米亚 350、367、370。
波佐洛 472。
玻利维亚 395。
伯尔尼(州) 14、16、472。
伯勒格布尔 165。
伯罗奔尼撒半岛 234。
伯南布哥(累西腓) 513。
伯西 325。
柏柏尔国家 279。
柏林 319。
勃艮第 4、247。
博伯尔河(布布尔河) 369。
博尔盖托 311。
博尔米达河 196。
博兰山口 221、222。
波罗季诺(波罗底诺) 309、389、450、462。
波斯普鲁斯海峡 359。
波斯沃思 177。
不列颠——见大不列颠。
不伦瑞克 315。
布尔戈斯 412。
布尔日 415。
布哈拉 46—49。
布加勒斯特 289、291、355。
布科维纳 416。
布莱 496。
布莱登斯堡 392。
布莱丁 370。
布赖滕费尔德 372。
布里夫拉盖亚尔德 471。
布里吉特瑙 321。
布列讷 373、374、400。
布列塔尼(半岛) 472。
布拉底 181、229、231、234。
布鲁格 13、15。
布鲁塞尔 203、290。

布吕恩(布尔诺) 350。
 布洛涅 473。
 布日伊(贝贾亚) 275、276、282。
 布日伊湾 275。
 布什尔 49、50、145、160、162、166、
 298。

C

柴郡 119。
 昌巴耳河 468。
 长江(扬子江) 105、107。
 崇明岛 105、106。
 楚格湖 13。

D

达达尼尔海峡 359。
 达勒姆 502。
 达斡尔山(雅布洛诺夫山脉) 148。
 鞑靼区 鞑靼 81、106。
 大贝伦 356。
 大不里士 49。
 大不列颠(不列颠) 56、109、163、
 164、172、207、479、488、501、515。
 代希瑟尔河 369。
 丹麦 301、351、355、453、506、513。
 但泽(格但斯克) 317、414、507、
 508。
 德比郡 119。
 德干高原 386。
 德格沙伊 322。
 德国 德意志 13、44、248、254、268、
 301、319、321、350、400、441、445、

448、502、519。

德黑兰 29、46、49、161、162。
 德累斯顿 369。
 德里 165、166、167、185、186、212、
 213、219、270、271、272、273、294、
 296、299、300、322、323、324、325、
 327、336、386、419—422、488。
 德文(郡) 119。
 登讷维茨 356。
 迪安维尔 373。
 迪纳杰布尔(县) 468。
 迪纳普尔 328、385、436、437。
 地中海 227、238、274、279、280。
 的里雅斯特 516。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317、351、
 367。
 蒂克斯伯里 129—130。
 蒂龙 119。
 蒂罗尔(州) 8、10。
 东普鲁士 308。
 东印度 479、508。
 都灵 447、472。
 杜本 371。
 敦刻尔克 398。
 多恩堡 351。
 多尔芒 375。
 多瑙河 8、13、31、44、244、289、359、
 362。
 多瑙河两公国——见摩尔多瓦和瓦
 拉几亚。
 多塞特(多塞特郡) 119。

E

俄国(俄罗斯) 10、23、25、30—43、
45、46、47、48、74、77、80、82、94、95、
126、128、142、220、262、263、264、
265、288、289、301、313、318、351—
358、502。
俄属波兰 415。
厄尔巴岛 180、310、314、401。
尼尔布尔士山脉 45。
厄尔士山脉 369。
厄勒布鲁 354、355。
恩巴河 47。

F

法尔塞斯坦 228。
法夫郡 119。
法国 法兰西 12、13、33、35、37—
40、84、85、95、112、126、137、142、
157、162、175、233、247、254、261、
262、263、264、267、268、280、281、
288、289、301、310、313、340、342、
351—358、412、415、441、449、455、
487、497—498、515—519。
法塔哈巴德 326。
法塔赫布尔 327、384、436。
法扎巴德 436。
凡尔赛 311。
方丹莱韦克 401。
非洲 244、275、439。
菲利普维尔 284。
菲罗兹布尔 166、215。

菲姆 379、380。
菲绍(菲谢沃) 415。
腓特烈港(哈密纳) 354。
腓特烈斯塔 357。
费尔尚普努瓦斯 376。
芬兰 351—356。
芬洛 194。
丰特努瓦 183。
佛兰德 398。
弗勒吕斯 348。
弗里德兰(普拉夫金斯克) 317、
412、450。
伏尔加河 48。
孚日山脉 373。
福尔诺沃 442。

G

甘达马克 224。
高加索 10、11、47、48、127、128。
高加索山脉 25。
格尔利茨 310。
格尔穆格代瑟尔 325。
格尔纳尔 324、325。
格讷拉 306。
格拉迪斯卡 349。
格拉尼库斯(河) 230、238。
格拉斯哥 119、479、485。
格赖芬哈根 445。
格朗松 3。
格劳宾登(州) 7、8。
格勒内勒 472。
格洛斯特(郡) 119。

格绍利 322。
 格扎茨克 309。
 戈尔德贝格(兹沃托雷亚) 369。
 戈尔哈布尔 386。
 戈莱伦河(高韦里河) 306。
 哥本哈根 301、392、513。
 根特 55、203、314、441。
 贡比涅 314。
 古巴 93、153。
 古吉拉特(邦) 328、424。
 古莱阿 276。
 古利斯坦 25。
 瓜廖尔(勒什格尔) 187、300、436、
 437、468。
 瓜州 106。
 广东 21、147。
 广西 147。
 广州 17—18、20、22、23、58、62—
 67、73、76、78、91、92、147、148。

H

哈德斯菲尔德 96、98。
 哈恩省 152。
 哈雷(德) 371、372。
 哈马丹(埃克巴坦那) 49。
 哈瓦那 153。
 海得拉巴 328、385、386、387、468。
 海尔斯贝格(利兹巴克瓦尔明斯基)
 317。
 海瑞(霍伊努夫) 367。
 汉堡 318、367、400、401、473、487、
 505—508、513、517。

汉诺威 315、318、350。
 好望角 297、470。
 荷尔斯泰因 301、357。
 荷兰——见尼德兰。
 赫布里底群岛 399。
 赫尔 53。
 赫尔曼德河 217。
 赫尔辛堡 354。
 赫克瑟姆 502。
 赫拉特 24、29、45—50、159、160、
 161、188、216、219、220、221、298。
 赫曼施塔特(锡比乌) 417。
 赫希斯特 373。
 黑海 43、516。
 黑河(乔尔纳亚河) 411。
 黑利伯里 330。
 黑龙江(阿穆尔河) 82、148。
 恒河 300、327、384、385、422、436。
 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 325、436。
 呼罗珊(山脉) 45、46、48、50。
 呼罗珊 216、219。
 胡宁省 394。
 华沙 316、415。
 华盛顿 392。
 滑铁卢(贝拉利昂斯) 180、182、310、
 381、430。
 黄海 105。
 霍贾克山口 221。

J

基德明斯尔 78。
 基尔 357。

基尔卡 395。
 基尔韦勒 366。
 吉伦特省 471。
 济里盐沼 217。
 加的斯 395。
 加尔比 436。
 加尔各答 49、165、166、186、213、
 297、331、332、385、422、435—437、
 467—469。
 加济布尔 385。
 加来 398。
 加利西亚(地区) 414。
 加泰罗尼亚 496。
 加兹尼 46、49、217、220、221、224。
 贾巴尔普尔 468。
 贾格达拉克山口 224。
 贾拉拉巴德 224、225。
 贾朗达尔 322。
 焦特布尔 468。
 杰尔宾特 316。
 杰赫勒姆 328。
 旧迈松 376。
 旧森林州 7。
 君士坦丁 281、282、283、284。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159、
 161、280、288、290、473。

K

喀布尔 24、46—49、217、220、221、
 222、223、224、225。
 喀布尔河 49、217。
 喀琅施塔得 82。

卡昂 400。
 卡比利亚(大卡比利亚和小卡比利
 亚) 284、410、498。
 卡茨巴赫(卡恰瓦) 368、369、381。
 卡迪博纳山口 7。
 卡尔斯 69、144。
 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 310。
 卡尔斯堡 416。
 卡尔瓦多斯省 471。
 卡拉米特湾 198。
 卡拉奇 468、469。
 卡莱尔 86、88。
 卡累利阿(卡尔亚拉) 308。
 卡利亚里 419。
 卡皮托利诺山 239。
 卡宴 293。
 开伯尔山口 224。
 开封 424。
 凯撒斯劳滕 366。
 堪察加(半岛) 82。
 坎波福米奥 349、472。
 坎大哈 24、46、49、217、219、220—
 221、224。
 坎德什 386。
 坎尼 182。
 坎普尔 300、326、327、328、383、384、
 421、422、436。
 康斯坦茨 12、13、14。
 康沃尔(郡) 119。
 考布 373。
 考文垂 119。
 柯尼希斯瓦尔塔 310。

科堡 194。
 科布伦茨 13、15、373。
 科茨克 414。
 科多尼奥 312。
 科尔贝尼 379。
 科尔多瓦 440。
 科拉普尔 385。
 科林 389。
 科隆 319、372。
 科鲁尼亚 397、398。
 科摩林角 437。
 科希斯坦(库希斯坦)(地区) 216。
 克拉奥纳 379。
 克拉克曼南郡 119。
 克雷西 181、246。
 克里布洛维茨(克罗别洛维采)
 365。
 克里木 126、202、261、392。
 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 300、
 357、358。
 克里特岛 243。
 克罗地亚 254。
 克罗伊奇(克罗托希采) 369。
 克什米尔 216、437。
 孔岑多夫(莫克热舒夫) 367。
 库讷斯多夫(库诺维采) 389、448。
 库斯科 394。
 库希斯坦(科希斯坦)(地区) 46。

L

拉昂 378、379、380。
 拉费尔 447。

拉费泰苏茹瓦尔 375、378。
 拉合尔 166、270、325、467、468、469。
 拉杰布塔纳(拉贾斯坦) 186、187。
 拉罗蒂耶尔 373、374、380。
 拉芒什海峡 34、398、399。
 拉纳克 119。
 拉施塔特 349。
 拉特考 351、367。
 莱比锡 253、254、310、318、320、357、
 370—373、400。
 莱里达 496。
 莱斯河 14、15。
 莱特河 379。
 莱希河 253。
 莱茵河 12、13、14、359、372、373、
 378。
 莱茵普鲁士 194、320。
 莱茵省 莱茵 莱茵区 莱茵地区
 244、372、373、378。
 赖讷克 14。
 赖兴巴赫 368。
 兰茨胡特 189。
 兰开夏郡 115、116、119、512。
 兰斯 378、379、380。
 朗贝萨(朗贝塞) 276。
 朗蒂 442。
 朗格勒 378、380。
 朗吕 375。
 勒克瑙 166、214、326、327、328、383、
 419—422、436。
 雷根斯堡 313。
 雷根州 189。

雷瓦 468。
黎凡特(地区) 516。
里昂 401、515。
里奥塞科城 412。
里尔 515。
里海 45、46、47、48、163、316。
里米尼 442。
里帕赫 413。
里斯本 397。
里沃利 312、412、472。
里约热内卢 513。
立陶宛 316。
立窝尼亚(地区) 308。
利包(利耶帕亚,斯拉夫斯克) 82。
利马特河 13、14、15。
利摩日 496。
利尼 381。
利物浦 55、76、88、99、483。
林克伍德 392。
留克特拉 182、234。
卢迪亚纳 322、326。
卢戈日 417。
卢森堡 366。
鲁昂 515。
鲁贝 515。
吕贝克 351、366、367。
吕岑 253、367、372、412、413。
吕根岛 365、473。
伦贝格(利沃夫) 415。
伦敦 17、77、88、111、270、330、479、
484、501、507、508、511、512。
伦弗鲁(伦弗鲁郡) 119。

伦格布尔 468。
罗马 239、242、312。
罗马高卢省(今普罗旺斯地区)
241、242、243。
罗马尼亚 289、291。
罗讷河 14、474。
罗奇代尔 96。
罗斯托克 365、381。
罗韦雷多(罗韦雷托) 412。
罗希尔肯德 300、323、325、433、
467。
罗希尔肯德山脉 325。
罗伊斯河谷 8、13。
洛迪 312。
洛哈 152。
洛桑 14、16。
洛特(省) 412。
洛伊滕(卢蒂尼亚) 389、447。

M

马德拉斯 165、187、214、296、302、
304、328、331、332、437、469。
马德里 152、153、172、395、412、487。
马恩河 376—380。
马尔普拉凯 446。
马尔托斯 440。
马尔瓦 387。
马耳他 279。
马格德堡 371。
马赫迪亚 440。
马拉巴尔海岸 306。
马拉霍夫冈 411。

- 马拉松 181、229、231。
马里尼亚诺(梅莱尼亚诺) 250、442。
马伦戈 412。
马其顿 237、239。
马赛 294、349、472、515、516。
马斯特里赫特 194、348。
马乌 296、325、386。
迈森 371。
迈索尔 328、336。
迈提贾(平原) 276。
麦克斯斯菲尔德 486。
满洲 148。
曼彻斯特 76、86、88、96、97、99、100、479、486、512。
曼丁尼亚 182。
曼海姆 373。
曼萨纳雷斯 152。
梅克伦堡 355。
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 365。
梅里 377、380。
梅斯 410。
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合众国 19、204、261、268、392、483、487、502、515—519。
美因茨 372、373、378。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321。
美洲 38、395。
蒙巴宗 472。
蒙多维 311。
蒙茅斯 119。
蒙米赖 375、376、377。
蒙特罗 377。
孟加拉 165、166、188、209、214、323、328、385、437、467。
孟买 165、166、187、188、209、212、214、296、323、328、331、332、437、467、469。
米尔豪森 366。
米尔豪森(米卢斯) 515。
米尔萨布尔 328、385、436。
米卡莱角(萨姆松山) 229。
米兰 312、349。
密拉特 165、166、214、273、322、325、336、420。
密西西比河 48。
明斯特 366。
摩尔多瓦 42、288、290、291、293、300、417。
摩洛哥 274。
摩泽尔河 13。
摩泽尔河谷 373。
莫(市) 378。
莫尔加滕 3。
莫尔施海姆 366。
莫尔维茨(马卢约维采) 255。
莫拉达巴德 325。
莫雷纳山 152。
莫伦根(平原) 351。
莫珀斯 502。
莫斯科 49、309、313、355、356。
墨尔本 479。
墨西哥 361。
默肯(丹尼希科) 372。

木尔坦 433、468。
穆德拉 434。
穆尔德河 371。
穆尔加布河 46。
穆尔滕 3。
穆罕默腊 145、160。
穆斯塔加奈姆 282。

N

拿骚 446。
那不勒斯(那波利) 40、58、69、262、
453。
那格浦尔 328、385—387。
那格浦尔地区 328。
纳戈德 468。
纳列夫河 316、415。
纳沙泰尔(诺因堡) 311。
纳沙泰尔湖 15。
纳西拉巴德 326、468。
南京 105、106、107、147、148。
南美洲 南美 394。
南特 515。
南希尔兹 502。
瑙姆堡 351。
内尔温登 194。
尼泊尔 188、384。
尼德兰(荷兰) 194、250、346、351、
373、415、443、453、516、519。
尼加拉瓜 22。
尼罗河 217、226。
尼罗河三角洲 226。
尼默杰 325、326。

尼斯河 368、369。
涅布拉 440。
涅曼河(梅梅尔河) 315。
纽卡斯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502。
挪威 301、355—358、399、506、507。
诺丁汉郡 119。
诺让(塞纳河畔) 377。
诺森伯兰(郡) 502。

O

欧雷斯山 274。
欧洲(欧罗巴洲) 30、32、36—40、
55、82、84、137、142、157、158、
172—174、204、247、260、268、274、
279、355—358、381、388、407、424、
451、487、505、511。

P

帕尔特河 372。
帕鲁帕米苏斯山脉(白山) 217。
帕维亚 177、250。
潘普洛纳 149。
旁遮普 164、166、186、187、209、215、
216、219、220、273、296、306、322、
323、328、386、433、435、467、468、
469。
佩鲁贾 248。
佩斯 415、487。
佩斯利 119。
蓬泰科尔沃 348、350。
皮埃蒙特 196、473。

皮尔马森斯 451。
 皮纪尧姆 440。
 皮劳尔 186、322。
 皮斯托亚 248。
 品第 335。
 珀勒德布尔 326。
 葡萄牙 38、63、415、453。
 普法尔茨 366。
 普赖萨克 412。
 普劳斯尼茨(普鲁西采) 369。
 普鲁士 12、37、40、95、254、261、262、
 263、264、265、268、288、289、301、
 356、367、415、496。
 普鲁士埃劳(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
 308、316、317、412。
 普鲁特河 309。
 普诺 395。
 普瓦捷 182、246。
 普乌图斯克 316。

Q

奇珀瓦 183。
 恰克图 81、82。
 恰拉克岛(伊) 29。
 千岛群岛 82。
 切尔克西亚 43、94。
 切塔泰 144。
 丘基萨卡(拉巴斯) 395。

R

日内瓦 14、16。
 茹安维尔 373。

汝拉山 14、16。
 瑞典 254、301、351—358、371、453、
 487、506、507、513。
 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波莫瑞) 355。
 瑞士 3、4、7、11、12、15、235、247、
 262、373、377、473、516、519。

S

撒丁岛 288、289。
 撒哈拉 撒哈拉沙漠 274。
 撒马尔罕 46、49。
 萨达拉 207、208、328。
 萨尔河 373。
 萨克森 320、370、413。
 萨拉戈萨 300、440。
 萨拉曼卡 412。
 萨勒河 371。
 萨摩斯(岛) 235。
 萨默塞特(郡) 119。
 萨特利杰河 186、221、238。
 萨西亚 326。
 塞尔维亚 41、42、254。
 塞纳河 375。
 塞瓦斯托波尔 198、202、270、272、
 294、431、456、488、491、495。
 塞扎讷 375、378。
 桑斯 377、400。
 桑坦德 399。
 色雷斯 238。
 色萨利区(帕撒利亚区) 232、237、
 242。
 森德兰 502。

森帕赫 3。
 沙蒂永 374、380。
 沙哈巴德 385。
 沙贾汉布尔 325。
 沙捞越 146。
 沙勒罗瓦 401。
 沙隆(马恩河畔沙隆) 376、377。
 上海 105、147。
 上莱茵 350、373。
 尚波贝尔 376、377。
 绍戈尔 296、328、437。
 绍梅尼勒 373。
 舍尔舍耳(尤利亚—凯撒里亚)
 276。
 设拉子 46、50、160。
 申布伦 353。
 圣艾蒂安(圣亚田) 515。
 圣彼得堡 316、342、355、415。
 圣迪济耶 380。
 圣多明各(海地)岛 337。
 圣哥达山口 8。
 圣赫勒拿岛 309、350、474。
 圣让达克(阿卡) 412。
 圣旺 375。
 圣威廉堡 166。
 施拉特科 473。
 施派尔 346。
 施特拉尔松德 356。
 施韦德尼茨(希维德尼察) 367。
 石勒苏益格 301、357。
 舒斯特尔(舒什特尔) 46。
 斯巴达 229、231—234。

斯德丁(什切青) 355、366、381、
 507、508。
 斯德哥尔摩 348、351、354、355、
 358、506、507、513。
 斯海尔德河 203。
 斯堪的纳维亚 175、300。
 斯摩梭斯克 309。
 斯韦阿堡(芬兰堡) 354—355、428、
 431、459。
 苏巴图 322。
 苏格兰 177、178、392、399、485、486、
 500、502。
 苏莱曼山脉 217。
 苏黎世 8、14、15。
 苏黎世湖 13。
 苏瓦松 378、379、380。
 索安河 385。
 索尔福德 96。
 索雷 315。
 索洛图恩 15、16。
 索米尔 311。
 索姆皮伊 375。

T

塔尔努夫(塔尔瑙) 414。
 塔夫纳河 497。
 塔拉戈纳 496。
 塔拉韦拉 392。
 塔利亚门托河 349。
 塔卢格 306。
 塔纳罗河 196。
 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 417。

泰辛 224。
 汤顿 78。
 唐郡 119。
 特拉亨贝格(日米格鲁德) 356、
 367。
 特拉讷 373。
 特莱姆森(省) 282。
 特兰西瓦尼亚 416、417。
 特里尔波 376。
 特鲁瓦 375、377。
 梯叶里堡 375—378。
 凸角堡(大凸角堡) 69。
 突尼斯 274。
 图阿普谢 94。
 图尔盖河 47。
 图尔克曼恰伊(托尔卡曼) 47。
 图兰 46、47、50。
 土耳其 40—42、142、145、160、254、
 274、280、289、290、410、417。
 土伦 473。
 托恩(托伦) 316、351。
 托尔布尔 468。
 托尔托萨 496。
 托斯卡纳 248。

W

瓦尔河 473。
 瓦尔赫伦岛 353、412、419。
 瓦尔纳 144、168。
 瓦尔滕堡(加尔滕贝格) 370。
 瓦格拉姆 352、362、450、464。
 瓦拉几亚(地区) 42、291、293、416。

瓦伦施塔特湖 13。
 瓦伦扎 196。
 瓦纳什里斯山脉 274。
 旺代(省) 311、334、350。
 威尔士 119。
 威尔特(威尔特郡) 111、119。
 南威尔特郡——见威尔特郡。
 威尼斯 517。
 威斯敏斯特 132。
 维奥蒂亚 232。
 维尔纳(维尔纽斯)省 315。
 维福尔 376。
 维卡尔瓦罗 150、152。
 维勒讷沃 14。
 维罗纳 517。
 维特里 380。
 维滕贝格 371。
 维亚马拉山口 8。
 维也纳 8、87、112、189、315、321、
 349、353、415、416。
 韦尔蒂 375。
 韦勒河 379。
 韦廷 371。
 魏登塔尔 366。
 魏森费尔斯 372。
 温泉关(德摩比利) 181、229。
 文迪亚山脉 325。
 翁斯科特 471。
 沃尔加斯特 355。
 沃尔塔河 472。
 沃库勒尔 373。
 沃里克(沃里克郡) 119。

沃尚 376、377。
乌迪内 349、517。
乌尔克河 378。
乌尔姆 313。
乌拉尔 47。
乌希堡 378。
吴淞 105。
伍斯特 512。

X

西班牙 10、11、40、149、151、175、
241、247、275、276、279、351、377、
395、399、415、443、496、505。
佛兰德(西佛兰德) 398。
西伯利亚 77、81、148。
西兰岛 351、352。
西里西亚(希隆斯克) 247、365—
368、369。
西区 512。
希卡布尔 468。
希腊 41、230、232、235、245。
希利夫河 274。
希萨尔 326、435。
希瓦 46—48、49。
悉尼 479。
锡尔萨 296、326。
锡兰(斯里兰卡) 167、297、469。
锡利斯特里亚 31、32。
锡斯坦 217。
锡亚尔科特 328。
喜马拉雅山脉 217。
下比利牛斯省 348、410。

下孟加拉 328。
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 82。
下夏朗德(省) 499。
厦门 102。
威海 47、49。
香港 17、62、73、77、92、102、145。
肖蒙 373、380。
小贝尔特海峡 308。
小喀布尔山口 224。
小亚细亚 244。
谢明诺夫村 450。
谢斯堡(锡吉什瓦拉) 417。
新奥尔良 48。
新加坡 77、146。
信德 信德省 164、216、221、222、
386、467、468。
兴都库什山脉 45、216、217。
匈牙利 249、263、417。
叙拉古(锡兰库萨) 233。
叙利亚 244。

Y

雅典 232、235。
雅西 290。
亚该亚 238。
亚拉巴马(州) 361。
亚历山德里亚 196。
亚美尼亚 48。
亚述 443。
亚洲 23、25、45、142、165、216、227、
407、439。
亚兹德 46。

药杀水(锡尔河) 46、47。
 耶尔河 377。
 耶利哥(今埃里哈) 338。
 耶拿 351、366、381、412。
 叶夫帕托里亚 198。
 伊尔库茨克 81。
 伊格劳(伊赫拉瓦) 350。
 伊朗 46、50。
 伊利里亚 238。
 伊斯法罕 46。
 伊斯利河 497。
 伊斯特里亚半岛 348。
 以色列 41。
 易北河 356、357、366、367、369 —
 372。
 易北河右岸 370、371。
 易北河下游左岸 370、371。
 意大利 175、245、248、249、268、379、
 487、505、516。
 因古里河 144。
 因克尔曼 50、260、392、411、488、
 491。
 因斯特堡(切尔尼亚霍夫斯克)
 308。
 印度 24、26、90、164、167、172、186、
 207、209、213、214、216、219、220、
 225、271、297—299、307、329、330、
 331、332、334、383、419—421、432、
 436、438、465、469、475、491、508。
 印度河 45、46、49、217、219、220、
 221、227。
 印度斯坦 208、218、323。

印度洋 216。
 印多尔 296、325、386、437。
 英国(英格兰) 17、18、24—29、
 33—35、37、38—43、45、55、62、63、
 65、69、73、74、76—79、84、90、93、
 95、98、106、112、126、137、142、159、
 162、164、167、173、186、187、204、
 220、261—264、281、299—301、
 307、329、331、332、334、356、381、
 396—399、432、436、451、452、468、
 475、477—479、483、501、503、
 515—518。
 英吉利海峡(拉芒什海峡) 173。
 英属印度 46、304。
 尤利安山 8。
 幼发拉底河 160。
 于利希 194。
 于默奥 308。
 约克(约克郡) 119。

Z

扎布(古代的格士利亚) 276、283。
 扎拉库斯山 274。
 扎特切 284。
 詹巴尼尔 424。
 占西 296。
 镇江(府) 105、106。
 直布罗陀 440。
 中国 17—18、19、20、22、62、63、68、
 69、76、82、91、93、102、105、145、
 167、173、297、438、439、475。
 中莱茵(地区) 莱茵河中部(美因茨

至科隆) 372、373。

中亚细亚 220。

舟山岛 102、106。

朱尔朱拉山 274。

朱木拿河(亚穆纳河) 166、273、
325、385、433—435、436、466。

珠江 17、107。